

# 陈毅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说明

陈毅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他便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一起为创建中国人民军队、探寻中国武装革命胜利道路而英勇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他对于制订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战争各阶段的战略战术方针、武装斗争与统战工作相配合、战争经济与后勤工作等方面，都在实践和理论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长期坚持党的正确路线，自觉地注重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他长期的军事实践经验和丰富的军事著述，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系统研究和论述，又是帮助人们学习和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生动教材。《陈毅军事文选》收入的六十六篇文章，便是关照了上述特点而从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数百篇军事著作（包括论文、讲稿、电文、通信等）中精选出来的，其中一部分为节选。这些文电有不少是首次发表，其中有些篇是他和毛泽东个别深谈的心得，十分宝贵。

我们已对入选文章产生的背景和文中史实作了必要的考订，对某些文字在严格保持原著原意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撰写了题解和部分注释。

根据军委指示的精神，得到总政治部的批准，解放军出版社将选编《陈毅军事文选》的任务委托给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这项工作便在南京军区党委和政治部的领导下进行。南京军区党委先后委托郭涛、刘伦贤两位副司令员主管其事，并由政治部缪国亮副主任参与领导。

《陈毅传》编写组接受任务后，分工由副组长吴克斌主持全书的选编工作，并担任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稿的编辑工作；罗英才负责征集全部文稿，并担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稿的编辑工作。对已编文稿实行互审。组长胡石言对选编工作提出若干指导性意见，并参加了对入选文稿的审定和部分编辑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得到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和图书馆、南京军

区档案馆、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等单位和有关方面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我们的选编工作难免有欠妥和失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毅传》编写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 陈毅军事文选

## 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 四军的历史

(一) 四军未成立以前的来源：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1〕，一为由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2〕，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军。叶、贺军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潮汕一带失败，三河坝一战，二十五师及九军失利，向闽赣边界撤退，由朱德率领转入广东北江，曾与范石生〔3〕有一时期的合作，得范之补充不少。一九二八年一月，脱离范石生到湘南，连战击溃许克祥、周斓、白崇禧〔4〕所部，实力增加了两倍。

是年四月湘南暴动失败，不战而安全撤退至江西宁冈与毛部会合。同行有湘南郴州、耒阳、永兴、宜章、资兴五县农军，计宜章第三师。郴州第七师，来阳第四师，永、资两县各有一独立团：毛部基础为卢德铭团。卢在八一暴动之后二日由武昌率队去九江，见张发奎业已反革命，乃中途起举，初拟沿赣边去广东与叶、贺会合，继因道途梗阻，乃留在湘东、赣北一带，复与平浏农军会台，并由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秋收暴动失败后，毛部被迫向南移动至宁冈，复得当时绿林（洪会）首领袁文才、王佐〔1〕之帮助，乃留在井冈山附近各县游击。这是一九二七年底至次年三月间的事。到了四月，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任党代表，改编为三师，卒以枪械及人数不足，乃改编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约万余人，枪仅二千余。

(二) 四军成立以后的经过：四军成立后与反革命斗争经过极艰难的历史，可分作五段叙述：

#### (1) 第一个时期（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七月）

这一个时期四军初成立，内部成分复杂，训练的程度各异，加以湘赣边界贫瘠，致此庞大红军的给养非常困难。同时边界各县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动，单独军事行动无法避免，只是在茶陵、酃县、桂东、遂川、永新、莲花、宁冈七县向皆属崇山峻岭，尤以井冈山为最险要，周围约有五百余里，四军得此地势却可以休息整顿。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发动群众斗争。这一个政策非常正确。但当时湘南农军皆有归思，不十分注意执行，卒于五月底因给养困难，三十团、三十三团转回湘南，结果分散到农村中，有一部分受了损失。留在边界之四团，非常努力于对外游击及内部整顿的工作。赣军三次进攻皆被击溃，敌军团长阵亡，师长杨如轩、杨池生〔5〕受伤。尤以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一战，敌以两倍于我之兵力被我击溃为最有名。当时边界群众有两句联语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破江西两只羊。”最能表示群众的欢迎。在赣军几次失败后，乃联合湘军举行大规模的会剿，吴尚八军〔7〕全部于七月初入驻宁冈，我军适在永新回师应敌。湘军在宁冈一星期，不敢驻民房，通通露宿，日夜被农民群众之包围袭击，恐慌万状，不得不引退。我军回师，波已连夜逃去，在此时期红军迭获胜利，边界党及群众组织，皆大大发展，宁冈、永新及莲花之一部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田地，

各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边界临时苏维埃政府业已成立，为当时最高指挥机关。群众武装各县成立了赤卫队，由六十名至二百名。红军武装大大扩充，有一倍以上的增加。同时在井冈山上成立了红军医院，成立了红军学校训练工农干部。按此时期为边界斗争的全盛时期。

### （2）第二个时期（从一九二八年七月中旬到九月）

在七月初吴尚部进攻宁冈，我军由间道回师应敌，吴逃入永新。我军恐其与赣军联合，乃以二十八、二十九两团进攻酃县、茶陵，入据吴之后方，以三十一团应付赣军，三十二团守后方。攻酃、茶之二十八、二十九两团迭获胜利，使吴尚不得不连夜赶回老巢。二十九团全部为湘南宜章县之农民，到酃县全体要求回湘南，二十八团则主张去遂川牵制江西敌军。两团行山道两日，非常疲劳，卒转道而入湘南，计于七月十五日由酃县、宁冈交界之十都出发，二十二日占领资兴，二十七日进攻郴州，击溃范石生部两团。是日黄昏时范部反攻，我军不及应付，夤夜撤退。二十九团大部去宜章，散入农村，有一营在乐昌受了损失。二十八团及二十九团之小部取道资兴、桂东到汝城游击，中间发生第二营长袁崇全之叛变。袁率所部四连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作前卫，袁逆假传命令，日夜急行，意在脱离大队往江西作土匪，或降投反军。卒因各连官兵不受欺骗胁迫，忠实于革命，自动脱离袁之羁绊归回大队，袁只胁迫了第五连、迫击炮连逃窜至江西崇义界。其后十日，大队取道崇义回井冈山，复与袁遇，第五连及迫击炮连均全部回来，袁逆只身逃去。不幸二十八团长王尔琢〔8〕同志于是役不慎惨遭毒手，为红军干部极大损失。计袁逆叛变至各部回来，前后经过两周之转折，卒得恢复旧观。此皆官兵忠实革命，出于自动，此点实一般雇佣军队所绝不能有的。

在军部率领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去湘南之后，赣敌杨池生残部八团及第六军一师联合向宁冈进攻，三十一团以一团兵力在广大群众合力之下与敌鏖战一月之久渐次引退，复于八月初湘赣联合以五团兵进攻宁冈黄洋界。三十一团以两连兵力利用要隘鏖战一日，敌知不可犯慌忙引退，毛在失败后率兵一营至桂东与军部取得联络，于九月间返至宁冈，计由七月至九月，出发湘南部队及留边界部队均遭失败，边界群众组织遭了不少的摧残，割据区域逐渐缩小直至井冈山下，是为四军第二时期之八月失败。

### （3）第三个时期（从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

四军回到宁冈，二十八、三十一团损失虽不见大，但数量质量均不如前。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极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同时又三次击溃周浑元〔9〕旅，三次击溃刘士毅〔10〕旅，宁冈及永新、遂川、莲花之群众赤色割据，又重新发展起来。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

敌人这次进攻，从十一月至一月，准备了两个多月，四军亦从十一月起积极整顿，同时彭德怀〔11〕部红军第五军于十一月初由平江游击至宁冈附近与四军会合，红军声势更加浩大。红军对于敌人三省“会剿”、决定以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以彭德怀及袁、王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部队，在四军至吉安附近，赣敌后方动摇必然撤退，彭、袁、王应付湘

军仅有余力，此为我方之计划，再者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丛中积雪不消，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月没有一文零用钱。物质条件如此困难，官兵奋斗精神并不低减，四军的基础确于是时建立，在事实上有了考验与证明。此时期为红军四军复兴与整顿时期。

#### (4) 第四个时期（从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三月）

(A) 出发赣南游击部队之经过：一月十四日，四军军部率二十八、三十一两团及一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一月二十八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庚，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但仍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至二月中旬（正阴历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师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下午三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肖致平、钟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支，俘虏数略同。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此后，红军由宁都至兴国、吉安、永丰交界处，得江西红军二团、四团之掩护，有一周以上之休息整顿。是时知井冈山业已失败。乃决定到闽粤交界处游击。

(B) 彭德怀、王佐部留守宁冈根据地，于一月二十八日敌分三路兵力，各三团左右，向井冈山进迫，彭、王部仅只千余枪左右，与敌相持五日夜，自动引退，彭部取道赣南与朱毛会台，王部则埋伏在井冈山附近。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到井冈山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上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即行撤退，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彭部至赣南，于四月初与四军会合于江西雩都。在此大的斗争之后，四军共存有二千余人，彭部只存有八百余人，两部共枪约二千支。

(5) 第五个时期（从蒋桂战争〔12〕爆发到现在）二月二十一日桂系袭长沙，酿成湖南事变。湘、粤、赣三省敌人自己为要打架，不能再向红军进攻。红军是时入闽西击溃郭凤鸣〔13〕旅（郭于是役阵亡），于三月中旬入汀州，工作了两个礼拜，红军大大补充，衣履焕然一新，人员增加，款恼亦得有五万元。决定蒋桂混战中放手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闽西赣南力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红军于三月底由闽西入赣南，游击区域及于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广昌五县。五月初，蒋、桂在武汉混战告一段落，赣军又向我进攻，红军乃于五月中旬第二次入闽西。正值张贞〔14〕入粤讨桂，红军决定汀州、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六县游击计划，至七月初复扩大至漳平、宁洋一带。直至现在，

计二次入闽，两次击溃陈国辉〔15〕部，陈部实力丧三分之二；两次击溃卢新铭〔16〕部得械两营左右。

彭德怀部退出井冈山于四月初与朱毛会合于雩都，受了使命回边界恢复群众割据游击区域，经过北江、赣南、湘南一带，最近在赣北、湘东游击，在城口得商团械二百余，在南雄得商团械三百左右，在遂川得赣军六十八团一营械，在安福击溃赣军一次，该部实力已增加四倍左右。

## 四军的组织及训练

### （一）军队的编制：

（1）军队的编制在原则上要注意武器与地势两个条件，尤其红军在游击战争时期，因为他是流动性质的，他的编制应该与普通军队不同。红军的战术原则不外“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争取群众”。但要军队的编制能恰如其分，做到分散集中两面都好，红军四军此刻还没有这个经验。四军此时成了庞然大物，一切都是吃“大锅饭”的集体行动，分散比较为困难的问题。同时四军此时的武器以步兵为主要，游击的地区时时要不脱离边界山林区域，在流动自如的意义上，红军要通常比敌军行动快，才不易受敌人包围或很快退出敌人“会剿”的范围。四军中经过几许讨论，仍然一仍黄埔式军队的编制。虽然有人曾在红军教。导队试验俄国红军的编制法，结果大家看了一回希奇，在实际工作上仍然只有照抄老的办法，因为上了五个单位不好指挥，每一个连单位超出了百五十人，于宿营给养就大不方便，若一连单位只五六十人，则作战警戒就疲劳得要死。因此四军此时编制仍然为国民革命军的办法，每排三班，每班十人，每连三排，每营三连至四连，每团二营至三营，加上机炮连或特务队。不过时常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红军需要多的徒手兵，一面红军不轻易作战，每战必有把握，因此在胜利后若没有徒手兵，缴得枪械就没有人抬，同时在经常行军，红军病兵多，一个病了，若无一个徒手兵，他的枪弹就无人抬了，所以红军的兵要多于枪为好。第二，红军的非战斗兵，如伙子及政治工作人材，非要多不可。因为红军的任务不仅是打仗的问题，伙子多子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政治工作人材多于发动群众、训练兵士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每每红军一团，人数有二千，枪还不及千支，就是这个原故，但这是一般旧军官所不懂得的玄妙。

（2）四军的经济组织可分为执行、计划、监督三部，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原则由党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则由各级士兵委员会负责，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会审查，军需处长出席报告负答复解释之责，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因此四军此时的经济脱离军官的影响，做到彻底公开，于经济上最能表现红军的平等精神。红军有一副联语道：“红军中官兵饷薪的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再则，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3）在军医方面，各团有卫生队，军部亦有一个直属卫生队。另外，赣南闽西游击边界皆特别成立红军休养所，来容纳病伤兵。不过医药与医官，很感困难去解决，在十分无法时雇佣本地中医，内外科也相当有功效。同时，

此休养所唯一的条件，要四面有群众组织及武装的掩护，在伤兵好了以后，不必一定要回红军即可由当地农协及革委分配到赤卫队〔17〕工作。

（4）在军事机关人员分配方面，军部有军长、党代表两人直接处理全军日常事务，参谋长一人辅助之，外有参谋处长一人指挥参谋处工作，副官长处理交际庶务等事，军需长负责管理经济及计划等。军成立政治部，设主任一人，秘书长一人，秘书若干名，外有宣传、组织、总务等科，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又政治部职权与军部平衡，不相隶属。军部与政治部以上的权力，在此未建立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时，集中于党的最高委员会。在团、营、连设党代表，团又设政治部主任，由党代表兼。因此各级党代表担任政治工作受政治部指挥。

（5）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18〕，官长同时为士委员会，全连士兵大会选举五人至七或九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一人。以全营人数按每五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十一人至十三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一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十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十七人至十九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一人任主席。全军按三十人或五十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十九人至二十一人或二十二人组成军士执委，选一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此外，士委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置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处理，士委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

## （二）四军的训练：

（1）军事训练可分为四种方式，第一种日常操课，由参谋长或军官制定日常操课表，按日实施之，所有科目课程均一仍国民革命军之旧，没有什么更改，只是把那些摆架子的于作战无大关系的繁冗虚文去掉，大概注意传令、侦探、警戒、瞄准及野外实习。关于可以振作精神之制式教练，亦有相当注意。第二种于作战之后或一月之后一种结束讲评，由军官负责，报告工作经过并指出缺点与优点。第三种为实地训练，于放哨时由官长说明放哨守则，于守卫时说明卫兵守则，一面使士兵于讲了之后照着去做，一面免掉说教式的训练的干燥无味。第四种由各级负责军官召集各级官长开军官会议，讨论训练方法或对于某种专门问题的报告。

## （2）四军的政治训练：

1. 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慨状报告等。

2. 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则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去讲。这个讲演比较计划的，或定于一月讲演许多题目，这些题目是可以连贯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知识。

3. 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照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评，或对于明日行动之煽动宣传等。

4. 在一次游击工作、一次战斗、一次行动经过以后的批评，要详细向士



兵讲出来。

5. 军队里举行识字活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军的标语，认得一个标语即将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

6. 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追悼会、俱乐会，亦为政治教育之另一种。

7. 在士兵委员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小组会上有各种报告，及工作批评，亦为训练的方法之一。

(3) 四军士兵之生活状况：

1. 被服方面在今年三月以前非常吃苦，隆冬尚穿单衣。在到汀州以后每人缝了两套新衣，鞋袜、草鞋、军帽已解决，所以近来军队表面非常整齐。

2. 驻军方面，士委有卫生部管理宿营的卫生事宜，饮食清洁，便所扫除，卧处整理等。

3. 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红军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4. 士委内有娱乐科，仅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剧团，有双簧，有女同志跳舞，有魔术，这些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

(三) 四军的军纪：

四军军纪可以分为下列数项：

(1) 战时纪律：临阵退却，畏缩不前，违抗命令等，可由军官就地枪决。

(2) 一般纪律：通敌，叛反，拐枪潜逃，开小差，强奸，乱烧乱杀，敲诈人民财物，均处死刑；赌博则没收其所有金钱，并决定一月内不发零用费；嫖妓则处以夜不归营之罪，因嫖妓而滋事者，量其大小，或处以死刑，或罚勤务，或打屁股或手心；其余比较小的错误则按其轻重处罚之。

(3) 红军三大纪律：各种纪律之后多而复杂，士兵每每弄不清楚，又特别归纳为三大纪律：

1. 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

2. 打土豪要归公；

3. 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这三条纪律是一个原则，但包括了一切，所以现红军士兵每每都要抬出这三条来批评他不愿的人，他自己犯了，处罚他也就没有话说。

## 四军的游击工作

四军出发达到某一定地点，即估量敌人并斟酌地方革命群众需要，决定五日至七日或十日以至于一个月的游击计划，计划定了以后，即分兵四面出动。在数县范围内经常以每一个纵队(团)为单位，在一县范围内则以一支队(营)或一连为单位出发游击。指挥地点通常在县城或出发部队之中心。在一期游击工作完毕以后，则开始第二期游击工作，或向前推进，或向口方延伸，均由指挥机关斟酌情形定之，如任何方面发现敌人。游击队一日夜即可集中。

在部队未集中前，各游击队不得轻易与敌人冲突。至各游击部队之工作通常为下列各种：

（一）调查工作：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红军行动如行云流水一般，所到之地皆不明情形，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须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关于调查的内容，由政治部制定一个极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比较，及土地百分比之分配，以及当地特殊产品等；其次对当地情形观察，交通、河流之测量，此关于军事上极需要。这大概是调查工作之内容。这个工作是一个极有趣味的工作，一般同志作起来感觉极麻烦。红军经过一时期，表册便堆积起来，政治部工作人员缺乏，无人整理，每致散失，却是一个遗憾。但是它的好处可以使红军不致不顾环境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

（二）宣传工作：红军在成立初期，对宣传工作仍沿国民革命军旧习，把宣传工作认为是一部分人的事，尤其是感觉军队是打仗的，宣传是卖假膏药，是讨厌的，这自然是表示兵士对于国民党的不兑现的口号的一种强烈的反抗。红军在经过许多斗争，觉得宣传工作太差，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作土匪打。红军为解决这困难，宣传才逐渐进步了。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五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更须全体出发在大街、小巷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挨户宣传，半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群众为了懂得红军这个怪物，及朱毛的仪容，常常是普遍的跑来参加这个大会。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要正楷，以愈大愈好。

要用梯子，写得高，使反动派不能随便涂抹。到达一个城市，各连的宣传员由政治部或党代表分配宣传区域，并派人巡视以观勤惰。各连写的标语有暗记不怕冒功或混淆，写错了亦易查出予以处罚。因此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同时宣传员还负责破坏反动宣传品，如国民党标语等。许多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

（三）组织工作：红军到达比较工农发展地方，则助其组织发展，或参加他们的会议，为他们纠正过去错误及计划目前工作，在未有组织的地方，则从宣传工作中物色群众中进步分子，大概注意下列对象：

1. 与土豪有仇恨的。
2. 极贫苦的。
3. 在贺、叶军队当兵的。
4. 由外地农协失败来此避难的。
5. 以前参加革命斗争的。
6. 与邻县工农会有关系的，把上列的人请到政治部用茶点招待，作一详尽之宣传，征求他们同意，如愿意组织则成立临时革委或工农会筹备处，举出人负责，一面派人为红军作侦探，一面要他们报告土豪劣绅姓名，或引路去打，红军得帮助十元以为办公费，

红军去后要他们继续有报告来，如果报告能来，则此种组织是可靠的，该地即有组织的初步了。同时要把一些负责人的姓名、住址、形象记下来，送到邻近有组织的区域，叫他们派人来接受。这个方法可于半日内收效，有许多白色地方用这个速成方法收了效验。许多同志反对这个办法，以为不可靠，或者工作上特别慎重选择。其实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把他当作一个特别宣传工作，日后有效无效可不必去顾虑的。

（四）筹款工作；红军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叨光敌人输送一部分米。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

1. 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经济的没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参加当地革命同志或机关的意见，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对于千元以下商店不筹款，如发现包办强迫或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损害人用书面及当面报告，再去查明处罚。这个办法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大的损失，同时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2. 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格，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于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3. 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疏松，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4. 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五）欢送俘虏。在与敌人作战得许多俘虏兵，则公开征求同意，如他们愿在红军则马上补名字，如不愿在红军则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二元旅费，由兵士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觉悟，归田去打土豪，不用再当兵，不要再来打工农和红军。敌人的伤兵，则上好药，发了钱，派人宣传，又请他带了大批传单，雇农友抬到敌人区域附近去，敌人得着大批俘虏伤兵回去，只有气得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蒙红军不杀之恩，深深觉得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自己的军队，跑了回去必然要交头接耳谈红军如何如何好，反动军官诬蔑红军共产党的宣传不攻自破。这是一个兵运的好方法。此外对土豪的走狗，如许多农民为了拥护家族，出头来反对分谷、分财物，一经捉获又不能枪毙，又不好释放，因枪毙了他的罪不致死，而且引起不好影响，若释放则他分明是一个反革命的行动，如何能放他。不得已才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由他请几个保人，红军代表宣布他的不是处，但说明他是没有阶级觉悟，受了土劣欺骗，可以不杀他，望他改悔，再由保人及本人向群众说明他是犯了错误，愿以后改过。如此当群众释放，可以得一个很大的宣传。

（六）红军的游击战术问题。四军的战术从战斗中有许多进步，但只限

于大规模的军事游击行动，对于小部队游击的经验比较要少。兹分述如下：

(1) 关于行动的。在前卫之前四五里，或后卫之后四五里，均须派遣便衣短枪侦探，以防敌人意外袭击，或无谓之冲突。

(2) 关于驻军的。每日对敌人方面必派遣一连或一排以上之武装游击队，作三十里左右之侦探及宣传工作。若发现敌人，该队一面抵抗，一面飞报，使我军能准备应付或撤退不致打不必要打的仗。

(3) 红军不攻坚，若土豪跑到炮楼里去，或敌人闭城固守，或据险抵抗，红军绝不去攻击他。因为：1. 攻坚费时日。2. 攻坚我之损失必数倍于敌。3. 在游击中我军炮兵是不健全的。4. 若轻易攻坚，一个时期急切难下，四面的敌人很易从四面包围拢来。关于此点指挥官务要有决心，不要轻易凭气愤去乱干一下。

(4) 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我军须要走得路，使敌人赶不上，同时经过地方要有群众及党的组织，才有人担负前后侦探工作，不致受敌前后夹击。

(5) 在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有党有群众的地方，我军有极大扶助，如运输、救护、扰敌、侦探等，敌人处于孤立地位，与之作战比较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幸失败亦有法收容。

(6) 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红军驻在某处忽然发现敌人，不知敌人多少，或从何处来，则绝不作战，千万撤退数十里，十分接近只好派掩护队。因为敌人敢向我进攻，他是有计划的，我们不要轻易去如他所愿而上当。如果敌大我退自然我占便宜，如果敌小我退不过有点疲劳，再去打不迟。

(7) 单纯军队的袭击。侦知敌距我有百里以外，我军轻装尽一夜功夫跑到，出敌不意而歼灭之。

(8) 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在敌接近我时，我方有群众的组织四面断绝敌人交通，使敌人不知道我军已在其附近，然后利用拂晓将其击溃。

(9) 用群众扰乱，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在作战时，分一部红军，以一排为单位，每一排领导三四百工农勇敢分子，多打红旗占领四面山头，利用工农的武器土炮、刀矛、喇叭，利用满山遍野群众打吆喝去扰乱敌人，然后红军以全力出其不意，从侧面击溃之，或利用赤卫队日夜打冷枪，或埋伏在山林中瞄准打大旗左右的指挥官，先使敌人恐慌疲倦，然后用生力军袭击之。

(10) 在后追兵，前有阻挡部队的时候，或追兵过于强硬的时候，为了脱离敌人，可以一部队距敌四五里引其走大道，大队则取间道脱离敌人，或猛出敌后而袭击之，或用农民在另一路上划路标，贴标语，以引诱敌去穷追，我军从小道冲出。

(11) 不打硬仗。不能十分有把握的仗就不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句好话，尤其红军干部补充困难，子弹不易，打了胜仗不能得枪械，在红军战术上均是失败。

(12) 敌人若进攻我的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此为围魏救赵之老办法，红军常用有效。

(13) 我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前去，偏偏走旁一个方向，到了中途忽然打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击溃敌人。

(14) 敌人急急追来，择一个好地形，埋伏的好好的，候敌一来一网打尽。

上面十四条，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无，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本有，但均为四军的法宝，故一并录出。

## 四军的近状

(一)目前的游击区域：本年五月二十日左右红军击溃陈国辉部两营，占领龙岩，五月底进占永定，陈之全部由粤撤回。红军往连城游击，复于六月十九日进攻龙岩，陈部五营、三营全部缴械，陈仅以身免，其余两营因未在龙岩幸而得免，红军因此即决定闽西龙岩、永定、连城、上杭、汀州、武平六县游击计划。龙岩城由六月起迄在红军手中，至近日始放弃，永定自本年四月起直至现在始放弃。上杭全县均有群众暴动。汀州、武平有一部公开斗争。连城南部全为赤色区域。宁洋、漳平，红军派部队前往游击。在目前闽西之游击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兵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入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上面三个方式视敌人逼进情况大明时才作决定。

(二)四军的实力：四军现分一、二、三纵队，此项为基本部队，每纵队分两个支队，外加直属机炮连及一特务队。一个纵队相当反动军一团，战斗力过之。每纵队人数在一千六百人左右，枪八百至九百，手枪排长以上军官均有一支，手机关枪每纵队有两挺，每纵队有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合组机炮连。四军子弹不甚充足，因经常没有接济。另属于四军所指挥的彭德怀部，江西红军二、四团，当另有报告说明之。

(三)四军官兵扶的成分：

1.历史的：贺、叶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现在还在当士兵者为数极少，以官兵快合计，此项人数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敌方士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

2.籍贯的：湘南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五，闽赣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三则为其他各省人。

3.年龄的，少年(十八至二十五岁)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壮年的(二十五至四十岁左右)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三，老幼的(十六岁以下四十岁以上)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一。

4.战斗兵与非战斗兵之比例：战斗兵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余为官佐扶役等。

## 结 论

把四军一般状况详叙之后，还须把它的优点和缺点指出，作为一个结论，以补足上面的不足处。

(一)优点：红军与普通军队大概从四方面去分别：

(1)红军是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

(2)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知识，不像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兵士作成好管理的奴隶。

(3)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兄弟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像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互相厮杀等事。

(4)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

在上面四点，红军四军渐做到了。如雇佣性，四军在过去困难当中能继续奋斗，实由于兵士自知当兵是为的自己及工农大众，不是为的饷银而当兵，尤其伤兵同志在困苦万分，没有抱怨或恃功骄傲等事。如红军的学校化，因此刻在流动时期及训练人才缺乏，没有做得十分好，但较之反动军队，士兵的政治认识、文化程度都要高些。在四军各团营兵士内，是非常团结，彼此相依为命的。尤其是恶劣的政治环境及斗争历史，更坚决了他们的团结。其次为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四军在过去经验上使每个兵士都知道对本地工农的帮助的重要，达到某一地方每个士兵能自动向群众宣传，与之发生亲密的关系，压迫工农是红军最重的犯罪。

## （二）缺点：

（1）造成党军的错误倾向。

（2）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

（3）士兵委员会的运用不好，有时士委超出职权的范围，有时又不发生作用，等于空闲机关。

（4）因经常在行动期中，伤病兵安插非常困难，安置在农民群众中，医药仍然没有办法，相当影响斗争力。

（5）集团军队的力量须能驱逐较大的敌人，但养成了群众依赖红军的心理，忽视本身的力量。

（6）经常受敌人封锁，对政治消息及各地革命实况隔离，以致红军中人常常有囿于一隅的观察，进退比较困难。

（7）经常与敌人冲突，干部感觉着补充的困难。

（8）红军士兵来源多半出于招募及改编敌兵，因此军队只能集团行动，竖极大目标引起敌人围攻而不能做到化整个为零。

## 注释

[1] 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指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四川仪陇人。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南昌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辗转香港，后来与张太雷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贺龙与周逸群等经上海返回湘鄂西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朱德与陈毅率领起义军余部，随后发动了湘南暴动，并带领所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胜利会师。

[2] 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六年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接受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组织秋收起义的任务，担任秋收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卢德铭（一九〇五——一九二七），四川宜宾人，原任武昌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后率部到江西修水与湘东平江、浏阳农军会台，参加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任总指挥。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部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3] 范石生，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与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有旧交。一九二七年冬，朱德、陈毅率部抵达湘粤赣边时，一度与范部建立了统战关系。

[4] 许克祥、周斓、白崇禧，当时许克祥任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师长，周斓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白崇禧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

[5]袁文才、王佐，袁文才原是宁冈农民自卫军首领。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后，他率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任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团长。王佐原是井冈山农民自卫军首领，一九二七年十月率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任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副团长。

[6]杨如轩、杨池生，当时杨如轩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池生任国民党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

[7]吴尚八军，指当时吴尚担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第八军。

[8]王尔琢（一九〇三——一九二八），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参谋长，后随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

[9]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

[10]刘士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副师长兼步兵第十五旅旅长。

[11]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同年十二月上旬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

[12]蒋桂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军阀战争。

[13] 郭凤鸣，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14]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5] 陈国辉，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6]卢新铭，原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补充回团长，后任该旅旅长。

[17] 赤卫队，指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18] 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群众组织。

## 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 党的历史

1. 四军未成立前毛部[1]由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指挥，湘南特委令其改组一师委，朱部[2]为一师委，湘南农军为各县委，是时各部队连上成立支部，营无营委只设直属小组，在营单独时颇感不便。同时军队受特委指挥，每每为地方主义所囿，不得不打硬仗，受不必要的损失。这时党在军队中不能起领导作用，军权高于党权。同时士兵同志没有提拔起参加指导机关。2. 在四军成立以后，军一级设军委，受边界特委指挥，有一时期四军军委即为边界特军委，团设团委，营设营委，连设支部，排班设小组，军部设特支。队伍出发游击，组织行动委员会，参加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之，同时可以公开命令指挥当地群众机关，行委成了一又是党又是群众机关的一种权力组织。

3. 在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要在军队中成立前委，指定朱毛及地方党部书记并工农份子各一成立前委。四军执行这个命令，由边界特委及军中同志共三十余人开特委扩大会（因是时四军受特委指挥）成立前委，选了九个人成立前委会，同时四军成立前军委，因此前委在当时指挥三个机关：一，前军委。二，边界特委。三，工农运动委员会。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了毛病，就是机关大多，人员分配不过，颇影响各级党部之活动。

4. 四军出发赣南，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达到某地作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这个状况一直继续到现在。

这一段党的历史经过，觉得有几点特别重要：

1. 军队党的负责机关人数宜多。因为军队是集中的，开会容易，同时军队党的决定可以影响军队的的生活，如休息给养等，负责机关人数过少，便不能很快的明白每日士兵的情绪。因此军各级党部执委均在十几个人以上，有时扩大到二十余人。

2. 营委问题。以前没有营委，不但在单独一营行动感觉困难，平时的训练给养之管理也感着困难，所以成立了营委，至现在已成为不能废除的了。

3. 在没有较大的苏维埃割据足以容纳四军时，四军不经常如行云流水般活动，不能解决他的许多问题，如避免与敌人冲突及自身给养等，则在此无苏维埃政府的指挥时期，红军的指挥，只能直接受命于党。纵然成立一个革委会，实际仍然是党的直接指挥，因为军队行动于开会后即要行动，有时连开会也来不及，多设机关，命令要经过周折是不利于游击行动。只交给军官指挥，则一个人的处置常常要错的，因此四军在经过许多讨论后，仍然觉得现在的指导方式是很方便于斗争的。在最近到了闽西，决定成立军部党团，意在把一些行政事务交给处理，以减少前委对日常事务的应付。这个办法行起没有什么成效，……总之党在四军指导的方式是如此，当然会有党公开指挥军队，造成党军，党的政府等毛病，但此问题在前委没有好方法来更正。

4. 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

---

这是陈毅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书面报告。编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委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力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才了。

5. 党的训练，在四军感着困难。许是材料收集与训练负责人员之缺乏，同时军队的习惯是一个命令服从，所以一般党员群众特别呆板而不活泼，党内生活之机械化是常犯的毛病。

6. 连上成立支部的作用非常大。因每一连可以担任一方面的任务，一个支部恰可以应付这个任务，连支部的精神，在“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上，四军党的基础在连支部上面，军队力量也寄托在上面。

## 党的近况

1. 数量：四军一、二、三纵队为四军基干，常常不分离的，计一纵队一千六百人，二纵队一千五百人，三纵队一千五百人，军部，政治部，特务营，军需处，约共九百人左右，全军计五千四百人左右，党员有一千四百人（据六月底统计）。

2. 成分：官长同志约占十分之三，兵扶约十分之七，手工业工人占十分之二，学商占十分之一，军队中产业工人成分极其低微。

### 3. 组织系统

a. 前委——纵委——营委——支部一小组。

b. 党的机关，纵委前委均分设宣传、组织、青年三科，士委会各级设有党团。

4. 军部机关人员成分的分配，通常士兵同志皆须参加军部指导机关，其比例为三分之一，譬如前委现有十三个委员，士兵分子占了五个，前委常委五人，士兵分子占了两个，皆有相当作用。士兵分子参加指导机关，在前委尚在初期的扶助中，并不能十分尽领导作用。不过士兵在各种会议上常有两种表现，一是随时提士兵利益，一是对付敌人随时是主战论者，不主张退让避免的。

5. 各级党部之书记，通常由上级委派，下级大会选举亦可，但须得上级党部的批准。在以前各级书记均由党代表兼，现在业已渐渐改变，书记可由军官士兵兼。

6. 现在四军党的一般表现：

### 右倾的危险

这种右倾的危险的产生由于下列的原因：a. 军部指导机关尚在知识分子手中，四军党的士兵基础薄弱。b. 党员政治水平不高，怀疑反动政局是一个崩溃的前途。c. 改良主义的宣传相当的影响到四军内。d. 在四军本身因长期斗争的疲劳，每日生活刻板式的是一些行军宿营作战等，在工作上感着无味，使他们别寻消遣，有享乐主义的倾向。e. 敌人的“围剿”在宣传上闹得慌，在行动上使四军感着应付的困难，自然要使一部分人动摇。f. 许多同志无法脱离军队，自己又因受伤毁坏了身体某一部之健全，日趋消极悲观，常常长吁短叹，影响到他左近的工作的人。

### 极端民主化

四军是由国民革命军改造而来，在初期一般官兵同志，皆十足的盲目服从上级，渐渐由党的在下层的发动，一般官兵同志渐渐能够讲话发表意见，到最近又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

### 小团体主义

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的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3]、南昌出发（朱部）[4]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总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忙自己的。

### 取消或缩小红军的观念

因政治的分析错误，认定反动政局是稳定的，当然会怀疑红军是否能够存在的，又见大的部队斗争日趋激烈，则主张缩小红军，以为缩小了就可以和缓敌的进攻。这些观念其骨子里面是无坚决斗争的勇气，四军党中有一部分具有这一类的思想。

## 党的前后政策

### 1. 以江西宁冈为中心向南向北的游击问题

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四军各部会合于江西宁冈，成立了四军，并有军委，但党内不统一，军队各自为政，袁王[5]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愿朱部及湘南农军这样多人在宁冈，使他目标大惹下大祸，主张四军到赣南去。毛部颇有自了之心，看见朱部及农军那样混乱，不愿意合伙，主张他们自己到平浏[6]（向北游击），朱部及农军到赣南（向南游击），军委则随朱部出发。朱部及农军尚一致主张到赣南，因为宁冈没有饭吃，实在不满意袁王及毛部的态度。军委明知这分家政策是不对，因为四军在此时初初成立，应该整顿，到平浏及赣南皆属单独的军事行动，尤其军队未整顿，到处要引起许多坏的影响，更应该顾虑。若说经济问题困难，事实上四军在宁冈一年多亦终有办法。当时的分南分北的政策，大部建筑在各部的私利上，尤以袁王的自私，毛部的自了不管，引起朱部及农军不满。这个政策决定后并未实行，因为一二日后朱部二十八团即击溃江西敌人两团，占领了永新，经济问题得了解决，大家又合伙起来。

### 2. 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

为了整顿红军，须要一个根据地，为了执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游击战争，红军须要帮助地方斗争，在江西宁冈为湘赣交界区域，距两省会皆远，在交通上及政治派别上，湘赣敌人对我“会剿”不易实现，红军在井冈附近八县工作足可以应付敌人，同时边界各县党至少有一些影响，许多地方过去有过农民斗争，主张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一个群众政权，训练庞大红军，发展各县群众斗争，向四周推进。这个政策在当时（四月至七月）在

党内没有反对，虽然有一二人主张下去要打南昌，这个投机的办法，毫无问题被党内拒绝了。

### 3. 五月初送湘南农军三十团、三十三团四千人左右回湘南

这个问题是军委常委会决定的。湘南各县委要求要回去，军委乐得送他们走，以减少他们在宁冈的各种困难（如给养问题，纪律问题）。军委常委是嫌红军人数大多没有办法整理，看见他们要走便让他们走，以致他们回去大部受了损失，红军日后没有人补充。这个举动引起党内极严重之批评。

### 4. 七月出发湘南问题

在五月至七月边界割据日益扩大，敌人进攻日益剧烈，红军的精英至少有了三分之一的损失，这个时候党内有两种主张是对立的。

第一派主张继续在边界斗争，边界的割据是可以扩大的，红军只有在这割据里可以保存，离开边界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尤其在七月间谷子黄的时候，红军为使农民割禾不能他去。

第二派主张，敌人进攻是没有止境的，红军屡次作战“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此时边界割据用红军去打出来，结果红军必为边界而趋于消灭，红军消灭了，边界亦同归于尽，所以红军应该脱离边界，到别处去游击。

第一派在军事行动上主张推进不脱离根据地。第二派在军事行动上主张不要根据地，流动的办法。

第一派主张红军应该为边界割据奋斗。第二派主张红军应该是游击的，不能为某一地域死守。

这两个主张还没有达到大的争辩，省委命四军到湘南的指示到来，结果四军二十八、二十九两团终于去湘南，弄得边界、湘南方面都大大失败，红军损失了一团基本势力。边界各县的农民不能割禾，让土豪弄了去。这显然是到湘南的政策从事实上证明是不对的。

从这件历史事件里面包含了几个重要问题：

一、红军与其根据地问题。

二、红军与群众割据问题。

就现在四军经验看来，在有一团力量以上的红军，实在是须要一个根据地，来作收容伤病兵，修理枪械，存储辎重，短期休养地，办理各方面交通等事，若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许多实际问题实在不能解决，不过这个根据地的条件，不一定像井冈山那样天生险峻，主要的是有党及群众的组织，肃反的工作有了成效，兼有相当的地势就可以了。红军对于这个根据地不一定要死守，他的保存应该交给地方的群众，红军已不在此死守树立大的目标，自然可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则这个根据地是可以作为永久的。

红军与群众割据。群众割据应该出于群众的需要，千万不能凭红军的力量，用打天下的本领打出一个割据来。红军的割据与群众的割据不同，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敌人是不能消灭的。边界的割据在初期的发展（四月起）至后期失败（二月彭德怀即退出井冈山）[7]，大半都是红军的割据，以实力造成，红军大半用的是染红的政策，而不是用说服宣传的态度，使他们自己红起来的，因此在边界赤白斗争中农民反水常常见到的。当时主张红军驻边界的一派，实含有硬打到底的意见。主张脱离宁冈的一派，实在是站在保存红军实力不顾地方

需要的偏见，所以造成去湘南的错误。当时应该在边界斗争，使边界群众割了谷子，使他们真正得了分土地的利益，就是把土地革命深入，使他们得了谷子，然后分兵到湘东去游击。一面不脱离宁冈，红军是向前发展的形势，一面可避免在宁冈一带的硬打，一面红军到湘东游击，平浏群众起来对南昌、长沙都是威胁，边界的割据自然可以保存，同时在萍乡、平江工农有数千人可以到红军来。

#### 5. 一月出发赣南问题

湘赣粤三省企图联合向红军进攻，国民政府以二三月的准备，调大兵二十四团限三月内肃清井冈山，这样大的声势，红军的应付有下列的意见：

第一派以守为攻说：积极准备边界八县群众的力量，凭藉井冈天险，引敌人到山下来攻，俟其疲敝，然后由红军及群众夹击消灭敌人。

第二派死守主义：在军事观点上断定井冈天险敌人不能攻破。在政治分析上，决定在三中全会[8]敌人破裂可期（蒋桂战争[9]），因此主张红军死守井冈，准备两月时期即可得最后胜算。

第三派抛弃边界说：红军应打圈子，到别处另图发展，不要在边界死守，红军一去敌人也要退去，如此才能保存边界党及群众组织。

前委最后决定，以为第一派的意见所谓夹击，实在把群众的力量太估量得大了，结果是夹攻不成红军陷在重围中无出路。这是一。第二，红军在此奋斗，即在保存群众革命以后所得的各种利益，并不是一定要这座井冈荒山，若让敌人深入边界各腹地把群众的利益一切打毁，甚至迫群众反水，则不待敌人打井冈而我们已大大失败。所以第一派的主张是一个红军死守根据地的主义，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在战术上又空想群众能夹击二十四团的大敌，是不对的。

第二派死守主义之不对在战略上是讲不通的，战略上只有死守待援，若无援可待而主张守，只是守死而不是死守。因为有外援，守者预定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援兵一到即可成功，有一个希望才能坚固死守决心。在井冈死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怎能坚固军心？期望蒋桂战争爆发，来解井冈之围，这当然是一个毫无把握的事。

第三派抛弃边界说，是忽略了红军与群众不可分离的关系，红军脱离群众走到白色地方受敌人包围更易消灭。群众在敌人进攻时看着红军逃脱，一定失望，要怨恨红军，结果于红军群众都有损失。所以第三派是红军自了，脱离群众的意见。

前委以为死守主义，硬拼主义，自了主义，都是不对的，乃决定：

一、我们对敌人要取积极的进攻态度，一切保守，死守，脱逃，悲观，最后一拼的办法都不对，都足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我们断定敌人的崩溃，反动政局的混乱，加上红军内部团结及群众拥护，边界地形险要，我们可以对付敌人，至少敌人不能消灭我们。

二、我们的战略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敌人二十四团，不能每一团都到边界来，计算他除了担任其他任务外，实际只能以十二团兵力到前线来，这个数目与六月湘赣合兵进攻是一样大的，并不是什么了不得。同时在敌人方面虽然“会剿”却包含了许多冲突，“剿共”的主力仍然是江西不是湖南。

三、决定以三分之一兵力加上边界群众总动员应付边界四周敌人的进攻力量，以三分之二（我军的主力）的兵力出间道以迅速手段占领江西敌人后方，乘虚而入，使江西军队回兵救援，则此次敌人之“会剿”计划可以打破

了。

这个政策的决定，前后各级党部讨论约经过一月的时间。

#### 6. 四军的分兵问题

在出发赣南以后（本年一月至三月）四军四战皆北，强大敌人穷迫不息，同时在所到各地闽赣粤边界一带群众组织非常薄弱，红军感觉异常困难，尤其大的军队（三千人左右）行动颇不方便，给养大感困难，四军党内起了争论。

第一种主张，此时四军应分为两部分，以团为单位，各路自行去图生存，以避免敌的追击。一面行动快，敌人追不上我们，一面人少给养容易，可以恢复红军纪律，一面减少了目标。

第二种主张，此时四军应该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开展，敌人的进攻不会再有时间延长。一面集中起来可以最后一战，分散要被各个击破。一面分散以后联络困难，士兵胆子更小，更动摇。

这两种主张，第一步是分兵，把四军改成两部分（二月间事），第二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所终没有分开。

#### 7. 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问题

在本年四月，蒋桂战争爆发，四军是期由闽西推进至赣南兴国、宁都、赣县、信丰等县，群众斗争大大的发展，同时赣西南宁冈井冈山一带有群众割据及红军组织，赣北德安一带亦有红军活动，赣东有方志敏部，赣南则有红军二、四团。前委根据江西省红军分布状况，决定一年内将这些红军努力联系起来，将赤色势力扩大起来，如果军阀混战延长，则一年内有夺取江西的可能。这个决定是前委对江西工作的一个意见，主要的是要把江西四个赤色势力联系起来，向夺取江西的目标去进行。这个决定写成决议案没有什么人反对。当时是一前委扩大会，赣南特委及某几个县委有代表参加。虽然有同志觉得这个决定太乐观太空洞，太不估量主观客观情势是否可能，但觉得江西党天然是一个夺取江西的任务，则这个决定也是可以的。

8. 蒋桂战争的爆发，前委的政策红军三月间到了汀州，知道蒋桂冲突必然要演成混战，此时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四军马上布置于南昌、吉安之间，接近战区，以便夺取敌军辎重，并且使蒋派失败，好改编他的队伍，不如此错过了机会，在他们混战中我们得不了什么是很可惜。第二种主张，则以为蒋桂战争是中国反动政局崩溃的第一幕，这一个崩溃，在客观上可以帮助革命势力的恢复与发展，但不能估量太过，认为这是一个全国工农夺取政权的时期。在此时期工作，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发动群众斗争，揭穿国民党的黑幕，号召群众起来，以组织的力量争本身利益，并反对军阀混战。红军应在这个目的下进行工作。所谓接近战区，是一个单纯军事阴谋，至多不过得些枪械。在敌人大的集团军事行动，不见得我们的部队就会有左右他们战局的能力，尤其在两个军阀混战的当儿，我们不能有帮助一个敌人来打倒一个敌人的昏想，这个思想是机会主义的遗留，最足混乱我们阶级的政治立场。

前委通过了第二种主张，决定以闽西、赣南、湘赣边界三地游击区域，放手分兵游击，争取广大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号召群众的反军阀混战，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 9. 闽西七县游击问题

五月四军到闽西，张贞、陈国辉大部入粤讨桂，此时四军有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此时利用两广战争[10]入东江消灭张贞，造成东江割据，

趁蒋桂决斗而渐扩大割据于全粤境。

第二种主张，打漳州使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

第三种主张，此时入粤消灭张贞是不十分有把握的事，长途行军之后，恐怕政局一变，红军会感着进退两难，因为我们对于东江的情形完全不明了，于东江的党没有交通。打漳州是一个军事冒险，因漳州敌有一旅人，攻城一项，红军无健全炮兵是无把握的，就攻下漳州，三天以后必要退出，敌人由广东回军，我必陷于绝境。

前委主张红军在闽西七县游击，一面整顿红军，一面帮助闽西党之改造，一面发动七县群众斗争，定两个月工作计划，无论蒋桂两方胜利如何，我们有了七县广大群众可以应付。在红军从一月至五月皆在长途奔波中，应该有相当休息。

以上是前委关于应付政治军事局面的决定。关于其他各方面的办法择主要者叙述如下：

#### A. 武装地方与武装工农问题

红军在胜敌以后得着许多枪械，对于此项分配也有两方面的意见：

第一种主张，用这些枪械来扩充红军，红军壮大才能应敌。交给地方，农民又不能打仗，存在困难。

第二种主张，红军此时不再需要成立一团、一营，应该交给地方赤卫队，赤卫队加多即是红军的壮大。

前委决定，第一种是单纯的军事观点。第二种是把赤卫队与红军的性质分不清，而且有取消红军的倾向。前委以为红军与赤卫队之武装应该同等重视，在群众有觉悟毫无武装的时候，红军应设法多发枪械给他们，在有几县以上的赤卫队，群众武器多的地方应该成立红军一营至一团，打破群众自私自利的地域界限，创造强有力的超地方性的红军。但不是朱毛改编赤卫队，把他们带着走。

B. 经济政策一、在农村中没收豪绅财物分给贫苦工农，勒款以供给红军给养。二、保护城市乡镇中小商人，对之筹款，公买公卖。三、对城市大商店举行累进法的筹款，不没收他们的东西。四、实行免除苛捐杂税。五、对城市的商店（反革命的）亦不主张没收，根据下列理由：（1）没收他们的，城市中小商人不愿意，一面是扰乱了市面，一面是他们与之有经济的往来。

（2）没收了他们的，得不着实际利益并不能打击他们，得来的东西零碎不成整，不好分配，分配给城市贫民亦不十分需要。（3）没收一家商店，其余恐慌，红军筹款发生问题。（4）没收商店风声传出去，邻近城市一概动摇，红军去了逃跑一空。因此对反动商店主张特别罚款。C. 红军补充问题一、招募新兵。二、改编俘虏。三、由农会工会送来。上面三者均填新兵入伍志愿表，说明红军苦乐及纪律，绝对禁止用欺骗方法，说什么红军每月关饷二十元。

自愿者则听其入伍，不愿者听其自去，红军士兵愿退伍请假者亦斟酌情形准其退伍。总之对士兵入伍退伍采取志愿主义，不用胁迫的办法。D. 对由兵变而来的部队及投诚土匪问题均欢迎其加入红军，红军是一个大炉子，可以把他们融化，常常是首领不干，群众自愿干，结果首领为他的群众所推翻。前委不主张硬性的消灭首领的办法，夺取了群众，首领自然成了废物。E. 对地方武装的政策一、在有如县以上的赤色区域，经过斗争的赤卫队业已有普遍的组织，在不妨害赤卫队条件之下，应建立红军，以扩大赤色区域，扫除武装不集中，不能被令作战的毛病。

二、各区乡政府及县政府均须成立赤卫队，县以百名至二百名为足额，区可以由三十至五十名，乡可以四五名到二十名。县区乡赤卫队队员除作战放哨外，应担任侦探、交通的任务。

三、为使农村的群众武装充分利用，大家都来学习战斗，敌人来攻作总动员的防御。成立暴动队之组织，以村为单位举出一个队长，除老幼妇女外，其余壮丁均须参加，有警，由队长鸣锣，各队员齐集登山应付敌人。

四、凡上列红军、赤卫队兵士皆举行按期退伍制，并可择其觉悟分子送一批到红军第四军来。

#### F. 对地方政权的主张

分为三种形式：

一、凡在白色区域中只能成立秘密农协，区则由各乡农协派代表举出区农协，或由红军政治部任命，皆绝对秘密。

二、在群众斗争比较有历史的地方，则农协可分为公开和秘密两种。

三、许多赤色区域则召集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

四、在区县两级苏维埃未正式成立前，通常成立革委会为苏维埃筹备机关，机关执委工会代表占多数，主席通常选举工人担任。

五、农协与革委机关内分文化、宣传、组织、经济、赤卫、土地各部，负责进行各种工作。

六、在农协内曾主张成立雇农部，专门注意组织雇农为农村领导，但这个在事实上没有什么人去努力做。

以上六项为前委对各地群众政权的主张，差不多红军经过的区域，他们大概都照这方法去办了。

#### G. 前委对土地问题的主张

一、达到某区域，由政治部会同地方政权机关（或单独），公布没收地主的土地。二、召集农民大会讨论解决土地问题，按人口平分，或只分地主的，均由群众表决。三、限期焚烧田契、粮册、税簿。四、关于债务，只主张不还土豪的债，农民相互的债是要还的。五、若田不够分配，可将山林连同分配之。六、若田多的地方，山林则归政府所有。七、政府机关职员及红军士兵没有饱发，但得分配土地，由政府雇人耕种，以维持其生活。八、手工业工人加工钱，不分田地。九、僧尼道姑，强迫其工作，可以分田地给他。十、老幼不能劳动，只能以能劳动的为标准分一半。上面是前委决定的土地法的大纲。

H. 前委对工人问题一、照一般工会组织法召集工人大会，成立工会及总工会。区设办事处，乡设各业工会，村设小组，城市除总工会外，设各业分工会，直属工总指挥。二、发枪给工总成立赤卫队，在城市内作肃反工作。三、召集店东开会宣布加工价，以物价为标准。四、严防店东入据工会机关。五、在县革委或苏维埃的执委，工人要占三分之二，或当选为主席。以上是前委决定之工会组织法的一般内容。I. 前委对于妇女问题一、农协下设妇女部管理妇女工作。二、妇女与男子一样得分田地及当选为执委等。三、对婚姻问题主张离婚结婚绝对自由，但不公开提倡，遇某一个纠纷，采取单独解决或调和，不用法令公布。

#### J. 前委对青年问题

一、组织方面：

十六岁以上至二十一岁可成立少先队。

十六岁以下至七岁成立儿童团。

## 二、利益方面：

青工做同样工作须与成年工人同样工钱。青工在学习期须得相当工资，不要拜师钱。青工不为师娘招呼小孩、倒马桶，不为店东服苦役及贱务。青工须有读书的机会。

## 三、对于一般学生知识分子：

(1) 说明知识分子要帮助工农革命才有出路。

(2) 欢迎学生及教职员加入红军作政治工作。

## K. 红军达到某一区域发动群众的办法（在安民告示里面表示出来）

一、平谷价。

二、废除债务，不纳捐税。

三、分土豪的财物及其田地。

因为这几个办法，红军行军常常有大批群众跟在后面，要求一同去打土豪。红军一到某地，群众的活动马上就可以起来。

红军内 CY[11]的工作团在红军的历史：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前，团与党一样在红军中成立了各种组织，但感觉几种困难：红军中士兵大半是青年（二十三岁以下），按年龄来划分，党就要发生根本的问题。在红军中，诸色人等要求与生活皆是一样，青年绝不能提特殊问题，亦不会受特殊的损害。红军干部缺乏，红军讨论问题为应付敌人要异常敏捷，每每党讨论了即执行，党先讨论传达要快些，团的讨论天然要靠后，每每使团员感着不能了解军队行动的痛苦，所以团员都不愿在团里，愿到党内来。党团纠纷在各级发生，影响到实际工作。

因为上列的原因，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以后，便取消了团的组织。但从此以后红军对青年工作完全忽略，甚至标语都没有了。到一个地方 CY 来接头，拿不出一个圆满的办法给他们，尤其各地 CY 组织非常薄弱，而青年的革命表现又特别好，乃决定在前委纵委两级成立青年科，营委设青年干事，连设青年小组，专门负责作青年工作，前委青年科长得出席 CY 县委，代表前委发表意见。这是本年三月间的事，红军对青年工作之忽视便纠正一些了。

## 注释

[1]毛部，即毛泽东率领的以卢德铭团和湘东农军为基础的秋收起义军。

[2]朱部，朱德、陈毅率领的以叶挺、贺龙残部为基础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3]武昌出发（毛部），指秋收起义军。参加秋收起义的卢德铭团原系张发奎的警卫团，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奉命由武昌开赴江西九江“东征讨蒋”，中途脱离张发奎的建制参加了秋收起义。

[4]南昌出发（朱部），指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5]袁王，即袁文才和王佐。

[6]平浏，即湖南省平江、浏阳。

[7]后期失败（二月彭德怀即退出井冈山），一九二九年一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以三个旅的兵力，分三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英勇抗击至月底，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相继失守。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突围向赣南转移，于四月初在瑞金与红四军胜利会合。

[8]三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七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9]蒋桂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国民党南京军阀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的战争，不久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



[10]两广战争，此处提到的两广战争即蒋桂战争。一九二九年三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讨伐桂系，蒋介石随即将不同政见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软禁于南京汤山，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以图拆散粤桂联盟，孤立桂系。不久，俞作柏经上海到广东，在陈济棠的粤军配合下进攻广西，迫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出逃。七月初，广西平定，俞作柏出任广西省主席，两广战争结束。

[11]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缩写。

## 关于赣州作战中的战略主张和对粮食筹办工作的意见（一九三二年三月三日）

（一）冬电[1]悉，已转省苏[2]。

（二）夫子[3]已出发，计日内可到江口[4]。

（三）粮食问题，只胜利[5]、零都新建区域较可以筹办，可得二次战争[6]经验，由总政治部派工作人员赴各区实行号召，庶乎因地方领导削弱，范树德同志过去曾负过这一工作责任，可以咨询。

（四）胜利之仙霞观、车头、岭背，零都之至龙、罗霄、罗家渡、长洛、小溪，赣县之大田、王母渡各区，均有大批粮食，每一地可派三人前往，十天工作即可收效，可利用河道运输。

（五）在战略方面，我主张一军兵力攻万安，截断赣江。现万城只两团兵，仍公部[7]。

以上各件盼裁夺。

### 注 释

[1]冬电，韵目代日，即二日电。

[2]省苏，指江西省苏维埃政府。[3]夫子，指当时担任战地勤务的民工。[4]江口，属赣县，位于平江与贡江交汇处。[5]胜利，当时县名，系由兴国、零都划出部分地区建立的新县。[6]二次战争，指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五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7]公部，指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部。

---

一九三二年春赣州作战中，红军组成了主作战军和支作战军。这是陈毅以江西军区总指挥兼赣州支作战军指挥名义给中革军委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加。

## 向赣城取攻势与武装赣县零都边境群众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

(一) 据清溪、江口二号正午报告：侵入赣县敌人两团，三日向储潭退去，零南[1] 敌人已留在信丰江西岸，信丰敌人(一报大部)、庚雄[2] 敌人仍未动，赣县报告：公部由万泰移赣州[3] 。

(二) 敌这次行动，显系侦察赤区虚实，以便作有计划的进攻，以影响漳州红军；我们已令三、六两师集中王母渡，向赣城取攻势，调集三团兵力于江口、茅店一线，武装赣县、零都边境群众，实行发展游击，以答复敌人，巩固红军胜利。但仍嫌兵力薄弱，请调一师前来以厚力量，并祈准官田兵工厂拨枪千支武装边区。如何，盼立复。

### 注释

[1] 零南，指江西省零都县(现改为于都县)南部一带地区。

[2] 庚雄，指江西省大庾县(现改为大余县)和广东省南雄县。

[3] 公部由万泰移赣州，指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两个团由江西省万安、泰和一带地区移防赣州。

## 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潮流——介绍永丰游击小组的战斗经验（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

永丰[1]从四月起在苻田、坵坊、谢坊、层山、石马各地建立游击组，不断向苻田、杏塘、善和敌封锁线活动，二月来获得了惊人的成绩，列举其最显著者：

### 甲光荣的战绩

一、他们白天运用组员向敌方进行便衣侦察，夜间袭击，在敌堡垒下捉获反动首领十余名，其中有十六年[2]跑去南昌今年才回来的地主首领谢开文，他们又捉获永丰边区中反水投敌的叛徒七八名及反革命的富农十余名。这些家伙均是依靠敌人堡垒积极向永丰苏区进攻，而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结果逃不了游击队员的妙手。

二、他们四次袭击敌人派出的连游击队及其便衣侦探队，有一次缴得几支枪。他们的办法是预先确查敌情，埋伏在大道近旁，敌人逼近时，猛扑其行军纵队，以白刃完成战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缩入乌龟壳内，相戒不敢轻出。最有趣味的，是有一小组有一个儿童团员善于吹号，配合几支梭标，几支快枪，打坍敌人几十名的短枪便衣队。

三、敌人由苻田四出抢劫，层山红军家属的耕牛粮食一大批被其抢去，游击组的同志英勇追截，全部夺回，归还红军家属。同时有一组捉了地主，罚款数百元，他们交给政府充实红军战费。以上是最显著的战绩。

### 乙发生什么影响？

一、敌进占苻田，其豪绅剥削机关特别区委员会、保卫团义勇队，均前驻十里（东沙陂），经游击组的威迫一次，摸了他们的卫兵，因此吓得退驻苻田街上。

二、永丰保卫团首领吴保芳作白军进攻龙岗的前驱，现被游击组的威力调动和吸引他回到苻田来，保卫其巢穴。同时敌人不得不增加守备，增修堡垒，加多加高加厚，常日夜不安，还觉得不妥。

三、过去永丰有许多地方部队，但天天受敌袭击，连石马的赤色堡垒也是敌来即逃，一无抵抗。现在形势转变了，我们永丰群众天天打敌人，胜利的保卫了永丰苏区。

四、游击组的作用，在永丰是开展了武装群众向敌人作战的潮流。目前各地纷纷办起了游击组，使群众认识了自己自卫力量的伟大。扩大游击队的潮流也掀动了，而使得永丰的基干部队能无顾虑的转移到主要突击方向，实际的纠正了过去分兵把口的错误。我们在西线捉获敌军，他们也说：“咳呀！永丰的老百姓厉害！”

### 丙他们怎样干的？

假如以为他们手中有飞机大炮通信枪照明弹，当然是蠢人蠢想；假如以为他们拥有长枪短枪驳壳花机关和懂得军事的人材，如现在许多游击队一佯，也还是过高估计了他们。我们派人去调查，召集各组长开会，清楚知道他们的武器，每组只有一二支步枪，极少子弹，其余尽系梭标、小刀、匕首、扁担、马刀之类；他们的本领是善于运用自己的武器；他们的组织十分之八是苻田、八都一带的被难群众，石马、坵坊边区群众参加一部分在内。敌人

在荇田、八都、坵坊的烧杀抢掠，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情绪和革命的创造力。他们每一组少则六人，至多的一组（如层山的）不过二十人；他们每一班里面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其中作骨干，他们每组有定期会议，由组员去发展组员，真是从打仗肉搏里面来考验组员。所以这里隐藏不了动摇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给养完全自给，不依靠政府津贴，还筹款供给政府，捐助战费。有一组自己募捐拿钱买子弹。他们的战术，绝对掩蔽自己的目标，多半是夜间动作，进行白刃扑搏，不乱打子弹。他们的前途，各组均向永丰县军事部要求转变和扩充自己，成立较大的游击队。他们是不满意于现有成绩，而是要扩大自己，加强力量，更有力的打敌人。

丁我们得到什么教训？

第一，永丰这一经验，可以使许多独立团营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含羞带愧，小小的武装居然对绝对占优势的敌人进行了胜利的游击战斗，那么分兵把口、拥兵自卫、乱筑支点、不战即退、望着敌垒唉声叹气的那些地方武装领导同志，何以自解？

第二，永丰的经验各地都可以采用的，他们完全依靠工农群众，特别是被难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熟悉当地地形及敌方情况，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补助条件。这两方面的基础，各地都是具备的。因此永丰的经验，不是什么惊人奇迹，而是坚决向敌人作战，坚决实行党与苏维埃“武装上前线”“不让敌人蹂躏苏区寸土”的动员口号所得来的。这不仅永丰如此。乐安、万崇两个游击组冲破封锁，保护大批食盐输入，国币[3]每元买得十一两（国币低价认为无法挽救的人们看看！）。公略、永吉间游击组经常通过敌人封锁线，在堡垒中间捉土豪。龙冈最近开始有四个游击组配合西方军[4]作战。可见各地正在开始造成一个群众游击战的潮流，不过永丰的创造应写在第一页第一行罢了！然而后来居上是有可能的，看我们怎样去组织与领导。

第三，据检查，永丰的经验在永丰境内就未能普遍的运用、介绍和发展。比如石马有八个组未曾出过发；李坊有一组一月内只在本境内警戒巡查，不向敌人出动；永丰中村区区一级以为在南北坑怕敌人游击（距敌三十里），而退驻三十里的中村地方，放弃南北坑一带工作，他们在游击组的第二线上而如此恐慌，真是可耻！另外，谢坊游击组屡得成绩，但无伙食，该区区苏[5]竟不帮助，反骂他们无用。从这些方面证明永丰党对这一运动的领导是异常不够，是让下层党团员及群众去干，自己不注意去收集经验，拿到全县去运用。这一点特向永丰党提出，要求立即回答。

第四，对永丰游击组立即加强其领导，毫无疑问的可以创造成为最有力的游击队，特别在举行向敌封锁线穿袭游击方面，定可以创造新的光荣战绩，予敌人西线进攻以有力打击。我们应把他作为扩大游击队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我们现在嫌地方部队弱小，永丰经验给我们指示一条坦途。

第五，根据永丰经验，还应该注意永丰是就散漫的群众中动员了游击战，假如在苏区各地能就赤少队班排连的基础，来广泛运用游击组的经验，我想开展游击运动必要迅速些。现在确在某些地方拥有现存赤少队，不去有组织的动员来运用游击组的经验，又另起炉灶来干，在人力上白费不少，动员速度更慢一些。正确的办法，凡赤少队无组织以及组织不健全的地方，应采用个别的办法去组织无数游击组，从三人到若干人，沿着敌人封锁线进行穿插游击（西方军在龙冈组织二十几组，开始纠正退却式的坚壁清野的错误）；在赤少队有基础的地方，采取有组织动员为更有利。

第六，游击组的领导，应由当地党及县赤卫军司令部、政治部负责。对组长组员的考查和游击组中的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要建立经常的政治教育工作，特别要使他们懂得党与苏维埃的政策和法令，把他们变成为争取占领区域群众及白区群众敌军士兵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特别要端正他们的筹款路线，使他们的给养得到充分解决。这一点不注意，则将来会有重复一些地方游击队的土匪主义倾向的危险。在军事艺术上，需要由县赤卫军司令部予以专门训练和教育，使他能密切配合着红军的整个战略的要求，从现在捉敌探敌反动分子提高到毁坏敌人仓库、车站、兵站，袭击敌人高级司令部，破坏重要道路，焚毁敌人堡垒，劫夺敌人辎重等。

第七，无论敌人怎样夸耀自己的堡垒政策，不管机会主义分子对着敌垒垂头丧气，永丰的群众是有了铁的创造。他证明了一个真理，即我们能百倍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运用我们现有的条件，我们是能够进行胜利的战争去战胜堡垒里面拥有近代新式武器的阶级敌人！沿着敌人封锁线前后左右及间隙处，开展群众游击的潮流，来配合英勇红军作战，敌人五次“围剿”必然要遭受着悲惨的陷落！

#### 注释

[1] 永丰，是江西省中部的一个县，在吉安东北。

[2] 十六年，指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

[3] 国币，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

[4] 西方军，成立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第四次反“围剿”中，由红一军团警卫师和江西军区部队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在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一九三三年九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陈毅兼任西方军总指挥。

[5] 区苏，即区苏维埃政府。

## 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 (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

蒋贼介石以倾国之兵，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在各个战线上遭受着英勇红军的顽强抵抗和严重的打击。战争愈持久，战线愈延长，敌我谁胜谁负的问题，愈要更激烈的更残酷的在最末尾的时间最狭窄的地区以及最困难的环境中求得解决。谁能持久，谁能耐苦，谁能经得起无比的牺牲，谁便是战争的胜利者！从全国极深刻化的政治经济危机中，蒋贼是企图以进攻苏区红军求得其危机中的出路。他是借帝国主义的债，喝人民的血来打仗，从各方面抽调兵力，凡能抽调的都抽调出来，组织突击。因此他仍然是一个经不起消耗的力量。从我们在西线上的缴获中就证明敌人在持久战中的困难：一是捉获五十三师传令兵携有蒋贼近来训令各军将领：“中央军费困难，兵工厂日出有限，而剿匪消耗过重，以后各军应厉行节省子弹，不准乱耗和浮领滥报。”另外在白军里面普遍的取消了米津，从发七成转到发五成，以至许多部队几个月不发一文。于是士兵中流行“中国国民党，几个月不发饷”的怨语。另外就是堡垒政策的延伸，需要更多更大的守备，不仅其远后方近来完全用地主武装强迫居民守备，以及空着许多龟壳。（据新淦挺进队的报告）即在成为战略上重要据点的苕田、沙溪，其封锁线的交叉汇合处，亦要计划所谓武装居民巩固后方了。（近来准备发枪给沙、苕两地的守备队，但恐靠不住，掉转去打他。）这又可以看见敌人在持久战中，深入苏区腹地，其力量转移和抽调不敷的蹉跎形态。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有轻视敌人力量的表现。但是把敌人力量看成无比丰富，没有丝毫漏洞，所谓“五次围剿满难打”以及“我们力量这样小没有办法，你赶快调几团兵来”（刘毅）等机会主义的哀鸣悲号，真是庸奴自扰，甘作敌人的应声虫！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游击战争还未抓住敌人上面那些弱点，予他以有力的打击，来配合主力红军在主要战线的决战。我们游击战争的薄弱，是对敌人五次进攻的弱点的放松。空堡垒固然是一无所用，但你不走拢去，远远望见仍然有他的封锁作用。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因此在此地来检查我们游击斗争方面情况，实有极严重的实战意义！

### (一) 远殖和挺进游击

集中一部力量潜入敌之远后方，向其兵站、仓库、医院、运输站进行突然的袭击，这种动作普遍发扬起来，可以有调动敌人向后，转变战局的伟大作用。这一主要的游击斗争，在西北线[1]的今天，我们还没有适当的例子：

(甲)最近新淦挺进队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游击于崇仁、丰城、新淦、乐安之间。一时使当地敌人驻军震动，急谋应付。该队发现崇、丰、新、乐这一四角地区虽密布堡垒，但除主要圩市[2]为保安队团匪驻守外，余均为当地群众被迫驻守，我军去自动放弃，或让我军通过。另外许多地方的堡垒，尚无人驻守。群众中一小部分被敌人欺骗的见我军去即跑散，余大部分则皆来接近我军。该队在插入原来之新淦苏区，即从群众口中弄明了敌情。该队经过了十几天流转，被敌发觉了他们的不大的力量，才派队日夜兜剿跟追。

中间几次大小战斗，击溃地主武装及保匪，但未能脱离敌人，敌人老在后面跟着。当地工作团以为无法存在，便指示该队折回中区。工作团则留当地活动。他们折回时，中间在屋头街拂晓时被敌袭击一次，冲散人枪十余。

（乙）宜黄某队以先头队伪装，尽一夜时间行百八十里，经过两道曲折的封锁线，达到距宜黄城五里许之某地埋伏，并接近敌人驻所。敌人在马路上往来来来太平无事，见我军伪装也不察查。我军直袭击到敌人保安队大部门口，捉获正在搓麻将之豪绅领袖数名，从牌桌上抹得一笔红军战费，从壁上缴得枪枝，从豪绅身上缴得其自卫武器。敌人闻讯追来，追我们不上，中途只逃走了几个俘虏。全队回到苏区。

（丙）崇仁某队以同样动作，夜间插入澧波桥马路上，在敌垒中间伪装穿行，拂晓后仍安然向崇仁城方面行进。靖匪大团总老爷，骑着一匹高大的骡马，迎面而来，后面挑了十几担腐化贪污的赃物。我军将其拦阻，他尚厉色的摆架子：“你是那个部队的！”我军答以红军。他始亡魂丧命似的，即答应以三千元赎狗命。我军胜利地连人带马赶回苏区。

他们这种行动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引起敌人的惊扰，错乱，其计划和部署，不得不是我支配而调动其进剿兵力来加强其后方守备，这样就有力地帮助我红军在主要方向的突击。这里要教训一切游击队的领导者：敌人远后方是十分空虚，守备非常薄弱。在那里群众是盼望我们的，是具备了开辟苏区的条件。这是一。敌人几道封锁线，利用静肃的灵便的夜间动作，可以通过我们极大的游击部队。这是二。可以收集充分的资材充裕我军战费，扩大我们的部队。这是三。但他们的不够的地方在哪里？特别就新涂队来说：

第一，来去都直走较大的道路，比如来回都经过敌极注目的屋头街，这完全是遭致敌人的截击和埋伏的。该走羊肠鸟道和往来走不同的曲折道路，才能出敌意表，算着敌人不为敌所算。

第二，不于黄昏前后进入宿营地，又不于拂晓前脱离宿营地，以致在拂晓之际招致敌人的包围，被冲散倒是小事，这回真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游击队千万记着要能绝对隐蔽自己的目标，尤其要于进行袭击显露目标后，立即能把自己隐藏起来。一般的办法可采取夜间运动，拂晓袭击，日间到极隐蔽的地方去埋伏休息，甚至每日每夜连连掉换几个休息地和宿营地。此时在四面派出极强的侦察和警戒。在利用村庄庙宇宿营时，可凿孔枪眼以资抵抗，防止敌的袭击。

第三，游击队最忌讳把自己情形让敌人清楚知道，一面在成份上保证部队中没有一个叛徒，一面还善于脱离敌人，避免敌人的战斗侦察和善于扩大自己的声势。新涂队初去时敌人惶恐震动，以为好大一个东西，以后经过打了几仗，晓得我们的力量，他便敢于布置四面的穷追。

第四，游击队一定要游动不停，千万忌讳停留在某一地区。凡胶着在某地即是招致敌人以强大兵力来进行包围，有特殊危险。所谓游击队要能生根，是说散布政治种子，扶助居民暴动，自己产生后代的意思，绝不是主张把自己尾巴埋在土中，让敌人抓住来死打。新涂队到新涂去，不先发展游击，立即就以为那里是一个根据地，可以太平过活，一到此节失望，即又折回。这是错误的。

第五，游击队最可靠的支柱，是与当地居民发生共生死的关系，应积极的吸收当地勇敢坚决的工农群众加入游击队。新涂队中有一部分是新涂苏区的群众，新涂队不利用他们保护土地革命利益的热烈情绪和其对法西斯蒂镇



压新淦的仇恨，以及他们熟悉地形居民的特殊条件，来发展游击，直到恢复苏区，乃计不出此，反而拖他们回永乐苏区，结果使这批新淦战士便脱队回家，削弱了部队。

第六，新淦工作团的同志，能把自己留在新淦地域埋伏于群众中，证明当地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他们不积极组织群众来配合游击队向敌人作战，将自己的一切才能来贡献于战争，而采取退却打埋伏的办法，毫无疑问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七，宜黄、崇仁部队夜间迅速的运动，出敌意表，获得奇袭成功，可作为向敌人远后方短促穿袭的模范，是值得学习的。

## （二）穿插游击

敌人封锁线长蛇式的向苏区蜿蜒的延伸，完全插在苏区广大群众的包围中。敌人这种几百里长的守备线，是摆着招致我们去进攻，而他是准备了挨打的。我们打他一点，则其全身震动。若能有计划分段进行斩截的破坏和游击，敌人这样防御线是不能持久，要穷于应付的。敌人精神上物质上是要受着无穷的创伤和痛苦的。这里就提出了穿插游击的问题，可作标本的例子有：

（一）西方军所直属的穿袭队，在二十天内向敌永丰、沙溪线进行十余次的穿袭动作，破坏桥梁数座，包围敌之电话站一所，破坏其马路数处，弄得沙溪、苻田敌人日夜警戒，并不停的派队沿路巡行。这个穿袭队是不大的部队，完全从西方军的直属部队抽调出来，配合当地游击队一部分，另外是从较老游击队中抽一部分加入。现在这一批老的游击队员已教会了徒弟，自己归还原队去了。

（二）独立二团远在去年冬一部挺至永丰故县堡垒线中，在敌人密集的机枪步枪交叉火力下，选择隐蔽道路及死角，冲上马路与敌人运输队混战一场。缴获一大批冬衣。惜某连动作迟缓，只截获其先头，让其解款（约十万元）部队向后逃逸。然而这次行动，证明在白天插入马路上打敌人是完全可能，而该团这次伤亡仅四五名。最近在富田之役，敌人差不多有四团以上兵力被西方军驱逐，余敌坚壁不出，相持两日夜。令该团派队负责，捉一个俘虏来查明敌情。该团侦察排于拂晓前进到敌人宿营村落堡垒的路旁潜伏，天曙后敌人仍固守不出。待到十时左右，堡垒里面一个班氏下来，即被捉获。敌人误认为是自己部队，待其察觉，已追我无及。该排是胜利的完成了任务。

（三）举一个坏的例子，三分区某队经常在敌人沙溪太和向横封锁线上穿插好多次，但他不敢去惊动敌人，敌人也不察觉他。这种偷巧过关是我们交通员的行径。只是穿插而不进行袭击，于战术上无丝毫价值，仍然是不执行自己的游击任务。上面的例子对照起来，使我们应该懂得在封锁线上堡垒间隙间发展游击是不怎样困难的。组织几十几百强有力的穿插队，一致分段截取敌人封锁线，使敌人前后联络时断时续首尾不能相顾，敌人将在封锁线上疲于奔命，则这些穿插队于五次决战[3]将有极伟大的贡献，我们将称赞他们与英勇的主力红军不愧为难兄难弟。

## （三）游击队打堡垒

游击队应该负责不断的袭击敌人堡垒从而焚毁拆翻之，这是五次“围剿”

给予诸游击队应解答的问题。每个游击队负责夺一座敌垒，几天内负责拆毁一座敌垒，这是完全可能的。其效果无庸以惊人的数目字积日累月来机械计算。但假如诸游击队直把袭击堡垒的责任担负起来，则敌人千座堡垒的作用大大减杀了。在这里诸游击队夺取敌垒的先例，零星的可以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多半是敌人放弃，或不准备固守的。对据占堡垒顽强防御的敌人，游击队敢于去敲门叩关获得胜利的，尚嫌少见。这里有几则新闻：

（一）宜黄某队于接近敌垒潜伏，先行派一个伪装白军士兵前往更接近的观察。这个战士勇敢算勇敢了，跑在敌垒门口不远地方，大喊一声：“报告！”里面便答应了一声：“进来！”这个伪装战士不敢上前。敌人听一声报告后，不见人进来，便出来看。敌不仅未带武装，而两手正用碗筷吃饭呢！并且说：“你是谁？干什么！”我们这个伪装战士，不能沉着应付支吾，或予以射杀，而回头就跑。麻木的敌人察觉了，丢了饭碗，就是一阵机枪步枪快慢机，向四面打电话。我们的袭击因此失效。

（二）永丰某队夤夜接近了敌垒之鹿砦，很蠢的去拉鹿砦，弄出声响通知了敌人。里面就说：“你去看一看，外面有什么？”那一个人到外面大概应付一下，即回答：“大概是野猪过路吧！”而我们这个游击队的领导者，神差鬼使，不由自主即蠢笨发出“瞄准放”的宏亮的口令。我们一排枪过后，引起敌人的榴弹机枪来回答。幸而昏夜莫辨目标，我们从山尖撤至山脚，虽无死亡，却不少破皮肿手伤脚的。

（三）在龙冈的部队，曾几次迫近敌垒侦察，判断敌人是有很强的守备似地，但几次悬心吊胆，跑拢去看才揭穿西洋镜，原来是敌人在其空堡垒上布置了草人。敌人在其长的守备线兵力不敷分配时，不得不弄诸葛亮式的虚玄。接受他这个欺愚的只有我们部队里的机会主义分子，见着堡垒生畏发惊造谣。这些例子，绝不是作者在此故作战时喜剧的描写，实际上这些为《红星报》所在指斥的不合战术原则的英雄们，在地方部队恐不在少数。敌人守备松懈，兵力难以分布，敌人这种痛苦与战线延长是成绝对的正比例。假如增强诸游击队的战术素养，教会指战员以夜间战斗及进攻巩固阵地的动作，我想是可以开辟诸游击队粉碎敌人堡垒主义的新战绩的。因此我们的结论，第一是加紧战术教育，第二是加紧战术教育，第三个还是加紧战术教育！加紧战术教育！

#### （四）封锁圈内独立的游击活动

敌人封锁线向苏区延伸，并求得其左右两翼的横的封锁的联接，因此造成连续不断的封锁圈，企图把广大的苏区划成若干小块，来进行紧缩包围而各个把苏区镇压下去。这是战争形势发展的特点之一。因此在敌人侧翼或后方（即封锁圈）留下作独立长期的活动，吸引敌人兵力到自己方面，以配合红军的决战，这是地方部队及战区党政机关在五次决战的基本任务之一。特别各独立团营及作战分区皆负有一严重的使命。这一最坚决的在敌包围中进行血战，有着调动和抑留敌人大兵团（数个师）造成转变战局的伟大作用。在历史上每一个大苏区，都是从这样小块赤色区域从冲破敌人无数次“围剿”而生长起。在一九三一年的二次战争，蒋蔡两敌[4]占领兴国，以武力维持并恢复豪绅的统治，把赣县苏区四面包围起来，当时赣南党与苏维埃机关在敌包围中，遭受敌人一旅兵力十二次的进攻，最后只留着白鹭、龙头两个乡

苏[5] 几座高山。经过四个月浴血的坚持，终于配合着二次战争的胜利，敌人的总退却，而胜利的保持了赣县苏区的独立的阵地，这算是一个光荣的前例。当时他们的武器不上五十支，完全依靠着当地群众进行灵活的游击战争，是值得特别表扬的。再次就是新涂的经验，乌江战役后新涂苏区即与基本苏区隔绝。敌人先后集中三师以上的兵力，以及在该地经常转移的无数兵团（如吴纵队、蒋纵队、永乐崇的各守备师及十三师、八九师、保安二师、税警团等）进行长期包围和筑垒的进攻。其中有消灭保安二师俘其师长的胜利。这个斗争从去年八月起直到今年二月才被贾德旺、罗绍洪的机会主义所送葬。但是他的吸引敌人的作用，是很伟大的。在冲破敌人五次“围剿”第一步计划上，应写在游击战史的最先头。这又充分证明在敌人远后方的独立的活动的完全可能及其战略上的意义。目前东线的黎南、闽中，西线的公略、乐安、万崇，以及战争更激烈开展还要更多给我们创造这一作战的区域，在这个时候有充分准备和进行这一斗争的万分必要。在此应提出万崇的经验，四月下旬敌二十七师把乐安、招携的封锁线于望仙、招携间封口，万崇一带地域即割断，被封锁线圈住了。经过红五月的流血战斗，万崇方面的党政机关及武装是受着了部分的损失和挫折。敌人以一团兵力、一个手枪连及四队靖卫团，连续不断的游击进攻，同时坚决进占万崇、鹅公、七都一带进行筑垒。他是要把这个封锁圈的地面再进行紧缩和截得更小块些，就是“抽干塘水再来捉鱼”。敌人这一政策，是使万崇部队受着了一些损失（被缴去枪二十几支，被冲散一部分工作人员）。何以至此？敌人力量并不怎样大，而是因为万崇苏区的领导同志：

第一，在敌人将招携、望仙封口时，他们一无准备，以为敌人不会到万崇来，他们的工作是下乡动员参战归队运输等，完全以最中心苏区的工作估计和方式来对付敌兵压境的紧急环境，把战争严重形势隐匿起来，不向群众宣布，不以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到游击战争为唯一工作去飞快动员，大家太平无事，不将群众武装起来保卫万崇苏区，致敌人一来，即四散奔逃，毫无准备。

第二，是万崇方面武装的领导者的错误，把部队始终停留在万崇苏区，不游不击。敌人不来，坐着休息，敌人一来，即起硬打，以致受到挫折（在吃饭时候遭敌人袭击）。

第三，是内部隐藏着的异己分子及敌探，乘时趁机窃发，影响几个动摇分子而相继投敌叛变，把自己的秘密泄露给敌人。

第四，在几次屡受挫折，即计划退回后方苏区，或想跑到河西[6]去的逃避斗争。他们以为在那里总有一个太平境界等着他们，不了解国内战争中，我们要从四方八面应战，敌人是从四方八面来进攻。今天的后方，明日敌人一来便成了前方了。不坚决斗争，想到任何地方去躲反走反均是无用的。比如公略总根据三次战争经验老把富田当作后方，结果富田先到敌，把他的后方布置搞得稀烂。万崇局面尚在继续斗争中，但已留下上面血的教训给我们。

### （五）群众的游击组

由于敌人占领苏区施行其残酷压迫和剥削，引起了广大群众起来反抗，以旧式的白刃对抗敌人最新式的武装，常常群众得手，进行了胜利的袭击。在敌人占领区域内，这些地方我们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差不多全部退出来了，

但群众尚自动起来斗争。比如白军第四军的通报说：苻田小岭王家，有匪众连夜杀死我军排长一，士兵三，采买四，丢在茅厕中。白军相戒：即约伴携械，不得远出。又如敌五十三师进占在牛田附近之水口乡。白军的厨房受着群众的袭击，捉去特务长一，炊事兵四，传令兵五。比如万太寺下游击组的群众，潜至罗家附近进行了各种破坏工作。又如龙冈毛南乡几个妇女同志被白军捉着，骂他们当土匪婆，向他们说土匪怎样要不得。他们坚决巧妙的反问：“你们说他们很恶，要不得，我看你们白军国民党更恶更要不得！”白军大怒，立即带了他们走。他们随行数里到半途乘隙逃回，白军追之不及。他们逃到乡苏诉说他们这一冒险，很英武的要求武装与敌决战。公略东固每一武装部队参战及戒严，均是妇女英雄占一半以上。此外在永丰，儿童团参加游击组作得力的组员，这是妇女儿童方面的力量也可以组织来起作用的。在博生、安福的群众，两次徒手捉获携械潜入内地捣乱的便衣队。公略水东群众的游击吓得白军不敢出堡垒，我们能顺利在堡垒迫近处进行对外的进出贸易。万崇的游击组发展到青山永乐马路近旁五里许，运进大批食盐。总之，为了冲破五次“围剿”，不仅依靠红军与游击队的力量，而且在广大群众中储蓄了伟大无限的自卫力量。用各种方式把苏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小武装起来，保卫苏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伟大的力量，目前在各地仅有稀薄的开端，缺乏有组织的具体的领导，这正是我们的弱点。

#### （六）地方基干部队的游击战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诸地方部队的游击方式：除了分兵把口、乱做堡垒、上山埋伏等机会主义表现不计外，目前最严重的表现，是向敌人封锁线每日报一次到，虚晃一枪回马就走。甚至虚报敌情，乱耗子弹，被敌缴枪。这在三分区、四分区的部队是最标本的代表。他们的生活，每天照例向敌方游击一次，走到距敌数里地方，打几枪就跑回来，于是一天光阴便过去了。这是由于游击队领导者按兵不动，害怕敌人，阻碍战斗员群众的战斗积极性的发扬。另外就是这些游击队的领导中混入了反革命，他们利用我们的武装来进行各种捣乱。如乱收人员，乱打子弹，乱抢东西，勾引敌人来包围我游击队等。这是关于诸游击队里面某些部队政治上最成问题的一方面。在军事战术上，便是游击队中一部分干部战术素养的缺乏，一般表现是：

第一经常停留一地，暴露目标，使敌人清楚知道我游击队内部人员武装及详情，比如魏赤同志过去在南丰白舍，白军第八师通报上详细载明了红军一分区司令员魏赤脸上大麻子，左眼是瞎的，左脚是跛的，其司令部有两支花机关，一支手机关，几多步枪等，这样当然予敌进攻袭击以千万方便。

第二是部队运动都是喜欢走大路，而且来往走一条路，不习惯于夜间运动，每每打敌人都落空，有时遭受敌人的埋伏袭击。

第三侦察警戒工作异常缺乏，耳目不灵，死板松懈，每每失事。

第四是一般军事政治训练的缺乏。今年一月在宜黄检阅全县七个游击队，没有一个游击队晓得刺枪和打手榴弹，表尺也有认不得的，近来才略有进步。最近检查永新一带部队，上课上操也不是经常的事，内容老是走步法刺枪等，敷衍了事。如潭头游击队尚有三分之二不晓得打枪。这只就军事方面的大端而言。另外公略、万太武装，三四月份在万太境内向靖匪作战，屡屡失枪受挫，但战斗员却不服气，硬要再打过。这回富田之役，配合西方军

独任一翼，激战一天一夜，奋勇压迫白军五十三师两个团退入龟壳，压倒了敌人极猛烈的火力。这证明诸游击队的素质和政治情绪是好的，问题在于领导的健全和坚决的肃清反革命的捣乱与暗中破坏。

## （七）结论

第一个结论应该说诸游击队素质优良（工农成份、战斗勇气及经验也是不错的）。目前就是领导健全和进行教育问题，经过三个月检阅运动，部队是有了相当整理，赶跑一批坏蛋。但热烈突击的运动以后，缺乏经常的教育训练和肃反工作来保证，以致不能完全克服投敌叛变的现象，且又继续发生。另外就是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对战局的各种政治的号召与指导，确实没有计划在部队中进行传达和解释，因此行动上不能高度积极起来。光辉的例子尚得不着适时的表扬，坏的例子也可能在我们面前安然偷过。这就要我们地方部队领导机关以最大的警觉性去注意，就要战区党与苏维埃予以有力指导和协助。

第二个结论是部队中军事上的游击艺术的培养，这一问题尚没有想办法去开始，即就各部队最富于兴趣的本身战斗经验的检阅也是很少。我们常常蕴蓄着丰富的经验，不拿出经过原则的洗刷与整理，不是遗忘，便是第二次又上当。现在办法要求游击队的首长经常进行战斗的检查，从其中把自己历来的优点视为该部队的传统加以阐发，缺点则作为谆谆的教训，而且这些应该是上课的主要材料之一。分区及独立团营应有一个专门负责教育工作的人，定期召集战术学习的会议，收集其战斗经验等。假如目前干部缺乏，应该找一个从这一方面可能培养的同志来开始，从最简单的方面做起来。

第三就是军委发下来几种小册子，如进攻巩固阵地，夜间战斗指示，游击队怎样动作，构筑支点指示及一些关于游击动作的文件，我们检查在游击队中很少影响。由于干部自己不看，当然说不到传达给战斗员。常常看见独立团营的公文箱中有许多崭新耀目的书籍，到了相当时期挑不起了往后面一送完事。这种现象是最不应该的。应该由各分区的首长特别注意这一战术学习和督促学习，以及进行简单测验。我们绝对不能说一般干部不愿意学习，最近我在某些部队中提倡这一方面，虽然自己也是外行，隔靴搔痒，他们听来也觉津津有味。我们应努力来提高战术的学习。

第四就是群众游击的伟大力量的发动的问题，要求这个运动应统一的在县赤卫军司令部及区军事部的领导之下，有计划的去进行。党与苏维埃的领导应经过军事机关去进行，要使得这些行动能服从于整个战略意志的要求则更尽善尽美。永丰的游击组织受区委的指导不受县赤卫军司令部的指挥，这是错误的。这绝不是限制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扬，相反的我们应责成每一个地方军事机关，应用各种方法去组织群众到游击战线上来。某一地游击组有经验立即介绍到另一地去，或把其中有经验的组员派到另一组去作导师。从四方八面把群众游击战蔓延起来，这是战区党与苏维埃的紧急任务。党县委的军事部更应该是这一运动的发机[7]。

### 注释

[1] 西北线，指中央苏区西北部作战地区，包括江西丰城、新淦、崇仁、宜黄、乐安、永丰、泰和、万安等县。

[2] 圩市，江西、福建等省农村地区进行交易活动的集镇。

[3] 五次决战，指中央苏区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4] 蒋蔡两敌，指北路国民党军队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

[5] 乡苏，即乡苏维埃政府。[6] 河西，指江西赣江以西地区。

[7] 发机，其本意指拨动弩弓的机关使弓上的箭得以发射，这里借以比喻领导群众游击斗争的县委军事部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致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信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

育英县长先生尊鉴：

快电奉悉，抗日热情溢于言表，读之令人至感且奋。日寇肆虐，非举国一致不能抵抗；举国一致，非各派首先联合无由实现，此固事理之至明者。国共两党为中国两大政党，两党重新合作则抗日统一战线告成，而日寇为不足虑矣。

敝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即提出联合抗日之主张，工农红军在当时曾不断抗日事实之策动，惜乎最初和者甚寡。迹来随形势之剧变及日寇之猛烈进攻，抗日联合之主张遂得深透人心，而为各友党友军所鉴谅、所接受，民族抗日大革命于已开展。诚中国历史之转捩，世界反侵略阵线之迈进，不独国人庆幸，即国际间同情亦倾注于国共两党矣！

我辈虽处深山，在敝党中央及特委领导之下，早于抗日工作多所准备，故于八月八日发表抗日宣言。复于八月二十日分函呈请南昌熊主席、赣州王专员、戴师长[1]，要求立即指示抗日合作，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同时，敝特委又发出各种指令，使雄、庾、信、康、雩、赣[2]各地党部及部队立即停止游战及一切反政府之活动，以示抗日之诚意。其他远地如三南[3]、瑞金、长汀、上崇[4]、莲花等地，以半年来交通断绝，传达无由，其行动之转变迟缓，诚为憾事。但敝党衷心，固焦灼莫名，热望早日停止对峙之局，方有益于抗日救国也。

兹得尊电指示，感佩莫名，敝党心中之萦结思虑得以纾解为快。何如昨日得里东唐营长及信丰第六区长两信，谆谆以抗日救国相属望，足资感佩外，复谬承其厚爱，以自新、纳降、投诚相责难，同时并以赏金、名利、免死、不咎既往为饵，复引何长林、李丙生[5]等无耻叛徒之前例，信誓旦旦，良足私感；但揆诸各党派联合抗日之精义，又不禁令人失望！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乌能表示抗日联合之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乌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夫无节操卖党求荣之辈如某某等，其自新之日，即脱离共党之时，界线显然，岂可强同！且此辈既无气节，复又贪生怕死，他日万一日敌深入，摇首变为汉奸自意中事。敝党素知善与人同之义，亦愿此辈革面洗心，努力抗日；但为抗日阵线巩固计，对此辈亦应有所戒惧也。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基本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自新、纳降之说必须辨正者，非敢饶舌，亦所以示抗日之忠诚耳，公其谅之！

毅一面将尊电飞送敝特委负责讨论答复，其代表约一、二日后可达庾城；一面以个人鄙见略陈，以读尊听。又项英同志于今春仙人岭袭击后即他去，当设法将尊电转达。北山粤赣义勇队刘发处，当再行令其待命抗日，一切请释尊念。再有请者，如尊处能转函驻军先行停止对信雄边、三南、上崇等地“清剿”，当于传达收拾便利多多。

草此。谨复。不恭之处，伏乞原宥。

---

作者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标题为编者所拟。原信无标点，未分段。

敬 致  
抗日之礼！

陈毅谨上

古七月二十九日夜

注释：

[1] 熊主席、赣州王专员、戴师长，依次指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党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王有兰、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

[2] 雄、庾、信、康、雩、赣，指广东省南雄县、江西省大庾（今大余）县、信丰县、南康县、雩都（今于都）县、赣县。

[3] 三南，指江西省之定南县、虔南（今全南）县、龙南县。

[4] 上崇，指江西省上犹县、崇义县。

[5] 何长林、李丙生，何长林原为赣粤边军分区司令部后方主任，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叛变。李丙生原为大庾县北山交通站交通员，一九三五年十月叛变。



## 茅山一年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 一、前言

去年五月中由皖南奉命东进，六月一日离开南陵，三号夜间通过芜湖，宣城铁道踏入苏境，六月十二日到溧阳之竹箠桥，十三日北进，十四日部队到达茅山。以前盘旋脑际、久思快游的茅山，一旦摆入眼帘，心中惊喜交集，喜的是部队安全挺进达到指定地区，吃惊的是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在游战[1]的地形意义上完全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地图与实地情形不能十分符合又得一次证明。十五日继续前进到宝堰，我们部队就积极布置战斗。十七日粟司令的先遣队[2]以卫岗[3]的处女战斗之胜利迎接主力，我们收得许多战斗俘获品，就在宿营地聚集了几百个居民来围观。我当时口占一首七绝是：“抗日族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4]，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当时斩获敌军土井中佐以下数十人，获敌日币伪票万余元，枪械数十枝。这首歪诗，聊志一时欣快之感。接着于竹子岗、孔家边、东西谢、新塘、新丰、东昌街、句容城诸地连战连捷。此皆六、七、八三个月中间第一期作战经过。现在回想起来，往事成尘，余味仍在。今当六月东征一周年之际，觉得一年来我军抗战，获有成绩，遇过困难，存在缺点，有总结一次之必要，作用在勉励同人，努力第二年战斗之开展。

### 二、南陵出动时期的局势估计

领导战争和组织革命斗争，情形差不多，首先在于正确的了解具体形势，有了正确的形势估计，才能定出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才能定出革命的正确策略和口号。形势的估计过高或过低，必然定出错误的方针，必要遭受失败，这是古今中外历经试验的真理。我们在皖南时期特别注意到这一个中心问题，我们部队出发前的战斗动员的主要军政内容，都不曾离开过全国敌情了解、友军抗战经验、本身优缺点以及江南的特殊情形诸方面。我们试引证叶、项军长[5]去年的五月指示，作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活动的地区是交通发达广大平原而多川河湖泊的地带，其中茅山山脉虽蜿蜒境内，但仅属许多小山。

江南地带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民间抗日意识相当高，但缺乏组织和领导，对我军认识当然不十分高，因我军从未到那一地带活动过。

我们活动地区是处在日寇战略主要交通线（京沪线）之侧面，南京、上海更是敌寇进攻我国的策源地。因此，敌人的兵力分配集结于交通重要点上，加以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但敌人兵力不够，空隙地区甚多，这一点是便于我们进行游击战的。

本军素质以山地游击见长，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

---

本文原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新四军《抗敌》杂志第一卷第五号。作者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副主席、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

人作战的经验，这是我们的弱点以及目前困难的地方。但我军另一面素能团结群众，在这些地区如能迅速争取群众，团结人民在我军周围，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就是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因为地形是死物，如能正确利用地形，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和战术，就是地形不利绝不能障碍我们。只有失掉群众的扶助，地形虽好也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不要忘记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的最基本条件。

根据以上情况和条件，对于本军执行任务，应采取的作战的方针和主要原则如下：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执行，依照目前地形和敌我状况，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集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和歼灭大的敌人！”，上面的指示是抓紧了自己的任务，估计了当面的敌情，估计了新四军本身的特点以及江南战场的轮廓，可说完全是正确的。我恐怕这样简单的指示，不能使指战员清楚了解，还在东进途中作了不厌详细的解释。记得五月二十八日在南陵的干部会上，我们作了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此地不妨引用如下：“一、日军进攻游击队的政策及战术特点之分析（丙）根据北线、西线的经验，敌人对游击队‘扫荡’计划，通常组织四路以上的支队配合飞机及机械化部队，分路对我军目标和活动地区围攻，求得齐头并进，分进合击，使我军无处躲闪，逼迫我军与之硬打，消灭我之实力，也就是根本上减弱和消灭我军的游击力量。

（丁）敌人‘扫荡’计划变成绝望时，必然迁怒于群众，必采用过去中国内战的经验，用移民移居、封渡封河、焚烧船舶、平毁村庄。屠杀人民等办法，来镇压反抗，陷我军于孤立无助的地位。

（戊）敌人惯用‘以华制华’的分化政策来对付我国，这个政策运用在沦陷区域上，便是组织若干汉奸伪军作为进攻的助手，收买土匪作为捣乱我军的别动队，派遣侦探、间谍、娼妓混入我方，进行破坏、刺杀、引诱等办法……

……特别要抓住我军前身是工农红军这一特点来进行欺骗鼓动……建立反共阵线来对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己）敌军虽有他的长处，但他的弱点也很多。我们全体军人要靠自己手中的武器，虽仅有步枪、手榴弹，善于使用他，仍然可以战胜强寇。

## 二、对日军战斗的着眼点

（甲）在战斗上，最好方式是打敌人的埋伏，在极接近敌人地区隐蔽起来，趁敌人行军纵队到达时，冷不防而猛扑之，使敌首尾难顾，陷于混乱，可获全胜。

（乙）袭敌战斗是对驻止敌人，主要是夜间秘密接近，拂晓前突然袭击，使敌人人不及用，马不及鞍，车难开动而解决之。

（丙）我们与日军作战，最好是手榴弹和刺刀，最好方式是白刃战、夜战，切忌进行火力比赛，切忌构成宽广的战斗正面，不要陷入敌人的火网，不进行持久恋战，一到敌人火器展开，火网构成，便立即转移到侧面，甚至放弃突击。

（丁）动员广大群众配合军事行动，集中、分散，灵活自如，是目前组织战斗的基本方略……大小破坏和骚扰是战胜敌军的主要手段之一，许多战术家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不顾主客观条件，就幻想第二平型关的战斗，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集合若干小胜来造成江南第二平型关的胜利，来附全国抗战友军的骥尾……如古语所说：‘我能往，寇亦能往。’这是指给我有利弊，于敌人亦有利弊，只要加上抗日人民的条件，加上自己的灵活指挥，这个平地游击和湖泊游击的课题，必然顺利解决……固然我们不否认地形是游击队有利的重要条件，但切不可变成人不去利用地形地物，反转来被地形地物所利用，人失掉主动与依靠死物，这未免与古昔的拜物教相似！

（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分化阴谋毒计的基本路线。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日军抗战，使日寇、汉奸、卖国贼陷于孤立……本军的模范纪律、政治宣传鼓动和战斗胜利，是争取人民帮助军队的三大条件……游击战区民运工作是以提高人民抗日斗争到武装游击的最高阶段为中心，要扶助和培养并改造地方人民武装势力……反对限制政策，反对吞并政策，尤其要反对游击队间的小内战……抗日的纪律最主要的原则，是部分利益服从总的利益，阶级利益服从总的民族利益，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抗日的胜利，就是救自己救国家的胜利。我党的基本路线在此，本军的基本纪律也就在此，这是战胜日寇的革命动力的泉源。”

我不厌重复来咀嚼旧文章，一面说明南陵出动之前，我们作了相当的准备工作，一面说明我们纠正了当时部队中少数同志那种不顾及主、客观力量的急性病，他们的错误在于轻视敌人、夸大自己，马上幻想几个大的歼灭战。同时也证明某些人指责新四军保存实力不打大仗的说法，不是由于战略战术的错觉，即是含着恶意的中伤。最后就是我们这种估计和判断的正确，为一年来的战斗所证明。一年来的工作都是遵循上面的方针，好像火车头沿着铁道行进一样，我们是很顺利的前进着。又如当时我们认为人员缺乏、武器拙劣、地区生疏的三个大困难，也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一般的解决。

### 三、初到江南一般局势的了解

和工作部署的概要上面所说的是南陵的方针，但仅属于一般性的决定，我们并不只凭主观的判断来行事，所以在沿途就尽量设法去了解民情、风俗、生产、消费、地方历史、文化状况，特别着重调查抗战以来在江南所引起的变化，这是新的事实。这一点把握得牢，才更能使自己的方针能正确实施。我们在南陵出动的训令即说：“所有干部应动员起来问路线、问敌情、问地形，搜集和了解一般社会情况……”沿途我们开了许多次的座谈会，拜访许多地方人士，动员工作人员作了许多访问和调查工作。粟裕同志率先遣队与我们会面，他作了五小时的江南行动报告，帮助我们十分大。在六月十二日军次溧阳竹箠桥召集一次干部会议，我们报告提纲中包括下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业已达到指定地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战斗。我们的部队贯穿苏南九个县区，大体上了解一般情形，因此我们不迟疑来决定我们行动的策略、口号、标语。我以为我们应抓紧下面四方面来执行任务：第一、我们在部署战斗解决问题时，首先要照顾日寇方面在江南的现行侵略政策。同志们常喜欢用烧杀掠抢奸淫六个大字来说明日寇的政策，这固然不错，但如果固定看下去，不免流为公式主义的估计。要知道日本强盗是现代的所谓文明强国帝国主义国家，他不会这样简单。他四十年的准备工作，他最会玩阴谋，弄新花样，更会寻找我们中国的弱点。我们对于日寇的一些小行动都要以高度警觉性毫不放松从各方面予以回答。我们的策略切忌为渊驱鱼，就是弄得

不妥当会在客观上助长敌寇的发展。第二、我们还要根据国民政府的法令切实宣传和奉行，我们不能标新立异。虽然在下层许多实际问题，政府法令并未具体规定，但我们解决这一些问题总不能离开政府的抗战国策和抗战建国纲领。本军是国军的组成部分之一，此次东征就是为了推行政府国策，造成本军是奉行国策的模范，这是同志们长期斗争的艰苦工作。

第三、我们还要顾及民众的情形，细心去了解民众的痛苦，洗耳静听民众的呼声。仅就十天行军的材料，一面看见江南同胞所受敌寇的压迫与战争的痛苦是十分沉重了；另一面又看见江南地区地方上小派别的斗争是异常紧张，许多游击队即因此而发生内战，民众对游击队的厌恶恐慌心理，达到异常程度。抗日游击队本是光荣的头衔，但确被一部分不法的游击队造成信誉扫地了。我们要收揽人心，调停内争，帮助地方武装的改造，说服、劝导、调停，我们不惜垂涕而道，切忌用武，切忌命令行事。人民望国军东来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如使他们失望，那就是罪恶，谁也不能宽恕。现在许多民众不愿意我们贴标语，我们就多用口头宣传，不能说扯标语的个个都是汉奸。民众不愿意我们久住他的村庄，我们宁肯多搬几次宿营地，千万不要说抗日烧了房子不要紧。因为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我们要用政治宣传鼓动，实际的战斗胜利，来提高他们的情绪。目前应该十分耐心，不能急躁。

第四、我们还要顾及本军本身的状况。这一点我们讲得很多，不下几十次。今天特别指出一点，即是以本身的兵种、力量和政治面目担任游击战，这是长期艰苦的斗争。我们不能马上攻城掠地，我们只能给予敌人许多打击和骚扰。民众中已发现对我们要求过高，比如说国军到了几千，马上可以打开南京。现在的过分热忱，必然引起将来的失望。另一面，这些游击战经过的地区，敌人必然采取严重报复，人民受着敌人的报复，必然有落后阶层不去抱怨敌人，会转而抱怨我们，这中间就要求我们极艰苦的宣传解释。过高或过低宣传游击战的作用，结果都会不好。我们做给江南人看，只要我们吃亏少，敌人吃亏多，经常保持这一比重，最后水落石出，江南民情必然奋发起来……”

把上面竹箒桥会议的解释拿来与南陵会议比较，事隔十天，确乎我们更详细具体的规定了各方面，这就得力于虚心体会和各方面的调查工作。可以说在竹箒桥以后我们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尺度，就决定地握在掌中了！

#### 四、一年来敌我间的军事纠缠

从六月到十月中旬，这是第一个作战时期。敌人肆意西进，在江南采取守势，不料到江南游击运动会有新的发展。在卫岗、新丰、句容、珥陵、高资、仓头诸次战斗，敌人大小被歼灭后，完全采取疯狂无人性的烧杀报复，同时极力加强守备。这个时候敌人对我军的批评是：“新四军太恶毒，常常把我们完全烧死”（见去年八月一个丹阳汉奸自新的报告）。又谓：“新四军是共产军，很灵活，他容易生根”（见去年十月敌人进占宝堰后公开的欺骗讲演）。南京汉奸《维新报》及上海汉奸《新申报》亦谓：“在京镇间行动的新四军属于共产系统，最为恶贯满盈。”我军便衣队于去年十月在宝堰击杀敌之中队长一名，迭次击杀日军不少，敌人恼羞成怒说：“新四军有胆量，公开来打一个仗，不要用这卑鄙手段。”这里我们看见强盗的日本军阀

在挨打之后，也居然板起面孔来讲什么道德了，一何可笑！从十月后到今年二月，敌人采取攻守并用之姿势，密布“梅花桩”来填满空隙，企图聚歼我军或拥挤我们退出京镇地区。但我们仍然能穿插盘旋自如，并进行许多次乘虚袭击；一面将战线逐渐向南转移，京沪铁道上的活动减少。我军常遭受敌人的分进合击，这已经于我们战略上不利，但我们仍然坚持原地活动。一般居民担心我们不能支持危局，怕我们走开，失其保障。几个月坚持原地活动，一般人民才将苦战坚持的评语赠给我们；特别隆冬风雪，衣被不全，更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经常有一个部队在南京、镇江、句容间三角狭窄地区，敌人动员千余兵力进行二十三次之围攻，我们仍然留在该地坚持。有时候整星期不到民家，完全露营，半夜才到民家烧饭吃，这就大大提高人民对游击战的信心。人民清楚知道敌寇伎俩，会在我军面前屈服，呈现智穷力细的状态，所以在去冬以来才开始了居民盛大的慰劳我军的运动，这是艰苦奋斗的代价，绝不是偶然的凑合，更不是简单的宣传鼓动能够解决的问题。从今年二月初，我们开始争取主动来打破敌人分区“扫荡”的计划。我们在战略上首先应该“扫荡”敌人的梅花桩，重新转到敌人深远后方。从二月七日东湾战斗，二月十四日延陵战斗，到二月二十日后淳化、高资等地的袭击，均完全胜利。敌人才知道小据点容易被我消灭，才改变计划，放弃小据点，增强大据点。在三月间，敌人放弃延陵、茅麓、丁庄、导墅桥、上党诸据点，一切守备兵力完全集结公路、铁道线上。敌人为执行其新阶段上“扫荡”敌后的方针，又增加新的兵力，计划作更大规模的“扫荡”。这个时候国军主力攻击兵团，配合四月攻击计划进入江南，予敌人以正面的有力回答。本军在苦战中，得到友军援助，就开始了目前新的战斗时期。

总结起来应该指出几个主要倾向：第一，日寇的悲哀正在他冒险进入中国内地与我中华民族进行战斗，处处都在我们民族力量的重重包围之中。敌寇在开战之初的主动性进攻性逐渐转为防守，在不知不觉间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比如敌人的据点伸入江南农村市镇，无论其四面扫清射界，密布铁丝网，引水灌成沟渠，作为外壕障碍进攻，同时昼夜轮班展望，机炮放在固定位置，预先测量好距离，日间标定目标，以便夜间用机枪水平射击，以火力封锁巩固自己的安全，但敌人不能不吃饭，不能不走路，不能不与中国人接触。俗语说“二十八碰不到还有二十九”，又说“月大等三十，月小等二十九”。这必然有松懈，必然会失足跌倒。我军的优长就在善于选择这个时机，这是敌人无法解除的困难，也就是一切侵略者的悲哀，了解这一倾向可增强我们抗战的更大信心。第二，日本是一个富于模仿性的民族。在江南我们也感觉这一点。日寇灵活善变，一遇挨打即通报各方，马上反映，马上转变。因此，我们一种新办法用了之后，就应该马上调换，守株待兔的办法一定吃亏。尤其重要的，日寇在后半年对游击战的学习和夜战，也有了显著的进步，这就是他们的模仿天才的成就。比如来去走不同的路线，宿营地经常变换，专走小路避开大道；黑夜包围住民地直至天亮鸡犬不惊；敌寇也伪装我军，也用便衣队四出滋扰。这种转变是在上半年敌人所不屑采用的，以后也居然学会了。我惭愧在使本军正规化和纠正游击习气上成就甚少，敌人军事技术的长处，我们也学得不多。第三，一年来战斗的倾向显著的是偏于肉搏纠缠，火力战斗和比赛，这是十回难有一回。这由于日寇深沟固垒，我们没重高兵器的条件来决定的。这一点外界不了解。比如居民中常说：“你们为什么不打丹阳、不打镇江啊！”又如外间曾有人说：“新四军保存实力！”我在未

歼灭延陵据点之前，遇着延陵绅士也坚谓立即打开延陵，我当时干脆拒绝了。但我没有使他失望，我说等将来。我认为不顾主客观力量，不选择时机要人家去无代价送死，这是罪恶，这是拿生命作儿戏，是敌寇的期望，绝不是我们的要求！这里用不着说这一倾向于部队的编制、补充、整训、士气都有极大的影响！第四，就是指出江南抗战诸兵团间的配合，大江南北的配合，还没有收着如臂使指的效果。人民武装与主力、兵团与兵团的配合更缺乏，所以不能收到全线游击、四面击扰的伟大效果。我认为这是今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地区的限制是各方面配合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值得考虑的是，敌人能以统一指挥对我，而我则各方不能配合齐一，显然是不利的。第五，就是一年来的教训，本军应着重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要改进和提高战术水平，记着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尤其部队经常分散作战，没有集中整训时间，新战士的战斗动作更不熟练，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虽然抓紧一面作战一面教育的原则，作了众多的努力，但所收效果仅能维持战局。站在开展战局的观点，我们必须更进一层！

## 五、一年来敌我间的政治争夺

在第一时期，敌人进入南京已安闲了半年时间，敌人只感到游击队的滋扰，此时敌人便抓住游击队纪律不良，来进行政治上的欺骗工作。敌人用“复兴江南委员会”及“江南难民救济会”的名义，以汉好口吻发出消灭游击队的呼声。他的传单上说：“几十万正式军队都失败了，小小游击队怎能抵挡皇军，不过徒苦居民。”“游击队要抗战请到湘鄂前线去送死，不要在江南捣乱，现在皇军正在恢复江南秩序，又枪声四起，完全是游击队打家劫舍的结果。”又号召“江南人快起来帮助皇军消灭土匪游击队。”是的，在我军未进入江南之前，敌人眼中只有一个游击队，满以为一加“扫荡”即可绥靖江南，实现“王道”。此时敌人中心政策是消灭游击队，同时定出收买游击队办法，只要游击队不破坏交通，可以让其安居乡村抽收捐税，甚至国军来时，“皇军”可予游击队以保护。

在第二时期，我军进入江南仅一个月来的战斗，敌人知道来的是正规军，敌人由反对游击队转到反对新四军身上。此时敌人抄袭以前的滥调，说新四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说蒋委员长勾结共匪捣乱江南，号召建立反共阵线，划京沪线为五个防共区，每区指定指挥官，进行“扫荡”工作。同时变更杀烧政策，改用怀柔政策，到处开“和平会”、“中日联欢会”，专力防共。这个时期，从去年八月起直到十一月，敌人进行了许多工作。从武汉沦陷后，敌人的政治欺骗更显明更精巧，在政治上组织“反共青年团”，开“反蒋示威大会”，勒令乡保甲长担任地方事务，招待军队，保护交通。他说：“你们是地方上的人，应办地方的事，应保护地方，不要与闻外事，否则用烧杀手段。”在经济上，着重吸收江南物力财力补充自己，秋收后大批收买谷物，恢复京、沪、芜、苏的工厂。今春又大批收买鲜茧，大批推销日货。在文化上，利用中国古旧传说进行欺骗。

我们在第一时期初到之际，特别着重整理地方游击队。我们自己把游击队弄好，使人民满意，敌寇阴谋不攻自破。我们对无可救药的游击队，曾奉命解决过，如朱永祥、陈德功等。我们知道本身是一个游击兵团，特别以自己的纪律来回答敌人的欺骗，用事实宣告了敌寇宣传的破产。

在第二时期着重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抗战中中国的伟大进步，政府国策的正确和蒋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安危的重要性。这里可以总结有以下教训：第一，我们应认识到敌人唯一伎俩在用屠杀手段来征服人民，江南人民除了的保障身家性命财产而外，没有一个人是甘心附敌的。因此，在与敌人政治争夺中应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我们设想一个人如对抗战前途没有正确认识，对敌人到来没有应付方法，对受摧残后无任何救济，这就只有走上不得已的与敌人妥协的道路。如果拿我们军队中人的决心认识和他们比较，自然我们得无条件视之为汉奸。但是这是江南广大居民中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极审慎的态度。当时对一般欢迎过日军的人们不谓之为汉奸，而谓之为两面派，决定了争取其转变走向积极抗战的道路。我们初来任何地方普遍是维持会，普遍挂良民证，普遍挂太阳旗。我们军队到一个地方，居民每每误会为日军，当着“皇军”来欢迎，后来知道是国军，才忙着把欢迎“皇军”那一套收起来，改成另一套。我们解说抗战形势，提高人民抗战信心，提出具体的武装斗争的办法，表示日寇到了有方法应付，同时组织人民间救济难民运动，表示抗战中受敌人打击时，也得到同情援助，在许多次战斗胜利后，才转移了妥协风气，争取两面派转到积极抗战的道路。第二个教训，在指出江南的地方斗争，游击队的小内战中间存在着敌寇汉奸的组织作用；就是没有敌寇背景，他们客观作用也在削弱中国帮助日本。首先我们以驻军的有力量的资格不偏袒任何方面，我们无数次用杯酒言欢，化仇为友的办法团结内敌，调停各方。我们公开宣称不愿受人利用来替某一派别某一集团作私仇的报复。我们公开号召认识民族大义，我们公开号召学习国共两党十年血战能一致抗战的优秀模范例子，我们公开号召一切以中国人为本位，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这种理论和态度感动了不少的士绅居民，取得人民无上的信赖。第三个教训，我们要认识“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在我们中国是具着传统的力量。历史上中国的党派予人民以强固的厌恶的心理，如历史上的东汉之党锢、宋朝蜀洛党（欧阳修的《朋党论》吐露厌恶党派的消息），这些党派斗争有的在国家破碎时含有原则性的斗争，所谓一正一邪的斗争，但仍然不能推翻“群而不党”的传统精神。不过这种厌恶党派的心理是带着盲目性的，而且这些党派与近代党派大不相同。但是人民中间这种心理，都是我们应该估计到的。我们一面解释国共合作的意义，一面解释各党派在抗战的作用，现存的党派是抗战的必要工具，人民应该严格要求各党派的组织严密，党员自重。我们更负起责任使在本军服务的共产党员，认识自己的岗位，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争取人民，团结人民。同时，我们更严格宣传和主张党派利益服从民族利益，绝不能不顾抗日民族利益，甚至牺牲民族利益来制造磨擦，便利私图。以我们行动来证实我们的宣传，无疑已获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大的成功，日寇的反共计划，固然遭着了决定的击破，就是这些磨擦专家向人民提及“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要剿共的”，也在人民冷视面前讨许多没趣，自己丢丑。第四个教训，我们应该认识游区是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游区是处在敌人势力大于我们的情况之下，游区是处在敌我相持不下，敌我势力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一切问题的解决应争取时间、空间，一切问题均贯穿了军事性质，所谓“争胜负于俄顷”，这句话可以说明许多方面。因此，游区工作应要求事权统一，要求独断专行，更应该反对限制、磨擦，反对互相怀疑和互不信任。三战区游区工作会议指出各兵团不得互相作恶意宣传（大意如此），我们完全赞同这种态度并努力奉行。我们认

为最好方式是用委员会的方式，把党政军民代表集合一堂，以集思广益的精神来决定统一行动，游区的中心问题恐怕就在这里了。

## 六、一年来地方武装工作

研究江南地方武装，其人员组成来源，一是当地人民抗日起义的，一是国军西退后遗留下的官兵，一是帮会分子转化，一是旧日地方保安团、民团改编的，可以说成分复杂得很。因此，其种类可分为十大类：（一）国军派遣的游击兵团。（二）地方拥兵自卫土皇帝式的武装。（三）抗日分子如文化人、进步青年集合成的。（四）帮会首领号召成立的，徒子徒孙一大堆，加上绿林成分。（五）地方县、区政府的常备部队。（六）两面派武装。（七）反正的部队。（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九）含党派性或党派所领导的武装。（十）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这些部队可谓名目繁多，不及备载。除游击兵团外，抗日招牌是要挂的，武断争夺税收是要来的，打日本是要先跑的。当然这里面仍然有不少的贤者，在抗战中也起了不少作用，如反对组织维持会，反对日寇抽壮丁，反对修马路以及破坏工作等，这不能一概抹煞。地方武装的领袖常常感觉：一缺乏子弹，二缺乏固定经费，三缺乏军事干部。但他们不知道最缺乏的是政治领导和正确的抗战政策。子弹不知取给敌人，坐着消耗一空；经费加诸人民，引起矛盾怀恨；雇用的军事干部不了解民兵性格，简单照军队规模来改造自己，结果徒得皮毛，遗其精华，甚至染着坏习气，这都是不从政治上加强领导所得的结果。地方武装有一种优点，都是来自田间，大多数脱离生产不久，全是天真的农民，能抓庄这一优良的素质加以整训，自然可以有光明的前途。有些地方部队从民众中出来转而压迫民众，结果反被民众解决，真可浩叹。江南地方部队一年来走过三条道路：第一条整理纪律，积极作战，转化为正规军，这是光明大道；第二条路腐化堕落，受敌人收买，终被敌解决；第三条路素行不法，脱离民众，不被国军剿灭即被民众解决。在我们行动地区一般游击队都转化为正规军，这是经过长期协作改造工作的成果。我们的办法：第一，是予以有力扶助，特别是政治工作，决定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第二，领导其从战斗中锻炼，只派他担任次要任务和辅助任务，绝不要令其打硬仗置之于危地，引起其对主力兵团的疑惧。第三，整理纪律，洗刷坏分子。第四，配合主力兵团行动，供给他照好榜样学习，如带徒弟一样，把他带大。第五，着重对干部的训练并予全队以整训时期，但不要撤换其原来的干部。一年来许多地方部队均逐渐进步，能单独作战，能单独进行民运工作，军民关系改善，都证明上述办法是正确的。此外应补述的，地方武装工作还应注意：甲、宜就其来源成份来进行改造，不应用笼统办法，如无条件改编，或完全解散取消或勒令调后方训练。乙、地方武装的首长愈进步，其全队转变也愈快。丙、当地民运工作普遍很能影响地方部队之进步，相反亦然，两者互相影响。丁，不要仅注意地方武装工作，还应加上注意到武装地方的工作，我们以为政府及主力兵团应有计划发枪弹给民众，把许多民众武装起来，才能使许多地方抗战工作猛烈开展。江南地方武装已是黄台之瓜，不堪再摘[6]，目前应注意到武装地方这一方面。我们在江南曾经拨了几十条枪给镇江县府，这是一个开始，可惜我们力量薄弱，不足以言此。戊、游击区实行征兵抽壮丁是不妥当的办法，要动员人力武装上前线，最好方式是扩充地方武



装，用逐渐抽调方式加入主力或组成主力兵团，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广大征兵工作。地方工农人民都充分有地方保守观念，都喜欢当地方兵，而不愿当国军兵，此一点宜迁就，使其逐步提高，逐步转化。

## 七、一年来敌伪军工作

到去年冬天为止，我们的敌伪军工作都限于火线喊话和散发传单。在今年开春后有几次伪军反正：一是金坛王部，一是镇江姜部，一是最近的镇江杜部，三部合计反正的人枪约三百余人。这是一个小数目，但能开始这一工作，也有他的政治意义。我们来研究初步的经验吧。伪军的组成，一部分是地方武装被敌收编的，因靠近城市迫于威势，他们自己愚蠢地以保卫地方名义向敌寇输诚的；一是由土匪被敌收编，目的在于金钱的；一是收集失业的粮差警察，由伪官组成的，上面是普遍的形式。他如抽壮丁，崭新组织伪军并不多见，日寇并不发给伪军以武器；日寇对汉奸，以其为中国人并不那样推心置腹的。在江南游击战开展、日寇势力削弱的条件下，特别几次汉奸伪军被我军干脆解决的教训下，一面日寇更不相信伪军，增强对伪军的压迫；一面全国战局转变的影响，终于打动伪军的心，造成其民族觉悟，这就是伪军反正运动的政治基础。我们试设想伪军的心理，本想托庇日寇，结果不能保险而又终日含羞忍垢，必然激起其反正的热忱来。因此，我们以为军事进攻配合政治的争取，是伪军的反正工作第一个经验。伪军生为中国人，不脱离乡土，绝不会与中国社会隔绝，因此有良好的民运工作，通过居民关系来争取伪军反正，是第二个重要的经验。伪军的官兵不愿受敌军压迫，但因做贼心虚，始终存着观望心理，一面怕国军不能容纳，一面又怕抗战会失败，因此军队愈有鲜明的抗战政治主张，光明的政治态度，愈获得人民的拥护，愈可以吸引伪军反正，这是第三个经验。江南所说两面派公开的或暗藏的与日寇通声气，特别与伪军正是同病相怜，莫逆于心，我们能运用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两面派，两面派之争取，正是争取伪军反正的桥梁，这是第四个经验。伪军工作在宣传鼓动方面应该是公开的，动员广大人民造成民众运动，但如何组织反正应该是绝对秘密的，事机不密，反陷起义者于死地，是民族的损失，这是第五个经验。伪军反正工作其作用在造成敌人营垒的瓦解崩溃，并不是着眼在扩充几多人枪，因此切忌各方面的抢夺，你来争，我也来争，于是脱离正确的对敌伪的统一立场，甚至走向用金钱收买的道路，于是使伪军待价而沽，甚至泄露秘密，这是汲危险的，结果不但不能瓦解敌伪，反使敌伪巩固起来，应避这种偏狭倾向，这是第六个经验。最后伪军工作既然是从政治上去瓦解敌人，不应贪图小利，因此凡有觉悟的伪军，应使其尽可能留在敌方，从伪军工作进行敌军工作，争取较大的反正，造成反正潮流，在适当时机配合国军进攻，以巷战迎接国军，聚歼日寇，只有在事机泄露不能再留下时才坚决反正，争取先机。这就是敌伪军工作的领导艺术，值得研究，这是第七个经验。

此外，因民族的隔离，言语的不同，自然使瓦解敌军工作难于伪军反正工作，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江南人中有根本否认敌军工作的原则的，目前我只限于喊话，而喊活上只限于几句简单口号，就是散传单尚缺乏良好技术，这是应该改进的方面，也是我们工作薄弱的一方面。

## 八、一年来的民运工作

一年来的民运工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我军初到，针对南京沦陷、国军西移后人民中间失望心理，进行了各方面的宣传鼓动。座谈会，军民联欢会，军民代表会，各县动员会，话剧宣传，街头讲演，是此时期的组织形式。宣传内容以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共对时局宣言，蒋委员长对时局谈话，作为基本原则。工作内容是调停内争，防匪自卫，破坏交通，侦查敌情，协助军队等。经过初步宣传动员及我军不断的战斗胜利，人民失望心理逐渐克服，抗战热情业已增高。此时期的工作进行到第二阶段（约在去年九月以后），宣传内容是保卫大武汉，坚持抗战，准备打破敌之下乡“扫荡”，武装民众，保卫秋收，动员参战工作，打破敌人“梅花桩”，揭破敌人反共欺骗等。组织形式是各界抗敌协会，各县抗敌总动员会，租息调解委员会，冬防队，国民抗敌自卫团队等。宣传和组织原则根据蒋委员长告沦陷区同胞书，蒋委员长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中共六中全会对时局宣言，江苏省府国民抗敌自卫队计划书，三战区整理游击区军政工作方案。具体工作在整理游击队，建立国民自卫队，慰劳军队，优待抗属，反对敌人修马路、抽田赋、抽壮丁，调解主佃、地农的纠纷，击杀汉奸头子，争取附从者反正，努力冬防剿匪工作。今年春间工作进到第三阶段，诸游击队已能单独作战，人民已开始自动捉汉奸，打日寇，普遍农村中已掀起抗日运动，自愿当兵的已加多，慰劳军队及抗属蔚成风气，反对敌探成为绅民日常工作，江南某某农村已逐渐走向抗战根据地的雏形。此时期的工作，集中在武装参战，争取敌伪军反正，肃清汉奸敌探，协助军队进行抗战，同时进行抗战第一阶段的总结和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教育，蒋委员长南岳会议训词和国民公约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教材。政治重于军事，宣传重于作战，游击重于正规，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这几个准则，在民众中进行了基本的解释，这是今年春间到夏初的具体的民运工作。

我们的民运工作基本方针是从初步的宣传鼓动进到各阶层的组织，直至武装游击配合军队作战的最高阶段。我们的工作方式，第一是合法，第二是合作。合法与合作这两大原则是项副军长屡次的提示，也是我们在实际民运工作中所体会得到的。要合法必须首先研究体会政府的法令，恰如中共党员应首先了解党的基本政策一样。要合法必须反对滥用“不合法”这顶大帽子。“我把持地方是合法的，我抽收捐税是合法的，我枪杀人民是合法的，我打骂老百姓也是合法的，但你不合法，因为你不能尽如我个人之意志。”我敢断定这种滥用合法，实际是违背政府国策，反抗领袖指示，断送抗战生命的最不合法。另一面来讲合作。合作就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就是民族统一战线，名词上不必争执，基本是在于抗日斗争上的联系和互相帮助，特别在战局吃紧之际，能以实际表现，帮助友党友军的才算真心合作。如果把合作挂在口头上，仅作为一块招牌，而暗中进行反对友党友军的活动，这就不能算是合作，而是破坏合作。我们与许多友军互助捉拿逃亡，互相交换情报，战斗中互相闻讯驰援，甚至不等待命令。我们去岁与七十九军及现在与攻击兵团，都彼此曾有过这种亲密合作的事实。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合作。江南战场上洒遍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的鲜血，流在一块，谁也难用政党派别军队系统去辨别他，敌人的枪口对准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枪口也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合法、合作可作如是观，离开了总的民族利益去

解释，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总结起来，凡能真诚运用合法、合作两大原则的人，他的民运工作必然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反之不真诚依照合法、合作方式的人，必然在广大民众面前失败，这是民运的第一个经验教训。凡能以抗战利益为前提而主张调停内战减少磨擦的人，必然得到人民拥护，反之不顾民族利益而专事内部磨擦的人，必然遭受人民反对，这是第二个教训。凡一切标语口号一面能不违背合作原则，一面能遵依抗战建国纲领，则这种标语口号必然在原则上与南京敌寇的标语口号造成绝对对立；反之凡不把抗战放在第一位，超出合作、合法的范围的，想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他的标语口号必然与南京方面含混不清，这是最苦的但又是显著的真理，可作为第三个教训。一年来的民运工作从这三方面最富于教训，教训了我们，教训了人民，同时也应该教训一切从事抗战的党派、军队、机关以及各种团体。

最后在民运工作方面还要补充三点感想：第一个感想，在民运工作中江南人民中的某些激进分子，每每嫌新四军太软弱，太让步，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批评。他们的缺点在于不了解合作是对敌的主要办法。一种让步，一种期待，是为了巩固团结坚持抗战，这是必要的，不算是吃亏。我相信一个抗战革命家，应该坚持抗战原则，同时也应该顾及到事实和环境，我们不要作一个抗战的罗曼谛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勉为其难，不应该犯幼稚病和急暴病。第二个感想，我们深深感觉我国人民经辛亥、北伐以及目前抗战三个大革命，三十年来饱经患难，政治觉悟和经验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人民常常是最严正的审判官。因此民运工作不仅在于使各党派去引导人民这一方面，还有使各党派去受人民检验的这一方面。这种检验是最无情的。我们应懂得一切武断蒙蔽的宣传是动员不了民众的。第三个感想，我们不仅集中力量反对敌寇方面，我们还集中力量指出中国各方面的进步。我们尽量宣传政府方面各种进步，伟大的实施，我们尽量宣扬各友军在各个战线的战绩。江南某些绅士中以十六年[7]以前的观点，来怀疑政府及国民党，我们也尽了许多说服工作，指出政府国策的正确及国民党对于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我们丝毫不曾抹煞某一方面的成就，这是具体的事实，我们这种态度取得人民更多的同情。我们以为坚持合法、合作的原则，承认人民的判断力，顾及具体环境和事实，竭诚与友军合作，共同领导，共同负责。这是一年来民运成功的原因，也是最基本的教训。

## 九、一年来部队本身工作

本支队在茅山一年来的行动，就部队本身方面也积累了许多优、缺点和宝贵经验，写出来可成一本大书。现在约略指出几点：第一，我们抓紧了一面作战一面教育的方针，有半天的时间即进行会议和操课，得以经常保持部队的战斗力。第二，我们依据实战经验和实际民运工作为主要教材，使学习与实用联系，学习中得到实用的兴趣。第三，估计到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准低，努力向高级阶段方面提升。这个方针是对的，但做得不充分，尚未达到我们预定的要求，也就使我们的许多特长不能充分发挥，难免不造成工作许多弱点，如有逃兵及个别干部堕落和逃跑等。第四，我们努力于维持纪律、提高纪律。这方面有了最大的成就。我们认为一面人民常从军队的纪律来判别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军队纪律好，即可以动员人民参加战争，纪律不好，人民

就望望然去之；另一面认为在游区军队恰是政府的代表一样，他应该是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纪律就是最初见面礼。这个见面礼弄不好，以后的话就十分难说。最后，纪律之维持应有经常性和自觉性，纪律如是时紧时松，一样败毁军誉。纪律不依靠自觉，专依靠行政手段，必然养成瞒上欺下的恶习。纪律的真谛在于对人民遇事体贴入微。纪律的维持，在于动员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的帮助。我们部队纪律的优点在于政治纪律好，弱点在于军事纪律的不整。比如派勤务讲价钱，礼节不讲究，部队内不爱惜武器，部队嘈杂喧贴不肃静等。这由于误解活泼，误解自由平等的缘故，这还须要努力纠正。第五，就是我们的部队仅具备游击战的特长，能单独作战，独当一面，但一般战术水准仍然很低，必须根据操典和实战要求，从基本教育上用功夫。第六，我部队的补充困难，特别是人员方面，我们就地补充完全依照自愿原则，新的补充，恰与伤亡逃亡两两相消。外传新四军扩大到好多万，完全是谣言。这一批逃兵们，你要他归队，他就说“你们军队样样好，只是太苦，天天打仗，免不了伤亡”，这些逃兵的话是最真切的。我们如不能解决逃亡问题，这种伤亡与逃亡削弱部队，使部队难以扩充。另外就是优待抗属的工作没有做起来，这需要政治系统和民运工作的努力。

一年来部队工作经验丰富，后有专文再不详细论及，此处只就想到的讲几点。一年来我们部队战斗经验增多，民运经验加强，干部指挥能力也有进步，武器也调换了一部分，地形敌情也熟悉许多。这些方面比较去年六月东进之际也大不相同了。固然有一部分老的指战员在战斗中光荣殉国，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战斗力，但我们正努力从教育中间去得到补偿和解决。

## 十、总结——今后如何开展新的斗争

过去一年来的工作应放在开展第二年的抗战工作的中心上，过去的一年飞快的去了，成绩和弱点都是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我们问：

第一，今年六月以后敌人的政策如何？我根据江南当地的材料，可以明白指出敌寇在进行其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总的灭亡中国的阴谋下面，江南有他的特别花样，归纳起来就是：

（甲）组织“反共青年团”，挨门造册，发证明书，有证明书的在寇区可以通行自由。发行《青年周报》，利用中国古旧文章，进行制造汉奸、顺民，消灭民族意识。敌人怕这样不能如意的使青年上当，所以又提出不加入者以参加抗日论罪，最后手段就是捉杀、投牢、罚款。这样使一部分青年决心向国军方面跑，由城市到农村，自然也有一部分青年不得已而暂时屈服。这种“反共青年团”的阴谋，曾有人去问江南的一位大先生如何办？他回答：“这是日本人反共，不干我们的事。”这种回答太干脆，也太荒谬。如果真以为日寇仅仅是在反共，与灭亡中国无关，我看这有点像是南京的新鲜宣传。

（乙）敌寇在京沪线各城市进行反英示威，提出替中国收回租界，开大会、贴标语、发传单以及摄影等。台上人多，台下的人反转少些，台上的日本人较多，台下人中国还更少。我们不能说这与英国无关，这可以教训唐宁街的保守党政客们[8]。

（丙）最近南京敌寇大宣传“和平计划”，中心问题是强调反共、联汪、反蒋，无耻的说可以保存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这种盗用三民主义和侮辱国民党，离间国共合作，这是敌人新政策的中心。在这里我们应选择自己如何来

回答。

(丁)新的制造汉奸的办法。敌寇鉴于江南抗敌运动的开展,知道过去到处强迫组织维持会、傀儡政权那一套不能推销,敌寇又知道江南的每一个农村都是抗战的根据地,如何侵入农村,乃是其基本的要求。敌寇巧妙的变花样:1.用绑票式捉拿抗战绅士,强迫其写降表,断绝其与国军联系,使国军把他当成汉奸失节的分子绝其内向。2.利用社会上原始的封建性的迷信组织,来向农村扩充势力,如大刀会、青红帮、同善社、佛教会,表面上宣传与抗战无关,守消极,守中立,实际上给以“皇军”下乡不向他们会员烧杀的保证,这样轻易毁灭民族抗战的意识,迷惑国军的耳目,以灰色方法,掩蔽汉奸秘密活动而深入农村,把军民抗敌合作拆散,以达到日寇安定农村的目的。

(戊)主张“中日亲善联欢”。日寇宣传:“你们老百姓,不要帮忙皇军,也不要帮助新四军,你们安居乐业吧!让我与‘共产军’一拼。”

(己)日寇还进一步发表《告新四军战士书》,如“你们不要替蒋政权打天下,蒋政权将来会剿灭你们,你们不要把祖国卖给苏联,你们到皇军这边来。”这些无耻的挑拨离间的谰言,值得注意;这种将来剿共的论调,许多不明大体的分子,也用同一口吻宣传过。我们应用巩固民族团结,巩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对日寇作响亮干脆的回答。

(庚)日寇有组织的使用土匪,利用土匪作为捣乱抗日根据地的前驱,这在丹阳、镇江地区屡屡发现。这里需要正确的争取土匪的政策。

(辛)日寇最后一个新的欺骗,即是宣传捉住国军人员,可以不杀,只要他作苦工,加入苦役队。

根据上面几点,证明敌人新阶段中,对江南的阴谋正在具体化,正在精巧灵活的使用,我们要不断收集新材料,注意强盗们的每一心弦跳动,随时给他以有力的打击。不消说日寇这些办法,是根据他的总路线建立“东亚新秩序”来的,但就在日寇决定其新政策时,自己已发出哀呼,呈露其恐慌。我们可以引用几段:

(一)近卫[9]在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的播音上最后结论说:“……没有以汉口、广东之攻略为一转机,怀抱太平时代即到来之思想者,则如此乃不理解此次事变之重大意义,天下未有比此重大之危险也,当负起建设新东亚之日本,于其国民生活之全分野已进入新的创造之时代,由此意义,真正之战争已由今开始……”

(二)平沼[10]于昭和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议会演说也公开承认着“……时局之前途,固为多难,不难推察……”他最着急的是:“……又一对当面对战争破坏而休业失业之工商业应迅速措施,农村渔场之维持振兴,以及如何安定国民生活,决排除万难,以求实现……!”

这是敌酋自己承认敌国在中国抗战面前的焦急,在江南前线我们也看见日兵逃亡现象。有一次,有五个日兵下乡投诚被居民击散,仅获带路的伪军一人。日兵自杀和醉酒痛哭的事件更多。无论敌寇如何施行其新政策,绝难挽救其颓势,这是可断言的。对这一点作为我们加速转变工作改善工作,加强团结准备反攻的力量基础则可,著作为速胜的基础,用来动摇团结御侮的政策,则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再问:

第二,在江南战线上,我们有什么新的进展呢?从四月以来,全国试行攻击计划,无疑义收着伟大的效果。在江南战线上,攻击兵团的行动,也给

全国以配合，尤其对苦战中的我们，是一个大大的增援。三个月来，江南战局正在猛力开展，几次攻击计划，在数百里战线上开展血战，几度攻击城市进行了巷战，几十次野战军给予敌人外出部队以沉重的打击，压迫敌人重新退守堡垒，使南京、镇江敌人不能不急调援兵。而攻击兵团诸部队，也显出他本身正规军的作风。他们正建立政治工作，他们正整顿保甲制度，他们正发动地方的抗战文化运动，如办报纸、书店、学校等。他们更正在严格的反对地方某些贪污堕落压迫民众等恶现象，某些地方政府不称职的人员已撤换，正在改进。亲自看见他们部队中的生活，也是极为艰苦。我所见的几个营部连部，都是饭食简单，与士卒一样的甘苦。他们部队中的抗战情绪很高。我们共同抗战，互相帮助，在事实上亲密合作。攻击兵团给予我们的指导，也按着正确的游戏原则，同时对我们的战斗方面，他们还屡次有奖励和鼓舞，我们也深刻检查过自己的工作。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和配合，虽然做到了某些方面，但仍然未能达到抗战的客观需要，正待我们努力。这些都说明江南战线上一般的正在进步和加强，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新生的前进现象。我们再问：

第三，今后江南战线，应作如何布置呢？根据上面指出的日寇的新政策，根据上面所指出的一年来我们中国在各方面进步，固然我们不能过分估计日寇的削弱和困难，但我们很清楚指出整个国际形势及中日战局已转向有利于我们中国方面，我们应加紧全国努力来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在江南战线上：

（甲）充分估计着敌人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大规模的“扫荡”京沪线两侧，整个江南战线，应为了打破敌人的大“扫荡”而努力，这是新的斗争任务，不容忽视，不容松懈。

（乙）诸主力兵团，力求战略上的配合，江南北的配合，京镇间与淞沪、苏常间的配合，主力兵团与地方武装的配合，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配合，求得整个战线盛水不漏，无间可乘，将敌人大举“扫荡”变成我们对敌的反“扫荡”。

（丙）地方行政系统及民运工作系统、民众各级团体，应有充分政治动员，一切为了扶助国军，一切服从战争，军事胜利第一。工作内容集中在参战工作、游击工作、敌伪反正工作、地方自卫生产文化四大部门，以及各方面协作的动员会议，来统一行动，统一意志。

（丁）本军站在茅山地区江南战线前卫之一角上，应努力担负起自己的神圣光荣的任务：面对敌人任何大规模的进攻，必须钢打铁铸似地坚持原地；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更大集团使用兵力；部队中进行充分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战斗的决心，使自己在战斗中向正规建军的伟大前途迈进，肃清游击主义残余，克服逃跑现象的弱点。

（戊）巩固内部团结，厉行合法、合作的原则，一致对付强敌。这是开展战局的枢纽，一切误会应该解释，一切磨擦应该减少，一切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应该放弃，一切过去旧时代的成见应该在新的斗争面前销毁，把整个江南的党政军民团结得好像一个人一样，在全国统一指挥的领导之下行动起来，必然可获得伟大的胜利。在江南行动的新四军，要争取自己起积极的斗争作用。

我在此引用明贤戚继光的话[11]作为政治的结语：“诸君以今日共坐之据是何处那？此非三间房子，乃是一只船，且漏风又当风波之中，若睡的自睡，坐的自坐，仇人反目，各不同心，将船被风浪飘冲打碎，彼时无分贤愚，

无分恩仇，都是溺死。遭此之际，便是异心仇人，既在一船，说不得平日不相识，说不得平日仇怨，推此共患共难之心，掌舵的掌舵，掌缭的掌缭，同心同力，将此船撑过江海。……今要求漏船过得风浪，却人人不齐心，不共拼一个死力，那个人免得去！”

#### 注释

[1] 游战，即游击战。

[2] 粟司令的先遣队，指一九三八年四月在皖南岩寺组建的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该支队组建后迅速开赴江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同年夏，任务圆满完成，该支队即撤销。

[3] 卫岗，实地叫“韦岗”。

[4] 抗日旗帜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作者以后将这两句改为“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一九七七年张茜将这诗收入《陈毅诗词选集》重新发表。

[5] 叶、项军长，即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军长”即政治委员，但当时新四军没有用“政治委员”这个名称；军以下各级政委，均为副职，直到皖南事变后才改正过来。

[6] 黄台之瓜，不堪再摘：传说武则天为篡夺唐朝李氏天下，在高宗死后。对李氏后裔一一剪除。太子李贤满怀忧愤，作《黄台瓜词》，其中有“三摘尤尚可，四摘抱蔓归”之句。此处作者比喻江南地方武装不能一概收编之意。

[7] 十六年，指民国十六年，即公元一九二七年。

[8] 唐宁街的保守党政客们，其时，保守党在英国当政，其首相府在伦敦唐宁街十号。

[9] 近卫，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

[10] 平沼，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近卫内阁于一九三九年四月总辞职后，平沼奉命组织新内阁。

[11] 戚继光的话，此活引自戚继光《练兵实记》杂集卷四，系戚继光登坛口授，由其西路副总兵官李超、东路副总兵官胡守仁同辑。

## 论游击战争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

### (一)

同志们，现在来谈游击战争问题，我只想从历史的叙述帮助同志们能进一步了解抗日游击运动，以便加强其领导。因此，不是一般来谈游击战争。为尔后说明方便起见，我首先把几个军事用语作一番解释。

游击运动，是指从开始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直至巨大发展的斗争过程，包括广大人民的参加，包括斗争涉及到军事政治诸方面而言。

游击战争，是指一种革命和反抗的武装斗争方式，特别是农村中广大群众在反抗暴虐压迫时所通常采用的方式，可称之为农村斗争的最高方式。

游击战术，则仅仅规定关于军事斗争的部分，关于斗争的动作部分。

游击动作，则更是单个的来说明如何使用武器而着重于技术方面。

游击根据地，应该包括若干游击基点，实际是会集若干游击基点始能成为游击根据地。所谓根据地，是指该地敌人难于侵犯，已经大部或者全部结束了流动性，处于比较稳固的局面，已经成为一个后方地区。

游击基点，仅是一种依托，作为游击队进攻时之跳板。

游击区域，是指该地敌我势力并存，你来我往，常不相下，完全处在敌我争夺的局面，而且常常是敌人力量大而我们力量小。假如我们力量大敌人力量小，则已经可成为收复区域或者根据地，那就不成其为游击区了！

同志们，我为什么用迂儒式的讲解来打搅你们，麻烦你们，实在因为许多刊物上关于游击战争的解释误会太多。在我们使用名词时不能不审慎，因为一个名词代表一个确定的概念，这是我们做学问讲战术的人首先应该遵照的条件。

### (二)

承认上面解释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来说明：第一，游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谓游击是“来路货”[1]的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在远古时代已为被压迫群众所发明、所创造，更是屡屡采用。我们设想，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广大农民受着剥削压迫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只有铤而走险，以自己劣势武器集合成为无组织的军队，所谓乌合之众来与压迫者搏斗，这种战争要避免敌人的聚歼，必然采用流动滋扰的各种办法，而且逐渐使自己进步，走入正规。这说明游击运动一般产生于农业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人民有了更好的反抗武器，如罢课、罢市、罢工、武装暴动之类，一般也用不着游击战争，也难以掀起游击运动。明白这一点，则知道游击战争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才能产生，其作用也受着限制，这可以纠正许多人中间那种游击万能以及诅咒游击的观点。第二，既然游击战争，其战术，其动作，其技能，其政治性质等，都受着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制，则领导游击战争的人，他就要善于运用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自己能抓住的各种条件来组织游击进行斗争。凡在农村的斗争环境，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愈大，则愈容易进行游击战争以至提高到游击运动。因此，游击运动常常是由极简单粗疏而日益走向最高的发展阶段，

---

这是陈毅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原文刊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抗敌》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凡不积极去发展和扩大的，凡不积极去纠正自己的弱点、从斗争中补救自己的弱点的，必然走向失败。游击战争要求不断发展，要求走向主力，凡停顿、保守的等于自杀。第三，游击战争是军事问题，同时也更是政治问题。因为游击战争是依靠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离开了政治领导和动员，决然不能发动和扩大游击战争。所谓命令游击、强迫游击是决然不可能的事，煽动游击是可能的，但一定在群众愿意条件之下，他们能决然武装走向战场，没有这一政治基础，任何巧妙手腕都是无用的。第四，中国辛亥革命以前由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诸先烈也常常采用游击手段对付清皇朝，当时统治者以“乱党”、“匪党”的名目加诸同盟会身上。这一段回忆谅必是仍存在我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当时的统治者大骂“乱党捣乱，只知破坏，不知建设”，造谣中伤说“同盟会的领袖是外国人生的，是要把中国奉送给外国人”，这一类滥调不仅说后十年已为我们所熟闻，现在在抗战中的江南，南京、上海的日寇发言人也以“游匪”、“共匪”、“游击队就是土匪”、“蒋、共投降苏俄”等称号加诸我们及一切抗日军队的头上。实际游击战争规律是在对统治者进行反抗滋扰，必然使用可以削弱对方的一切手段。这种行为，因有政治目的和政治纪律，当然与土匪行为决然不同，但统治者常抹杀此点而进行造谣中伤。另一面更有趣的我军捉的日本俘虏，也公然义愤似地抗议说：“中日交战要堂堂正正，不应该用这种无耻的游击偷窃办法”。再有就是当去年广州陷落之际，日寇华南总司令某也致电蒋委员长，要求两军会战。他责备中国军队在不利情况下的战略的自主退却。这又说明统治者与游击者的斗争方式根本对立的倾向……。总之凡统治者和两军的强方，他们总想把弱者或对方聚而歼之，总喜欢用硬战强攻，总讨厌这种游击的办法，所以轻蔑他、诅咒他，加以“匪、匪、匪”等恶名。但是被压迫的人，力量较弱的人，总是舍不得这个避实击虚的游击办法：一面可以保存自己，一面可以逐渐来增强自己。这已经是说出了全部的秘密。历史本是前进的，本不会兜圈子的，但是五十年来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中，恰恰有类似的重复事件，从统御术与革命术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找得出许多滥调的无数次的重复，虽然他们内容和实质不能尽同，这应该是最开心的事体。第五，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一年在桂林，对滇粤桂军讲演勇战术，一般已指出游击的特点，他更主张革命军的补充与接济应该取诸前方，不应专靠后方，这点更是远见卓识，令人崇敬。孙先生这一段指示，特已印发，大家可以细看。我们回想本军的历史，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全部都经过游击战争的阶段，所以我们具备了游击的专长。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所获得的结论实与孙先生的指示暗合。我们不应该抱残守缺，我们应该继续不断来发扬自己的特长，创造更新的东西。

### (三)

中国的游击运动以近十年来最为丰富，尤以现在的抗日游击运动，如果发展下去更是集今古中外之伟观。现在有把内战游击运动与外战游击运动看成一个东西的人，比如同志中那种观点“我是者游击，现在游击不算什么，自有办法”。也有把两个东西看成毫无关联的人，譬如某些人士说“现在才是真游击，以前是土匪，不是游击”，不消说都是错误的。照我的意见，我先从我军在历史上所遭遇游击时代说起。我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井冈时期为中心，运动的特点是处于暴动的初期，其环境是零星的不联系的游击地区，游击方面力量弱小，进攻方面自然也说不到大动兵马，这是在空隙中生长起来，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

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显然当时的游击运动没有遇着像以后那样的大的遮拦，比较可以作自由的发展，所以进退集散能够灵活布置便可臻上乘了。此时期最容易发生盲动主义。但是游击运动发展到第二时期，强大的进攻军摆在面前，宽广的根据地的正面需要防守，于是提出建立主力的问题。显然，在江西苏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如果不集中各游击队建立主力兵团，决然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游击运动发展到主力时期，游击战争就退居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一切服从主力”、“配合主力作战”，这是最可代表其精神的两大标语。这种时候其战术的战斗的诸方式采用远殖队、挺进队、破坏队诸办法，从以不脱离主力的指挥，求得与主力的战役及会战的配合为中心。这种场合容易发生一切依靠主力以及对游击战争的取消主义。这种教训想来大家还记得吧！第三个时期，到了江西突围留在南方各省边区的游击部队，这个时候游击运动采取了新的形式，斗争环境是空前的艰苦，而没有顺利发展的革命形势，只有一个坚持阵地保持骨干力量的任务。进攻者与我们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同时又当着—个大的根据地放弃之后，由大的斗争转到小的斗争，由大的进攻转到小的退守。革命往前发展指导运动是比较容易的，但在革命挫折之际以及转变关头，要保持力量收容部队，则是十分困难的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这方面的艰苦远超过于以前两个时期，因此其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战术上的创获更超出前两个时期。扼要的总结说来，他善于在大的失败之后保存自己，善于由大的进攻战局转变成退守战术；他善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局部反攻来掩护退却，收容自己；他更善于团结群众，以群众的掩护作为自己保存和发展的基础；他善于把一切群众斗争的方式如秘密的、公开的、半公开的、亭子间的[2]、搭棚子的[3]与游击战术和动作综合—起来灵活使用，所以能在大的“清剿”和严重进攻的局面下坚持到底。这里就做出实例，不仅崇山峻岭可以发展游击，就是平原地、丘陵地、沿海地带—样可以进行游击。游击战争应依靠群众作基础，游击战术应更多带群众性质，这个真理便全部被发现了！在中国社会的环境内，如游击战争有了人民的基础，赋予坚强的政治领导，他之不可消灭性，也从事实上证明了！然而此时期最容易在转变关头发生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同时在尔后坚持中，由游击主义蜕化为土匪主义。第四个时期，就是当前的抗日游击运动，卢沟桥的炮声征调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走上战场。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决斗，犬牙相错的战争局面，梅花形的相持阵容，敌“扫荡”我反“扫荡”，敌包围我反包围，敌大踏步前进与我大踏步后退，敌由疯狂进攻逐渐趋于坚强防守以及最后的引退，我由国境的大规模退兵，逐渐转为艰苦相持以及最后的反攻驱逐敌人到国境以外，这样战争的伟观，必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切战争的方式，从现代的机械化兵团的战法，到原始的人民的野蛮的战法都可以，而且已经搬演于中日战场上，游击运动以及游击战争的办法，便担任着攻击敌后方的重大任务。就全国范围说，他是担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就他本身所在地区说，他又是独立坚持作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就其力量的来源，完全依靠抗日的民众为祖国战争的情绪；就其动员的深广和地区广阔包括了—切中国人的各阶层，战线在万里以外，远非内战时期能够比拟。另外，敌人是现代强大的帝国主义武装，而我们仍然从农村的粗劣武器使用起。战术的特点，在军事上是抓住敌人弱点避免敌人的长处，发扬

自己的长处和补足自己的弱点，凡机械的以现代战争的条文来对付日寇的，决然要遭受失败。在政治上更是使游击运动担负着恢复政权、保护政权、组织民众、训导民众的艰巨任务。因此，单纯的军事家绝然不能胜任于抗日的游击战争，就是我们在内战中的经验，也就不够应付这全面的新的斗争局面。这新的斗争任务提出了如何去创造新的斗争办法，老游击解决不了新问题，他的悲哀正在这个地方。在此种时候，因为在主力受挫之后，容易过分扩大游击战争的作用；同时又因为四处分散，无坚强领导，容易产生土匪主义及消极保守的行为！

同志们，我这一大段话有什么意思？我是说战争的规律是变动的，历史的规律是发展的。我把十年来的游击运动分成四个时期，就是要我们能把握着变动的规律、发展的规律来作比较研究，我们才能知道有所去取，才能知道发扬光大，才能指导运动，了解其过去，把握其现在，适应其将来。本军的干部在两年来抗战中多所成就，但也有所损失，关节恐怕在这个地方，离开这一基点是难以说明的！

#### (四)

现在再费一点时间来说在江南的抗日游击运动，作为对上文更进一步的说明。江南的敌寇推誉本军说“共产军的战术为十年来百战磨练的战术”。这种说法是含着痛苦、受过教训而说出来的。我又研究一个日军文件，他归纳中国游击战术为下列课程：

- 甲、旋磨战术，指善于回旋，打圈子往来自如而言。
- 乙、隐伏战术，指善于暴露目标，消灭目标而言。
- 丙、穿插战术，指善于在据点内远去挺进通过封锁线而言。
- 丁、偷袭战术，指善于偷营劫寨突然袭击而言。
- 戊、破坏战术，指破坏交通桥梁诸事项。

日寇归纳上面五种战术又提出了他的对策如下：

用、以遮拦战术对付我之旋磨战术。就是着重加强封锁，补填空隙，以棋盘格式紧缩游区，压迫我军远行高飞。

乙、以“清乡”政策对付我之隐伏战术。就是着重在遮断人民与军队的联合，造成我军的孤立。日寇在这方面以威吓利诱加紧欺骗着手，是以政治手段达到其军事“扫荡”的目的。

丙、以封锁战术阻止我之穿插战术。日寇利用我国内战经验，在铁道、公路上加强点线的守备，缩短点线上的据点间的距离，以强力的巡查队日夜定期巡查和不断的预期埋伏，阻止我军的灵活转移。封锁战术与遮拦战术之不同，即前者是缩短点线上的距离，后者是填补交通网内的空隙。

丁、以堡垒战术应付我之偷袭战术。着重加强守备，加强据点的防御，采取炮楼碉堡政策，更使防守趋于地下层，“把战争装在柜千里”，趋于避免火攻并配置毒气。

戊、以平毁政策对付我之破坏战术。敌寇对付我军之破坏战术已感困难，尤其对付人民之破坏战术是更加困难，因为沿交通线居民家门前的破坏真是防不胜防，日寇只能以烧屋、杀人、决堤作为对策，日寇在战而难胜的情势下，专向和平居民泄愤，这本是日寇的专长，我军非有充分的人民工作不能打破其万恶的企图！

上面所罗列的已可一般说明敌我之江南战术之变换和争夺，此地更可指出下列诸点：第一，日寇苦心孤诣所计划的下乡“扫荡”均告无效，不能驱

逐我军，同时据点封锁政策依旧留我军以活动余地。可以指出敌寇今后一方面要更着重坚强防守，求得攻不能破；一面必然集中更大兵力进行集团“扫荡”，一般小部队下乡“扫荡”必然会减少。这可以说明江南战场必然趋于战斗次数减少，战斗范围扩大的前途，这不是战事的沉寂而正是战争的发展。第二，我们中国军队及游击部队一定要使自己有远见地适应这种发展的情况。我们过去在句容城、在新丰站、在太平山、在延陵、在四摆渡、在魏村、在仓头、在白兔等地，固然予日寇据点以彻底摧毁，扫除其梅花桩的政策，我们过去在珥陵、在东湾、在武进丹阳之交、在句容北方、在上下会战斗，打破了日寇之下乡的分进合击，这些战绩使日寇日益改变其战略战术，我们就应该同样的改进自己吧！要能够攻破更坚固的据点，必然学习更高的攻击技术；要能够打破敌之大举“扫荡”，必须学会更高的运动战术；要能继续破坏，必须更深入动员民众，有自己的高超的工兵队；同时化学防御也不能不讲究。这中间对于干部的指挥艺术必须提高。过去是小部队行军、宿营与作战，现在应研究集团使用部队才行了；过去仅仅以口令指挥就可以抓住全部，现在提出组织战斗的问题，没有良好的参谋工作，没有良好通信交通侦查工作，没有良好而有力的政治工作，决计不能开展战局。第三，抗日就是打日本，就是讲打、讲拼，打得过、拼得过才有胜利的可能！因此指战员要求有臂力、有强壮的体魄，能够肉搏，能够纠缠，拳打脚踢，能够使用长枪大戟来压倒武士道[4]，同时又要讲究智谋，讲究战术，讲究指挥，一个人勇敢不如领导大家一齐勇敢。俄国早期有一个革命家说：“提高群众一寸比自己一个人上高楼要强”。这是政治的名言，用在军事斗争上一点也不错啊！我们的干部不少是“猛张飞”，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这是再不应容忍的现象。在部队的编制上，要力求切实精练，反对头重脚轻，反对非战斗员多于战斗员的现象！能战者留队，不能战者送其归家。许多文人学士应该要他们学习拿武器，真正来参加有血有肉的战争。第四，居民起义，敌军内变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敌人进行的是反革命战争，他没有使用这种斗争武器的政治基础。我们进行的是革命战争，合乎正义，合乎人道，为了和平，为了自由，所以我们具备了使用这种瓦解敌军的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有人怀疑能够把敌人力量掉转过去对付敌人，我们应该决然相信，这是能够的；我们可以做出许多实例来看。第五，旧的战术只估计军力而忽视民力，新的战术不仅使用军力而且善于把民力加在军力上面以打倒敌人。敌人处在江南的人山人海，他屡屡企图吸收我们的人民到他们方面，我们不仅防止其阴谋的实现，而且应该从积极方面调动民力参加作战来回答他。第六，日寇在江南已构成坚固的战略后方，我们应该在京沪路两侧造成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来同他对立。一年来我们在江南所建立的若干游击基点，目前已逐渐形成根据地的雏形。我以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应包括下面四大条件：（一）强有力的武装部队。（二）强有力的指挥战斗。（三）比较广泛的人民组织，人民中有相当的斗争经验。（四）能便于利用相当的地势（不一定是崇山峻岭，就是茂林修竹和湖泊河湾亦可以）。现在的江南尚没有完全具备上面的条件，我们仍须极大努力，这不仅是本军的任务，也是参加江南抗日的所有党政军民的任务，我们大家应该努力来担负这个任务，本军的同志应该随时记清自己在这个任务下应如何努力啊！

#### （五）

最后，我还要就战略来说几句。游击兵团的战略，凡处于进攻、经常保

持进攻状态、经常保持主动的靡不胜，反过来说，凡专力防守、处处陷于被动的靡不败。因为，大兵团的战略，因敌我条件及我本身主、客观条件，常有决定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守退却的可能。这是变换多端的。但在游击运动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处于敌人侧近，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之下，它只有以灵活的进攻才能支配敌人保持自己。因此，也可以肯定说，游击兵团无所谓战略防御的问题。游击兵团的进攻常常是多股的分散的进攻。要经常保持主动进攻的局面，这就提出进攻的指挥问题。从这一方面可以说，指挥游击队的进攻，比指挥大兵团有他的特殊的困难的一面。因此游击队的进攻，依靠于游击指挥部多给下级部队以独立活动的可能，而下级部队首长应该具备独立作战的特长。各部队就自己单位积极行动，并力向前，便可以造成齐头并进的游击战略的进攻配合。凡是等待上级命令、等待友邻配合、自己消极的人，必然陷于防守、遭受敌人进攻的危险。大胆派遣部队，大胆鼓励所分散部队坚决动作，仔细注意部队的补给，适当计划部队的轮流休整，经常以全局敌情和各部行动结果通报分散之部队，这都是游击兵团战略指导的基本事项。指挥大兵团作战，要常以敌情、任务、友军诸事项具体指示下级，而下级则根据首长决心来定出执行的动作方针，从战斗开始到战斗终结，都是依命令行事而且了如指掌。游击兵团之作战则难以这样做，上级只能给予下级一般指示，指定其在某一个地区担任某一方向的任务，训令指示是最好方式，命令则要审慎，不必要的要避免。下级得到上级训令后，一切依靠自己的独断专行，自己应该去找仗打，找敌人弱点，“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只靠上级指示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以今天当面的敌情、地形和本身状况来决定行动，来决定打法。这些问题处理得适当，是游击战斗胜利的决定因素。常常上级认为必需要打，而下级在其本身不可能的情况则其突击计划必需放弃；常常上级并未提出突击计划或给以任务，而下级在其当面恰有可乘之机，则应该独断专行坚决去干；常常在全局需要突击而下级并未感觉到的，常常又有下级认为可以打而上级又认为是多事的，这中间是存在着许多不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一面要求下级指挥员都能着眼全局，同时要求上级指挥员也应顾及到局部情形，才能正确解决。游击战争既然是以避免决战为原则之一，因此对于应付事机应有伸缩余地的可能。我们在江南一年来的战斗，对以上诸方面的做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我们的优点是埋头作战，艰苦与敌人纠缠。但一般说来，尚缺乏照顾全局，尚缺乏战略眼光，尚缺乏战术素养。同志们，我们要以英勇战斗的卓绝精神。提高自己的战略战术的认识，我们决然可以战胜日本强盗！

#### 注释

[1]来路货，指从国外（海外）进口的商品，即“舶来品”。

[2]亭子间的，上海及其附近城市的旧式楼房后部楼梯转弯处一侧的小房间叫亭子间。中共地下工作者常租用这种房间作为联络点开展秘密工作，逐渐形成一种斗争方式。

[3]搭棚子的，游击队在敌军残酷的“清剿”中没有房子可住，便砍伐竹木茅草在山林中搭棚子作为临时集合点或联络站，以坚持开展游击战争。这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是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4]武士道，日本从镰仓幕府时代开始倡导“武士道精神”，要求武士遵守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封建道德，以为其反动统治服务。此处是指日军所崇尚的“武士道精神”。

## 关于贯彻“五四指示”，发展苏南的布置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我们收到中央“五四指示”，召集团、县以上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场振奋，指出过去由于国党的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自己，现在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立即对苏南工作做如下布置：

一、乘京沪线上一分空隙积极发展，如江阴、无锡、苏州、常熟直到浦东、青浦、吴江、松江等地。已派一个团的兵力东进归谭震林指挥。在苏、常、昆、太[1]、青浦地区，在两月内肃清该地顽固武装并发展至四个团。

二、派两个营兵力及干部数十人，进占江阴、武进、无锡、太湖北，并在两月内发展成两个团。

三、发展平原，积极在冷欣[2]直辖地区打入工作。原来我们已占领了两个报馆，宜兴、溧阳两县党部及一部地主武装，现应付统战态度，注意秘密工作。

四、原一、二支队京、镇、丹阳、金坛、句容一带，努力扩大充实二、六、四三个团，使之变为主力团。

五、广德、郎溪、长兴、吴兴、绩溪等均早有基础，目前以妥善方式加紧深入和开辟开作。

六、于我处派往苏北的管、叶、张、梁四部[3]，每部千余人，留存苏南者六千余人，不断发展达到一万三千人，保证在本年底总数扩充至七万人。

七、立即成立江南财经筹委，全局计划苏南财富，充分解决战费。

八、发动全党全军作群众工作，建设政权，培植新的地方武装的创造热情。

九、在思想上，要纠正业已毫不适用的委曲求全、期待国党进步以走到合作的陈旧观念；必须经过党内思想斗争，打击尾巴主义。

十、纠正过去统一战线中的错误及实行的精兵主义（所谓“以质量代替数量”）。目前应大量扩充数量，同时不放松加强政治领导，提高战斗力（即质量）。

十一、目前困难，在全部兵力调第一线打网式散开发展（非如此不能陆续膨胀），手边却无兵力，我们指挥部在溧阳县仅直属队千余，对于局部事变不能应付；若调集两团以上兵力在手中，则第一线又不能散开大量争取。因此，我们一面缩小后方，加强苏南游击战争，一面以游击方式应付顽方。目前，在战略上亦不宜轻易北撤让出溧阳北部致失掉联络。请中央即电项英东移，宜饬大行李及重要资材东进，不要再迟缓，要根本放弃挺进皖东南的下策。

十二、对基本自卫原则[4]，我们这样了解：在国弱我强地区，可以不先开枪；在国我平衡地区，则自卫必须是带进攻性质，特别战略要地及财富中心，必须先行夺取，以武力开辟道路；在我弱国强地区，一切应先发制人。事实上一般有把握的局部进攻，是不会影响大局的。国党是承认事实而不讲道理的。对于国党，事实就是道理。反磨擦的胜利等于自卫原则；自卫决不

---

这是陈毅在苏南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即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布置苏南发展工作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其时，陈毅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兼政委。标题为编者所拟，并对部分文字作了订正。

是削弱，也不是逃脱挨打。我们已开始向京沪路两侧二十九县地区（溧阳、溧水、高淳、宜兴除外）发展，估计国党在一月后要增兵来强夺，我们决然击破之。

十三、由于某些干部缺乏独立负责能力，在过去发生六台、天长的民变，江宁、句容大刀会的暴动，不仅由于敌伪汪顽进攻，而且由于我们第一线部队本身领导薄弱，乱打汉奸，侵犯中层以下利益的结果，现在分析纠正中。

为要执行上述任务，各部队业于十四日出动。

注释

[1]苏、常、昆、太，指苏州、常州、昆山、太仓。

[2]冷欣，当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苏南是其辖区。

[3]管、叶、张、梁四部，指已合编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纵队的管文蔚部（丹阳挺进纵队）、叶飞为团长的老六团（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以及张道庸（陶勇）为支队长的新四军苏皖支队和以梁灵光为支队长的南通地区抗战支队。

[4]自卫原则，中央书记处五月二十六日复陈毅电指出：“武装斗争的自卫原则，并不是要限制自己的发展，而是要放手发展，在放手发展中，如遇顽固派阻碍及进攻，则我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 郭村战斗简况及部队动向 (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

一、苏北叶管部[1]击破两李[2]，战斗八天，共歼灭三个整团，其余十团均被击退，两李已无进攻能力。二、共缴获步枪六百余支，轻重机枪十余挺，手枪三十四，手榴弹七百八十三，步弹三万发，俘虏七百余，内团长两名。两李部下反正者计千余，现编为五、八两团。三、省韩[3]积极争取两李，并以弹药、经费助其向我进攻。两李残部尚有九千余人，已派代表来此谈判合作。我们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八个字争取其共同推进抗战，镇压反共势力。目前，双方已停战，正商量条件中。四、两李可帮助我东进，但要我撤回反正部队，我应在尔后发展中以出赠形式予以补充力量。两李应整顿内部，肃清反共活动，彼此建立友好合作。改造苏北两李问题，尚须一时期后可以争取其中立，但必须给他一些甜头。五、敌寇对我之苏北攻势十分注意。省韩、两李经过反共派拉拢，则正力求苏北反共大团结。苏北人民及友军中同情者，正积极希望我之发展，加以组织，可望再有兵暴民暴的配合。六、此次战斗证明，历来对两李上层争取，积极组织其中、下层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将大桥南北巩固，以便向天长、扬中、仪征地区发展，打通西路，转而东进的路线亦是对的。在八天战斗中，两李以强大兵力企图歼灭我军，管叶部以攻势防御，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亦得到大的成功。目前，江南一支队已渡江会合，江南指挥部已陆续渡江，造成我军争取苏北发展的良好环境。七、建议五支队东进部队召集胡田大队[4]应迅速经天长、仪征开往泰州附近郭村，与我们会合，估计七日内可达，以便作第二次发展计划。目前管叶部正集结整训。另外，八路军南进支队[5]及张爱萍部[6]应以游击形式，向淮安、淮阴以东发展，牵制韩部。八、五支队东进部队要求归此间统一指挥。九、对苏北党政军民整个工作布置及组织领导关系均请指示，以便赶上局势及新发展。

十、现塘头(泰州西)、界沟以西，樊川、小纪、丁沟(均在兴化以南)以南之顽军已全部肃清，均已全部入我掌握中。

注 释[1]叶管部，指以管文蔚为司令员、叶飞为副司令员、中共党委书记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纵队。[2]两李，指国民党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亦称“两李”。[3]省韩，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4]胡田大队，指以胡炳云为大队长、田文扬为政委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5]八路军南进支队，指以钟辉为司令员、韦国清为政委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6]张爱萍部，指以张爱萍为总队长兼政委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当时驻皖东北洪泽湖西岸地区。



## 东进任务和方针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

江北主力业已集结江都东北地区，共约八千人。

一、决定整顿一礼拜即向东挺进，在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建立根据地，以黄桥为中心。这一沦陷地区，无国党主力，仅仅有地方土匪游击部队及伪军，我们有地方党基础，可成为有理有利之发展。

二、我们不攻取泰州[1]，一俟两李中立，我们东进可与两李互相交换情报，两李亦知阻我发展于他不利，在东进发展削弱省韩之后，更可进一步中立两李。

三、东进黄桥，应先求得抗日战斗大小胜利，以发动人民，同时必不免再与韩、冷[2]起冲突。韩、冷与我们争持者，为江南、北交通线的贯通问题。东进黄桥，则韩之交通即切断，我之交通则血脉流通。

四、东进胜利有可能与省韩恶战，但又可能逼迫省韩向我妥协从而谈判江苏问题。因此，东进口号是：团结抗战，反韩打顽。

五、东进，决定任务为创造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扩大主力到五万而斗争。整个江苏行动方针是：江南取守势，江北取攻势；将来苏北问题解决，再移兵南渡。

注释：

[1]泰州，当时是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新四军部队在郭村及塘头连续击溃李明扬、李长江（简称“两李”）所部的进攻后，乘胜追击，兵临泰州城下，为了争取两李，陈毅下令不攻泰州。

[2]韩、冷，指在苏北的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在苏南的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

---

这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时，陈毅给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电报。其时，陈毅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

## 苏北统战工作的经验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我们与李明扬、李长江（苏鲁皖游击军总、副司令）合作，开始于去年管部最初过江之际[1]，深知其与蒋、顾（祝同）、韩（德勤）[2]个人利益冲突。在大革命时，顾、韩资格较两李[3]低，明扬为老同盟会，辛亥革命湖口之役，明扬首先发难，资格比蒋高。乃在二十年[4]，一下将江苏问题交顾、韩包办，两李对地位愤愤不平。抗战后，两李经李、白[5]扶助，又受顾、韩压迫，我们就利用这一矛盾下手。

二、陈于去年夏过江拜访两李[6]，办法：

（一）承认其为革命前辈。

（二）假朱、毛[7]名义写一问候信，并谓玉阶[8]与师广兄（明扬字）皆属同盟会反袁起义军伟人，措词恳切，两李颇感动。因此到处乱说：“我打坍了，到延安，玉阶会招待我。”

三、去冬，两李与省韩冲突激烈，我们即暗中支持，首先帮助子弹两万发。两李在江南有子弹十余万发无法过江，我们即代替安稳过江，统交一粒不少。

四、陈乘运子弹两次过江拜访，两李待以上宾之礼，召集部队讲话，以蒋、韩反共密件告我，自谓不反共，并商定时机助我东进，慰劳我军万元。再拟选送三百名干部到我处[9]受训。提议订一个合作协定，两李不愿见诸文字，即任之。但此次去，进行了扩大解释我党政策的工作。

五、但陈回江南后，管文蔚、叶飞[10]即利用两李关系进步的机会，大作两李部下的争取，用拜弟兄方式（当时只决定可在中、上军官中发展秘密的特别党员），事机不密，引起两李反感，同时罗炳辉又在湖西解决了盛子瑾[11]（两李部下），省韩即进行挑拨，甚至用武力。陈又于冬派代表过江致两李密函，承认解决盛子瑾不当，担保释放并还枪（以后拖延未施行），承认管、叶行为不对，但仅系共同合作，图谋东进，共谋发展，绝未违双方上层的约定，绝不是分化其部队，并劝告其勿受韩挑拨。并说蒋、顾、韩过去剿共时代是拿杂色部队作牺牲，抗战时期亦复如此，现在发动反共战争亦如此，不要中其传统政策的毒计。同时诚恳说出新四军衣食不饱，受反共派包围的困境，要求其帮助，大家有饭吃。结果两李有谅解，又申明不受省韩利用，我们才能调叶飞部西开增援[12]。

六、叶飞部由西路回来，根据延安电报内“积极发展，不顾韩德勤、李明扬反对”的一句话，断章取义，认为两李是顽固派，主张向两李开刀。并说邓[13]讲的，江南[14]对两李统战路线是机会主义。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因两李与省韩联合力量强大，我们吃不消，坚持苏北问题以中立两李为原则。郭村战斗，管、叶打坍了两李部队，又令陈、粟率队过江，大家认为，再打两李，泰州垂手可得。我们认为，这样做造成苏北反共大团结，八路、五支[15]增援不及，我们孤军应战必失败。同时，消灭两李正中韩奸计，且于全国影响不好（两李与桂系有关系）。因此即与言和，不攻泰州。我从旁边去向两李说，陈、粟司令大兵过江，不打泰州，是尊重友军及老前辈，但

---

这是陈毅在黄桥战役胜利后，以他和粟裕、钟期光的名义给中央的电报。中央在十一月十八日将此电报转发重庆、西安、琼崖及各部队。

应扶助新四军。并云，如两李答复让我们东进攻黄桥，我们即将江都三十里防地让他（月收五万元），因我们不能分兵把守。两李见我有合作诚意，省韩挑拨又无效。我们占领姜堰，距泰州六十里，与两李、税警团防地相接。他们感觉新四军日益发展，威胁甚大，要我们即让出姜堰。对韩则称让步，以求抗战和平；对人民则称让步以利团结；对两李则让姜堰，减少其威胁，换其守中立。我们又暗示两李，你此时可向韩敲一笔竹杠，两李照办，得了韩十万元。因我们不闹，两李亦会去做，我们说了，他知我们谅解，所以大家做，故于我无损失，又使两李到现在从事实上感觉新四军发展不仅于他无损，且能得利。我们亦说新四军固然发展，可是你们（两李）不费气力也得发展，证明只要不反共，我们始终会帮助他而长期合作。老蒋在西安事变，中共救他，现在忘恩负义来限制异党异军，逼得我无办法，不得不自卫。

税警团原为两淮盐警，连以上干部均为黄埔生，因此许多人又断定为顽固派。但我们调查出他们是外省人，与省韩冲突。因为顾、韩有不愿外省人在江苏立足的勾结，所以虽是黄埔生，亦受其压迫。税警团指挥官陈泰运为贵州人，与何应钦有旧交，陈如此倒霉，则证明其为失意之人。另一面税警团非正规军，班长士兵均有老婆，不喜战。因此，即反对党内“凡黄埔生均顽固派”的原则。各方找人去游说，写亲笔问候信，开始接近，以后省韩迫令其进攻[16]，被我打败了，并缴了一千多支枪，我们立即退一百支枪并送两挺轻机枪（因他们无一挺轻机枪），所以恢复友好，他们自愿不内战，而争取其中立。但另一面有一个立三路线时代的党员黄逸峰、第三党季方[17]，均苏北人，均同情我党。以重庆党政军视察员来苏北，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感情去开展统战工作，于中立两李、税警团均有帮助。十月四日至六日黄桥战斗，我们仅七千人，四千战斗兵抵抗韩德勤、李守维一万五千人，七千枪。两李及税警团的部队进至我们后十里至二十里，我们先期派人住在他们那里，同时他们也派人住在我们司令部，随时报告战况，时刻不放弃中立工作。省韩以十万元贿赂，也派人督促过他们，均无效。我们仍能以全力反攻，致李守维全军覆没（缴步枪四千余支、重机枪三十四挺、俘虏数千人，军长李守维死[18]，师长孙启仁、旅长苗瑞麟以下军官被俘数百）。当十月四、五两日战况紧急，一日数变，两李、税警团态度也一日数变，李明扬从四日下午到五日不见客，六号我已全胜才见客。

#### 七、统战经过总结：

（一）我们始终遵照中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

（二）我们首先击破了党内“凡国党、国军、黄埔生皆顽固派”的过左估计，同时纠正“战斗开始即统战终结”的观念。坚持政治前行，军事后盾的原则。对顽固派，应一面拉，一面打，先拉后打，先打后拉，均应活泼运用，反对一味蛮干或一味退让。

（三）予中间派以实利，实行分赃，不独吞，实行“大斗进小斗出”的地主原则。主张蚕食跃进，反对鲸吞冒进。

（四）充分调查对方情况，每一个集团他都有一个基本利益和中心要求，不要轻易去违犯他。

（五）充分利用问候、送礼、写信及许多私人关系。同时，知道统战对象的人事关系是很重要的。

（六）态度谦虚，措词和平，讲礼貌，打了仗还要做到拉，向他说服。

他们最讲面子，无论如何不伤他的面子。不能答应的事，不要马上拒绝，推下去，过后自然不提。

（七）上层联络应有下层配合，但不能盲动。两李部下两团反正，即是如此（现已停止对两李下层组织争取工作，但政治影响的扩大仍不放松）。

（八）如作战缴得武器立即退还一部分，向其讲和，每每得到成功，对于被顽固派欺蒙的部队最有效用。

（九）苏北对统战的缺点，在于我们部队不能普遍了解上述策略，许多自高自大、狭隘贪小利的观点仍然存在，仍须作深入教育。

（十）现在两李与税警团有联合组织中间集团向我分肥之形势；同时又有受蒋、顾贿买，继续随省韩反共的可能；但尚有进一步与我们合作的可能，中心决定在我。我们反对目前即向两李开刀，仍然力争其进步，再同走一段路程。此外，韩德勤残部及各保安旅团，亦按中央争取友军建立外围军的办法在做。

注释：

[1]去年管部最初过江之际，指一九三九年一月，以管文蔚为司令员的丹阳挺进纵队（原丹北游击纵队）攻占扬中之后到达江北。

[2]蒋、顾、韩，指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顾祝同是苏北涟水人，蒋介石的亲情；韩德勤是苏北泗阳人，顾祝同的亲信；顾、韩主张江苏人治江苏，包办一切。

[3]两李，即李明扬、李长江。

[4]二十年，指民国二十年，即公元一九三一年。

[5]李、白，指国民党桂系的代表人物李宗仁、白崇禧。

[6]陈于去年反过江拜访两李，指陈毅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第一次到江北泰州拜访李明扬、李长江。

[7]朱、毛，即朱德、毛泽东。

[8]玉阶，朱德的字。

[9]我处，指皖南泾县云岭。当时新四军军部在云岭办有教导总队，训练干部。

[10]管文蔚、叶飞，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叶飞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之命，率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原新四军第六团）由东路撤回扬中，与管文蔚率领的丹阳挺进纵队一部台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任司令员，叶任副司令员、中共挺进纵队委员会书记。一九四一年初到达苏北。

[11]罗炳辉又在湖西解决了盛子瑾，盛子瑾为国民党安徽省第六区专员（兼该区第一支队司令）兼泗县县长。因受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的排挤，决定率部投奔李明扬。当他于一九三九年春（半塔集战斗前）率部进入新四军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时，在高邮湖西的天长县半塔集地区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司令员兼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领导的部队发生误会，被全部缴械。

[12]叶飞部西开增援，一九四一年三月下旬，韩德勤乘淮南路东主力开赴路西作战未归之际，令其所属主力第一一七师、独立六旅等部十个团共万余人围攻路东根据地的中心半塔集，叶飞奉命率挺进纵队主力五个营由吴家桥地区西开增援，配合各部解了半塔之围。

[13]邓，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半塔集战斗胜利结束后，叶飞准备率部东返，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邓子恢接见了。

[14]江南，指陈毅在苏南时所主持的工作。

[15]八路、五支，指从陇海路南下、从津浦路东开的八路军部队和新四军第五支队。

[16]以后省韩迫令其进攻，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率部由塘头地区东进黄桥，陈泰运奉韩德勤之命率税警总团两个团由曲塘地区南下截击，打了一仗。

[17]黄逸峰、第三党季方，黄逸峰是江苏省东台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党的组织关系，流亡海外，一九三四年回国后，在广西当教授，受桂系支持。此时，他以国民党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的身份，奉命来组建党政委员会鲁苏分会，因与桂系有联系，遭韩德勤冷遇。季方，江苏海门人，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一九四一年进入苏北；为国民党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

[18]李守维死，黄桥战役尾声时，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骑马夜逃，坠入挖尺沟河中淹死。

**苏北工作中心应即转入农村作持久抗日的布置**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电悉。朱克靖[1]电亦谓李长江有勾结敌伪进攻海安、曲塘、东台说，情况尚待查明。你处特别加强如皋、兴化方面之侦察工作。

二、估计敌伪进犯将以如皋为中心，此种可能最大。但彼必须占兴化[2]后，始能向东台、盐城推进，目前宜特别加强侦察工作。

三、整个华中形势，在敌伪顽联合进攻之下，我们均只能占据乡间作长期坚持。只有在坚持长期斗争中始能巩固自卫的阵地，城镇之得失不足虑。苏北工作应转入农村作持久的布置。

四、敌伪如大举进犯海安、东台，只能以小部队游击战侧击之。新四军宜集结主力，荫蔽在适当地点，让敌前进转而袭击其后方。突击点可选择在如皋及其以南地区，你们应预先作此种布置。

五、两李在全国形势逆转之下，有可能投敌，但必须经过与敌默契的过程，故我仍与其联络。对其截断我黄桥过苏南之交通，则不必让步。只有两李公开投降时，我们才好打他。

六、立刻在苏北党政军中传达，把工作中心转入农村，广泛发展地方武装，作深入的游击战争教育，加强敌伪军工作，巩固全党坚持的决心，望依此电布置。

注释：

[1]朱克靖，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党代表。一九三八年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新四军政治部顾问，主要从事联络工作。

[2]兴化，当时为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所在地。故陈毅估计，日军必须占领兴化，驱逐韩德勤或压迫韩德勤投降后，才能向东台、盐城推进。

---

这是陈毅在苏北盐城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起草的给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领导人粟裕、刘炎的电报。陈毅还将此电告华中有关各部队。标题为编者所拟。

## 论建军工作 (一九四一年七月)

### 一、建军工作的重要性

(一) 皖南事变以来的严重时局：日本帝国主义汪精卫亲日派反共势力，均集中力量向新四军进攻。本军处在极危险境地。皖南部队及军司令部既大部被解决，本军番号复被取消，接着我五师、四师、二师、六师又在鄂豫苏皖战线上遭受反共大军三十万众的进攻。日寇汉奸伪军又不时出动袭击我军侧背，与反共大军作直接间接的配合，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阴谋家们，指望在几月内完全解决所谓新四军“残部”。抗战军民及国际间同情人士，莫不关怀新四军的现状和前途，慰问鼓励不遗余力。自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机立断，于一月十八日任命新四军军政首长后，新的军部于一月二十八日宣告成立。半年来的努力，本军突破了被包围的危境，取得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民主阵地的伟大胜利。本军本身反而更加壮大充实，完成了全军的铁的统一，由游击兵团提高到正规军的阶段，由无数小块敌后游击区，形成了一片宽广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华中敌后数千万同胞在本军掩护之下，享受了抗日民主的幸福。民生改善，民权发扬，民族正气之扶植，开始华中敌后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纪元。本军的力量和所保卫的国土，与全国友军比较：任何一个军，一个集团军，甚至一个战区，都不能与本军比拟。本军所牵制的敌伪军，约占敌侵华总兵力六分之一强，这是皖变以来本军苦斗中的伟大收获。于是本军成了时局的中心，全国抗战军队除八路军而外，没有哪个军队能有新四军那样，享受着空前的国际荣誉和人民的同情。这证明着中共中央及其华中局领导的正确，证明着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联合反共的阴谋遭着惨败。本军在今天已成为中国抗战的支柱之一和坚持抗战的保证，是无疑义的事了。

(二) 本军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战武装，中共今天的总的政治任务，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本军在目前即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政治任务而奋斗到底。因此团结人民，争取友军，反对投降，驱逐日寇，乃本军的斗争内容和奋斗目标。抗战四年来的教训：是从抗战第一天起，中国内部即存在着抗日势力与投降势力两者间的斗争。抗战坚持了四年，正是抗日势力不断克服投降势力的结果。但今天还未最终战胜日寇，亦即是投降危险仍然存在，这说明了抗日势力的发展和强大，尚未达到足以完全克服投降的地步。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在过去发挥了坚持抗战克服投降的伟大作用，但为能适应时局的要求，尚需把今天的力量大大提高，因此，建军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

(三) 本军十多年来创造了强大的革命军队的基础，皖变以来的锻炼，更加巩固和增强了本军的力量，这是一面。另一面本身仍然存在许多弱点和严重现象，这些弱点与现象不纠正是足以障碍本军的进步和执行其政治任务的。有些什么弱点呢？主要的是：1.障碍部队正规化的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正规化的程度不够。2.只看局部不顾全军总的利益的本位主义。3.只顾私人利益忘记革命利益的个人主义。4.对党的政策不能完整把握，只是片

面的执行，甚至有违反党的政策的过“左”过右的现象。5. 留恋过去，回忆过去，对新事物毫无感觉，自满自足不求进步创造的保守主义。6. 长期脱离阶级，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后，使个人架空游离，接受外来的影响，冲淡了自己的革命意识，变成资本主义的思想追随者，于是形成生活上的腐化堕落，甚至干部开小差以及个别叛变的蜕化的严重现象。这说明干部的党性不够坚强，个别的业已另找出路，有的正在腐化中，有的正在动摇中，这是最严重的现象。只有依靠大批坚强干部在党领导之下提高党性，力求自己进步并纠正上述严重现象，本军才能前进。7. 部队编制不充实，不整齐划一，执行命令不坚决，工作凌乱无计划性，行动配合不密切，8. 部队纪律要求不严格，仅仅重视群众纪律，对军事纪律、经济纪律忽视的倾向。9. 军事技术落后，战术理论缺乏，军事教育及行政工作薄弱。某些干部提升很快，他的能力与工作担负不相称，掌握部队能力差，战斗任务不能绝对保证完成等。这些现象在全军各部队说来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绝无根本例外。这说明本军现有力量尚未达到组织得更好，教育得更好，训练得更强，必须要求进一步来建设自己，改进自己。

（四）本军的游击范围，包括了华中数省几百个县的广大地区，数千万同胞的生命财产在敌伪的威胁蹂躏之下，均依靠本军强有力的掩护。因此本军今后的抗战任务，是更加重大了，如何巩固本军，扩大本军，是巩固华中阵地的前提。当去年亲日派何应钦等阴谋命令本军北移的时候，当皖变之后，日寇与反共大军以武力夹攻，压迫我们退出华中的时候，华中鄂豫苏皖四省的工农商学各界，均一致要求本军驻防原地，不得轻易移动。因为本军移动居民即失去保障，立即要受敌伪烧杀的痛苦，立即要失掉抗日民主生活，恢复黑暗专制的统治，本军与华中数千万同胞的血肉相联，正遭着敌寇的怀恨，随时均在设法来计算我们，本军只有努力建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扩充自己的编制，把人民的大多数组织起来，才能坚持华中阵地。华中的抗日民主政权拥有新四军这样进步的武装，是民主政权的标志之一。把新四军建设得很好，乃是抗日政权巩固的基本条件。同时中国革命历史指出：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说明掌握武装，建立武装，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为着中国革命长远的利益，新四军本身之加强和努力建军，不仅必要而且是一个长期性的斗争。

（五）我们今天建军是与皖南时期的建军有着下列原则上的区别：1. 建军是从政治上着手，首先保证党在本军中的绝对领导权，排斥一切非革命意识的侵蚀。皖南的建军主张，容许本军有两个领导，和降低本军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是政治上的绝大错误。2. 建军目的是为了战胜日寇、亲日派，及一切危害本军的阴谋。建军的办法便是集中全力，打开局面，改变环境。我党六中全会即指出，抗日战争投降危险异常严重，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号召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充分准备，以应付突变。皖南的建军，没有清楚看见这一严重形势，一切建军工作离开克服投降的严重政治任务。在思想上组织上战斗方面缺乏准备，形成一种逃避现实，关起大门来，独善其身的技术建军的倾向。其强调反游击主义，是弄错了打击方向。游击主义一直未纠正，反而取消并压制了本军灵活游击机动作战的革命传统。所以在突然事变爆发时，毫无准备，手忙脚乱的陷于失败。反之，本军其他各部分，不



仅在抗日方面有了准备，而且在克服投降、抵抗磨擦方面也有了准备，其结果就与皖南相反，始终保持了胜利发展的局面。3.建军是要求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皖南建军提出以质量代数量的精兵主义，不懂得数量质量互相转化、互相依存的法则。所谓精兵主义，只在于自己限制自己，自己束缚自己，自己满足自己，发展中断，停滞不前，当然招致灭亡。

## 二、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

（六）本军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集合体，抗战以来吸收了成千上万的新成分。这些新成分，来自不同的地域，各有不同的历史，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其来本军又各有不同的动机。而部队又处在经常作战不断消耗不断扩大状态中。新的训练尚未成熟，而老的坚强的骨干业已部分伤亡，这些伤亡都是本军十年的精华，是短时期内所不能弥补的。特别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环境中，斗争极其复杂，外界的不良影响不断于无形中侵入本军。加上皖南的主张有了原则上的错误，更助长了这种外界侵蚀的形势。由此看来，本军在抗战中虽然日益扩大，某些方面较内战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质量方面尚不够坚强，又在许多方面尚不及内战时期的水平。此时不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与教育，则将发生极大的危险，这是应特别警惕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乃是本军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本军生存发展壮大的基础。保持发扬和加强这一特质，不仅可以保证本军能够日趋强大，且可以进而保证与加强本军对中国抗战的支柱作用。反之，如削弱这一特质，于本军及抗战前途危险性实大。党在本军的领导，就是本军特质的体现。几年来一切外来的反共阴谋，都企图在取消和削弱与破坏我党在本军中的领导，亦即是企图取消和削弱本军这一革命特质。同时本军的斗争也实际是在如何能保持和发扬这一特质。前面指出过本军质量比内战时期较差，同时本军内部现在存在着许多危险的倾向，如某些干部腐化堕落开小差，以及许多不良倾向之发生等。这就说明本军的少数分子已在蜕变。我们的建军正是以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来反对一切不良现象，来保持和发扬本军的革命特质。因此建军便从加强党在本军中的政治领导，保持与加强本军的阶级性和党性下手。我们的建军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建军，而且是强大的政治建设工作。不是轻视编制组织和技术训练，而是用强力的党的政治领导去保证一切部门的健全。因此我们的建军任务是加强党对本军的政治领导。我们的建军口号，是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

（七）党军就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党依靠这个军队去完成政治任务，作为党遂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党军中必须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不断增强这个领导。党军与其他友军相比，虽同为抗战军队，但是保持着原则上意识上的不能混同的区别。党军是具有高度革命自觉性，排斥军队的雇佣性的。党军是具有强固的工农革命的优良传统，扫除了脱离群众的混杂游离的社会习性。党军是能做到政策统一，行动统一和指挥统一，没有地方界限、浪漫习性及阶级成见。党军的团结是政治的铁的团结，没有官兵的阶级悬殊，没有军民的冲突隔阂，更没有部队间的矛盾和猜忌。党军不仅对友军不采取孤高自赏的宗派主义态度，正相反，我们的党军还要善于去团结友军，进行一切抗日的合作。因此党军不仅限于能服从党的命令，完成一切战斗任务，而且还要善于运用和发挥党的政策，去引起人民和友军的共鸣。

党军是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执行者。

(八) 党军的正规化，是指军队的编制和组织能保证实现党的政治领导而言。所以必须是正规化的军队，才能担当党军的光荣称号。党军在党的政策领导之下，建立了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形成了组织上的一致。即是政治上铁的团结，造成了组织上铁的团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在军队的政治领导，是决定战略方针，发展方向，以及政治教育，技术训练，供给卫生文化的设备，均是从组织上去保证政治领导的实现的。仅有政治领导而无组织办法，则政治领导变成抽象的架空的，不能起改造现实的作用；仅从事于组织上的努力，脱离了政治领导，则是盲目的，单纯技术的，必致迷失方向，甚至会遭受失败。因此军队的党化和正规化是政治与组织的密切联系，是互相浸透的整体。

(九) 八路军、新四军十多年来都在党领导之下奋斗，而且都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八路军、新四军之为正规化党军乃是已有的事实。即在皖变中，我皖南的部队虽由于亲日派的阴谋及领导上的错误而失败，但其作战之英勇顽强，亦表现正规化党军的英雄气概。但为什么又重新提出正规化党军的口号呢？我们认为党化和正规

化是无止境的。我们所要求的是党的政治领导不断增强，军队干部的党性不断提高，军队的阶级性及其特质的充分保持和发扬正规化的强度的继续提高。这样看来，本军任何一个师、旅、团都不能例外，都需要提高党性和正规化，乃是最实际迫切的要求。不过在建军进行中可以将建立正规化党军的口号，分别情形，作更具体的规定：在某些主力兵团提出建立模范党军和加强正规化的口号；对某些主力兵团，则仍一般提出建立正规化党军的口号；对地方游击兵团则提出学习主力，赶上主力，建立基干部队，加强党的领导口号；对人民自卫队则提出加入主力，出门打游击，配合主力作战的口号。总之口号应针对部队具体历史、现在基础去提出，不要自夸自大。部队进步是无止境的，一切取决于工作，老部队要继续前进，新部队要急起直追，建军乃是全军工作的大比赛，向最前进的看齐，反对停留在原位置，不迈步向前。

### 三、正规化党军的条件及其最低限度的要求

(十) 正规化党军的第二个要求，是在政治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养成全军服从党的领导的天性，执行党的政策的完整性，执行命令的坚决性。强化并巩固政委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保持和发扬我军的革命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就是本军阶级性党派性的表现。那种离开党的领导的绝对性，来说明什么一种另外的优良传统，是绝大的政治错误。我军的优良传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武装的革命特质的发扬；全体军人有最高度的政治觉悟，加强阶级教育和站在阶级立场上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教育，造成本军自己是抗战军队的模范，是抗战军队中最先进最觉悟的一部分，成为团结人民，争取友军，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

(十一) 正规化党军第二个要求，是在军事组织和技術上的优越性，要求达到并超过现代中国军队的军事水平。本军富于作战经验，指挥上的灵活机动，战术战斗上的独特创造，临阵时的英勇牺牲和坚强勇敢的精神，政治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坚强性和独创性，游击战术的伟大发挥和发明，这是本军的特色，超过中国其他军队，即日本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而引起畏惧。然而本军军事方面仍然存在下列弱点：兵团指挥尚未深造，组

织战斗的能力尚不充分，战略战术的理论素养尚未提高，军事教育尚无完整周密的系统，限于应付目前的战况，未能逐渐去接近现代的技术水平，长于实际缺乏理论是一般的弱点。我们一方面应吸收苏联红军的新战略战术原则，一方面应研究世界大战的新经验，最主要的是继承和发扬内战时期及抗战以来的经验和传统，有系统的、批判的融化起来，造成理论与实践的更高级的统一，那种“老子只会打仗、只晓得冲锋，不爱听讲什么道理”的反对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是应该去掉的。

（十二）正规化党军第三个要求，是在纪律上要求军事纪律、群众纪律两者并重，提高自觉遵守纪律的热情，做到模范纪律的地步。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测量器，军事纪律的提高基于随时有敌情观念，群众纪律的保持基于全体军人具有群众观点，随时不忘本军是人民的军队，与一般雇佣性的军队完全不同。本军现在有只注重群众纪律忽视军事纪律的偏向，这就是等于削弱了本军的战斗力。本军某些部队保持着原始农民队伍的游击习气，证明军纪的薄弱，是经不起持久战斗的。没有军纪即无从保持战斗的胜利。本军某些部队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军阀残余，是要脱离群众孤立自己的。两个偏向均应纠正。同时纪律又是团结内部的轮带和锁钥，纪律严明，共同遵守，人人生活都愉快，能做到各尽所能，各负其责。纪律严明，对于守纪律的兵员，等于鱼水的不能分离，对于坏分子则是一种拘束和裁制，而这种拘束和裁制是完全必要的。另外，纪律又是解决军民关系的桥梁。纪律好即是向人民说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人民根据军队的纪律，即可判断军队及政权的性质，来决定其拥护或反抗的态度。某种政权必具有某种军队，人民对政权和军队的性质，在开始接触的第一天，常常从纪律上来判决，同时军队也是以其纪律对人民作日常的切身接触，这乃是一个真理，是我们主张模范纪律的根据。

（十三）正规化党军第四个要求，是在行政上、编制上、工作制度上、事务处理上，都有计划有组织合乎规律的去进行工作，分工是严密的、科学的，同时是极负责任的。行政工作是集中指挥强力统率的敏捷机断的高度表现；编制工作是适当配置力量，适当使用力量，长期积蓄力量的表现；工作制度是把各部门的工作规律和要求，写成章程，便利万众共同遵守，并能妥善去解决各部门联系的最科学的办法；事务工作就是一切工作的不可少的实践的重要步骤。目前部队中存在着轻视行政工作，轻视事务工作，和随意解决编制，随意去取人马的游击主义现象，这是本军正规化程度不够的证据。实践即劳动，事务工作即实践，他是基源的，先行的，而理论和原则是随从的，是从实践中洗炼出来的。人类实践愈多，因而理论也愈丰富，这样就从实践产生理论的阶段，转为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当社会进化到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阶段后，重视理论轻视实践的错误现象遂以发生，特别那种鄙薄劳动的观点，乃是统治阶级的观点，我们应反对的。究其实，脱离了实践，任何理论就变成抽象的无关现实的东西。人们只要求党军会打仗，会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的任务，人们也以此自诩。可是细心考究，部队十几万人，要穿衣、要吃饭、要行军、要宿营、要药吃、要钱用，这些实际问题不先行解决，必然谈不到什么打仗分胜负的问题。所以妥善解决行政工作、事务工作乃是一切工作执行的前提。人员马匹，辎重行李、弹药武器，都是军队战斗力的构成部分，用一定的制度，一定的组织去贯串他，用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手续去处理它，这就是指挥艺术的基础。

(十四) 正规化党军第五个要求,是在作风上充满革命热情,建立宏大的规模,具备雄伟的气派。我们军队是力求创造进步的军队,是与服从旧传统的保守主义不能并存的;我们军队是有远大理想的军队,是与庸俗猥琐的事务主义对立的;我们军队的生活训条,是严肃、活泼、紧张、团结、友爱、学习,对新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对旧事物能不留恋,能批判加以扬弃。我们主张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把新旧干部截长补短融为整体,消除其对立,共同为党为革命服务,反对无原则的纠纷,即对无原则的纠纷亦应提到原则的高点加以解决,锻炼全军十几万人都有远大的眼光,开阔的手面,丰富的学识,健全的体格,充分的学习精神,严格有规律的生活,这样来造成我军先声夺人威震四方的革命气派和工作作风。

#### 四、建军中的政治建设

(十五) 政治建设是建军的中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五大项:1.提高干部的党性 2.强化政委制度;3.加强政治工作;4.健全军队党的组织工作;5.加强全军政治教育。这五大项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五个环节。政治建设必须从这五大项做起。

(十六) 首先讲提高干部党性问题。军队是交给干部去指挥的,是主张坚决执行命令的,几万人的进退生死都决定于一个或几个干部之手。军队的干部是有枪在手的干部,是掌握兵权的干部,如其服从党、拥护党,运用政策灵活,自己党性坚强时,于革命于党真是无价之宝。反之,如党性不强,打个人算盘,领导错误的时候,于革命于党的危险性最大,常常造成危害全局不可挽救的失败。在军队中不仅要重视一般干部的党性问题,而且更特别重视高级干部的党性问题。

(十七) 本军今天掌握了一批优秀的负责的干部,能独立领导,掌握路线,于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为党奋斗,这是本军的骨干,是经过长期考验的人物,是不怕火烧的真金,是全党应该尊敬的人物。但确有一小部分干部尽管是老资格,尽管干革命很久,到今天对斗争感觉疲倦,感觉难以继续支持,残留在思想中的旧社会意识并未肃清,在统一战线的新环境下,与外来的资本主义影响遇合,便立即起共鸣作用。这样的分子尽管资格老,地位高,而实际他的心事,早已不在继续革命,他是逐渐腐化,对党对革命正在起离心作用,其结果必然会走到离开党离开革命的危险道路。比如本军一个团长李忠民便是一个标本例子。他专讲资格,不讲工作;专借口党的干部政策要求党去顺应他个人,而不讲他个人应该如何来为党工作;他造成个人的权威,讲究生活的舒适,以革命功臣自居,以革命贵族自视;他以为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都不是为他定的,他可以对党提出特殊待遇的要求;他甚至仇视党内的积极分子,仇视党所引进来的革命积极而优良的新成分;他利用党爱护老干部的心理,来达到个人的私欲。李忠民有了这样的表现,虽然经过党不断的斗争和教育,仍不愿改悔,终于走到开小差的可耻道路。李忠民仅仅是一个例子。这种人在本军各师团中并不止一个,值得大家拿来作一面镜子,当着自我检讨的参考,凡有程度上相似的地方,应该自觉的纠正。党是主张对这类障碍进步、党性不纯洁的分子,在原则上采取坚决的态度,要求其改正与无条件服从党,愈是资格老,愈是有功劳的,更应该作服从党的模范;如其中有不听教育,不愿改正的分子,错就错到底,这是他自绝于党,

是应采用必要的组织办法的。

（十八）我党华中局在党中央指示之下，开始创办党校，大批重要干部纷纷要求入学，这是好的表现。但仍有个别分子固执不求进步，拿个人的唯心推测，来误解创办党校的意义，认为调训即是受处罚，即等于撤职。坚持其我个人无须受训的自高自大情绪。这正表示其党性尚很不健全。另一方面，一师某旅最近特别注意党性教育，亦开始了好的反映；许多同志把自己不应得的东西交还给党，并且向党写申明书，完全无遗漏的暴露自己不正确的阴私，这是好的表现。党对能彻底批评自己的党员，是特别奖励的；纵使他过去犯过大的错误，并不妨害他今天纠正后努力去做一个好干部好党员，党之信任他是不成问题的。

（十九）同时得指出有更大数目的新党员新干部加入了我们党我军，这同样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产。这些新成分有革命热情，有学习求进步的情绪，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接受新事物的锐敏感觉，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党特别看重这一方面，特别鼓励他们努力服务。但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均不够用，党性不强，没有经过锻炼，党是望他们在长期斗争中去锻炼自己的党性。但必须指出这些新成分当中，亦有一部分人存在着不正确的倾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不服从组织，强调个人自由，喜空谈不切实际，喜争地位不愿埋头工作，喜欢闹无原则纠纷挑拨是非，无组织的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自高自大不尊重老同志，自以为本领强，服从个人，不服从组织等。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习气，随处都与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发生矛盾。服从个人呢？还是服从革命服从组织呢？在他们仍然未能解决这一革命根本问题。甚至还有最坏的个别分子，表现他带着一种投机心理来参加革命、参加我党的，是因为我军我党在抗战中争取了优越的地位，革命胜利发展已为全国人民可以耳闻目睹，这种人是过渡同船，为争取个人的发展而来。他觉得在革命发展时期走反革命道路走不通，不如此时走革命道路反而可以一帆风顺，扶摇直上。这种基本为个人而不是为革命利益而来的，是真正的投机分子。他们隐蔽在党内只是一时间的事，终久必被淘汰。我们应正告这样的人，今天共产党新四军是饱有经验，已具有充分的判别能力，显微镜下可烛照一切，我们希望他能够认识党，认识自己，重新定下自己的决心，能向好的方面转变，那仍就是好的。抗战四年来我党我军吸收了大批新干部，也依靠新成分，我军才能创造得有今天。任何排斥轻视新干部的倾向，党均反对的。可是四年来的实践，也逐渐发觉着像这种个别的投机分子，是必须注意不能放松的。最近某旅军医处长李子民和他的爱人邱剑辉，两夫妇共同拐款潜逃。两人都加入党，前一时期工作表现并不坏，这就是投机分子一流人物，这正是抗战吃紧，国内磨擦紧张，本军斗争更加艰苦的反映。他们到了紧急关头，不愿个人吃亏，所以逃跑。我感觉摆在新干部面前有这样一种区别：同样是努力学习，但一种是党学习，学习好去努力实际工作的，一种是为了能够懂得辞句，便利在党内争取地位，把自己摆在又革命而且又安全的地位；同样是开展自我批评，一种为了党的利益，一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同样是尊重党的机关，一种是为了党的利益，一种却是为钻地位谋晋升之阶；同样是努力工作，但可能含着为党或自私的某种企图。这些分别是微细的，最初是看不见的，发展起来结果相反，所谓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因此我们认为党性锻炼是要求养成一种服从党、服从革命利益的性格，并使之发展成为党员的天性，成为极其自然的，毫不做作的。我们处在小生产占优势的中国社会，每个同志入党

之前，都有小生产者习性，他必须于入党之后，拿无产阶级的意识去克服和代替他的小生产者的意识，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不要说我一个人可以例外，我一个人在短期内就已解决这一问题，个别老党员十多年并未能解决这一基本问题乃是常有之事。

（二十）党性是什么？本军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回答得最明确，就是“一切服从无产阶级的与革命的战斗利益，就是一切服从党、服从组织、牺牲个人”。而且这种服从是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变动的环境中，党的政策策略的灵活运用中，去表现和体认的。胜利环境，和平环境，短短时期不容易作一个同志的党性结论，但在长期斗争中，任何人也不能掩饰的。根据上面的干部状况，所以我们主张本军政治建设以干部教育为中心，干部教育又以提高党性为重心，并应该采取下列步骤：1. 普遍建立和恢复干部小组会，专门讨论党性，举行干部间相互批评。2. 干部轮流调党校受训。3. 重新教育新老干部，督促自我学习。4. 全党尊敬老同志，大胆提拔新干部。5. 对不称职或有坏倾向的干部，应该调换。6. 全军各旅团干部应设法对调工作，打破恋栈割据的观念。7. 责成各级政委，特别注意干部审查和教育工作。8. 大胆培养非党干部，提高干部质量，对非党干部尚未成熟时，不一定迅速介绍入党，应经过长期考查。9. 责成各级政治机关应在下层及角落里面，去发现那些被压抑、被排挤，受委屈而基本上很好的新老干部和非党干部，加以提拔，伸张正气。10. 提倡引进大批作地方工作、群众工作、党性坚强、成绩卓越的者党员加入军队，担负政治工作。11. 强调政治工作人员作干部的模式。12. 创造干部和干部应具备的条件：（1）绝对服从党，原则上的坚定明确；（2）学习的模范；（3）艰苦生活；（4）完成职务并协助其他同志；（5）有斗争精神和民主工作方式；（6）有独立领导工作的能力。这六条作为我们选拔干部与同志自我检讨的标准，我们要求干部同志都向才德兼备方向去修养，提高党性（即党德），更为目前要务，但不是主张可以不要才能。

（二十一）我们不仅注意党内新老党员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而且还应用大力去培养和提拔非党的干部。目前在本军中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其关系尚不够健全。然而非党干部及一切尚未取得党籍的同志，他们在本军中有极大数量，在各种工作部门占着相当的地位，对本军有很大贡献。根显然本军如没有他们的帮助，一切事情便也不好办，或者办不成功。目前非党干部同志中有人颇有些不满情绪，工作关系尚未做到完全互相信任，安心愉快的地步。我以为应从三方面来解决此一问题：第一，首先党员应了解协助非党干部非党同志，是每个党员的革命义务，任何轻视歧视都是不许可的。我们党员在未入党之前，羡慕党员的光荣称号，努力工作，积极取得党籍。可是取得党籍之后，便以先进分子自居，而以落后分子看待别人，这种自高自大的情绪便障碍着我党与一切非党同志的合作。党员应了解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绝不仅是党本身的力量，我们共产党员之所以受人尊敬，绝不由于他的自高自大；共产党能完成一个革命，除依靠党本身力量而外，还要依靠千千万万的非党群众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奋斗。共产党本身是先锋队，任何革命只依靠先锋队是不可胜利的。先锋队的伟大处不仅在于他能冲锋陷阵，作英勇牺牲，而且在于他能领导千百万群众作自己的后备队，共同前进。先锋队脱离了与自己后备队的联系，自己必然失败。这是列宁留给我们党员最宝贵的指示之一，是不应忘记的。我们某些党员恰恰对这个原则是不够了解的。每一个党员应该常常想到自己来入党以前的情况：

那时是如何彷徨歧途，如何没有依靠，那时完全因为接触了一个党员，经过他的提携扶掖，取得党籍，我才有今天，变为党员，在党领导之下行动的幸福。因此不仅不应对非党同志骄傲，而且应很谦虚、很用心去帮助非党同志，如在未入党前党员来帮助我一样；对非党干部许多不够的地方，应加以体谅，和很诚恳去帮助。何况我们新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其思想意识上差别不大，则自高自大是完全应该纠正的事。再则在革命历史上常常有非党同志站在党外来帮助党、帮助革命，其贡献远非若干普通党员所能企及，这种非党布尔什维克，应该一样受着尊重，首先党员就应该尊敬他。第二，非党干部，和尚未取得党籍的同志也常常有一种偏向：因为看见共产党内尚有某些弱点，某几个党员的落后行动，便因而对党对党员有着轻视的心理。同时又因为自己尚不能立即取得党籍，便误会党的组织对他歧视。特别在军队中，党的会议不能参加，便误会是不相信他。某些党员对他采取不正确态度，他以为是党也在怀疑他。这些情绪都是不正确的。这只能证明一事实，即他们对党和本军的认识 and 了解尚差。我们以为非党同志应该放弃急躁心理，应该努力自己的修养，充实自己的工作，不应该不管自己应做的事而特别想以某种方法去取得党籍。党不仅不歧视非党同志，而且随时想在非党同志中去选拔真才。只要你自己修养到家，工作够份，党一定能发现你的。遇着党内某些党员有不好表现，非党同志不应轻视，不应因此不平，相反的应本着一贯的同情党爱护党的立场，去加以匡救。这种正确态度，必然引起同情和鼓励，可以解除一切隔膜，并受到党和党员的尊重。再则我们虽然说明非党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地位，但在非党同志就不必因此企图长期留在党外，总以能加入党的组织为更好。第三，党领导机关为了健全党员与非党员间的关系，应依照下列原则：新老干部发生纠纷多责备老干部，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发生纠纷应多责备党的干部，党员与非党员发生纠纷应多责备自己的党员。这里是强调党员的模范作用、领导作用，所以是正确的。党的机关还应多注意非党干部的教育，本军的各种会议尽可能让非党干部参加，关于政治形势和任务的讨论会议等亦尽可能要非党同志参加。惟党内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有关事项，特别是关于保持党的秘密方面，则应该严格；即非党同志亦不应去打听这一方面的事。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斗争的党，担负了革命的历史任务，他要完成任务，必须与强大敌人作战，而各种敌人也特别设法专门对付党的组织。党为了自卫，为了进行胜利的斗争，所以必须保持组织上的秘密，即军队党亦不能例外。这是党员与非党员都应该共同认识清楚的。

（二十二）政委是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是执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方针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政委对军队中一切工作、一切行动有督导之权，而且有最后决定之权。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虽然曾规定将战场指挥的决定赋予同级军事指挥员，但不能因此得到在军事作战方面，可以削弱政委权力，脱离领导的结论。政委人才应该严格挑选，首先是具有强固的党性，领导全盘的能力，生活工作方面的模范，自己是团结同级、下级的重心，对上级指示的坚决执行，不断学习理论，能够把握路线和理论。党对政委的权利给予最大，因此对政委的督促也要更严，而担负政委的干部的自处，也要更严格。政委不仅仅是以自己的职权从行政方面实现其领导，而且是以自己的远见，模范生活，民主方式，说服态度，坚定立场，英明指导，去建立自己的威信。本军政委制度一般已奠定了基础，但仍然有个别的局部的不能称职的情形。一方面是某些部队对政委制度尚无深入的正确了解，不服从不尊重政委制度

的现象尚时有发生，特别一部分军事指挥员，尚时有不尊重政委制度的现象。军事指挥员应作尊重政委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模范，只有如此才能使整个部队，对政委制度有正确的理解和观念。目前必须纠正皖南时期，历来把政委改为副职的错误办法，这个办法实质上等于取消政委制度和削弱党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还得特别检查各级政委人选，他的品质，他的能力，他的威望，特别是他的党性，是否能够称职，不称职的应该调换。再则担负政委的同志，应随时作自我检查，不负党的委托，不负下级的期望，这又是政委干部自己的事。

（二十三）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就是党的工作机关。党对群众团体及政权的领导，是经过自己的党员，经过自己党员所组成的党团作用，是间接的形式，民主提议的形式。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经过自己的党员，而且直接在军队设立党的领导机关，政治机关就是党部，而且特别赋予行政指挥的全权。党把自己的领导嵌入行政和指挥命令之中，且作为核心。因此各级政治机关，他是以党的机关的地位，调动指挥所有军队的党员，督促其起模范作用；同时政治机关他又以军队指挥行政机关的地位，可以指挥调动和号召全体军人及全体居民。因此政治机关与政委必然应受到部队及全体军人的尊重。政治机关及其工作部署应该：1. 保证党的政策路线和上级命令的执行；2. 以党的政策路线教育全体军人；3.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4. 政治机关及政工人员首先是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目前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已发生不执行命令，不能作模范，发生贪污以及脱离群众违反政策的现象，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虽然仅是个别现象，我们应该警惕，如不立即纠正，必给我军以大的危害；5. 保证部队之巩固，保证战斗之胜利，保证全体军人的精神状况物质状况的健全，保证其他军事供给卫生部门的健全；6. 政治工作方式要求适合情况，要求敏捷迅速，要求指导实际。旅团政治工作应该以巡视检查，实际帮助连队工作，口头指导为主要指导方式。旅团以上则一面依靠文件报纸和定期会议，一面抓住巡视和口头实际指导；7. 战时政治工作仍然是本军政治工作较弱的一点，其来源即由于战况吃紧，炮火猛烈，全军进入高度紧张，血液沸腾之际，每每政工人员处此时机，头脑不能冷静地继续考虑，不能于转瞬间反映事物，因此不能提口号，定任务，这是通常的弱点，这要求政工人员有沉着冷静的头脑，战前先有各种可能的准备，尤其临阵应表现政工人员的革命品质，忘记自己，去想到工作，想到战况；8. 新四军政治机关的威信，比八路军要差，因此其政治保证力量也较弱，应该向八路军学习。首先应坚决反对不尊重政治机关的反党倾向。某些部队（一师特别多）在参谋处副官处均有不尊重政治机关的行为，应立即纠正。特别是党员更不容许有不尊重政治机关的违反党纪的倾向。另一面本军某些政治机关也缺乏首先抓住自己的政治领导，从思想意识的教育上，去巩固全体军人对政治机关的威信，常常因为个别政治工作人员本身的毛病，也影响到整个政治工作的威信。同时还有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式把握不牢，特别对部队中非党成分的接待不好，也引起别人以“特务工作”看待我们的政治工作，这是政工人员应首先举行自我检查的。这种情形在各旅团中存在着，在新争取的部队中更应严加纠正。

（二十四）党的工作，在这里所指的是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工作。如总支部工作，支部工作，党员的训练教育，发展党员，党内处分和批评等。党的组织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第三师在这方面成就最大，值得全军取



法。我们应加强党的支部，在连队中起工作堡垒作用：第一、党的支部在连队中应有参与一切工作的权利，我们虽然不赞成恢复老红军时期支部管理一切的原则，但主张在不干涉行政决定权及军队指挥的原则下，一切经过支部并由支部去保证，是合乎要求的；第二、要特别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第三、要求小组为核心，适当分配党员到班排起积极的核心作用；第四、支书应该专人负责，不兼其他职务；第五、党员及支部应在连队公开，这种公开是为要加强党的威信，改善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第六、本军部队的生活应该适当的民主，才能更发动党员的积极性。一般应保持党员应占全部队人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数目。数目少于百分之四十，必致削弱党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第七、第三师连队许多工作制度，如巩固部队的看兵制度，流动查哨制度，连队经济卫生制度，连队的学习互助制度，连队补课制度，文化娱乐等，均能以连队为单位去进行，经过支部的独立自主的推动作用，这是值得全军学习的。

（二十五）在全体军人中加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本军过去政治教育中曾把阶级教育与统一战线教育看成对立的東西，且争论不决，这是不正确的。我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我党在抗战时期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为了战胜日寇争取自己阶级解放的正确的唯一的阶级政策。我党用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就是教育他们要善于去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的一面，同时不放松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反动的另一面。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懂得运用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自己的阶级解放。因此，统一战线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即是阶级政策，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目前的建军要一面提高全军干部的党性，一面加强全体军人的阶级教育，并保持发扬工农武装的特质，这必须不能离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教育。因此凡党性强的干部，凡阶级意识强的干部，都必须懂得统一战线政策，不违反他，且能灵活掌握他，运用他。又全军指战员更要从本军工农武装的特质上认识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不会过“左”过右，所以站在自己阶级的立场上加强全体军人的阶级觉悟和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是政治教育的中心。

（二十六）要揭发皖南时期政治工作中的原则上的错误：其明目张胆承认本军政治工作可以容许异己党派的政治主张与党的主张平列，互争雄长，并且引用其言论文告作为政治工作方针，编入政治教材，定为政治纲领，这完全抹煞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友党中间原则上和政治上的区别，甘心放弃党的独立性，将党的领导转让于人，这是政治上绝大的错误；另一方面借口说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应该随着抗战时期的新环境加以改变，因而削弱党的领导。我们承认抗日时期的政治工作是与内战时期不同，如以前是内战，现在是国际战，以前是以工农阶级为工作对象，现在是以全国人民为工作对象，以前只作敌军工作，现在要团结友军，同时与友军还有磨擦，大批专门家文化人友军军官加入本军，文化艺术水准提高等，这些都是内容上的不同，自然不宜墨守成规，应有大的改变。但这些新的添加，无论如何不能走到使党的领导削弱；恰恰相反，只有更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使本军能胜利的应付抗战环境，不致在五色迷目、万花缭乱的复杂社会环境中迷失方向。保持本军阶级的革命特质，加强本军的政治领导，这是不变的，以这个不变方能应付新环境中的万变。今天本军中当不致重复皖南时期的错误，但不尊重政治工作制度，不尊重政委制度，想以个人威信来代替党的领导，想以军事领导与

政治领导对立，这些恶劣倾向则时有发现。另一面轻视文化工作，轻视新成分，阻止新成分，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左”的错误，也存在着。这些倾向都是从“左”右两方，企图来削弱党的领导的，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

（二十七）政治建设中如敌伪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民运工作，文化工作诸部门，我们不想在此仔细讨论。在华中地方党、政权业已建立，部队民运工作应相当缩小，方式应有改变，只宜站在协助地方工作的地位，再不需要军队党去干涉和直接指导地方党了。另一方面要养成我军是尊重地方党、尊重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

（二十八）军队文化工作是军事政治工作的助手，不能混同文化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区别，不能拿政治工作来取消文化工作。文化工作他本身具有特点和其不同于军事政治的特殊规律。它在部队中仍有独特作用，特别对全体军人的启蒙作用，以及性情上精神上的陶铸作用。另一方面文化工作是革命军队强有力的斗争武器，本军应掌握这个武器，去打击敌人和保卫自己。但是又要承认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他有辅助军政工作的作用，但如强调为单独的系统也是不正确的。本军的文化工作，得着外来帮助，是有一般的开展，但仍未被人适当重视，甚至还被轻视。那种仅以识字课估量文化工作的价值的观点，是庸俗浅陋的观点。文化工作如其具备着反帝的民族内容，反封建迷信的科学内容，反特权阶级的大众内容，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本军在部队内外均应该提高，使其能配合军事政治工作完成战斗任务。除正式操课外，课外活动是文化工作的主要园地。应当尊重文化教员，提高其政治地位。对文化工作的时间应适当分配。对文化干部经常培养，相当保持一批比较专门的文化干部，不要流动性太大和随意调动。

## 五、建军中的军事建设

（二十九）本军军事建设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健全的司令机关。本军各部队之指挥依然靠军政首长的一手包办，一面是军政首长忙不过来精力有限，而军政首长自己又不放心交给别人，仍然未脱离游击队式的口令指挥的作风；一面是历来不注意司令机关的健全，不愿安放得力干部在里面；一面由于战斗频繁火线上干部伤亡大，把机关人员实际变成是一个候补指挥员；一面是将犯错误的同志大批塞在司令部机关内，不能称职工作，且不安心，又影响司令机关的威信；这就造成本军部队庞大，统率机关不健全，指挥难以统一，行动难以做到完全配合的严重现象。这是本军各部门过惯独立活动及小家庭生活的反映，下级存有不靠上级的自由自在的心理，上级除政治指导而外，也并不急迫要求指挥行动的统一。但是今天本军业已造成强大集团，担负更严重的作战任务，敌寇等和反共势力一刻不放松的向本军下攻击命令，全军力量统一起来，收如臂使指之效，这是指出军事建设的问题的根据。

（三十）军事建设的重心在建立全军首脑的参谋机关的工作。参谋工作是组织战斗指挥战斗的枢纽，参谋工作不得视为首长的幕僚工作，一个军部的指挥是由首长加上参谋工作构成的，参谋工作对于首长有其隶属性，绝对听首长的指挥；首长对他也有其依存性，他的生活一时一刻不能脱离与首长的联系，可是还有其独立性。参谋工作与首长是一种分工，如果把参谋工作

当成文武秘书，只听驱遣，无独立工作的可能，自然使首长变成“万能人物”，非回复到自然经济时代，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境况不可，必然使首长变成忙人，毫无时间考虑大的问题。这种现象是不能再保持了。为今之计：1.纠正对参谋工作的轻视观念。军政首长大胆让参谋人员去独立负责，提高参谋处的威权，军政首长应有意识去加以培养；2.参谋长是首长的代理人，部队的统率者，各级指挥员应以服从首长服从上级的精神和态度去服从参谋长，各级首长对自己的参谋长应尊重并设法发挥其指挥能力。参谋人员应长期在职培养，不能随意调动或改职；3.将参谋人员与军事指挥员一元化实行互调工作；4.鼓励参谋人员努力自己的修养，以实际工作建立威信纠正轻视自己的观念。对不尊重参谋工作的倾向不应让步，应该以实际工作成绩转变其错误观念。5.普遍建立见习参谋和见习军官制度；6.加强参谋人员的专门学习，每天作研究两小时军事的规定；7.参谋人员的质量应提高，采取宁缺毋滥的办法；8.作一个好参谋应该是终身奋斗的光荣事业，党奖励从事此种不出风头埋头苦干的同志。每一个团有几个好参谋，比多几个连还要好；9.参谋工作分作战、教育、侦察、通讯、后勤诸项，应以作战科为中心，但目前作战部门最冷落，应向这一部门突击；10.确定参谋人员到部队巡视，在具体情况下赋予代表首长的权利，部队指挥员应听其指挥；11.为了建立参谋工作，团以上首长副职斟酌取消，即用以加强参谋工作；12.各级政委应特别重视参谋工作的健全，经常督促之，并出席其会议；13.要养成每个司令机关都有几年在职的参谋，以积聚经验养成专家；14.参谋工作要能抓住大体，也要能明察秋毫，因此参谋人才的标准要求有军事经验，相当政治文化的素养，冷静聪明的头脑，坚强的胆识。军政首长应于平时留心去物色适当的人物，下决心培养参谋人员。

（三十一）军事建设应提高部队的军事教育和战术研究。本军战术方面长于实战，短于理论，存在着对军事技术的不正确理解。实际上军事技术有他的原理和规律，若不去理解其规律和原理，即无从得到优越的技术，何况如战斗动作刺枪打靶操作等固纯系动作，理论思考较少，但仍然是易做难讲，这是由于军事技术有他的特殊规律，距离常识较远的原故。我们强调学习军事技术，更要强调学习军事技术理论，从把握其规律性去了解，这个关键突破，即可一通百通，这是一。第二，本军多年来的实战经验有最丰富的内容，即四年抗战经验，亦何莫不然，但缺乏去深刻研究，用理论方式提取出来。这些实战经验，蕴藏最宝贵高深的原则，是古今中外兵学书上所没有的。目前应提倡把实战经验理论化。第三，我们的干部，他善于个人口讲指画，个人闲谈，而不能长篇大论出诸于口，笔之于书，这由于文字程度差，也由于头脑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太差，这一工作应由司令机关帮助解决，用口讲记录方式，或用讨论方式去推进。第四，常常有人怕讲错，同时有人以为讲错也感觉是一件耽心之事，我们主张大胆的多讲，愈多愈好，先求数量，数量多了造成风气，再进一步去求质量，不然便只有停止不前，永远打不开这片未开垦的沃土。第五，军事教育，本军长处在于抓住了应急的实用这一方面，所以三天新兵即能打仗，可是短于全盘发展和面向全套武艺的发展，特别短于高级指挥的研究，这于本军转向大兵团作战前途不适合，所以目前一面加强班排教育，一面干部应注意到较高的指挥之研究。第六，体魄锻炼非常重要。第二师在这方面很有成绩，值得表扬。我们的战士一般体格差，特别需要加强训练，造成雄纠纠气昂昂的威武姿势，准备同敌人格斗的本领。第七，

军事教育着重做到战场纪律、课堂纪律、操场纪律、射击纪律之遵守，一律采取严格主义。第八，发动学习军事，研究军事。各级军事研究会，军政首长应作该会负责人之一，担负作报告和读书指导。第九，部队应学会夜战、河川战、反骑兵战、平原战诸大项，多着重演习，多讲多做。第十，本军根据敌我情况，战术方针应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大兵团作战，在特殊情况下，才运用之，不到时候想过早跳到运动战，是脱离实际的妄想，会吃亏的。游击战的精髓，在于善于分散，善于集中，分散能作极小的散兵群的战斗，集中则视敌情地形，作较大的突击，总之以养成官兵独立作战，独立游击，就地游击，长期纠缠为主体。这个主张是根据四师、二师、六师方面的实战要求来说的，应成为全面的准绳。至于在苏北的部队，可以稍加变更，即是除游击战外增加运动战阵地战的项目。第十一，本军军部应创办军事杂志，作为全军对理论实际研究的领导，综合研究华中几年来战斗经验，编订教材，训练部队。第十二，本军各师应发扬自己特长，学习别人的特长，不要故步自封。战术方面，且应向敌人学习。

（三十二）军事编制应有明确规定，才能妥善处理人员、武器和估计并储蓄战斗力，同时也才方便分配任务进行战斗。1. 编制应依照各部情况分订为大小几种；2. 编制应有固定性和伸缩性；3. 减少机关后方人员充实战斗连；4. 坚持多拿步枪，配以机枪和白刃，减少短枪；5. 订定保管武器的特殊纪律，对损害武器者予以最严厉处罚；6. 师旅建立主力团，团建立主力营连；7. 人员武器调动采取严格主义，不经批准，不得带走和私相授受；8. 收集子弹壳，节省弹药。

（三十三）建立后方勤务及兵站联络等工作。我们指挥员均有临阵勇敢作战的政治优良的素质，这是革命军人的本色，可是常常于战斗前后即忘却后面还摆着一大堆，不去管他。另外任何战斗中均感觉各部通讯联络差，然而纠正的很少。要知道前后联络不好，即无从协同动作，而后方无人管理，必会影响前线陷于失败，并常常发生我军人员误落敌手的事实。比如今年三月泰州讨逆之战，即不止一次发生此种过失，这由于平时没有养成注意后勤和通讯联络工作的建设，临时自然手忙脚乱，应付不开。我们的参谋工作一般比内战时期差些，这是组织能力薄弱之证据。我又感觉通讯联络工作亦较过去为差，比如目前的电台电话材料的补充，比过去便利若干倍，人员的文化水准也比较高，但我们使用时则感觉异常不顺畅，所以有很好的条件反得着很低的效果，完全是一个组织问题。我们部队的指挥传达法太简单，仅限于电讯和徒步两种，应尽量扩充部门，如使用骑兵，使用汽船，使用声响烟幕，使用旗语，利用有线电等等。内战时期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可以进行工作的精神，今天应该保持发扬。目前各部队既然在一定地区，独立坚持，应有独立的后勤工作。各级司令部应有专人负责后勤，各根据地后方工作应有专门委员会和专门机关去管理。

（三十四）军事建设上应注意建设强有力的供给工作。本军供给工作各部队并不一样，有的最好，已达到相当高度，有的造成了良好基础。然而有些部队，在这方面则十分落后，不仅浪费，即贪污腐化现象也正在潜滋暗长，有些部队甚至相当严重。人们常常拿江苏财物较丰富优裕，所以部队就宽裕一些，华北地区贫瘠，所以部队生活艰苦一些来自宽自解。我们不同意这些说法。我们承认环境对于我们有影响这是事实，但我们革命军队不是完全受制于环境，我们还是有改造环境和改造现实的作用，华北部队应作华中部

队的模范，这证明我们领导在这方面太欠缺了。为了整顿供给工作：第一，各级政委应切实负起督促指导供给工作的职责。第二，供给工作本是一个专门工作，设法吸引专家参加并造就专家。第三，老的工作人员，工作是负责的努力的，但技术不够，应重新加以训练；其中坏的应严办。第四，大胆吸引新成分参加供给工作，提高技能。第五，对供给工作人员首先应有政治鉴定，不得把犯错误的人送去，滥竽充数。第六，严格执行预算决算，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全体的本位主义。第七，各级指挥员应知道自己应该遵守预算决算，超过预算决算去支配经济，特别假造预算决策，是违反纪律的。第八，各主力兵团应特别注意保护税源，注意开辟财源，应实行先报数后领钱的原则，纠正那种多领后报的助长贪污浪费的现象，这里一松手便会有几万几十万被乱花乱用。第九，提高并建立本军的经济纪律。本军是革命军队，在共产主义思想下行动，他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贪污腐化的思想行为是敌对的。抗日民主政治是廉洁的政治。本军在抗日民主政权之下是这种廉洁的模范，本军艰苦耐劳的生活，官兵平等的制度便是这种廉洁的奉公守法的革命精神的表现。但免不了有一部分旧社会余毒未除尽的人，寄生在本军中，图谋私利，以公家经费来填满私人的欲壑。这种化公为私的偷窃行为，与本军的根本精神相反，所以对这种人便不能再以同志的态度去对待，这是经济纪律应该特别严格的理论根据。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有原则的去分别处理大小轻重的案件，而且应该进行遵守经济纪律的教育。过去各部队对经济纪律很忽视，或者等同于其他纪律之处理，这是不对的。第十，各级供给机关应派遣政委加强政治领导，政治机关应提出健全供给工作的政治保证。

（三十五）卫生工作在军事建设上应提到重要的地位。本军卫生工作抗战以来吸引一批专家参加领导和主持，业已使本军卫生工作较内战时期有所改进，那种设备简陋、缺乏科学性的医务，已走向科学医学的新阶段，确定了采用科学新医学的原则。但由于人才不够，设备不全，环境流动，所以卫生工作仍处在不健全的状态中。目前应采取下列办法：第一，确定卫生工作应以集中前线、面向连队为主，则建立几个后方医院是必要的，但应按照可能去建立。第二，确定保健在先，医疗在后的卫生工作原则。第三，对内战时期的卫生工作承认其技术落后已无再固执的必要，但那种无医无药的勉力救护精神，火线上与全体官兵并肩奋斗的精神，对伤病员的革命友爱，尽心抚慰调治的精神，独立收留落伍伤员利用民家边地保护伤员不畏强敌的精神，是革命精神的最高表现，这种精神是与一般人道主义的医学有革命非革命本质上的区别的，必须将这种革命精神与新的医学结合起来，建立全新的卫生工作。第四，承认医生与护士应该是分业的，不应该以强制手段，去破坏此种公认的科学规律，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中把医生、护士形成两个阶级，互相对立，此种习气必须克眼抛弃，提高护士同志的政治地位，使其安于工作岗位。从护士转为医生，一般应经过医学学校的学习阶段。第五，确定本军对待专门家的正确态度。马列主义是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之建立是集合人类历史科学思想之大成，没有现代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马列主义决然不会有那样丰富的内容，所以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不断吸引在马列主义的宝库中成为马列主义的构成部分，马列主义是总括的去研究人类自然历史社会的总结，所以他有正确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抓住了具体，也了解全盘，他包括自然科学的正确法则。因此凡是真正忠实于科学真理的科学专门家，

只要他真是深入具体地研究了一个部门（比如医学），他就能够深入了解其辩证规律，将达到与马列主义吻合的结论。但专门家的缺点多半是只看见树而不看见森林，除本行以外便毫无知识。统治阶级为了发展生产，需要高技术，就利用他们埋头苦干的专门化，不供给他以任何专门以外的知识，同时那些专门家在历史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研究，他个人对自然的作用“专行”这一部分，虽努力求真理，而他所处的人对人的作用（社会关系）这一部分，则完全受阶级成见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剥削意识的支配，他每天吃饭消闲看报生活接触都由统治者供给他们，他在一种不自觉的情形受了成见薰染，所以专门家和科学家不可能超政治超阶级，所谓科学的中立性的夸耀，乃是统治者利用他们埋头服务，不管外事，免得多事的一种愚弄。但科学家因为努力求真理，发现真理后，其专门研究常常与其自己从统治阶级方面得来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矛盾；自己的专门部门是想努力求真理，日与马列主义接近，但其从统治阶级所陶铸的社会意识常常要求蒙蔽真理，而日益离开科学，这样，科学家常常分两类：一种是替统治者服务的，一种是替革命服务的，其原故在此。马列主义揭穿了统治阶级蒙蔽真理黑幕，不害怕真理，靠真理吃饭，将历史社会自然各方真理贯通作总括的研究，解决其连锁，所以真正为真理奋斗的科学家专门家必不会反对革命，必会离开统治阶级的蒙蔽而同情并接近马列主义。如达尔文与马克思的故事，如罗曼罗兰、爱因斯坦之反对法西斯专政，同情苏联。同时真正的马列主义，必不会反对科学，并要提倡科学，给科学家专门家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帮助其作深刻的研究。因此现在资本主义各国为了进行战争之需要，不得不去发展技术科学外，一般科学艺术文化的发展，均被其窒息。而在苏联反而各种科学均有飞跃进展，开始了人类文化的新时代，这就是只有在马列主义领导下科学才能充分发展的证明。有些专家认为共产党是反对科学的，乃是一种误会。有些专家们忽视政治的倾向也是不正确的。另一面某些同志想用行政手段，去干涉专家的专门业务，这也是非科学的态度，不知道从总的政治领导去说服和帮助专家们，不知道尊重他们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不知道在专门技术的内部，应服从他本身的特殊规律和习惯，而不应该强迫去改变。我们应这样正确的来反对这两个偏向，结束过去皖南时期的争论，开始新的工作。我们要求吸收大批专门家到本军来服务，如医学家，财政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军事专门家等。我们相信在我党正确领导之下，

这些专门家一定能得到他自己的发展，本军亦可以取得大的帮助。对于专门家的待遇应有必要的生活改良，但我们不拿什么优厚的俸金来收买专门家。事实上能来本军的专门家，必然是同情革命的没有雇佣性的。

（三十六）军事建设应该加强行政工作与事务工作的领导，纠正部队中轻视行政工作，事务工作，甚至有人以为强调行政工作，就是学资产阶级那一套，或者把事务工作，当成无足轻重的粗俗劳动，是与革命无关的事情，这些说法是不对的，行政工作是解决上下级关系，军队直的指挥系统和解决军队同级各部门横的系统的协同动作的组织手段。他用命令通报训令呈报的方式，经过各部门的专管与协同来处理全盘工作。所以行政工作，在实施领导方面有极大的组织作用。行政工作是军队指挥和处理复杂问题的线索；拉动这条线索，就可以拉动全部。目前部队中习惯于个人指挥，一手包办，不讲程序，不讲手续，自由凌乱的现象，只有加强行政工作才能改变现状。部队每日行政会议应该开，一件呈报，一件训令，必须经过首长核定，再转交

各有关部门去办理，办妥善后再发出并追究其结果，这是一面。另一面这个待办或已办的文件，应有存根，应归入档案，工作人员应熟悉其内容，以备他日检查。军队里的一支枪，一匹马，一个人，其来历，其工作分配，其工作分配后情形，和其移转介绍，均用行政工作的一定表格表示出来，按一定章程去处理。行政工作弄得有条理，有系统，才便于首长的掌握和指挥。就是一件废物登记，指明其来龙去脉，这样严密的工作方法，就可以使得部队任何角落不能发霉生锈，不能掩藏任何坏事物，保证部队巩固和安全。现在部队中自由支配人员，自由支配武器，自由支配经费，一无报告，二不经过批准，三则无法查究，四则大家不負責任，正是无行政工作的结果。假使在友军有行政工作的话，正是其长处而不是其缺点，我们当然不要完全抄袭他，应去掉其“等因、奉此”的繁重手续，采取简要明了更直接的方式。另外事务工作如部队副官处、管理科、事务长、勤务员、饲养员等工作，所谓每人日食三餐，夜眠八尺，这是每个人在从事军事政治活动之前必不可少的，可见其重要性。但正因为太平常便一直被人忽视，事务工作中如接人待物，送往迎来，是对外团结人民，团结友军的桥梁，对内是处理宿食、健全身体、巩固战斗力的起点，这些工作仍带重要性原则性。这些工作是党应该去指导的，是各级军政首长应该去关心指导的。努力事务工作同志应该受到全军的重视。希望一切事务工作同志安心职务，放弃改调工作的思想，能把事务工作做好，正是一个革命家应有的锻炼。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风，就是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事务工作精神之结合。

（三十七）最后，军事建设应该特别强调执行命令，而且是坚决执行命令。本军集合各地区的力量，造成大的兵团，最初不合手，无共同工作共同作战的习惯，独立搞惯了，无执行上级命令的习惯，终觉得命令是一种拘束，甚至借口实际情形来抵销命令，将命令打折扣，这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坏现象。第二种以为军政机关命令与华中局党的命令是不同的，采取不同的态度，殊不知应该拿服从党的命令的精神来服从军政命令，乃是必要的。军政机关正是华中局信托的指挥机关，是委托他来指挥全军的，对立起来看是很大的错误。比如皖南部队即由于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而失败，所以中央特别在皖变教训中引伸服从军委命令的重要性。在本军范围中明显违抗命令的事，可以说没有，但可以对命令不理，打折扣执行乃是常见的事。命令有关于发展方向、作战方针、整个工作部署方面，也有关于日常生活工作的方面，司令者是就全军情形及局部情形来下整个命令，是要求协同动作，某部不执行即会影响全部，造成失败。另一面还有一种自高自大，以为自己很对，很有本事，搞出一个局面，因此对命令指示含着一种怀疑不信任的心理，以为未必比我强。这种现象不纠正，任其发展，必致走到违抗命令，陷于失败的前途。固然在指示中也有不适合的情形发生，这是可以容许商讨的，

但这仅指训令及工作指示而言。所谓商讨是指准许请求改变和回训，在回训未到之前仍应执行，不得借口拖延。但对命令则应坚决服从，坚决执行。

## 六、建军中的地方武装建设

（三十八）在华中建军必须首先确定地方武装政策。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广大地区上进行，敌前敌后，造成无数的大块小块，犬牙交错的游击地区，武装人民独立参战是我党的抗战主张的重要政策之一，这与某些集团剥夺人

民武装抗日的权利，是根本相反的。

（三十九）地方武装是不依赖主力来担负保卫家乡的任务的，这里确定了地方武装的独立性。地方武装须得到主力的帮助培养才能有所成就，主力须得到地方武装的协助，始不致孤立，这里便确定了地方武装与主力互相依存性。地方武装是主力的外围和助手，是主力的追随者，地方武装的建军任务，是逐渐提高自己，变成主力。

（四十）地方武装虽是人民的武装抗日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只有真正抗日的民众才能够享受。一切靠抗日发财，一切借抗日谋私利，拿着武装不参加抗日，转而压迫抗日人民，或者暗与敌伪土匪勾结，借以达到拥兵自卫的人，则断乎不能容许其手拿武装；必须服从抗日政府抗日军队的改编和指挥，否则解除其武装。

（四十一）人民自卫队与青年队是不脱离生产的自卫武装，男女老少在一定的年龄均应参加自卫队、青年队或妇女队。以旧武器为主，应该普遍成立，发挥其抗日锄奸，巩固治安的作用。数百万人民的自卫队与青年队，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雄厚基础和后备队。

（四十二）承认人民武装抗日的权利，是抗日民主政权的特色之一。但我们不赞成强迫抽壮丁的兵役法，我们赞成以自愿原则扩大部队的志愿兵制。因此承认人民自愿队、地方兵团、主力兵团三个阶梯，首尾相联起来，是发动华中全区域人民尽兵役义务的正确办法。

（四十三）华中人民武装在本军扶植之下，在几年来斗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许多部队已过渡成为新四军的主力之一，过去是在地方党部或军队直接领导之下遂行这一任务，目前斗争局面开展，许多独立区域的根据地业已形成，这里要求有独立的地方武装的指挥系统，即是斗争形势已提出建立军区、军分区及县、区政府军事工作部门的新任务。这一任务能够做好，即可保持主力兵团的战略机动性，即可奠定根据地治安的基础。

（四十四）地方武装人民自卫队的军区系统，仍然是与主力兵团一样保持党的绝对领导权。几年来的经验，各游击区域的地方武装凡没有党领导的部队，平时尚与新四军维持友谊，遵守抗日纪律，一到形势紧张，即转而危害抗日人民，向新四军进攻，并拖到敌伪方面，或者变成土匪。因此我们根据血的教训，必须坚决主张在地方武装、人民自卫武装中，党的领导权应该保持，一切武装均应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有坚持抗战的保证。自然还有一种同情我党的友军，或与我党协作的外围军一类，那是例外，我们当然不能强迫其接受党的领导和指挥，但主张建立密切联系，互相信任共同抗日。

（四十五）在独立的大块游击区设立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统率全区武装。他是一个战略的独立作战单位，下面可根据实况如敌情、地形、交通等条件，设立分区，再下则设县自卫部队、区大队、乡保中队等，县、区自卫队即可作为政府军事部，负责领导武装工作。

（四十六）地方武装的战斗任务是配合主力作战，独立负责巩固边境和保卫后方。地方武装应首先组织基干部队作为骨干，来引导其他部队的前进。地方武装的建设一面应大胆收罗，一面应加强政治领导和成分洗刷。人民自卫队应组织脱离生产的模范队作为骨干。地方武装的战术应以游击战为中心，人民自卫队以破坏道路和桥梁，捉拿敌探，封锁消息，协助主力为战斗任务，军区、分区应特别着重边界工作，注意敌伪工作，着重锄奸工作及部队政治工作。



（四十七）目前主力部队应以培养地方武装为主。地方武装编入主力应得军部批准。先建设了数万地方武装及数十万人民自卫队，主力才有可靠的陆续的补充的基础。反对地方主义，因他不引导地方部队向主力转化；反对皖南时期主力对地方武装连根拔除编入主力的政策。

七、建军是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斗争（四十八）建军是全党全军的伟大运动，必须首先克服现存部队中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各级政治机关应领导各部队的思想上的严格检查。党的政策和党对军队建设的主张是测量一切的尺度，对建军的各种障碍必须扫除。全体军人都动员起来，都努力建军工作，才能保证建军工作的进行。应该以师为单位独立进行建军工作，开各种会议，制定具体计划，决定到本年底为第一期工作计划。可首先进行全部队的点验工作，指定主力旅，团作建军的推动模范；采取竞赛突击方式，逐渐转为经常工作，以建军运动去推动扩大部队，巩固部队，去保证反“扫荡”的胜利。

（四十九）建军是伟大的组织工作。建军是全体的政治动员。动员后不应放松的是经常的组织工作，督促、检查、汇报、总结均必须每周每月按期举行，按期上报，并在各部队互相交换经验，制定各种工作条例和章程。本军在创造过程中，决心在第一期建军运动，综合各部队的经验，来进一步解决编制和各种法规及工作方针、战术方针，我们不以现有的为限，在建军运动中去深入理解和创造。

（五十）建军是伟大的学习运动。建军中心在进一步提高本军，进一步提高干部。因此发动伟大的学习运动，特别是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有决定意义。政治上学习马列主义与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军事上总结抗战经验，加紧战术理论学习和实战演习。行政上则强调实行八大制度，加紧事务工作。对干部则以提高党性锻炼与军事理论素养为中心，对全体军人则以服从我党绝对领导、加强政治军事教育，坚决执行命令，尽忠职守完成任务为斗争目标。

（五十一）本军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成立到现在，已经三年零十个月了，中间经过无数次的事变和艰苦奋斗。皖南事变是本军完成大兵团的转折点。在中央及华中局、军分委领导之下，全体军人应认识新时期的需要，以新的眼光，新的精神，来进行建军运动，团结全军像一个人一样，立即开始工作。

## 关于参谋工作的职责与认识 (一九四一年冬)

### 第一部分参谋工作的重要性

参谋工作是部队的灵魂，不但我们党军中需要这一工作，就是在过去许多的朝代也同样需要。没有这一工作，军队就不会打胜仗；谁轻视这一工作，谁在军事建设上就一定失败。为了证明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将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名的几件事拿来证明：

(一) 过去在中国汉代，刘邦战胜项羽而有天下，刘邦是当时封建王朝斗争的最后胜利者。当刘邦与项羽争霸时，项羽每战皆胜，刘邦连败七十二次，而最后九里山一战成功。战后论功行赏，刘邦自以为所以能最后一胜而取得天下的原因，是张良、肖何、韩信三人的功劳。张良是当时的军师，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肖何掌管后方勤务，供给军费；韩信是一员将材，掌管人马，指挥全军作战。这三个人的三种工作，以张良的工作为第一重要，因为一切胜利的获得，都是靠张良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把握战略、战术的原则与发展，定出适当的行动计划，否则韩信虽有将材，也不会取得胜利。这一故事，就证明了参谋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张良就等于现在的参谋长，他是刘邦最大最重要的助手。

在每次战斗中的胜利，名义上是指挥员在前方指挥得当的功劳，但基本上还是参谋工作的成绩。因为胜利的获得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在军事上一定要靠军队训练得好，战斗力强，战时的侦察警戒严密，作战计划周到详尽，部队的调动适宜，给养、卫生、后方勤务等有保证，然后再把指挥员适当的指挥加进去，才能取得胜利。所以参谋工作对军队战斗的胜败起着决定的意义。

(二) 三国时代的刘备，手下猛将很多。但在诸葛亮未来以前，老是打游击，没有什么根据地，东奔西跑，不得安闲，猛将虽多，也无能为力。后来得了军师诸葛亮，才定下“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西取四川”的战略方针，才打下了天下，所有猛将，在诸葛亮“运筹帷幄”之下，才发挥了威力，否则专凭勇敢尽力，打一辈子也打不出鼎足而立的形势。可是后来刘备不听诸葛亮的话，兴兵伐吴，结果七十万大军惨败，演出了白帝城托孤，结束了刘备的一生，最后还是由诸葛亮顾大局，东和孙吴，南征孟获，北出伐魏，才维持了刘家天下。

这一故事，就证明了在战争中，要有能训练部队，照顾大局，把握战略战役的方针，靠冷静头脑想问题，布置工作，准备一切，制定计划的参谋人员（也就是拿鹅毛扇子的人物）；否则尽管前方有大军百万，没有健全而坚强的参谋处，还是不能打胜仗。所以决定胜负还是参谋的工作。

(三) 现代外国参谋处的例子（略）

(四) 中国现代参谋工作的例子（略）

### 第二部分参谋工作者修养品格

一个参谋工作者，起码要有共产党员的修养，此外还要有参谋工作的修养。所谓修养，就是锻炼你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道德，

待人接物的风度，对人对事的品格。以下专指参谋工作者的修养与品格

来说：

参谋工作人员应有的修养品格：

一、任劳任怨——参谋工作者应有任劳任怨的精神，凡是艰苦的事，受抱怨的事自己担任，多作事，少要东西，多埋头苦干，不出风头，不图享受。我们党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政党，正是因为我们不居功，牺牲自己一切，为全人类谋幸福；正是“前人植树，后人乘凉”。一个参谋工作者，一定要有任劳任怨不图名利，一切为了革命工作的精神。

党对事物的观察最敏锐，最明亮。革命是长期的，你有才干终必被党发现，用不到急躁，不要总见到某某人提拔得比你快。要知道才德不够，举得越高跌的越重。百尺高楼从地起，小有才不成大器。也正像跑马厅跑马一样，开始跑得最快的，也许就越是慢的；只有最后的胜利者，才是快马。孔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也正是这个道理。

参谋人员要愁自己的思想意识、吃苦耐劳不够，想法使自己进步，不要嫌自己的工作不随意。有的人愿当团、营长不愿当旅参谋长，愿当旅长不愿当师参谋长，这就是要出风头，投机取巧的心理，一有权位就一定坏事。我们大家要学习炊事员同志的精神，因为他们任劳任怨，作出饭来大家吃的精神，合乎共产主义的原则。出风头，争权夺利，投机取巧，都是非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二、要修养到能注意重大的问题，也能注意小的问题，能注意到远的问题，也能注意到近的问题，能注意到全盘问题，也能注意到部分的最细致的问题——这就是思想方法的锻炼。

参谋工作是最精细的工作。例如战斗统计的数目字，命令上的时间与地点，粮食的计算和供给，对于一切文件的细密等，都是不能有一点错误，稍不注意，就会影响到全军的胜败。过去我们在井冈山游击时期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当时力量很小，只有几千人，被多数的敌人连日连夜的追击，大家都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队伍会被敌人消灭。有一次，我们已经脱离了敌人，到了一个群众条件较好的、附近三四十里又没有敌情的地方，大家以为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所以大胆大睡。到了半夜，有一个参谋起来解手，听到老百姓说某处到了军队，这个参谋就立即报告首长。于是又派人去侦察，果然确实，队伍遂立即出发，结果我们队伍在敌人层层包围中夜间脱险，由几乎被敌人围歼中转移。由这个例子，我们就很可以看到，假如这个参谋同志不注意不报告，队伍可能遭受大的损失。所以虽然是小问题，而埋藏着大危机，所以参谋工作者对于小问题的观察，应如猎犬敏感，粗枝大叶是不适宜参谋工作者的。我们一定要周到细密，有远大的眼光，从整个全盘上着眼，又不放松一点一滴的小问题，把大的、小的、部分的、全盘的，小到部队中的枪支，大到国际上的时事，都能抓到我们的手里。同志们对这一点一定要苦修苦练，苦下功夫，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修得成的。

三、工作态度。参谋工作者应有虚心而又负责的工作态度。凡事多请问别人，多听别人的意见，多请别人帮助，多帮助别人，不轻易多讲话，说出话来要负责任。虚心与负责，两者是既虚心而又负责的关系，否则只有虚心，便成了毫无决断的人；只要负责而不虚心，就必然是到处指挥人家，管理人家，和人家关系弄不好，主观主义，也就会到处碰壁，使工作没有成绩。

四、生活修养上。把参谋工作的生活变为终身奋斗的事业，造成参谋工作的专家。对参谋工作的态度应当像科学家研究科学的精神，准备三十年、

二十年，总结自己的成绩。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精神，才会把工作作好。

### 第三部分参谋工作怎样作法

参谋工作怎样作法的问题，很广泛，在这里我只提出来一个基本上重要的问题来讲，就是“参谋工作的关系问题”。军队好比一个复杂的大机器，互相间的关系弄不好，各部机件就不灵活，所以这个问题是参谋工作怎样作法的主要问题。

一、与首长的关系——站在帮助首长的立场，健全、调整、改善相互间的关系。对首长要服从，但也要有“强谏”的责任，并不是明明看到首长把问题处理错了，你也不作声，要有“请求”首长采纳正确意见的责任心。

二、对同级的关系——对同级的同事们或同级的各机关，采取帮助的态度。因为你接近首长，对于军队的行动、作战的部署、需要的物品和时间等等都先知道。根据首长的意志和企图，以正确的预见性，帮助各部门的工作，考虑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种帮助是带有指导性的，但并不是一手包办。要与各部门取得密切的联系，一点都不能忽略。例如我们某某部队，在敌人“扫荡”时，部队转移了，没有通知卫生机关，结果被敌人俘虏，这都是血的教训。

三、对下级的关系——应当是严格的督促和检查，对工作不讲价钱，越是对下级的帮助应越多越大，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问题，替他们想办法。

总之，对以上三种关系，应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则工作关系就一定能弄好，工作就一定有成绩，一定能完成任务。

## 黄桥战斗总结 (一九四二年)

一、战前的情势是这样的：苏北的磨擦战，三个月来已打了七次（一次打郭村，二次打姜堰，三次打营溪。而北边八路军也打了四次王光夏[1]），但都没有结局。虽然击溃了韩德勤的主力，但没有消灭他。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未开拓，新四军的脚跟未踏稳，与八路军未联系。

二、因为国际关系的影响（滇缅路封锁三个月，德苏关系有改善可能，又因为鹿钟麟[2]在华北磨擦失败了），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结束，全国宪政运动[3]高涨，但苏北韩德勤却未放弃其反共主张，形成苏北与全国范围形势之矛盾。党中央当时指示我们要尽量与韩德勤妥协，赶快结束苏北战争。局部的策略是不应该违背全国策略的任务的，所以我们也提出加强团结的口号。但中央的指示是全国范围的，全国性之任务，必须要在局部地区按具体情况来实施。有人以为全国反共高潮已去，苏北韩德勤也不会反共了，这是不对的。当时韩尚有七万军队，有两万是主力，存心要消灭我们，所以我们仍要有战斗准备，要准备军事行动。韩德勤如果要进攻我们，我们要积极的自卫。这还不够，我们一定还要将韩德勤的阴谋本质暴露出来，给全苏北人士知道，这才有胜利的把握，但又一定要不给全国范围以不良影响，不危害当时党在全国性之妥协任务才行。

三、所以当时决定我之任务及作战方针，皆须以退为进。这样可以暴露韩德勤的本质，暴露蒋介石之本质（口是心非），也可暴露我们顾全大局的本质，这样可以争取广大的群众站在我们一方面，使我们斗争能取得胜利。这就具体的表现在姜堰争让这一问题上：首先是韩德勤集中兵力攻我营溪，但结果攻不下，又自己秘密的撤退了。我当时却还以为敌人还要进攻，把兵力集结好而不动，结果等我发现情况，敌人已经跑走了。如当时情况早点知道，我能出击必能歼灭敌人，苏北韩德勤必处守势，当然也没有什么黄桥战斗了。敌人既跑掉，乃在海安、东台一带重新部署，而我虽保住了营溪，但地区太小，无法立足。因此，我就决心打姜堰。一方面估计对韩德勤威胁并不大，另一方面也因为姜堰地区富，税收多，可以解决我们许多困难。战斗结果夺取了姜堰，消灭了敌人两个旅，而且我在经济、粮食等问题上也大大解决了。但是，韩德勤却不肯与我妥协，而且准备向我大举反攻。

这以前，我们尚未曾与韩德勤直系军作过战，打的都是与韩也有矛盾的封建顽军何克谦，所以苏北问题还可以说是一个局部问题。这以后就不同了，苏北磨擦战成为整个苏北和全国国共两党的问题了。因此，像李明扬、韩国钧[4]等都出来讲话了，一共有八县的代表，三四十个长胡子穿长衫的人。其中的确有些人是本着团结抗战的好意的；而像李明扬等中间势力是希望韩我力量均等，他可以在中间立足；有人则和韩德勤有不可分离的利益，眼望韩德勤再打就会失败的，所以也出来劝韩德勤不要打了，韩紫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许多钱都投资在韩德勤的手中，所以也出来劝韩不要打了。另外，有些开明人士则主张我们消灭韩德勤。但不管当时许多人的动机如何，对我都是有利的。他们都跑到韩德勤那边去，韩对他们说新四军如果让出姜堰，什么问题都可谈了，他并且说新四军是最不讲信义的，决不会退出姜堰，劝

---

本文是陈毅在一九四二年所作的《几个重要战斗总结》之一。黄桥战斗又称“黄桥战役”或“黄桥决战”。

各代表不要多费心血。代表回来后都不敢将叫我退出姜堰的话当面说，怕碰一鼻子灰，而我却首先慷慨大方退出姜堰，请代表们去和韩主席接洽。代表遂喜颜大开，大为称赞，忙再去见韩德勤，不料韩主席竟如我料，下命令要新四军完全退出江北到江南去。这一来，代表们都摇头回来。我就特别同情代表们，暴露出韩德勤反共内战的本质，而且我们是退出姜堰。

估计当时韩德勤是要下决心打我们的，而只有李明扬和陈泰运是中间势力，如果他们帮助了韩，我就失败，而且韩也很可以下命令要李、陈出兵夹击，姜堰又是被韩、李、陈三人力量所包围，河网又多，对我很不利，我就将姜堰让给李明扬和陈泰运，一根骨头喂三只狗，结果李、陈态度对我更好，并暗示我，韩要打我。

后来因为陈泰运兵力小，姜堰被李所独占。陈泰运就派代表来问我要枪支，敲我竹杠。许多同志都不高兴，我却慷慨得很，叫代表自己到仓库中去挑选，结果拿去百余支，但却和我订了条约：如果韩德勤叫他打我们，他枪向天开，而我们可不必还枪。

四、军事上，韩德勤以为我退出姜堰是“匪胆已寒”，乃下令一鼓作气，冒险轻进，一共集中十三个团，约一万七千至两万人，其中以八十九军及独立第六旅为主力，他决心先歼灭南边之新四军后，再北上消灭南下之八路军。

我们则有九个团分三个纵队，其中只有三个主力团，共计七千余人，战士只五千人，敌人多我三倍至四倍，占了绝对的优势。在部署上：

（一）我刚刚撤出姜堰，敌人就已经展开了，比我展开早了五天的时间。当时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力阻止敌之前进，而使自己部队迅速集结。所以，敌人一过海安河，即遭我叶飞部之抗击。当时我们多争取了一分钟的时间都是有利的，结果我们兵力集结好了。

三十日展开的敌人到四号才与我主力作战，连日来敌人都与我牵制部队作战，相当疲劳，而且敌人首先皆尽力布置攻占营溪、古溪，而我则先行撤退，敌人均扑了空，士气已较松懈了，敌以为我必已撤出黄桥，所以也更轻视我们了。

（二）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是非常重要的事，而在整个战斗过程中，钳制队之积极动作，完成任务也是很重要的。当时我主力少，照理是应当拿主力来作突击队，我却派主力团（如二团）去钳制敌人，打游击战，任务完成了。

（三）黄桥西南面是有日寇的据点，北面又是大敌来攻，背腹受敌，当时的决心很值得考虑。有人主张集中全力死守黄桥，候李守维进攻失利后再出击。这个决心是有理由的，可以应付敌顽夹攻的严重局面。但是这样就不能决战，最多只能击溃敌人，使苏北战争长期下去，这却与我不利的。所以我的决心是要用全力来包围敌人而歼灭之，对日寇据点则大胆不管，只派少数侦察就好了。只以一个纵队守黄桥，以两个纵队包围敌人而决战。如果战胜了，苏北大局就定，我们也可东进了。如果失败，那就算了。

结果胜利了，当我俘虏到三十三师的麻子参谋长时，他竟伸指称赞说，出其意外，我们竟敢用包围。

如果照前一决心，敌人可以把我国围困在黄桥饿死我们。李明扬虽然接受了韩的命令，一天只向我推进五里，但如我被围，迟早一点也会赶到的，他天天派人来问战况就是如此，他是企图找时机来下手的，鬼子当然也会出动。所以当时我只有迅速解决战斗，才能解决问题。

（四）守备黄桥的三个团，我仍是以两个营出击包围敌人、迷惑敌人，

使我两翼迂回部队得以成功。当时有人反对这样，其实当时战斗重心已经不在黄桥了，黄桥之得失已不起决定作用。两个营出击是对的，结果取得很大的胜利，并且配合了迂回部队的成功。

五、李守维从展开以来的整个部署是对的，其失败之主要原因，是由于平均使用兵力的结果。把十三个团分成五路开进，在最前线的只有五个团，当然便于我之各个击破，如果他抓住了三十三师及独立六旅的七个主力团作为突击队，其他用来佯攻，我恐怕还会被迫退出黄桥，最多也只能击溃敌人，不能歼灭敌人。

六、黄桥战斗之胜利，当时八路军也能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在北边钳制了韩德勤的几个旅。战斗胜利后，我们就打东台，八路军则南下打东沟，一直打到盐城，结果兄弟军会合了，苏北形势就分明了。

#### 注释

[1]王光夏，当时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七旅旅长。

[2]鹿钟麟，当时是国民党冀察战区司令长官。

[3]宪政运动，即“立宪运动”，是争取制定宪法、实现民主政治的斗争。

[4]韩国钧，即韩紫石，又名止叟，江苏泰县海安镇（今海安县）人。早年曾任江苏省省长等要职，告老还乡后，是苏北一位声望甚高的爱国人士，经陈毅多方争取，能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并支持新四军抗战，后被日军毒害而死。

## 华中实战的经验教训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敌后工作与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敌后斗争的特点是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工作，正如内战时期在两个反“围剿”之间进行工作一样，一切工作受着反“扫荡”的影响，且为其服务。

我军从连续不断的反“扫荡”战斗中，强大自己，壮大自己。军事建设工作，地方建设工作，全部都要受反“扫荡”的检验。我们的干部的指挥能力，我们根据地的抗战能力，乃至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战政治面目，也同样受反“扫荡”的检验。故经常研究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经常有反“扫荡”的准备，是我军在敌后的生活规律。故我们要谈几年来的实战经验，首先从反“扫荡”的经验谈起。

华中我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夏季挺进敌后，迄今将满四年。本军对敌伪战斗不下数千次，大小规模反“扫荡”战斗不下数百次。本军地区党政军民在民族抗战中所表现的英勇，产生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极伟大、极悲壮、极复杂、极残酷的战斗场面，非笔墨可以形容。不身处敌后，不亲历战斗的人，是不能体味其艰苦的。我党政军民几年来对国家民族是尽了他应尽的义务的。我军的战绩为敌后地区人民所赞许，为敌伪方面所惊惧，较之全国各抗日友军的战绩并无逊色；且有其本身毫无补充接济、又要忍受着反共磨擦的痛苦的特殊情形。完全依靠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全军指战员的政治的铁的团结，依靠人民的帮助，尤其依靠几万名指战员在前线的流血和英勇牺牲，这样去奠定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坚固基础，使敌伪的多次“扫荡”归于无效，其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很好地总结起来。今天我只提出下列几点，作为扩大会讨论时的参考。

反“扫荡”斗争的具体形势是：在军事上敌强我弱，在政治上我强敌弱。敌占城市，我占乡村，事实上是地域上的一种城乡的斗争。敌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的集中的优势，我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分散的优势。我身在敌后处在敌之大包围中，故我分散才能坚持和生存。敌据点密布，又处在我之分散的反包围中间，故敌要集中才能“扫荡”。分散以巩固其占领区，集中以“扫荡”其攻击目标，是敌之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分散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以突击敌分散的弱点，是我军反“扫荡”作战的有效战法。这是历年来不断反“扫荡”指出的真理。此其一。

“扫荡”与反“扫荡”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此种情势决定了根据地巩固中的流动性，决定了部队正规化的游击性，决定了一切工作的集中领导的分散性。根据地几年来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但其流动的形态是仍然存在着。我们的部队力求正规化，但游击任务仍然是自己的主要任务。故在主力军说是以集团正规部队担任分散游击任务，在地方军说是以分散的游击部队要求走向必要的正规化。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工作，在部署上，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持久的布置，但又必须以分散方式付诸实施。一切工作打算应该是长期的打算；但每一阶段其任务之完成，则要善于争取时间，善于抓住可能机会去进行突击。时间稍纵即逝，乃至不能挽回。要求有相当

---

这是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军事建设》的第二部分，曾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华中局《真理》杂志第十八期上发表。编者在篇名前加了“华中”二字。



健全的后方，但反对大后方主义。要求有必要的工作机关，但机关应严格依照游击环境去建设；超过此限度的大机关，必受损失和挫败。每年夏收秋收是最好组织群众的时机，错过此时机，则一年光阴等于白费，必得推迟，等待第二年。“扫荡”未来前，一切应作反“扫荡”的打算，“扫荡”到来时，一切又应估计到“扫荡”终了的可能去部署。这是敌后环境的工作的规律。此其二。

反“扫荡”的战役战术原则是：发展广泛游击战，但要反对轻率浪战。主张积极行动，但反对盲目硬拚。主张突然袭击，但反对毫无准备及毫无计划。主张保持有生力量，但不疼惜应有的牺牲。主张进攻，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主张转移，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主张防御，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要学会隐蔽埋伏，而隐蔽埋伏是为了创造突击的机会，而不是埋枪卖马式的散伙收队。不取消攻坚，但攻坚最好用偷袭和长围，轻率从事，乃其切戒。自己处在敌之包围中，对敌系内线作战，但力求转到敌人翼侧，争取内线的外线。对敌进攻，采用外线包围，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集中的突破，争取外线的内线。主张分散作战，但不忘记争取有利的集中突击的机会。主张集中突击，但随时具有能迅速分散的打算和处置。必须分散兵力进行对根据地的防卫，但反对分兵把口，以及平均使用兵力。必须独立自主，机断专行，但不得脱离统一的战略意志。主张战略意志的统一，但又不得妨害实施时的机断专行，相反的，更奖励不脱离上级意图的发挥和创造。这是以我军现有的兵种，对强大敌人，当着敌后农村环境，为了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般的军事原则。每一个原则都有它的几个侧面，由几个侧面构成全面。侧面与全面常常构成矛盾，但不能顾了一个取消一个，而是要统一去理解它，去运用它。这就是历年来实战中指证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原则。此其三。

“扫荡”未到之前，迷惑于一时的安定现象，容易产生太平观念，不重视敌伪动态，对敌伪进攻的轻视，忘记了敌后斗争的艰苦。此时领导方面，应提倡敌情观念，纠正松懈、麻木不仁的现象，不忌讳说明危险及困难，并估计着一切而指出克服的方法。当“扫荡”严重之际，受了损失和牺牲，这个时候兵慌马乱，容易产生悲观失望心理，甚至根本怀疑敌后抗战坚持的可能，根本怀疑中胜日败、苏胜德败的真理。此时领导方面，就要坚定不移，鼓励前进，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扫荡”未来前单凭主观愿望，想轰轰烈烈建设一切，布置一切，一切大城市的办法，都想搬到敌后农村中，你不答应他，他即感觉无事可做，无用武之地，以致失望消极不想再干。“扫荡”一来，又神经过敏，单凭主观的恐惧心理，便又取消一切，最好一个光人走路，或打埋伏去。太平时忘记了敌情严重的到来，敌情严重时。不了解敌之进攻受一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不能沉着勇敢去维护自己的工作基础。这是敌后工作经常发生的偏向。此其四。

敌后斗争以及反“扫荡”斗争中，均应了解上面的各种偏向，加以预防和制止。上面各种倾向，都由于不能具体的正确的估计斗争形势，所以不“左”就右或不右就“左”，几乎成为一种工作规律。善于预见事变预作纠正和补救，或使其不致发生，乃是领导方面的事情。

## 二、苏南反“清乡”斗争的初步总结

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及六七个师的伪军，于去年七月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江渭清[2]同志已经报告了我六师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我想这

样的“清乡”办法，敌伪还会继续采用。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应该接受苏南反“清乡”的经验教训，并懂得应付它的办法。我们将有专门的总结文件发表，现在只提到更大的方面。

1. “清乡”运动最大的特点：敌人不仅是靠它的情况清楚，军事力量强大，特别是在政治上的布置，组织上的动员；各种守备队、清乡队、调查队、封锁队、特务组、保甲组的专门训练，费了三四个月的准备，拨出“清乡”经费六千万等。这些部署与一般“扫荡”是不同的。特别更不同的是经过汪精卫出面所主持的。他们有十几年“剿共”的经验，敌寇加以利用。比如“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3]他是个叛徒，直接到前线协助“清乡”，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4]等也亲自到苏州助威。南京伪政府把“清乡”运动视为“和平建国运动”的试金石。如说：“‘清乡’运动的成败即和平运动的成败，即中日合作的成败”，这说明敌伪眼中“清乡”运动的政治作用。同时强调所谓“和平清乡”、“不流血清乡”，在失败后又提出“长期清乡”和“机动清乡”，更看出其政治欺骗作用，更看出敌寇汪伪在“清乡”运动上的配合作用。

因此，我们反“清乡”运动首重政治动员。着重在反“清乡”运动中，组织一致反对敌伪“清乡”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失掉任何抗日方面的同情，丢弃任何方面抗日力量而不动用，想单纯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或仅仅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必致失败无疑。我六师在反“清乡”运动中吃亏的原因，就是把这次敌人的“清乡”看为一般性的战术“扫荡”，看成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忽略其政治作用，这是自己受损失的基本原因。另一面苏南的顽固派及地方顽固分子，顽化土匪和顽化伪军，以及其他杂牌军，把敌寇“清乡”认为是只打新四军，与自己无关，甚至推波助澜，趁混水摸鱼，不愿与我们共同对敌，敌寇也是毫无分别地予以打击，他们也一样遭受了损失。这又是对顽固派的极好教训。

2. 敌寇“清乡”的军事部署，是以敌军担任进攻，伪军担任守备和搜查，敌主力于开始时找我决战，且在极狭小地区突然包围及实行彻底肃清。此种情况不是正面应战能够阻止的。因此，我们对此种情况应懂得转移自己的主力；凡不懂得转移，必中敌人奸计，使自己失败。敌人集中对我某一地区进行残酷“清乡”，其他方面必然形成兵力薄弱，因此我主力应转到敌寇之薄弱处进行突击，或分散进行开辟新区工作。但突击必须极得力，始能影响敌人，并调动敌人，甚至迫其改变“清乡”部署。在某种时候，敌可能不理睬我在其外围翼侧的突击，而仍然主动地专力地进行原定“清乡”计划，但我借此可以开展新区，以我之所得，偿我之所失，使敌得于此而失于彼，两两相较，仍为我之成功，敌之失败。这应该是主力部队在反“清乡”斗争中主要的机动的原则。同时指明所谓突击必须有力，仍须按照一定的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

3. 地方武装及党政民诸方面的部署，须适应主力机动的部署及敌伪“清乡”情况来决定。主力转移或转换突击方向，党政军民之机关亦应事先跳出包围，于此点犹疑不决者必受损失。但跳出包围之时，必预先在当地留下一部可以秘密或灰色存在的工作人员及一部精干武装，留在原地坚持。其任务是镇压叛变分子，稳定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击杀敌伪分散下乡的搜查分子，做各种政治鼓动，继续指导斗争，表示我党我军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对敌伪主力则以避战为原则，对人民则以取得其掩护为满足。对敌寇各种残

酷镇压、屠杀办法，一面领导人民反抗，一面亦应指导人民以灵活办法去麻痹敌伪。在不损害抗战根本利益的条件下，必要的忍耐和以退为进的妥协，是可以采用而且应该学会的。此时切忌硬拚和不讲究策略。对叛变分子与不得已而附敌但不害我的分子，应有区别。前者应镇压之，后者应争取之。留原地坚持之同志和部队，以分散、藏躲、隐伏为主要行动办法。不住村落，进行露营；白天埋伏，夜间活动；选择敌人疏忽处所，去隐蔽自己，造成敌去我来，敌来我去的打圈形势。必要时在敌伪认为其统治业已安定的地方，恰恰可以以秘密工作的方式取得自己之存在，因而可以继续指导的工作。假如说敌寇采用内战“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则我们亦可以采取内战经验去回答敌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是一部反“清剿”的历史。我们能战胜对方的残酷进攻（其残酷程度在某些方面远较敌寇“清乡”更为剧烈），由于我们把握着以地下党的斗争方式，配合着灵活的游击战术，这样就使对方无可如何。因此，游击战术与秘密斗争的综合运用，是反“清乡”斗争留原地坚持的主要办法。4. 根据上述的情况，在反对敌寇大举“扫荡”、“清乡”之际，已提出我根据地应有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区分；应有坚持部分与转移部分的区分；应有分散工作与隐蔽工作的部署；应有秘密工作和半公开工作的准备；应有撤退、转移和随时可以转回原地恢复工作的布置。凡是靠一种估计，一种办法，一种手段，而不知道灵活改变方式和策略以应付当面具体情况的人，必致失败无疑。5. 反“清乡”斗争提出了组织民兵的严重任务。华中各地的游击小组和自卫队是民兵的先声。我们的任务是就原有基础普遍扩大。苏南反“清乡”斗争没有广大人民武装参加，是自己斗争中最大弱点之一。6. 根据上述办法，只要我们应付得宜，指导上不犯大的错误，即有错误能迅速察觉改变，则敌寇“清乡”我们仍然可以战胜的。苏南敌寇“清乡”，在苏常太取得局部的成功，还由于我军的经验缺乏。今后能根据苏南经验采取正确对策，敌寇必无如我何。因此我们应批评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错误估计，即对敌寇的任何行动，都认为“清乡”又开始了，不知道敌寇“清乡”办法，只是敌寇对我进攻的一种，此种办法不是能轻易举行的，它受着一定条件的限制，过分估计与估计不足，均要自食其果。

### 三、水上战斗问题

我三师九旅肃清洪泽湖湖匪的经验，六师在阳澄湖及苏常太坚持的经验，一师二旅在兴化水网地区作战的经验，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于我军战术上有很大用处，于坚持华中河川地带的斗争有极大帮助。我指出以下几点：

1. 河川水网以及江湖地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地形地物，使我们生长在山谷平原，不熟悉水性的人，每每望而生畏。其实是由于无经验，只要我们去研究，把握住其中的特点与一般规律，则河川江湖以及海面仍是可以利用的极好的地形地物，于坚持斗争上具有极大的战略战术价值。我们在华中坚持抗战必须适应这种特殊环境，只要我们肯学、肯研究。

2. 苏北某些海匪常常拿下海的办法企图与我们做长期斗争，由于他欺我不识水性。实际上有陆地的凭借，才能有海上的活动。水之四围都被别人掌握，则水上必不能生存。这是水上活动的基本规律。洪泽湖的湖匪，由于湖之四围被我控制，所以根本覆没，便是一个铁证。今天华中沿海沿湖沿江的陆地优势，均一部或大部掌握在我手上，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组织水上游击，这是必然的道理。

3. 水上渔民船夫及靠岸的居民工作，是我们水上游击和坚持的基本条

件。特别渔民船夫，他们识水性，是水上地形的向导，是我们的教师。我们要在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上，与他们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

4. 教导我们全体指战员学会游泳，学会撑船。在团营部队，登记有这样专门技术的人，平时组织部队进行演习，一回生，二回熟，便不致临时仓皇失措。

5. 指挥几十只民船，载着部队，无论行军作战，指挥员的船只应放在先头，即前卫之后，本队之前。至少河的一岸，应有陆上掩护部队，有较远的了望设置。遇着紧急情况，舍舟登陆，切忌慌乱，否则会自行淹毙。

6. 研制水雷以阻止敌之汽艇，研究阻塞河道、开坝、打坝等以阻敌之运输。对有关居民水利的堤岸和坝口，不应无条件进行破坏或阻塞。

7. 船夫及船只均按民兵编制进行编组，并进行专门政治工作，使他们受相当军事训练，才能达到与我军动作协同。

8. 辎重行李船只应有专门部队掩护，控制在与战斗部队比较远的距离。情况未定不轻易令其前进或后退。

9. 河川分岔处，应派人坐守，指示进退方向。

10. 水上活动部队，任何时候均应掌握船只，掌握桥梁及自备渡河器材。

11. 部队使用船只，应特别爱惜。船夫与战斗员住所分开，一个靠左，一个靠右。船只上应设置必要的步兵掩体，便利抵抗和防卫。

#### 四、对敌伪配合作战的对策

1. 华中敌伪配合作战是经常现象，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敌寇加上集团伪军配合，如李长江、杨仲华等部，证明敌寇的力量变化。他利用伪军取得许多便利，去制造适合于侵略者的社会基础。敌无伪军帮助，敌寇只是一个外国人，异常孤立，有伪军做前导时，则军事政治作用均起了变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不仅假手于当地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常常假手于流氓成分，差不多在侵略初期几乎成一种规律。因此在政治上我们应懂得扩大敌伪矛盾，争取伪军，改造流氓，纠正对敌伪配合的轻视的情绪。

2. 在军政作用上，固然有因敌伪配合而敌力加强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因敌伪配合而更暴露敌方弱点，便于我打击的另一面。比如敌伪互相猜忌，民族仇恨在伪军部队中并不能完全混灭，刺激爆发之机会异常之多。军事上敌伪驻扎均隔着相当距离，彼此应援很差，作战部署上，敌伪配合是极困难的。伪军战斗力弱，便于突击。伪军方面的崩溃常影响敌方全盘战局。把敌伪配合的进攻，给以各个击破，或分段截击，是我们对敌伪混成部队作战的有效战法。某些部队经常只打伪军的办法，增加了伪军流氓性的仇恨心理，逼其专心致志替敌服务，这是不妥当的。首先应制服敌人，打击敌人，以慑服伪军。同时又要争取并打击伪军，以孤立敌寇。两者应适当地配合处理之。

#### 五、反“扫荡”中的部队配合与地区配合问题

1. 反“扫荡”中部队间的配合，党政军民的配合，属于各战略单位的部署和计划，其重点在协同动作。这是每个战略单位应经常留心之事。但敌人的“扫荡”常带突然性，常有使我准备不及的事情发生。敌人早出晚归，或声东击西，如此类临时“扫荡”，则对我危险不大。此时需要的部队间之配合，完全靠各部队首长的机断，来不及等待上级命令。一般原则是应认清敌情，于敌突然前进时，予以可能的阻止，而我军比较大的反攻则应放在反“扫荡”的末期。

2.如果敌之“扫荡”不是临时的，而是大规模的，比较持久的，“扫荡”范围包括到某一整个地区，则不仅需要该地区部队间的战术协同，还要靠毗邻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战略协同。比如去年敌寇大举“扫荡”晋察冀，我一二九师出动援助，获得改变甚至停止敌寇“扫荡”的伟大效果，便是好例。去秋苏北“扫荡”，敌寇北进攻陷盐城、阜宁，我在甫发动反攻，迫使敌寇南调。当敌寇南调，我北面发动追蹙，使敌寇首尾不能相顾，使我由被动转为主动，收着挽救战局的伟大效果。事实上去岁敌七月初开始在苏南“清乡”，七月下旬即在苏北发动“扫荡”，“扫荡”范围包括了整个苏南、苏中及苏北之一部。对付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便提出我军两个地区以上的战略协同问题。敌寇惯伎，常于大江南北互相抽调兵力，故我军应乘间蹈隙，以迎击敌人。在敌“扫荡”地区以避免决战为主。敌兵力抽空地区，则应有较大之突击。敌前进之际，予敌以骚扰。敌退去，予敌以突击。敌之翼侧及归路则派得力部队挺进，予以打击。包括几个地区以上的配合，才能发挥我军伟大的力量。这要依靠我各战略单位首长有照顾华中全局的战略头脑。熟悉具体实在的情况，勇于驰援和互救，才能补救我各根据地分散不完整的弱点。

3.今后华中情况，说明对敌运动战的可能性不大，一般的作战应采取分散作战的方式。但运动战的准备仍不可少。在敌人疯狂“扫荡”之际，予敌以大的打击，是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必要条件，这也是要清楚认识的。

六、民兵战术问题 1.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配合主力担任各种战时勤务，如担架、运输、警戒、侦察工作；一种是直接拿武器反抗敌伪“扫荡”。凡主力到达或有主力驻扎才开辟工作之地，人民参战的表现属于前者。凡在主力未到达之前，由地方党部开辟工作，或主力转移之际，人民即独立地自动地拿武器进行战斗，是属于后者。不断的农民暴动，反抗暴政，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历史的特点。这样使中国人有了武装斗争的传统和实战经验，我们应以研究学习的态度，去发掘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应根据人民保卫乡土的革命热情，根据敌伪进攻情况，帮助人民能单独地进行自卫。不拒绝任何古旧的战斗方式，只要他能打击敌人。不拒绝使用任何旧式武器，只要他能实行自卫。我们有这种态度，必然能发挥华中人民武装抗日自卫的伟大力量。过去在淮海区，在淮南，在路西、路东，在苏南、苏中，以及在盐城沦陷后的盐城地区，先后均有无数人民游击歼敌的光荣前例，我们应该加以研究总结。一般说来，现在还未得到普遍发扬，这是战术上的新园地，急待我们去耕种和动用。

2.淮海区人民在抗日防匪自卫战中，采取坚守围寨，以外壕地道及铁丝网做防御物，以土炮土枪配合钢枪手溜弹做防御火器，用土泥改装房屋，以防止敌人的火攻，房屋内外布置暗藏地道，以备固守无望时，便于自己夜间退出战斗，同时又配合着各乡各村的外围游击的驰援和互救。这是顽强的地道围寨战术的最好发明。津浦路东，来安、嘉山及其他某些地区边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对敌伪采取顽强的自卫游击，背靠我中心区，向敌伪区进击，逐步前进，灵活回旋，终于使敌伪军不敢轻易下乡，陷于完全的防守地位，而我方则取得了巩固和发展边区的胜利。这是属于人民游击进攻的最好例子。在苏中、苏南及盐城地区，人民武装以个别袭击及群众集团围攻的力量，不断予下乡敌寇以打击，不断予镇市上的汉奸首领及敌酋以击杀，这是人民义愤和反抗最直接的表示，同时也是使敌寇方面不可能防范的最好战术。津浦路西定远凤怀一带[5]，有四万至五万人民武装参加自卫战斗，使一切进攻抗

日民主根据地的恶势力，受着不断打击，予我主力军以极大帮助。这是人民参战工作、人民独立防卫工作的范例。

3. 中国革命几十年来的历史指出人民武装斗争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除那种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方式，不属于本题的范围，可以不讲外，一般可大略指出有下列十余种：（1）麻雀阵。（2）回旋打圈。（3）地雷战术。（4）化零为整，化整为零，零整互化。（5）狙击战术。（6）空舍清野。（7）布毒断绝粮食水源。（8）破坏桥梁道路，阻塞河道，改造地形。（9）埋伏袭击。（10）截尾子，捉落伍人员。（11）摸哨。（12）群众混战和围袭。（13）诱敌深入，待机袭击。（14）围寨和地道斗争。以上等办法是从人民单个的反抗到有组织的反抗，一直到广大群众的地方起义和暴动，这中间有广大群众的雄伟的创造力量。在华中地区，我党政军民应从这方面去研究，去组织，去创造，去发挥。这不仅可以在配合主力作战，而且可以在斗争中创造新的主力，担任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今天的各个主力部队，差不多都经过这样的锻炼过程，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 七、应付夹击与反磨擦的自卫战斗问题

1. 在十年内战中，我军有充分的反“围剿”的经验。今天的敌后斗争，基本上是以反“扫荡”对付敌之“扫荡”。十年内战史是一部反“围剿”的历史，几年抗战史是一部反“扫荡”的历史。过去的反“围剿”与现在的反“扫荡”，两相比较，有许多地方相同，也有许多不相同，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应付夹击的问题。此地夹击不是敌伪分兵向我包围夹攻的意义，而是指敌、顽对我的夹击而言，我们应分别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敌顽双方订定共同对我之作战计划。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未全部投降敌寇之前，此种夹击是不可能的。如其公然投降，则等于一般敌伪对我之进攻，更无所谓夹击了。

第二种情况，是敌向我“扫荡”，顽方不顾大义，出兵击我侧背，企图收渔人之利。或者是顽方向我进攻，我进行不得已的自卫，敌方出兵对我，企图讨便宜。此种夹击形势则经常存在，也是抗战时期最不同于内战时期的地方。这种夹击仅系政治上三角斗争的一种规定。在战役战术上的战场夹击，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但在战略上我们则应随时照顾此种夹击情形。

2. 我们几年来有如下的例子：一九四一年夏天，苏南友军某部向我进攻，敌寇出动击我侧背，事实上陷我于夹击的危险情况。因我方早有准备，明白情况，在同一早晨敌顽向我南北夹击时，我早一小时从夹击中间安全走脱，结果变成敌顽双方剧战，这是一种偶然涌现的局面。我方因应付得宜而出险，予进攻的双方以痛楚的教训。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顽方向我进攻，我失败，敌寇出兵截击我突围部队，使我大受损失。这是由于我方事先仅只畏惧夹击，不懂得利用敌顽间隙处，以遂行自己的战略转移，企图逃避夹击，而走入顽方包围中。这种错误的军事方针，使自己遭受惨败。一九四一年秋季，苏北反“扫荡”时，敌占东沟，我留守益林。韩德勤以六团之众进至管计沟附近。敌我相距七里，顽我相距十里，我处在敌顽中间。因我坚决抗敌，逼敌撤退，顽方见无利可图，亦自怯引退。一九四一年黄桥战斗，李守维大军向我进攻，兵临城下，泰兴敌寇亦以数百人驰至黄桥西关十五里处，见我有备，又因当天见李之覆灭，敌亦引退。一九四一年夏，某方大举向我进攻，我在淮上应战，宿县敌寇即出兵击我侧背，我两面应战而致失败。这些例子说明华中抗战的特点是：要求我军在作战部署上，应有两面作战、不怕夹击

的本领。要求我军应学习应付夹击和具备应付夹击的战斗精神。其指导原则是抓住主要方面，把其他方面视为次要。当我们在主要方面取得胜利时，即有了全局的胜利。切忌东张西望，进退失据，顾此失彼，造成全盘的失败。

最后，我们对友军一律以民族大义争取其共同抗战。我们应向附近友军号召共同分担抗战任务，互相援救。当敌伪向友方进攻，我们绝不乘人之危，且自动加以援助。当我们与友军共同配合抗战，分担抗战任务时，在总的战斗任务之下，我们独任一面；如若混合担任一面是不适宜的。当敌伪向我进攻，我们不拒绝友军的援助，但绝不期待友军的援助。

全军任何指挥员，均不得擅自向友军挑衅，应严格遵守党中央的团结友军共同抗战的政策。当某部友军不顾大义向我军进攻时，我军应用各种有效办法去促其觉悟，使其翻然改图。只有在他们毫不觉悟仍然进逼时，我们才站在坚持抗战保持抗战实力的立场进行严肃的自卫，直到停止其进攻为止。一到其反共进攻被打破，我军应不咎既往仍本一贯的团结政策，力求再度合作，言归于好，这样去表示我党我军主张团结、主张抗战的光明正大的态度。这种办法，是谦逊的，但绝不是示弱，而是维护民族抗战利益的最严正负责的手段，全军同志应共同遵守这一原则，任何反共进攻都会失败的。

#### 八、梅花战术问题（略）

##### 注释

[1]民国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九三八年。

[2]江渭清，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

[3]李士群，浙江遂昌人，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变，一九三八年投敌，力日本在上海收集情报，后投靠汪精卫组织特工总部，官至伪警政部长。一九四一年五月任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后任伪调查统计部部长，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被日本宪兵毒死。

[4]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均投降日本的大汉奸，当时依次为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伪财政部部长兼警政部部长，伪立法院院长、政治训练部部长兼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及“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妻子，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5]定远凤怀一带，指安徽省定远县、凤阳县、怀远县一带。

## 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我们的战略总方针，是统一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目前我们的组织战役和部署战斗的指导原则，仍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之下的运动战。

我们的战斗方式则强调近战、夜间战、白刃战、袭击战、埋伏战等。这是我们主要的战斗手段。一切战斗动作，均围绕着此一中心。

对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战法，我军均应学习和研究。在主力部队应该能全盘掌握，在地方部队与民兵应该特别强调游击战。我军不拒绝采用任何战斗方式，而且应做到能使用和掌握所有战斗方式。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团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到持久的城寨战，均应列在我军研究训练和试用的范围内。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打击敌寇的胜利，均依靠广泛的游击战，辅以必要的运动战。对克服反共逆流的进攻，均依靠强有力的运动战，辅以广泛的游击战及必要的阵地战。对匪伪交通施行破坏战。对敌伪推进据点施行阻击战夺战。对潜伏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土匪和危害分子施行清剿战。对近代新式的高、重、热诸种兵器应努力研究，设法逐渐添加，以改良自己的装备。对旧式的短、轻、冷诸种近乎原始的兵器，则仍不拒绝采用。敌后的复杂的战局，使我们不能不采取又简单又复杂的战法。积蓄力量，强大自己，经常保持自己编制和装备，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积聚有生力量以待有利时机。以上就是我们应采取的整套的军事方针。

对于这一整套的军事方针，德国防大学生、日本士官学生必鄙薄我们为简单固陋，不懂得世界战争原则。黄埔、保定军官必讥笑我们为乌合之众，不符合中国的正规战术。他们必共同预言我们不能战胜拥有近代高度技术的敌人。一个熟读苏联战术的教条主义者，必根据其满腹教条，斥我们为庸俗，为狭隘经验，不能登诸世界战争的大雅之堂。

这一片喧嚷声，在于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懂得在今天敌后的战争的特殊规律。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世界战争原则，但不能拿来同中国战争原则等量齐观。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世界革命战争原则，但不能拿来同中国革命战争原则等量齐观。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中国革命战争一般原则，但不能对敌后战争的环境毫无研究毫无出入去照抄硬套。一般战争与革命战争在原则上具有其同为战争的同一性，可也有其差别性。一般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战争在原则上具有同为革命战争的同一性，可也具有其本身特点的差别性。一般中国革命战争的原则，无疑义的是我们今天抗战军事原则的指导理论，可是运用到当前的敌后环境，又要因我、敌、地形、任务之不同，要求灵活变动，不能划地以自限。教条主义者多半只抓住了战争的同一性方面，故于实践不仅无用且要打败仗，我们十多年来曾经吃过亏的，如果真有所谓狭隘经验的话，则这个狭隘经验应该严格限制在那一类仅固执自己局部经验坐井观天的人，凡主张认识同一性又认识差别性，主张理论与实践联系，主张以世界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又主张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洗练上升成为一般

---

这是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军事建设》的第三部分。曾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新四军出版的《军事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发表。



革命理论的人，那就不是狭隘经验，而正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创造和发展，则教条主义者无反对的权利。世界战争原理是从解决两个势均力敌互有长短的国家间的战争问题出发的，故与我们革命战争任务中以弱敌强的斗争长期性根本不同。世界革命战争的原理，如马列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科学加上在苏联的伟大实践、无疑问可以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指导，可供中国革命的采取和参考。但“大匠能以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这就是说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极艰苦的创造过程，不是背书本，抄条文，画符退鬼那样轻便的事情呵。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以来又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向全殖民地的地位前进了一步。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以弱敌强、以被动对主动的不利状况中。一切战略、战术的课题，离不开解决此一基本问题。要从一切战争原理中学乖弄巧来解决此一不利形势，绝不是说一切原理中业已具体的替我们订有便宜办法，可以一索即得。拿今天敌后环境来说，敌比我强，我之强处仅依靠政治上的真理与人民的帮助。我处在敌之包围中，主动权长期掌握在敌人手上，我们长期处在被动地位。以弱敌强，以被动对主动，以分散对集中，不仅在书本上没有人替我们预备了锦囊妙计，即过去十年战争也没有样样相同可以完全重复的致胜的旧经验。毛泽东同志天才的著作《论持久战》，替我们指示了以弱敌强、转被动为主动、以分散对集中的正确路线。这是得力于二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得力于对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战争理论的研究，更得力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与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战争原理的统一的统一的理解，业已把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中最本质的东西揭发了出来，我们应仔细研究的。我们已驳斥了党外的意见，但在我们党的军队内部是不是都无异议呢？我们以为是存在不同的意见，至少说在执行上、了解上的偏见则异常之多。我们来研究一下，究竟有哪些偏向呢？

第一种偏向是不了解统一的战略意志的领导对今天敌后环境分散作战的重要性，常常拿地方的特殊情况与上级的战略指导对立，或者强调游击战争应该独立自主的一面，来削弱上级的集中领导。比如在整个发展方向上这是全军应该统一的问题，可是过去在某一时期某几个部队中确存在着全军向北而他偏要向南，全党东进而他偏要西进的现象，这就是破坏了全党全军的战略意志应有的统一。意志不统一必造成行动的不统一，行动不统一必遭受各个击破的命运。战略意志的统一是表示政治方针军事方针的领导上的集中性，这方面的集中是分散在敌后环境求生存的起码条件。游击战争的独立自主是表示在上级军政方针之下，应根据实际情况去灵活实现上级给予的任务。游击战争的独立自主是为了实施战略意志的统一的。离开了统一战略意志的独立自主必致失败无疑。战略意志要求统一，而游击行动要求独立自主，两者在事实上构成一个矛盾，但后者服从前者，绝不应把决定方向颠倒过来。自然在事实上也曾发生过个别单位有过分干涉下级工作，使下级感觉指示太多，要求过苛，太无伸缩余地，缚手缚足，大幅度削弱了指挥上的机断性，这一过度集中现象亦应反对。因此，在上级负责保持战略意志的统一时，应多注意启发下级的创造性和机断性；下级工作同志在机动灵活执行工作任务时，随时不忘记上级统一的战略意图，两者互相顾全，才能正确掌握战略方针。关于战略方针、发展方向、制度制定、政策实施和决定用人、行政的大政方针，一般应该属于统一的范围。全军服从军部，军部服从中央军委。关于工作细则、办法、工作实施过程、战场指挥、部队整训、人马调动等，属

于纯粹的组织问题、行政问题、战场问题，则应该在不脱离上级的总的意图下机动的去灵活执行，而且奖励有决断有魄力有新颖的创造。三年来的艰苦斗争造成了全军铁的统一。今天在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上，明目张胆公开与上级意图对立的现象，是基本上消除了。但不切实具体执行上级指示，不仔细研究中央指示。借口客观环境困难延缓对上级企图执行的执行，或者于执行时不坚决，仅就自己部队的局部情况来了解任务、执行任务，不能从华中全局或全国战局来了解任务执行任务，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这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都会妨害党的战略方针的实施，是应该纠正的。

第二种偏向是主观主义的了解，只就部队的一时的顺利发展情况，空喊向运动战发展。只根据主观的愿望、想以主观的几个大的突击来改变敌后客观环境，不了解敌我条件对比，要转变强弱形势是长期斗争过程，还要配合着国际国内的诸条件。这一空喊运动战的错误认识，如不纠正，必然走到轻易放弃游击战争，走上过度消耗自己实力的盲动冒险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向运动战发展的英明指示是有条件的，是指示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是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三阶段论。在初期的游击战争逐渐加强，到第二期以至第三期反攻时期到来，适当时期才能把向运动战发展的口号变为实行的口号。在目前敌伪“扫荡”频繁，且日益残酷，分散作战的要求更多，过早提出运动战方针是错误的。

第三种偏向是机械的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立起来。运动战与游击战均为一种战斗方式，在长大战线与宽广地区上进行对敌的外线速决进攻，便谓之为运动战。在敌之侧后进行机动袭击扰敌，便谓之为游击战。在固定战线上进行持久防御以待机反攻，谓之为阵地战。几种战斗方式完全因敌我兵种、地形条件、任务来决定，不能死板认为大部队打大仗即为运动战，小部队打小仗即为游击战。事实上部队编制大小只是决定战斗方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其全部。游击战的部署常常是运动战部署的一部分。同样，阵地战的持久防御常常是争取运动战的一个手段。同样，阵地战部署中亦应讲究配以外围的游击战，以阻止敌之围攻，而争取战局之能转到完全进攻的地位。同样，游击战仍不拒绝采取集中全力的突击与局部的阵地钳制。各种战斗方式均由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斗方式所演化而来。而且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斗方式又互相浸透不能完全分开毫无联系。比如遭遇战两方企图以进攻方式争取先机而压倒一方以结束战斗。事实上两军相接即便转为固守的一方面或包抄的一方面，仍旧逃不出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斗方式的推演范围。明白这个道理，便不能机械把游击战、运动战分开，而取消其中的联系性。目前我们是以正规军担负游击任务，应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诸种方式联合运用。目前以游击战为主，将来反攻时期以运动战为主，这是可以断定的。

第四种偏向是把保持有生力量绝对化。由于认识到敌后的斗争的长期性，认识到敌我强弱的对比，认识到环境的艰苦和力量的培养和保持之不易，因而把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绝对化起来，应该打的仗不打，应该付的代价不付，造成惧怕牺牲的消极保持的现象，以致丧失时机，错过能够解决以及应该解决问题的机会，结果是图一时苟安，贻将来之大患。不了解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的保持固是坚持长期斗争积聚力量的根源，但若不经过战斗，根据地是无法保持的。从战斗中去解决一切问题是十多年来的宝贵经验。不进行必要的战斗，有生力量之保持是不可能的。今日贪图眼前的小节省，会造成将来加倍的大牺牲的祸患。以一部有生力量去取得胜利，才有可能更大的发展

和保持有生力量。所谓“舍得宝调宝，舍得珍珠换玛瑙”，便是这个意思。当然，把这一观念绝对化一变而为盲动硬拚的冒险主义亦是不正确的。但今天之患在前者不在后者。

第五种偏向对坚持阵地的战略战术意义了解不够，有轻易放弃阵地的现象。目前的某些阵地某些地区的坚持，在今天或许无重大意义，即或放弃也许不会影响全局。可是从远大战略眼光看来，其价值则异常之大，今天的失着会造成将来的极大不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某些地区和支点今天不坚持立即影响全局的事亦常常发生。所以从远大的战略眼光看到将来，必须有坚持阵地的决心。从目前全局着眼，对敌后阵地亦更要提高坚持的勇气，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不出让阵地。党政军民共同坚持现阵地这种教育应深刻进行，主力部队应成为坚持的模范。阵地即或丧失应设法去恢复，这样来表示坚持阵地的决心。内战时期常用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以吸引敌人，我们首先出让许多地区，把敌人引到适当地点再进行反攻，战胜敌人后，再重新恢复阵地。这种战略退却的方针，在我之广大的根据地内进行，其退却仅系一种准备进攻的手段，故是正确的有效的方针。但今天在敌后犬牙相错的环境中，临敌而举行战略退却是不可能的，或无利的；阵地一出让即有不能收复的危险。故坚持阵地应列为第一义，不能机械运用内战的战略退却方针。但所谓坚持不是死守的意义，而是就地游击就地坚持，以争取最后战胜敌人的意义。华中几年来的斗争证明游击坚持无往不能，党政军民全体应深刻领会这一教训。

第六种偏向关于攻坚问题亦存在着不正确了解。我军技术条件落后，特别装备上无重兵器，如大炮；无高兵器，如飞机；又加我军弹药补充接济困难，故根本上不具备攻坚的条件。这本是一般革命军队对反革命统治阶级作战的共有的现象。因此在革命军队装备不全的时期，战术上不提倡攻坚，这是正确的。可是因而得出在原则上拒绝采取攻坚战术的结论亦是不正确的。今天敌后环境中，在我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之下，在我握着农村优势的条件下，对侵入我区的敌伪孤立据点应采取适当的可能的攻坚办法，我方对敌伪进攻亦可同样采取有效的顽强的围寨防御的手段。“地区是我们的，周围人民是我们的，邻近区域是我们的，某方面发生战斗坚持一定时期让各路援军赶到即可歼灭敌人，这是应采取持久防御以及采取坚守战术的理由”。

第七种偏向是某些部队中存在着的行动不积极。经常停留中心区，不愿到边区行动，对掩护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的战斗，视为地方的事情，不视为自己应尽的天职。进行对敌游击时常有游而不击的现象。进行对敌人交通破坏时，常常有破而不坏、毫不得力的现象。进行对敌人扰乱时，常有扰而不乱、敌人并不理会的现象。这些现象常常在边区发现，在某些地方武装中则更严重，对战斗任务之执行，采取敷衍不积极的态度。同时边区部队有时有受袭击的事件发生，由于侦察警戒疏忽，行动不积极，经常停留原地，致为敌人所乘等。

以上七种便是现存的一般不正确的倾向，这是与党的军事方针不能并存的。反对分散主义对全军的统一集中领导的削弱，反对独立主义对总的战略方针的割裂和曲解，反对教条主义对实战经验的轻视和隔离，反对对具体经验的固定化和绝对化，反对组织战役指挥战斗中不脚踏实地、不正确分析情况的主观主义，这才能保持我党的战略战术方针的正确的实行。

## 论军事建设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胡服同志[1]在扩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我党我军今后在华中工作的总的政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同时为了执行这一总的政治任务,又提出九大工作任务。军事建设工作是九大工作任务之一,其具体内容是:“要切实依照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指示,来继续提高主力军,加强与扩大地方军,广大的建立与训练人民武装,建设与提高兵工生产,及正确指挥各种战斗。只有建设强大而精干的军事力量,并培养很多很好的指挥人才,才是我们坚持抗战与争取胜利最可靠的力量基础。”我在报告了华中敌我友三方具体情况及几年来实践经验之后,现在进一步根据这一总的任务决定,来具体提出军事建设的各项工作。

### 一、一年来建军工作的一般检讨

几年来军事工作的成绩和弱点。在胡服同志总的报告中已正确而扼要地一一指出,无须在此重复,但应略作下列补充:去年军部重建后,华中局及军分委建军工作讨论会已指出新四军建设的新阶段,即皖南事变后予本军以严重锻炼和试验,“本军突破了被包围的危境,取得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民主阵地的伟大胜利,本军本身较皖变前反而更加充实壮大,完成了全军铁的统一,由游击兵团提高到正规军团的阶段,由无数小块游击区形成了一片宽广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当时根据这一估计提出建立正规化党军的任务,规定了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地方武装工作作为三大建设内容。同时又指出建军工作是伟大的组织工作与伟大的学习工作,号召全党全军在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正规化党军作严重斗争。这些决定八个月来一股地获得了下列成绩:华中部队均经过相当整训,战斗力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不同的战斗方式均历经试验,本军均比较能顺利进行;各级参谋处工作的建立初具规模;几个抗大分校的创立,先后培养了万名以上干部担负了新的工作,团旅级干部亦有二百余名经过党校训练,在党性锻炼上提高了一步;去年秋季反“扫荡”以来,各部队的巩固程度提高,逃亡大量减少,个别团队在几月内消灭了逃亡现象,营连消灭逃亡现象的成绩则更大,部队中流动现象亦较前减少,部队中保持了半年至一年以上的比较熟练的老战士。这些证明部队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一般的加强。部队人员消耗总数与扩大总数的比例,约当于一与三之比,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编制;供给、卫生诸后勤工作均重新建立,获得成绩;军区、分区各地均先后建立,在不大的基础之上开始武装人民,各地地方武装建立后开始了独立担负保卫地方的战斗任务。以上这些证明部队数量与质量是在继续提高和加强之中。军部重建之际,指明新四军游击兵团阶段的结束,开始正规化的阶段,今后则要求正规化之继续提高,走向铁的党军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的弱点是:某些部队违反党的统战政策的事件时有发生。某些部队中游击习气和军阀习气的残余仍未根本纠正,在实际工作中仍占着上风。去

---

这是陈毅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军事建设》的第四部分,原标题为“军事建设的各项工作”。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曾在《真理》杂志第七期上发表,题目为《论军事建设》。

年一年干部逃亡及犯严重错误如贪污腐化堕落倾向的分子，总数约四百余名，其中团以上干部亦有十余名。部队中对党的政策的实施、命令的执行和对地方关系仍有极大缺点；独立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并未在锻炼党性的运动中根本纠正。轻视军事学习，轻视军事技术，轻视参谋工作的倾向，仍然存在。供给制度极不严格，浪费贪污现象一般继续存在，在某些部队仍极严重。政治工作制度仍未做到完全巩固的地步，不少的政工人员尚未能保持自己在部队中的模范作用，某些指战员对政治工作轻视的倾向仍然存在。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经济纪律尚未能做到严明整肃的地步。敌方特工的破坏仍在不断发现，甚至在个别地方得以售其煽动逃跑的好计，虽然仅限于个别兵员或排、班以下干部，但这种现象仍是极为严重的，证明保卫锄奸工作仍然不够坚强。这些弱点和缺陷，是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具体的斗争对象。我现在根据中央指示再进一步来检讨建军中的思想问题。

## 二、纠正建军中几种不正确倾向

1. 把中央精兵简政指示及中央军委精兵建设指标，看成一般的裁兵，不论时间地点及具体情况，要求主力裁减，这种裁兵论的呼声已在地方工作人员中发现。

2. 把精兵主义认为是扩大主力充实主力的机会，特别借此以编并地方武装，这种论调部分发现于正规部队的工作人员中。

3. 精兵简政是需要裁汰老弱及缩并骈枝机关，结果是一方面并未认真实行必要缩减，某种程度的大后方主义，大行李主义，并没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又有不分皂白缩减一切的倾向，把必要的机关和部门都不设法去保持和建立，以致影响工作之开展。4. 就是形式主义的了解精兵简政，忘记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乃是中心环节。5. 借口所谓华中的特点，认为精兵简政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华中；又有在认为完全适用时，即机械执行，缺乏具体步骤及灵活执行办法。6. 在执行过程中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主力军和地方军，对地方武装及自卫军的努力仍不够，特别对军工生产的扩充，对旧武器的大量采取，则在认识上工作上均未有实际的转变。总之完整的了解中央指示，正确的执行中央指示，实际而具体的以执行情形按期上报，则一般缺乏，这是我们华中各地执行中央精兵简政及军事建设上的共同弱点。我们要求完整而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的根据地建设方针，必须正确认识下列诸方面：第一，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敌后斗争的新阶段，和依据此新阶段所定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新方针。“由于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及我军之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我之斗争方针应当是无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采取一切方式与敌人周旋，其目的，节省与保持自己的实力，不但是武装实力，而且是民众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这一指示是极为明显清楚的，告诉我们必须首先顾及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顾及民力为军力之泉源，军力为民力之掩护。在战役中战斗中应有的消耗和不惜牺牲，正是坚持长期斗争的必要条件，反之，为了坚持长期战争又要在使用力量时对战斗中的消耗必须十分谨慎，十分顾及实力（包括军力、民力）的保持。偏于任何一面，只站在哪一面讲话，或者把民力与军力对立，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截然分开均是不正确的。比如在某一根据地民力、财力、物力动员已达到饱和点，则此时则便不应再强调扩充和大规模动员，宜力求休养生息，即使是最短期的甚至暂时的休养生息均十分可贵。又比如在某一地区，民力、物

力、财力的动用并未达到饱和点或距饱和点尚远，则此时期的迅速扩充和必需数量的动员仍是必要的，此时指导中心则应争取时间，在短期内完成自己实力的充分发展。又如在某一地区，当民力已十分枯竭而军力特别主力更形枯竭的时候，这时候则必须咬紧牙关，说服一切人民，指出保持主力的必要：我们根据地是敌后根据地，无主力掩护则一切安定和秩序无从说起，且有立即沦陷，陷于不可恢复的危险，处这种情况，动员一切力量顾全主力，是党政军民应有的神圣职责，这种指导和决断常常于根据地斗争有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决定意义。估计华中根据地一般状况，则人力、物力、财力之动员和消耗，并未达到华北那样的高度，华中地区之开辟较迟两年，“扫荡”不如华北之频繁，在乡人口与入伍壮丁比例高者仅达百分之一，低者尚在百分之一以下。根据地物力、财力之储藏尚可以征用，裁兵论者，缩小论者是于此点缺乏调查研究的。另一面华中斗争日渐激烈，一般有紧步华北局面后尘的趋势。某些地区如苏南、苏中、鄂豫边区差不多与华北相埒，仅天然富源较优。另一面华中尚有强大反民主势力的存在，随时秣马厉兵，向我整装待发，我于分散游击战外应有大规模的自卫战准备。因此我们现有实力尚在数量上质量上均不够充分应付事变，特别在主力方面急需补充缺额，在地方武装方面则数量发展不大，这乃是华中的实际情况。地区特点论者，并不是真正认识这些特点，而是把这方面片面夸大，不知道华中斗争的长期性与华中根据地的趋向是与华北基本上相同，而中央指示在基本上也是全部适用的，此时提前注意到军力保存，人力、物力、财力的储蓄和正确配备，正有利于长期作战。中央根据华北经验给华中的指示，正是主观的正确指导，能有力地影响到今后斗争的客观发展前途，正是先见之明，能预见事变以防患未然。说中央军事建设指示不适用于华中，借口华中特点，不愿实行必要的裁减，舍不得以一部主力地方化，仅片面强调主力之扩充，忽视地方武装，或强调地方武装重要忽视主力补充，无视敌后根据地游击性之加强和运动战之可能减少，不深切注意到人力、物力、财力之储蓄以及主力之正确使用，这种特点论当然与裁兵论、缩小论同陷于主观主义的泥坑之中。过去皖南特点论即片面夸大皖南特点，否认全国工作在抗战环境中的共通性，借以拒绝执行中央指示已遭受了历史的惩罚，这是不能再重复的教训。最后指出在地方工作同志中一般缺乏培养主力，爱惜主力，顾全主力的观点；在正规部队的工作同志中，缺乏对根据地人力、物力的爱惜的群众工作观点。这两种倾向不扫除，正确执行中央精兵简政及中央军委军事建设的指示是不可能的。

第二，中央军事建设指示着重在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分，同时又注意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正确关系，指出独立建立地方军事机关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某些地区又因具体情况不必有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又指出：“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分、其主要干部，应当是本地的，因此培养当地干部，由地方党选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是一等重要的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均应适应本地情况（即尊重地方性、游击性），因此空喊正规化，把主力军的一套机械搬到地方军中去的不妥当的。”又指出：“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与指挥机关，但主力军帮助地方武装的责任，不仅仍旧不变，而且较前更加增重。”又指出：“在主力整编时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干部枪械弹药等。”这样明确的指示是建立主力军与地方军正确关系的工作原则。在我们华中地区一般说来是地方军数量质量均极不够用：第一种现象是使主力分

散担负地方任务，陷于地方任务，不能进行集团的整训，减少提高主力的机会。第二种现象是在主力担负地方任务的条件下，形成地方依靠主力，主力抽调，地方防务即难于维持。第三种是主力长期担负地方任务，也在客观上使独立生长地方武装的机会减少，在不利环境下，逼着主力消耗于地方任务。第四种是主力在成分上，战斗作风上，工作作风上，均与当地群众斗争联系比较薄弱，所谓“主力始终要走的”，把主力视为客军，以及主力部队某些同志认为部队除打仗而外一切不必过问或参加，一切脱离当地群众，不与当地群众斗争密切联系的客军观点，是或多或少存在着。要纠正这些现象，只有正确执行中央规定的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关系。目前的工作仍处在建立地方军以减轻主力的地方任务的阶段，只有完成了比较强大的地方军的建设，主力始有集团整训与集团机动的机会，主力的缺额补充也才有经常的保证。目前应纠正主力部队专送质量较差的干部到地方军去的倾向，纠正正规部队工作干部不愿到地方军工作，视到地方军工作为降级使用的错误观点。纠正地方党政机关不派遣地方领袖到地方军去工作的倾向。即或派去工作时亦只给以闲职，挂名而已，不下决心予以培养和提拔，因此一般对地方军忽视，对军区、分区工作重视不够，不愿意独立建立，或者在兼军区、分区时，仅视为次要工作部门，仅委托一个地方武装科去管理，或视军区、分区为主力师、旅的附属机关或动员部门，这些观点都是极有害的，目前已到必须彻底纠正的时候了。

第三，民兵自卫军的工作，是华中刚才开始的工作，过去仅有一些游击小组，或参战自卫队如担架队、盘查哨的工作。仅苏中、淮海、淮南诸地区稍有些数量上的发展，比较能担负战斗，因此这一部门的工作经验十分缺乏。目前从实际建立民兵自卫队的过程中去积累经验，去力求发挥和创造，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在认识上，第一应特别指出民兵自卫队的建设是在于加强根据地的武装自卫力量，以造成战争的新局势。弄惯了旧的一套，主力及地方武装孤单单地进行战斗，大大减弱了我根据地的战斗力，减弱我根据地的声势，使得敌伪可以乘我军的空隙，独来独往，横冲直撞，使我军应付敌伪之游击，疲于奔命。特别华中某些地区的土匪猖獗，以及边区匪伪扰乱，于我人力、物力、财力的侵害极大。中心区巩固程度不够，边区警报频起，主力部队应接不暇，地方机关时受袭击，工作人员时受摧残，这就是根据地的战争的旧形势，或者稍为强调一点说就是现存的局势。要将此种局势改观，则非从民兵及自卫队的大量建设着手不可。农村军事化，党员军事化，武装男女壮丁，人人武装自卫，每人拿一件武器，随时准备自卫加入战斗，配合主力作战，击退任何方面的进攻，为保卫家乡而战，为抗日救国而战，为救国家救自己而战。这些口号之具体执行，组织了几百万民兵自卫队走上战场，则我根据地的力量好像铜墙铁壁又伟大又雄厚，我主力部队及地方兵团便如虎添翼似的凶猛，如鱼得水似的飞跃，敌后战争形势必改变旧观，根本解决了自卫问题，根本解决了长期坚持问题，以及造成了反攻的基础。目前的毛病即在对新旧局势的估计不足，即或认识了而没有从民兵自卫队工作去实际着手。第二在于建设民兵自卫军的形式主义，官办政策。不想根据革命的创造精神去解决这一伟大的群众武装自卫问题，而想轻松地利用国民党壮丁训练的旧基础，挨门选派，委派改编，满足于大会检阅的捧场示威，而缺乏实际调查和具体组织工作。无专门工作机关，无强有力的干部去独负专责。把群众武装的严重任务放在其他斗争任务之末尾，经费毫无来源，教育毫无制

度，武器毫无统计和补充，于是使人民武装工作成为空喊。官办政策的表现在不切实依靠人民自卫的自愿原则，照抄国民党壮丁队办法，以命令强制执行。对地方士绅参加自卫队问题，站在狭隘的宗派观点上，拒绝吸收，另一面又完全委任个别对象，听其包办，采取放任政策，结果把广大人民武装权利垄断在少数人之手，使基本群众失却自卫的屏障。第三就是群众武装要求，常常在群众斗争发动之际就自然涌现，不懂得在群众的政治经济斗争情绪提高之际，即联系着去利用斗争热忱，切实解决民众自卫队问题，即或开始了这一工作又限于少数自卫队的狭隘范围，不大胆向全民武装道路上迈步。

第四，军事建设中兵工建设，其目的是具体解决武装问题，目前这项工作满足主力的需要上已开始了相当的工作，获有很大的成绩。但在地方兵工的建立尚未开始，在民兵大量发展中，武器问题便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兵工建设是中央军事建设指示中四大项之一，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尚未提到与其他三大项并列的地位。主力军因有切身需要，故尚重视兵工建设，而某些地方党政机关对兵工建设则尚以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极大的错误。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在友方断绝对我接济条件下，一切应转到自力更生。敌寇以近代技术占强大优势，我们则只有以极大量的新旧式武器，凑合起来，相对地减弱我之装备劣势，以企图在某种场合能转为相对的优势，或局部暂时的优势。依据我们目前的条件，大量制造白刃、炸弹、地雷三大武器是极可能的，如果能几万几十万集团的集团使用，必然使我们的战斗人力加倍改观。因此轻视兵工工作等于残害自己，是必须纠正的；要了解兵工工作比吃饭更加重要。

第五，还要纠正不耐心做教育整训工作和不耐心做组织建设工作等偏向，我们的干部长期生活于游击环境，流动游击，广泛发展，独立应付，大刀阔斧地干是其所长。但另一面即养成不惯于作耐心的教育整训工作的情绪。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部队天天到新环境中去，作惯了开辟的工作，每天能看到自己人枪的增加，胜利的累积；但今天由于根据地业已形成，部队与地区发展受着一定的限制，人力、物力、财力的征调达到相当限度，大规模战斗的减少，过去工作以发展为中心，到今天要转移到以巩固工作为中心。那种习惯于发展、扩大、追求数量的工作热情，必然与力求巩固、力求深入的工作任务发生矛盾。就是说工作中心业已转移，而主观上的愿望尚停在旧的阶段。发展扩大工作是走州过府，日新月异，眼前兑现的工作。巩固深入工作是化验室内显微镜下的耐心研究的工作，其伟大的效果必须在事后甚至在很长时期内才可以表现。我们必须说服我们的干部懂得今天不抓住时间作深入巩固工作，则力量不能继续发展，不能应付新生的事变。过去发展扩大的成果，必须经过今天的精雕细刻的点滴工作才能消化和加强，不然过去的成绩会丧失，过去的努力可能等于白费气力。同时也只有经过今天的深入巩固工作，才能打下将来新的更伟大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今天的深入巩固工作，绝不是消极保守，自满自足，画地自限，相反地乃是充分的积极发展的精神的强力表现。有人说：“给我几百人，让我到某地方打游击去。”“我愿意到前线去打仗冲锋，不愿搞整训工作。”“整训整死人，整训无用，过去不整训有了大发展，今天这样整训，整不出金子银子。”这些观念是我们军事建设的大障碍，必须耐心去克服。我们号召全党全军以反“扫荡”，反磨擦的战斗精神进行军事建设工作，号召全党全军以扩大部队发展部队的前进精神，来进行整训工作和学习工作。奖励整训有成绩、学习有成绩的干



部，处分逃避整训、逃避学习的干部。把整训捷报、学习捷报提高到与战斗捷报一样高的地位。学习、整训、建设工作的落伍者，等于战场上的逃兵。

第六，彻底揭发我们过去整训部队的弱点，过去我们的部队是否经过一番整训呢？我们回答：华中部队差不多都经过初期整训，但时间是短促的，因此整训工作是短期突击，对应付临时情况上获得效验，对根本的建设并无经常工作，一暴十寒，并未能根本改变现状。而且各部队也未十分注意选择整训机会，甚至某些游击师团，一年两年未经过整训的情形仍然存在。过去我们的部队整训，一般趋向是注意战士的整训，全部精力用在战士身上，对干部整训反而忽略。由于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准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影响到对战士的整训，不能在质量上有日新月异的提高。师不高弟子也不强。因此使整训工作变为循环重复，不能高度发挥学习的热情。过去我们的干部整训一般的注意到政治学习，党性锻炼，军事学习竟被忽视，文化学习更未提起。由于文化水准低下，使学习工作仅在门外摸索，不能接近更高的水准。军事学习既被忽视，自然影响到军事技术不能提高。

我们今天的整训工作，是抓住整训机会，用整训部队的方式来进行根本的军事建设。整训不仅限于操课学习，而要将部队编制、制度建设、作风转变、生活改善等围绕着整训的中心去统一地进行。干部间、部队间均采取轮训制度。每个干部每年均应受训三月，每个部队每季至少整训一月，一般行军作战期间的整训还不算在内。整训部队要求有计划性，要求有自觉性。计划不周密，课目不讨论，教员不先加训练，教育进度表发下去就算完事；做完了一期，在办公室内检查一下又算完事，又定第二期进度表，这是官僚主义的整训办法，要根本反对。在整训中主观上有严格的注意，能努力去干，这是好的；可是又发生不注意启发部队的自觉性，用简单的激将法，用惩罚手段，使人人以整训为苦，无法提起整训的积极性，也同样使整训失败。

### 三、军事建设的新方针

在指出军事建设工作各种偏向后，应提出我们建军的正确的新的方针。这个方针应如下分别的提出：

第一，主力的建设方针，就是精兵主义的建设。其内容是：提高正规化的程度，整理编制，充实编制，力求精悍，建立铁的党军。加强整训，建立突击旅团，便利战略战役的机动；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进行适合环境便利坚持阵地的必要的地方化、正规化、精悍化，是主力建设的两大口号。

第二，地方武装的建设方针是：建立独立负责的军区和军分区工作，努力加倍扩大，同时注意巩固和精悍，一年内达到与主力军相等的数目，完全能分担主力现有的地区任务之一部或全部。建立正式的地方军团，提高战斗力，提高纪律，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保护地方群众日常利益，彻底完成地方任务，这是地方军建设的基本内容。提高纪律，行动积极，加强党的领导，为保护地方群众日常利益而斗争，是地方军建设的具体的政治口号。

第三，民兵及自卫军的建设方针是：进行抗日的全民武装，组织并武装男女壮丁。以工人自卫队，农民自卫队，青抗先[2]及模范自卫队为乡区脱离生产的或半脱离生产的民兵武装骨干；再普遍建立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坚决实行民兵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建立各级武委[3]工作，以乡、区两级为中心，农村军事化，党员军事化，武装保护家乡，就地游击、就地坚持，是民兵建

设的四大口号。

第四，兵工建设的方针是：扩大兵工制造所，扩大生产数量，提高兵工技术，利用和改造旧式兵器，至少每分区或每县应有一兵工制造所。专门训练最可靠的技术人才，从雇用外来技术人员，逐渐过渡到自己能全部掌握技术。收集和储藏大批兵工器材，做长期打算，后方生产要力争保证对前线的供给。每人拿一件武器，少吃一碗饭，多造一件武器，是扩大兵工生产的标语。

第五，政治工作、参谋工作、供给工作、卫生工作及其他后方勤务部门的工作以提高和深入业务教育为中心，提高工作效率，锻炼和提高工作能力，建立各部门的协同动作，建立经常工作制度，奠定连队工作的基础。一切工作是为了达到建设强大而精悍的军事力量，培养大批指挥人才和工作干部，以遂行党的坚持抗战，巩固根据地，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总的政治目的。练兵练将同时进行，首先以练将为中心。建设主力军实行精兵主义与建设地方军团实行全民武装两者同时进行。第一阶段以地方军为中心，迅速转到充实主力强大主力的第二阶段。这是伟大的建设工作，我党必须在一年内赶速完成其大部分的建设任务，在二年内应要求全部任务的完成。扩大会闭幕后，我们建设工作立即开始，做出成绩以待来年的检查。主力军与地方军达到相等数量，发展民兵到二百万，其中至少要求有八十万基干队。

四、建设办法和工作 1.整理编制和加强行政工作。部队编制是战斗力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储蓄战斗力，组织战斗力的具体的机构，形式与机构不健全，必形成战斗力的薄弱。人马器材不适当分配处理，必造成组织编制的混乱。平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造成紊乱和空隙，便利特工的乘机破坏。战时则呆板笨重，使非战斗人员与战斗员互相牵扯，不能发挥战斗力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所以严整编制，裁汰老弱，编并叠床架屋的机关，力求部队的精悍，纠正某些浮肿现象，是目前达到正规化精悍化的首要工作。编制的整理是日常工作，是行政工作的中心，经常能根据编制表来检讨人员、马匹、公物的配备、增减和调动，均井然有序，在最不显著的角落，进行特别仔细的清查，这是部队行政首长及其司令部应负的责任。部队编制应按各战略单位的实况作具体的规定。某些地区如苏南、苏中、巢无地区，不应有主力军和地方军之分，师旅两级均兼军区和军分区，其他地区斟酌实情去建立独立的军区、分区，某些主力部队及地方军团应考虑师废旅直接指挥团，旅废团直接指挥营，团废营直接指挥连的问题。按地形、敌情及自己兵种和任务来规定。小团制（五个连）在游击区可多多采用：政策执行，战略配合，干部任命，行动方针，法令颁布，生活待遇，属于华中全局者必须严格遵照军部命令，不得擅自改变，妨害全军统一。凡地区及部队有特殊情形，在军部规定的建军原则行政原则下，采取灵活的不同的办法。这些不同办法是为了达到造成全军铁的统一的目的，而不是借此去发挥其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一切工作需符合全军战略意志的统一，以及在符合全军战略意志的统一下，能发挥游击战争的必要的独立自主，部队编制以机关编制、后方部队编制最感困难，应采取严格主义。清楚认识敌后环境，反对大后方主义及大行李主义。机关编制应按编制表去紧缩，不得随意增减部门及人员。机关部队应保持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三与一之比，应有足够的掩护部队。旅团级机关部门应大量减少，尽可能把卫生、供给部门直隶师部管理，使旅和团成为纯粹的指挥教育机关。后方部门以分散隐蔽为主，不要大规模地展开，随时准备

反“扫荡”。要做到部队编制精悍化，部队制度正规化，首先在各级部队首长自己是一个遵守制度的人，是一个遵守制度的榜样。自己对人员、马匹、服装、经费都能切实遵守制度，一丝不苟，律己很严，才能责人以严，才能改变风气。要反对遇事马虎，杂乱无章。要反对两眼向上，绝对平均主义。要反对个人突出，个人特殊。服从组织，遵守制度，指挥员和党员首先做模范，再影响全体军人共同遵守。为了健全行政工作，保证制度实施，每周应有一次行政会议，作内务检查，军风纪检查，部队公物登记表检查，十大制度检查。新旧指挥员交代工作应在行政会议上举行。行政会议以检查事务工作、供给工作、人事工作为中心，与部队党委及军政委员会工作分开。司令部首长作行政会议主持人，吸引各部门首长及主管科长参加，定期向军政委员会或党政军委员会做关于行政工作的报告。

2. 健全参谋工作，提高参谋工作的强度。现在各级参谋工作的弱点，一在于参谋人员选择不严，缺乏实战经验；一在于各级部队首长对参谋工作的重视不够。去年建军会议对参谋工作特别重视，提出十四条[4]，特别列在军事建设的首位。这十四条仍可作为建立参谋工作的依据。此外我们应颁布参谋工作条例并在制度上确定下来，以便利全军统一实施。苏联参谋工作条例，其基本精神我们可以采用，但其将供给、卫生、后勤诸部门直隶首长，使参谋长仅处于指导地位，此点有改变的必要。苏联红军部队首长仅有军事工作任务，与我们中国军队的军政首长必须兼顾其他工作不同，故我们不机械照抄苏联的参谋制度。中国旧军队的司令部制度，即所谓司令部的八大处制度，降低参谋处在司令部的枢纽地位。这是旧制中特别迁就人事处理问题的特点，是特别便利造成私人统率军队的一种办法。我们军队基本上与他们不同，也不能完全采用他们的办法。我们确定参谋处工作是司令部工作的枢纽，参谋长是首长的代理人，对各部工作，在工作上处于领导地位。此外军事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实行必要的互调，后方工作同志与前线工作同志实行必要的互调，这个办法自然应根据军事指挥员与参谋人员的性能的应有区别去做，不能机械实行。但必要的互调，正可以补足我们现存参谋人员及后方人员无实战经验的缺点，也正可以使许多指挥员有学习参谋工作，增强其统率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机会。最后参谋工作的加强决定于党的领导及政治工作保证。师、旅军政委员会对参谋工作之检讨应列入每周议程之内去。

3. 建立教委工作，以增强业务教育、文化教育，做为建军干部教育的中心。干部的文化教育应包括中国社会常识，中国历史知识，自然科学常识等，但以增强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为中心。目前困难是教材问题，必需专门精选旧有材料或加以重新编订。各部队应办文化补习班使所有文化较低干部轮流入学。可编订专门文化材料使能一期读毕，一直把文化程度提高到能自由阅读和写作为止，在职负责干部的文化教育，可指定专人担负文化教员，每日教二小时，对写信、作文、修辞、写日记、阅读新闻报纸及文学作品等作广泛的指导，要在半年内即可达到比较熟练的程度。我们负责的工农干部同志，他们觉悟性及理解力均强，因具有革命经验及锻炼过的革命立场，他们缺乏的只是文化技术及一般常识。为了不妨害工作且帮助其工作，故用专任教员制更是十分适合的。在职干部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做什么学什么，为工作而学习，使学习与工作密切联系，以造成大批专门家为目的。“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专门干部比较百个无专长的干部，其作用更大。一个人想深入各方面，想使自己成为多方面的人才，这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我们的

革命运动是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伟大的社会变革工作，我们不能拥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大批专门家，我们的革命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我们鼓励干部党员努力去做专门业务的研究。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发动学习军事的热潮，在学习军事时更要进一步去学习总的军事学中的某一个专门业务。部门愈专则范围较小，足够一个人的精力去做具体深入的研究。因为某一部门带专业性，研究的人较少，个人去抓住研究，对个人说成就较易，对团体说贡献更大，使我党我军能拥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使工作更带深入性和全面性。因此我们除使党员干部具有党的一般知识外，还应该使他们每个人具有特殊专门知识，所谓“在一行说一行”，“把本行弄好”，“三句话不离本行”，“家财万贯不如薄艺随身”，这些俗语均有一部分真理存在。党员和干部都有专门知识，结合千万专门知识人才在党的指导下，使党的领导更健全，革命大业更易成功。教育工作在军、师两级应成立教育委员会负指导责任，而以军、师参谋处之教育科为执行机关建立起经常工作，按照军委及总政治部干部教育指示切实执行。对在职干部可用函授制度，可规定教育奖金并特别优待教育人才，奖励业务上的新发明和创造。学习战术理论时要与实战联系，反对教条主义。总结战斗经验时要有理论认识和以理论指导实战，反对狭隘经验主义。观察问题，分析情况，处理战术，组织战斗，教育部队等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不调查即无发言权（毛泽东），要反对主观主义。

4. 提倡基层工作及具体工作的调查研究，制定各种工作条例，以创造本军全部法规。夸夸其谈的多，实际工作的很少。眼睛向上的多，眼睛向下的很少。我们写报告写得多，但看报告研究报告的很少。作报告的人作得多，可是听报告后研究报告的人并不多。会议多，检讨多，而积累整理这些经验传播这些经验并不多。这是我们现有的情形。扩大会号召全军与总的政治任务联系着去研究下层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研究细节问题，将调查研究的结论，互相交换公布。几十万人的新四军有几百个工作需要总结，定成章程，需要一个完善的具体深入的法规作为建军的准绳，这一工作要全军指战员参加。本军各部门的工作，以及每一部门中更小的细节，均有十年来的工作过程，其建立与发展达到今天的程度均经过曲折的道路，是流血的代价，值得我们去仔细的研究和整理。特别任何一个细小工作都包含有争论，对目前均有适合与不适合处，急待解决。每一工作都有十年演变历史，都需要负责人亲身深入连队，以学习态度去调查清楚。以下层工作同志为出主意的人，自己做记录员，完全客观地听他们发表意见，将他们的意见收集好了自己加以总结和去取。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正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是我们高级干部应首先学习的。扩大会军事组起草了各种工作条例，总计有十几种，这些条例一般原则是正确的，而且反映了实际情况，但仍然不能认为足以完全解决一切实际繁难的问题，主张先颁布实行，再于实施中加以修改。我们深信一二年后一定有更完备的东西出来。关于全军的法令制度由军分委决定，由军部政治部公布。各师、旅可不断建议，经过军部决定公布实施。师旅不必独自订定，以免政出多门，紊乱系统。但在各种工作制度的实施，其办事细则和办法，各师、旅均应有独特的创造，以供全军的采用和参考。

5. 加强抗大工作，建立抗大的教育系统，以抗大为训练军政干部、创造军政干部的中心。抗大各分校以训练连、排干部为中心任务，军属抗大总分

校以训练团、营干部为中心任务，各旅、团教导队以训练班、排干部为中心任务。军政干部必须经过抗大受训一期始为合格，建军首先从改造和提高干部入手，抗大应负起这一任务。抗大除训练学生外，应负责培养创造大批教育人才，造成军事教育专家。轮流调全军干部入抗大受训，受训期限延长到一年至二年，学生质量严格选择，质量不合格者勒令退学，宁缺毋滥，纠正某些部队首长专送不好学生入学的倾向。把好干部留下令其长期服务，没有学习和总结经验的机会，不能更大发展；把坏的往学校里送又不能获得学习成效，这样使全军干部质量无法提高，害己害人，莫此为甚。这是对党对革命最不负责任的行为。凡送学生入学应首先选最优秀的入学才是最公道的办法，我军多年来都继续这一坏的传统，于我军人才损失十分可痛。现在应严格纠正。以后尽可能做到指名调训，不准这现象继续存在。教育干部应严格选择，加以特别优待。抗大总分校与各分校建立工作指导系统，每年应召集抗大会议一次，以总结经验，确定方针，改进教育。抗大性质从政治上说是党领导的学校，锻炼党性整顿党风为其基本任务；从业务上说是军事学校，培养军政指挥干部，是建军的推动机。要把过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抗大，提高到建立正规军干部大学的新阶段，要求各地抗大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在教员、学生两方面均应反对学习与教授时的教条主义。教育的教条主义，不在于他根据书本而在于脱离实际的照抄书本，死背死诵书本。学生方面的教条主义不在于他喜学高深理论，而在于他只记字母，只满足于文字的表面，以此沾沾自足，忘记为实践而学习的目的。

6. 审查干部，检查党的政策之是否正确执行和战斗任务之是否完成，巩固政治工作制度。全军指战员服从政治领导及政治工作，强调政工人员的模范作用，是现阶段军事建设中政治工作的中心。政治建设问题由黄克诚同志[5]负责作单独报告，我只能提到一个大概。军队的干部现存状况是需要提高其军政质量。目前的时局需要一批更成熟的高级指挥人才，需要大批比较成熟的中级干部，需要几万初级干部以巩固和扩大干部的基础。为了执行中央整顿三风[6]的决定，政治工作应以审查干部为中心。在审查工作时以提高干部质量，锻炼党性，增强组织观念，选拔和培养真才，清洗混入我军的坏分子，保障干部成分质量的纯洁性，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为根本目的。审查干部是最严正负责的工作，是党员干部政治生命的再检讨和判决。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均对党对革命负严正责任。同时各级干部对上均为被审查者，而对下常常是参加或主持审查别人的人。各级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应切实按照华中局、军分委的决定去实施。此外政治工作还应不放松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的执行，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保证军事学习的发动和实施，保证连队工作的健全，保证各部门业务工作的进步。首先从巩固政治工作制度，强调政治工作人员、特别政治委员的模范作用做起。扩大会建议军政治部颁布政工人员奖惩条例。这个条例颁布后应成为加强并提高全部政治工作的锐利武器。

7. 正确解决军队和地方的关系，造成根据地党政军民铁的统一。军队党首先做到自己是尊重地方党政及群众团体和爱护人民的模范。在军队方面认识自己应该站在拥护地方党政及群众团体的前列。军队不首先做到这一点，必然削弱地方党政群众团体在广大人民中的威信，必然造成工作中的损失。这个损失也就是军队的损失，也就是整个革命的损失。这种认识在军队指战员中应广泛深入地进行重新教育。对地方党政和群众团体的态度是否正确是

判断党军的标准之一。抽象的党军，一般政治观念中的党军是不存在的；活生生的党军，实际存在的党军，是存在于对敌的战斗中，是存在于对地方党政人民的正确态度中。某些人知道在战斗中去表现和创造党军是对的，但仅限于此，以为“天下是我打的。”“先有我然后才有你。”因此“一切我第一，你应服从我。”这样就错了，就违反党军的基本原则。但是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不能完全对军队做片面的责备，在地方党政及群众团体中同样要进行爱护主力，帮助主力的教育，军队是自己的军队，应如爱护自己的眼睛的态度去爱护它，“癞痢头再不好看，总是自己儿子。”军队是根据地的保障，是根据地的支柱，不能把自己的利益与军队的利益分开。最后军队与地方党政及群众团体只有个别的态度不正确，或者个别人处理问题发生某些错误，不可毫无分别去笼统批评，或者竟离开整个党与革命的利益，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去进行肆意攻击。这种行动已经走入违反纪律的范围，是不能容许其存在流行的。具体的关系问题的解决，在于地方与军队建立经常的联席会议制度，互相通报，互相商讨，争议互相解决，困难互相帮助。凡策划地方党政的安全，武装保护地方党政及群众团体，是军队的神圣义务，不容许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违此者应受党纪军纪两重制裁。同样尽一切可能帮助主力，帮助军队，是地方党政及群众团体的革命职责，亦不容许采取旁观的态度，违此者应受革命纪律的处分。一般说来，华中地方党政及群众团体，均是年青的，而军队党则比较成熟，比较有经验，因此许多军政要务的处理，其重心不能不多半放在军队党身上，地方党要承认这一具体事实，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原则问题组织问题的争执，均按照党规党法由同级会议或请示上级解决之，采取另外的道路，均是不正确而有有害的行为。

8. 建立能够独立负责的军区、军分区工作。军区建制属军部，但受师的指挥。分区建制属军区，但应受师及主力旅的指挥。独立团、营其建制属军区、分区，但应受主力旅或团的指挥。主力旅、团应尊重区党委、行政公署及地委、县署的决定。同样地方党政应切实关顾部队，尊重部队方面的建议。独立团、营归军区为军区部队主干，县游击队等属县级，自卫军、民兵等属区、乡级。领导系统是指直接建制而言，指导系统不属于建制，是就其军政等级实行按级服从，按级指导而言。地方军经费，确定统一由各战略单位支付。县、区武装及民兵经费由地方政府筹划。地方军待遇应较主力待遇低一点，以低减百分之三为限度。地方武装的服装亦尽可能做到与主力有一定的区别。地方党政人员，群众团体人员即非军人，一律不准穿军服，应穿便衣。某些游击部队亦可穿便衣，以完全在服饰上适合地方性群众性。

9. 发扬并扩大中央整顿三风的号召，严整军纪风纪养成党军的作风。整顿三风是地方党、军队党的全面动员，三风既正则其他方面也就走上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整顿三风实施到军队中应具体进行下列工作：（1）从根本上加强部队干部及党员的马列主义的立场及思想方法的教育，其关键在反对主观主义，加强调查研究，研究敌、友、我三方面情况，不说空话，不放空炮，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一切以党的利益为依归。（2）正确解决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党员以模范作用团结并吸引非党员同志在党的领导之下来行动。纠正宗派主义的孤高自赏的排外性，纠正并停止一切无原则纠纷。（3）强调服从军纪。军纪全军共同遵守，党员首先作遵守军纪的模范。军纪主要内容是保障坚决执行命令，自觉遵守纪律和制度。除反革命的命令而外，执行命令之前，是不讲道理，不讲价钱的，执行命令之后，才有讲道理的余

地，而且讲道理要经过合法手续。今天本军中明目张胆违抗命令的事实没有发现，而用另一种曲折方式，延缓执行，改头换面执行，打折扣执行，对命令怀疑，执行时不坚决，则所在多有。军队党的教条主义表现在学军事时作战与教育脱离，表现在不重视业务，表现只背条文不求实用，表现于学习政治时离开了党的政策的研究和检讨。另一倾向表现是只相信自己的局部经验，拒绝自己以外的理论学习，而不承认别人的经验。这是坐井观天的狭隘经验论的倾向。党八股在军队党的具体表现是，不按军队特点、以简明扼要的军语来指挥来办事，不注意军事要求的时间性和准确性，来遂行军事业务。冗长死板，游移粗糙，空洞浮泛，重复老调，是军事党八股的具体表现。军队党的宗派主义表现在对内是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轻视组织，个人突出；对外为关门主义，忘记争取友军士绅等工作。必须以整顿三风的精神来检讨全部军事工作。要求军队在党性上，干部思想方法上，对外政治关系上，对内组织关系上，军队文教工作上起伟大的进步作用，以建立党军的正规作风。（4）养成党军的革命军人的生活，至少做到思想正确，立场坚定，态度严肃，行动敏捷，体格坚强，技艺高明，胆大心细，艰苦奋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十大条。订定各种关于指战员职责的守本，使万众共同遵守，以保持我军的革命优良传统。

10. 建立坚强的战略单位，正确指挥战役战斗。全军在华中是全国一大的战略单位。各师地区在全军也是一大的战略单位。各旅及军分区又是较小的战略单位或战术单位。这些单位的工作包括党政军民各方面。各战略单位必须独立掌握党的政策，独立指挥战役和战斗，独立掌握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处理极端复杂的军政问题。对上级应该服从其领导和命令，但又要求能具体灵活地执行，避免死板机械。对下级应该进行不间断的指导，但又要求能虚心体察和切实帮助与严厉督导。对同级在原则问题上要求明朗化和正确解决，不能有游移和混同，而在纯粹实际问题、组织问题、行政问题上，则要求能互相协调，互相帮助，以利事机。各级负责同志，在独立负责的岗位上，责备人的机会多，被别人责备的机会少。上级只能作远距离的大的原则的帮助，实际部署则要自己动手，既可使全部工作走向胜利途径，偶有不慎，亦可以使全部工作走向失败。同级干部才德有长短，亦如自己才德具有长短一样，如何虚心的负责的共同工作，把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联系得很好，是建立正确工作关系，加强各单位领导的中心环节。一切工作的保障在此。各战略单位的工作内容分应付情况与根本建设两大方面。应付情况，靠决断，靠抓住时机；根本建设，靠苦干，靠周密，靠全面深入。这两方面均要抓住，不能放松哪一面，而且还要善于选择其轻重急徐。不怕环境恶劣，只怕内部不团结，一切革命的失败，外面破坏的原因常是次要的，而内部团结因素常有决定意义。

11. 最后提议军部、军政治部应在最近时间分头召集各种工作会议，如参谋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军区工作会议、供给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锄奸工作会议、兵工会议、军区会议等，来更具体讨论军事建设工作，更具体总结过去经验，更具体讨论全军的巩固扩大，以实现我党我军在抗战建国中的伟大任务。这就是我根据军事组的讨论向大会的报告，请大会讨论决定。

注 释[1]胡服同志，即刘少奇。[2]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3] 各级武委，指区、乡各级的人民武装委员会。[4] 十四条，参见《论建军工作》第三十节。[5]黄克诚同志，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6] 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 华中精兵简政的一些情况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一、(略)

二、(略)

三、执行中央指示中的各种倾向：

1. 地方党政人员常常在讨论中央精兵简政指示时着重主力裁减，其根据是部队愈大，公粮及税款愈难办，发生不顾华中敌、顽对我环境、我之主力尚不足以应付的情况。而华中人力物力之征调并未达到饱和点。除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外，一般均未达到中央关于脱离生产人数不得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三的规定。华中主力仅八万人，地方军仅四万余人，相当的扩充仍属必要，而且可能。这种裁兵论、缩小论是基于片面理由，我们认为应加以纠正。

2. 另一方面，华中主力八万余，力量并不算小，但分布于七、八个独立地区，每一个师均无力单独应付顽方之大举进攻。军部手上并无集团的机动部队，尽可能大量抽调时亦只能抽十二个团去进行大的会战。各主力师均为地方任务所牵制。主力限于地方任务，结果等于无主力。主力调走地区即不能巩固，地方工作及粮款来源即受影响。假如将现有之四万地方军扩大到十万，比较能担负主力现有任务时，则主力即可选择安心放手整训的机会，足可应付大的局面。故扩大会[1]主张发展主力十万，地方军到十万，自卫军二百万，基干队四十万，准备一年内完成此计划。而目前着手重心放在地方军及民兵建设上，主力一般注意整训、巩固工作，大规模的扩大动员。这个主张又发生有所谓“特点论”出来阻碍，其实质是某些主力工作同志认为主力编制不充实，不同意搞地方军，而要求继续编并地方武装以扩大主力。认为中央精兵主义只适用于华北，不适用于华中，强调地方的特点，因而曲解中央精兵建设指示，专强调主力的扩大，不了解华中地区主力亦必须注意本身地方化，否则即难以坚持；即令某些地区人力、物力尚可供我征调，但提前注意积蓄，保持军民实力，仍是必要的（又此时不通过发展地方军的办法，孤单的扩大主力亦不可能）。我们对这种地区特点论者不了解华北、华中同力敌后，不了解斗争的长期性，民力力军力之泉源，不爱惜民力，绝难长期坚持。这些观点正在纠正。

3. 华中各根据地从一九四一年冬黄桥决战后才完全控制在我手，才有了正规建设的可能。但不数月即一九四一年春李长江叛变[2]，是年初秋敌伪“清乡”并“扫荡”盐城，又加韩德勤仍未走，在予我建设以阻碍。因此，许多应办机关均未成立，比如各根据地的参议会仅先后初办，许多机构仍未建立，如一切裁减势必影响工作。但如不顾可能，不密切注意敌后环境及根据地发展之趋向，而建设庞大机关及后方，亦必在“扫荡”期中遭受损失。

四、一年来的华中局面，敌、友、我均保持三角的相持形势，汤、李等大军[3]计四十余万，屯集豫鄂皖，每月对敌定期袭击破坏，客观上予我在敌后坚持很大便利，故华中敌伪“扫荡”不如华北之频繁，此为根本原因之一。故我应利用此时机在两个反“扫荡”之间。来迅速进行建设工作，反对各种偏向，正确而灵活的执行中央的精兵简政的指示。

---

这是陈毅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的电报节录。其时，陈毅兼代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

五、在军事建设上，皖南事变以来，本军七个师一律采取三三制，现已感觉不妥，故决分为甲、乙、丙三种师的编制。甲种师采取三旅三团三营四连制，乙种师采取废旅制，丙种师如七师则废旅并且团亦废营。又如一、六两师师部合并。该两师原为一个部队分开的，且地域接近。又各师或兼军区或不兼，某些军区之下设分区或不设，总以避免叠床架屋、头重脚轻为目的。

六、（略）

七、华中群众工作，在今年夏收可保证普遍进行减租减息，今年秋收可将人民大多数初步组织起来，并建立系统的正规工作制度。我们打算秋收前完成扩大地方军到十万任务，冬季动员数万新兵充实主力。冬季才有可能使各种工作走入正规或可能完全照中央规定的报告项目，作正确的统计报告。

八、华中局仅保持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宣传、青妇各部仅一人或二人，政府工作部至今无人负责。军政治部主任亦系兼职，无人负专职。我们军直机关连特务团、抗大在内仅三千人。我们工作机关拟逐渐添补人员。

九、胡去山东[4]，饶去二师[4]，仅将最近情形简要报告。

注释：

[1]扩大会议 指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至三月五日在苏北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的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

[2] 李长江叛变，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游击指挥官李长江率部在江苏泰州投降日军。所部被改编为伪军第一集团军，李力集团军总司令。

[3]汤、李等大军，指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以李品仙（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以及以李仙洲为军长的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以何柱国为军长的国民党骑兵第二军等部。

[4]胡去山东，指化名胡服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由苏北盐阜区前往山东巡视工作。

[5]饶去二师，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华中局决定，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委饶漱石到新四军第二师去处理领导关系等问题，须时三个月，其间饶的职务由陈毅兼代。

## 关于华中、山东统一领导，另建江南战略单位的意见（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

我感觉华中、山东应统一领导。去冬胡服同志主张回延<sup>[1]</sup>时，因交通不便，我们盼望胡服同志留华中兼做山东工作。现传敌七路进攻大后方，如真实现，则赣北、皖南、闽、浙工作有成立单独战略单位的必要，华中局恐难兼顾。因将来情况变化，宜派主力一部渡江到鄂南、湘北发展。七师到皖南、赣北发展，六师到天台山脉、闽、浙及赣东北可打抗日游击，这种情况，则非有一战略单位独立负责直属中央不可。现在浙江已大打，七师、一师即建议南进，我已去电制止。目前仅可准备，不宜轻动，要看清大局再动，否则打不好，收兵难。如敌西进之局势已成，我再去，要有理且有利那才对。

注 释<sup>[1]</sup>胡服同志主张回延，一九四一年冬，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七大”，曾通知胡服（刘少奇）返回延安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

---

这是陈毅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拟，并对电文作了校正。

## 关于创造东南三大战略基地的建议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浙江战争已发展至江西，浙赣铁路敌将控制不放，但敌是否继续向西进攻，则尚待证明。现各师同志均来询问此事，要求对策。

(中略)

我们为了抓住浙江的发展时机，业已作如下处置：

(一) 已令谭启龙[1]在一师抽调几名原浙江游击干部前往余姚，去发展金华、衢县一带工作。尾敌前进。拟与浙江地方党配合成立浙东区党委，去开辟游击根据地，并设法与闽、浙两省委[2]联系。

(二) 令七师加强皖南，该地成立一电台与军部通报，首先调查黄山山脉情况。但七师、一、六两师均只作南进准备，开始进行许多地方工作、友军工作、调查研究情况的工作。

(三) 浙赣铁路以北、长江以南、鄱阳湖以东广大地区，包括黄山山脉、天目山脉最好之山地，估计冷欣、唐式遵、俞作柏“忠救”[3]三部分是不会退走的。其中有五十几个县，至少有三十县左右不会沦陷的。但我们去要师出有名才行，目前尚不能公开去，以皖变残余[4]名义固可，但只能小搞，不能大搞。敌皖南、浙西目前尚不便大发展，浙东则发展机会已成熟。

计皖南之黄山，苏南、浙西之天目山，闽、浙、赣之仙霞、武夷两大山脉，可造成我三大战略基地。我二、七两师可出皖南，一、六两师可出苏南，五师一部到鄂南。东南的战略单位可以成立。如派我去，我亦愿去作此工作，该方人地均相宜，我现职可由谭震林接充。敌寇大举进攻，国难更艰，于全局不利，仅在东南给我们一些开展工作之便利，收益较小。故强调团结抗战，乘机改善国共关系乃为第一着。东南之发展，应在不妨害到上述目的的条件下行之，轻举妄动、贪小利应切戒。

注 释[1]谭启龙，江西省永新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在湘鄂赣地区工作，是湘鄂赣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赣东北特委、苏皖特委（后改称苏皖区党委）、苏南区党委、皖南特委书记。调赴浙东工作前，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学习。

[2]闽、浙两省委，指中共福建、浙江两省委。当时，福建省委在崇安地区，以曾镜冰为书记，浙江省委机关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在温州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五月十八日在永康之方岩就义。此后，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停止浙江各特委之间的联系，认真执行隐蔽精干的政策。在原省委所在的基本区，以龙跃为书记的中共浙南特委坚持了长期的胜利的斗争。

[3]冷欣、唐式遵、俞作柏“忠救”，冷欣，一九四一年起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兼江南行署主任、六十三师师长，皖南事变后任八十九军军长。唐式遵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俞作柏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忠义救国军司令。

[4]皖变残余，指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突围及隐伏于原地的新四军人员。

## 对抗大工作的建议 (一九四二年八月)

### 一、要彻底转变教学方针

华中抗大各分校在党中央关于学校教育的决定公布之后，一年来在工作上引起了某些转变。如总分校及五分校注重策略教育，注重文化教育，学校军、政、教工作关系的良好，学校编制及干部的配备进行了必要的缩减，教材的修订和审查引起了注意。五分校吸收了大批当地青年入学等。四分校注意实习，注重与前方部队联系，注重淮北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政策的的教育。八分校注重军事演习，开办文化预科，注重体格锻炼，注重学校生活的严格化，养成严格的军人生活，九分校在不断反“扫荡”中获得一面作战一面进行教育的宝贵经验，学校编制实行了相当的精简政策。同时各分校在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的指示下即注重锻炼学员党性，在党中央整顿三风[1]的决定号召下即开始领导整风，一般说来，于教员、学员的政治修养和政治认识上均获得进一步的成绩。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几年来的建设上，抗大组织在保证供给军政干部上是完成了相当大的任务的。但是上述的成绩，仍然不能满足斗争环境所提出的需要，教育方针和学习方针的转变，仅仅部分的开始。要求彻底执行党中央的新的教学方针，彻底审查和转变抗大教学方针，是今后华中抗大工作的中心任务。

党中央的教学方针是什么呢？

党中央指出一般干部学校教学上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所学非所用，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存在。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上，亦指出教育与作战脱离，是军队干部教育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标志。因此，理论与实际一致，所学与所用一致（做什么学什么），教育与作战联系，这是我们军队教育上学习上应该采取的三大原则。“马列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因此理论与实践，所学与所用的一致，就该是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要学生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目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去指导实践。因此除了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又要教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使学生既懂得理论又懂得实际，并把二者联系起来。”（见《解放日报》社论《教育上的革命》）这是我党中央提供的完整的教学方针。

这一方针运用到军事教育与学习上，就是要学生通晓一般的战略战术原则和马列主义的军事原则，从军事理论的学习，把握军事科学中的规律性，而同时又要使学生能够根据一般的军事原则去研究目前的实际的作战经验，总结中国革命中过去各时期的战争经验，去发现和体会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去提高学员指挥实战的能力。不仅能够讲而且能够做，不仅懂得大的问题而且学会小的动作和技术，不仅在讲堂上能背诵讲义，回答问题，而且要在出校后在战场上真正能够指挥部队打胜仗。

但是这一方针，仅是一般的原则说明，运用到华中总分校与各抗大分校，

---

这是陈毅在华中抗日军政大学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于《建军》杂志一九四二年第二期。

则应分别学员对象，如团级、营级、连级等职之不同而应有所去取。又要根据教员学员的理论程度，工作经验多少，采取活泼的运用。如果好高骛远，把延安学校和抗大总校的课程教育计划表，一般无二运用于华中各抗大，或把总分校及抗大分校的计划，搬到各团的教导队照样去做，则在本质上仍然是片面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怪，虽然口头上空喊执行中央的教学方针而实际违反他，于是不管你学校和教员如何努力，而学员一是听不懂，二是记不清，三是出校之后不能用，这干马列主义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的教育目的，仍是毫无关联，且要造成实际工作上的妨碍。因此华中各抗大应根据实践去讲授理论，根据理论去总结实战，作为教育与学习的总方针。不独学员应如此，教员亦应如此。教员的任务不仅限于讲解书本，更在于帮助学生如何去运用书本知识，以总结其本身的工作经验。学生的任务，不仅限于熟读讲义和课目，而在于能领会课目讲义所包含的精神和实质，并能进一步启发对实践经验的了解，并提高今后指挥作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为了实践而学习理论，为了打胜仗提高工作而进学校，为了养成一批军队工作干部才办抗大。这一方针之确定，自然会引引起教育计划、教学方法上之根本改革，解决许多不必要的争执。

检查各抗大的教育计划一般表现着政治重于军事，有轻视军事业务的偏向。在重视政治中又有以空洞的无血无肉的理论教育压倒一切的偏向，对根据地政治情况及党的政策反不重视，尤其日常接触的政府的现行的法令反而置之不闻不问，夏收秋收群众运动的经验反而下列入政治学习的课程中去。在军事学习既被轻视的状况中，而军事教育计划，又是最庞大的，包罗万象的。陆军大学的课程，几乎七、八十种课目限令四个月完成，结果没有一个课目完成。内容表现着正规战术多于游击战术，理论讲授多于实战总结，制式教练多于实战动作，课堂讲授多于野外演习，军队技术的具体研究和实习为课堂口授所代替。文化教育虽然引起重视，又有由过去的“生字主义”，转向进行庞大的文化课程的偏向，没有把握着文化教育是以提高写作阅读能力为中心，即是应该以增加科学常识、国文习作为中心。如果毫不研究对象和实际需要去进行教育，结果费力不讨好，仍然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未能根本改革的表现。

教授方法的毛病，是以讲授为中心，而不是以帮助学员了解和运用为中心。讲授只根据书本，而不是根据学员理解程度。讲授只根据教员的本领，而缺乏照顾学员的具体情况。忙于使学员背诵和抄录书本的字句，而不能使学员去领会和运用书本内容。不去变书本知识为学员知识，而使学员永远站在书本之外作书本结论与条文的奴隶。教课前的准备，教课时的部署，以及课后的指导，没有造成完整的联系，不了解课后的指导如复习、问答、漫谈、个别质疑和讨论，发动和组织学员问的争论，乃是教授的重心。不了解课堂讲授只是教育的开始而不是他的终结。学校中许多关于生活锻炼和日常训练，如支部生活，小组汇报，其他政治勤务等，这是辅助的教育方式，如与正课联系起来，进行得很好，对于教育效果有极大帮助。目前情况不仅未与正课有很好联系，反而有反客为主，代替了正课的现象，排挤和侵占了正课的时间，使学员自习时间，全部荒废于课外活动。会议多，会议大，会议长，反而使会议不能解决问题或者妨害解决问题，这是学校教学工作上一般的毛病。

学习指导上的毛病如下：第一，不善于去启发学员的自觉学习精神。任

何学习上的成就主要依靠个人去钻，要提倡钻的精神，个人能够钻，教员的帮助和集体学习才有根据。不应该使集体学习和互助学习代替了个人努力专心研究的优位。个人主义的学习应该反对，而个人专心学习则应该提倡。第二，有人提出反对分数主义的口号，这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提法。学校根据测验以鉴定学员的学习成绩，以鼓励学员的学习，这是可靠的方法。因此在校学员应该以领会课程为主要学习任务，如因此而得到优等的分数鉴定，应该是学习的模范；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则根本取消了入学受训的目的。如果有人热中于分数的追求，因而自高自大，则应该批评其学习的观点。但是我们不应该连热心课程争取优等学习的好处一并反对。第三，对在校学员的思想意识的锻炼，应该是主要的教育目的之一。学员入校前、在校时与出校后均因情况不同而表现不同。因此学校教育工作、政治工作对待这一问题，宜依据学员的历史的发展，作深刻的帮助和思想指导，不能以其在校的短期表现为标准，更应该从强调这一方面以鼓励学员努力学习各种课目，以备他日之大用。更要使学员懂得在校学习即可表现他的党性和他的思想意识，学校还应从学习表现方面去检查学员的思想意识和党性。第四，学员的时间和健康应特别爱惜。学校起居作息时间表，应重新审查。上课时间、自习时间、休息时间、课外活动时间应严格分开。纠正以课外活动侵占休息游戏时间的不健全现象。一个紧张的学习者每日给他一小时到两小时休息尚祥，让他停止思索，恢复疲劳，或让他个人去对学习内容进行独自的反嚼，对于学习效果帮助是很大的。第五，对各级干部学员应有分别不同的生活管理和教育训练。新生入校应经过严格入伍生活。班、排干部之学习生活，应略同于前方连队。连、营中级干部，则可不机械采取连队管理。而团以上干部，则应提倡自觉学习，自动学习，解除其学习以外的各种生活管理。将将与将兵方法是两样的，因此，教干部的方法与带兵的方法也是两样的。

学员除他本身的革命经验外还努力想获得新的知识，而课堂讲授的一些知识，都是以往的革命经验的总结，对学员来说都是别人的，或前人的经验总结。教员对讲授的课目，也是自己来讲别人的东西，与学员不同处，是在他接收和了解多一些。学员努力学与教员努力教，便是共同努力去解决接受别人的经验的问题，去经过接收别人的经验，以改造自己的经验的问题。这一工作过程，是艰苦的思想锻炼和精神活动的过程。教员、学员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一过程，是一致的。但前人和别人的经验要灌输在教员的头脑中，再由教员输入学员头脑中，其中有容易接受与不易接受的各部分，无形中构成一种拒抗性，即构成学习中的矛盾。学习中的问答和质疑即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不多多启发这种矛盾，不能正确解决这种矛盾，学习过程的根本完成，是不可能的，又教员与学员有共同解决学习困难的一致性，可是在其解决学习困难的过程中，又因教员、学员的观点、思想方法、个性之不同，事实是构成不能完全吻合的矛盾。因此正确的教授法和正确的学习法，均应深刻调查研究双方情况，适当的定出具体办法，以适应学习上的思想锻炼和精神活动的过程，这便是我们革命军队干部学校的教授方法的研究出发点。我们的教员、学员的师生关系，是建筑在同志的关系上，建筑在为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共同政治要求上，不仅应该如世俗所说的“尊师重道”的精神在学员方面应该提倡，而同志间互相学习、教学相长的精神，同时也应该提倡。每每我们的学员的实际斗争经验一般比较教员要丰富，此为我们的学校比一般旧式学校的教学生活根本不同点之一。耐心仔细去进行思想指

导和思想合作，这就规定教员、学员间的正确关系。这里有任何粗枝大叶，任何马虎儿戏态度或带着一些雇佣性格，均与教育任务之完成根本妨害的。

## 二、要具体规定教育内容

在党中央的新的教学方针的指示下，华中各抗大以训练团、营、连、排干部为对象，则政治教育应该以整风教育、时事教育、党的政策、政治工作建设的办法、根据地情况、民主政府法令、华中局通知和决议、我军革命传统为具体教材，而以党的政策、政治工作建设，作为政治教育的中心。以毛著[2]《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件为基本读物。马列主义理论的专门研究，我以为是只适合于团以上有独立研究能力的高级干部，而不是目前华中各抗大的事，如认为必要，只可列为专题报告。我们应该以党的政策为中心，帮助学员去了解马列主义的方法和理论，由具体问题逐渐上升到原理问题，而不应该倒转逆行的从空中掉下，弄得不着边际。

军事教育应该分成理论教育与技术训练两大部分。理论教育包括战役战斗指挥概则，讲一般战术原则，而以毛著游击战略及步兵战斗条令、步兵操典为基本读物，以总结华中各实战经验为具体研究的方法。技术训练注重适合近战要求的需要，战斗指挥注重从班到营的指挥法，以营、连为重心。军事管理教育方法，列为专课来讲授，强调妥善处理行政工作，妥善处理事务工作。行政工作、事务工作历来被轻视，不知道这是一个军队干部必备的起码知识，均应列入正课程作专门研究。军事教育和学习应多进行演习。军事技术，应多做少讲。军队干部应首先懂得军事。军队干部于懂得和注重党的一般政治政策之外，应以专门研究军事，把自己造成军事家为根本学习任务。军队政治工作干部首先自己要学军事并应提倡和领导其他同志进行军事学习，转变忽视军事学习的恶劣空气。要了解军事力量是解决政治任务的最后手段；不通晓军事科学，不掌握军事技术，决难解决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问题。

文化教育开辟我们工农干部研究军事、政治的蹊径。不首先打通这条路，自己将永远为高深研究的门外汉。同时本身所积累的经验也无法总结，无法外传。文化程度之提高，更是加强工作便利处理革命工作的工具，我们许多工农干部，在这方面吃亏不少，努力打破这一难关，必能使自己提高一步。初学文化的人比如记生字记笔划字义，必然感觉一些困难。我们的干部，要以革命的斗争精神，来打破这一难关。“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能在革命斗争中表现英勇的身手，难道我们终于在文化学习上落伍下来吗？有些同志不愿学习文化，觉得从头来学习未免难过。有些人讥笑读书认别字，以及某些违反文法不合常识的写作与说话的人，我以为都是错误的。我们工人、农民在旧社会制度下，被人剥削压迫，与文化学习隔绝，这是旧社会罪恶，我们干部自己不仅不负其责，正要努力学习文化，以根绝旧社会给我们的痼疾，有什么难为情呢？凡讥笑别人文化低落的人，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意识。一个革命者传染着此种恶习，正表现他的意识不健全，为什么还借此洋洋得意呢？文化学习应放在入校初期，应创造半年为一期的文化学习的突击计划，以增加科学常识、练习国文写作为中心，联系到学员的思想方法，情意表达等。提高文化教员的地位，专设文化科，其职位与军教科、政教科相等。文化学习不应该向学生去讲《马氏文通》[3]，弄一些动词、名词、



前置词，反而使学员望而却步，这是洋翰林玩的洋八股。中国到今天还未有一部严格合乎科学规律的文法书，这是文法专家的事，不是我们干部的事。我们的文化课应以帮助学员读、写、做为主要办法。多读多写多做，是学习文化的无上法门。可提倡专门精读一本文化课本，或以一种适合的政治著作代替之，真把他从头至尾反复再四读下去，然后再兼阅一些文学著作及古代名小说，积久必见功效。同时帮助学员联句、作短文、写日记等。在旧式高小、初中国文习作的方法，一般可以采用一些。文化学习应有得力的政治指导，看旧式小说，应告诉学员能以新的观点去看他，否则要收到不预期的弊害的。

### 三、要创造优良的革命校风

创造优良校风仍是抗大工作中的斗争任务。严格的军事生活之锻炼，我军传统作风之解释和叙述，军队铁的纪律的遵守，军队指战员间的革命的友爱，革命军人的自觉的学习和工作精神，这是创造优良校风的具体内容。学校生活应该有其严格紧张的一面，即对工作任务是负责的，对纪律和制度是严格遵守的，对课目和操场是以与战场同等的紧张精神去对付的。敌情观念在学校生活中，仍不应去掉，而养成古人请缨杀敌、击楫中流、闻鸡起舞[4]的志趣和决心。学校生活在严格、紧张、负责任、守纪律的条件之下，应该养成活泼、团结、重视民主的优良习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帮助同志，尊重战友，不损人利己，不同俗自媚，不争功自大，遇事虚心请益，不矜骄自私，忧国忧民，这是革命军事干部应有的德性和风度。工农革命武装为我军的特质，这一特别品质，即是我军传统作风的基点，创造校风，更应以发扬和保持这一特质为主要依据。校风之创造，是造成良好的学习与修养的环境，更加熏陶和提炼干部的优秀政治品质，更加提高和增加干部的实用的军事技术，使每一干部踏足校门，即有新鲜的感觉，而便利他从事学习与修养。从正确的教学方针上，正确的教学方法上去创造良好的校风，这里就需要学校的主持者，教职员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工作关系，能正确配合提高到可资师法的程度。在这些方面值得华中各抗大工作同志去努力奋斗。

### 四、要健全学校工作关系

争职权，争时间，争待遇，这是我们学校工作范围内常见的不健全现象。我党政策上的原则问题之反复研究，教学方针上的正确性的商讨，战略战术上的原则性的争执，教学事业的专门研究，这类值得商讨较量的问题反而少见。这就使学校工作比较注重皮毛而轻视了骨肉，我个人以为这是应解决的问题。军教、政教、文教仅是教育内容上的课目分类，学校行政部门，政治工作部门，教育训练部门，仅是属于专门业务上和教育任务上的分类。工作部门和课目的分类，是为了统一的去完成共同的学校教育任务。因此有利于共同的教育任务之完成，是检查各部门工作的标准。工作关系应建筑在共同完成党的教育任务上，职权、地位、待遇、态度，反是次要问题或是不值得我们共产党员斤斤较量的问题。离开了共同的教育任务，专门着眼部分问题和个人问题，绝不能建立好健全的工作关系，纵令彼此态度和和气气，待遇优厚，把工作弄坏有什么好呢？

学校为训练军队的军政干部而创办，为训练大批军事工作干部，政治工作以及其他军队业务干部而创办。政治上发扬我军的工农武装的革命特质，通晓我党政策，执行我党政策，忠实于我党的革命事业为主要教育任务。在军事上以研究和通晓军事业务掌握军事技术为主要教育任务。抗大是党领导的革命学校，他与一般政治学校不同。抗大是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学校，又与一般军官学校不同。政治上发扬我军工农武装的革命特质，军事上精通军事理论和技术，两者互相结合，便是抗大的基本教育任务。而在这基本任务中又以提倡军事学习、训练军队干部为其主要特点。学校内注重政治教育，不仅不妨碍其军事教育，更是使军事教育增加。正确的完整的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绝不会有轻视军事学习的观点的发生，更不会在党领导的抗大军校中有忽视军事学习与军事教育脱离关系的现象的发生。彼此互争职权，以本位为重，各部门站在本位上，企图以本位工作侵占大部教学时间而置别部门工作于冷门的地位，或者故意扩大本部门的职权，而缩小别部门的职权，均于共同任务有妨害，而造成全部教育任务之不能完成，这是极不正确的偏向。训练机关强调军教重要，以轻视军事学习打击别人；政治机关强调自己的行政地位，以不尊重政治领导反对别人；训练部政教又与政治部宣传部门争职权，出主入奴，两不相下，完全忘记了自己部门在整个教育任务下仅系一小部分，与别部门配合进行才能利于总的共同任务，每一部门单独的突出，于己于人，均有妨害。不仅学校教育任务是共同的，学员之为教育对象亦是共同的。争时间，争职权，互相侵犯工作范围，层出不穷的计划花样由各部门单独实施，弄得学员们转不过身，将学员的时间精力浪费得一塌糊涂，这是工作路线上极大的错误，非严加纠正不能提高教育工作。

学校整个领导在党内属于校委会，全队的统率属正副校长，教育长与政治部主任是在校首长领导下进行其专门部门的工作，整个教育计划由校委决定，校首长根据校委决定付诸实施。训练部、政治部则根据整个教育计划，定出军政教育的实施计划和政治保证计划。训练部门不负教授学习方面的指导，政治部门不负政治保证方面的指导，必致使整个教育计划流产。事情和职权本已清楚划分，则所争何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能从共同的教育任务上、能从整个教育计划上去检查各部门的工作，则一切工作关系之争论便得到解决的锁钥。我以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相结合是工作关系不健全的根本原因；要建立健全的工作关系，应从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做起。

## 五、要正确鉴定教员、学员

学校教育中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少而精”，这是对教育计划上应该采取的原则。我以为不独教育计划为然，这句话可以扩大运用。我主张教员、学员的选择上，同样采取重质不重量、少而精的原则。教员、学员又多又精，这是很好的理想，事实是做不到的。教员选择其能胜任者留职，其不胜任者可由总分校办教员训练班，加以培养或另调工作。目前各学校中，除教员外，尚有大批教育干事，这一批教育干事，应再加训练或派其参加前线工作，培养其将来成为一个胜任的教员。教员质量不仅应该加以选择，更应该加以培养。对教员的在职教育，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要说服不安心工作的某些教员。一个人在大革命中，只能做一部分工作，即使马、恩、列、斯

等人，他也只是做好了一部分工作，自然他们做的这一部分工作虽不是平常人能够企及，但如没有阶级与党的帮助，他这部分要做好到现有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工作选择的标准只问他是否对于革命有利，有利的事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不必在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去较量。党的教育事业是光荣的革命事业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担负教育干部，训练干部，作革命干部的师资，可见其重要性。至于提升快慢，名誉大小，在一个共产党员看来，应该视为身外之物，是不值得考虑的。至于争物质待遇问题，在我军吃苦耐劳的传统习惯上，历来认为是一件被人轻视的事。至于政治待遇，如可以参加开什么会，可以被指定看什么文件，是否可以参与机密，我以为这是一个党的组织原则问题，绝不是一个政治地位高下的问题。我党内部，只有工作责任之不同，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我军内部也只有职责之不同，政治地位也是平等的。我党我军均没有所谓特殊人物，他可以比一般同志得享受政治特权。我党我军在与敌人作艰苦斗争，而斗争又是长期的，敌方对我不仅采取公开的进攻，而且采取秘密破坏，而且其秘密破坏技术是很高明的。我党我军为了革命利益不得不以自己的秘密工作进行革命防卫，因此替党保守秘密，成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的义务，不被指定参加的会不参加，不交你看的文件不应该看，不需要知道的消息不必知道，不需要过问的事不必问。凡与你本身工作有关的事项，党的组织自然会通知你，不会忘记你的。这些问题能服从党，即是在组织上服从党，正是党性坚强的表现；在这些问题上表示不满，又证明他的党性不健全。

学员为什么要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呢？我的理由是：学员以愈多愈好本是常情，可是现在正当抽调大批干部入学受训的时期，数量上已是很多，再不加限制，会影响教育效果。特别各部队仍然继承旧习，送有毛病犯错误的人入校，不知道选送入学，是培养干部、提升干部的一个方法。选送质量较低的入学，仅能予干部质量以修补（自然修补工作也是学校工作任务之一），而不可能提高干部的质量。再则各部队选送学生，不按照正确原则，又于学生毕业返队后作要求过高的批评。比如某旅负责同志，于抗大学员返队，亲自加以考试，并对抗大工作加以指责。又如不少部队干部，对抗大工作在旁观地位，作不负责任的批评，我以为办好抗大，是学校干部本身的事，更是本军全体干部的事。关心抗大工作，帮助抗大工作，前方部队与抗大建立通讯联系制度，交换工作经验，以入校出校学员情形互相通报，这是对全军干部教育最有利的事，为什么不作呢？

学员的名额，现在已很多，均主张精选一下。其中有个别分子，十分不能造就的，应令其退学，改调工作。但是对一部分同志，虽然毛病很多，学校仍然要尽最大能力去加以培养和争取。如果学校成立一个原则专收好学生，一切犯过错误的人均不要，这完全不正确。在工作中犯错误是一个革命家所不能免的事。我们干部虽则难免在工作中有谬误，但无伤于他的优良的工农干部的政治品质，或者是前进的革命青年的政治品质，有这种政治品质，即可以造就成为更好的人才，工作中的错误，只是其成功道路上的转折。

我们学校不拒绝收取犯过大小错误的人，更要根据其犯错误的过程，予以有效的帮助。我亲自在总分校参加开除过一、二个不能造就的分子，送他去另做工作或遣散回籍，我以为这种处置也是对的。但这是稀有的例子，不能因此作消极的决定，将一部学员都以质量不好作托词而鉴定出校，违反了学校创造干部，改造干部的基本任务。

学校教职员对全体学员进行一般教育和周到兼顾的培养，这是正确的，但并不妨碍而且应该对学员中优秀者和落后者，进行更多的注意。这里既要反对教学中的平均主义，又要反对旧式学校的偏枯办法。

## 六、要实行精简政策

精兵简政，是我党对根据地工作提出的总方针。抗大组织应依据精简政策，来紧缩学校编制，提高教育效率，应付战时情况，准备反攻条件。精简政策之重要，还未为我们同志所深刻了解。安于现状，不去估计现状之严重变化行将到来，不忍割爱裁减自己的建设，留恋坛坛罐罐，必招致严重环境时的破坏和毁弃。不估计工作质量和效率，满足于形式上的铺张扬厉，必致经不起严重局面到来时之试验，而影响到坚持长期斗争。这些不重视不执行精简政策的错误倾向，首先应在抗大机构上实行纠正和改革。抗大应以自己的改革影响别的部门。抗大应以精兵简政方针传授于学员，使学员能了解时局的动态和我党应付的方针，这应该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抗大随时准备于战时能改变自己成为独立支队，能进行独立坚持。平时的训练处，战时即为参谋处。平时政治部，战时即进行战时政治工作。平时校首长，战时即变为坚持一个独立地区的游击首领。目前抗大机构，教职员与学员比例是教职员太多，应按教二学六的比例改组。学校中相类似的机关裁并，勤务人员减少，教员、学员自动参加某些劳作。学校变为战斗部队，装备需要加强。学校能直属一二个战斗连则更佳。

对抗大工作的领导，各战略单位应统一归一个通晓军事的负责同志负责，避免多头指挥。不得随便改变教育计划，调动学校干部、支配学校学员。我提议师、旅首长应直接负责处理关于学校及教导队的工作。学校内部不宜多设挂名的名誉职，宜有人负实际工作责任。在一个正校长之外，又添几个副校长，教育长之外又添一个副教育长，因人设官，不是因事添人，此种旧军队的习气，我们不应传染。抗大总分校，各分校，旅团教导队，造成由上而下的工作指导系统，定期巡视检查，以利教育工作之统一进行，反对现存的独特的自我风气。

抗大学期一般均应延长，各分校可延长至八个月到一年，总分校可延长到一年或一年半。各旅教导队以轮训干部为主。排级干部尽可能归分校办理。军区可办短期训练班，较长期的教导队，可归抗大分校设地方队兼理之。

从编制上、干部配置上、经费节约上、教育效率上、教育方式上实行精简政策，是抗大建设上应付时局战局的工作方针。

注释：

[1]三风。指党风、文风、学风。

[2]毛著，指毛泽东所著。

[3]《马氏文通》，是清朝马建忠撰写的语法书。

[4]击楫中流、闻鸡起舞，都是东晋名将祖逖的。（一）祖逖与友好周琨同寝，半夜听到荒鸡啼叫，他便唤起周琨一同练武。（二）公元三一三年，他率军渡江北伐，在船上敲打船桨发誓，一定要收复中原。参见《晋书·祖逖传》。

## 《精兵简政文选》序言 (一九四二年九月)

我们面前摆着一本小书。

这本小册子大部分选集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其中提出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现阶段的敌后抗战的政策问题，即精兵简政问题；一是对付敌寇残酷“扫荡”的军事方针问题，即新的战略战术问题。这两个重大问题，是相互密切联系着，或者说他是一物的两面，是我党我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本方策。遵照去做，做得很好，必然可以制服敌人，取得坚持根据地的胜利。更可保证反攻时期以及战后新中国的胜利。反之不遵照去做，战局既变，而自己的工作方针、战术办法，以及领导方式、组织形式故我依然，一成不变，则于战局突变到来时必手忙足乱，招致极悲惨的失败。至于说到更远的将来，如何应付反攻及战后诸问题，则自然更谈不上了。

分析情况，掌握方针，均依靠有远见。有了远见才能预知时局发展的趋向，才能预有准备以应付行将到来的形势，也才能把自己主观的努力，加在最大的可能发展的那一面，以取得胜利而避免挫折；即使挫折，可使自己损失更小，一到胜利则自己的胜利必更大。本书各论文中所指示的趋向，根据这些趋向所提出的一些办法，完全是正确的。一年来的敌后斗争的发展过程，均证明党中央论断之不谬，过去证明了他，现在证明了他，将来还更要证明他。

不要说论文的根据多半是华北的经验，不要借口说华中与华北有不同的特点，因而不重视这些指示，企图保持自我特异的作风，而迟疑不前，不进行精兵简政，这是最大的危险。不要留恋现状，安于现状，难于下斩钉截铁的決心。应该知道，这种优柔寡断的态度，其结果必致损害自己，贻误抗战和革命。精兵简政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工作。目前臃肿的现象不加紧缩是妨碍工作效率的；精兵简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准备更大的发展，是为了消化和提高过去的发展。目前庞大笨重的现象，使自己蹒跚不前，妨害现在的坚持和将来的发展。懂得这些道理，则知道华中各地下列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应加以减少，不能再事增加；脱离生产的部队也不能再事增加，应用大力去建设民兵和自卫军。

第二、相类似的机关应合并，不应再加扩充。

第三、地方党、政、民经费超过军费的现象，地方党、政、民人员超过军队人员的现象，工作人员超过战斗人员的现象，整个军队兵员及地方工作人员总数过大，超过中央规定与居民数百分之三的比例的现象，应无条件纠正。

第四、滥征民扶服役，滥事动员，不爱惜民力的现象亦应纠正。

第五、一般情况应停止扩大主力，加强地方军，切实扩大建立民兵和自卫军，主力及地方军应淘汰老弱，减少马匹行李，实行高质量使部队精悍化的原则。

第六、一切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均应重新研究，以简捷明了、抓住中心、深入具体为主，复杂空洞的不切实际的花样，应在取缔之列。

第七、精兵简政还着重在于部适当配备和一部分人员归田参加生产。所以生产工作及安插工作，又是精兵简政中极具体的工作。

我随便想到这些问题，自然还遗漏甚多。兵既精，政既简，则支出便减

少，生产便增加，而人民负担减轻；人民负担减轻，则民力之储蓄积聚必厚，统一战线的团结力必更强大，因而长期坚持乃有了雄厚的基础。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除此而外没有其他的法门。我们要求本位主义者想一想，多多争着在本机关停留拥挤一大批干部，一大批闲员，其于事功有何裨益？

我们要求浪费主义者想一想，多多开支，铺张扬厉，制造庞大预算，不顾民力负担过重，随意征调民力，将达到民力、财力枯竭之境，其前途是如何？我们要求那些不依照编制，只从一己之便的人们想一想，弄一大批小孩，或随便扩大收容一些不能服务战场的人们，塞满机关，密布后方，平时盛极一时，只图热闹方便，造成部队头重脚轻，机关浮肿笨重，战斗员过少而工作人员过多的现象，战局不紧即已不能维持，战局一紧则自己处置如何？精兵简政，由自己主动来实行，则一切处置，井井有序，能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老安而少怀。反之精兵简政不主动实行，而是由于战局转变逼迫之下去实行，则其招致的恶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假如在今年初华中局扩大会的时候，我们还照顾一些必要的发展的话，主要是在地方军和群众运动方面，则今天的条件已与上年有些不同，我以为除了扩大和建立民兵及武委工作外，一切均应在缩减提高质量和增强效率之列。今年冬季开始，应该是华中各地彻底执行精兵简政的认真的开始。其次讲到新的军事方针。在精兵简政的政策之下，自然提出了新的军事方针。我对此问题是作如下了解：第一、在主力与地方军强调精悍化和提高质量的条件之下，因此把建立自卫军及民兵提到第一等主要的地位，必须有大量的自卫军和民兵才能弥补主力和地方军数量减少之不足。现在情况是主力军、地方军、民兵和自卫军相互依存的关系，尚未能为人们所正确的了解，必须首先指出。

第二、兵力注重积蓄和整训，因此使用的时候应特别强调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分散作战是主要的形式。一般说来集中力量作大的突击机会已少，但不是没有，故应特别谨慎兵力之使用。无必要不动，必要大动时，一出手则得保证其必成。

第三、在我方根据地内反“扫荡”时，应军事办法与政治办法相辅而行，正规战术与游击战术相辅而行，政权斗争与群众斗争相辅而行；在敌伪区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辅而行，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辅而行，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辅而行，但是应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离开武装斗争是无从去了解 and 部署根据地工作的。这一整套办法又要看具体条件，分别主从正副，因地制宜，而不能固定一套毫无变化。

第四、党政军民的工作关系应密切配合，应特别强调统一指挥和领导集中，一切互相牵制闹独立性的现象均应严格纠正。

以上四方面总括说来，包括了今天在敌后指导战局的全盘方针问题，即军事方针与政治方针的综合运用问题。这无疑义是战局转变到现在在敌寇残酷“扫荡”面前所提出的新的问题。能了解和掌握这一新的方针，胜利即是我们的。我们从本书的许多论文中可看见华北军民在应敌的军政方针上的新的创获，特别显示着民兵自卫军的伟大作用，以及主力进行必要的地方化和地方军彻底地方化的益处。

以上就是我读了本选集之后的一些意见。本书内容丰富，我之所见仅系其一个侧面，若细心去研究的人，必能更有新解。

最后我提议华中各抗大、各党校，均应以本书作为军事政治的教材，领导教员、学员作深刻的研究。这种生动活泼的教材，是使教育与作战联系的

锐利武器。

不要随便看，以为这些都是过时的老文章，但老文章所包括的全是新的内容。

几年来华中的反“扫荡”经验也很多，各地也不断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收集起来与本书合并研究，益处更大。为了节省篇幅和物力，所以不添加进去。

最后得再指出一点，这本书自然还不能当成万宝全书，自然还不能完全适合华中各地的一切具体情况。我们应领会其指导精神和其基本工作方针，完全靠我们研究实况之后去灵活运用。打个比方，本书是剪刀尺子，自己的实际情况就是布料绸缎，如何量体裁衣，那就靠自己的努力了！

## 新四军在华中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 一、敌后抗战第六年

“七·七”全国性抗战爆发，我党即在东南各大城市进行抗战动员及组织工作。随着徐州、武汉的沦陷，我党即留在敌后，由城市转入农村去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掀起华中人民武装抗日的浪潮。一九三八年新四军奉令东征，与江淮河汉各地之人民武装汇合，更加强了敌后抗日阵线，由零星游击武装变为集团的抗日部队，指挥统一，地区联系，各种战争建设，次第兴办，蔚为大观。而敌寇之“扫荡”亦日益频繁；自汪逆精卫粉墨登场后，更以“反共”“清乡”为敌寇“扫荡”之前驱。战局之紧张，斗争之艰苦，物质供给之困难，诚为前此所未有。本年为抗战六年度，亦即新四军东征后之第五年，抚今追昔，训诫良多。试略举敌我一年来军事斗争之诸大端为本军同志告，并以就正于国人！

### 二、敌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

去年夏，敌寇以独立十二旅团南浦部队[1]为基干，向我长江下游苏中地区进行“扫荡”，六月开始进攻南通、海门、启东地区，七月转至靖江、如皋、泰兴，八月九日转至高邮、宝应、兴化，并再度进攻南通、海门各地。敌之锐利武器为水行利用装甲汽艇，陆行利用装甲汽车，水陆配合，且有大量土著伪军配合，运动迅速，刀锋深入每一农村角落。我一师粟裕部，经四个月血战，始于十一月初制止其“扫荡”凶焰。北面敌寇于九、十月之间，大举“扫荡”山东我一一五师地区后，十月、十一月以十七师团小林部队为基干，以徐州为指挥中心，大举“扫荡”淮海地区及淮北泗水地区泗阳、宿迁、灵璧诸地，兽蹄遍至；并于津浦路西之凤阳、怀远、定远诸地，敌伪动员数达二万余人，继续“扫荡”，亘二月之久。我三师黄克诚部，四师彭雪枫部，二师罗炳辉部，均轮番与敌纠缠。敌虽曾占我中心地区，不得不被迫撤退。去年十二月为战局比较安定之月份，但敌寇是时正转移兵力进攻大别山及豫南友军李品仙、汤恩伯[2]诸部，本部决心自动配合：我二师罗炳辉部，七师傅秋涛部，在淮南路两侧及巢湖、桐城之线，予前进敌军之后路以袭击；我五师李先念部在黄冈、黄梅及平汉线上发动游击及破击战，均收效甚宏。敌虽占领光山、潢川、罗山、商城、固始、立煌[3]诸地，然历二十余日之激战，终在我国军抵抗及我军配合夹击之下，仓皇撤退。

当大别山战役进行之际，月初，敌伪不断在南京东南进行“扫荡”新四军及鲁苏战区副总部韩德勤部队，公开广播东京报纸社论，连篇累牍讨论“扫荡长江下游匪军之必要”，且谓“予韩总部、苏省府及新四军军部以毁灭性之打击，是粉碎英美反攻的太平洋总力战之必要部分”，又谓“长江下游，富于食盐、棉花、粮食等战争物质，实不容渝[4]，共盘踞其坐大，将为皇国百年大计之祸患”云云。敌寇鉴于多年“扫荡”之失败，转而与汪伪协商对策，选定人员专门研究中国内战经验，尤注意江西时期“围剿”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的研究。敌寇二月间草定之进攻计划纲要，其为日后攻战所证明者，其概要如下：敌寇判断鲁苏战区副总部及省府与新四军军部均集结于旧黄河与射阳河之中间地带，东至于海，西至运河、高邮湖。两部常在该地带

---

本文是陈毅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而作。



流转，敌寇决心以三个师团之兵力，进行大举包围，由西向东、由南向北，以实现歼灭我军于海滨之迷梦。敌寇计划之毒辣，于此可见。敌寇之准备迅速就绪，于二月十二日即开始进攻。北面出动之敌，为十七师团，由淮阴、涟水进攻，南面之敌为十五师团、三十五师团及独立十二旅团，由兴化、盐城北攻。十七日十八日两日，敌寇即在阜宁城、东沟、益林、风谷村、曹甸一线上，完成其合击计划，本军三师黄克诚与韩总部相为犄角，策应得力。韩部于十二日后分批突围渡运河西移，敌寇乃以全力“扫荡”我三师部队与整个盐阜地区。敌方分设据点，构成大小包围圈，大小合击数十次，企图打网收网，期一举而得鱼。我军反击突围，时分时合，忽现忽隐。敌我双方极尽其纠缠迂回扭打之能事。当此之际，我一、二、四师粟、罗、彭诸部，出动部队，援助友军，打击敌进犯军之后路。在路北侧翼，二月二十四日，彭部攻克泗阳之洋河镇据点，韩部突围路经此间，彼此配合，颇收协同对敌之效。韩楚箴[5]先生曾驰书致谢。我们深感援助友军，共同杀敌乃我们应尽之责，本军愿以更大之配合，期诸未来。二月二十三日，我一师粟部攻克南通东北曹家埠、孙塘等地，二师罗部乘虚以奇袭入淮阴城内，夺获敌马匹甚多，淮安、淮阴两城闭门数日。敌寇正面占盐阜区既难于站稳，而翼侧又受威胁甚大，顾此失彼，乃被迫撤退，敌寇宣称之盐阜、滨海“扫荡”遂于三月中止。敌寇自信其可靠之侦察，判定本军军部西移皖中无为、巢、庐之线，并以另一部南移苏南之茅山地区。敌寇不愿休息，复于三月十七日以大军进攻我七师之巢县、无为地区，并在苏南茅山地区加紧其第四期“清乡”，此为盐阜区大“扫荡”之尾声，亦即敌伪夸称对新四军之穷追计划。

江南战局至四月初略趋平稳，而苏南敌伪之“清乡”工作则已进至所谓第五期矣。我六师谭震林部活动于苏南地区，出没南京、镇江城下，穿插在京沪线上，为本军斗争最艰苦之区。一年来经过此次“清乡”，至今尚在坚持不懈中。

敌独立十二旅团南浦部队于“扫荡”盐阜区后，进驻苏中，即于四月初连续进攻李明扬、陈泰运、黄逸峰[6]诸部。我粟师迭与友军配合，不分畛域，使本军地区友军能够自动转移，能够获得必要供应。李、陈两将军与本军抗敌合作之友善关系，深为敌伪所嫉视。此种抗战中的真诚团结应随斗争的愈加紧张而愈益巩固。敌之独立十二旅团长南浦，乃敌方长任之“剿共”指挥官，进驻苏北已历三年，日与本军接触。三年来其所属五个大队长均已阵亡，石井负伤，部队消灭达三分之二。发动伪方向我军“清剿”为南浦得意之作，南浦亦以此自夸。今则以“清剿”苏中历未完成任任务，复与伪方矛盾加多，不能协作，南浦因之去职，继任者传闻为小林师团，伪方为张北辰，我一师在苏中之反“清剿”战斗必更加紧，可以预测。

我五师李先念部队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之两侧，北侧背摩皖豫，南侧襟带江汉，远出挺进，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今亦五年。今春二月十五日，武汉敌寇向长江与汉水间之三角地区进击我国军一二八师王劲哉部，沔阳以西地区失守，我五师即在汉川、天门之线进袭敌寇，给友军以支援。迄三月八日，敌寇发动长江南岸攻势，分五处于岳阳、沙市间渡江，进占公安、石首、华容一带，我五师即在敌后发动全面配合对敌之破袭战，五月中转战于宜都、安乡、南县诸地，复先后在潜江、沔阳、监利、襄阳等地发动游击战配合。总之，今春敌寇三次进攻我国军正面，我五师即三度在敌后痛击敌人，配合作战。其中以四月二十一日我五师攻入蕲春城、三月十

日进攻黄冈柳子港两役，对敌震撼之力最大，尤为当地绅民所称誉。

### 三、本军战斗举例

(一) 去秋九月二十五日南通战斗。我军歼灭敌保田大队长以下日兵八十五名，战斗形式为伏击。该敌于夏家渡[7]被我于其半渡袭击之，敌退守沿岸村庄顽抗，我继攻之，半夜放火围歼，始克竟功，守敌全部就歼，生擒三名。战后我军捡还保田尸首于南通，以示我之伟大器度。敌方收尸复信感谢谓：“贵军战后，归还战骸，宽仁厚德，诚贵军政略之胜利！”是役我军由奇袭转为强攻，伤亡亦达百余名。这一战役之功，在于阻止了敌伪下乡挺进之企图。

(二) 去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定远之敌松尾中队长率敌伪四百余，事前秘密进攻，企图一举而歼灭我驻在定远东南老人仓之驻军和党政机关；我军仓卒应战，予包围之敌以反包围，鏖战至午，定远敌大队来援，复陷我军于二度围困中。我军应战至夜，突围而出。是役敌伪伤亡五十余名，我们伤亡数目略等。老人仓虽沦为敌伪据点，然迄今敌未能再出。又三月下旬，淮阴、淮安之敌，逐日向我淮宝区推进据点，企图蚕食我军根据地。四月初已进至顺河集，企图进占高良涧、蒋坝之线，控制洪泽湖东岸，对我作更大之危害。我军于四月初袭击顺河集之敌，敌退至陈集。四月十日我军大举进攻陈集，亘一昼夜。敌三路来援，复放射糜烂性瓦斯以自救。十五日天明，我主动撤退，敌我伤亡均重。是役后，敌向南推进之计亦不得自动放弃矣。

(三) 今春敌寇“扫荡”盐阜区之际，二月下旬即安布据点，计二月末到三月初，在不及两县范围之地区，即新增据点六十余处，妨害我军民居住活动甚大。我军乃于三月中旬后，发动拔除据点之反击战。三月二十五日，我军进攻阜宁西之陈家集，战斗当夜开始，敌据屋顽抗，我继以火攻，战至天明，敌不支突围；阜宁城之敌来援，亦被我军袭击于中途。是役敌三十五师团之高智也中队计八十名全部歼灭，伪军一部亦同归于尽；我军亦伤亡计营长以下百五十余名。除了此役外，还有其他如单家港、建阳诸地之著名战斗。敌不得已乃紧缩其据点，将新增之六十余据点，减至十一处。敌寇密布据点即所谓钉铁钉之政策；我军拔除据点，即所谓拔出铁钉之战术。钉铁钉之力愈大，拔除之力必超过之，始克有济。战斗之险恶残酷，可以想见。

(四) 今春三月十六日，淮海区敌寇分兵十一路，计敌兵千余人，包围我进驻梁岔之部队，企图以铁壁合围，全部歼灭我军。我军闻讯，灵活转移，跳出包围。敌调兵追击，复于十七日续行第二次合击计划。双方遭遇于涟水老张集、朱杜庄一带，激战半日，我军复于黄昏后突围转移至牛皮镇、刘老庄等地；十六日晨敌三度合击，我军先头部队安全突围，而后卫则陷入重围中。我军乃就田畴间之交通沟进行抵抗。第一阶段，我军进行突围，屡次与敌肉搏均无效，乃决心固守待援。第二阶段，敌见我转攻为守，欺我力弱，以大队兵力向我猛冲，为我军击退；其冲至防御工事前沿之敌，下马肉搏，均为我刃毙。第三阶段，敌悉知我仍不易欺，乃选择较远距离，重新配备火力，以机枪、大炮集中放射，对我进行火力毁灭；是时敌寇知我军已突围无望，乃妄想降服我军，无耻的伪军乃开始其招我投降之火线喊话。我军将士坚不为动，乃从容将机枪步枪拆毁，并将文件杂物付火，将忠骨掩埋后，乃集中未伤者之二十余名，进行最后之突围战；至下午五时，终全部殉国！此我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第四连全部，连长白恩才、副连长石学富、政指李云朋、文教孙尊明、排长张庆忠、蒋员连、刘登甫等以下计八十二人，无一

投降者，无一生还者！诚悲壮矣！敌寇虽陷灭我军一连，其损失亦相近。此役敌寇所获者无一可用之武器和杂物。伪方传出消息，敌军对于我军壮烈之殉国牺牲精神，深致敬佩！当地人民于战后三日内，即将忠骸举行公葬，题为“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之墓”，过者无不徘徊流涕！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为式范而励来者。惟本军转战敌后，长年累月，应与敌之包围作斗争，切忌陷入敌之重围，此战术上之缺点，本军将士宜知所警惕者也。

（五）四月二十四日，我进攻运河西岸之洋河镇，经六小时战斗，歼灭敌伪军四百余名，残敌据房屋顽抗，我军以洋油火攻。房屋全毁，敌寇无一脱。我军在洋河镇上向民众收集火攻材料等，均照价给钱。洋河为苏北大镇，长十余里，战斗前后，我军秋毫无犯。后洋河伪军给罗坊伪方信称：洋河一战，人心大变，并谓“新四军固不仅以力服人，且能干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明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云云！

（六）苏南我军于四月十五日奉命渡石臼湖（溧水之西，高淳以北）西向游击。十七日进至明觉寺附近，当被敌寇发觉。天明时，敌寇四路向我包围，双方遂于石臼湖东冈前堡、新张家、外赵五家、东五埭之线，发生肉搏激战。敌寇企图骗我全部投入石臼湖，葬身鱼腹。我军背水抗战，士气倍增；激战至夜，我军全力突击明觉寺方面之敌，敌不支溃退，撤围而去。我军当夜安全执行了渡湖西进之原定计划！

#### 四、战局平衡

分散兵力，巩固其占领之点线，集中兵力“扫荡”其攻击之目标，此敌寇战法之大要也。全面出动以包围我军之根据地，寻求我主力决战，此敌寇“扫荡”初期之动作也。密布据点，进行封锁，部署不断之大小合击，以肃清其占领地区附近之我军，巩固其已得阵地，均敌寇“扫荡”中期之部署也。“扫荡”末期，则进行所谓网梳式之“清乡”，其目的不在打击我之主力军，而以全力摧毁我方之党、政、民组织，遂行其“归化运动”，即所谓政治“清乡”是也。敌寇进军之初，先以军事镇压、火烧、抢掠，无所不至；继则进行其怀柔政策，以“反共”口号掩饰其毒谋，妄图使人民健忘而坠入其彀中；伪方上下，则为虎作伥。敌寇之分区“扫荡”为敌寇兵力不足之证据，敌寇“扫荡”时期，有继续至二月以上者，虽较过去为更持久，但终不能弥补其时间之中断；敌寇之施用毒瓦斯以及所谓三光政策、怀柔政策等，均为敌寇外强中干、力量不足、对我无可奈何之表现。此一年来敌寇“扫荡”之规律也。敌寇之所得，在予我根据地以极大之破坏，予我部队以相当的损失，但不能予我以根本歼灭；敌寇之所谓胜利，盖暂时之胜利，军事掳掠之胜利，战术上之胜利，而战略政略上之失败，则与日俱增，敌寇亦自知之。

分散游击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兵力以突击敌之薄弱部分，此我军反“扫荡”之战法也。“扫荡”初期，避免正面恶战，而必予前进之敌以阻滞；“扫荡”中期，相机击敌，而必予敌新建之据点和封锁线以适当平毁；“扫荡”末期，则必予敌以有力反击，并痛击伪部，以刈除敌寇之爪牙，歼灭敌寇以动摇伪部之心胆。我军抗敌有方，则伪部更必人心思汉，此乃事理之必然。我主力为反“扫荡”的骨干，灵活转移，在适当时机，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军之时隐时现，零整互化；民兵就地游击，就地坚持，神出鬼没于敌之卧榻居室，构成敌伪之日常恐怖。三者互相配合，互相转化，使敌伪

难于捉摸，敌伪虽强大，终必低首于此军民联合打击之下！“清乡不怕清，扫荡白费心”，此敌占区人民之民谣，实为对敌寇“扫荡”之正确结论。“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此为华中人民要求参军上前线之歌谣！盐阜区士绅慰军大会，其传单有云：“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挥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国民党书记长某君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淮海士绅见农抗会领导之民兵活动，使敌人不敢下乡滋扰；盐阜区士绅见民兵作战得力，土匪为民兵削弱，交口称誉“党政方面有远见”，并谓：“始知减租减息、扶助工农政策为抗战建国之大端；共产党能担负艰巨，又能与人民同享其成果，乃知我等以前之不满属于成见”云云。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来华中，调查反“扫荡”军民合作情况，指出：“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任，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谣言；余不亲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苏中有九十老人某君自言：“几十年来，数经世变，凡大战兴起于城市，匪乱必盛于乡间，战争之直接损失尚小，战后引起之兵荒匪乱，使人民受祸至大。不料苏北处在经常与敌伪对战，大军转移以后，月必数至，甚有日必数至者，而乡间秩序井然，无跑匿畏兵畏匪之累，此乃党政军之得法。战后若天下太平，当于此终其生”！沪上文化界某君等，获悉反“扫荡”中我军与苏北友军配合作战的情况，为之大悦，并致书申其敬佩。以上皆人民对本军之评论。其于本军之缺点或略而不言，或嘉其长而缩其短，或言其大而略其小；以本军之实况当之，自省仍有愧怍之处。然而环顾国人中间，亦有人以“游而不击”的蜚语诋毁本军！古云：“止谤莫如不辟，止毁莫如自修。”本军素以此义自励，但上述人民之言论，固系公正之判词，当为国人所共鉴！

##### 五、克服困难迎接胜利

抗战第七年时局，对日寇必日益不利，其疯狂镇压敌后必日益加紧，严重“扫荡”必然来临。本军决心不惜重大牺牲，坚持敌后，支撑全面抗战！本军损失无可避免，而敌寇又不能不付出重大的代价。战局之必趋于更加严重，此困难之一面也。

抗战第七年，华中根据地，平原地区甚大，战局时紧时弛，尚有喘息余地。今则敌我战斗处于狭窄地带，寸地进退，皆非易事；“游而不击”者必亡，击而无力者亦必亡；既游且击，击必得手，此本军在敌后生存发展之道。违此者必降为敌寇之降虏，其证例甚多，无庸列举。本军在武器拙劣和弹药缺乏条件下，向强大之敌寇作战，故战斗之夜间性、白刃性、流动性、短促性、群众性，表现最为明显；伤者多重伤，重伤者多死亡，此医药缺乏之所致，此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自皖变以来，迄今仍有友军不断予本军以高压：我五师、六师方面完全处在两面被夹之地位。我四师也常在友军袭击状态之中。本军忍辱负重，不愿轻辟事端，扩大事态，仅限于严正的不得已的自卫。去秋浙赣路战役爆发，苏南皖南约六千里撤防，本军无一兵一卒南进，此为铁铸之事实，为江南友军官兵、地方绅民所目睹者。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援助敌后抗战之孤军，撤销磨擦方案，放弃特务政策，此本军所馨香祈祷者也！国内关系僵持不下，

友军煎迫迄未停止，此本军处境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近年法币贬值，百物飞腾，敌后部队给养更见困难。去冬以来，本军即本“寓兵于农”之旨，从事生产，力求自给自足，比者黄梅初熟，麦黄菜青，荒地润，水利兴，生活逐渐改善，人民负担亦为之减轻，此我军生活之困难以及如何克服之又一方面也。

以上仅就内部外部之困难条件大体言之。本军将士身经数百战，出生入死，一心一德，政治觉悟和战斗能力，均历经考验，加以当地各界人民同情，人民乃本军之父母，本军乃人民之卫士，故本军虽临万难，信心坚定，始终如一。盖困苦艰难之来既无可避免，惟奋斗不息方足以克之，最后之胜利，盖属诸最后之搏斗！孟子云：“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8]；本军对国家民族之忠愫，庶几近此。如何以民主方策澄清时局，外以适合国际民主之潮流，内以解决多年内争之纠纷，改正罪过，反躬为上；是非混淆，民意是从，是在明达者一转念间耳。抗战六周年，胜利在望，克服困难，以迎接新时代之胜利。本军将士仅以此自勉并待教于国人！

#### 注释

[1] 独立十二旅团南浦部队，指南浦襄吉少将任旅团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

[2] 李品仙、汤恩伯，当时分别为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3] 立煌，县名，即今安徽省金寨县。

[4] 渝，指退据西南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党当局。

[5] 韩楚箴，即韩德勤。

[6] 李明扬、陈泰运、黄逸峰，当时分别为国民党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国民党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亦称税警总团总团长）、苏北联合抗日部队司令（属新四军苏北指挥部）。

[7] 夏家渡，实地名称为谢家渡。

[8] 孟子云：“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见《孟子·尽心上》。

#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一九四四年夏)

## 一、华中情况

### (一) 基本情况

华中地区是处在敌伪与顽固派两大力量对峙之间，处在敌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派遣军[1]之间，处在华中汪伪[2]与华北王伪[3]之间。同时敌伪内部矛盾，伪军与伪府矛盾，伪府本身矛盾和伪军内部矛盾，以及顽[4]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之矛盾，顽方内部派系矛盾，敌伪与当地人民的广大矛盾，以及其他矛盾等等，极为复杂错综。以上种种矛盾虽然以民族矛盾为主潮，但每一次要矛盾虽小，在地区斗争和策略上有极重要意义。

又华中基本地区在江苏北部、安徽东部、湖北东部，旁及豫南、豫东、鄂南、鄂西、苏南、皖南、浙东各一小部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处在江、淮、河、汉之间，是南北殊风异俗的中间地带。基本地区背靠黄海和山东，向南向西作战。国民党在华中苏皖诸地和平统治了十余年，江浙资产阶级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领袖，故国民党的影响是比较强的。另一面上海历来为我党工人运动的据点。农村中如淮海、苏常[5]、南通、如皋、广德、宜兴、盱眙等地农民运动曾前仆后继，大别山苏区的影响更大，故我党在华中亦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

### (二) 敌方情况

华中包括沪宁、武汉、南昌、杭州、徐海[6]等地。敌兵总计第十一、第十三两军，辖十四个师团兵力，共约十五万人。太平洋战争前，在华中有敌陆海军不同系统的区别，后因海军调赴南洋，沿海、沿江均隶陆军统辖，此种区别已不存在。敌方师团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为旧制一师团二旅团四联队制，另炮、骑、辎、工四个联队；乙种师团下废旅团，直辖三联队，设一步兵指挥官；丙种师团下辖两旅团，废联队级，每旅团直辖四个步兵大队。这种编制的改变系敌军从一九四一年底起的新调整。1. 明白划分正面与敌后任务。第十一军驻武汉，担任正面对付顽方，随时有向西进击的任务。第十三军驻上海，专任镇压敌后，有随时增援南洋和协助第十一军进击的任务。

2. 实行精简以应付具体情况。敌军中之废旅团、废联队以及减少特种兵，皆系针对敌后我军情况以及华中地形而特别改变的一种精简办法。

3. 在敌后亦同时划分敌后地区的攻守任务。敌后之小据点通常以敌兵一班配以伪军百名上下，专任巩固交通，不担任“清乡”任务。而大据点及城市则驻敌之大队部或中队，担任策应各小据点并兼任“蚕食”出击任务。联队或旅团驻较大城市或交通中心，手上控制了机动部队，担任巩固全地区治安，并兼任战术或战役性之“扫荡”。

4. 敌在华中之“扫荡”可分成下列诸种：季候性“扫荡”，着重夏秋抢粮；“蚕食”性“扫荡”，着重推广伪化；报复性“扫荡”，着重回答我予该敌之打击；袭击性“扫荡”，着重大举包围歼灭我军之主力和分割地区。

---

这是陈毅一九四四年夏在延安代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节录。原件没有写作时间，这个时间是编者考定的。

敌之战役性大“扫荡”，每年有一次，包括对我军一个战略区，或两个至三个战略区，时间在一月左右，多由敌师团部主持，旅团指挥之。“清乡”性“扫荡”着重镇压我之某一点，通常包括二至三个县，着重先以武力驱逐我之部队，再继之以各种软硬兼施的伪化工作，提出不流血“清乡”、和平“清乡”、政治“清乡”、机动“清乡”等欺骗办法，履行自首政策和封锁政策，时间以每季为一期。“蚕食”与袭击等“扫荡”则时断时续，此起彼落，为边缘区工作情况的特点。

5. 敌师团、旅团、联队甚至大队、中队之间的防区分界线，即两个以上指挥系统的接合部，仍形成极大空隙，我方可以“此剿彼窜”，对坚持根据地有极大战术意义。

### （三）伪方情况

应分为伪府与伪军两种。先说伪军。

1. 伪正规军计任援道（京沪）、李长江、杨仲华（苏北）、杨揆一

（武汉）、张岚峰（开封）、刘湘图（兴化）、徐继泰（淮海）[7]、汪伪中央直辖（警卫师、税务团、上海保安团）等八大部分。任援道伪军为汪投敌前成立，故多土匪、散兵、帮会成分。李长江、杨仲华、张岚峰、杨揆一等及伪中央警卫师多为投敌顽军及一部投敌地方实力派，或顽军俘虏交汪补充者。故正规军计分伪化顽军、伪化地方实力派两种。伪化顽军多为顽方掌握，企图利用敌寇以攻我，不易争取，敌亦不大信任。伪化地方实力派容易争取守中立，敌对之亦甚重视。

2. 地方伪军计苏、浙、皖、豫、鄂、苏淮特区六个省单位，包括县警队、反共自卫队、清乡队等，总计十一万人。其成分以当地帮会土匪、旧政权衙役警察为最多。另有一种系地方士绅处敌据点附近，不得已而投敌者。另一种为地方土匪武装，先经过我军改编，以各种原因争取未遂而投敌者。前者经我军工作容易成为两面派或三面派[8]，后者则多半为坚决反我成为地方顽化伪军之类，对我危害较大。

3. 伪府方面计分还都派、维新派两大派。还都派又分周佛海[9]财政系与陈公博[10]之原改组派两大系。维新派以梁鸿志[11]等为首，系北洋余孽，以中日战争完全应由国民党负责，颇以历来亲日不反日自诩。日方认为此辈对大东亚秩序有深刻认识。故曾见重。但冈此辈对渝方[12]无瓦解分化能力。对华中人民无号召作用，故于汪还都时暂时失势，但日方并未抛弃他们。近来鉴于汪的能力有限，又渐渐垂青维新派。还都派以中日共甘苦同生死，和平反共建国相号召。在日方眼光中还都派比较倨傲，维新派则更恭顺。日方利用周佛海收罗京、沪资本家担任向国民党大后方走私，吸收战争资源，成绩很不坏。日方利用汪、陈改组派对渝方作政治分化诱降等工作，亦收得许多效果。

4. 敌方对伪方的政策。日方支持华北、伪满，反对汪系以打破汪伪大一统的迷梦，并限制其向华南发展，限定汪之势力不能出华中一步。这是日本对诸伪逆的分治政策。日方限制伪方各派系的办法是政不建军，军不干政，以隔离伪军与伪府的关系，同时又不让伪方派系直接建立武力，和不准伪军直接干政。这是日方对伪逆的军政对立的脱节政策。比如汪刚好建立了两个中央警卫师（一色中条山俘虏[13]，日方即勒令调一个师赴南洋参战；李士群[14]积极搞武装即被毒死等等。日方对华中伪军师以上均派了日籍顾问，南京成立了顾问部，直接统辖伪军，离间其与汪伪的关系，制造和掌握诸伪

逆、诸伪军的内部矛盾，以达到忠实的为其服务，是日方对伪方的基本政策。

5. 华中伪军的特点。在淞、沪、宁、汉、长江下游一带帮会势力甚大，来源于失业群众的流氓化，且有不断补充，故形成相当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流氓群众均有头目率领，系统分明，具有长期斗争经验，自逊清迄今均替统治阶级服务。统治者不断改朝换代，而他们的地位是不改变的。旧统治者退场，新统治者上台，仍然要吸引他们成为爪牙，而轻便取得统治地位之巩固。华中自敌伪盘踞以来，照老例并未改变这一事实，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地位反而提高了。伪府伪军均以这一事实为其下层基础而建立起来，各县、区的税收、警察机关，公务人员均属此辈，我们在接敌区域，如京沪线，苏中、苏南一带，能够开展据点工作，也由于利用和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是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政策，既在我们根据地不予青洪帮以合法地位，也不一般号召反对帮会。同时在敌伪区则以个人名义个别利用帮会友谊来策动反敌伪，并争取伪方人员为抗战服务，收得很大效果，其中有不少分子转变终成正果。

6. 维新政府时代，在华中仅有地方伪军，但零星小股，不成气候。汪逆上台和我在华中反顽战斗胜利，大批顽军不断投敌，始有集团伪军出现，此为汪逆对敌寇之大贡献。一九四一年起至一九四二年，敌伪着重编整正规伪军，作为镇压敌后之助手，以补其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之不足。一九四三年夏大批建立县、区地方伪军，实际与我进行边缘区之争夺。一九四三年春日方派平沼赴宁答访，召集顾问部开会，总结了敌方伪军工作，其结论指出：支那事变[15]以来，中国建军以伪满皇协军成绩很大，对皇军有认识，思想业已肃正，在顺天讨共安民上成效显著；其次推华北治安军；华中和平军抗战思想尚未根本消除，应首先肃正，取法于皇协军和治安军，因此一九四三年后敌汪乃有积极编整伪军的计划，敌汪与伪军间之冲突亦更加尖锐了。

7. 伪府各派对我只有个别关系，由于我未主动去联络。伪军如李、杨、刘各部则与我之关系密切。但伪军是敌、顽、我三方争取对象。敌对伪完全以力服。顽对伪依靠其中央合法正统，以未来的高官厚禄为饵。我方则以在敌后的优势（力），民主政治的光明前途（理），根据地的粮食、税收等伪军非靠我不可（利），先之以力服，次之以说理，再加现实的利益，亦可打动伪方，动摇其投敌反共意志。

#### （四）顽方情况

##### 1. 汤恩伯系统：

（1）正规军：四个集团军计八个军，二十二个师，总兵力计十五万人。

（2）苏北挺进部队：计独立旅一，十二个地方游击纵队，总兵力约二万人。另李明扬、陈泰运、张星炳[16]三部留苏中不足三千人。

（3）鲁西挺进军沈克部，计七个纵队和二个独立支队，总兵力计万余人，驻冀鲁苏边区，与新四军关系不多。

（4）豫东挺进军陈又新部，在豫东与睢杞太[17]接触，总兵力计六千人。

汤部总计二十万人左右。

##### 2. 桂军系统：

（1）正规军计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辖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三个军，计六个师。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辖第六十八、第九十五两个军，计四个师。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瓚绪部两个军，计四个师。另第四十五军刘和鼎部两个师拨归李品仙指挥，驻鄂东。



(2) 豫南挺进军李金丹部，兵力约六千余人。

(3) 鄂东挺进军程树芬部，兵力约六千余人。

(4) 淮南路两侧及平汉路南段两侧之地方部队，兵力约二万人，直接归李品仙指挥。

以上桂系约五万人，孙连仲部约一万四千人，刘和鼎约万余，川王[18]约二万，正规军总计十万人，以桂系为主干（五万），地方部队约四万人。

### 3. 江南第三战区：

正规军计浙东李默庵[19]和皖南唐式遵[20]二个集团军，在苏南有第五十二师、第四十四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及“忠救”[21]残部，均分布在接敌区域，担任对敌对我之双重任务，总兵力不足十万人。顾祝同[22]之主力王敬久和上官云相、陶广[23]三个集团军约六万人，均位置在金华、上饶、南昌之线，担负对敌任务，皖变后与我无接触。

以上华中汤、李、顾三大系统，总计正规军三十五万人，地方武力计十五万人，约在五十万人左右。

4. 一九四一年黄桥战斗后，接着皖变爆发，顽方决定以李仙洲[24]集团援鲁，王仲廉[25]集团援苏，以“忠救”军挺进苏南，企图北渡长江援韩。此为三路与我争夺敌后的计划，而以汤恩伯总其成，以李品仙进入皖东作策应。此计划经过一九四三年春韩德勤之最后失败，李仙洲入鲁受挫，于学忠[26]撤回豫东、皖北，顽方与我争夺敌后之计划最后失败。故于一九四三年夏季之后，蒋、何已主动放弃派大军进入敌后的计划，乃改变对策，严令桂系保持淮南路东侧的敌后据点（在全椒、合肥、江浦一带）与我二师对峙；令韩德勤保持津浦路东灵璧、唯宁一带据点，与我四师相峙；令李明扬留苏中，掌握李长江等伪部待机反正，并策动敌寇扫我；令“忠救”挺进苏州、无锡、江阴，保持北渡的道路。这三种步骤是在保留敌后战略支点，顶为将来大军反攻反共的准备。同时这些支点还有积极掌握伪军、组织特工对我破坏、保其政治旗帜的积极作用。因此顽方两大部署：正规军全部观战，不抗不击，保存实力；而地方游击队挺进敌后，以政治破坏为主，军事骚扰为辅，达到继续在敌后进行反共工作为目的。

## 二、华中工作发展过程

### （一）抗战初我们的力量

一九三八年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时计六千人，枪二千余支，轻机枪只三挺。在江北高敬亭四支队计千三百余人。全军计八千人。其中长征后留下的红军游击队成分，江南闽、赣、湘各地共约二千人，以后和平实现后，陆续收容、招募计四千人；江北四支队老基础约六百人，抗战初期招募七百余。当时各路游击队分散各方，政策转变的时间先后不同，特别当时项英同志对新形势认识不够，他本身表现由国共对立转入国共溶化的情绪，未积极放手吸收青年（怕特务）、吸收新兵（怕破坏国民党兵役法），又因经费困难，不敢搞大队伍等。地方党仅在徐州、上海开始了一些恢复组织的工作，而在农村中则有一大批出狱归田失联络分子，或系自新分子，在农村自动开始抗日工作。

### 1. 华中工作的三个时期：

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27]，开始华中工作的新时期。以后工作发展，六年来可划分为二个时期。

甲、第一时期：从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三九年冬。此一时期是最好发展时期。南京、徐州、武汉三大城市相继沦陷，我党我军声誉突起，国民党限制不大，应大胆迅速东进向敌后发展，但当时则采取沿途停留，不愿脱离国民党区域，等待敌寇前进。应放手到敌后去解决人、枪、物和根据地问题，而当时则采取整训部队提出建军的精兵方针，把大批新旧干部留在皖南作训练教育工作，使敌后前线工作人手不够，而限制了自身发展。新四军是由各路“诸侯”、大小“股东”集成军，自然在当时形成各种严重现象。项英不了解只有在政治上领导东进求得大发展，才能团结内部，说服同志，克服各种倾向，反而死死箍在皖南，必然是治丝益纷。对恩来同志三九年春传达中央指示后确定的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亦不具体执行。特别到一九三九年冬八路军大发展，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北爆发，顽方在华中对我进攻日亟，项英同志反而信赖顽方说华北过左，对中央所提出的反投降任务及应付突然事件的方针，项不但不执行并且不着重传达，更无部署，这里就深深种下了尔后皖南惨败的根苗。这一时期应该以向敌后大发展为中心，项的领导是闭关自守，丧失时机。但在此时期，前方各部仍有一些发展。苏南第一、第二支队已完成直达淞沪，足跨长江两岸的发展，造成了大军可随时北渡的优越条件。第四、第五支队在江北亦有些发展。彭雪枫、李先念于一九三九年在豫东、武汉外围开始了游击工作。此时全军力量计皖南七千人，苏南一万一千人（调回皖南四千人），江北七千人，加上彭、李两部不到五万人。

乙、第二时期：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冬。此时期的特点：敌寇诱降日亟，国民党华北敌后失败，我党我军在华北大胜利，英美东方慕尼黑政策，汪伪粉墨登场，国民党积极反共，企图造成

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磨擦中心转移在向脆弱的新四军开刀。这时顽方部署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一九四一年夏开始），以冷欣[28]进攻苏南，韩德勤、李明扬进攻皖东、苏北，李品仙进攻皖中。项英同志处此紧急情况，对部队毫无精神上的反磨擦准备，政治上、组织上均如此。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不敢抗议，不敢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而事事让步，而且压制各支队对顽方进攻的正当防卫的行为。如处置苏南对冷欣抗议事件，反对东路撤兵到江北发展，处置皖东反击刘子清无理进攻的事件，阻止张、邓[29]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提议和部署等，均要下面无条件退让，而皖南军部附近对顽方屈服事件，更指不胜屈。

此时刘少奇同志奉令南下，中原局成立，解决三大问题：第一，以坚强而正确的反磨擦的统战方针，针对着顽方计划，予以不断摧毁，改变了华中空气，纠正了对顽的怯弱心理，使各个战线上取得了反顽的伟大胜利；第二，统一指挥苏南、苏北、皖东及李、彭、黄[30]各部。顽方以分进合击对我，我以战略统一各路应战回答，补救了新四军当时的分散不集中可能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第三，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首先在皖东之路东、路西开始了群众工作的建设，予华中全局以先导作用。这三个问题以争取反磨擦的军事胜利为中心，掌握得很紧，在一年半之间，创造了华中根据地，挽救了项、袁[31]所造成的危局。

丙、一九四二年春反顽战役任务大体完成，敌寇转而积极“扫荡”我军，根据地建设必须开始。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检讨抗战以来的工作，定下华中

尔后工作的方针。这样正式开始华中工作全面的建设时期，即华中工作第三时期。

## 2.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成就：

(1) 扩大会议关于总结工作的部分（略）

(2) 一九四二年扩大会议所提的新任务，当时华中反顽战已大体告结束；全国局势是日寇诱降，国民党从各方面准备新的反共高潮，以反共和缓敌寇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寇大举对华北、华中“扫荡”，因此提出坚持敌后抗战、渡过难关，继续积蓄力量，努力建设、完全巩固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新任务。在这一总任务下，又分别提出对敌伪斗争，对顽斗争、军事建设、群众工作、改善民生、政权建设、地方党建设、防奸工作、财经建设等九大工作任务。总括二大项：第一群众建设，第二军事建设，而把中心摆在减租减息、提高工农、改造政权、实行三三制、武装地方、发展民兵诸项之上。首先解决深入群众工作问题，再陆续过渡到其他环节，最后造成华中根据地工作的全面深入进展，完全巩固的目的。

## 三、华中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 (一) 对敌伪斗争的经验

1. 一九四一年以前我在华中不占主导地位，未被敌方重视。敌当时以对顽为主，几次大举“扫荡”苏北，使韩、李两部[32]损失甚重。但我军在苏南打敌的成绩不坏，开始引起了敌寇注意。敌一面发传单警告新四军将士应知道北伐时期受蒋利用打北洋系，蒋成功以后即屠杀共产党，现在不要再上蒋之当，盲目抗战；一面向我苏南军队致送定期决战书，反对所谓卑鄙行为，而且到处宣传新四军无勇气正面决战，只会偷摸的杀人放火等。此时的教训是过分予敌刺激和暴露了自己，形成了苏南局面的困难，但这对于渡江以后对敌战略有进攻的作用。这是一九四一年以前敌以对顽为主，以对我为辅的初期状态。

2.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是华中大磨擦时期。敌寇采取放任政策，两不妨害，让顽、我扭打下去。敌寇对韩重视，对我轻视之用意显然。项英同志不懂得具体分析这个形势，说敌寇要阻止其渡江，是错误的。事实上大江两岸过渡极为自由，敌寇不加阻止的。第二次黄桥决战，李守维与我大军鏖战三日，泰兴敌寇派队进至黄桥西门外十五里地，观战两天，不前进妨害我军。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亦如此。形成四种力量并列，而两方苦打、两方观战的奇局。我方胜利，彼等即撤退，如我败退，彼等必出来最后收拾我军。这是敌寇对国共磨擦的放任观战时期。此时期使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去利用和扩大敌、顽的矛盾。

3. 第三时期是敌寇以对我为主而助顽反我的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因为我在华中已由敌、顽、我之第三位。取顽地位而代之进到第二位，我与敌矛盾加重。敌大举向我“扫荡”，对顽不予妨害，转而采取助顽以反我的政策。此时期独立应敌，华北抗战经验对华中帮助甚大，使华中对敌经验向高级方面发展了一步。

4. 第四时期是敌寇双管齐下，打击顽、我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二年末到一九四三年春。敌在半年之时间同时对韩德勤、李品仙、李明扬、陈泰运和

对我第一、二、三、四、七各师先后举行大“扫荡”，规模是空前的，时间继续到二月以上。一面由于敌寇在第三时期专力对我搞不下，相持极苦；又由于我党二次“七七”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国方亦散布政治解决之麻药，顽方大举东进，策动伪军反正进行很积极，伪军动摇。敌寇鉴于德国转入败局，自己在西南太平洋形势不佳，故大举“扫荡”以达到所谓安定“和平地带”（即汪伪地

区）的目的。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韩双方撤销了以前对立局面，开始反“扫荡”中的协作，“扫荡”结果，是韩德勤在敌后阵线总崩溃，客观上造成我在苏皖敌后的清一色。敌寇歼灭韩军万余，稳定了伪军，使顽方策反计划破产。而韩顽对我，初则俯首受缚，继则感恩释放，终则退出敌后。[33]

5. 正确估计敌、顽、我三方面的具体形势，从敌、顽矛盾中趁机活跃加强自己。每一个时期要善于正确了解敌、顽企图，抓住主要一面，不要面面进攻，使自己枪法散乱。全局是敌、顽夹击的形势，而具体战局则始终只有一面战争，我应沉着应付，打破危局。这是应付敌、顽夹击的具体经验。最标本的是五师的例子。我五师地区几年来均处在敌、顽夹击的情况。敌寇沿江沿铁道有强固封锁和防守，我五师则在敌伪据点的侧近和外围。顽方依托其大后方向我逼近，企图逼我投入敌伪罗网之中；敌伪由据点出击，迫我转入顽军地区，以引起磨擦。我五师完全执行了灵活的攻守穿插战略，一面背靠敌区以对顽，另一面又背靠顽区以对敌。敌、顽绝难一致同时进攻，故我得利用其空隙以生存和发展。同时几年来敌寇向西大举进攻数次和“扫荡”大别山一次，客观上缓解了顽方进攻我五师的严重形势。同时李、汤大军控制中原、襄河两岸及陈诚、薛岳在江南[34]，均吸引敌寇之注意力，此一空隙亦予五师以生存发展的机会。同时五师地区皆系老苏区，干部多本地人，此一优越条件亦全国敌后各地所无，且领导甚强。这是五师长期在夹击情况中发展坚持的特点。

6. 应付敌伪联合“扫荡”的经验。华中有大股伪军，通常是敌军三千人左右配合伪军万余出动“扫荡”。伪军迷信敌军实力，形同狐假虎威。敌军利用伪军，恰似如虎添翼。其进攻队形分两种，第一种敌伪混合编组，第二种敌伪各占一翼。我军应付方策是：予敌以打击以动摇伪军信心，予伪军以打击以减低敌寇对伪军的信任。因此应具体分析每一反“扫荡”战的形势，或专打伪军，或专打敌军，这样造成敌伪相互抱怨，扩大敌伪的矛盾，而最终达到击败敌军、制服伪军的目的。因此斗争的结果，敌寇与我军损失通常都不大，而最苦的是伪军，如是伪军必转而求我。这就是善于区别敌伪，利用敌伪矛盾的主要经验。如苏中地区有一时期专打伪军，愈逼愈反，乃造成伪军死心塌地帮助敌人。华中伪军与我斗争多半反复无常，时和时战。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敌则驱遣伪军以厄我。因此我军应认识到敌伪是一个体系的敌人，但仍然在策略上战术上区别其间有民族的不同，利害、地位的不同。明乎此，便可知无不可争取之伪军；即是打仇了的，亦可言归干好，供我之利用的。

7. 反“扫荡”之战略战术一般经验是：敌寇优势在于集中“扫荡”，而分散防守是弱点。我军之优势在于分散游击，而集中驻扎乃我之切忌。敌寇之分进合击，我则分散穿插。敌寇集中火力企图压碎我一点，我则事先转移，让其扑空，而转头陷敌之空隙。我之分散游击带经常性，但必须懂得组织必

要的集中突击。敌之集中亦不是经常性，而其分散则带固定性。对敌大小“扫荡”不能一味硬打，但亦不能不打。“扫荡”初期、中期主力应避战，而施行地方武装、民兵的纠缠。“扫荡”末期则主力应趁机突击，以收复可能收复的地区。集中与分散，转移与穿插，突击与避战，应综合应用。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三者应适当配合，这是华中一般惯用的战法。在战略上应基本上把握抗战的长期性和敌后分散的游击性，只能在长期斗争中来改变敌我双方形势，即逐渐削弱敌人，积蓄自己力量，造成自己优势，以最后战胜敌人。急躁性、冒险性、悲观失望均应随时纠正。强调实施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上强调统一和各兵团的协调，战术上战场上的指挥一般不宜多所干涉，而充分发挥下级的创造性、机动性。

8. 在华中敌前有国民党强大武装汤、李、顾三部，在敌后有我新四军的强大力量。我在敌后，国在正面，形成对敌寇的夹击。因此敌寇在华中全盘战局仍以国方为主要对手，我在全局说处在空隙和次要地位，此为华中“扫荡”不如华北严重的一大原因。另外华中沿江沿海重要财富均落敌手，我军所得的地方仍然是一些偏僻农村，故敌寇也不以全力来争（苏中、苏南除外），此为第二原因。第三，敌寇在华北几年来用了全力，未将八路军搞下，因而也觉得新四军也是不易搞的。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对新四军有掩护作用，正如苏中、苏南的坚持对华中全局有支撑点的作用一样。第四，敌寇依赖华中大股伪军作为其巩固的助手，这些伪军予敌军以帮助，而敌伪矛盾却形成供我利用的空隙。第五，华中根据地和军队发展在后，学得华北一些经验和最初在苏南的经验，没有不计后果地予敌以打击和破坏，工作方面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办法，敌寇重视华中不如华北，重视新四军不如八路军，这也是华中情况较为缓和的一个原因。以上五点加上其他一些敌我双方原因，造成华中局面比较安定。六年来我军根据地均保持巩固而发展的形势，这个形势能保持至反攻时期则最好。

## （二）对顽斗争经验

### 1. 顽方对我的政策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顽方的分化溶解政策。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顽方还梦想经过叶挺关系分化新四军，又看着新四军与八路军步调不同，更增加其幻想。如果当时军部有正确的策略领导，本可乘顽方的幻想之际，自己可以假意佯装而放手在一、二年之内首先占领华中阵地，惜乎项、袁把假人情当作真朋友，忘记了自己立场而在各方面丧失时机。顽方以后见叶挺不受其利用，分化新四军无望，乃于一次反共高潮后，针对新四军准备其第二次高潮，而决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

（2）顽方武装进攻时期。此时期前一阶段顽方是企图以其敌后力量独立解决新四军，对八路军南下部队防御，对新四军采取攻势。其失败在过分轻视新四军，不知道新四军改换了，策略转变了。后一阶段正面计划，汤、李二十万大军东进增援苏鲁，而敌后顽军则采顽抗固守的围寨政策，形成顽我在敌后的堡垒对峙局面。时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

### （3）顽方对我的政治破坏、特工破坏、组织土匪游击骚扰、策动

敌伪“扫荡”的时期，从一九四二年春到现在。这时期为顽、我双方政治对政治，游击对游击，堡垒对堡垒，民兵对土匪，斗争极为复杂。但敌寇之封锁，阻止了汤、李大军东进之企图；敌寇之“扫荡”，驱逐和削弱了顽方在敌后的反共力量。

2. 顽方内部矛盾之利用是极复杂的一个策略问题。首先要有正确分析，不可一概视为同等程度的顽固分子。如利用韩德勤、李明扬的冲突解决苏北问题，这是利用了地方实力派与顽中央系统的冲突收得的效果。五师方面利用孙连仲（西北军）、王瓚绪（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程汝怀鄂省地方实力与桂系（外地实力）的矛盾，亦达到了反顽战斗的若干便利。反之，彭雪枫在初期利用了何柱国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当地西北军失意军人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满而便利了自己的发展。但到一九四一年自己力量膨胀，即很轻率向何柱国、马彪等进攻，堕入顽方奸计，以致他们团结对我，而造成自己的失败。又在江苏陈果夫当政，顾、韩系及复兴社[35]受 CC[36]打击，以后韩系当政，CC 及李明扬亦受打击。我军过江，CC 则采取利用新四军以打击韩德勤的政策，我军则慨然接受，向 CC 伸出合作之手。在反韩斗争中，苏北地方 CC 对我军帮助甚大，其首领张公任[37]因此受陈果夫的疑忌，电其到渝面谈，张因此愤怒病故。张如不死，形势逼迫有使苏北一部分 CC 左倾可能。另一例子，韩在黄桥惨败后，利用霍守义[38]东北军与我之关系，以缓和我之进攻。我亦利用东北军旧关系（彼军对我颇以恩人自居，认为在西安事变前主张停止剿共对我有功），企图中立霍守义便利抗韩。霍则利用韩我冲突，依、违两可，以求生存。最近霍守义因跟韩走，脱离于学忠升任军长，大得利益。韩确受了霍之帮助。我在利用韩、霍间关系亦并未吃亏。项、袁在皖变前则不懂得利用川军与顾祝同之间的矛盾，堕入顾祝同挑拨川军与我之恶感的奸计中，造成孤立，也是皖变中失败应得教训之一。最后，桂系在全国范围内某一时期是以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出现，故桂、蒋关系可供利用。

但在皖变后桂系企图作反共先锋以取悦于蒋，则这种利用成为不能。同时桂系与我关系恶化，还由于彼在我第二、五、七三个师包围中，大别山地区之争执，使彼此关系立于极尖锐地位，故极难改善；而桂系封建军阀之本质有时暴露得较蒋系更反动。然而桂系之部下却又有可以守中立的分子。如在路西与我二师对峙之曹师长[39]，因他在敌后不能二面作战，则极愿与我亲善。我第二师因见曹师凭险固守急切难下，亦采取双方休战以争取时间，来作训练部队和整风及地方建设工作等。总之，顽方内部党、政、军间均充满了各种矛盾，应懂得分析加以利用，以适合总的反顽的战略目的。

3. 在战略战术的指导上，首先区别对顽与对敌的不同。而在军事上、政治上，反顽反敌都包含一个思想转变问题，没有政治准确、战术教育准备，必致转不过来。如高级司令员懂得这个转变，不一定中下级指挥员能够同时转变，下级战斗员群众更是如此。打日本的道理，打顽军的道理，先在政治上讲个清楚。打日本的战术，打顽军的战术，在军事上也先要讲个清楚，否则糊涂战与浪战均要失败。

4. 顽方与我党从江西打起，如今打遍全国。这个“老朋友”有他长处，在于他的规模具备的军事机构，加上相当深入的反共教育，善于把抗日情绪组织到反共方面，装备训练均较我为好。其短处通常是军官的实力主义，不敢冒险牺牲。军官手中掌握大预备队，有大预备队主义，怕迂回包围，多头指挥、战役计划零乱等，加上政治上各种矛盾，推动其大度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蒋虽采取对抗战失败的将领则严惩，对反共失败的则鼓励的政策，终于无补其部队上下的团结。

我军一般弱点是在于带兵和练兵的办法没有与实践经验密切结合，故改进甚少。这是留待军司令部去解决的任务。

### （三）军事建设的经验

#### 1. 主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华中主力计八万，地方军计四万。此时期第四、第二师均难独立对顽，靠第三师增援，苏南亦常向苏中呼援，第七师常向第二师呼救，形成华中兵力对敌嫌太拥挤，塘小而鱼大；对顽嫌兵力不够，决口多防堵不来。乃决计使主力精干化而放手扩大地方军，以三分之二主力编入地方军。于是第一、第六两师的十五个团只保持四个主力团，余皆与各县地武[40]合并，第六师师部取消，部队归第一师指挥。第二师三个旅改为两个旅，从九个团改为四个团，调一个主力团加强第七师，余与地方合并。第三师拨一个团归山东，第七、第八两旅均留二个主力团，余入地方，第十旅完全和地方会并，师与军区并，旅与分区并。第一、二、三、四师保持了十个不与地方军合并的机动团，并可以听军部调用。这个部署是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逐渐演变而定型起来。这样使军、师有主力在手，而各县亦有主力巩固边区。敌“扫荡”时，我主力团属于大突击和大转移部队，地方团属于当地坚持和小转移的部队。平时则主力团集中整训，着重实践总结，体力锻炼，战术学习，近战技术，生产节约，纪律整顿等。主力在反顽战则应强调突击，反“扫荡”初期先转移，保存实力，末期回去收复失地。地方团则巩固地方边区，并不断向敌伪区伸张。这一部署使边区巩固，新区创立，反顽、反“扫荡”均比较能灵活应付裕如。

#### 2. 地方军建设：

一九四二年春所谓四万地方部队，均战力不强，成分复杂，叛变逃跑时有所闻。边区极不巩固，使根据地人心不安。边区党政时常受敌伪顽匪摧残袭击。地方党政尽是文官，不谙武事。地方部队主力不管，地方管不来，形同孤哀子一样。这样使华中主力不得不拨去担负地方任务，有主力等于无主力，虽有地方军四万亦等于没有，民兵则更未形成，根据地的治安问题十分严重。

自从决定主力精干化，而拨主力并入地方军后，情形便改观了。一面主力编入地方，一年以后所有地方部队均战力高强，能追随主力之后独立应付敌顽，在事实上扩大了主力，使根据地巩固而向外扩大，一面地方部队的主力化不是走的过去路线，强迫调离原地，而是把主力并入地方，去加强当地斗争，落脚生根，为地方群众日常生活利益而斗争，与地方人民打成一片，把边区巩固变中心区，向外推进，于是地方性逐渐消失。这是走的加强其地方性以最终消灭其地方性转化为主力的道路。这一辩证的发展，便把主力地方化、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正确解决了。因此现在华中的十四万大军，每个团均能独立打鬼子、打顽军，也就是主力扩大了。以前地方军怕鬼子怕顽军，只欺负伪军的现象，完全改变而提高了。

#### 3. 民兵建设经验：

华中自卫军工作开始时，即感觉其只有开大会时刀剑林立的捧场作用，其次便是形式主义的查路票的劳民伤财的坏处，故一般不强调搞自卫军而着重在民兵建设，但并不取消自卫军，只在中心地区乡为单位利用冬暇作一些人皆兵的军事训练工作，作为民兵的一种教育基础。

民兵工作是开始于群众减租运动胜利之后，为巩固胜利，群众要求武装的心甚切，因此实行向地主转移枪支。起初用硬转办法，下命令向地主强要，

结果造成枪支外流，或埋入地下，甚至武装反抗。以后采取借用的办法，由农会打借条，政府劝告到期退还，这样时借时还或早借晚还，地主嫌麻烦而自动捐枪，把借枪条退回。这样开始借用一、二支枪，以后逐渐添借，特别反“扫荡”及肃清土匪运动中民兵表现了力量，地主自身取得安全，又确见减租运动是有节制的，于是也自动拿枪出来。通过这一渐进办法，把枪逐渐从地主手中转到工农手里来了，华中民枪甚多，估计至少在二十万左右，现在转入农民手中的枪支无确数统计。如继续用这一逐渐转移办法，将来武装的需要定可逐渐满足。

民兵战斗力之提高，是在于边缘区的反维持的斗争（淮南、淮北及淮海区）和反伪化、反“归化”、反“清乡”斗争（苏中、苏南）。伪

军依靠据点向我区之乡村逐渐推进，派款派粮。边区人民不堪其扰，发生组织民兵的需要。凑款捐枪属地主、富农，出人出力属贫农、中农，轮更守夜，守望相助，党从中加以领导，遂开展民兵与小伪军战斗。此为民兵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通常民兵筑围寨固守，相持紧急时，我主力及地方武装加以增援，击退敌伪，民兵情绪高涨。每一农村的胜利，必蔓延邻村掀起民兵看家自卫的热潮。第三阶段，敌伪派款筹粮不遂，乃乘夏收秋收之际四方下警告，不“维持”、不“归化”即大烧大杀，意在乘我粮食在野的弱点。此时应懂得策略，凡不多少给一点而一味硬拚会失败，因主力增援不可能每天每地随呼随到。如一味向敌人赔小心，任其诛求无厌，刺激其贪欲，亦必致失败沦为伪区。因此在夏收秋收我有弱点时，应用软办法以小利和缓之，在收获过后我之打算又不同，可采取强硬办法。民兵工作与伪军工作部门应采取密切配合，使伪军不敢轻易侵犯我区。我研究了各地民兵在边缘斗争的经验，从敌伪据点起算，二里以内是属伪化村（对敌一面负担），我方难以插足；二里以外到五里以内（两面负担），通常是敌我争夺或缓冲地带；五里以外则通常（基本上）为我区，每年只需多少向敌伪给一点应付的维持费用；而七里到十里则完全属一面负担，为抗日民主地区。这种形态是以民兵为主要支持力量所形成，故民兵力量之强大可以窥见。

民兵战术，通常靠在政治上与敌据点内人民的联系，取得灵通的情报，靠广大群众的协助，数十里村坊协助应援，靠强固防寨配合地道固守，昼夜狙击汉奸，伪装主力，诱敌深入村庄，进行埋伏袭击。一般说来，华中民兵的力量远远超过内战时期的赤卫军和游击小组。民兵常常很自然的转化为地方武装，并且在民兵加强之后，小敌骚扰，民兵可以击退他，大敌则靠主力来援。因此使县、区地方武装遇着一种苦恼，地方小仗打不到手，他赶到时民兵早打退了，而大打又无力独立负担。这样造成地方武装愿当主力情绪。

民兵建设一般在地方支部和乡农会领导下，因地方需要而建立的。故华中只区、乡有武委会，区以上皆不强调设立。

#### （四）群众工作建设的经验

1. 群众工作的工作路线。华中根据地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要渡过难关，反对敌伪残酷“扫荡”，反对顽军大举东进，一切决定于根据地之巩固。巩固工作之中心首先摆在发动群众上面。只有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才能削弱封建势力、动摇顽方的社会基础，消除敌、伪、顽的内应而造成我在农村中之优势。把这第一步弄好，才能根深蒂固，使我党植根于华中地区，使党在农村中有不可动摇的堡垒。地方党的基点解决，才能顺次去解决基层政权，而过渡到上层政权的比较民主的改造。同时也在有了有组织的广大群众和农村党



以后而顺利的解决人民武装（民兵与自卫军）问题，这样就使地方建设开始与军事建设是分不开的，而达到最终的结合，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四大建设都比较平均而坚定的发展起来。这是华中地方建设的完整步骤。原订计划是打算在二年之间做完，在四二年春开始，于四四年春全部完成。换句话说，要求四二年夏收秋收完成减租减息彻底深入，不作其他的事，四三年则转到政权改造和民兵建设等。

## 2. 群众工作的经验（略）

（五）政权建设与三三制之实施（略）

（六）精兵简政情形（略）

（七）财经工作和部队以及人民生产情形（略）

（八）党的建设和领导一元化实施情形

1. 加强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和建立坚强的战略单位（以师为单位）。华中各师战略单位负责同志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基本上虽是团结的，但隔膜牵扯仍时有表露。或属于历史性质的未决悬案。或属于目前工作部署处理性质的，或属于分工性质，其间并无根本的政治路线的对立，多半由于实施党的领导一元化及精简机关之时，对干部配置，经费审核，这部门或那部门常有畸轻畸重之感，形

成隔膜误会以致影响到工作和团结。其中心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近乎宗派情绪问题，工作关系处理不善的问题。这里需要从思想

上培养每一个负责同志，一方面由各单位自觉的了解去形成一个

中心，推贤让能，纠正谁不服谁的宗派倾向；一方面要懂得对共同工作的同志不能求全责备，而应互相取长补短，彼此虚心请益，养成民主协合的新作风，纠正过分自信的专断的倾向。必须先从打通

思想入手，才能使各独立领导的战略单位能团结得更好，工作得更

好。这一工作我们过去只局部做了一些，拟在一九四三年春召集各单位首长来开始这一工作。

2.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和精简办法在华中的反映是：在乡一级

使农抗主任、乡长、支书三者统一起来，许多地方开始试行一身而三任，每一部门设副职兼理。这一办法在组织上确定了农村的工农优势是好的。在区、县两级确定县书<sup>[41]</sup>或县长兼任部队政委，这样推动了他们去注意打仗，关心部队情况，弥补军队与地方的隔阂，推动一批文官能兼武事。反之对部队亦推动，使其懂得把自己的基础依靠在地方党政和人民身上，加强部队政权观念、群众观念是有极大作用。在师、旅两级由师、旅长或政委兼地方党委书记，则推动

他们注意地方的事情，懂得去研究部队衣食饷款的来源，把过去只知道打仗、不管地方的推脱现象纠正过来了。

3. 党的领导一元化实行困难在于：（1）如军队同志兼地方党委书记，中心移到军队而使地方党政日常工作日常处理较以前减弱了。反之如地方同志兼军队政委，则中心移在地方而使部队日常工作处理较前减弱受些影响。这一矛盾的解决，应该是使各部门工作均健全有独立工作能力，而以区党委总其成，不致遇事均要找书记或政委请示。另一面书记和政委的领导方式，要懂得从一般事务工作解放自己，要懂得掌大舵，撑满帆，注意自己的工作时间内，更必须首先估计到自己附近其他工作同志的时间，不要任意指挥。其他同志也不要作壁上观，等发命令。一般说来华中的党的领导一元化在开始时摸不

着规律，颇有些不惯，积久就更顺畅无阻了。

4. 党的建设方面，把最重要的干部教育说一说。我们干部分新、老干部两大类。老干部分三类：（1）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以后参加内战，以知识分子为主。（2）大革命前后坐狱分子，仍然以知识分子为主。（3）苏维埃运动中入党的，大批工农干部。

新干部分两类：（1）抗战后加入的青年知识分子。（2）根据地减租斗争中加入革命的工农干部。

这五种干部的参加党，其来源、动机均各有不同，入党后所遭遇的环境和锻炼亦多相异。一般说，第一类是全党的中坚，处于掌握方针、决定政策的上层领导地位。在华中说，这批干部并不多，并在军、师、区党委一级负责。一般说有独立负责能力，对党贡献大，革命人生观一般均解决了。但其不够的地方在于思想方法上的锻炼，或多或少尚有毛病，党史和路线了解尚不完全充分。这批干部是打通思想，课以领导艺术，使能掌握各种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做到更成熟的地步。第二类出狱分子，一部分历史未弄清的多年在埋头苦恼中，一部分历史清楚的，成为一种重负，自高自傲，而其本身除牢狱经验外，尚须从下层经验积累起。这批人在华中多半担任地方党务工作，仍然是着重思想锻炼撤销其倨傲心理，转入实事求是的整风学习。第三类工农老干部多在旅、团级负责，一般思想和经验脱不出苏维埃运动的旧范围，一大部分进步很快，可是一小部分则处在停滞状态。他们从打土豪分田地的工农民主革命卷入运动，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曲折性最初是意料不到的。尔后在运动中能随运动进步，确定其革命人生观，成为最优秀分子；可也有一部分停滞不前，旧思想意识在脑中复萌，个别分子走上堕落的道路。一九四二年统计全军这类团、营级老干部逃亡堕落的计四十余人，这是极为惊人的数目。这是一个极应耐心教育帮助其进步的问题。我们研究从大革命以前即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以作为对抗战以后加入的新知识分子的教育借鉴。这批

新分子长处有许多，但在基本上尚未经过大风大浪的颠簸。我们研究在苏维埃运动中加入的工农干部，亦可作为最近在根据地加入的工农党员的一种参考。党的干部建设应具体区别这些方面，归根到思想锻炼、实际工作锻炼，研究其历史和入党以来的转变过程，以启发其革命自觉性，打破其盲目性。这是我们建设干部的一般方针。

新老干部对立的现象在华中初期工作中颇为严重。处理新老干部的经验，我们初期决定以老干部为基础来使用和提拔新的，第一步即营、县两级以上均保持老基础，让新的到连和区、乡级去锻炼。第二步逐步开放营、县两级，而团级则仍紧握着保持老基础。现在已进到第三步，便是团、县两级也必须大大开放，但军事指挥权（团长）和政治领导权（政委）仍必须是尽先补用老干部，新的则只让他们作政治处，参谋处工作。但另一面在特殊情况下亦承认和使用破格用人的原则，就是说遇着新干部中某几个特别优秀的亦破例提拔，加以培养。才难之叹，古今所同，我党亦应作例外的照顾。解决老干部某些停滞状态，纠正新干部的躁进情绪。今天的是新的，而明天会成为老的；今天是老的，而昨天却是新的，新老不能对立来看，而要联系着看。过去在苏南某老干部同志气愤说：“没有老的，那里来的新的。”这话固然不错，但只讲了一半。他不知道“没有新的则老的何以为继？”况且今天的新干部，日积月累也有六七年斗争历史了。此外一般同志新、老干部观

念是以部队为本位，以军龄军功定新老，而不是以党龄和党功为标准，不免偏而不全。在一般新干部中学军事的不多，这在干部的积蓄培养上是有缺陷的。

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华中根据地是新四军反磨擦创立起来的，因此本地干部大半属后进，或者“入股”不多，不够“大股东”的资格。如今区、乡两级为减租的工农干部，县、专署、分区、地委一级则有一批本地干部，其对师、旅老干部是尊重的，在同级的纠纷亦有。但此批本地干部多为出狱分子，一面历史尚待清查，一面功绩不大，倨傲心理不重，所以从本地干部引起磨擦的原因比较少，另一面华中地方党与政权工作多半全属地方，本地干部一揽包干，因此军队与地方党政的矛盾常常包含着本地与外地的矛盾，故放在党的领导一元化中加以解决，而整风、肃特对本地干部的清查，应采取极其审慎的政策。

### （九）边缘工作经验

敌后边缘区工作情况，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奇观。在华北是如此，在华中亦是如此。内战时期赤白对立，是白军主动造成；而我方的过左政策，亦应负相反相成的责任。敌后斗争，敌寇也屡屡企图造成“赤白对立”，来阻止我之发展，但被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隐蔽的游击政策所打破了。今分述其具体的经验：

第一，要懂得分析形势。

1. 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各种势力并存的局面。敌、伪、顽、匪、帮会会门和我方力量均在那里进出，而以敌、顽、我三大势力为冲撞的主潮，其余的力量则穿插依附于其间。自我在敌后占优势后，敌我矛盾为主潮，顽方成为其间重要的挑拨者。

2. 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各种斗争方式的扮演舞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方式，合法与非法，流血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妥协与革命，诸种方法均要采用，才能进行斗争。

3. 要懂得边缘区工作是长期处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轮番交替，而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

4. 边缘区工作流动性、变动性非常之大。七进七出，三翻四复，是其常有的状态。一切工作要掌握其变动的过程。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概括的结语：边缘区工作是抗战中国的全国性斗争的一幅缩影；其决定关键，在于我们的政策是否运用得适当。

第二，要懂得必要的妥协和运用两面派，承认两面派或主动去组织两面派是承认暂时妥协的策略正确的具体表示。华中的两面派先我军而存在。敌寇侵入，国民党逃跑，当地士绅、会门首领即懂得以两面方式去应付敌寇，顽方更运用得纯熟，我军以后也跟着学会了。两面派分几种：第一种反革命的两面派，是帮助敌伪服务而向我敷衍的；第二种是革命的两面派，是向敌寇应付，而替我军服务的；第三种是应付各方面而替他们自己保全产业和权利的，这种便不止两面，而是敌、顽、我三方面应付的三面派。我们的经验，初期是去争取许多替我服务的两面派，以后感觉不够而进到派同志去充当两面派，这样使敌我接壤地带有了缓冲地带出现，对于长期斗争之坚持有极大的作用。顽方最初派部队投敌当伪军以掩护其敌后力量，以后我军进入华中，顽失败乃转而不反日，而靠敌伪掩护，以专力对我，顽县长与伪县长合署办公。当我军进入，顽军不支时则退入敌伪据点埋伏，或从敌据点逃脱。顽方

大后方接济挂伪军番号，替其源源接济等，顽方做得很巧妙。我军鉴于顽方策略的进步，也在边缘区学他的办法，于是在敌伪方面，在顽内部均安上我们的人，形成形式与内容极其复杂的矛盾。我们能以顽方姿态去运用伪方阻止敌寇的侵扰，同时又可以伪方姿态去了解顽方的情形。对许多土顽固的歼灭，均得力于伪方内线之援助。运用两面和三面派问题，实质上是掌握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单面与多面的矛盾的问题。两面派的入选最适宜是帮会首领人物。

第三，要懂得镇压反水分子的巧妙办法。我们派人组织两面派，派人进入敌伪营垒，有时也会弄假成真，转而叛我。镇压此辈一股利用敌寇对中国人的疑忌心理，送假信，假造情报，均可借刀除患。我之敌伪内线叛变了，我两面派变成忠实替敌伪服务的人，我可另组新的内线去对付他，或从敌伪上层制造疑惧去压服他，或派人狙击，镇压一、二个反水分子可以慑服一切。对党外两面派分子不能要求过高，宜尊重他本身利益，帮他策划最后安全。

第四，敌伪军内线工作、两面派工作均不能用假投降办法。凡从根据地去的人，敌方均不信任。苏中曾派一个小部队去假投降，企图保持某边区的据点，结果全部缴械，损枪折将。敌方相信国民党部队可以伪化争取，中共部队则不然。因此两面派工作应从敌占区的党做起，这里要以敌占区工作援助边缘区工作。

第五，边缘区工作，条件不成熟不宜企图去变成中心区。边缘区分几种：第一种是我政权占优势的；第二种是敌政权占优势的；第三种是敌、顽、我三种政权并存的；第四种是三不管的地区。以上诸种形式，华中均先经过同情区的方式，逐渐变成我政权占先的地区。同情区是经过联庄会或会门等地方性的小型封建政权，先取得其同情，容我工作人员驻脚，再以便衣武装队、短枪队前往，逐渐改变人心，提高斗争方式，而达到我军力量之逐渐抬头，而剪除敌对势力。

#### （十）国民党地区工作与点线工作情形

##### 1. 国民党地区工作

华中局管理下的大后方的党计有刘英、龙跃的浙江省委，曾镜冰的福建省委，皖南特委与赣北特委。

皖南事变前归东南分局指导，在浙江发展党员二万人，在福建闽北崇安、邵武老苏区保持了阵地。在福州以东（北）宁德、福鼎沿海一带发展小型的抗日游击队，并下海活动。国民党尚不知是我党武装。敌寇在福建始终不大举入侵，故该队发展亦难。

浙江党在抗战初期利用黄绍竑的进步形势和黄、CC 许绍隶[42]的矛盾，取得包括全浙江各县的发展是有成绩的。其错误在用大力于城市和文化教育，未在农村和国民兵团去找自己的根基。项英的浙江计划、天目山计划给浙江党以盲目期待。项英也不叫他们去遵照中央指示如何应付突然事变，如何不怕武装斗争、预作武装斗争的准备，而是要他们准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样在皖变之后便显得十分狼狈而零乱。饶漱石同志皖变突围道经刘英处，告以归山掌握武装为主，对大发展的二万个党员宜注意各级领导机关的内奸，地方党要采取隐蔽方式，要懂得收容部队应付国民党的进攻。虽然苦告刘英从丽水把省委搬回平阳老游击区，但刘英仍未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饶的意见，故不久又跑到温州城下来进行统战工作，遭内奸告密，刘英逮捕。此时国民党大宣传：三个月可全部破获浙江党而刘英确为坚强，在狱中与国

国民党进行英勇的斗争，使国民党阴谋变幻想。一九四二年秋浙赣路战争之际，国民党慌乱撤退，刘英同志被枪毙于永康省府附近[43]。刘英同志的英勇坚定可为模范，长留令名于浙江人民的心目中。

刘英同志被捕，国民党一面大举搜山，进攻平阳、泰顺、南雁荡山北我老游击区；一面利用叛徒在浙省各地进行疯狂追索。我老游击区无数次击退了国方进攻，而城市里的党则陆续遭受破坏或冲散。宁绍特委则与我浙东部队会合找到了归宿；金华特委一部分同志在金华附近拿起武装进行自卫。其余如处属、温属、衢属及浙西各地，既不懂拿武装上山，又无秘密工作经验，故遭受了极大失败，抗战初期的蓬勃发展成了春梦。

曾镜冰在崇安武夷山中下山后，撤退归山比较快，现仍与国民党武装相持。过去皖南军部送了一个电台去，通了一次报，即保不住而弄坏了。皖变后我军被俘干部押在上饶、铅山，许多越狱同志到曾处，由曾资送到华中局，说那一带群众很好，国民党搜山很凶，他们最困难的是经费问题，现武装有数百人。

赣北鄱阳、彭泽、都昌一带为方志敏部老游击阵地之一，抗战后一部加入新四军，一部留山保持，其领袖田英同志则往来景德镇、都昌之间作统战工作，后被特工暗杀。此后当地党即完全上山拿起武装进行了不断斗争。一九四二年他们策动了川军一营拖枪上山入伙，这样一来从内部一胀，经费困难，给养无着，目标太大，敌进日甚，不得已拖过长江靠第五师。事实上这样一来全部新旧人员、马匹都过了江，现留第五师鄂东区或到第七师，而都、鄱、彭的游击历史遂告结束了。

皖南特委皖变后保持一些组织，与皖变上山打埋伏的将士结合在黄山山脉，太平、青阳、泾县、旌德等县交界保留了三百余人，分五个山头坚持，一部参加了生产，且与第七师经常有指导关系。这一带是能长期坚持的。

以上是国民党地区、老游击区的党的情形。具体经验是，东南局项英时期他们总计发展到五万人，均把中心放在城市和文化教育界知识青年身上，而现在只留下不到二千人，均是依靠拿武装靠山地而保存起来。从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运动失败后，抗战中的转折——皖变惨变后，三个不同时期均得出真理：靠武装靠山者则存；靠城市不拿枪者则失败，甚至灭亡。

皖变后这一带党又打游击，到今天实际斗争环境又教育他们可长期保留无虞，我们要浙东部队设法予以各种接济。这一批同志们正处在黎明之前的黑暗的时期，最忌讳是把破晓时期估计得太短。

## 2. 上海党的情形：

敌占区的点线工作可举上海党为一个例子。上海党是一九四三年春中央命令撤退才归华中局管。刘晓、潘汉年[44]到根据地后，他们的工作尚未作具体总结。上海党抗战以来，在恢复上海党的组织上，在宣传扩大影响上，在情报工作上，在输送工人和干部、文化人到新四军上（约二千人），在农村组织游击队上（亦有几个游击部队加入叶飞部），均有些成绩，但严格检查起来，实际上的可能甚大，他们努力所达到的限度仍是很小的。一面由于他们在东南分局指导之下一贯是坚持上海大城市的暴动主义，这里与项英的伟大江南战略联系着的，而对农村工作的帮助是很小的。据省委同志谈，抗战初上海难民十几万，如动员加入新四军，至少可达五万工人，但他们要保留所谓“党在上海的无产阶级基础”，不愿送其人新四军而说服他们到日厂去服务，这是一。第二，他们虽然提出生产化职业化的口号，而实际做投机

生意，省委一面累资数百万，一面又向华中局要钱，怪不资助他，大概他们要留着作为大暴动的基

金。同时几年来的安全最后依靠潘汉年与李士群的统战关系，才不致陷落敌手。一般说他们并未能将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提高一步乃是实在的。

自然我们一面不能抹煞上海党重建以来曾做过一些工作，一面我们尚未彻底检讨。但上面的说法是与刘长胜、刘宁一[45]诸同志谈话中一致的意见，可供中央参考。

#### 四、华中工作现状和今后任务

- (一) 华中地区面积、人口(略)
- (二) 华中党的数量(略)
- (三) 华中部队人员、武器的统计(略)
- (四) 一九四二年华中全军的财政收支

……十四万武装部队，十万以上半脱离生产和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十八万党员，四万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统治着三千万人口，控制了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每年费用四十万万元(法币)左右，这就是我党在华中六年来血战的收获。

- (五) 华中人民对我党的认识和反映

……我党在各阶层，皆拥有坚强的政治影响。这是我党政策的极大成功。

- (六) 华中今后的工作任务(略)

#### 五、结束语

(一) 在华中六年的工作结果，使我党在华中敌后广大农村中确立了普遍的巩固的军政优势。由零星分散的小块地区逐渐衔接几个大片，由零星的武装建立大的集团部队，经过了反顽、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锻炼，一般维持着向前发展的形势，对华中的

具体环境我党是有了适应的和推动的能力，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具体领导和政策正确的结果。敌方在华中全局掌握军事优势，仍处处立于主动地位。但其优势几年来是逐渐削弱的，也是一个确切的事实，配合国内外条件，这一削弱更是日益增长，我们不可因此忽视敌人，但不能不从这一方面把握敌人的脉搏。顽方具有全国的合法中央正统的优势，但在敌后由于他们的反动政策自取溃灭，这样也使我在华中敌后，由不合法地位而逐渐取得各阶层人民的公认，合法地位业已在事实上形成了。继续巩固和发展我党的已有优势去削弱敌顽的力量，纠正和避免我们的弱点，这是坚持抗战、过渡新时期、迎接胜利的保证。

- (二) 华中广大敌后阵地计有三种地区。

第一种基本地区。特点为群众运动深入，群众有相当能战斗的武装，培养出一批地方群众小领袖，经过战斗锻炼，封建势力堡垒业已攻破等。这种地区是我党的暖床，一般估计在华中地区全面积上的比例至少占十分之六。

第二种为相持地区。群众运动尚未深入，封建堡垒未攻破，多半是大地主统治的巢穴或者靠敌伪不远，这一边缘地区的工作尚待深入，约占全面积的百分之三四。

第三种为敌占区或同情区。我以半隐蔽形式出没其间，作各种待机发动的政治准备工作。

这三种工作地区应采取三种不同工作方式，且必须联系起来，有基本地区才能造成边缘地区的相持，有敌占区工作才能保证相持地区的斗争胜利。我们依靠基本地区向边缘区敌伪区推广，用挤和楔入的方法；但在目前条件之下，要很精微的把握这种挤的限度，不挤不成，如企图把一切地区都挤过来，也会造成错误的。

（三）华中几年来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并且在刘少奇同志带领之下，最好的是体验领导艺术的锻炼，每一时期均能把握着工作中心，集大力抓住中心环节。推动中心环节之后，而使其他次

要环节也同时并进到一定程度，这一正确的领导使华中工作虽开辟甚迟，又遭项、袁的延迟，也终于在几个根据地基本建设问题上少走弯路而逐渐迎头赶上。因此领导者的职责在于掌握工作关键，掌握全局与局部的衔接，掌握两个中心工作之间的连环，善于从第一、第二挨次过渡到其他方面。另外在敌后环境，领导艺术还须表现于能有力的去解决应付情况与努力建设之间的矛盾。不能应付情况即无法创造建设工作的时间和地盘，不能趁机作建设工作，也无法应付极端复杂的严重情况。内战时期在两个反“围剿”之间进行工作，但中间的间隙为日甚长。抗战之敌后地区是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工作，但其中间的间隙甚短，领导者要善于照顾这两方面。善于利用时间，适时发出适合情况与建设任务的各项指令，善于抓住中心，善于转移中心，善于将应停止的一面即时停止而转向当务之急去突击，突击到适当的程度，又要知道掉头过来去完成尚未完成的任务。只有如此才能在瞬息万变、各种工作纷至沓来的环境中，领导机关不致失掉主动而迷失工作方向。说得出，做得到，抓得起，放得下，这样才能使工作程序不致走弯路，努力建设与应付情况都两无所缺而处置裕如。

（四）最后华中工作仍有其极其不够的缺陷和弱点：

第一、尚有许多未解决的任务，如练兵、财经、文教、青妇工作等，这些工作一般只维持现状，尚待深入。

第二、对许多下层工作经验总结检查很不够。

第三、各级领导机关的机构的配置尚不十分健全，许多尚待实践中去加以改善。

第四、中央的领导方法，领导新作风，我们了解和掌握尚极其不熟练。

第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钻研和执行的程度尚不够，如何根据中央指示去解决华中问题，去创造新经验，尚待我们极大努力虚心向下层向群众学习。

第六、我们对下层情况的调查研究是不够的，时有挂一漏万不免沧荒之感。特别报告人我自己对华中情况了解不够深刻，只能把这篇报告写到处为止。

注释：

[1]敌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派遣军，指当时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和日军华北方面军。

[2]汪伪，即汪精卫，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逃离重庆，二

十九日在越南河内发电报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一年三月，自称“还都”，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后又兼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3]王伪，即王克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就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4]顽，指国民党反共顽固派。

[5]苏常，指苏州、常州地区。

[6]徐海，指苏北徐州、海州地区。

[7]任援道、李长江、杨仲华、杨揆一、张岚峰、刘湘图、徐继泰，均是伪军头目。任援道是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李长江是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原为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投敌后被委为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揆一，一九三九年投敌，一九四四年任汪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北省保安司令；张岚峰是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刘湘图为伪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徐继泰任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第三军军长。

[8]三面派，指同时应付敌、顽、我三方面的人物。

[9]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底投敌后潜入上海搞“和平运动”，一九四一年三月协同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

[10]陈公博，为原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追随汪精卫投敌，一九四一年三月任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院长等职。

[11]梁鸿志，一九二四年为段祺瑞政府秘书长，是北洋余孽。卢沟桥事变后即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组织维持会。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成立伪维新政府，任伪行政院长，成为维新派首脑人物。后又与汪精卫勾结，一九四一年三月汪伪政府成立后，任伪监察院院长。

[12]渝方，渝是重庆的简称，当时国民党以重庆为“陪都”，渝方即指国民党方面。

[13]中条山俘虏，一九四一年五月中旬，日军大举向山西省南部的中等山区进攻，俘国民党军十万人，汪精卫即以俘虏一部组建两个警卫师。

[14]李士群，一九三八年投敌，曾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调查统计部长和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担任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时，多方组建武装，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被日本上海宪兵特高科科长冈村毒死。

[15]“支那事变”：即卢沟桥事变。

[16]张星炳，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旅旅长。

[17]睢杞太，河南东部睢县、杞县、大康县地区。

[18]川王，指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总司令王瓚绪。

[19]李默庵，当时为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20]唐式遵，当时为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21]“忠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的简称，受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

[22]顾祝同，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总司令官。

[23]王敬久、上官云相、陶广，当时分别为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指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皖南事变前后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

[24]李仙洲，一九三八年二月起任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



一九四一年春率部由湖北到安徽阜阳地区，五月，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25]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五军军长，皖南事变后，任苏皖豫边区第二路挺进军总指挥。

[26]们于学忠，一九三九年一月起，任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一九四一年底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二年任鲁南游击总指挥。

[27]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按新四军军部是一

[43]刘英同志被枪毙于永康省府附近，杭州失守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逐步迁移到永康县之方岩，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华中局特派员刘英在此被国民党杀害。

[44]刘晓、潘汉年，刘晓一九三七年五月由延安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同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俗称上海党）书记；一九四二年三月到淮南，任新四军政治部调研组组长，六月，任中共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在抗战初期先后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从事统战工作，一九四二年春回到淮南参加华中局分配的工作。

[45]刘长胜、刘宁一，刘长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受中央委派到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和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四二年十月离上海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部长。刘宁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狱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工委书记、保卫部（社会部）部长，一九四二年冬，奉命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

## 五师今后应确定向河南发展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诱胡宗南[1]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2]亦将不守。敌由广韶[3]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4]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但在目前，由于敌寇尚未大举进攻五战区和平汉路尚未修复，故五师方面只宜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四师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可西进至涡、蒙、阜、颍[5]等地，相机处理，亦暂不宜向豫境急进。总之，发展河南的斗争任务是必须完成的。目前从各种有利的准备入手。另一面敌寇在粤汉路大举攻蒋[6]，目前湘北、湘东、赣西北之间，均构成了极宽广的敌后地区，我五师宜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指示他们就当地敌后的实情向南推进，预先占领一、二线阵地也是必要的，宜调查通山、通城、阳新境内九宫山脉的情况，就可能作相机推进。鄂南发展是仅较河南为次的。

注释：

[1] 胡宗南，国民党原第十七军团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此时为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九四四年冬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衡州，即湖南省衡阳市。

[3] 广韶，即广州、韶关。

[4] 缩毂，毂为车辐聚合处。比喻处于中枢地位，对各方起联络、扼制作用。

[5] 涡、蒙、阜、颍，指皖北的涡阳、蒙城、阜阳、颍上等地区。

[6] 蒋，指蒋介石军队。

---

这是陈毅在延安起草的，由他和刘少奇联名发给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和第五师领导人李先念、郑位三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拟。

## 关于华中部队整训办法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 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1]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的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师旅负责干部应亲自主持。

(二) 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判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2]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四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才，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才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 关于培训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关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 注释

[1] 张宗逊，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五八旅旅长。

[2] 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

## 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用挺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向我进攻的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份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1]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2]会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3]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

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阳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须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4]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会合十六旅[5]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六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六师军政入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六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理，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注释：

[1] 刘亨云、张文碧，当时分别任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参谋长和政治主任。[2] 龙跃，时任中共浙南特委书记，自从一九三五年进入浙南后，一直坚持武装斗争。[3] 京杭国道，从南京到杭州的公路。[4] 叶飞、朱克靖，当时分别是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苏中三分区行政专

员。

[5] 十六旅，当时由旅长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率领坚持战斗在江南苏、浙、皖边区。

## 关于向南发展的准备工作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能确实占领芜、宁、沪、杭各大城市，目前必须以大力着手，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浙赣路沿线及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1]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的地下党工作或相机去恢复。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如果是这样，则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四军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由华北太行、太岳各地予以协助），湖南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四军对以上各单位只担负配合责任，但目前你们与五师的关系暂不改变。

二、为了争取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四军部队开始分批南下。粟裕率三个团为一批是对的，叶飞（或震林同去）准备率第二批去，嗣后看情形可能再从二、三师派第三批去。提议派去的部队，每团均留下三分之一的底子，番号仍旧，使在原地继续发展。

三、如反攻时期揭幕，则四军全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者外，均应南渡长江，去保证在江南的伟大发展，诸如破敌、收京、入沪[2]，配合盟军登陆等任务。目前你们应从此种战略的可能情况出发，一面能使四军逐渐南调，一面能使现在江北的各地方兵团逐渐加强和提高，而能适合需要全部担任江北重大的配合任务。你们今后一切工作都应照顾大举南进和加强现地的双重任务。

四、华中局及军部应预有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期率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局，而江北现地应于军部南移后能成立一个独立工作的大单位，负责江北工作。这个江北军区要能担负起华中战略后方的重大任务，如出干部、出兵、出军需品、出粮秣资财，保证前线动用无缺等。

五、因此你们应开始考虑江北大军区的人选，将来这个单位仍是华中局下面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单位。下面的各军区、专区、县、区均应以就地取材为原则，尽先任命与当地人民有联系的苏、皖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许多外地干部应大量调赴江南工作，这方面在华北、华中过去均未十分注意。中央来陕北，自开始重用陕北当地干部充任重要领导责任之日起，收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团结人民的效果极大。在华中，例如粟、叶南进，应考虑培养管文蔚、季方、黄逸峰[3]等作为苏中的领导中心，重新要他们担任指挥部队和党的工作。例如在军队方面，三师应注意提拔原十五军团的干部到师级工作（徐海东[4]同志病况如何？代中央慰问）；例如二师方面中央决派郭述申[5]、周骏鸣[5]等回来负责。过去在二师方面对引用大别山的干部方面是不够的。在其他各地的地方工作方面，均应提拔当地干部，不仅作政权工作，而且就其可能去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我党在整个内战时期，均曾犯过以外地干部代替当地干部的偏向，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偏向。你们在进行大

---

这是陈毅在延安起草的以刘少奇和他本人的名义发给华中局、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的电报。

的战略转移之际，宜注意人事配备中的提拔当地干部的原则。自然，华中的大发展是在四军进入之后，那时不能不形成外地干部占优势的事实。但几年来的情况变化，当地干部已受过锻炼，这一事实已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而且在四军未到之前，华中确有一些开创游击的老干部，如管文蔚[7]、孙象涵[8]、徐宗田[9]、吴觉[10]及其他许多同志。目前应考虑就才、德、资三方面的可能性，宽广大胆的在当地去重用他们，加以培养，加以提拔。

六、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干部计百余名，全部派回华中工作；另从在延的东南籍贯的团、县以上老干部，调四百名左右来华中工作；还又加调东南各地的新知识分子约四百名同来。这些干部明春可分批起程。但这些干部大部应使用在江南，去担任发展工作，并准备就可能派些到闽、赣各地去。而在江北各地区，仍应尽先录用当地人才。

七、以上是属于战略部署上的一些意见，提出供你们考虑。例如江南情况是否能围集众多兵力，其限度如何；江北地区抽调兵力的限度如何，是否影响到现有坚持和将来配合；以及提拔当地干部和提拔部队老基础的干部的可能程度，均应防止另一偏向的发生。还有其他未想到的事情甚多，请你们详加考虑电告中央，再作执行的决定。

注释：

[1]曾镜冰、龙跃，曾镜冰是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书记，坚持在武夷山北段的闽浙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龙跃是中共浙南特委书记和浙南游击队的领导人。

[2]破敌、收京、入沪，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南京，进占上海等大城市。这是当时的基本口号。

[3]管文蔚、季方、黄逸峰：当时分别是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兼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中共兴（化）东（台）泰（县）地委书记和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4]徐海东，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等要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时，在淮南津浦路西古河、周家岗地区指挥反“扫荡”胜利后，因病重长期休养。

[5]郭述申，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部长，红二十七军、二十八军政委、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委、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九四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6]周骏鸣，抗日战争中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团长、第五支队支队长、第二师参谋长等职，一九四二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7]管文蔚，一九三八年初在江苏丹阳组织抗日自卫总团，该部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纵队的前身。

[8]孙象涵，抗战初期受党组织派遣回淮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曾任萧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副总队长、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独立大队、苏皖纵队陇海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新四军三师第九旅副旅长兼第七团团长，后任第三师军工部部长。

[9]徐宗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入党，次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十四纵队特务支队中共工委书记，他率该部五个大队官兵一七 余人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十二团，徐任团长，后调任盐城县县长、淮北行政公署第二区副专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敌工部长。

[10]吴觉，淮阴人，一九三 年在上海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

年转党，曾几度被捕入狱，出狱后，投入苏北的武装斗争，一九四四年以后任淮北、淮海专员公署专员。

## 建军报告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 一、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略)

#### 二、我党建军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

我们党为什么要建立军队呢？我回答是完全基于中国人民的需要。请回想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过程。首先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投入反动营垒，煽惑曾参加过革命的国民革命军队掉头镇压人民。这些军队虽然参加过北伐战争，而其本身成分、制度、习惯仍保持着军阀军队雇佣性的旧型，故迅速由革命方面转到反革命方面，成为屠杀人民的工具。当着彼时大革命失败之际，中国革命人民惨遭屠杀的悲惨情景，逼迫着我党为了保护人民和挽救大革命，不得不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自卫。这种武装自卫的尝试，便是我党独立建军的根源。假如当时我党不独立去拿起武装，则人民之被屠杀压迫，将无止境。中国大革命的传统，将被腰斩，必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更顺利协同国内反动派来宰割中国人民的机会。就是十年之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抗战能否爆发，尚属疑问，我们是可推想得到的。这一段举行革命自卫而建军的历史，只是中国人民武装自卫的神圣权利之正当取得。国内反动派多年不断对我党这一革命行动进行指责，诸如“暴徒行为”、“暴民专政”“叛军奸军”等污蔑咒骂，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要求我党主张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听从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是永远做不到的。

那么，我党被迫建军，又是建立哪一种军队呢？因为我党所处的被压迫的在野地位，故不可能采取一如西欧各国国家式的建军规模。因为中国革命的艰苦性，以分散的农村作为革命的起点，故又不可能采取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中国封建式的集队方式。我们的建军是走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武装斗争的光明的建军大道；由人民的武装反抗转到广泛进行游击战争，再进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正规军团之出现。因此，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道集体创作所共同培养出的一枝革命鲜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无数农村集合成强大的根据地，再发展到全国，出现于抗日战场。这一支军队离开人民不能存在；人民离开这支军队，也同样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为人民服务，建立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就是这支军队从呱呱堕地直到今天的根本属性。因此，建立一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军队，是我党建军的根本目的。这支军队的名字，便是今天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所以表现出他本身的民族性和民主性的双重特点。在抗日民族战争中，他不像某些军队退却逃跑，或大批叛国投敌。他八年来能在敌后忍受无比的艰苦，胜利执行对抗敌寇的任务。

---

根据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立即准备“七大”的决定，以朱德为召集人的“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陈毅为委员之一）在延安成立。陈毅受该委员会的委托，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完成了《建军报告》（草稿）。但由于几个月来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已成为国共谈判和“七大”政治报告的新主题。七中全会遂决定“七大”的各报告由只对内不对外转为对外对内兼顾。因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中全会主席团的参与下，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确定另起草《论解放区战场》以代替《建军报告》。但是《建军报告》（草稿）是有其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的，故节录收入本书。



这种民族气概的伟大表现，正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我们看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投敌总数，达八十万以上，两相比较，便不难了解这些投敌军队不简单由于上层军官的不肖的缘故，而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的雇佣制度，是靠个人作用来维系的缘故。另外又如全国人民切身感受的不守军纪，摧残人民，是中国大多数军队的一般现象；而八路军、新四军所表现的与人民合作的亲切关系，则是很自然的流露。这中间的区别，在于八路军、新四军多年来均是献身争取民主斗争的战士群体，而不是摧残民主的工具，这也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贯坚持和厉行为为人民服务这一铁则，故能在中国的民族与民主双重事业中历经锻炼、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也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而屹然立于不败之地。八路军、新四军之不愧为民族先锋和民主战士，便被中国的历史事实所确定了！

我再就八路军、新四军的本身工作来证明上述的分析。通常观点，军队是以打仗、进行军事业务为唯一工作，其他事项，军队是不理会的。然而自成立之日起，八路军、新四军既于打仗的军事任务之外，还得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群众动员工作，还得从事经济生产解决自己的供给装备诸种工作。军事、政治、生产三大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常工作。这样的军队不能不是突破历史的、古今稀有的新型军队。入伍为兵，退伍为民，来自生产战线，回到生产战线，变军营为学校，变破坏为建设，军队放在人民之中，不放在人民之上，从人民中来，回到人民中去，于是中国旧军队脱离群众的一切恶习，便一扫而空。华北、华中敌后人民推称：“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团”。这正是根据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在长期体验中发现本质的论断。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共产党与这支军队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回答是：十多年来，这支军队均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进行活动。这支军队是在我党抚育之下长大起来的。他与我党有“不可须臾离也”的密切关系。党与军队这种关系，国内曾有人致非难之同，提出“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番研究。我首先认为人民鉴于国民党军队业已变成个人专政独裁的工具，因此要求改变党军的办法。这是有根据的，正可以提供国民党方面作深刻反省。但如果这种片面主张，把它一般化，则其弊害不可胜言。我认为世界有两种党军，一种是希特勒式的党军，一种是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希特勒式的党军，是建筑在愚昧欺罔，对领袖盲目服从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在消灭民主，征服世界。这种党军，不得不变成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种党军不仅应该深恶痛绝，而且应予以彻底消灭。这是世界公论，已成为全世界将要完成的共同事业了！另一种如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他以服务人民、争取中国民主、争取世界和平为目的，是人民的救星，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对这种军队采取取消主义或不承认态度，乃是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利益，根本反对中国民主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这是要请朋友们加以深刻考察的。与其朋友们关心党军的称号和制度，不如进一步考察某一党派及其统帅的军队的具体内容。他们是专为私利，不惜使用军队来殃民祸国呢？还是多年来伴随军队作自我牺牲，专替国家人民服务呢？只有这种具体的严格检查，可以得到去、取的正确标准。例如北伐时期，“清党”以前的国民革命军，难道因其有党的色彩，便可以否认其革命功绩而加以取消吗？例如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的军队，敢于向人民开枪，敢于俯首让敌，敢于屠杀青年，这样的军

队，难道因其无党军的称号而你们便主张给以保留吗？我们应该站在军队人民化和个人化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党的地位，只看他率领军队是站在为人民服务一边，或者站在替个人专政服务一边。只有这样去决定其对党与军队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军队国家化”这一口号，如果从为人民服务出发，而那个国家全部是民主化的人民有权的国家，那这个口号便是正确的。如果国家化这个口号不是从服务人民出发，而那个国家正处在寡头专政的状态，那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他正可以帮助野心家以国家名义长期掌握军队作个人祸国殃民的工具。处在中国长期不民主的状态中，人民痛苦深重，外有敌寇入据国土，内有贪污高压横行，正需要有主义有领导为人民服务的如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来担负民族与民主双重任务。像这样的人民革命军队，只有在人民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造成，也只有这样服务人民的军队，才真正是国家化的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应该看他是否服务人民，而不应该看他外面所贴的商标。因此八路军、新四军这样替人民服务的军队，是应该奖励帮助使其扩大。而不是诋毁他、限制他，或者企图取消他。

从“六大”到“七大”这十七年中间，创造出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光荣的革命铁军，这是此时期内我党的第一等重要工作，第一个伟大的成就。我党拥有这支军队，是我党的无上光荣。这支军队得着党的培养同样是这支军队的光荣。党与军队结合坚决为人民服务，广大人民给予党和军队的援助，造成军民的伟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战胜和必然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源。这也就是我中华民族人民全体的无上光荣。从党创造军队这一伟大工程中，不可忘记一个名字，那就是毛泽东同志。记得在我党建军的每一阶段上，无论在统论纲领上，无论在细论条目功夫上，件件般般皆可发现毛泽东同志神工斧凿的痕迹。当这支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有毛泽东同志在一道为之决策，为之指示方向，如何力戒矜骄，如何保持胜利发展胜利。可是当这支军队遭到空前失败的时候，仍然有毛泽东同志在一道同生死共患难，靠他掌舵，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又重新进入康庄大道。党与军队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存在着血肉的联系。我们切身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军队不能离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我们更将高举毛泽东旗帜英勇前进！

### 三、论创造军队

我党是何时了解军队的重要性的呢？并在何时开始军事工作的呢？

远在我党成立之初，在一九二三年，党报《向导》周刊上即有论文作出建立新的国民军以完成国民革命的重要论断，又不断有关于改造旧军队、进行士兵国民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四年，党派遣大批党员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1]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另外又派叶挺将军率领一批党员在肇庆成立第四军独立团[2]。军校工作与独立团工作，均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占有历史地位；无论在创造干部上，影响国民革命军军制上，提高战略战术上，建立军队政治上，皆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我党对国民革命的重大贡献的一面。然而这仍然只能说党在当时是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仍是不完全的。

由于党在建立之初，由马克思主义小组正转入群众性政党的新的政治活动时期，党的课题是急于放在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方面，尚来不及以全力进行军事活动。同时，党内有一种意见占主要统治地位，即对中国革命看法纯

全采取西欧先进国家革命的看法，企图以片面的民众运动去完成国民革命，根本否认争取军队的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重大特点是熟视无睹的。这个错误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末，其危害是很大的。具体表现在不用大力作争取军队工作，即在部分军事工作上，只愿党员任政治工作，不愿党员任军事指挥工作。在军队中一切迁就同盟者的意旨，失掉革命立场，不愿自居于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而自甘退居于辅助的地位。虽然在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由于我党的政治工作起了伟大的团结军民的革命作用，然而野心家们利用了军队指挥权不在我党掌握中的弱点，遂能顺利指挥军队进行反革命政变。这个教训是不能不牢牢紧记的。这是我党对军事工作初期的情形。这是陈独秀机会主义不要军队，违背人民利益，葬送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然而大革命的失败教训造成我党以后伟大的进步。一九二七年冬大革命失败，使我党进入独立建军掌握武装的新时期。

此时期情况是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革命人民遭受屠杀，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已变质成为军阀屠杀人民的工具，空前的白色恐怖遍于全国。全国人民特别是大革命影响深入的省区，如湖南、江西、广东、湖北等地所遭受的惨杀无可忍受，我党不得已才领导革命人民退出城市，依据农村举行武装自卫。这是一面。另一面在国民革命军中，有一部分不愿意叛变革命的军队，在我党领导之下举行革命起义，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如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均有军队掉头站在人民方面。因此，大革命虽失败，但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的武装自卫，得有正式军队的参加便更强有力的发动起来了。因此，不要忘记：工、农、兵、革命知识青年的大联合，便是我党建军的基础。

这种工农兵武装自卫的大起义，造成全新的革命局面。党不仅了解了创造军队的必要，而且必须独立担负这个任务；更必须创造崭新的革命军队，以区别于国民党的旧式军队。党研究了大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教训，一面保留国民革命军中的优良部分，一面抛弃其中的恶劣部分。党必须以健全的军事方针，始能应付当前局势所提出的新课题。这中间最能领会大革命教训继往开来的，首推毛泽东同志，这不是偶然的。在政治方面，在党最初决定国共合作的时候，以及党的五次大会紧急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明定友我阶级界限的主张，以及以后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的主张，这些正确的远见，并未得着全党的公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末是以孤独的情怀转入湘赣边界的农村，首先毅然着手政治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新创造。当时平浏[3]各地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以及由武昌出发转到人民方面的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举行秋收暴动。这个暴动失败后，不久与南昌暴动军的余部（肇庆独立团后身为其中骨干，配合湘南暴动农军）会合于湘赣边界井冈山，配合当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其规模和力量便逐渐强大起来从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党和指示我们，是针对着以下的问题，坚持下列诸原则：

第一，我们必须铲除旧军队长期脱离生产、脱离人民因而养成的雇佣性质。这种雇佣性质是一切军官得以利用军队进行祸国殃民的社会基础。我们必须铲除旧军队的雇佣性质，以创造能为人民谋利益的新军队。这是我党建军的基本精神。

第二，必须吸收革命的工人、农民加入军队，作军队成分的改造。另一方面必须着手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并且在分散打游击和做群众

工作中使官兵与人民接近，共同作革命斗争，这样去改造军队的气质。这里就提出和建立了在军队中的群众工作路线；这里就解决了军民团结和合作问题。

第三，在解决官兵关系上，提倡革命服从，官兵平等，废除肉刑，废除打骂，不枪毙逃兵等民主制度。这是对于军阀军队定型的压迫制度的大胆的根本破坏，使官兵双方在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目的之下亲密团结起来。

第四，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确定军事服从政治的领导，军队是推行政治的工具的根本原则；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必须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去推行。这里就提出了加强军事工作的问题，消除了党权与军权的对立问题，造成党与军队的不能分离。

第五，军队下层的广大士兵是一个武装的群众问题，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党员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军官党员和士兵党员都要拿出一般党员在工人农民群众中的工作精神在部队中进行工作，党员不是以特殊的资格站在士兵之上进行工作，而是以士兵资格逐处代表士兵的利益，领导士兵走自由民主维护部队的革命斗争大道。同样在军队各级设立政治机关和各级政委，这是由上而下的政治领导和动员工作，与党员在士兵中间由下而上的政治工作互相结合，造成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便保证了军队能完全负责去执行党的政治和军事的战斗任务，完全忠实于人民事业，使军队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旧军阀把军队当作个人工具的事，在我军中便完全消灭了。

第六，在战略战术上进行崭新的改革，一方面是保存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大胆挺进、英勇冲锋的突击战术，一方面根据敌我强弱悬殊和农村分散环境，提出了经过百战磨炼的游击战术。这可引用一九二九年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面说：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

这是毛泽东同志概括我军最初战斗经验作出的总结。旧的军事头脑是不会懂得这种战术的，是不敢作如此大胆分散的，是反对用军队去发动群众的。旧军队战术一般指示了进攻与退却的原则，然而把进攻与退却综合研究，特别提出弱小军队在强大敌人面前，敢于大胆退却再转到大胆进攻，这又是中国旧军事学中找不到的。

根据地思想之提出，以及凭险依山的巩固发展方针，以及长征时的摆脱战术，这些新的创造反映了红军在强大敌人“围剿”跟踪时代的艰苦，更显示了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在当时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伟大的革命军事天才。我们在尔后的多年国内战争中以及当前的八年抗战中，还可以看见上述的战术原则的创导和启蒙的功用。

第七，建立了团结人民的群众纪律制度。旧军队只有军纪风纪，军纪所以强迫士兵服从军官，风纪所以重军队内外的瞻观，对人民养成军队的威严，至于涉及军民关系则不属于条令的范围。反之，旧军队逐处有派兵虐民的事实。我军军纪首重自觉服从，所谓连坐法于我军毫无用处。我军风纪不在形

式而在于民主自由的活泼精神。群众纪律便是我党的新创造，他正确解决了军民关系。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养成军队官兵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一碗一筷之微，必须不可侵犯，就是把我军官兵英勇牺牲献身人民事业的精神，表现于日常与人民共处的关系之中。这种群众纪律制度便成为军民结合的桥梁。

第八，建立优待俘虏的制度，这是证明本军代表工农兵的人民利益，包括对方被压迫的官兵在内。因此本军敢于从优待俘虏转到武装敌方归顺的官兵加入共同作战。只有实行为人民服务的我军，才能有此气魄。这个政策在战争中收到瓦解敌方意志的伟大效果。

第九，我军开始即估计到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故即注意到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这样建立了废除薪饷、战费自给的供给制度。至于由此出发，发展到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则是以后的事了。

第十，更其重要的是对创造根据地的重要性之了解。如果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路线是从工人运动到城市起义迅即取得政权，则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于经过工农运动，经过根据地逐步发展到全国。中国马列主义提出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融合了中国汉、唐以来的历史和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所发现出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因此创造根据地，坚持根据地，爱护根据地，发展根据地，便成为党与人民大众的根本革命思想。这个思想的创导者是毛泽东同志，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其正确性。

以上是我军最初建军的纲领，一般包括在二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的讨论和决议之中，它把中国社会上军民对立、官兵对立、党政军对立的腐恶痕迹便彻底肃清了。这样明确规定了党、政、军、民的关系：用党以建军并领导军队，再用军队发动民众，扩大地区，建立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掉过来党与政府和人民又用全力来帮助军队。这里明确的使党与人民认识了中国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间的杠杆作用。这些关系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和结论，是在开展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的艰苦过程中所获得的。党一方面必须接受国民党暴动军队的遗产，利用其军事经验。一方面必须改造其雇佣军队脱离群众的本质。党一方面必须起用和信任旧军队出身的军官，没有他们，当时我军的作战指挥不是一般民运党员所能胜任的。所有一批旧军官在这点上均起了极大作用。然而党一方面必须用力对他们进行改造，党不顾情面暴露了投身革命的旧军官与我们党中间的矛盾。是否从群众出发，是否具有群众观点，是否承认农民战争是我军的革命特质，便是争论中心问题。现在看来，假如党当时不坚决克服出身旧军官的党员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他们的以军治党、以军治政、以军治民的错误观点，那是会破坏我们的伟大事业的。党在这方面的思想上的胜利，于最初建军有其决定意义。党一方面利用旧军队，欢迎旧军队官兵转到革命方面；一方面又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队不从内部瓦解将增加中国革命成功的极大困难，因此必须与党内不重视军队工作，无条件排斥旧军队的倾向进行斗争。党一方面反对军队中不愿建立根据地、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方面反对地方上不顾全军队主力要求无条件死守某一根据地的地方主义。党的正确原则是承认红军主力必要时的转移，同时必须部署加强地方武装，以达到主力转移后可能限度的坚持根据地。因此，只注意扩大主力不帮助武装地方，和只注意武装地方不帮助主力，两者都是错误的。党在时局估计上，一方面反对空洞乐观主义，

不了解斗争长期性，幻想冒进明天就取得胜利；一方面反对悲观失望情绪而怀疑红军、苏维埃之能否长期存在。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正是这种胜利时轻敌冒进，失利时悲观失望的代表。一九二八年秋进军湘南的失败，便立即受着历史的惩罚。党的主张是艰苦做群众工作，艰苦做游击战争，队深入土地革命去扩大红军去扩大根据地，去迎接和发动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党在当时从群众利益出发，从正确估计政局出发，从反对各种偏向出发，特别是反对旧军官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急性病两种偏向，所以能够在反革命的长期围困中达成建立红军、发展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井冈山斗争直到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区联系、建立中央苏区为止的建军规模确立的过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便全部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便在政策上、组织规模上完全奠定了我军历史的建军的基础。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路线的纲领便以完备的姿态出现了。这一伟大的创造功绩应首先归功于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创造精神，其超脱人寰处，在于就当时的每一革命经验，每一农村材料，每一具体事物，作了详尽的全面的分析，把马列主义的原则放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上加工，这种结合便创造出新的原则，再去指导革命实际，从而得着更丰富的革命经验，又进一步使革命的理论丰富起来，这样使我们在斗争中便受用不尽了。毛泽东同志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立脚农村却不研究农村脚踏实地从发展农村出发，而天天幻想城市，把城市工作方法强迫移用于农村环境；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立脚中国却不研究中国社会情形，一切不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机械地把外国革命规模移雨于中国环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人民的智慧变成共产党的智慧，又把共产党的智慧与人民的智慧结合创造出新的智慧。因此毛泽东同志成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智慧的最优秀的代表。这一身份在早年便确定了。当时有不少的人嘲笑毛泽东同志为“右倾”，为“保守主义”，为“农民意识”，今天历史出来作结论，被嘲笑的乃是那些嘲笑人自己，而最为正确的，代表中国马列主义正统的，乃是毛泽东同志。

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大会决议中指出“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意义”。又指出：“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领导”。这些指示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是很正确的。然而由于斗争环境的限制，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最初建军经验不可能及时反映到六大大会中去，但六大大会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中国革命的民权革命阶段的性质，提出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建立苏区和红军的任务。这些正确指示，对各地启示非常之大。一九二八年冬“六大”决议到达井冈山，大家在研究中即指出：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反对盲动主义，以及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革命根据地的办法是与“六大”决议符合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超过全党的独特的卓见，且较“六大”决议更其前进突出，更其符合实际，故能别开生面，更其深入具体的发展了我们工农兵的革命事业。

在这一时期的建军，我是以江西、福建、湖南三地红军斗争经验为中心来论述的，同时在鄂豫皖木兰山，在赣东北磨盘山，在湘鄂西洪湖，在广西左右江，在广东海陆丰等地，红军发展过程，虽备有特点，但一般均走着相同的路线。举一反三，不再一一复述。但要特别指出，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中国的首创，但以后在发展红军的过程中，由于盲动主义，地方主义，以及

各种环境的限制，宣告失败，这是极大的教训。如果拿各地苏维埃和红军来与江西苏区红军比较，则应承认后者没有犯过路线的错误。更其顺利的造成一条发展红军的正确路线，其基本原因在于有一个掌舵的能手毛泽东同志。革命运动需要英明领袖。这个真理在此更深刻的证明了。

#### 四、论内战（略）

#### 五、论抗战

##### （一）论抗战准备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以一个坚强的战略兵团单位进入敌后担负抗战中最艰苦的军政任务。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跟着以一个战略支队挺进华中敌后。这两支军队大胆的向敌后进军，从平型关初战的胜利起即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全国士气，使全国和敌后战局为之改观。我军之踏入抗日战场即获得影响全局的伟大胜利，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充分准备所获得的成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研究从一九三五年冬我军到陕北结束长征后直到抗战爆发此两年间党的文献，便看出我党对抗日战争的准备步骤。特别从一九三七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以及此后的报告与论文中，均对抗日战争有正确的估计和明确的指示，这便是我军出发抗战即能出人头地震撼敌寇的根源。尤其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仅及九个月的抗战经验即发布两本名著：《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便把全部抗日战争的过程作了肯定而正确的科学分析。今天来说，八年的抗日过程都从事实上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断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肯定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提出持久战略而不是速决战略。同时提出持久战略必须用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和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来支持。同时在正面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与战役的方针必须是战略防御中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外线战。这三方面便是将战略、战役、战术三者之间的辩证联系加以具体分析和综合研究。能顺利执行这三个作战方针，才能不断打击敌人，削弱敌人，才足以达到全国战局的持久，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在于大胆进行不利情况的战略退却，争取在有利时机和地点予以反攻而达到削弱和歼灭的目的。这一战略一直未被国民党采用。国民党八年来均执行其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终究只做到向西逃跑无法停止敌人的进攻。而敌后游击战在于阻止敌人和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这一战略任务一般说来执行得很好，所以有了抗战八年的敌后的伟大成就，遂把敌后战场的地位提高超过正面战场，使自己处于坚持抗战的现有优越地位。毛泽东同志最后又把上述观察总括来说明整个抗日过程，提出抗战的三阶段论，即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具体研究了每一个阶段中所应采取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方针。同时坚强指出敌后战场农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乡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斗争的特点，从长期斗争中用以转变敌我形势的特点，以及一面抗战、一面进行民主建设的特点。这些分析便全面说明和掌握了抗战的全部规律。全国军民照这规律办事者胜，如敌后战场。反对这个规律者败，如正面战场。这是八年来的抗战过程所证明了的。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对敌人方面的主要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又分析了抗战内部的关系，分析了国民党友军与我军之关系。其主要指示是，抗战的性质是一个反抗异民族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

胜利基本因素是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起来抗战。这里说明实施民主与争取抗战胜利之不可分离，在抗战中国国民党厉行专政，压制民主，与共产党领导人民发扬民主，成为国共两党的基本分歧点，在这种意义上，抗日战争只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苏维埃战争[4]的一个继续，即是说它是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争取新民主胜利的伟大的国际战争。敌人是唯一的，即日本帝国主义，这与过去不相同了。动员参战的人民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汉奸、亲日派除外），其广泛性也与过去各时期不相同了；国际援助的广泛也与过去不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也与过去不相同了。还有其他不同之点。但战争的基本性质在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即争取人民民主胜利则数十年如一日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其深广程度和斗争形式有了不断的改变。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十年苏维埃战争是共产党独立进行的，而现今抗战又是国共两党共同去进行的。二十多年来经过了国共两党的两次离合的历史，证明国民党对于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任务，不仅不是坚定的，而且是实行中途背叛；他曾几次以暴易暴地站在破坏民族与民主双重革命任务的反动的主导地位上。而共产党则经过三次大革命，始终没有弄错政治方向，坚持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革命传统，奋勇直前，前仆后继，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光明大道。这就是说联合国民党进行抗日战争是适合革命的需要，同时在共同抗日中，反对国民党对抗战的动摇，反对其投降妥协半途而废，更是适合革命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对于民族抗战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这个抗战友军的极其忠实的负责态度，这也就是抗战八年历经变故，抗战大业保持不坠，国共合作保持不破的基本原因。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抗战内部的正确分析。

对我党我军自己的正确分析，在于承认敌人军事力量强大和其政治上的孤立和寡助，及其战争之野蛮性、退步性，在于承认自己的数量弱小和质量坚强，战争之进步性和政治上的多助。我党我军数量弱小到全国党员不超过三万，军队数量八路军四万，新四军四千，仅剩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和南方十几个游击支点。拿这样的力量与敌寇相比，强弱不侔十分显然，拿来与国民党比亦极其悬殊。然而我党我军的政治方向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正确的政治方向，逐处吸引广大人民的同情。我党我军的质量都是坚持中国革命传统久经磨练的革命战士，和经过二十年培养出来的一批革命领导人才，本身具有几次大革命的治党治军建立根据地的宝贵经验。特别我党我军所处的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抗日战争所处的政治领导地位，造成我党我军不可遏阻的发展优势。诸如我党所处的地下党的劣势，苏区的偏僻的不利地位，以及我军装备和数量之低劣等弱点，一经我党所准备的抗战之爆发，这些弱点便在学习中溶解，以极大的飞跃取得伟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后以及初期对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分析。这些分析驳斥了亡国论，驳斥了速胜论，驳斥了民族失败主义，严重打击了民族投降主义，阻止了尔后的投降潮流，对敌取得了坚持抗战的胜利。这些分析鼓励了和争取了国民党转到抗战方面，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不得不举行一定程度的政策转变；而另一方面严格批评了国民党政策的动摇及其反动方面，坚持了抗战民主的革命大纛，使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企图遭受着抵抗和粉碎，对内取得坚持抗战团结的胜利。这些分析在对巩固和发展自己上，顺利执行了由结束内战到发动抗战新政策的转变；即是说在转变关头对敌对友都是以清醒的头脑、稳定的脚步领导广大人民奔向光明的抗战前



途,因而领导了伟大的抗战,取得了伟大的发展,驳斥了抗战以前党内的“左”倾的关门主义,驳斥了抗战以后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左”的关门主义在于以“左”倾的革命高傲的宗派主义,拒绝抗日合作,不敢以民族领袖的姿态放胆去迎接和领导抗日战争。这是以“左”的“纯洁”的姿态,脱离全国人民,让日本帝国主义放手侵略,必致葬送人民利益并葬送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右的投降主义在于当着抗战后国共合作确立,在新兴的抗战合作局势之中迷失了自己的政治方向,甘心放弃人民利益去迁就和适应同盟者的反动企图,不敢实行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不敢大胆发展自己,而是随声附和、追随同盟者的尾巴,自居附庸地位。这样必致放任同盟者厉行反动政策,葬送抗战利益、人民利益,造成整个抗战的失败。

党内“左”的偏向在抗战前并不严重,故克服容易;而抗战后党内右倾的阶级投降主义即新陈独秀主义[5]则十分露骨,引起了政治上对党的危害,其克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了党内的“左”右偏向,保护了党的正确的抗战的人民路线,这样使我党我军能以坚强姿态站在抗日战场,领导抗日战争的迈进。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形。

## (二) 论敌后进军(略)

## (三) 敌后抗战的三个阶段

综合八年敌后进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四年底结束百团大战为止。此时期重要事件是平型关初战大捷改变敌后形势,影响全国战局,粉碎晋东南九路围攻,回答了敌后能否站足的问题。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回答了敌后可以发展可以坚持可以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冀鲁豫、冀东、冀中的进军,回答了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根据地。武装自卫制止河北磨擦,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破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三次整军,和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的民主建设,各地初步实现了敌后根据地的宏伟计划。举行百团大战[6]坚强的击破了敌寇紧缩我根据地的计划。此时期全国抗战重要事件是,敌寇继续战略进攻,南京、武汉之沦陷,华北、华中均被敌控制,国民党继续向西退却,汪逆精卫投敌,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在敌后坚持抗战。在武汉失守前,敌寇战略重点放在向西进攻,对敌后我军之活动未十分重视。其进攻方式是利用伪军土匪捣乱农村,组织各路“讨伐队”进行短促的“扫荡”,实行突贯进攻、分进合击的战术,以达到巩固其交通城镇的目的。其政治口号是“反共灭党”。进行治安肃正计划,是对国共两党两方都打的。在各个“扫荡”中烧杀极惨,企图以野蛮手段压服反抗。在政治上着重建立维持会,招抚流亡、实施小恩小惠,组织“爱护村”并开始征集壮丁。武汉沦陷,敌寇停止向西的战略进攻,转而回援华北,敌之战略重点放在“扫荡”华北敌后,这个时候敌后情况便严重起来了。敌寇视华北为其“大陆政策的重点”,谓我军在华北为其“心腹之患,等于盲肠炎”。曾有一个时期把晋察冀边区与武汉并重,足见其重视了。敌寇发现早出晚归的“讨伐队”不仅不足制止我军,且亦不能保护其交通城镇,乃转而实行大举“扫荡”政策。其具体战法是囚笼政策,即所谓“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整套封锁分割战术。例如完成自晋铁路,德石铁路[7]的建筑,大量修公路,密如蛛网,将我根据地割成“井”字“田”字形状,并于铁路公路两侧挖护路沟,建封锁墙,这样以便其“分区扫荡,分散配置”。另外加上大军的“扫荡”即所谓“长驱直入的牛刀子战术”。这是堡垒主义与进攻军配合的攻守并用战术,是根据其第一期“讨伐队”战术的经验加以

修改而重新订定的。这个战术改变的发起人是山下奉文（当时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即现在敌寇在菲律宾的败将）和桑木师团长[8]。他们认为“讨伐队”的迫奔逐北式的战术，对于国民党军队是有用的，对于善于灵活机动的八路军是无用的。敌高级将官曾谓“皇军讨共实如蛮牛捕鼠，捕鼠无效而已力已竭”，这个譬比是很恰当的。山下奉文与桑木主张放弃日本的旧套战术，改订进攻与封锁并用的新战术，这是有见地的。这里可看出日本军人在学习国民党的内战“围剿”中采用堡垒战的经验。他们还提出“与剿共团作比赛忍耐之斗争”，“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敌寇决心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进行长期进攻的准备，因而战局更严重了。这个时期国民党方面利用我军在敌后坚持所获得的胜利，以友军姿态分批遣军楔入敌后，利用敌我相持的困境对敌后战局进行破坏，于是特工横行、磨擦迭起。如果抗战初一九三八年国民党要我军进入敌后意在令我为他火中取栗的话，而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见我军强大了，便不惜到处楔入进行横插破坏，一句话说完，国民党的反共进军企图置我军于敌顽的南北夹击之中，这个局势是异常危险的。此时我军的政策是，从平型关初战胜利后，我军进军敌后，牵制敌军配合正面作战。对敌人之“扫荡”，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其不敢孤军深入；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这种积极作战的原则在各种战斗中取得无数次歼敌的胜利，这样就打开了敌后的局面，站稳了自己的脚跟。这里我党实行了自己的口号，即“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当一九三八年末到一九三九年开春，敌寇与国民党对我军的夹击形势到来时，我军一面坚强的迎接敌寇对敌后的战略“扫荡”，一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采取审慎的自卫态度。在反对敌寇攻守并用的战略上的经验是：在反“扫荡”初期敌来势凶猛，我军避开其锋芒，让他挺进深入，而以游击部队削弱和分散其优势，错乱其部署。我之主力则隐蔽集结，避免陷入敌之合击点。中期敌一再扑空，其势渐减，由进攻转为比较分散筑碉修路驻守等，我军仍以强有力的游击动作予以疲困袭扰，更使敌趋向疲困，我军主力则持满待发。末期则乘敌疲困或撤退之际，予以猛力围攻，做到歼灭其一部和收复沦陷的地区。加上我军大规模的交通破坏战，全体人民的坚壁清野，我军灵活机动的移动，敌占区人民的同情拥护，人民武装的战斗配合，这样便粉碎了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的新战术。其堡垒主义与公路封锁与牛刀子“扫荡”，在我军面前宣告了无用。在对国民党举行武装自卫方面，我军实施有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集中兵力，对顽军的磨擦进攻实施了退避三舍[9]、促使对方觉悟的委曲求全的古训；对方势焰喧天非消灭我军不可，我军才忍痛还击；击溃之后不加追击扩大。这个方针制止了武装磨擦，继续维持了国共合作。

总之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底这是我军在抗战中的第一阶段，是我军向敌后的战略进攻阶段，充分发展自己巩固自己的阶段，联合友军共同抗日并制止武装磨擦巩固民族团结的阶段。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寇，创造敌后根据地。我们的战略是，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的伟大成就是，粉碎了敌寇无数次的“扫荡”，打破第一次反共高潮，创造了遍于华北七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我军由四万发展到五十四万，解放人口六千万。加上华中根据地伟大的创造和华南的初期游击，调动

敌人，应援华北，使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我党我军对抗战的伟大功绩。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一年冬百团大战结束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反治安强化运动。此时期国内外的重要大事件是，德苏战争爆发，日寇南进爆发太平洋战争。国内投降潮流高涨，爆发皖南事变。敌寇在华北的几年“扫荡”屡变战术、屡易统帅，无法阻止我军之活动和发展。而我新四军也继八路军之后在长江两岸华中地带创立了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寇于一九四一年乃以更大决心来“扫荡”华北，企图一劳永逸作根本摧毁。敌寇以冈村宁次[10]为首的进攻方针，其政治口号是“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巩固大东亚战争华北兵站基地，建立大东亚战争华北参战体制，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的总力战。政治上是改变“反共灭党”的口号为全力灭共。即是取消了消灭国民党的口号，而是以全力灭共，向国民党招手，策动其投降，这正是针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行动而来的。同时对我根据地施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欺骗办法，厉行“自新”“自首”政策和特务政策来分化我军民。在经济上厉行敌占区的配给制度，加强对我根据地物资的封锁和掠夺。在文化工作和特务工作上加强“新民会”、会门等封建迷信宗教团体，深入我区作为其进攻的内应。并特别着重以威胁利诱手段争取知识青年堕入其圈套。例如组织赴日参观团、开运动会、征文竞赛、麻醉性文学书报大量印发等。对伪军伪组织工作特别运用伪满洲“皇协军”经验以加强伪“治安军”工作，此时期使华北伪军有空前扩大。又以强力进攻国民党部队，使其转化为伪军，并作为进攻我八路军的前导。其军事方针是加强封锁沟墙和公路建筑。此时期封锁沟墙和公路的全长等于我国万里长城的六倍，工程之浩大亘古未有。其“扫荡”办法是由短期“扫荡”进到长期“扫荡”，由分散“扫荡”进到集中“扫荡”，由线式“扫荡”进到纵深“扫荡”，由分区围攻进到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进到步步为营，由分进合击进到“铁壁合围”。其战术口号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等。特别残酷的是由过去乱烧乱杀进到有组织有计划的烧杀，其目的在于消灭我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建立无人区，从妇孺老幼一个不留，虐杀净尽，在某些地区造成整个村坊整个地区的毁灭。这是古今中外任何野蛮民族的侵略行为所不能企及的。除非华北军民亲眼看见和亲身遭遇，简直难以相信其惨毒的程度。但是敌寇这种疯狂的无人性的进攻，乃更激起了华北广大人民的更高度的决死反抗情绪，这种比赛，敌人也终遭了失败。

敌寇还依靠其特务内线潜伏我区作进攻内应，同时依靠其优越的科学技术加上其精密的情报组织进行各种各色的侦察活动，专门奔袭我之指挥机关和后方勤务部门，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指挥系统、后方据点及我军部队以及根据地之人民，这是亘古无前的残酷战。

国民党这个时期尚有许多部队留在华北敌后地区边沿，经不起敌寇这样空前严重的压力，采取了经过国民党层峰所批准的“曲线抗敌”政策，即是毫不抵抗，整批率队投敌；投敌之后即作为敌寇“扫荡”我军的前导。国民党的妙计是投敌反共，“变奸伪区为敌占区，再变敌占区为自卫区”。国民党这个政策直接帮助了敌寇，使伪军扩大数倍以上。例如庞炳勋、孙殿英[11]之流投敌将领就华北即在四十名以上，先后投敌部队近五十万人。这个力量辅助敌寇，更增加了华北敌后的严重局势。从此，在华北七省敌后战场和华中五省战场，均只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击敌寇的任务，这个时期全中

国的抗战担负和中心便转在敌后，转在华北，转在我党我军的肩上。这个时期，敌后战场上地区破碎、死亡枕藉的惊心动魄的悲壮斗争场面，当事者在当时并不觉得，那时只有向前不容后退，过后思之才令人心悸。我军将士和人民到处鲜血横流，每日均有被敌寇包围“兜剿”的危险，亦即每个部队和村庄每日都有被消灭摧残的危险，亦即每个地区都日在削小，都处在不被鲸吞囊括即被零碎细割的危险状态中。尤其恰恰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遇着普遍的灾荒，树皮草根人民食之殆尽，发现易子而食的悲惨情景。天灾的袭击更加重了我们的困难。在事实上敌寇的毒辣计划收到了不少的暂时效果，例如在此时期冀中、冀东、冀南、冀鲁边、清河区等地全部变质，变成游击区或隐蔽游击区，主力和党政军机关不得不退回山地，只能留一批干部带小部队在该地坚持，与当地人民共生死存亡、作最后奋斗。又如晋察冀、晋东南、冀鲁豫、山东各大根据地亦大大缩小了，我军由第一阶段五十四万减到三十万，人口由六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这种缩小是何等严重啊！

在这个兴灭继绝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和党的军委是以冷静坚强高瞻远瞩的头脑，提出“咬紧牙关，渡过两年”，指出敌后艰难困苦只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指示鼓励了敌后抗战军民。连年发布我党著名的十大抗战政策[12]，另一方面下达了有名的军委第四号指示[13]，提出正确的巧妙的应敌的军政新方针：以分散游击战争对付敌之空前“扫荡”，以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去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大量发展民兵作为保乡自卫的骨干，造成主力、地方军、民兵三者的连环，逐处发动千百万人民与敌寇周旋，这样去突破危局。

这个时期的经验是：

我党我军以党政军民领导一元化来对付敌之总力战，以更大的团结和统一指挥来对付日军、伪军的协力，这就是领导上的比赛，精神上的角力，团结与团结的比赛，结果我党领导的民族团结便击破了敌寇伪军的同床异梦。敌寇以太平洋战争的新胜利和敌汪对华新政策来进行欺骗，瞎吹敌伪必胜，我党我军以强大政治攻势说明苏必胜，德必败，同盟国必胜，轴心国必败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必败命运。这种宣传比赛用事实来揭破敌伪欺骗、巩固军民的抗战信心。我们用精兵简政政策，缩小机关加强战斗单位来对付敌之包围奔袭，任何机关均能干根据地变质时继续坚持斗争、指导斗争。我们用精兵简政政策和节约生产政策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斗争，减少了浪费，使民力有喘息机会，使物力得到存储。我们用华北、华中全区域党政军民的努力互相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我们用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发动群众的反特斗争。来根绝敌特汉奸的内线破坏。我们用民族气节教育，反对投降敌人的抗战教育，来稳定人心，坚定抗战，宁为玉碎，不求瓦全。我们用敌进我进的办到敌后之敌后去坚持游击战争，以回答敌之进攻。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援助山地，坚持山地以支持平原。我们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新斗争方式，成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带到我之根据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外，去动摇敌人之心脏。我们创造了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办法，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承认在不利情况时的退却，而这种退却是为准备好能适时转入反攻。承认在敌情严重、根据地变质时，能巧妙运用敌人能容许的范围去达到掩护自己、保存自己以准备恢复工作，以掩护武装游击之随时进出。我

们用深入而坚强的敌伪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分化和中立伪军伪组织，这一工作，日本反战同盟[14]和朝鲜独立同盟[15]他们工作得很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用地下党工作方法去争取敌占区有民族意识的士绅和青年，以上层工作来掩护下层工作，这样使敌寇之自首自新政策失其效果。我们用整风审干政策改造了思想，团结了全党，提高领导能力，改变了工作作风。我们用拥政、爱民、拥军的政策加强了军民的团结，粉碎敌寇的挑拨离间的伎俩，巩固了共同奋斗的决心。在军事上，我军以反复穿插对付敌之辗转电击，以间隙穿插、灵活转移对付敌之纵深合围，以分散隐蔽、反复转移对付敌之集中包围和“清剿”。以我之集中对付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以军民大破坏对付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地雷战对付敌之梳刮搜索，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地区之被合围“扫荡”。主力则灵活转移，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与民兵们就地游击就地坚持，达到与敌人扭打纠缠，使敌人“驻剿”也难以肃清，不得不自行松懈停止。这个阵势是主力与地方军与民兵配合，几百万人民对付几万个分股入侵的敌伪军的联合作战。当敌人集中前进时，其锋不可当，当其转入“驻剿”时，已自行分散，意味着其势稍杀，其力初竭，当其分股下乡搜索时或换防转移时则其弱点已暴露而到了战周转变关头了。军事组织上的成就是，扩大了内战时军区工作的经验，将地方党政军民的力量，主力、地方、民兵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正确使用，一面使用兵力，一面积蓄兵力，这样便坚持长期战争渡过了难关。

这就是在第二阶段上敌我政治对政治、军事对军事、经济对经济，文化对文化各种斗争方式的总的比赛。斗争之持久性、复杂性、残酷性是古今中外的新创局面。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十大政策是经过考验的、制胜敌人的武器。我们与敌人的比赛，我们并未落伍。敌寇企图消灭我党我军的计划是失败了。我党我军取得坚持抗战的伟大胜利。自然此时期我们根据地是缩小了，军队数量是减少了，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是遭到空前未有的破坏，某些地区业已接近枯竭的地步。然而我党政军民受着锻炼，锻炼得十分坚强，学会了各种斗争经验，数量之削弱增强了质量。就是说我党我军经过第二阶段的伟大斗争，人人敢说不再怕敌寇了。敌寇之伎俩已穷，而我军办法之多则愈出愈奇。这里得“谢谢”日本帝国主义，“谢谢”他的“教育”，使我们学会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打定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基础。

这就是第二阶段，数量缩小的后退阶段，锻炼增强质量的巩固阶段的基本内容。

第三阶段是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东、冀中各根据地工作开始恢复，华北各根据地开始从缩小转到再扩张的时期直至现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外的重大事件，首先是苏联的再进和德国再退，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战争局势。接着是意大利投降，美国在太平洋的反攻，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16]，露骨地完整地提出其法西斯政策，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一面是以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一面是派汤恩伯、李仙洲大军进入苏鲁敌后发动大磨擦。敌寇恰在此时与汪逆订定日华同盟条约[17]，强调实行对华新政策，这是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密切配合着。敌寇鼓励蒋介石的反共以策动其投降，蒋介石经过反共来达到引起敌寇的谅解。在蒋介石名著《中国之命运》中，袒露了反苏反共反英美的纲领。基本上说来，在思想上、精神上蒋日业已站在一条战线上了。这个时候，陕甘宁边区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敌后各地武装制止了李仙洲、韩德勤、汤伯恩、顾祝同所发动的进攻，

我党取得击破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胜利。接着是由陕甘宁边区发动伟大的整风、审干运动，发动了伟大的生产运动和有力的除奸运动，敌后各解放区立即响应进入行动，获得巨大的成绩。同时这一时期各地实施并再次深入减租减息的群众建设和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使解放区更加团结起来。在对敌斗争中，敌后各地实行敌进我进的伟大进军，取得解放区的再扩张，我军的再发展。主力兵团之坚强，地方兵团之扩大，民兵之普遍发动，加上一切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新设施，把敌后各解放区提到空前未有的规模。这里与国民党从河南败退、两湖瓦解、粤桂沦陷、滇黔告警、川陕震动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接着又是河南解放区、湘赣解放区之新出现，和苏皖、浙江、广东各解放区之新扩张。我党对敌战斗的胜利与民主建设的业绩无情地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路线的谬误，指出毛泽东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正确。抗日救国的重责落在我党我军身上，国际视听，为之改变，人心趋向为之奠定，敌后解放区的发展如日中天，而蒋介石领导的大后方日趋崩溃。这个趋向从去年五月所连续进行的、经美国调处的国共谈判把中国问题的本质完全暴露了。因此今天担负在远东和中国战场上抗战救国的责任，是要依靠毛泽东和共产党而不能依靠蒋介石和他亲手所腐化了的国民党。谁是能够担负抗战救国责任的军队？以及谁是日寇的对手？这个军队、这个对手只能是八路军新四军而不是蒋介石的军队。如果要恢复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必须依照八路军新四军的楷模从蒋介石统帅部的改造做起直至其军队各种制度的改变为止。谁是能符合全国人心的政权形式？谁是能担负抗日救国的政权形式？那只有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敌后解放区的民主政权经得起锻炼，只有他能领导战争；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八年抗战中证明他腐朽无能，反动有据，误国殃民，已经到了应该彻底改组的时候了。总之，根本解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解除其反动祸国的失败主义的军令政令，立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立即改组国民党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这已是应天顺人、挽救时局、争取抗战胜利的必由大道。抗战胜败和建国百年大计取决于此，这是全国军民奋斗的中心目标。我党我军领导的敌后解放区便是这个奋斗的主潮，是强大的日寇所不能压服阻止的。国内任何反动阴谋的阻挠顽抗必被粉碎无疑。毛泽东同志对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宏伟报告，“联合政府”这个正确口号已为全国军民所接受，已经在行动，实现之期已经不远了。以上就是说明敌后斗争第三阶段，我党我军再发展的阶段以及它在全世界全中国所起的伟大的影响。

（四）光荣的牺牲和伟大的成就（略）

（五）对敌伪方面的评论（略）

（六）抗战初期、中期的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上述经过均属于抗战初期和中期的事情。抗战已接近末期，总结整个抗战的经验的时候尚未到来，现在拟将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教训作一初步总结，对于进入末期以及结束抗战是有意义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抗战路线，八年来的伟大发展证明其完全正确。其基本内容是针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敌后战局的残酷性，提出了削弱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游击战略。针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而提出我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即联合他抗日的一面而反对他反共的一面，这就是正确的站在中国劳动人民立场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针对着抗战中国内外的复杂局势，特别敌后的艰苦斗争环境，

提出坚持抗战、积蓄力量、长期打算、储蓄人力物力财力的持久对敌的方针，提出有理有利有节对顽固派武装反共的严肃自卫方针，创造了一条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正规路线，从军事底定打开局面转入深入群众运动，直到建设群众武装再转到伟大的生产教育和军政建设。这一条正规的创造根据地的路线，使每一阶段上应做的工作有了极其科学的部署，主要任务与次要任务均有适当的配置，既不轻重倒置，也不先后错乱。同时又在每一时期每一具体工作部门都贯穿着对应付情况和进行建设两大任务的统筹兼顾。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必要的建设，和以这种必要的各种建设支持长期的反“扫荡”。这就是全般的领导艺术，使领导者在极端纷至沓来的战争中，能把稳船舵化险为夷而主动的推动抗战运动的前进。这一条领导路线原是依照内战开辟根据地、巩固向外发展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又依据抗战新环境的锻炼，而更其完备系统化成为创造根据地科学的一条领导路线。在发动群众运动方面，同样总结了多年的民众运动的经验，造成一条正确而科学的做群众运动的新方针。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发布的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是最标准化的新的群众运动路线。这是我党二十多年来群众运动的成果。在军事政策上提出又打击敌人又发展自己，从打击敌人中发展自己的游击战争的总战略。以武装斗争为主、配合一切各种斗争，这便是游击战争的总概念。在这个优异的游击战略之下，既照顾主力，又照顾地方武装，又照顾民兵；既照顾军队本身，又照顾地方党政人民，于是把根据地几千万人民锻炼揉和成为一支人民的政治军事大军去战胜敌寇。这便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抗战军民主持制定的一条完整的抗战路线。换句话说，是中国人民的抗战的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群众工作的路线，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教育团结学习的工作作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这一切便是这个完整的抗战革命科学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抗战政策和游击战略是主张积极打击敌人的，而且是主张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去逐渐的歼灭敌人的，其战略精髓在于以占主导地位的分散游击战配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去打击敌人来达到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这与怕打敌人的“恐日病”有区别，又与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事实拼命决战有区别。

内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战略口号，如响斯应[18]表现在我军的发展和削弱的过程上面，便明白指出集中不分兵便不能大发展，同样只分兵而不集中也便无法应敌，也便无法再发展和保存已有的发展。这个原则毛泽东同志运用到抗战新时期的条件下，便提出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主张，又更概括地提出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总纲领。这告诉我们，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去分兵大量发展自己，又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集中兵力去打击敌人。由于我军弱小，敌人强大，战争的长期性，分兵游击是主要的，是战略的，带普遍性的。而集中应敌是特殊的，局部的，甚至以后运动战在相持阶段中减少到最小的限度。这就可以认识到重视集中作战、忽视分散作战，重视正规战、忽视游击战，重视正规军、忽视地方军、游击队，重视军队、忽视地方人民等一系列的部署上的、思想上的错误和所引起的弊害。

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战略是主张联合国民党的，是主张帮助国民党的转变的，是正确估计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的，因此也更主张以我军的行动

配合友军、帮助正面阻止敌人前进的。凡我们同志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是对的。然而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全部抗战责任寄托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上面。他还有重要的打算，便是我党我军的发展是支持抗战的骨干。要阻止国民党投降，要钉住国民党使它不敢放弃抗战、不敢破坏国共合作，这一切必须从我党我军的伟大发展上做起。这种正确主张，与不帮助国民党、不配合友军作战的“左”倾情绪有区别，也与专力配合国民党友军、不发展自己或放松自己发展、迁就依赖国民党有区别。总之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把敌、友、我的关系放在发展、削弱、上升、下降，地位互易诸方面去考察、去决定对策。第一必须削弱敌人。第二必须发展自己。第三对国民党的进步或倒退都预作打算。更重要的是要有我党我军独立起来担负抗战重任的打算。

对敌、对友、对自己三方面的情况和关系有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处理，才能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方针，也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不犯错误。有些同志由于未能正确了解洛川会议[19]的精神，初期即有偏差，十二月会议[20]到六中全会[21]这一段中间则受党内右倾投降路线的影响甚大，对敌、对友、对己都摇摆于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没有执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抗战政策。但每个地区所受影响和程度不同，觉悟也有先后之别。这种摇摆是由于从事多年内战的同志，依据其内战经验未能灵活运用于抗战新环境，对毛泽东同志所主持几年的从思想上、政策上转变到抗战环境的各种报告指示，没有深刻研究和了解，食而不化，抱残守缺，把从事内战搞正规军搞运动战搞大根据地现存的一整套移用到抗战新环境，忘记了敌人不同了，忘记国民党初期的友好仍包含充分的敌意，会迅速变化。于是只重军队忽视地方，于是只知抓一把忽视应该大力去重新开辟根据地，一切打算只从胜利发展方面去着想（发展和胜利确实使人头昏），片面主观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内战局部的旧经验，特别是偏于军事方面的旧经验，这样就容易造成党内新陈独秀主义的市场。因为他强调速胜，强调现代水平的运动战，强调国民党作抗战主体，把自己作抗战附庸等观点，都在某几点上与我们一部分同志根据内战运动战经验，片面了解敌人一些弱点而产生的轻敌心理相吻合。因而虽出发点不同而达到主张运动战正规战之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对友关系上则迷惑于国共合作初期形式的谅解，激于民族义愤，而陷于迷失方向，这就成为新陈独秀主义的市场，这样就离开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正确的政策。这样，对于错误路线的接近一分，必致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脱离一分。毛泽东同志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的这种迷惘，使这种迷惘尚未达到造成潮流的地步，而我们一部陷入迷惘的同志，也迅速在实际碰头中间、在敌寇大“扫荡”和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惊醒起来，全部转到正确路线上来，这样才取得了我党我军的伟大发展。我党过去曾有的政治摇摆往往需要好几年或几个大失败才能改变，则今天这种转变角度是缩小而迅速的。这是我党的伟大进步，是由于我党有了伟大领袖的结果，也由于我党一大批干部布尔什维克化程度提高了的结果。

其次是执行党的正规的创造根据地的路线问题。我们要了解敌寇、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实即是人力物力财力之争，换句话说即是互相争取人民。他们是以军事力量争取对人民的统治，以达到其压榨剥削之目的。我们是以军事力量解放人民，以为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故在军事开展和底定的过程中，即应动手做群众工作，并适时转到以全力深入组织人民大多数和进一步依靠



群众，这是发展革命的总规律。在抗战时期深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根据地巩固支持抗战的中心关键。离开这一点，一切民主政治的强调，便失掉了强固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我们不仅要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还要了解农民革命战争更是这个武装斗争特点中的特点。我们不仅要了解农民

革命战争这个武装斗争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农民革命战争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顺利发展，达到成功，这更是特点中更大的特点。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特点，更要了解这个无产阶级领导，其本质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中国马列主义，即毛泽东主义。

这一系列的对中国革命的本质的了解非常重要。我们只空喊懂得武装斗争的特点，懂得搞军队，搞根据地，懂得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是无济于事的。懂得打仗，懂得训练军队的军事专家，并不等于懂得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懂得作农民运动，懂得作地方工作的农运专家，这只是农民工作的起点，而并不是中国农民斗争的全部。农民与革命与战争相加，加上无产阶级领导，这才是全面性的东西。现就眼前的抗战来申述一番：抗战本质是一个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由国民党领导必致失败，因为他无限制地使用农民，牺牲农民，不替农民办一点好事。这个战争由共产党领导才能胜利，因为他能够代表农民利益，一面替农民办事，一面鼓励和组织农民拿起武器走上政治和战争的舞台。抗战军队和根据地，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民集团，如果一味照存留在农民身上的地方性保守性办事，必致难免于狭隘报复而有陷于孤立的危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充分发扬农民伟大的革命作用而避免其弱点。以处理旧军队、旧国家的观点来处理这个新军队和根据地，必致陷入空想与事实矛盾的错误迷乱之中。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他本质是中国无产阶级代表——共产党领导千百万武装农民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一种联合抗日政策，形式是联合的，立场和界限是分明的。没有这个坚定的立场，不足以搞统一战线。类似的情况，我党的建设亦复如此。我党多年在农民群众中的活动，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从农民党员中训练干部，一面提高其觉悟，一面洗刷其弱点，从照顾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这样建设了我们伟大的党。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建设党是我党进行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则这三大法宝，无一不以农民革命战争为中心。掌握这一点，我们进行了伟大的内战，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抗战，我们因之以创造游击队，更要因之以掌握正规军。我们因之以掌握了乡村，更要因之以掌握城市。我们因之以掌握农业手工业，更要因之以进到掌握工业和进到掌握现代工业化的水平。我们因之以掌握农村根据地，更要因之以掌握全国政权。我们党不是农民哲学家，而是农民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首先善于接近农民，向农民学习，善于为农民利益着想，善于以各种组织形式去组织农民，八路军新四军是组织农民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因而善于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直到农民最后解放。同时更善于以各种人民的斗争去配合农民斗争，造成伟大的中国革命阵线。过去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城市中心主义，由于忽视农民革命战争或过度和冒险地去指导农民革命战争，便败坏了中国革命。同样以旧军队经验为中心的单纯军事主义者，他们只有战术头脑、而没有战略头脑，只有军事头脑而没有政治头脑，只懂得军事技术而不懂得军事政策，他们除军队而外不知其他，或者口头仅仅知道一点农民或照顾一点农民，而

不知道农民利益实即军队本身利益，而不知道军队来自农民，应该为农民利益奋斗。他们这种无知，也同样削弱了革命。

这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的一般了解。

## 六、论毛泽东军事学派

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政治理论和革命的实际政策。这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环境的新的发展和创造。这个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便是毛泽东同志。

北伐革命、苏维埃运动、抗日战争这三次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他已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的精神武器。这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又创造出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完整的军事理论系统，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学派，即毛泽东军事学派[22]。现就这一伟大的理论命题作一番考察，作为我党我军二十多年来的军事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的尝试。

中国在近六十年来历史上，没有中国民族自己适用的军事学，也没有出现过具备中国民族军事创造能力的军事家。太平天国出现了革命军事家如洪、杨、石、李[23]等，出现了反革命军事家如曾、左、李、胡[24]等。洪、杨、石、李的军事学是产生于农民暴动，有了朴素的游击战、运动战的理论成就。即就这一点已所向披靡，已使曾、左、李、胡束手无策，最后是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曾、左、李、胡等才能完成其所谓中兴大业。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民族伟大的军事传统被淹没搁置，让位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学说。近四十年德国军事学经过日本的改装传入禹域[25]。于是开始了中国军界的洋泾浜式的买办军事学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封建主义的腐朽实质，从李鸿章、袁世凯、吴佩孚直至蒋介石的新旧军阀主义，只造成强固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恶劣军事传统。近四十年伟大革命领袖如孙中山先生，虽然半生戎马，仍在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中国保定[26]的幕僚军事学中讨生活。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军事学上没有什么贡献乃是一个铁的事实。从小站练兵[27]起，中国废除绿营[28]和游勇，采用资本主义的军事方法和形式，创造所谓有名的新军，这个新军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非驴非马的东西。他的成就造成了军阀主义，对外敌屈服献媚，对人民横蛮镇压，祸国殃民乃是其基本特点。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军事学，那只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奴役人民的军事学。如果说中国有所谓军事家，那就是大批出现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反革命的军事家。我们在其中找不出任何根据民族传统的创造因素，找不出任何为人民服务的有益民生国计的影子。伟大的北伐战争击破了北洋军阀，这是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和影响，有中国的先进政党中共的支持的结果。可是这只是昙花一现，大革命之失败使这一点革命影响败坏，封建买办的奴性气息又统治着中国军界。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的确切反映。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独立建设中国军事文化，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独立领导的军队起，整个中国的军事史改换了新的面貌。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条件，分析中国历史，估计军事上对战双方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准，提出整套建立革命新军的方法。随着大革命与

内战的实践，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天才创造，遂有了伟大的辉煌的成就：真正代表中国民族，代表中国人民的独立的革命军事学乃得出现。毛泽东军事学派之出现，一洗几十年来军事界抄袭外国的耻辱，不能不算是伟大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件快事。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军事学派呢？

毛泽东军事学派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孙吴兵学[29]。孙吴兵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国家的混战情况，他的许多战略原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这是由于无论时代如何进步，而私有财产社会背景仍是共同的原故。特别将近二千年来的战争活动累积经验是很多的。例如根据地思想，奇袭挺进的运动战思想，农民暴动的游击经验，坚壁清野、疲困敌人的思想等等。这些宝藏落在毛泽东同志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加以改造便成为崭新的合乎实际的东西。所以毛泽东军事学派不是简单继承民族前辈，而是加以改造了提高了的东西。

毛泽东军事学派有别于近四十年来取法西欧的镀金的中国旧军事学派。中国旧军事学派的特点，几乎全部是德国战术的翻译家或抄袭家们在中国军队中讲授根据德、日诸国背景条件所铸就的战术。他们抓住了军事学上一般适用的带普遍性的原则，而忽略中国战争的特殊情况，更不懂得中国革命军事的特殊规律。他们是善于呀呀学语，拾人牙慧，在通常圈子里他们能讲会说，也能打仗，但一遇到与本书不合的新的战争情况，他们只好屡屡败北。中国陆大、黄埔、保定完全代表这种军事翻译教条主义，八年伟大抗战国民党军队的败北，便是这个学派破产的证据。问题是这批笨伯们今天没有觉悟，他们死死陷在翻译的操典条令之中。毛泽东军事学派不拒绝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经验，但只采用其中适用的东西，特别其中的军事科学技术更非大量采取不可，这正是我们长期学习的对象。然而资本主义军事学如涉及战略学、战役学以上的范围，则中国的条件，如人力物力财力与他们不同，我们便不能完全照抄。我们应根据中国战争的特点，提出自己合用的东西。

毛泽东军事学派也有别于苏联的革命军事学派，在思想方法上，在为人民服务上，在争取世界民主和平上，这个基本精神我们军队与苏军是相同的，可是苏联军队是伟大的成功了社会主义国家军队，而我们只是局部胜利正走向全国胜利的一支人民军队，其特点是由农村根据地过渡到全国胜利，即便这个全国胜利到来而中国仍处在民主革命阶段，较之西欧各国仍要落后百年乃至一百五十年，所以我们只能有择别的去学习苏军的经验，而不能机械搬用。在我军历史上曾经犯过机械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不应重复的。

因此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他有别于一般军事学，也有别于一般革命军事学。他是站在中国人民的革命立场，面对国内外反革命的强大敌人，根据手中此时此地的条件办发展革命的事，白手起家，日新月异，不直达革命胜利不止。

假如历来的军事学派一般是研究相等的敌对军力的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30]则在回答实力悬殊的军力的胜负问题；

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间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问题。换句话说，研究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

以弱胜强，便是我们军事学派的革命本质。因此历来军事学派只就军事本身如技术、武器、战法等问题着眼去加以研究。他们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但从来不曾把他放在适当的角度上面。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不仅就军事本身去研究，我们是把军事当成社会现象的总体一部分去加以研究，我们不孤立的去研究所谓纯粹的军事问题。我们承认军事受政治的支配，承认军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更承认战端一开，军事胜利又掉转头来成为决定政治胜负成败的唯一关键。这样造成我们军事学派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更善于使用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不仅善于指挥军队打仗，更善于指挥人民作战，更善于使两者力量相加去完成共同的战争任务。不仅善于动员和使用我方的军民，而且善于使自己的动员侵入敌方营垒，瓦解敌军，使敌方内溃。不仅善于作武装斗争，而且善于使各种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

由此可见，毛泽东军事学派便把旧军事学的狭隘范围冲破，把军事学范围广泛扩充放在革命政策的主要部门上加以考察，提出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旧军事家穷年累月所专攻的战略战术只占这个政策中一部分。这个军事政策包括对敌、对友的综合研究，包括就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诸关系的全盘考察，包括军队、人民、政府、党部的关系的正确决定，包括军队本身诸事项的确立，这便是中国革命军事学的重大特点。于是旧军事学中的腐朽部分被废弃，合用的东西被保留，新的正确的作战原则代替了死板无用的旧教条，这在军事思想上军事组织规模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只有毛泽东同志站在中国人民革命的立场，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才能有魄力的去发动这个革命，完成这个革命，造成中国革命的新的军事科学，这样真正开辟了我国军事历史的新时代。

于是，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军队内部无阶级对立、讲究官兵弟兄般阶级团结的军队，那种内部包含两个阶级以上的对立的旧军队，它是业已过时代了。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工、农、兵、知识青年的人民子弟兵大团结的军队，站在人民之中替人民服务的军队，那种替统治阶级服务、奴役人民的旧军队，它是业已过时代了。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来自人民、回到人民，来自生产、回到生产，那种长期脱离生产雇佣性的旧军队，它是业已过时代了。从此中国的军队只能是反对愚昧黑暗、提倡文化的人民大学式的民主军队，那种提倡愚昧黑暗，造成非人生活，脱离人民的旧军队，他是业已过时代了。旧军队是“集天下不义之人、日授以杀人之事”，而我们的军队是集合工农青年子弟专门讲究替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旧军队全靠保留战争的永远性而存在，我们的军队是向战争作战，为消灭战争而战争，为根本消灭战争、消灭军队、消灭军事、实现人类永远和平而努力。旧军队依靠技术，依靠机器，把人的活动屈服在技术支配之下，我们的军队是依靠人的因素，依靠人去掌握技术，使用技术，发挥技术，把人放在技术之上。这一切说明在现代的中国，旧军队已走完他的历史时代，总体上它已不能再发展也无法再发展，它必须让位于我们的革命新军。一切旧军事学派，必须让位于我们毛泽东新军事学派。

在作战方式上，我们很重视一切军事经验，但从来不被其束缚，且从实践中加以检验，而大胆创造新经验新原则。同时又从来不自己限制自己，而是大胆变更陈旧的东西迎接新的合用的东西。

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变动的，故作战方式的决定也是发展的变动的。这

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是与教条主义根本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军事家能指挥工农群众以原始武器梭标土炮去杀敌制胜，去换取现代武器，去创造游击兵团。当我军进到游击兵团时代，我们的军事家又能运用当时各种条件去与强大敌人进行正规战，战胜敌人，把自己提高到正规军，人们曾预言过八路军新四军的低级技术不可能与日本帝国主义现代化的军队作战，有人曾希望我军进入敌后之被消灭，然而事实证明，我军的作战，不仅在内战时期是能手，即在民族战争中，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的日本“皇军”，仍然获得杀敌制胜发展自己的伟大效果。这由于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大家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武器，从实际出发，故无施不宜，而能应付各种情况，从内战顺利过渡到抗战，而能掌握各种战斗方式，从游击战、运动战到阵地战。今天的战争形势在剧烈变化中，我党我军将很快走完农村根据地的路程，过渡到掌握工业化的大城市，掌握现代国家的军事装备。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的去迎接这个发展，我相信定能胜任愉快的去抓住这个发展。

最后，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长期的反对军事路线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发展起来，创立起来，坚强起来的。首先在反对一般旧军官的单纯军事观点中创造了建军的群众路线，群众作风，群众游击战术；其次在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左”派革命家的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创立了巩固向前发展的战略，创造了诱敌深入以退为进的优异的战略和战术。而且那种冒险主义只是那些“左”派革命家们在红军胜利时的一种发狂的表现；一到红军受挫折时，他们灰心丧气退却逃跑要求离队打埋伏，对革命与红军丧失信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又转而打击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去使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这种“左”来左打有来右打的思想斗争精神，保护了创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军事学派。我们要懂得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其残酷剧烈的程度，并不亚于党内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我们党员要对这一点具备高度自觉性，拥护毛泽东同志代表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军事路线，而坚决反对并克服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党员和干部对任何带敌性的、反无产阶级的思想，应具备敏感，知所行动，这是使我们伟大事业继续发展的保证。

#### 注释：

[1] 黄埔军校，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的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下令在广州市南郊黄埔长洲岛创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鲁易、张秋人等担任军校的各种负责工作，还从各地动员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

[2] 第四军独立团。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由区委军事部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等党员军事干部，另从广东区委机关抽调廖乾吾等，组织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将铁甲车队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任命叶挺为团长。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三十四团在广东肇庆阅江楼成立。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第三十四团奉命脱离第十二师建制，归第四军军部直接领导，改称第四军独立团。

[3] 平浏，指湖南省平江县、浏阳县。

[4] 十年苏维埃战争，即从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〇年七月的土地革命战争。

[5] 新陈独秀主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如

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他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但对外未点名，故称“新陈独秀主义”。

[6]百团大战，一九四一年八月至十月，八路军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改变战局，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先后集中一百零五个团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破击战役，被称为百团大战。

[7]白晋铁路、德石铁路，指山西白圭至晋城、河北石家庄至山东德州的铁路。

[8] 桑木师团长，即日军一一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9]退避三舍，春秋时，晋、楚争霸，在城濮（今濮阳附近）作战。晋文公重耳先令晋军主动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然后进攻，打败楚军。

[10]冈村宁次，当时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将。[11]庞炳勋、孙殿英，庞炳勋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四日，与原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联名通电叛国。庞投敌后，就任伪“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2]十大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为克服敌后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在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间，陆续制定和实行了以下十项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13]军委第四号指示，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其中指出，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巩固和扩大上，主力军应当采取精兵主义，并规定各根据地脱产人员总数与总人数的比例，以及各类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等。

[14]日本反战同盟，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的反战组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在华日本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者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成立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同日，一部分经过教育觉悟的日军战俘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又发起组织“在华日人反战联盟”，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在重庆设立总部，并在桂阳、洛阳、延安及华北、山东、华中设立支部。其宗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并采取各种形式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一九四二年八月，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反战团体大会在延安召开，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日人反战同盟”合组成立“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并将其组织逐步发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南。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反战同盟在延安召开华北联合会扩大会议，在日共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的指导下，决定筹建“日本人解放联盟”。同年四月十九日，反战同盟宣布解散。

[15] 朝鲜独立同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延安设立组织机构，由朴一禹等领导。

[16]《中国之命运》，由反动分子陶希圣遵照蒋介石的意旨为蒋介石写的一部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发行。[17]日华同盟条约，指汪精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与日本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

[18] 如响斯应，成语，呼唤与回声之意。

[19]洛川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任

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政治思想基础。[20]十二月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三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发言，对洛川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持否定态度，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取得了部分与会者的支持，故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

[21]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中国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

[22]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提法被认为不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覆盖面广，后来没有再用。

[23]洪、杨、石、李，即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

[24]曾、左、李、胡，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

[25]禹域，相传夏禹划分九州，并指定名山大川为各州疆界，后世相沿称中国为禹域。

[26]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中国保定，指德国陆军大学、日本士官学校和中国保定军校。

[27]小站练兵，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为组建新军，派胡英到天津东南的小站训练“定武军”。一八九五年便以“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新建陆军”，新军的组建便由此开始。

[28]绿营，清代兵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绿旗兵。兵种分马兵、步兵和水师。在京师的叫做巡捕营，隶属步兵统领。在各省的有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军标、河标、漕标，标下设协，协下设营，营下设汛。绿营兵总兵力约六十万左右。

[29]孙、吴兵学，孙即春秋时著名兵家孙子，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兵攻破楚国。所著《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吴即战国时代的著名兵家吴起，《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失传（今有《吴子》六篇说是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论兵的辑录，系后人所托）。对孙子、吴起的兵法，称孙吴兵学或孙吴兵法。

[30]我们的军事学派，即指“毛泽东军事学派”。

## 收复农村市镇，放手发动群众，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一）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长兴、吴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以及浙西敌区各县，并立即在以上各地连成一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可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如能占领时亦不作久留之计，而主要的是去占领各该县的农村市镇。江南的任务是于占领各城镇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群众，屯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顾祝同[1]大军如分路东进京沪杭通过我区时，不作正面堵截，应让其通过，而截击其翼侧后尾，仍按照自卫原则。

（二）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苏中负责解决孙良诚[2]、陈泰运[3]等伪顽，二师予以协助。二、三、四师主力则迅速出动，巩固占领津浦线。对徐州、蚌埠两县之占领，主要由二、三、四各师负责，八路军只能配合，必须如此才能控制津浦线，打通华北，取得对李品仙[4]、何柱国[5]的优势。七师皖南部队要打通与苏南的联系，造成整块农村的连接。七师巢无地区[6]于敌伪投降、桂顽[7]东进时，准备就地坚持，不能坚持时，可退到二师协同作战。

（三）军部在运河沿线选择适当指挥位置。

以上意见作为你们部署行动时一个参考，请电告实施办法。

注释：

[1]顾祝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2]孙良诚，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3]陈泰运，国民党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4]李品仙，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5]何柱国，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6]巢无地区，安徽省巢县、无为县地区，这是新四军第七师的中心区。

[7]桂顽，指国民党广西系统的军队。

---

中共中央判定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即，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就华中新四军的部署问题电示华中局：二师夺取蚌埠至浦口之线，四师夺取徐州，三师即集中津浦路，与二、四师共同夺取该线，七师夺取芜湖，一师及苏南、苏中各部夺取南京、上海之线，浙东担任沪杭甬之线。在津浦路同时要有准备击退国民党顽固军与我争夺城市的计划，江南要有准备击退顾祝同的来犯。不怕爆发内战，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和消灭内战。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分析了国、共力量的对比，又令华中改变部署，要求江南力量就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等等。陈毅为使华中更好地执行这一指示，即拟此电致华中局，后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下发，并加发新四军第五师。标题为编者所拟。



## 关于今后华中自卫战争战略战术诸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

(一) 在最近两月内，顽[1] 在各线向我发动进攻均遭失败后，现已改变作战方针，强调稳扎稳打，造成有后方的前进。因此在行将到来的华中战争中，顽将采取分割封锁式的堡垒主义的战略，而我方则将采取逼迫敌人进行运动战的诱敌深入的歼灭战略。

(二) 为实施此种战略，我在主要战线上需用三万以上的兵力，在次要战线上则必须组织一个旅的兵力，在敌人前进方向组织运动防御，并指导敌人后方、翼侧的游击战争，借此造成敌人前进的困难，使自己的主力保持高度的机动，而不致陷于浪战和被动。

(三) 所有边缘地区及敌人前进道路两侧之粮食，必须有计划的搬运，分散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务求其不致大部落入敌人手中。袭敌保粮将是我军开战后的重要任务之一，此点必须预先有准备。

(四) 举凡兵站线、电话网、前后方医院、粮食、侦察网、俘虏营、被服鞋袜等项，皆须预先作妥善的全盘的部署，俾使主力作战将不受拖累，可能及时进行机动。在津浦沿线及运河沿线，对兵站线、电话网、医院、补充物品等四者，均应预先加以部署。

(五) 各部队应争取时间进行整训。整训中应特别着重战略战术的教育。在战略方面，团以上干部可印发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组织领导他们阅读。战术上则强调熟练夜战，学会攻坚，学会八路军的爆破战术。这是把步兵、工兵、炮兵合一的办法。华中入鲁部队近已开始学习，兴趣甚高，对于通过鹿砦，攻打炮楼、土城之困难，皆能加以克服。干部更应加强组织火力、利用地形地物，使火力与运动互相配合之战术教育，纠正蛮打蛮干、不讲战术的倾向。如此次鲁南作战，各部均甚勇敢，然缺乏战术素养，以致伤亡颇大。

(六) 在即将对顽大战展开时，打几个好仗以后，弹药即不会十分缺乏。我们的兵工厂应多注意制造手榴弹、地雷和炮弹，并利用一切办法收集和购买炸药，以备大量应用。进行兵工生产的后方机构，仍应采取集中指导、分散安置的原则。

(七) 在组织战斗时应精心计划，多方考虑，不宜草率从事。要求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沿铁路线对顽战斗具备着待机作战的特点，因此如何把握时机，是指导作战的第一个问题。掌握主力，审慎使用，最为切要；应纠正急躁和盲动。应强调兵种协同、步炮协同、攻守协同，养成顽强作风，以担负连续战斗的重任，克服山头主义与游击习气。提倡执行命令，节约兵力。从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的许多实际问题，须从思想上予以解决。

(八) 为有力地保证华中反顽战争之胜利，在政治上应注重思想教育，巩固坚持华中的胜利信心，解决部队内部的实际困难，调整干部关系，巩固团结，克服一切困难。

(九) 总括地说，我们的战法基本上仍是主力与地方武装和民兵三者密切结合及党政军民密切配合的人民战争的战略。上述要点，在鲁南短期作战

---

这是陈毅(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给华中军区领导人的电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华中军区司令部将此电印发给所属部队。

中已得到若干经验，希各部队军政负责同志作为参考，加以研究。

注释

[1]顽，沿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称呼。这里指的就是国民党。

## 如何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

### 一、对目前战争性质的分析和认识

目前战争的性质和第一次自卫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相同的，是中国人民对中国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阶级的进攻所采取的自卫行动，是为保卫和平保卫民主而战。中国今后之命运是走向自由光明或是走向黑暗专政就要由这次战争的胜败来决定。

但这一次自卫战争与第一次自卫战争也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

第一次自卫战争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以“受降”和“接收主权”为名，向中国人民、中国民主基地的解放区进攻。

当时广大的社会进步人士虽然认识了这是独裁与民主之争，内战与和平之争，但是仍有很多的中间阶层没有认清战争的性质，以为仅是国共两党之争，地盘之争，权利之争，或以为仅是两党的私事，希望和平了事。

基于他们的这种认识，许多中间人士都奔走调停于国共之间，以“和事老”的立场出现，他们惟恐国民党坚决要打，中共又坚决不让步，则战祸不可免。所以希望中共不要太硬，要求中共作些让步。可见当时的中间阶层基本上还是站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立场。

而这一次的自卫战争，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一次自卫战争中政治上军事上节节失利，在国内外压力下，被迫实现和平，成立三大协定[1]之后，而又公开撕毁三大协定，破坏和平，重新发动内战。所以战争的性质比第一次自卫战争时更加明显，更加清楚的为全国人民所认识。我们在政治上有理有利，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国民党反动派无理进攻，破坏和平，摧残民主，不顾三大协定，更为全国人民所反对。其军队内部也因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而产生更多的矛盾，产生了比去年更糟的情形，反内战起义的事件将会更多。

而我们为人民而战，为和平而战，为民主而战，为推翻封建独裁而战的自卫战争的本质，更获得了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和声援。时至今日，已不复有人怀疑这是两党之争或两党的私事了。仅以民主同盟及许多工商业家的态度为例，他们惟恐中共继续让步，国民党反动派有进无已而使民主力量失掉依靠，内战更难避免，所以要求中共决不能再让步，并表示决与中共共患难，这就是中国政治进步的高标。

这次代表上海十万群众到南京请愿的代表中，马叙伦是大学教授，阎宝航是东北名流，还有学生代表二人，其余都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家，他们表示反对国民党，坚决赞助共产党。

刘善本[2]和其他十个航空员是国民党一手培养，又加上美国式的教育训练的空军人员，他们既非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也无亲故，但是他们为反内战而自动驾着飞机到了延安。

潘朔端[3]将军和在东北起义的国民党官兵也是因为认识了战争的性质，不愿内战而站到民主方面来。山西的民团本是地主武装，但是也因为反内战而站到民主方面来。

今天共产党所代表的已不仅是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的利益，也同时代表着

---

这是陈毅在山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全国士兵的利益，更代表着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代表着工农商学兵的全民利益，有了更广大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美帝国主义的卑躬屈节，奴颜婢膝，出卖国家主权，断送工商业权益，丧权辱国的卖国主义已经暴露无遗。美国的飞机可以自由在中国天空飞行，美国的兵舰可以自由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航行，美国的商船可以自由在上海、南京、汉口、九江行驶卸货，美国的货物可以自由在中国市场倾销，美国的公司得到国民党宣布的新公司法的保护而不需负担中国的税款，中国的海关让美国人管理。请美国人训练中国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甚至中国的内政问题还要给马歇尔以最后决定权，请美国人当太上皇作干爸爸。

世界上能有一个独立国家准许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这样无限制的侵入而表示欢迎的吗？古今中外实无其例。只要是真正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是决不会的。而任何一个侵略国家也从未受到今日美国在中国所得到的方便，即卖国政府替他安排妥当能无限制遂行其侵略之贪欲。

所以今日的自卫战争已经带着深刻的民族性质。我们或者是忍受蒋介石卖国媚外的政策，使中国变成拉丁美洲式的国家，变成菲律宾第二[4]；或者是坚决的自卫，保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主和平，要美军从中国撤退，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

所以今天的战争性质又是爱国主义对卖国主义的斗争，是民族主义者对卖国汉奸和外国侵略者军事干涉的斗争。

这一次的自卫战争带着更广泛更清楚更深刻的民族性和民主性，是爱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内战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的自卫战争。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训练的程度之高涨与外国干涉者与国民党卖国贼的罪行明

目张胆肆无忌惮形成更鲜明的对比，这便是与第一次自卫战争所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谁能掌握民族民主的旗帜，谁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谁就能得到胜利。国民党当苏联在东北撤兵尚未结束时，曾经来了一个烟幕，高叫“苏联侵略中国”，“共产党出卖民族”，当时这种蒙蔽事实的欺骗宣传虽然被很多民主人士所揭破，但是也曾经骗得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激动。现在事实早已揭破了国民党的无耻叫嚣，苏联早已撤兵，而共产党并未出卖中国的利益，倒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其独裁专制，进行反共内战，而勾结了美国反动派，出卖国家主权而换取美国的军事干涉。侵略中国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苏联始终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共产党则始终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的前卫。这个问题已很明显，事实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任何欺骗蒙蔽也都无用了。

八年的抗战，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加汪精卫，现在又有一个美国帝国主义加蒋介石危害着我们民族的生存独立，威胁着我们人民的民主自由，我们要拿反日反汪的勇气与决心来争取自己的独立和平民主。我们要拿反日反汪的胜利经验取得反内战反外国侵略的胜利。

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是以公开的战争，武装占领我国的领土，而汪精卫比蒋介石卖国的勇气也更大，汪精卫好比四马路上的野鸡[5]，蒋介石是个暗娼破鞋，做的勾当是一样，但表现的形式一个公开一个是半公开。

我们打败了第一个公开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第一个公开卖国的汪

精卫，我们就一定可以打败第二个外国侵略者和第二个卖国贼，不管他是采取公开侵略或暗中偷摸的形式。事物的逻辑必然如此，这是无意义的。

同时我们还必须把美国人民与美国反动派分开，如过去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分开一样。美国的很多民主人士如罗斯福总统夫人，前副总统华莱士等，以及广大的美国人民都是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继续实行独裁专制的。美国的干涉和中国的内战也实际的危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并改变其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毛主席的声明已获得中外人士的同情和拥护，美国代理国务卿亚泽逊的声明也不得不含糊其词采用模棱两可的态度。美国的援蒋政策也可能改变的。过去由于中国和美国人民的压力曾经使赫尔利[6] 滚蛋，今后在中美两国人民和民主力量的压力下，美国的援蒋政策和军事干涉也是可能被迫改变的。

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但战争还是带着局部的性质，时断时续的性质，还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长期性的战争。是不是将来会卷入全面的长期的战争？还要待以后的发展。在目前来说，战——可能有些地方还保持和平状态；和——有些地方仍不断有炮声。全局打还有局部和，全局和还有局部打。原因就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强大，反动派有所顾忌，使他不敢下全国内战的决心，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的力量有限度。假使国民党反动派真的力量比我们强大，那他们就用不着什么谈判调处，早就下令“讨伐”共产党了。假如没有美国的参加，形势也会不同，内战也就不会存在，而美国又是以调解的姿态出现，还不是公开站在国民党方面，所以战争时打时停，边谈边打。

我们目前还是以国民党的独裁为斗争的主体，对美国人士要分清楚，马歇尔还在调解，还未公开站在国方。我们只采取适当的批评的态度，我们仍欢迎马帅[7] 的调处，但他必须改变其表面“公平”，实际助蒋的态度。所以大城市的外交活动仍要进行，以争取全国群众更大的同情与援助。我们将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密切配合起来，争取第二次自卫战争的胜利。

停战几个月来我们并没有吃亏，我们取得了国际上的合法地位，积累了外交工作经验，军队得到了休整，完成了麦收，开展了新解放区的群众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和民主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我们是有很大的收获的。

在军事上说，我们取得了热河、察哈尔和东北六个省，我们的地区扩大了。主力部队也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万人，装备比从前也改善了。解放区的人口在一万万五千万到二万万。

国民党方面则得到了美国的装备补充，并且将其在印缅的主力集中起来。国方控制了大城市，在国际上是合法的政府。

因此国共的对比是：我们政治上是强大的优势，国民党威信扫地臭名四布，国共双方军事上互有长短，国之装备物资较强，而我之地区广大，战斗士气占优势。所以现在还是各有长短，胜利必须取决于前线的努力。

我们全体同志必须正确的认识自卫战争的性质和目前的形势，发挥高度的革命积极性，责任所在，义无反顾，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则我们就可能操胜算。

但我们不讳言我们的内部也有个别落后动摇不坚定的分子。他们过低的估计了政治因素和中国的社会力量，过高估计了美式装备的力量和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因此悲观失望，产生了苟且偷安的思想。这种机械论的思想无论主观如何或是出于不自觉，而客观上实际是蒋介石式的思想，犯了和蒋介石

一样的错误。因为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正是从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过高估计新式装备的力量出发的。假使美式装备和帝国主义不可战胜，则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打不垮，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就不灵了。

我们必须取消与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要从人民出发，从中国百年来革命的经验出发，正确的认识目前形势，坚定站在斗争的前线，以共产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胜利。

另一种人则对战争采取漠不关心的麻痹态度，他们知道革命一定要胜利，但认为自己对革命无足轻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或者对新事物缺乏敏感，和平生活日久，一时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还是以后方作风来对待前线流血战斗的工作，不紧张，无热情，悠哉游哉若无其事，身在前方心在后方，身临战场而一心以为和平将到，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工作，其危险性与机械论是一样的。

政治上我们不会失败，军事上装备不能决定胜负，可以致我们于失败的就是内部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和对战争不负责的工作态度。第一种思想的人是极少极少的，但是第二种类型的思想则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改革，淬砺奋发，发挥共产党员和毛泽东战士对新事物的敏感，善于把自己的努力加到战争最需要的方面，能如此我们就会胜利。

## 二、战争的实际过程与变化

国民党反动派鉴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和自己力量的不足，还不会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全面进行内战，而是边打边谈，避实就虚，采取分区宰割的办法，集中力量搞我一块，求得各个击破。反动派过去在关内吃了亏，所以愿意关内停战关外不停战。现在他在东北需要休整，所以又搞一个东北停战而准备在关内打内战，不全面公开破裂，左顾右盼，避实就虚，而达到得寸进尺，取得实利，耍一套流氓手段。

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宣称在二十四小时内有“惊人之举”。于是六月二十九日反动派进攻中原，而中原部队全部突围，蒋介石的“惊人之举”落了一个空。最近反动派可能进攻热察或华中，并宣传“苏北威胁南京”，“四百万苏北难民要求武装还乡”，以及“热察威胁北平”，以代替过去“中共妨碍接收东北主权”的宣传。

最近蒋机在睢宁散发传单，宣称要大举进攻，告我军民投降，估计蒋可能发动对苏皖边区的进攻。

但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没有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其内部矛盾日见尖锐，灾荒严重，民不聊生。最近四川省参议会通过决议停运粮食出境，不供给在东北打内战的蒋军。而美国的援蒋政策也可能改变，例如联总[8]物资已对华停运。

我们在各方面都要准备抵抗，而重点在消灭其军队。其军队有三等，即美式装备的——是其嫡系精锐部队，日式装备的——是其嫡系部队，旧式装备的——是杂牌军。我们只要能消灭其美式和日式装备的军队几万人或几十万人，则战争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内就可以结束。

现在徐州蒋军有十几万人，沿长江蒋军也有十几万人，共三十余万人，假如进入苏皖边区，而我们能消灭其五万至七万人或十万人，则十个指头断了两个，没有不缩手的（例如去年我们在鲁南消灭他五万人就达到了停战），

所以我们不需要全部消灭蒋军才可以停止战争，只要彻底干脆的消灭其一部，则全国震惊，蒋介石就会说“又误会了，还是重开谈判吧。”

过去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周瑜只有五万人就把曹操打得大败。晋时秦国苻坚百万之众进攻东晋，苻坚夸其军威：“投鞭可以断流，”但东晋谢安、谢玄只有七万人，淝水一战，苻坚大败而逃。

历史上这些战例都是以少胜多，但并不是五万人和几十万人对战，而是消灭其一路，其余的闻风丧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兵败如山倒了。我们对顽作战也是如此，不是顽军一来我们就打，而是能够歼灭他才打，打得不痛快就不扫”，我们可以休息整训，以逸待劳，不打则已，一打就彻底干脆的消灭之。

这就是我们机动作战，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战术原则。等到我们决心要打，那就不避任何牺牲，全军抱必死必胜的决心，争取伟大的胜利。

在战术上敌向我进攻是外线作战，我防御是内线作战。但我们要变内线为外线，变防御为进攻，大胆包围敌的翼侧达到全部歼灭之目的。

### 三、战争对我们的要求

战争的过程与变化既如上述，所以必须要求我们的部队有高度的机动性。我们的作战要趋利避害把握全胜，长江以北大海之西，均是顽敌就歼的场所，均是我们机动的范围。一个奔袭打了胜仗在华中吃早饭，回头一仗歼灭了山东境内的敌人再宿营，这就是我们最高的要求；千里奔袭，灭此朝食，就是我们的战斗口号。

为要达到这样高度的机动性，必须要全军指战员对战争的性质有深刻的认识，保持高度政治积极性，进行不断的及时的动员，保证部队在行军作战中的机动性，巩固我们的部队，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为此，就要实行轻装，锻炼行军力，加强体力，能以出敌意料的行动出现在敌人面前而以刺刀手榴弹白刃搏扑歼灭之。

在进行运动战中，必须改变过去游击主义的习气。要有坚决顽强，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勇猛向前，以狮子下山，猛虎扑羊的精神捕捉敌人而彻底歼灭之。

而我们的一切工作，不论机关和部队更要求敏捷确实迅速，以符合高度机动的运动战之要求，并坚守秘密以求出敌不意。

我们还要善于在待机中不放松日常的工作，而在休整中不放松备战。

我们更要密切同住地居民的关系，尊重地方政府。因为将来流动频繁，假使没有良好的群众纪律和军民关系，我们将脱离群众而增加自己的困难。最后更重要的是全军上下的团结和坚决执行命令，不讲怪话，不闹关系，不要求调动工作，改善领导作风，不提个人的要求，顾全大局。一个革命家，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家，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还有精力心思去考虑人民利益以外的事吗？我要求全体同志万众一心，不追求别的，而专心致志去追求歼灭敌人。有十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闯入我解放区，我们朝斯夕斯地去计划捉捕他，大事忙不了，我们还能去忙别的不相干的小事吗？这里就是考验我们每一个同志的革命品质的时候，这是决胜的先决条件，万勿怠忽！再说一句：就是坚决执行命令，造成铁的团结，坚决消灭进攻的敌人！

假使我们做好了这些工作，则政治上我占绝对优势，军事上敌我互有长短，经过我们这些工作的努力，我们就能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决胜于战场就

有了充分的把握了。

### 注释

[1]三大协定，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及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三十一日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政协决议》共有五项，即《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和《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

[2] 刘善本，山东省昌乐县人，国民党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一九四三年赴美国学习驾驶 B—24 轰炸机，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乘机组驾 B—24 飞机由成都去昆明执行任务途中，毅然改变航向，飞抵延安。

[3] 潘朔端，原为东北国民党军第一八四师师长，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辽宁海城率部起义。

[4]菲律宾第二，菲律宾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独立以前，曾先后是西班牙、美国 and 日本的殖民地。

[5] 四马路上的野鸡，旧上海的四马路是妓院集中的地方，妓女很多，最下等的妓女被称为“野鸡”，她们会在马路上公开拉嫖客。

[6] 赫尔利，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美国的驻华大使（曾以美国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到过延安），是一个怂恿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并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帝国主义者。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对，美国总统杜鲁门不得不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批准其“辞职”。

[7] 马帅，即马歇尔，他是美国的五星上将。[8] 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简称。



## 华东三个月自卫战争的总结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目前全国范围，有四个大的战场，这就是东北、晋冀鲁豫、晋察冀热、华东（包括山东与华中）。还有五师方面的一个游击战场，南方各省国民党正在积极激起民变，自己在开辟的第二战场——这个战场虽不是主力决战，也已有燎原之势。此外，国民党正跃跃欲试，企图进攻延安——可能再加一个战场。今天的战争，是中国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或近百年来最大的战争。今天的战争，从兵员的动员来说，从每日的伤亡来说，从其破坏的残酷性来说，无论北伐战争，二十年军阀混战，十年内战，八年抗战，都不能比拟。如以过去十年内战而论，蒋最多也只动员了二百多个团，八十万人。蒋与冯、阎战争[1]，冯、阎五十余万人，蒋八九十万人，双方也只得有一百四十万人。抗战期间沪苏会战[2]，中国三十余万，日本二十余万；南京战役，国民党十余万，日本不及十万；徐州战役，国民党五十多个师，三十万人，而日本只有五个师团。今天国民党方面动员二百多万人，战线延长从鸭绿江到长江，从四川边界到长城，如果再加上南方的民变斗争，那么可说是全国全军全民的一次大战争了。

这样规模的战争，其意义不仅有关中国的存亡，而且直接威胁到远东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全。现在巴黎和会已经开过，纽约在开联合国大会，如果这个会再开好了，那么全世界的注意力，就将集中移到中国问题上。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过去任何一次内战的观点，来看这次的自卫战。我们要完成历史性的任务，同时必须认识我们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体人民所负担子的沉重。我们要替全世界消灭一个最反动的因素，压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要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再次来掠夺和奴役中国。我们不单是保持八年抗战的果实，不单是保卫解放区一乡一村与土地改革的利益，而且要阻止美国组织人力物力来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冒险企图。我们站在世界和平民主的第一线上，我们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战。所以在火线上千百个同志的流血牺牲，是有极伟大的意义的。他们杀身成仁，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自我牺牲的代表——这就是党和人民对于“舍身取义”的同志应有的评价。正因如此，所以一切赞成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反帝国主义的，包括各方面广大的阶层都同情我们，认识我们牺牲的神圣意义。与此相反，一切企图苟安速胜，准备很快搬回城市，恢复和平安逸的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的人，是经不起暴风疾雨的考验的。他们焦灼不安，猜疑埋怨，患得患失，甚至动摇发抖，退却逃跑，与上面说的比较起来，越显得渺小卑微了。同志们！战争是长期的，我们要担起建设新中国的担子，首先，就要受得起艰苦困难的折磨，今天我们就是处在这种考验的时候。我们有困难，但是，敌人的困难更甚于我们，我们的困难可以克服，而敌人的困难是始终无法克服的。只要我们不被敌人的进攻所吓倒，不论敌人如何疯狂，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二、华东战场上，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一战又予蒋整编七十四师以沉重打击，变成八战八捷；晋冀鲁豫刘邓部队，三仗消灭了蒋方六个师，都证明

---

这是陈毅在华中野战军直属队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结束语。篇名为报告第一部分的原标题。

了蒋的进攻部队是可以消灭的。晋东南陈赓部队只有九个团，其中只有一个主力旅，打退了蒋方五六个师的进攻，歼灭其精锐胡宗南部队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更证明不但可以消灭他们，而且可以以少胜多。张家口外围歼灭了蒋二个师，淮北歼灭了蒋一个半师（其中一个团是桂系），都证明了不管当敌人前进时如何疯狂，而一经进入了解放区就要被消灭。至今为止，蒋方被消灭的已有三十个师了。我们主力集中的地方固可以消灭敌人，就是主力没有集中的地方，也可以消灭敌人。比如陈康那里，并不是野战军集中的地方，他们还是以少胜多，消灭了敌人。又比如胶济线，那里只有几个团和民兵，然而三个月中零零碎碎消灭了蒋军共三、四个旅，敌人至今无法打通，弄得失去信心；就是打通了还是可以破坏，可以夺回。又比如苏中及七八分区，八分区的主力离开已五个月，七分区已离开两个月，苏中撤出已一个月，但地区仍然可以坚持，我们仍保持区、乡政府，照样的收公粮、开会，“还乡团”不断被消灭。又比如淮南路西从五月开始就被敌人占领，但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游击战。又比如五师地区被敌人侵占更早，现在不但在原地保持着游击战争与革命政权，而且，从宣化店突围的远征军[3]到了川、陕、鄂、豫边，化整为零，在五、六个县份内创造了游击根据地，并且已在分配土地，组织几百人一股、几百人一股的人民武装。这说明我们不但在老解放区里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且“仁义之师”到处可以受到“箪食壶浆”的欢迎。即使蒋介石的后方，我们也可以树起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也会有成千成万的群众的拥护。蒋介石愈反动，其结果只是制造革命，规模愈大，发展愈快；这样下去，解放区就会推广至全国。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也是如此，也丝毫用不着害怕。须知压力越大，反抗越多。反动派要想镇压革命，而结果恰恰是制造革命，这是由事实证明的不易规律。是的，个别也有在火线上动摇投敌的，甚至也有少数老战士，边界上有些民兵叛变，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不是奇怪。这好像箩筛底下必然分出粗细来。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许多腐朽脆弱的分

子自然受不住战争激流的冲洗，而要沉淀，淘汰；而许多优秀分子，便始终屹立在最前哨。所以我们不能光看一面，光看这种腐朽脆弱分子的没落，而更要看另一面，这就是许多新的积极分子和新的斗争力量，更像雨后春笋一样卷入到革命阵营里来了。单就马叙伦、陈瑾昆、张奚若、罗隆基诸人来说，他们有的以前也并不很好，可是现在他们比某些幼稚的共产党员还要坚强，这说明在这正义、自卫、爱国、保卫民主的战争中，涌起了并且还要涌起更多的新生力量，而那些少数唉声叹气的，腰酸腿软的，近视的，终究要被清除，既是必然，也是不足惜的。

总而言之，我们在主力集中的地方能够胜利，没有主力集中的次要方向也能胜利，交通线能够继续破坏，主力撤退的地方也不会被压服，就是完全放弃地区，像五师那样也能坚持下来，而且还要发展新的地区。此外，如像邵伯、海安、四平街和这次涟水七日七夜的守备，说明我们必要时要守也是能守的。所有这些，都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我们胜利，并不只是可能，而且是现实的。

三、三个月战争，指明了一个规律，也就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蒋所得的还是要失掉，而蒋所失的是永远不能再得了。三个月中，蒋得了我们两淮、曹州、承德、张家口等七十几个城镇，其中有好几个在我是大城市，在全国是中等城市，还有几千村庄，约占我解放区城镇十分之一。但津浦、

陇海、胶济、平汉、平绥各铁路，一条也未打通，部队被消灭了近三十个师，伪军、土匪、还乡团等，还不计算在内。蒋介石大言不惭，计划三个月消灭我苏北部队，恢复交通，占领华中，结果却完全破产。而他被消灭和受重创的三十个师中，如一师、五师、新六师、八师、七十四师等，都是一等的精锐主力，其次如九十九、六十五、二十三、一百、新七、第三、十一、九十二等师，也都有优良的装备，然而都被歼灭、击溃、或严重杀伤了。他损失了有生力量，我扩大了有生力量，并且改进了装备；他们所失的正是我们所得的。他损兵得地，我得兵弃地，失地可以恢复，丧师就无法恢复了，而且蒋介石这些部队，均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心血建设起来的，又经过了美国的训练，才有今天。其中如一师、三师、七十四师，十四军，还是北伐时的老基础积蓄下来的，更是主力当中的主力，完全美械美训，可是碰到了新四军、八路军，在一天一晚之间便被消灭或被击溃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而且也使美方痛心疾首，事实上蒋介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惨败过，不要说军阀混战，就连过去跟红军的十年内战来说，也是如此。今天，仗还只打了三个月，还只刚打进解放区的大门，就来了这种厉害的一个见面礼。过去，江西的第一次“围剿”，蒋被消灭的有四个团，第二次四个团，第三次八个团，第四次十二个团[4]，这次一下子就搞掉了五十个团到六十个团，就是跟日本鬼子号称“世界第一陆军”作战，如淞沪、南京、徐州、武汉、中原、衡阳等几次会战，也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损失。衡阳之役只有一个方先觉[5]被俘，而现在军长以下成百成千的军官做了俘虏。但是反过来，我们要问问“蒋委员长”：“你可曾整个的消灭过我们一个排没有？”不但没有消灭过，而且大量放下武器的士兵，倒戈相向，在火线上特别积极；他们本有不坏的战斗技术，经我教育改造后，大多数能和我老战士并肩作战，并不落伍。至于蒋方的不断起义，下面再谈，这里不必细说。蒋的力量只会缩小，我的力量愈为增强，今后蒋军还要进得更远，而失败也将更大更惨，这是可以断言的。

总而言之，蒋得了些城市和交通线，但并不都能扩张为面；扩张了，一时也不易巩固；巩固了，也未必就能用其人力物力；就是用了，也会散布新的反抗种子。而我们的失地，可以用主力去夺回，可以用武工队去秘密控制，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活动，而且还可以深入至蒋的统治地区去。我们可以准备其再进临沂、邯郸、哈尔滨，甚至延安；也可以准备其再进兴化、临城、阜宁、涟水、沭阳，然而蒋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要我的失地不至没有周旋的余地，蒋在其力量不断被我消灭而不断转变为我的力量的条件下，那么最后

力量对比，就会起根本的变化，我就可以收复失地了。我解放区共有七百多个县城，我们要是丧失了仍能去控制，失去这块，搞回那块，那么就是一半县城丢了，胜利仍是可操左券的。

四、战争前途可能是这样：三个月自卫战，还只是在我解放区的大门上打的，这是初期。这时双方都还少经验（我们有的也只是十年内战与敌后磨擦战的经验，而尚少这些大规模战争的经验）。今冬明春，敌人可能登堂入室，占领主要城市，打通铁道线，并控制某些乡村，在我腹地残酷纠缠；而双方力量也可能就在这时期起根本变化。那时敌的兵力更分散，战线更延长，而我防线更短，力量更集中，经验更丰富，敌在占领区更难控制，而美国可能从中国退出，敌的有生力量继续被我消灭，于是力量的变化由量至质，这也就是我们开始反攻，收复失地，开辟大块新解放区的时候了。所以今冬明

春，我们是否能够继续消灭其有生力量，是很重要的，否则虽不影响我们最后胜利的前途，然而相持局面便要长期化了。

华中自淮阴失守后，是增加了不少困难，这是不用否认的，这好像北边的撤出张家口，也同样增加不少困难。但我们必须认识这些困难的性质，不要被困难的表面现象所吓倒。这些困难，本质上只是我们的斗争方式的改变问题，而不是什么能否生存的问题。敌人到了，主力撤开，我们自不应再开大会，再用从前的标语口号，在我们已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的地方，在大多数群众抵抗失败，情绪低落，要求妥协时，甚至可听从人民大众的意见，与敌人表面敷衍，甚至建立两面政权。我们由公开转入半公开，甚至完全秘密状态，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离开群众放弃原阵地。又加工厂、学校、医院，分散游击时仍是可以办的，不过方式是跟今年春夏时候不同了。我们在敌人占领的地方采取新的斗争方法，准备力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开展游击战争。而在其他地区，大量发展民兵，充实主力，使主力二倍三倍的增强起来，只要我们主力存在，我们终能杀出一条血路。假使我们悲观失望，精神上先解除了武装，这才不可救药。是的，我们解决困难的条件是少了几个了，可是我们可创造新的办法。我们干部伤亡，可以从新的力量中获得补充；地区大时容易扩充新兵，小时也可拉游击队与争取俘虏；此外财力物力也都有解决的办法。同时，蒋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全国反对，财政除借债外没有办法，经济已走上绝境，军心厌战，想多得地盘而又想迅速解决战争，这都是无法解决的困难和矛盾。敌我双方两相比较，胜败的形势是极明显的。

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起义的问题。有人认为过去的起义都是几千几万人，而这三个月来只有一班一排。殊不知过去有些人起义，事实上是先由我们包围而促成的；可是这三个月来的起义，比第一次自卫战争中次数更多，范围更广泛，从陆军、海军、空军、保安队，一直到特务武装，都纷纷起义，而且都是自动的，没有任何外力的逼迫。最近大批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都向这里跑。有一个中间派的报纸有人说：“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不过在反帝反封建反独裁与争取民主的政治主张上跟共产党的意见一致就是了。”事实上过去还有所谓中间人士，今天这些中间人士除在阶级基础上组织问题上和我们不同，而仍可名为中间派外，在目前的斗争纲领上，不能再有第二条路，这也就是革命阵营中的斗争力量。在社会基础上蒋是缩小了，我是扩大了，这里已有显著的变化；而更多更大的起义，将来还要接踵而至。所以我们必须换脑筋，把目光放得敏锐一些，不要只在片面的现象上打圈子。现在是抗战结束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阶段，假定共产党已是四岁（北伐、内战、抗战、现在），那么这里大多数同志都是参加抗战好多年的，也已经有二岁了。我们要求已二岁的同志，看问题就得深刻些，不应再是只凭普通的常识来判断。要是我们搞得不好，革命失败的可能性自然存在，但我们还是要干。在今天，并不能说一失了首都，一失了某些地区，就认为不能生存。问题要从多方面来看，要看了这面又看那面。我的失地是增加了困难，但失地并不丧师，所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蒋得地而丧师，困难就无可补救。总之，新的事物有新的规律，我们今天处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断不可简单化。比如再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说，他反对美国这样帮助蒋介石，认为这要使美增加灾难，遭受失败。华莱士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新四军、八路军，而是美资本家十足的代表人物。为什么这样呢？不是又使人糊涂了么？其实这

毫不稀奇。因为他是一个比较高明的资本家，他不是爱护中国，恰恰是更好的为美国打算，想保持美国和苏联斗争的力量，想和中国通商赚钱必须采取和平的办法。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劝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要做希特勒第二，在中国范围内不要做日本第二。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么明天华莱士也和赫尔利、马歇尔一样，先后态度变了，不是又失望了吗？起义问题也是如此，积小胜为大胜的问题也是如此！当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一班一排的起义，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有重要意义。我们记者，只爱报道大的歼灭战，而不肯报道民兵的战绩、敌后坚持的经验、伤兵工作与后勤工作的范例，也是不对的；须知前线的胜仗重要，但还要加上大家在各方面的努力。

三个月的战争，考验了我们华中的同志，替我们审查了干部，实行了精简，也真正给我们上了第一课。我们各种毛病，不问是阶级立场，思想方法，或者在工作态度方面，都要克服，而且都要很快克服，因为我们的仗，还要继续打下去，许多地方还可能放弃，地区可能更紧缩，单位必须减少，机关必须合并，干部必须降级使用，和平时照顾这个照顾那个的一切都要收起来，现在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方向，一个意志，一个行动，这就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约束自己，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牺牲生命。在此伟大战争中，牺牲是无上的光荣，古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说：“一夫拼命、万夫莫当。”现在真是拼命的时候了。战争首先要靠勇气，就是拼，其次才是战术，所以我们要提倡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敌进我也进，挺进敌人后方去，准备杀他个七进七出，我出来就准备三条路：胜

利回去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则开追悼会，不能再有别的了。中国的和平民主是难产的，现在正是胎动的关头；胎儿是命定要出来的，这时是忍痛的时候。我们不要将困难和失败混淆。今天不是失败，而是困难；我们只要是巩固团结，不怕牺牲，埋头苦干，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华中还可能丧失更多的地方，只要主力打胜仗，各地方坚持，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就能打开战局，恢复失地，走上胜利之路。

注 释[1] 蒋与冯、阎战争，指一九三一年五月至十月中国三派军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进行的中原大战。[2] 沪苏会战，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二日进行的淞沪战役。[3] 远征军，一九四四年的十月，中共中央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决定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组成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于十一月九日离延安南下，辗转到达湘粤边境，故称“远征军”。该部在日本投降后，返回湖北与新四军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第二纵队，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在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下，奉命由宣化店地区突围。[4] 江西的第一次“围剿”……第四次十二个团，这几个数字和以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统计数字有出入。[5] 方先觉，任国民党第十军军长。一九四四年秋，日军攻陷衡阳，方被俘投敌，日军将其部编为“先和军”仍以方为军长。同年十二月方回到重庆，国民党当局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 宿北战役之检讨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

(一) 宿北战役，戴之奇(三青团中委[1])自杀，临死高呼“国民党万岁”口号，黄保德(六十旅旅长)亦自杀，魏人、董继陶[2]突围时被击毙，师参谋长下落不明，副师长饶少伟、副参谋长章秉彝均俘，合称此次失败：(1) 由于未判断我军南下出其侧背，以为马励武东进定可牵制鲁南部队。(2) 由于十一师增援不积极(实际是我第三旅第二晚挺袭十一师师部，解决其工兵团一个营及骑兵团，击溃其炮兵团，复受二纵牵制，增援实难，又二次出援，均被我击溃)。(3) 称赞我炮兵射击准确，炮火猛烈。(4) 称赞我战士英勇。(5) 被俘敌见我民扶担架众多，便说国民党多失人心，一定失败。又称：六九师[3]全部东进计二万一千余人。

(二) 此次俘敌军官兵：一纵俘六千余，八师三千，五旅三千，二纵二千，九纵一千五，军直三千，地武俘获数百名，总计在一万六千以上，战场遗尸千余具，故突围不多。敌方消息：敌军收容逃回散兵甚少，家属纷纷到徐州哭诉。

(三) 原拟定计划，打了六九师之后再打十一师，求得彻底消灭后好部署第二步。(1) 由于要守涟水，我第六师不能参战，陶师[4]从盐城开涟水亦未赶上，故造成盐城失守，涟水亦陷，而十一师亦未能歼灭，为此役最大缺点。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中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力的主张。数月来，用于箝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2) 由于前线兵团首长浅尝辄止，又因部队战术差，伤亡大，部队编制不充实，电话未确保畅通，且多谎报情况，故未能扩张战果，仅做到打坍十一师师直及十一旅、十八旅两次援队，未能予以歼灭。整个战役过程，我四旅仍未大用，若组织的好，实有可能再歼十一师二个旅，如六师能参战，则十一师可全歼。

(四) 过去的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部队编制番号均须统一，一面作战，一面正商讨整编办法。苏中七战七捷以及最近的胜仗，缴获多而大，但由于本位主义，打埋伏、抛散浪费太多。今后确定以战养战的思想，严格处理分配胜利品，始能持久。现部队对使用炮兵，使用俘虏，防空防炮均有进步，打二六师则未克服反坦克的困难[5]，故又提出树立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的思想。

(五) 山东之财经计划制度等均好，惟动员新兵送前方、后勤工作等远不如华中。正加紧克服对战争认识不足的思想。

### 注释

[1] 三青团中委，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简称。

[2] 魏人、董继陶，分别为国民党军预三旅旅长和第四十一旅旅长。

[3] 六九师，即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文内提及的十一师、二十六师，均为整编师。

---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在江苏省宿迁县以北地区，胜利地举行了宿北战役。这是自中共中央九月二十三日作出的山东、华中“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的指示之后的第一个大歼灭战。本文是陈毅在战役胜利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4] 陶师，即以陶勇为师长的华中野战军第一师。

[5]打二六师则未克服反坦克的困难，二六师即二十六师，陈毅发此电报时，已准备好于次日发起鲁南战役，该战役将首先攻歼附有第一个速纵队之敌军整编第二十六师，该敌拥有坦克二十四辆，而解放军的参战部队当时还缺乏打坦克的经验。

## 一面打仗一面建设 (一九四七年一月)

同志们！饶政委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对时局的指示，指出全党全军今后的任务在于准备和迎接民主高潮，这就加重了我华东野战军全体同志的战斗任务。我华东野战军是山东、华中部队的汇合，是全解放区兵力最大集中的地方，是解放区爱国自卫战争主要战线之一，又是美蒋集中大军进攻的主攻方向。特别今后山东地区的战争，将成为中国人民与美蒋恶势力的决战场所之一，因此，我们的任务很大，担子很重。半年来华东我军连续获胜，总计歼敌二十六个旅以上。特别宿东、鲁南<sup>[1]</sup> 歼灭敌三个整师及第一快速纵队，这个胜利对美蒋打击最重，影响最大，与全解放区各兵团的伟大战绩配合起来，使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形势更清楚明显，到现在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和南京首脑部的人员也无法否认战局于美蒋不利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一次自卫战争的车轮一定可以引导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独立民主和平，使历史上来完成的民主斗争任务在这一次最后完成。我全体同志能亲自参与这个伟大的斗争，且在斗争中担负重大任务，这是最光荣的，这就是至高无上的革命幸福。我们要好好组织起来，好好的去完成新的作战任务。因此，在此非常时期，为了执行中央所给的任务，我想向同志们提出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双重任务，是为了能迅速纠正部队中现存的一些缺点，更能加倍提高战斗力，更能迅速的最后击败美蒋。我在此对部队的整顿问题，也就是对部队建设上带基本性质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作为今后部队的中心工作：

一、建立整体观念，实行统一集中的工作制度，保证执行命令、完成战斗任务

中央的指示来了，中央提出的任务交下来了，我们一致领受了光荣的战斗任务，今后还要打几个或上十个比宿东、鲁南更大规模的胜仗，因此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组织，统一制度，建立野战军的整体观念，便是保证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我想，以野战军今天的现状来说，各兵团具备了坚决完成战斗任务的优点，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人人有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高贵的革命品质，我们部队的装备在不断改善，掌握运动战战略战术日趋熟练等，这对担负战斗任务在基本上是无问题的；但应当指出，由于部队不断伤亡，老骨干损伤很大，新骨干还待培养，解放区新战士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士兵大批涌入，又加战斗频繁，训练时间腾不出来，不能不使部队的组织和制度方面大大削弱，于是便产生各种坏现象。如群众纪律不好，打骂老百姓，对地方党政不够尊重，俘虏政策不够严格，对新兵爱护团结较差，对政治工作制度轻视，对胜利品处理自由放任，肥的愈肥，瘦的愈瘦，各兵团的团结，不够友爱亲切，破坏公物（如破坏汽车及各种器材等）现象异常严重，甚至沿途拦汽车，打汽车工人的现象屡屡发现。某些部队骄傲得很，自以为天下第一，天兵天将。上述现象，各兵团都难免，只有轻重之分，并无例外，如不立即加以克服，必然涣散我军的政治团结，必然分散我军的打击力量，必然脱离群众，必然犯轻敌的错误，完全可能在今后残酷战斗中遭受挫折。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除骨干伤亡、战斗频繁等客观原因外，还应着

---

<sup>1</sup>一九四七年一月鲁南战役胜利结束后，山东与华中两支野战军正式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是他在山东临沂附近举行的一次野战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重指出在主观上一部分干部由于连续胜利冲昏头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自己本事高，不懂得一切是由于党与人民的基础强大所得到的，误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这种政治上的盲目性妨害进步很大，因此我们要提醒全体同志赶快猛省。集中精力，举行自我批评，走建立整体观念，实行统一集中的正确道路。

## 二、建立整体观念，就要打破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

由于现在的战斗，较之过去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其规模空前巨大，敌人装备且较日寇为优，又采取凭坚固守的集团推进战术，我军不集中强大力量，便不能求得会战的胜利。战胜这样的敌人，当然不是一个部队、一个兵团、一个地区所能完全担负的，而是要各个兵团的协同动作，甚至几个地区部队的会师；战胜这样的敌人，当然不是仅仅部队在前方作战所能完全担负的，而是要靠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民及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配合。八个月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便建筑在集中兵力的原则上，便建筑在动员党政军民全体参战的原则上。过去曾有过分散兵力以致仗打不好的例子，曾有过前后方工作配合不好以致影响战斗的例子。因此，我们部队全体指战员应该以团结兄弟部队、团结地方人民为第一义务，有了这一条，则敌人必被我战胜无疑。因此，基于过去分散作战环境所产生的山头主义，基于过去独立坚持强调自给自足所产生的本位主义，基于过去强调分散游击所产生的游击主义，便成为今天进行大规模作战的障碍。山头主义站在自己的山头上，自以为是，只知道本山头的的光荣历史和特长，忘记了其他方面的光荣和特长是自己应该学习和尊重的，更忘记了自己这一部分只是整个人民事业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如果把这极小的一部分夸大起来，便必然犯骄傲自大不顾大局的错误。本位主义只看眼前本单位需要，缺乏对整个人民事业的关怀和认识，必然会犯狭隘自满、自私自利、破坏团结的毛病。游击主义必然会把自己束缚在分散游击作战时期许多不适用的旧经验上，必然不适合正规战时期高度协同动作的要求。总之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均是妨害整体观念健全，妨害大局发展，妨害团结进步，妨害胜利的恶劣表现，必须坚决纠正。我们今天号召全军应该以整个人民事业为出发点，大家齐心，以各单位的努力造成整个人民事业的胜利，人人具有牺牲一己换取整个人民事业胜利的革命精神。如是便能随处着眼大局，照顾友邻，照顾团结，照顾地方，照顾兄弟兵团，不骄傲，不突出，谨守岗位，争做模范，向人学习。我军人人养成这种作风，于是统一的集中的模范的铁的人民武装便可以造成，不仅一个蒋介石加美国反动派可以打倒，就是再有几个蒋介石加上他们的外国主子也必被中国人民军队击败无疑。

三、提高群众观念，遵守群众纪律，提倡群众工作，配合地方进行土地改革如何建立对人民的关系，如何采取对人民的态度，是我们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同之点。国民党军队是替国民党反动集团服务的，他是压迫人民的工具；我们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斗争中间创造出来的，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国民党军队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压迫人民，打骂人民，以至于对人民采取抢劫烧杀奸淫等罪恶行为，这是他本性的体现，而且是蒋介石等一贯的法西斯教育方针所培养训练而成的；我们人民军队是站在人民之中的，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入伍为兵，退伍为民，根本上军民是分不开的，没有伟大的斗争的中国人民，绝不能产生和创造出像八路军、新四军这样一支革命军队，所以来自人民，回到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天性。因

此，一切替人民打算，为人民着想，帮助人民，体谅人民，爱护人民，成为我们军队的神圣义务；离开人民，我们军队不仅做不出什么事业，连生存的条件也就取消了。我们部队中的同志们在英勇作战方面已表现出为人民服务的舍生忘死的可贵的革命精神，这是最好的地方；可是某些同志不能把这种作战精神扩充和贯串在一切生活方面，每每在处理日常生活时、接待日常事物时反而常有脱离人民的错误的表现，以致常有部分的打骂群众、压迫群众、不尊重地方党政等恶劣现象，这是最大的错误，因为他根本违反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本性。这种不自觉的脱离人民的行为，必须彻底纠正，这就必须从提高群众观念，遵守群众纪律，利用战斗空隙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学习做起。要求我们部队的同志不要沾染国民党军队的军阀习气，切实遵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时刻刻记住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替人民服务的军队，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团；脱离群众，压迫群众是极大的罪恶和耻辱，人人有权干涉，有权纠正。主要是说服犯错误的同志自觉纠正，无论行军作战，都应照顾人民利益。人民中间由于战争频繁种种原因，对帮助军队方面，如送粮送草出扶招待部队准备不及或表现不能及时等等，我们应该体谅，不是加以责备，而是加以帮助，迅速动员准备起来，以应急需。只有采取这种正确态度，才能加强对人民的团结，有利于整个人民事业。特别是现今正当着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我们军队所到之处，均应动员全体军人关心土地改革，宣传土地改革，配合地方土地改革运动，使全体同志懂得，保证农民获得土地是我们作战的基本目的之一。同时，这种土地改革在部队的动员，对于教育和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与政治认识有极大作用。更要懂得，我党实行土地改革以取得数万万农民的援助，这便是战争胜利的保证。我敢说，帮助农民或反对农民，更是我们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分界线。根据此一点，希望我们军队在这方面展开新的工作。

四、服从党的领导，提高政治认识，尊重政治工作制度，学习政治工作，提倡各部门工作的密切配合

我们人民军队的建设，是整个政治建设的一部分。一切军事建设要首先从政治建设做起，离开了政治建设，便没有什么单独的军事建设可能，如有的话，那只是属于军事科学的技术装备建设方面。但即使在军事科学的技术装备方面，也仍然离不开整个政治建设，因为军事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只是为完成政治任务而斗争，军队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别中国人民军队的历史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白手成家、愈来愈大、愈大愈强的历史，一切取给于人民，从人民中间拿出力量，集合成军，再逐步解除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扩大自己。假如不是依靠人民革命的真理，绝不能动员人民去进行政治斗争，也就不能把这一政治斗争提高到军事斗争的阶段。从整个政治斗争立场上来认识军队的作用，因而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同志必备的基本观点，离开了政治来谈军事，形成单纯军事观点，必然要沾染军阀习气。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军事斗争，我党为了遂行政治斗争，必须掌握军队以进行胜利的军事斗争，故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委员会，建立政治工作机关，派遣负责干部任军队首长，以建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使我军将士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为人民而战的政治情绪高度发扬，因而能进一步努力学习军事，掌握一切军事技术，因而政治军事并进，造成一支能文能武的军队，既会作政治工作，又会做群众工作，又会做军事工作。这样一支新式的为广大人民所拥

护的人民军队，当然不是腐朽而单纯军事的国民党军阀部队所能抵挡的。因此，我军将士人人均应学习政治，提高政治认识，尊重主持政治工作的政治机关，服从和尊重政治工作制度，学习做政治工作。如拥护党的决定，服从上级指挥，动员战地群众，对指战员进行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学习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争取俘虏，优待新战士，瓦解敌军等。这些工作应该与军事上瞄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等基本动作一样重视，每天都要放在心上，加以不断研究。这样一来，我们军队的将士就必然头脑发达，智力丰富，真可以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了。现在部队中个别同志在屡胜之余，误认自己本事高，会打仗，枪响便解决问题，忘记了战争胜利是各种因素得来的，特别不喜欢讲道理讲制度，使自己的军阀残余很不方便，这种现象是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次打快速纵队，我们召集几个部队政委来开会，商定统一集中使用汽车和工、炮、坦克器材，由各政委打条子去各后方机关集中器材缴到上面，不料竟有部队人员荒谬他说没有司令条子我不买帐。这不仅是尊重不尊重政治委员，而且是不尊重上级决定的违法行为。例如我在本军担任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但我必须首先尊重和服从饶政委、黎副政委以及舒主任[2]及军政治部的意见和提议；我在野战军虽兼政委，我仍然必需尊重谭副政委和唐、钟两主任[3]及政治部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每一个军事指挥员要养成这种尊重政治工作，提倡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的良好习惯。自然我不是说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都是无缺点的，我是说作为我军一个基本的政治工作制度是经过政治工作人员来代表的，人与制度不能截然分开的，希望不了解此点的同志迅速反省。反之，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站在执行政治工作制度方面，应该特别警惕，善于管理自己，约束自己，更要尊重其他部门的同志，特别要尊重各级军事负责同志，要了解军事政治负责同志间的合作，常常对部队工作有决定的作用。例如，我在本军必须重视张副军长[4]的领导，在野战军我必须遇事征求粟司令[5]的意见，重视他的领导，这样才能做好工作。我想这是不错的，因为军队的军事工作制度是经过党的决定与批准的，军事工作人员是受党的委托来执行军事指导任务的，故应受到全体同志的尊重。其他部门的工作同样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在正确执行其具体工作方面同样应引起全体同志的重视。中央决定在部队中成立各级党的委员会、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一切决定交由部队首长负责执行，把过去部队的首长负责制度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这正是为了发扬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作风，更造成军事、政治及其他部门的密切配合。这样必能保证各部门的分工合作与健全发展。

#### 五、实行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

我军从抗日时期的分散游击作战转到日寇投降后的大规模集团作战，从第一次爱国自卫战争到第二次爱国自卫战争，这中间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艰苦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转变过程，从不断胜利的事实说明我军已逐渐完成这一转变，我军已能胜任进行运动战，已能掌握大兵团作战的规律。这些都是很好的方面，但并不是说一切转变都很顺利，都已经全部完成，特别是在部队组织和制度方面，在战斗指挥如担任箝制方面，组织火力、使用武器方面，指挥和部署后勤方面，尚有着严重的缺点，这就是转变尚有不够的地方，我军的干部均应在这一方面痛下钻研功夫。由于敌人不同，装备不同，任务不同，战争规模不同，敌人是蒋介石、美国反动派，敌人装备是美械、日械、国械的混合；我军任务在过去是独立坚持，在现在是以运动战为主，辅以必

要的游击战、阵地战；任务在于集团使用力量，保证集团歼灭敌人，每一次战役都带着某种程度的决战性质。因为战争规模的空前巨大，战争对敌人的歼灭性便连带着表现我军无可避免的连续消耗，特别是在巨大后勤的部署上在我军战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你们看，成千成万的人力、数千万乃至数万万的金钱和粮秣消耗，每一次战役至少数千个指战员的伤亡，这些均要求我军组织上，制度上应具备高度的计划性和统一性才能保证连续胜利。我们提出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是正确的，是号召全体指战员从不断战斗中学习以增加新知识新技术，以便使我军能掌握各种新兵器，能进行更复杂的战斗，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会战，以便保证在不久将来争取歼灭敌人的更伟大的胜利。例如大会战的要求在于各兵团的高度的协同动作，在箝制方面要顽强有力使敌人攻不动扯不脱，在两翼包围部队和较远距离的迂回部队要配合得十分密切确实，要预备队方面适时加入战斗并且更适时举行战场追击，扩大战果等。这里据实战经验，说明我军对运动防御，固守要点，担任箝制等任务，远较担任突击为差，白天战斗还较夜战为差，使用轻重炮较之使用机步枪为差，固守阵地较攻击敌人阵地为差，攻坚较之运动战为差，土工作业的水准比较低，步炮协同的技术更不熟练，这就需要加紧学习。例如我军近来对空防御、打坦克有很大的进步，土工作业的要求也在提高，我军使用炮兵使用爆炸也有进步，我军手中一切武器都能掌握，都能使用，在决战方面都合乎科学规律，但是不浪费弹药，减少伤亡则尚差，部队的肉弹主义、打干部仗[6]的倾向仍要力加纠正。现在我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国民党差，也不比抗战时期日寇差，问题是在组织火力与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上需要加紧学习。例如我军装备改善已接近现代化的水平，而交通条件、运输条件、供应组织条件则尚是手工业式的，我军各后勤部门的同志以及某些指挥员的思想尚缺乏关心这些方面，不愿意去积累经验，适时改善自己的部署，作战只凭一冲，指挥只凭一挥，以人的血肉压倒敌人。这种高贵的革命牺牲精神是好的，但是讲求技术，打仗打得巧，使伤亡少、胜利大，则尚需我们同志努力去研究战术、研究组织战斗，去研究组织火力来解决。这方面不但不能自满，而且要表现出为人民服务的负责精神。即是说成千上万的战士与干部放在我们手上去拼命杀敌，我们的指挥干部便负了一种严重责任。这个责任便是以较少代价求得更大胜利，如是我们才对得起人民的委托，才能应付长期战争。这一点无论战时平时，各级指挥员都要深刻思考，特别要研究军事，研究战斗指挥，做到第一战的好处能到第二战发扬，坏处能够避免，不再吃亏。例如部队运输问题，担架问题，伙食问题，日常用品补给问题，粮秣节省问题，伤员救护问题，各级指挥机关在战前战后均应作妥善部署，不得只管打仗不管其它。

#### 六、实行以战养战，反对破坏专家

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是我军能从战斗胜利中取之于敌人的优良传统。现今大规模战争一面要靠后方兵工生产的支持，一面要靠战场上的缴获，特别某些器材尚不是我们的生产自给条件所能解决的，更要靠战场缴获补充。现在情况是：我军连续胜利，缴获极大，如弹药、电料、粮食、卫生器材等，每每堆积如山，但实际上有计划保管、整理、分配则很差，把第一次战斗缴获的粮弹运用于第二次战斗则很差，把这个兵团缴获有余的粮弹调剂到另一兵团则困难重重，把主力兵团的弹药器材向地方兵团调剂则尚要经过各种障碍，始能勉强实行。某些同志把自己部队的缴获看成是自己个人的

本领高强所发的洋财，看成为个人的私人财产，因而只承认他自己有处置的自由，不同意党与高级司令部的处理办法；当党提出有计划分配这些胜利品时，他们便认为侵犯了他个人的权利，虽不会公然反抗，但他们不是勉强执行便是把一些损坏的器材交上来，自己留用最好的最新的。当他们不高兴时，甚至发展到不愿交给上级和别人，他们宁肯痛快的加以破坏。这种阳奉阴违自己处置战利品的现象，是与我党进行长期战争的路线相矛盾的。每当一个战斗结束之际，他们争夺战利品非常起劲，搞得愈多愈痛快，搞得少就发愁，抱怨上级和友邻兵团。他们可以因上一次搞得多而痛快，又可以因下一次搞得少而啼哭。当他们搞得多时，便忙于打埋伏，忙于向上级隐瞒，忙于私人赠送，这个时候他们绝不提什么统一分配和集中使用；当他们没有搞到东西时，他们的部署便改换了另一套。他们忘了我们战争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一切胜利是在党与军民全体努力之下获得的，某一部分的努力只占其中一部分，个人努力所占比重更极其微小，夸大这一小部分便形成其骄傲自大，不仅对友邻部队是如此，对上级对党对人民也有时候得意忘形了。照这些同志的办法干下去，自然造成我军缴获愈多，破坏也愈大；不了解一切缴获妥善保管既可以连续战斗，又可以调剂各兵团，（连自己在内）；既可以加强各部队给敌人以新的更大打击，还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更可以加强对长期战争的支持能力。现在到了以严格办法来终止这种破坏行为的时候了。今后的办法，凡战斗中，一切缴获品，应由各兵团负责保管，确报数目，应严守每个共产党员忠实于党的原则，凡不报准确数者应受处分；其次才是上级按照准确数先批准留用，然后进行统一处理，统一分配。我们既要奖励缴获大的兵团；更要奖励缴获又大、保管又好的兵团；更要奖励缴获又大、保管又好、又能服从统一分配的兵团，着重指出，更要奖励作战得力的兵团。不应以缴获大小为标准，而应以在决战中所完成任务对全局胜利的比重来作标准。但当我们执行这一路线时，我们可以预见到必然产生新的偏向，便是彼此不关心战利品的收集和保管，以为自己搞得多反正得不到，不搞上级会分配下来，这是把过去个人主义的积极一变而为个人主义的消极，两者都必须纠正。同志们！我军既有本领把美蒋的进攻变为输送队，更应有本领把一切战利品加以妥善保管分配，来加强对美蒋的新的打击，这种从战争中壮大自己培养自己的以战养战的思想必须确立，就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反对破坏公物的破坏专家着手。

七、爱护新战士，争取新战士，同时懂得对一切反动分子发挥人民的仇恨大批解放战士涌入我军，他们在屡次战争中表现英勇，对人民事业立下功勋，我们不仅应加以欢迎而且要加以爱护，更要加以提拔和培养。我们部队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有许多新经验值得总结，值得继续发扬。这些解放战士经过战争洗礼，经过一定时期政治教育，他们便是我军干部基础之一，对他们采取漠不关心或不信任态度是不对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法西斯教育是有其长期的准备的，一部分士兵常有受欺骗甚深的，一个时期难于转变、觉悟，可能在连续战斗中发生异动，对这个现象，我军同志必需有警惕性。一面不放松争取教育，一面仍应有制裁反动家伙的紧急处置，即人人有枪杀背叛人民的投敌分子的权利，这是保证战斗胜利的一个办法。同时更要指出，在大批俘虏中，对国民党军队中级以上军官一面要执行党的宽大政策，即不加杀害，不侮辱其人格，但一面又要了解他们多年指使军队屠杀人民的罪行重重。他们被我们俘虏，是他们应得的反人民的处罚。这些家伙未

被俘时，神气十足，被俘后常用贿赂办法企图只身逃脱，再去干反动事业。我军同志必需有高度仇恨心理严密监视对待这些反动分子，对他们的仁慈即是对人民的残忍，等于犯罪，是不容许的。自然在这批国民党中级以上俘虏官中，仍应采取分别对待政策，即对一贯干反动事业的分子与尚可以改造觉悟的分子应有区别，对一贯干反动事业及其胁从分子和对其人虽置身国民党军队之中，但对人民事业有认识有同情不愿意内战的分子应有区别。我党对俘虏的政策一般的采取宽大改造的办法，但对坚决的反动分子应有警惕，绝不能无条件予以宽恕。

#### 八、加强团结，争取新的伟大胜利

我党我军从一九四二年毛主席提倡整风以来，造成了全党全军铁的团结，这种坚强的政治团结历经日本投降、第一次自卫战争、六个月停战和平到现今的第二次自卫战争各种事变的考验，证明全党全军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能应付任何事变，能击退任何敌人的袭击和进攻。从第二次爱国自卫战争以来，我们更亲眼看见党政军民全体的伟大团结争取了连续不断的伟大胜利，说服个别思想波动的分子，打破了对和平的幻想，提高了个别的对战争认识不足分子，在部队中也锻炼了我们各个兵团，对于了解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实施运动战战略方面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目前在部队建立整体观念，实行统一集中的军政制度，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以及对公物、胜利品的严重破坏主义倾向。我想，我军全体同志只要注意研究是不难克服上述倾向的，特别是战争规模继续向前发展，我军不仅要完成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而且面临着从农村到大城市的转变，面临着从解放区向全中国的民主高潮的转变，这就要更加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各种准备和教育工作，要保证在任何新收复区、新占领区使一切公共建筑，如矿山、学校、铁路、车站、仓库均完好无损，保证其能完好地变为人民的财产，成为替人民服务的工具，这里就要剥夺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破坏主义的地位，特别破坏主义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思想反映，是与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建设性相矛盾的。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无条件的反对一切破坏，也不是无条件的赞助一切建设，我们赞助和提倡革命的破坏以达到革命的建设，而反对一切反人民的建设，例如对于封建主义和法西斯的一切建设我们就应实行革命的破坏手段加以摧毁，这种破坏正是进行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反之，对一切可以保留作为服务人民之用的物资和建筑，则应视为人民的公共财产，便应承认人民的公共财产他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加以破坏是犯罪行为，即如加以贪污、浪费也应在受处分之列。我们今天的战争目的便在于反对美蒋对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之剥夺和破坏，因此我们是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者。在我军全体指战员中提倡革命的建设主义，在建立整体观念、实行统一集中的军政制度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必能使每一次战役的收获能更多贡献于中国人民，必能在今后的伟大的战略进展中，面临大城市和全中国规模的时候，能胜任愉快地掌握一切胜利，掌握全中国的局面，使全中国人民享受和平民主独立的真幸福。我希望全体同志共同努力。我预祝新的伟大的胜利。

注释：

[1] 宿东、鲁南，指山东和华中两支野战军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在江苏宿迁以北地区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等部两万一千五百余人的宿北战役和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日在山东峰县（今峰城），枣庄地区歼敌整编第二十六师、

第一快速纵队和整编第五十一师共五万三千五百余人的鲁南战役[2]饶政委、黎副政委以及舒主任，依次指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副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舒同。此后不久，新四军和山东军区撤消成立华东军区，以上三人依次为华东军区政委、副政委、主任。

[3]谭副政委和唐、钟两主任，指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

[4]张副军长，指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并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不久，成立华东军区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5]粟司令，指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华东野战军成立前往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6]肉弹主义、打干部仗，指部队不讲战术，对敌阵实行集团冲锋和强调干部带头冲锋而忽视干部指挥的作战方法。

## 关于增强纪律性，反对不良倾向，加强政治工作等问题 (一九四七年三月)

会议已开了三天，饶、粟、黎三同志[1] 报告后，今后工作大体上已讲了。有几个问题要特别说明一下。讲七个问题：

一、饶政委传达中央政治局二月一日的指示[2]，对时局的分析及关于中央指定华野要一个月歼灭敌军五个旅，到年底歼 45~50 个旅，完成内线作战，不要求很快转入外线，任务已经定了。这一年要歼灭敌人，还要付五六万人的伤亡，是一个严重斗争。改变战争形势，迎接新形势，只有消灭蒋军才有保证。中央政治局决议将要印发，我们要反复研究，特别对我们自己的任务，要作很好的准备，清楚认识形势与任务。我们到年底至少要消灭敌人十至十三个军。我们几个纵队，每个纵队的任务都很大。特别饶政委传达中央准备大革命任务及华野的任务，提高了我们的政治认识，懂得了我们的责任，指出了斗争方向，帮助前后方解决许多问题。饶政委回来后，使我们党政军民各方面布置焕然一新，对整个局面的改善起了决定的作用。同志们对这一点要有认识。

饶政委报告中强调反本位主义。他从思想上、现象上及其发展前途，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说明了这些现象在不断胜利中很难避免，但又严重，是一定要纠正的。但不能泼冷水，搞惩办主义。主要是政治教育、说服、民主讨论来达到。不要害怕，不要以为了不起，不要以军阀主义纠正军阀主义。希望同志们特别注意这些，遵照去做，则本位主义、破坏纪律偏向可以纠正。饶政委的正确思想领导与工作作风，是值得学习的。这样，部队可以提高战斗力，更加巩固。如果平时不管，发生问题急忙急躁，手忙脚乱，惩办镇压，表面上有些效果，但不久就会更坏。关于整顿纪律的方法，我再补充几个意见：

(一) 各部要开纪律检查民主动员会，开展坦白运动。对严重违纪分子耐心说服，要他们深刻反省，引起大家反省；并吸收地方团体、支部代表参加，增进军民了解。这是第一步要做的。特别要注意对落后分子的教育，负责同志亲自参加主持和检查，并作结论。如果简单的下一个命令，召开一个会，大骂一顿，一瓢冷水泼下去，只能一时有点效，过一些时候更大的破坏纪律现象就要发生。

(二) 大家要研究一下破坏纪律的原因在哪里，具体研究十几个几十个实例，详细研究一番就可找出其原因，不要单纯气愤的主张枪毙几个算了。唐主任[3]指出，破坏纪律不能强调行动多、俘虏多而原谅自己，有些破坏纪律是我们上面命令他们破坏的，叫下面破坏纪律又要处分下面，是不对的。犯纪律最大的原因，就在抓扶抓驴搞粮食上。因东西运不走，命令又急，没有办法就乱抓，就逼粮、逼草。各级指挥机关命令一到就走了，把大批东西交给少数事务人员，不送上来就要杀头，无人帮助，他只好强迫命令，乱抓，打乡长、区长。这种布置是等于逼着他们犯纪律。在野战军方面我们也要负责任，不能简单怪下面。整顿纪律，就要从这方面着手。有许多辎重行李，是否只能交给几个人，别无办法呢？弹药、背包是否都交给民扶驴子？对全体动员一下，就可以带走了。不动员自己带，而是交几个人运走，当然就会犯纪律，处分他实在是冤枉。

(三) 行军、设营、作战布置一定要有维持纪律的布置，一定要检查、



收容，负责人一定要多多维持，要说明、预防，不能把队伍丢了不管。如果这样一定有很大转变，干部带头破坏纪律的现象就会消失，个别的现象就容易克服。

（四）政工人员应该负责维纪，军事指挥人员同样要注意维持纪律，而且作用更大，给政治机关及维持纪律同志以帮助，特别是部队高级指挥员亲自动手作用更大。没伏没粮是破坏纪律的原因。没伏可解决，每纵队有二三万人，比几个村庄人多人强，为什么不动员自己的人力，为什么要去逼村长、支书？行军要布置如何自己带走。打仗队伍太疲劳，是一个事实，但现在每次打仗都是准备得好好的，跑出去打，打了回来可以休息，打的是歼灭战，可休整一下，再打第二个歼灭战，不是连续几千几百里的打。有时间可以布置。一个人带两斤粮，就可带二万斤，一个人多背一个手榴弹十发子弹就可以解决了。大家试验一下，依靠群众是可以做得通的。在江西苏区，经常四五万人去作战，也有子弹、炮弹、粮食，但动员了大家来做，军长、师长亲自抬伤兵，还不是一样打仗？现在一个纵队几万人，动员起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相信。黎主席已想办法搞常备民伏、大车，满足前线需要，但要看你如何使用，使用得不好，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二、黎主席代表华东局、省政府作的报告，清楚告诉我们，山东人力物力是强大的，进行战争有了雄厚基础，对取胜有坚强保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也是对这次战役的一个贡献——打通了胶济铁路。华中去年支持了战争，现在山东又增援上来，国民党统帅部已动摇，不得不改组，而我们渤海、胶东刚刚才开始动员，力量还很雄厚。黎主席在山东提出拥军，特别拥护新四军，饶政委提出要拥政爱民，两方面合起来，问题就能解决了。地方要知道军队的困难，特别是对华中部队来说，要体谅；军队要知道地方上很困难，边沿区几进几出，破坏很大，人民负担非常重，我们为人民而战，就要处处为人民打算。有些部队对山东的感情要改变过来。去年美国人

都说“山东好”，因为这里是战略要地，有几个大港口，有重工业，这样的地方在世界战略上都有很重要地位，美国人和蒋要争，我们争到手，是很重大的收获，缺点是没有大米。华中有大米，但要恢复华

中，必须依靠山东。有些战士做打油诗：“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口吃煎饼，手拿大葱。有啥意见？要回华中。”表示对山东没有好感，是要教育的。但也要对山东人民说明，大山东主义也是不对的。一定要在内线歼敌之后，打出去，转入外线去作战，把全部人力、物力拿出来支援战争，帮助山东以外的地方获得解放。因此，对部队、对地方要看不同的特点来进行解释。南面来的说山东人“很脏”，山东人说华中人“头发长”，各找对方弱点，是不好的，要互相尊重。要说服山东农民到主力当兵，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是障碍战斗力提高的，一定要解决。有些部队只欢迎俘虏兵不欢喜解放区的新参军战士是不对的。经过土地改革的新兵，是我们的骨干，要保持一定百分比，不能单看俘虏兵的技术好，简单教育就可指挥，就说好；不要以为参军新兵战斗经验不够，爱讲民主，用命令行事不易领导，就不高兴，只有以他们为骨干，基础才很坚固，我们偷懒讨便宜，将来就会吃亏。渤海、胶东各有一万人来，要求巩固百分之八

十。黎主席在山东十年，贡献最大。他提出的几项指示，希望大家以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也是地方及人民的意见。

三、粟司令对此次战役的总结，野战军几个同志事前商量过都同意，是

完全正确的。但一个报告只能说明主要问题，不可能说明一切问题，希望大家研究补充。我着重重复几点：（1）这次战役可以看出是自卫战争到了新的局势。过去敌人被歼后，一般是拼力保持巩固阵地，阻止我们扩大战果，必须要我们去啃硬骨头，而且很快又布置新的出击。现在就不同了，五万多人在莱芜城一被歼灭，胶济线上一口气就退了几十个市镇，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更不可能立即组织再进攻。过去内战反“围剿”又类似于今天，这种形势还要发展，如果再歼其两三个军，其余敌人还要望风溃退，再组织新攻势更要延迟，我军的战果会更大，收复地方会更多，主动更在我，敌更被动，休整机会更长一些。以前我们要以撤让城市作代价换得歼灭敌有生力量，现在要变了，敌有生力量要继续被我歼灭，失地也要被我收复。（2）这次战役的胜利，是一个战略上、军事思想上的深刻斗争，决定于首脑部门的正确。鲁中战役[4]的胜利从决定放南面开始（即撤出临沂，不在南面决战）。在歼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五十一师[5]后，我们估计敌人要集中攻临沂，王耀武[6]一定有部队南下侧击。这个估计完全对了，以后的布置都如我们预计。而敌人的判断却是错误了。敌人以为我们师土肥原[7]故技，与刘邓[8]夹击徐州，是错误了，以后又判断我们一定要守临沂，在临沂以南有一决战，以为我们不会分兵北上，即分兵也兵力不大，王耀武南下无问题，又错了，直到占了临沂还不清楚。王耀武较警觉，但还以为我们是搞济南，叫李仙洲撤，缩短防线，便利保障济南。这是一个根深刻的思想斗争。现在敌人又判断我们要与刘邓会攻济南，又要开始犯错误了。如果我们佯动一下，更可使敌人犯大错误。他们也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极力想挽救失败，（3）此次我们的作战计划变更七次之多，才抓住了他，是很不容易的。不能说敌人很蠢、不行，的确是很复杂的战斗，经过周密的布置，当时并准备打不到，在莱芜、新泰地区整训后再打。（4）党政军民全体配合，各兵团协同动作，每个人都有一分功劳，所有部队都要记一功。敌人孤立无援，遭受了惨败。（5）战斗胜利是不容易取得的，不要看得很轻易，经过中央、华东局及我们的考虑，经过大家努力及敌人犯错误才取得的，内行要识货。华东自卫战作战，以这次为最圆满，各方面更熟练更提高了。我们要懂得这个艰苦，不识货是不好的。但另一方面，这样大的部队久经锻炼，中央、华东局的考虑，党政军民配合，敌人又孤单又犯错误，胜利也是必然的，不这样认识，就会骄傲起来的。我们不要做外行，又不要骄傲，特别是还有缺点的部队，更要注意，大家贡献都大，但不是那个部队没有缺点，我们整个部署上也有缺点。有的同志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不是计算路程，计算地图，军事常识上的毛病，主要是山地战，担心敌人走掉，要打二梯队，电话难架，战斗分界线难划，山东、华中兵团一起，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谁指挥谁，我们有顾虑，临战很乱。有人说，敌人如果顽强些，我们就会失败。这个意见我不同意，当然困难会增加，歼灭敌人还是可能的。在宿北[9]我还担心，这次则不担心这一点，因为大家都到了，展开了，我们处于优势，他们即算把我们压退了几个庄子，要跑掉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检查缺点，有些未预见到，各兵团必会去检查，但要避免互相指责，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要相互研究，多讲自己缺点，少讲人家缺点，合起来就什么缺点都暴露了，什么优点都发扬了。（6）在这个战斗中，瓦解敌人，联络工作不错。南京办事处[10]的功劳不小。我们谈和平，不撤退办事处，这也是一个好处。像韩练成[11]这种人，将来还是有的，看到人民蓬勃，法西斯腐朽溃败，他们会更动摇。现在一次搞敌人两个军我

有信心，如三四个军在一起，就还要考虑。但战斗愈打愈大，担子也愈担愈重，现在又要加重了，这是大家要检讨来加强的，希望以粟司令的报告为指导原则来检讨。这次战斗布置与指挥及宿北、枣庄之战，粟司令负主要责任，做的工作最多，最负责任。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他对于战役胜利贡献最大。苏中部队对粟司令很熟悉，新四军其他部队，山东部队不大熟悉，特别山东八路军更不熟悉。我这里介绍一番：粟司令在大革命时期是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农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响应党的号召当学兵参加南昌暴动，上过井冈山，当过方志敏的参谋长，浙江游击队领袖。抗战时期为二支队副司令，江南指挥部副司令，在江南江北是负总责，反磨擦黄桥、天目山战斗[12]也是负总责。在自卫战争中，粟司令领导的战略区，表现最好，他经得起考验，作风老实，埋头苦干，成就很大。在军事上，希望大家在粟司令领导下努力学习。今后作战规模更大，更需要统一指挥。野战军工作还有谭副政委、陈参谋长、唐、钟主任[13]领导，战略方针及部队工作，我们是一个委员会来决定，然后交大家做。谭副政委原做工人工作，工人出身，二十六岁当特委书记。内战时期为福建军区政委，福建游击队领袖。抗战后在三支队、六师、二师、华中军区任职，是多年经过严格考验的政治领导同志。陈参谋长对山东建军，组织部队，领导大进军，帮助罗司令[14]、黎主席等方面贡献很大。他大革命时期是青年知识分子，应召入伍到井冈山，一向做参谋工作。拿最近来说，他从北平执行部[15]回来，就帮助一纵整理，在南面牵制敌人，重视部队组织、制度、技术战术的提高。大家要在陈参谋长领导之下努力工作。唐主任原是滨海政委，内战时期当过团、师政委，一向未改行的老政工人员。钟主任在华中一师积蓄八年抗日中丰富政工经验，把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建立起来，保证战斗胜利，成绩也不小。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缺点还很多，要整理加强，大家要在他们的领导下努力。中央要我们采取红四军九次决议[16]的做法，成立各级党委，代替首长单一制，党委决定后交各部门执行。这次政工会议，我们要来讨论这个问题。过去党的组织，变成党务机关，而一切大政方针由军政首长负责。成立党委使首长制有更大群众基础，一切问题尽可能进行反复讨论，决定后由各部门负责执行。这一点要大家保证。

四、关于反对本位主义，集中统一，我写了一篇文章，可能挂一漏万，希望大家提出意见，作为大家执行的一个标准，希望能作为今后建军的一个启发。问题都已提出来了，但不是问题的解决，因此再重复一下：（1）我们就是一个本位主义——无产阶级的一个本位主义、中国人民的本位主义，但部队中所存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放大，是不好的，而革命的本位主义还是要拥护，并用来代替小资产阶级的本位主义，把思想提高一步。我们应关心和注意人民事业的利益，不应该只注意我们这一个单位这一部分，如需我这一部分牺牲就要牺牲，局部牺牲，照顾大局、全体，以人民、阶级利益为利益。我们是人民勤务员，一个螺丝钉，如果不是这样，就要变成人民事业的障碍，违背本心初志。（2）本位主义发展下去，就会出现以下现象：第一，违犯上级领导，不尊重上级，打折扣，讲价钱；第二，对下面养成坏意识，不好领导；第三，对同志就会不团结，怪这怪那，讲闲话。如果本位主义改为革命本位主义，这些问题就解决了。（3）本位主义与党进行长期的现代水平的大战争是相矛盾的。现在中央给我们任务更大，不是一个兵团、一个地区、一个大英雄可以担负起来的，要靠我们这么大部队，还要出一把劲，还要准备第二线兵团，还要其他友邻战略区互相协助配

合才行，任何一个部队、一个地区是不可能担负的。抗战八年的历史，如八路军不南下，新四军得不到这么大的发展；八路军到东北，新四军在华中不来山东，山东也不会有今天这样。自卫战争初期，不是新四军在华中拖住敌人，山东也搅烂了；山东部队过陇海路作战，帮助华中战局也很大。现在光是看到华东，眼光也不够了。因此，大家要有集中统一的思想，要以全中国人民整个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因此必须统一组织制度，统一待遇给养，在这次休整打下基础。因为不是一次可以搞好的，还须让同志们有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这个问题在过去已开始，但很不彻底，大家都有些推，说什么“我们没有问题”，其实却都还有些问题。现在不是追究责任，但一定要搞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是否有个别同志转不过来的呢？可能有的，但我们有准备有办法，不能把大队伍停下来等一个人。由游击战转到运动战，由乡村转到城市，由解放区斗争转为全中国大革命是一个伟大转变，各种组织、制度、办法，都要有新的一套，要转变，是不容易的，要很好研究。游击时代的好经验，看家本领，有些现在不适合了，有些在农村中坚持游击是好的东西，拿到城市可能就错了，不能完全老一套。现在有些部队打埋伏、隐瞒等，就是对整个时局不认识，障碍整个运动的进展，把有用之物，置之无用之地，而不给没有的部队，在客观上是帮助敌人的，因此要加强统一集中，统筹统支。在这次会议后，希望大家搞通思想，踊跃争先做模范。山东还有许多部队无机枪无炮，应该去帮助他们。今后大家对缴获要忠实报告，可提意见报告上级，有优先权得到批准留用必须的东西，一定是抽自己肥补别人瘦，这样才是人民财产由党处理，上级不会抽瘦补肥。有的同志可能说：“过去你不讲统一集中，这次我搞到一批东西就讲统一集中，专门搞我的。”这是不合事实的。谭副政委说在和平时期未想到，未作准备，这话是对的，以后也曾提出过，不过提得不深刻，消灭快纵后才深刻的提出。希望各部队要听党的号召，照顾全局，带头来影响人家，不要观望，不要怀疑猜测，不要讲闲话。过去有同志说“嫡系非嫡系”是完全不对的，是原则性的错误。野战军方面力求照顾周全，但做到这一点也有困难，五个手指一样齐也不好，实际生活总是参差不齐的，必须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加以调整，使之比较整齐，但提高了又要发展，由不完全走向完全，而总是不能完全的。因此，我们只能在可能条件下不断改善对部队的补充，但是补充有先后之分，分量有所不同，决不会有厚薄之别。

五、部队政工制度显得比较模糊，职权不分明，政委制度、政治机关、政工制度等，找一个老战士、中下级干部间却不清楚。有同志说，“组织科是统计科，宣传科是收发科，民运科是伙子科，联络科是俘虏科”，这也反映这方面的缺点。有的政委写条子行不通，政治机关成了“反映机关”。许多材料反映上来，却因许多障碍不能处理，引起许多政工人员不安心。有些政委，专门管军事，管业务，对思想领导，党的领导，保证各部门工作等却做得不够。听说有一个部门政委不能批电报，当上级的通讯员，开会司令不去，叫政委去。今天到会的干部都是党的骨干，如果不尊重政委、政治机关是要改正的。但并不是说过去政委、政治工作没有作用，过去成绩很大，如发扬英勇牺牲精神，争取俘虏，政治机关同志非常忙，起了应有的作用，较之内战、抗战时期的政治工作有新的创造发展；但职权不明，认识模糊，分工不清楚，在某些部队内作用受到削弱，是要改进的。要避免内战时期四中全会[17]以后的偏向，过分强调政治工作高于一切，仿佛只承认政治工作是

党的工作，把它驾凌其他工作之上，强调行政地位如何重要，而未能从民主思想领导入手。司、供、卫也是党的机关，党的工作，政治上是一律平等，政工人员没有什么特别高贵，没有什么突出，战争的胜利各部门都有成绩。政委、政治机关都要注意领导、保证，同时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参加政治工作，执行党的指示号召，各机关要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否则就会变成技术机关。

六、关于军事方面：（1）现在基本战术问题就是要解决步炮协商，做到了这一点则一些主要困难可以解决。内战时期靠步枪、手榴弹，抗战时期靠步枪、刺刀、炸药、地雷，现在则主要靠步兵与炮兵结合，如结合得好，就有足够的把握消灭蒋介石。今后炮还会更多，如何与机枪、步枪、手榴弹、刺刀配合起来，要多进行研究。中央指示还要我们建设工兵，因有了炮，还要有高度良好的道路与作业，才能发挥炮的作用，尤其将来外线出击，更需要每个指挥员特别注意学习，如果这么多的东西掌握不了，就要“让位”，那时就不能说历史老，你“占住茅厕不拉屎”就不行。（2）箝制与突击问题。各个部队总是不愿箝制，只愿突击，箝制到有利时机可以转入突击，有些同志了解太机械。同时要提倡担任箝制的部队，创造生动活泼的经验来提高我军军事水平，这方面我们还很落后。部队受领箝制任务，不仅不抱怨，而且要表现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咬紧牙关完成任务，并创造宝贵经验，如果不是这样看法就是照顾本位。在战争实际生活中，突击与箝制是对称的，都少不了的，当然可以求公平，但也要看条件。如果不愿担任箝制，就不可能把箝制仗打好，或者即使勉强担任也会打得不热闹。缴获少，补充少，主要原因是统一集中问题未解决，今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多补充箝制部队。指挥部队使用上有重点，也是有道理的。所以不要多讲怪话。（3）补充与编兵。补充应该照顾各纵队，但不可能完全平均照顾到，少一点不要拿编制表来讲价钱。在战斗必要的情况下，要能迅速缩编，两个建制合一个，充实力量继续打，这是我们大家要有充分准备的。同时培养主力师、主力团、主力营、主力连，不能平均，这是需要的。如有九个团，三个三千人，三个二千五百人，三个二千左右人。要培养骨干核心，又注意帮助较新一点的部队的提高进步，但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对那个特别爱好，这个问题要讲通。但主力不是行政上规定命令可以决定的，而靠自己努力，不然就落伍，新的部队进步快，就会赶上来，主力就会起变化。全军九个纵队，每个纵队都可以考第一，但也可以落后，问题就在领导与团结，部队历史老、基础好，不是完全决定的条件。

七、整训中的三个工作：（1）政治整训，保证集中统一。思想教育，整顿纪律，最好不消极惩办，即使是惩办一个，也要有群众基础。（2）军事整训。战斗方式是运动战加攻坚、箝制，要步炮配合，演习爆破，（3）军民关系。整顿纪律，求得焕然一新，巩固基础。

#### 注释

[1] 饶、粟、黎三同志，指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黎玉。

[2] 中央政治局二月一日的指示，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

[3] 唐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

[4] 鲁中战役，即莱芜战役。

[5] 歼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五十一师，指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日华东野战军在鲁南峰城、枣庄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和整编第五十一师的鲁南战役。

[6] 王耀武，山东泰安人，当时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

[7] 土肥原·即土肥原贤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魁之一，甲级战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日军以其主张，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津浦线南北夹击徐州。

[8] 刘邓，指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

[9] 宿北，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江苏宿迁以北地区进行的宿北战役。

[10] 南京办事处，由于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由重庆移到南京。一九四六年五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设立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该机构对内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等返回延安，由董必武坚持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其间，对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进行了有效的联络工作。

[11] 韩练成（一九〇八~一九八四），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曾任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进行的莱芜战役的关键时刻，接受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劝告，放弃指挥，对战役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他后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病逝于北京。

[12] 反磨擦黄桥、天目山战斗，即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至六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组织的黄桥战役和一九四五年二月至六月由新四军苏浙军区组织的浙西天目山区三次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战役。

[13] 谭副政委、陈参谋长、唐、钟主任，依次为谭震林、陈士榘、唐亮、钟期光（副主任）。

[14] 罗司令，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

[15] 北平执行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同时颁布停战令。为了执行停战令，由国、共、美国三方代表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于北平（今北京）。

[16] 红四军九次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亦称“古田会议决议”。

[17] 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

## 关于山东战局及军队建设问题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 一、山东战局今后的发展

坚持在山东基地彻底粉碎蒋介石进攻，准备反攻条件，争取战局转变。不轻敌，不害怕困难，承认困难，不急躁，不分兵，集中主力，肃清敌人主力。与各战略区配合，与全国群众斗争配合，推动大革命高潮。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干部发生波动，甚至怀疑领导。重伤兵杀俘虏，不老实，公开对党进行欺骗，违反政策。张灵甫是我们杀的[1]，报告说是自杀的，我们便骗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缴获不报实数，领钱领粮多报人数，大斗进，小斗出。现在胜利一天天接近，如这些问题不进行自我批评，不很好纠正，可能造成挫折，推迟胜利，有遭受严重挫折可能。今天着重讲思想问题，应采取很严肃的态度。革命胜利前进，靠执行党的政策和方针，没这一条，不管本领如何高，还是危险的。

为什么要在山东基地彻底消灭蒋军的进攻？因为山东是敌人主战场，敌军力量集中，加重了山东的负担，造成了许多困难。敌人“看得起”、重视山东，战局比过去严重，但要反复强调我们有把握在山东主要战场上将敌人彻底消灭。西路军[2]到了路西，说那里好。我们不是要分兵，尽管地区缩小，粮食困难，北有黄河，东靠大海，但我们一定要在现地消灭敌人。党要我们这样做，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蒋军自己送来，我们这个方针不能动摇。全体党员在这个方针下行动起来，不怕伤亡，不怕打箝制。如果垂头丧气，精神上便输了。莱芜战役后，中央来了许多指示。只两条，不急躁，不分兵，一定能消灭进攻的敌人。在山东基地消灭敌人，一定要使这个思想在全军中昂扬起来，派兵南下北上[3]，是为这个方针服务的。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消灭敌人，看了困难而埋怨是不对的。在主要战场消灭敌人的力量，便能推动大革命高潮。整个华东军区担负了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可以自豪、兴奋、骄傲，付出鲜血是应该的、光荣的。

敌人现在山东集中兵力进攻，是敌人最后一着棋。其他地区抽出兵来，改取守势，维持对山东进攻，这是敌人最后的仅有的进攻。敌人从豫北抽八个军[4]到山东来，他承认搞东北、搞豫北搞不下，这是敌人最后一点主动，这一点击败了，便是全局大胜利到来了，敌人便要从战略进攻走到战略防御、战略撤退，我们便要转入反攻，胜利便可提前。要从积极方面了解敌情，提出积极办法，不少同志不是这样想法，认为“打了蒋介石，还有美国；其他部分胜利，我们悲观。”过去几个仗没打好，舞龙灯[5]舞了一个时期，以为顾祝同比薛岳强[6]，不知这是蒋介石走下坡路，我们胜利快要到来的表示。即使本部消耗了，对全局说还是胜利的。本部缴获很大，是大家努力的，不只是一个纵队的功劳，要从狭小的圈子、从局部看到全部。今天和蒋介石打便是和美国打，蒋是美走狗，打败蒋介石便是打败美国。根据各方条件，美国还没本事敢冒这个险来直接参战，即使万一来，还不是榴弹炮、飞机，换些美国人，实际他不如蒋介石，更不如日本。如果美军到孟良崮来，不如张灵甫。帝国主义炮打南京[7]，大革命还是开展，后来失败[8]，还是自己搞坏的。日本搞了八年，最后还是失败。美国的原子弹只能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没有一种武器没有御防方法。就全局看，敌集兵力于山东，正是敌人对全局无办法的表现。只要谨慎小心，消灭敌人，我们便能胜利。懂得这个，敌人

不大好打，要多走些路，要遭遇些困难，便没什么可怀疑的了。其他各解放区的伟大胜利，都是与我们密切配合的，敌人虽往我们这边推，愈造成各解放区的胜利；各解放区与我们配合，愈加速敌人的崩溃。我们要担负起与敌人争取主动的任务，要承受困难，不怕吃苦，不怕多跑路，不怕给养缺。

山东战局表现敌人的改变，在其他地区改取守势，新集中二十多万人到山东来；薛岳、李延年、韩德勤下台[9]，顾祝同来，蒋介石、陈诚[10]、美国顾问自己来督战，保密及侦察工作有进步，处罚了很多人；将各兵团靠拢，每个兵团有一个主力配备几个次要主力，互相积极增援，是前所没有的，在敌人是一进步。这是敌人失败后的改变。但这个改变不能挽救他的命运，他的改变是如何避免被歼灭，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不是如何胜利的办法。顾祝同上台时便没有信心，只要不吃亏，便是胜利；避免当李仙洲、马励武[11]。中央社[12]天天说几个星期要解决我们，实际是如何避免他的被歼，怕我们打出去。应承认敌人的改变是一个进步，但不能避免他的被歼，官兵斗志无法提高，蒋管区危机无法解决，不管如何靠拢，逼得不能不散，七二师[13]、七四师无法避免被歼。当初第一线是十个军，三个指挥机关，以为无论如何无法消灭他，他不分开，一下吃他不了，他们颇费了一番苦心，想把我军追到海边，置于死地，自认为妙哉妙哉。结果七二、七四师的被歼，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战局一发展，他便掌握不住，步伐混乱。这是我们两个月的努力获得的。敌人以为我主力到淄博去了，坦埠[14]只两个纵队，敌人企图占了坦埠，会合桂系[15]夺取莒城、沂水。我们路跑得好，将敌人搞乱了，敌人判断错误了。白马关、南北桃墟明明可守的，我们未守。沂蒙线明明可进攻的，我们忽然不打，敌人以为我们在临蒙公路[16]不行了，主力走了，敌七四师孤孤单单的进坦埠。我有力的箝制、佯动造成敌人的错误。箝制与佯动，是今天消灭敌人的重要手段。两个月来事实证明，不管敌人如何改变，都是可以消灭的。此次歼七四师就是伟大胜利，左右那样多队伍，一下抓住七四师，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积极增援的，都被挡住了，这给敌人今后部署很大困难。过去孤军深入失败，这次十四个军[17]紧靠着前进，还是被消灭两个，给敌精神上很大打击。不管如何困难，我们一定能坚持在山东基地。

为什么说争取战局的全部转变？敌在七四师被歼后，可能再调兵，也可能考虑困守一时期，伺机进攻，或就此转入守势，这还要看此后发展。但七四师被歼灭后，山东战局已开始改变了。不能说已取得了全部主动，但已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从开始改变到全部改变，逼得敌人转入防御，我转入进攻，这是一般的趋势。这次敌人进攻，王敬久[18]在西边，欧震[19]在中间，七军等在右边，三个拳头维持其进攻。七四师被歼，去了一根柱子，抽了一根骨头。敌人今天要维持攻势，遭遇很大困难，要继续进攻就要调兵来，还要拿“硬核桃[20]作骨干；如不维持进攻，又如何维持其全国的政治、经济现局？抽兵无可抽，不抽兵又守不住，今天蒋介石统帅部很忙乱，在考虑此问题。现在我们实施中央突破，消灭敌人的信心提高了，两翼打击敌人的信心更强了。但敌人还要调整部署，我们还要准备两个到三个恶战，消灭其二一个主力师或一个主力带几个次要的师，才能造成反攻的条件。东北还是反攻的过渡阶段，我们还是内线作战，应该歼灭进攻的敌人，争取全部战局的转变。不要轻敌，看准了，打击敌人要害。虽然敌军官兵动摇，困难、混乱、颓势，走下坡路，但我们不要轻敌，中国大地主的武装在美援助之下，最后挣扎还是有力量，要经过残酷的战斗；若在六、七、八几个月，消灭



了蒋一、二个主力师带几个次要的师，可转入反攻，但还不能轻敌，以为一帆风顺，从击败蒋介石到消灭蒋介石，还要有一段路程。干部中总有速胜要求，几个胜利后，要求速胜；两个不利，便怀疑胜利的可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是不对的。几个月来的努力，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们由劣势转成优势，还要准备残酷战争，还可能遭受某些挫折，我们要作很好的思想准备，确定要继续歼灭敌人主力，一次消灭一个，搭一两个次要部队，必须要再来几次孟良崮式的战斗[21]，几天不吃不喝，最后歼灭敌人，要准备一个纵队伤亡五六千，伤亡一两千便沉不住气是不对的。不要看伤亡大，要研究如何减少伤亡，改变战术，老办法不改，伤亡只有更大。伤亡大，不是叫，而是改变战术。要战胜敌人，要付出代价，今天有得补，还要准备将来没得补，两个师编一个师，中央在宿北战役时早有此指示。打敌一个主力，要避免另一个主力靠拢；但如果一定不能避免，只有打下去，是短兵肉搏，不叫苦，不埋怨，沉住气，争取胜利。胜利之后要研究如何改进战术。孟良崮战斗是伟大的开始，只要领导研究改变战术，至少伤亡可减少一半。

过去一般原则，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几个月来，一般是先打孤立的敌人，先打弱的，这是正确的。根据目前战局，要提高。一般打弱的，还要连带打强的，但不采取一杯干，而是各个击破。这次在孟良崮没消灭二十五师，集中力量搞七四师，很成功。要以同样方针对付五军、十一师，有机会打两个到三个烂葡萄。现在要收集五军、十一师、桂系的材料，六、七、八三个月要解决这个问题。轻视十一师不对，把羊当老虎打，才不会吃亏，不犯轻敌的错误。思想上要准备歼击敌之主力及几个次要部队，扩张战果，再歼灭敌之第二线部队。不要片面了解毛主席军事理论，只吃弱的。要准备打桂系，打五军、十一师，不让他逃出山东。先打谁要看情况变化，不急躁，不分兵，不忽视目前困难。目前干部问题、粮食问题都有困难。干部困难，造成中下层指挥弱，只有大量培养新骨干来代替老骨干，大胆提拔，只要忠实、勇敢，便要破格提拔，超级提拔。还要从地方上进行新的补充，靠我们耐心教育与耐心培养，每个同志要准备一个代理人，两眼向上是没有办法的；广大俘虏经政治上改造后，可以作为我军中下级干部。解放区经过土改的战士，是我们的骨干。粮食是有困难的，麦子吃不到，夏收还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靠我们不丢粮食和节约粮食。地区缩小，影响军工生产，后方机关、群众疾苦、战士情绪，要清楚认识这些，不被迷住，要向战士讲清楚，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粮食有，只要有人运，有人背便解决了。有鱼，有油、盐，运来能背上前线，还是可解决的。

消灭敌人，敌人进攻提前停止，后方便安定了，困难可以减少。打箝制难住了，是因为没有研究，几万人追求这个目的，一定会发生奇迹。不研究，难住了，不是共产党的态度。箝制战是和胜利不可分的，主要是箝制方面不容易扩张战果，研究得好，箝制方面一样可以歼灭敌人。不仅今天困难较多，须要我们努力，即是反攻实现之时，也还是有困难的。蒋介石内部有些人投过来，转到民主运动方面来，敌人控制不住。但要攻坚，我们部队还不熟练，小据点还可攻，水泥钢筋工事还没搞过，没这知识。外线作战还有困难，无群众搞担架运输，特务横行，有些群众可能跑光，美帝可能放几炮，派些兵到南京、上海，不让我们去，吓你，与你发生个误会，是可能的。他如采取这些办法，也一定要失败。到外线，部队纪律难于维持，还是靠我们谨慎小心，慎重的考虑问题。

与各战略区是互相配合，不能说山东是主战场，其他地区没用了，事实上是互相配合；不能说解放区便是一切，蒋管区人民斗争也是互相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最后击败美蒋。应从全局看局部。应从群众方面看问题。解放区是中国人民伟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其骨干，此外还有伟大的民主运动，两者结合便是大革命，过去打败日本、汪精卫[22]，今后是可以打败美国、蒋介石的。

山东战场上的胜利，不单是山东解放军的胜利，要看到后方五十万人的动员支持。在部队内部特别要强调人民的力量，提倡爱兵、爱民、爱粮食的思想。部队要成为伟大群众运动的一部分，才能更加发挥军事威力。今天如果没有后方成千成万群众的支援，前线是不可能胜利的。有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还怕什么蒋介石和美国？刘伯承同志对慰劳团讲话，说胜利全靠群众。华东野战军要特别强调这点。强调为人民牺牲是光荣的，强调群众在伟大战争中的作用，悲观失望一扫而空，全心全意为胜利斗争。

这是二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大翻身，要继续努力，整个形势可喜可贺；但这不是轻敌，不是松懈我们的努力。

## 二、军事问题

坚决学习毛主席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研究总结战斗经验，打一仗，进一步。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总决战的思想，主张分批歼敌主力，逐次歼灭敌人。每个部队必要时应牺牲自己换取全局胜利，承认不利时的撤退及有利时的大胆猛进，能攻能守，会打箝制，以少胜多，会打突击，以多胜少。学会使用新式武器，步炮协同，大胆分割敌人。提高行军力，不要反对“变化多端”。强调独立自主，又要配合友邻，反对等待和不愿打箝制战。提高战术，勇猛冲锋与发扬火力相配合。对人民子弟、青年士兵，在指挥作战时，要有高度责任心，提高爱兵思想，丢伤兵要提高到责任问题，冤枉打死打伤一个，要引起我们良心上的责备。

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在于主张歼灭战，反对击溃战，从来军事家没有这伟大气魄。主张歼灭战，主张干脆、彻底、完全歼灭进犯军，需要有明确清楚的远见与深刻认识，即是舍得丢地方，方敢大胆撤退，放开两手，造成歼灭战的条件。从来军事家没有这伟大的勇敢，总是要堵住，只能打击溃战，不能打歼灭战。毛主席领导根据地，将敌人引进来，消灭敌人，达到收复失地，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这是毛主席的明智与大胆，不害怕敌人，毛主席的歼灭战，是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总要五六万人消灭四五十万敌人，战役上总是以几倍于敌人的力量打敌人，自卫战争更清楚地发挥了这个思想，七个月来已消灭敌九十个旅。不是片面的以多打少，还有以少打多，以弱打强。具体执行一般是以多胜少，以强打弱，这不仅消灭敌人力量，还要毁灭敌人的军事机构，使其不能恢复起来。毛主席有三本帐，歼灭其主力，打中其要害，摧毁其军事机构。歼灭战是天才的军事思想。说共产党不行，又消灭蒋这多力量，说行，又丢了这多地方，弄得美国人也莫明其妙。这是毛主席根据几十年中国人民武装斗争经验综合研究的结果，变成整套的军事科学，道前人所未道，言人所不敢言。他在井冈山便有这思想，现在达完满地步。华东战场在实施这方针方面有很大成绩。我们要用心研究，打歼灭战，避免击溃战，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以战养战。蒋介石打我们，“孔夫子搬家都是输（书）”我们越打越大，现在问题是容易重复差错。军事斗争是精密的计算，靠估计、计算，天天在变，互相影响，不犯错误不

可能，只要不犯基本差错，不重复错误是完全可能的。泰安夺了蒿里山，又被敌人夺去，孟良崮又重复这个错误。要善于吸取经验，好经验要广为传播。打宿北放走了十一师，打鲁南把冯治安[23]留到现在，鲁中战役[24]搞得快，还可多搞他几个旅。这次可以扩张战果，但没有扩大。这是典型的歼灭战，不是没有缺点的，不能自满，要更好地实行毛主席歼灭战的方针。不要吹牛，以为自己不差，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值得研究。孟良崮打了二百万发子弹，可以少打些，一次战斗有一次经验，不要重复错误。

我们歼敌主力带决战性，吃一个“核桃”等于三个“烂葡萄”，对成败带决定性，要特别重视，不要气馁，要保证完成任务。任何困难要咬紧牙关歼灭敌人，但并不主张冒险主义，拼命主义的总决战思想还是要不得的。各个的消灭敌之主力或次要部队，以我能力大小，解决敌人，继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的力量，求谨慎，求稳妥。战术中，战斗上，不迟疑观望，要勇往直前；战役上要留有余力，战斗一开始，要速决，有决定意义的，要舍得拼。孟良崮战斗是对各部很好的一次考验，证明我军素质是好的，配合不错；另外也考验了过分消耗自己，有些观望的，熬不下来的，有些气馁的。成败只在呼吸之间，千钧一发，要继续考验我们。各兵团首长要自己检讨，多讲自己缺点。

我们要能攻能守，守时以少胜多，攻时以多胜少，后者做得好，前者成就就不大。利用战场优越条件及我军可得机动，杀伤敌人，以至击溃敌人，要在部队内提倡。有些人以为不可能，在精神上便输了。不要忘记邵伯战斗[25]是很好的箝制例子，海安[26]、胶济线的例子[27]。伟大的歼灭战离不开主力的佯动及箝制战，佯动与箝制战常常是打歼灭战的基础。各部轮流打箝制是可以的，不是一定要“祸事”推给你，不能说打箝制决定要亏本，这是机械论，不合事实。拿两三万兵打箝制，为什么不能消灭敌人？以少数抵住敌人，使敌人进攻疲惫时，再以主力出击。如打箝制打不好，打突击也打不好。可以机动，可以出击，不能说两万多人不能打箝制。要继续打歼灭战，一定要解决箝制战问题。进攻可以消灭敌人，箝制也可消灭敌人。一个营箝制敌人一个团，一个团可以箝制敌人一个师，特别是山地战。这次在孟良崮，若不是箝制有力，不能提早拖住增援的敌人，七四师消灭不了。提倡箝制专家，加强班、排指挥，利用地形，打反突击，两翼出击，击溃敌人，此次箝制任务都完成了，今后要提高，更多消灭敌人。有些同志的提法，向敌人低头，是不对的。甚至有些同志不愿干了，说“打箝制打苦了”，也是不对的。吴奇伟[28]承认我们能守能攻，我们要提高。

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但在决定性战斗中，要舍得拼。进行残酷的战争，有些时候不可免要消耗，便要勇敢担负起来，得到胜利，消耗是可以补偿的，否则要所得者少，所失者大。孟良崮战役，十五日晚告诉大家一定要解决，要舍得本钱，不顾借本钱，才保得本钱，犹豫分明危害全局。孟良崮打不下来，敌人便要进沂水、莒县[29]，骑虎不能下背，下了便要被咬死。有些部队初次经过这样战斗，一定要有精神上准备，从各方面准备执行中央及华东局交给我们的歼敌主力的任务。

几次打歼灭战的经验：截断敌人的归路，插入敌人纵深，每每是歼敌的先决条件。宿北、鲁南将马励武归路截断，由西向东打，莱芜截断口镇[30]，李仙洲就擒。击溃敌人指挥机关，分割敌人，各个击破，箝制打增援部队，第一晚包围，第二天晚上最紧张，夺得敌人主要阵地，第三天解决问题，到

第三天敌增援来也没用，或做“输送队”[31]。突入敌人纵深，袭击敌人指挥机关，截断归路，动作要迅速，要搞成很熟练的一套，拿手好戏，还要演他几回。敌人来援更好，便出击消灭他。

要提高部队的行军力，”陈军长电报答答答，小兵脚板拍拍拍。”要强调支援，要歼灭敌人，便要走路，这是脚板比赛，独立师[32]慢了，几乎误事。走路不要抱怨，硬要拖，尽量向前赶，一两个团占领了阵地，后边部队好跟上，师长、团长要走在部队先头，好处理问题，带点冒险性，实际最安全。动作迟缓的部队要引为教训，装备太笨重了，可以组织两个梯队，前梯队只带轻武器，重武器陆续跟上去，民工担架放在第二线。只听见消极的批评，没听见积极的意见，消灭了七四师又要求打仗了，没水没粮，拖得要死，是不可避免的，这总是战争，敌情变化很快，要争取时间，以后可能遇到一个部队被敌人包围，要去增援，或要他自己突围，在内线可能少，但在外线，被敌包围是完全可能的。

要承认“变化多端”，不变只有被敌人消灭。要求一个作战方案，还是几个选一个？常常是后者好；一个决心，常常不合实际，几个决心选一个。为要胜利，不能不变，当初我也反对变，后来便不反对了，变是必要的，被迫应战很危险。要求团以上干部要体察士兵痛苦，但不要盲目，要说服战士，承认四个月来[33]有此变的必要。由于情况变了，要求不变不可能，可以少变，可以少跑些路，但不能不变。要解释，上下一致，不要跟着士兵打吆喝。[34]今天可能打的地方很多，也可能再耍龙灯，使敌犯错误。有计划佯动，常常使敌犯错误。

一般协同动作是好的，不能说危险，突击、箝制都完成了任务，但部队有严重缺点。七四师参谋长说我们攻击精神很旺，但拥上拥下很混乱。气馁、等待、争俘虏、争枪，我没有具体了解，各级自己检讨。

从成绩中找缺点，从缺点中看好处。

基本上要看成绩，提高信心，严重缺点要检讨，勇敢的承认自己的缺点，学习人家长处，可以保证下次仗打得更好。否则，不能胜利。要有全面的自我批评，要让功，将情绪提高一些，不要争功诿过。每个缺点都可能使功败垂成，承认、改正就是胜利。

### 三、建军问题

贯彻大矿地会议[35]精神，健全整体观念，统一集中，反对分散主义，强调爱惜人力物力。两个月来有进步，开始有人注意，比较主动了。当时提出以中国人民的本位主义代替狭隘的小团体的本位主义，但还不够，还有许多严重现象，所以重新提出，不能马虎下去，淡漠下去，还要加强研究《一面打仗，一面建设》那个文件。现在强调几点：

一是胜利品的处理应公平合理。本着以战养战精神处理。缴获多少归个人还是归公处理？归公处理就应该归华东局处理，不应属于哪一师哪一团哪一个人处理。（1）打扫战场不注意，以流血换来的胜利品不能悉数收集，作下次战争之用。六纵队某团搞到二十多万发七九子弹[36]，应奖以一功。一个小小物件都要捡回来，它甚至是无价之宝，要指定部队打扫战场。（2）打扫战场之后，要确实报告数目。本来缴获很多，总要报少一些，存心不良；要求忠实，不要按级说谎，不要怕调走了。（3）处理原则，尽量批准你留用多少人、马、枪，不会挖肉补疮，只要够用，有多余应自动请求拨出补充人家，有责任补充地方，“投桃报李”，“礼尚来往”。（4）公平调剂。（5）

武装地方，武装新的兵团，野战军负担才能减轻，本位主义是不会将革命搞成功的。

二是爱惜民力、物力、粮食，力求节约，纠正浪费。政治机关很少提到这方面的问题，疏忽这方面是不对的。用了多少民工、民兵、粮食要报帐，要管打仗，又要管这些。头脑是完整的，这是我们的战斗力，胜利所必需。常备担架要在战争中教育他们不开小差，有组织进行教育。部队本身担架要建设起来，一个团五十副要切实做，宁可少些兵，少些伤员也便省下来了。将运输队解决，才可节省民力。组织部队运输力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一个因素，不要动员担架民兵当兵，要以重视战斗部队的精神重视这些。搞好了，支前力量增加一倍。粮食是一大困难。不要丢粮、打白条、多报，存粮放在那里不管。军需日用品，后方都在准备。如何运输，分到大家，是复杂的组织问题。

最近开了一次后勤会议，成立后勤部，把各级供给部加强，使部队能拖得动。现在拖不得，没有粮食吃。我们二十年建军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前方指挥员要关心配合后方准备，节约人力物力，战争才可长久支持。各纵、各师要将后勤组织部门加强，能独立解决各部队穿衣吃饭问题。着重在建军中解决这个问题。

此次对俘虏政策的破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放下武器的自由杀害，不多责备，不追究责任。要推动全国革命高潮，必须认真执行俘虏政策，有些同志不相信俘虏策反成绩，甚至害怕，有的又认为很好。解放战士在火线上立功是自卫战争胜利的标志之一，他们是被压迫的人民，革命部队的亲属，只要争取教育便可变为自己人，不可动摇这信心。但又要了解他们受国民党影响很深，坏分子杂在里边，战争的残酷，会起变化。四个月以来，俘虏暴动者几十起、几百人，要引起很大警惕。有的专喜欢俘虏，不喜欢解放区战士，这是偏向。部队各种成分要保持一定比例，要有领导骨干。只要解放区战士不要俘虏，也是偏向。要保持两套。

孟良崮丢伤员最少，丢了伤员数目虽不多，但丢了一个也不好，救护小组，团担架排，师、纵担架连、营要巩固，战地群众就地抢运，不让丢一个伤兵。

战斗之前应讲清楚，要对人民负责，讲求战术，不是以血去泼；谁丢了伤兵，谁负严重责任。师、团、营、连长为什么不能背伤兵？人总是贵重的。过去丢过伤兵的，要检讨，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不能光讲下面不负责，我们有责任，实际办法要解决，伤兵抬不下来，不能巩固士气，要分段负责。当然为避免整个部队被歼，跑出时丢了伤兵，这是万不得已，也只能是例外。要以关心我们自己生命的精神，关心我们的战士。

俘虏不能自由的放，轻伤兵在内，一个也不放，重伤兵要上药送出去。泰安也随便放，用那样大的力气抓来，为什么随便放？蒋介石如果没有干部和士兵，看他如何反动！怕一时疲劳、麻烦，更大的疲劳麻烦还在后面等着你。一日纵敌，累及子孙。六纵放走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团级正精强壮，反动有劲，最嚣张。对俘虏不要伤害其自尊心，争取说服为我们服务，消除对立，对立只是障碍，要启发其阶级觉悟。

三是弹药各纵队内部要互相调剂，然后根据确实数目进行全野战军的通盘调剂，后方要彻底清理。

四是提高胜利信心，巩固团结。提高信心，一部分同志还恐惧美国原子

弹，怕蒋介石主力越打越多，对残酷战斗认识不足，报请思想又在开始抬头，要迅速克服。

巩固团结，各纵队间，各纵内部上下团结，军民团结着重于部队内部的团结。要很好检讨自己为什么没有打好，学习人家为什么打好的。批评人家指挥错误，首先要检讨我们自己指挥上有什么毛病，严格自我批评，便能巩固团结。自我批评不是打击人家，看人家缺点也要看自己缺点，看自己长处，也要看人家长处。连续胜利中，暴露弱点不是泼冷水；遇到困难，要支持他克服困难，改变困难环境，当然屡教不改的便不在原谅之列，而要予以打击。对敌人，对自己长处与缺点，要有正确的态度。胜利中的困难，前进中的缺点，是容易克服的。全国共四十多个纵队，五百多个团，责任非常重大。提倡老实、负责、认真、艰苦的作风，不偷、不装、不吹的作风，“满瓶水不响，半瓶水响叮当。”要服从领导，执行命令，不要造成困难，努力开辟胜利的条件。

反对各种偏向，但我们基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战略路线是一致的，团结是很好的。仅是有些问题想法不同，如对美国看法、战争的长期性、打强打弱等，要提高认识统一认识。

#### 注释

[1] 张灵甫是我们杀的，指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一部，由副团长何凤山率领冲至孟良崮山上敌整编第七十四师指挥所隐蔽的山洞口，向洞内开枪，敌师长张灵甫等被击毙。由于当时野战军指挥部提出的口号是“冲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故假报了张灵甫是自杀的。

[2] 西路军，华东野战军攻克泰安后，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战机，以第一、三、六等三个纵队沿津浦路西侧南下，进击路西之宁阳，以威胁敌之补给基地兖州。这三个纵队即称“西路军”。

[3] 派兵南下北上，泰蒙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决定以第一、第六两纵队插至鲁南敌后，以第七纵队南下苏北。后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令第一、第七纵队停止南下，回师北上。

[4] 八个军，放军除第五军外，其他各部均相当于军的整编师。

[5] 舞龙灯 陈毅在华东战场提出的一个在运动战中为创造歼敌战机而调动敌军的战术用语，就像在民间舞龙灯时，一人在前挥舞圆宝（彩球），以吸引大龙左右浮游上下翻滚一样。

[6] 以为顾祝同比薛岳强，由于连续遭到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沉重打击，担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薛岳于一九四七年三月被撤职。国民党撤销了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组成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的部队，开始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有人以为顾比薛强。

[7] 帝国主义炮打南京，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第六、第二军打败直鲁联军，攻占南京，英美等帝国主义为保持其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利益，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于当天下午二时半下令停泊在长江中的英舰一艘、美舰二艘开炮轰击南京下关，制造了“南京惨案”。

[8] 后来失败，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利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先后叛变革命，造成大革命失败。

[9] 薛岳、李延年、韩德勤下台，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因连续战败，撤销了以薛岳为主任，李延年、韩德勤为副主任的徐州绥靖公署。

[10] 陈诚，当时是国民党参谋总长。

[11]避免当李仙洲、马励武，李仙洲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一九四七年二月在莱芜战役中被俘；马励武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一九四七年一月在鲁南战役中被俘。这里是指避免当解放军的俘虏的意思。

[12]中央社，即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

[13]七二师，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山东泰安被歼（欠一个旅）。

[14]坦埠，在山东蒙阴通往沂水的公路上的一个小镇，曾是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驻地。

[15]桂系，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国民党广西系统军队。

[16]临蒙公路，由临沂通向蒙阴的公路，贯通沂蒙山区，战略地位重要。

[17]十四个军，其中除第五、第七军外，其余均为整编师。

[18]王敬久，当时为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统辖整编第八十五、七十五、七十二（残部）师和第五军。

[19]欧震，当时为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统辖第八十四、六十四、二十、十一、九师等五个整编师。

[20]硬核桃，当时华东野战军谑称国民党军中战斗力较强的精锐部队为“硬核桃”，弱的为“烂葡萄”。

[21]孟良崮式的战斗，即孟良崮战役。

[22]汪精卫，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十二月逃赴越南河内，发表“艳电”，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一年三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头号汉奸，并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效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逝于日本名古屋。

[23]冯治安，国民党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下辖整编第五十九师和整编第七十七师），一九四七年一月鲁南战役时，因见整编第二十六师和整编第五十一师被歼，迅速撤退，未能就歼。

[24]鲁中战役，即莱芜战役。

[25]邵伯战斗，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部队据守邵伯、乔墅一线阵地，抗击由扬州北上的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五师两个旅在飞机、炮艇配合下的疯狂进攻，血战四昼夜，歼敌二千余人，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26]海安，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一部在海安及其以南、以西地区组织运动防御，抗击国民党军六个旅分由如皋、姜堰的进攻，歼敌三千余人，保障了华中野战军主力的休整待机。

[27]胶济线的例子，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第五十四军由青岛沿胶济路向西进犯，山东军区部队以一部兵力沿即墨公路两侧山地，采取运动防御迟滞敌人，一个月内先后歼敌四个营。

[28]吴奇伟，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29]沂水、莒县，这一带是当时山东解放区的后方基地。

[30]口镇，即吐丝口，在莱芜城西北。

[31]做“运输队”，敌军进攻，其武器装备被我缴获，有如我军的运输队。

[32]独立师，即原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

月二十日胜利突围到达苏皖解放区后，改归华中野战军序列，以后华东野战军成立，编为独立师，归第一纵队建制。

[33] 四个月来，指华东野战军建立以来。

[34]打吆喝，四川土话，叫喊的意思。

[35] 大矿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三月，华东野战军在莱芜战役胜利后，在淄川大矿地地区整训时召开的干部会议。[36]七九子弹，直径为七点九毫米的子弹。国民党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步枪大都是这种口径。



## 如何爱护民工与组织民工 (一九四七年六月)

目前在我军前线和后方，日夜有数十万劳动人民替战争服务。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抬运和救护伤员，替军队运送粮食，担任战利品的后运和军用品的前运，同时还要替各后勤部门、各地方工作机关进行输送工作。这样一支由劳动人民组成的志愿劳动大军，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其劳动服务的热忱，其政治觉悟的深刻，其工作过程的辛苦，如风餐露饮，日夜勤劳，还要与美蒋飞机炮火进行搏斗。他们爱护伤员、爱护公物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保证了繁难任务的完成。数十万劳动人民的组织和指挥，逐渐形成系统和秩序，这是一门巨大精深的组织科学，这是在我党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天才的伟大表现，这是我军能保持常胜光荣成绩的有力因素之一，没有这样一支伟大劳动人民志愿运输大军，我们休想战争能够胜利。一个美国记者游历山东解放区，看着劳动人民服务前线的运输队列，深为诧异，他认为在欧美各国从未有此现象，必须军队押解和官吏监督，至少应有巨大报酬才行，否则人民推运着许多重要的日用品和军用物资是难以保障不被损伤和盗窃或私自取用的。至于在其他各国或国民党中国，据该记者亲眼看见，则更非高度强迫命令用尽奴役办法不可能组成这样大的运输队，而且这种运输队是不可能持久的，大批开小差，大批逃亡，大批损坏盗窃贪污是难免的必然现象，只有在中国解放区的现象是非常奇特，这样强大的数十万人的运输队伍，一无军队押解，二是到处推着和运送着主要战争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三是为了防空而夜间运动，四是劳动辛苦，还要冒着国民党飞机炮火威胁，据调查并无成批逃亡和盗窃的现象，人人表现了志愿的劳动服务的高贵精神。该记者最后认为这是解放区人民的民主运动的伟大成功，是突破历史所创造的奇迹。我想这个美国记者的估计和评论是正确的，目前在解放区所进行的伟大爱国自卫战争，只有从为人民事业的真正牺牲和解放区军民服务战争的自觉性，才能获得正确了解，因而这个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不能克服，它的胜利的必然性更可预见得到的。

一年来的自卫战争，出现了各种新事物，广大人民有了各种新的创造，人民运输工作仅是其中的伟大事件之一。各方面的工作和创造需要加以总结，我在此特就手边关于组织和领导劳动人民进行运输问题提出几项意见，作总结工作与进行工作的参考。我不企图讲到全般的问题，我只讲其中几个要点：

第一是改变称号问题。某同志来信，他提议改变“民伕”的称号。他说“民伕”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一种轻贱的称呼，与我们劳动人民服务前线的自由劳动的新内容太不相称，应考虑改变，事实上有不少民伕讨厌这一旧称呼。例如有同志叫民伕同志“夫子同志”，他们即回答：“我自愿上前线替战争服务，不是强迫来当伕的，革命同志就是革命同志，俺不跟你夫呀妻呀的！”某同志又提议改称“民工”，名实才不矛盾。我完全同意这样改称。记得在江西时期，当地人民最讨厌军队喊“老表！老表！”或喊“老百姓！”现在据我个人耳闻目见，山东人民亦讨厌别人喊“老乡！老乡！”大家以“同志”相称，则十分喜欢。我想我军对人民历来采取同志的至亲的友爱态度，

则“民伕”改称“民工”[1]，对当地人民一律以“同志”改称，这是对的。军队对人民采取同志的自家人的态度，这本是我军的传统和本色的表现，这与反人民军队对人民采取压迫者、统治者的粗暴野蛮的态度是两样的。我提议把这改称变为加强军队与人民联系的更实际的步骤。我们应针对实际，进行更多的结合人民的具体工作。应注意到数十万民工同志与部队一起并肩作战，这中间工作的重要性应引起充分注意。

第二是民工的组织与领导问题。对民工同志应有两种照顾：第一种是政治的，第二种是生活物质的，同时注意两者的结合。数十万民工同志们，他们经过八年抗战，经过双减[2]和土改，他们的政治觉悟很高。他们到前线服务，第一关心的是战争情况和受领任务，到部队受到部队全体的欢迎，这种政治联欢首先使民工同志们精神上得到满足，因此一切工作便顺利进行。某部队在初期仅注意到他们的生活照顾，以为这一批民工胆子不壮，受不得苦，老百姓不懂得什么，采取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态度，虽生活照顾很好，结果很不融洽，工作推行困难；反之，某一部队仅仅一些空洞的宣传，不照顾初次加入战争的困难，造成疾病和损害，是令人很痛心的。因此我们对组织民工和领导民工的具体经验是政治教育与生活照顾两相结合，不仅要多方关心民工同志的日常生活，如饭要吃饱，有房子住，疾病要医治等，还要认识把数十万民工同志服务前线，等于进入人民战争的学校，这种教育的成绩不仅在于有力支援了目前的战争，而且更要影响到数十年后的人民建设，是可以断言的。这一基本路线应确定下来。据我所知道的材料，指出：一、民工同志们的讲话最能打动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解放战士同志们的感情。部队奔赴战场，成千成万民工跟着进行，他们看到这种情景，许多人兴奋得扯着老战士说：“我们从前到一处老百姓便跑光，你们到处有这样多老百姓帮忙，难怪你们打胜仗，怪不得我们一打仗便被抓过来。”新解放战士受了伤，民工同志抬下来，端茶送饭，问暖嘘寒，伤员感动的说：“你救了我的命了！你是我的恩人！”民工同志说：“怎么我是你的恩人？你打仗负了伤，打垮反动派，你救了我一家子！你才是我的大恩人！”这便使军民的阶级情感很自然的联在一起，这最能迅速提高解放战士的觉悟，深切了解参加人民军队为人民利益作战的光荣本质，深切认识人民力量，而更加提高胜利信心，迅速促进其转到人民方面。二、民工同志们对伤员的爱护。他们一付担架五个人招呼一个伤员。胶东在武昌部队服务的担架队内，专门进行了爱护伤员运动，曾经深入的进行了为伤员服务的教育，提出“晚上担架员，白天看护员”的口号，提倡“五快”运动（集合快、吃饭快、睡觉快、走路快、转运快）。他们以爱护伤员的成绩为立功的第一个目标，他们买了三次鸡蛋给伤员吃，买了瓢接伤员大小便，遇到飞机先把伤员隐蔽好，抬时要平，放下要轻，总是关心减少伤员的痛苦。给伤员东西吃先问医生，伤员不能讲话的不多讲，能讲不谈家常而谈国家大事。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伤员，最能给伤员同志们以精神安慰和物质照顾，这是最好的创造，解决了转运期间伤员同志的各种繁难问题，补救了医务救护的不足。三、民工同志们从前线服务期满回到后方，他们觉悟又提高一步，见多识广，眼界开阔，在其本村本乡每每成为该地的最有力的战争支持者和组织者，成为土改复查和生产最积极的参加者和骨干，经过他们还把战争力量更雄伟的组织起来了。四、许多民工同志们由于短期在前线服务，经过他们的头脑，目前已发现了对救护物资、搬运伤员、运输粮食等专门业务的研究和创造，他们发明出许多又节省又合理的办法。

例如有运输任务则担任运输，无任务则进行居民政治工作，并附带帮助居民生产，如收割等工作，不浪费工作时间，是值得称赞的。我军指挥员和共产党员应向他们学习，切实协同民工同志们去作民工支援前线的专门业务研究。我想，最大的成绩和宝贵的经验是在等着我们的。因此，对部队担架，对常备的民工担架，对临时就地动员的人民担架，对部队的民工车辆运输队、民工大车队，均要求按照规定数目，加以切实巩固。战斗结束，应计划民工运输队的整训，列为部队整训项目之一，切实总结经验，解决一切繁难问题。

第三是对民工同志们自愿参军问题，一律依照政府规定，服务期满即欢送回籍，不得破例动员。事实上，民工同志回家以后，他们带头参军，比在部队中即行入伍作用更大更好。

第四是民工同志的政治待遇、物质待遇问题。应在民工同志们中进行立功运动，应按照民工同志组成的特点，进行系统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大批民工英雄之出现，必更能加强军民之结合。民工同志的物质待遇，其随军民工队应与部队同志享受相等的待遇，短期常备民工队则斟酌满足其应有的需要。

第五是提倡部队与民工的互爱运动。民工队中爱护伤员的运动正在开展，部队同样要进一步爱护民工队，应把民工队视为部队的组成部分，他是有力的战斗结合，无论行军作战或整训期间，均应列入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项目之内。除生活上必须妥善照顾之外，应就可能，民工队和部队进行互相参加会议和互相汇报工作，互相照顾。战利品应适当配给民工同志，战斗紧急时，战士负伤，民工同志奋勇拿起武器加入战斗，应即批准，但应特别加以指挥，关心其突进，以减少伤亡，以表现部队对民工同志的特别关切等。

第六是反对任意使用民工和浪费民工。自卫战争初期，我们部队内曾在这方面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经过几期休整，已有转变，逐渐走上轨道，个别浪费民力现象还须加以克服。人民力量虽是丰厚无穷的，但必须有节制的使用，才能源源不断，长期供应战争，否则便有枯竭危险。现在已有不少部队注意到具体计算使用民力的限度，不多要，不滥用，适当分配任务，科学的有组织的使用，并适时予以休整机会，这是很好的。但还要进一步，提倡部队自己劳动，一切可能不用民力的，尽量以自己劳动解决，我们自己多劳动一分，即减少浪费一分民力，帮助群众劳动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要普遍做。从各方面节约民力，培植民力，不仅足以亲密军民关系，也是不断增长战争力量、战胜敌人所必需的。

我们正进行着中国历史上直古未有的大战争，面对着具备现代装备的敌人作战，我们所依托的农村，其经济是分散的，交通是落后的，能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基本上是靠进步的人民加上党的科学的领导，因而一切粗笨的落后的工具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样在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的控制下，便能创造出出乎人意料的成绩。解放区的人民民工队服务前线，解决繁难运输问题，支持战争获得胜利，实际上就是伟大民工运输队的缓慢速度打败了国民党所依靠的美式飞机、汽车、海船和火车的现代速度。因此，我们应该更深刻觉悟到和领会到坚决的实际的依靠伟大的进步的人民，科学的转动和启发千百万人民进步头脑，创造新的智慧，已经打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加汪精卫，再打败一个美国帝国主义加蒋介石是不成问题的。伟大民工运输队的创造只是解放区战争的新事物之一，我们还可以列举下列事项，例如对反人民军队进行歼灭战的伟大军事艺术的创造问题，例如争取数十万过去国民

党兵士加入人民军队作战的政治改造工作问题，例如数十万野战军的立功运动与英模运动相结合问题，例如解放区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的伟大土地改革问题，例如伟大的战时财政经济和人民生产的结合问题，又如解放区伟大的军民团结互爱问题，又如在蒋管区坚持游击战争保护人民利益的伟大斗争和蒋管区伟大的人民民主运动，这些新的创造，均是在击败日寇以后，又面临新的爱国自卫战争中的新创造。因此，依靠落后的工具和落后的物质条件，依靠进步的人民，依靠党的科学的领导便足以战胜现代化的敌人，而以进步的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为杠杆，每一方面均值得细心研究，细心总结，求得更大规模提高，这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所亲手做出，所亲自开辟，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胜利道路。

注释：

[1] “民伕”改称“民工，夫（伕），旧指从事体力劳动或被役使的人。尽管陈毅当时公开支持将“民伕”改称“民工”，但人们长期受习惯称呼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改过来，以后叫“民伕”的还是很多。

[2] 双减，即减租减息。

## 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

华东一年多的自卫战争没有做过详细的总结。在太行、在晋察冀中央局报告过一次，这里又要我报告。我讲的没有系统，用漫谈的方式，希望同志们听了研究纠正。大的战争考验是严峻的，局势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事前无准备，吃亏不少。在晋察冀的情况也差不多，坏的现象应有尽有，当然好的现象也差不多。个人的经验教训很少，有些经验教训是很痛苦的。我们山东报纸多登好的，主要是打气，我们坏的地方更多更严重，错误也不断。依靠个人的自信心是很成问题的。战争不是容易的事，个人的作用很小，微乎其微，主要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党、靠群众。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叫做“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分下面八个问题来讲：一、战略问题；二、战役问题；三、战术、战斗问题；四、政治工作；五、后勤工作；六、反攻和新区情况；七、国民党方面的解剖；八、结束语。

### 一、战略方面

(一)一年来伟大的自卫战争总结，首先是战略总结。战略是敌我双方的思想战，精神战。毛主席与蒋介石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毋悔”。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许多国民党的俘虏兵都说：“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俘虏的将军师长、旅长等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对我们部队看不起，认为我们军队不懂军风纪，武器杂乱，甚至连口令也叫不好，有时闹出笑话。他们说：“你们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有些不服气。我们回答：“不管怎样，总是把你们俘虏来了。”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我们的战略有世界意义，在世界上是崭新的、优秀的。如果我们军队再能把战术提高一步，配合优良的战略指挥，在世界上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军队。

我们俘虏的国军士兵，现在有的已当上了排、连长。他们有一个普遍的呼声，要求我们改善指挥。说：“你们的指挥是‘肉弹主义’，采用集团冲锋，英勇固然好，就是要多死人。”我们为此抽了一些班长当兵，排长当班长，连长当排长，营长当连长，团长、旅长当营长，组织两个营作战斗演习。许多团、旅长甚至纵队司令员因长期打仗，平日很骄傲，一演习战术都不行，旅、团长不能当营长，连长不能当排长，排长不能当班长，暴露了我们战术上许多严重的缺点，这样使我们很多指挥员虚心了些，知道自己的战术不行。现在部队提倡学习战略，由此学习战役、战术，提高战术战斗动作。这对部

---

一九四七年冬，陈毅奉命到中共中央开会，途经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到陕北，应以上各中央局和军区的邀请，分别作了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的报告。本文是他在晋绥对敌斗争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记录稿节录。编者在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订正。

队是重要的。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七月，华东野战军伤亡七万人，到现在约有二十万人，这表现了我们的英勇，也说明了我们的战术战斗的蠢笨与落后，伤亡很大，否则伤亡是可以减少的。直到现在，我们仍保持北伐时期的战术，采用波浪式的集体冲锋。

（二）我们的战略战役问题表现特别突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全部消灭敌人。即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四面包围消灭敌人，以此改善我们的装备，改变敌我形势，到一定时机转入反攻。采取这种战略方针，要舍得丢地方，抛出空间，争取时间，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以退为进，先退后进，逐渐改变敌我的形势。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基本方针和战争全部过程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如华东战场，我们把敌人诱入山东，一直牵到胶东烟台那个牛角尖上。西北战场诱敌进到绥德、葭县[1]，冀鲁豫战场也是三进三出[2]，敌人进到黄河沿岸，甚至渡河攻占大名府[3]。敌人不断占我们地方，他们的有生力量也不断被我们消灭。他们每进一步，占领我们一个城镇，必须付出几个旅的代价，反复如此。这中间是有矛盾的。但到一定的程度，敌人后方空虚，进攻不得不停止了，我们跳过来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进入反攻，敌人便处于被动，掉在我们反攻大军的后面。整个战争过程就是出让地区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敌我思想斗争也就是这一问题。战争的复杂奇妙为古今中外所未有。

这是个新问题，但也是个老问题，我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武装斗争就是这个问题。在苏维埃内战初期，井冈山时期，这个战略思想就开始形成了，就有了一个草稿，一个大概的轮廓。在北伐时期与今天不同，北伐时是一往直前，没有后退的。北伐军一直前进，北洋军阀一直垮下去，因为当时敌我形势不同，北洋军阀非常腐朽，北伐军异常精锐，能够一往直前，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以农村条件和有新式武装、依托城市的敌人作战，就出现了这个战略方针。敌人进攻，我们后退，再进再退，必要时我们退出井冈山，另建立根据地。因为敌人是强大的，有现代化的武器，又依据城市，经济力量比我们强，我们革命军队是处在农村，由工农和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组成，没有正式军队，也不懂军事，见敌人就打，硬碰硬非失败不可，敌人恰恰希望我们这样做。敌人集中又有准备，我们先让他扑了个空，使他们精神松懈了，防备不周，如能打则打，不能打时，让敌人再进，又扑了空，精神更加松懈了，造成我们有利条件，我们即可将他消灭，壮大自己，又削弱敌人，这样我们“胖”了，敌人“瘦”了。毛主席以十六个字概括这种战略思想，即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年来自卫战争并没有出这个范围。敌人进攻是因他强大，我们不能和他硬拼，不明敌情是不能乱砍刀的，一定得往后退。敌驻我就乱打冷枪、摸哨、破路，使敌人不舒服，精神疲乏。敌疲劳了，我们休息好就打他。敌退我们就追击，收复失地，打开新地区。这种战略方针，主要是研究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最后才可消灭敌人。这是中国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唯一办法。研究了苏维埃内战时期广西、赣东北、湘赣红军的经验，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此。广东海陆丰不照这个规律，虽然那里的农民条件很好，还有南昌起义及广州起义的部分军队参加，但是最后还是垮台了，失败得最惨，就是因为打硬仗，不愿离开海陆丰一步，当时他们认为见了反革命不打就是机会主义。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地方主义。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

当敌人进攻到非要离开根据地不可时，井冈山可以不要，另去开辟根据地，保持有生力量，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叫做“后发制人”，准备好后再打，是与历来旧军事思想“先发制人”不同的。

长沙战役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江西苏区大规模的内战“围剿”与反“围剿”，使这一战略内容更丰富了，原则更扩大了。那时提出“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不怕苏区被敌人占领，不怕坛坛罐罐被打烂，使敌人深入以后，再聚歼他一部分，结果是国民党军之张辉瓒、蒋鼎文、毛炳文、朱绍良[4]等部都先后被我消灭了。因为敌我强弱条件未变，我们唯一的长处是政治条件，即群众条件。将敌人引入我熟悉的地方，敌人的长处变为短处，才易最后将他消灭。那时有人从莫斯科回来，硬抄教条，强调苏联“消灭敌人于国门之外”，结果失败了，全部苏区被搞掉，几乎全部红军都被消灭。实际上苏联也并非机械的实行“消灭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次苏德战争也是诱敌深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来消灭敌人，因为当时希特勒统治整个欧洲，他用整个欧洲的力量压在苏联身上，也是敌强我弱的形势。

抗战八年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比国民党更强，我们战略“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利用我们的长处和农村环境，以疲惫敌人，进而消灭敌人，求得敌我形势逐渐改变。现在革命形势不同了，我们提出基本上是运动战的方针，其原则仍不变。这次自卫战争的指导是综合了苏维埃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一年多证明这一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古代军事思想也有过这一战略思想。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为说明他的战略思想，曾引用《左传》一段话，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主张后发制人，以退为进。《水浒》中林冲与柴大官人的教头比棍，教头骄傲轻敌，林冲先让他打几棍，看出他的弱点，结果一棍将教头打倒。拿破仑进攻沙俄，五十万军队一直进到莫斯科。当时库图佐夫主张一直撤退，甚至把莫斯科也烧了，等冬天一来，转入反攻。拿破仑五十万大军最后只有五万人回到法国。燕国攻齐，一个多月连下七十三城，田单守即墨守了三个多月，燕国攻不下，军心松懈，齐转入反攻，一个多月收复全部失地，消灭了敌人。淝水之战，秦苻坚出兵百万，都是骑兵，吹牛说：“投鞭可以断流”。晋兵只有七万人，谢安、谢玄选择淝水地区为战场，那里遍地皆水，骑兵无用，一打即垮。秦兵百万，前面的被打垮了，后面的还在长安未出发，互相践踏死的不少。毛主席是研究了敌我强弱、政治条件、气候、地形等条件，得出这一军事思想，并将他完成一个体系，写成学说，成为有系统的科学的军事思想。这次战争运用的更广泛更复杂。执行这一方针不是容易掌握的，且为一般人不易理解。这里讲几个故事：

一是美国人。去年六月底，驻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克里门将军到临沂找我，他自吹牛皮法国登陆有他，北非登陆也有他。他希望我到青岛与反革命王耀武[5]见面。我拒绝去。他说：“那么战争非打不可了！”我说：“不是我们要打，是国民党要打；我们是不打出去的，如国民党要打进来，我们一定要应战。如果你真有调解的诚意，去跟国民党讲，只要国民党不打就行了。”他又问我：“战争打起来，你们有没有把握？”我说：“初期，两淮[6]、临沂要放弃，甚至张家口、延安也可能失守。”他问为什么？我说：“国民党力量大，你们美国又帮助他。”他说：“那你们何必打，讲和算了。”我说：“不然，半年以后形势会完全变化，我们会打垮他。”他进攻两淮，我们可

消灭他多少，进攻临沂，可消灭他多少，进攻延安，消灭他多少。最后他晃着肩膀说：“我不懂，你们又要丢地方，又要消灭敌人，中国问题真复杂！”我说：“占领临沂不容易，进来就退不出去。”毛主席这个军事学说全部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军事特点，是外国人所不能懂的。最后我又告诉他：“现在你不懂，一年以后你就懂了。日本开始也是不懂，八年以后懂了，要他无条件投降”。

二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当我们失了张家口、两准时，他很着急，恐怕我们要失败，但在三个月后，他承认了错误，说我们不守张家口、两淮是对的。

三是自由主义的新闻记者。有上海和武汉两个新闻记者，他们也许是自由主义者，也许是左翼。在克里门走后第二天找我发表谈话。我说：“现在要打仗了，不发表谈话了。”他们要我谈战争，我把和克里门所谈的问题谈了，他们大吃一惊，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是真话。”他们说：“这样动摇人心，民主人士会不干了。”他们正在宣传我们会打下徐州、南京。我说：“没有办法的事，第一年人心动摇，第二年人心巩固，第三年人心欢喜！”他们以为我骗他们，是为着保守军事秘密，我叫他们今后看事实就会了解我讲的是真话。实际上这个道理是很难为人了解的。

四是汉奸郝鹏举[7]。他叛变前几天来找我。他说：“延安报纸说消灭这么多敌人，俘虏这么多军长、师长和旅长，我认为是战役、战斗上的胜利；蒋介石已占领我们二百多座城市，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意思是我们不行，蒋介石靠得住。我说：“我不是军事教员，但是许多军长、师长让人家抓去了，不会与战略无关，世界上没有这种战略。我们失去的二百多座城市很快就可恢复的。”他不相信我的话，回去后没几天就叛变了。

这种战略方针只有革命人民、革命政党、革命者才能了解的，对其他人是说不通的。苏联武官在三个月后就了解了，所以他承认了错误。这种战略有国际的意义，对近代军事学说有新的发展。苏德战争也可得到证明的。但他不是万灵膏药，而是人民的军事学，革命的军事学。单讲两个军队，弱军可以用这个办法，两军相等也可以用这个办法，主要是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的。若是我为绝对优势、敌为绝对劣势，就不用这个战略方针。就像大人和小孩子打架，一下把他抱起摔到地下就对了，用不着先退两步再去打他。我们与国民党比，军事上相对的弱，政治上绝对强；国民党在技术上、财政经济上是相对的强，政治上却是绝对的弱，因为他卖国独裁内战，他不可能采取这个战略，若采取了失败更快。这个问题是反革命不能懂得的。

### （三）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几点经验：

第一，反对逃跑主义，表现在一方面是有秩序的撤退，一方面是在敌后坚持斗争。开始执行这一方针，党内多不信任，有很大的震动。逃跑主义表现在和平观念未完全转变，敌人一到，主力撤退，人心动摇，认为敌后不能坚持斗争。说抗日是民族斗争，日本是外国人，各阶层都反对，敌后容易坚持。现在是内战，蒋介石有他的社会基础，地主、富农是他的天然基础，敌人一到，地主、富农就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就站不住脚，地方干部和游击队也站不住，不愿坚持斗争，不管组织许可不许可，从华中纷纷逃跑到山东，不讲纪律，不讲秩序，以为华中不能坚持了，结果到山东没有组织介绍信的，我们坚决要他们回去，不给饭吃，不给房子住，把他们的理论打破。

我们说抗战时能坚持，内战时同样也能坚持，统一战线更有广泛的基础。



今天很多地主、富农和资本家都被蒋介石搞垮了。很多地方土地改革提出“挖蒋根”的说法，是不策略的。蒋介石原来是没有群众的，他硬送群众给他，硬把所有的地主、富农算成蒋介石的是不适当的。他们反对土地改革，但不一定都拥护蒋介石，因为蒋美的政策是毁灭整个中华民族的；蒋军多是客军，是两广、四川人，语言不通，他们把解放区一概认为匪区，到处奸淫烧杀，对地主、富农更凶，因为地主、富农的女人更漂亮，财产多，房子好，他们住在地主、富农家里便乱搞。有些地主说：“我们被清算了！”蒋军说：“妈的皮，你投机！”更搞得厉害。我们调查了苏中几个区的地主、富农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跟我们走的，二是愿意守中立的，认为天下大事胜负未定，不反共也不反蒋，三是极少数坏的，破坏我们，我们就搞掉他。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地形不熟，讲话也不懂，每个军常带几百个“还乡团”[8]。其中也可分三种人：一种是回乡搞点财物，取点底财，赶快回南京、徐州。他们说：“新四军真厉害，住不久。”二种是外乡流浪多年，没有饭吃，老婆、女儿卖淫为生，一回乡马上和农民搞好说：“给我一分土地耕种，我再不反共了。”三种是流氓、汉奸、特务，坚决搞武装破坏我们。由于各线连续打胜仗，鼓舞人心，广大农村还是我们的。国民党的逃兵，我们放回的俘虏，他们都说：共产党又消灭国民党军队多少多少。结果许多“还乡团”都来向我们声明“不反共”。因此我们数百人的游击队，就可坚持一个县的工作。开始从华中撤退时，只留下六个团，每团不过千余人，最近没有主力帮助，大部分地方都收复了，许多乡村没到过蒋军，也说明敌后是可以坚持的。靖江、江都、南通这块地区，经过敌人连续三个月的“扫荡”，但除靖江县委及县大队因麻痹，在一个地方住一个多月不转移受到损失外，其他地区没有受到损失。敌人的区、乡公所始终建立不起来，全在县城里办公。因为蒋军纪律坏，搞翻了老百姓，他没有正规军就建立不起区、乡公所，如每个区都要一营正规军，哪里有这么多正规军呢？所以我们只要在敌后坚持，那里就是我们的。我们在华中暂时退出城市，广大乡村仍是我们的。

有秩序的撤退。我们从华中撤退二十万人，一些必要的器材、工厂、银行、荣誉军人、家属、医院及后方机关、工作干部等，要预先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到枪声响了再撤退是不成的。沿途设兵站招待所，准备好粮食，这样撤到山东的成为很好的宣传者，无秩序撤退就变成流亡政府、难民，散布失败情绪，惊慌失措。他们到山东后把金融也搞乱了。华中票子到山东买东西，商店不要。他们说：“毛泽东出的票子，你们为什么不要？”后来有些伤兵就不用票子，见到合作社就去乱拿东西。

撤退不能太劳民伤财。华中有很多花生油、棉花、粮食，都没有撤退，分给了老百姓。如这些东西撤退，需要一千万民工。因为动员太多，沿交通大道的老百姓有的把大车烧了，牲口杀了，以避免支差。有些无组织的撤退，把钢丝床、沙发以及很多书籍都带走了。我们就组织检查站，在交通要道上将这些东西没收送给老百姓，如老百姓不要就放火烧了。这样把思想问题也解决了。

经过我们组织动员后，有三四万人重回华中敌后坚持斗争。没有回去的很后悔，流亡山东被人看不起，政治上又犯错误。开辟敌后工作比较好的方式是先组织精干的小型工作组。我们中央局、军区[9]组织了好些工作组，先进去几天，就回来座谈敌后的情况，又进去活动一个礼拜，再回来座谈总结经验，再进去就住下了，不回来了。采用这种方式回去好多人。当时我们都

在前线，故有此条件。

第二，关于保卫城市据点，要防止两个偏向：一是拼命死守，寸土必争，另一是不战就逃跑。有的城市要作适当的、必要的保卫，多保卫一些时间是有价值的。这与死守不同，死守是愚蠢的。我们必要的保卫城市是有两种作用：一是掩护撤退，稳定人心；二是争取时间，使我们获得在主要战线上的展开。保卫据点并可锻炼我军的守备力量，使我们一个打敌人十个。但我们是反对拼命死守的，敌人是希望我们死守，怕我们撤走了，不和他们展开真面目的战斗。我们保卫城市与死守城市是有区别的，放弃一地要有一定的代价，不能不战而随意放弃。我们两次保卫涟水，当时有些干部说：“涟水城不过一千五百人口，值不得我们一万二千人的伤亡来保卫。他不知道我们第一次保卫涟水是为掩护伤病员、家属及大批后方机关等撤退，我们伤亡八千人，把敌人打退了，使敌人侵占推迟了一个月时间；第二次保卫涟水，是为争取在侧翼主要战线的展开，使敌人疑为我们主力在那里，拼命进攻，我们伤亡四千人，却造成宿北大捷[10]，消灭敌人一个军。这些干部是没有了解我们的战略意图的。

第三，决战思想，这是小资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急性病的反映。他们认为不决战，拖来拖去将人都拖死了，埋怨领导上为什么不决战，这是拼命主义的表现。有些同志主张要打就先打敌人的主力，不打较弱的。他们不懂得敌强我弱，战争的长期性。敌人是愿意和我们决战的，我们本钱少，一决完了，就没办法。敌人本钱多，有许多的后备力量，我们同他决战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方针是选择有利条件全面歼灭敌人。一个俘虏旅长说：“与共产党打仗真不痛快，要打时，你又走了，不打时，就被你捉住。”决战思想的另一原因，因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头脑发烧，轻视敌人。他不知道敌人只是打伤，还没有打死，不知道敌人力量相当强大，对长期战争没有耐心。两淮战争时，敌人想同我决战，我们没有上当，下边却不断讲怪话。领导上不能放松对这些人的教育说服。毛主席说：“决战要分多次来决。”一次决战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是形式主义的，唯心的。分为多次决战，每次歼灭战都带有决战的意义。如孟良崮之战、莱芜之战、鲁南之战，苏中七战七捷，每次都有决战的思想。像吃梨一样，先把皮削掉了，切成一片一片的吃；你一口吃下去，非把喉咙弄坏不可，甚至塞死。像喝一杯茶，一口一口的喝，直至一杯喝完；如一下喝完，也会把喉咙呛坏。我们对日本的决战是决了八年，最后才把他打败了的。

我们华东野战军开始消灭敌人一个旅算大胜仗，以后消灭敌人一个师才算大胜仗，后来认为消灭敌人一个旅不算什么。有些人看消灭敌人几百人，连战报都不愿写了。毛主席说：“伪军、还乡团、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有些人就要求打敌人主力，不愿打保安团、还乡队，以为消灭了也不算数。实际上敌人的保安团、还乡队是蒋介石的基础，你消灭了一个保安团、还乡队使农民土改能顺利的开展，比消灭敌人一个正规团的意义还大。”有些部队对打汉奸更不高兴。郝鹏举叛变后，派部队打他，他们认为是看不起他的战斗力，倒霉的事情。当时我们发表谈话说：“临沂人士对郝逆叛变非常冷淡”，其实我们真不高兴，你吃了解放区这么多小米，胡子一抹就走了。我们赶快把他消灭了，将他捉回来，比消灭敌人一个正规军影响还大。

我们要打敌人要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强的吃不消，弱的也壮起胆

来了。如先把弱的消灭了，其他同样的敌人就恐慌被歼，强的敌人也变成孤立的，慢慢转为弱的。先打弱的敌人，强敌可以变弱。这是辩证思想，是科学的思想。七月间打十一师[11]没有将他消灭，我们部队撤出来，路上碰到伪军吴化文[12]的部队，也向我们调起皮来了。

第四，集中兵力首先反对地方主义，这对我们有很大的经验。在日本投降时，山东有部队三十万，内野战军五万，苏中二十万，内野战军三万。初期五十万军队，在第一线作战的只有八万人，其余都是分兵把守，地方部队调都调不动。苏中七战七捷是蒋军分散，一个旅为一路前进，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所以打了七次胜仗。淮北敌人把三个军集中一起，不好消灭。双方兵力相等，只消灭他一个旅。后来华中撤退，集中了三十万兵力，经常保持六人打敌一个人，所以有泰安、莱芜、孟良崮等五次胜仗。只保守一个地方，是不行的；主要战线胜利了，其他各地都可解决。撤退到山东，也是为的保卫华中，这点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对集中兵力有很多意见，在厕所里写起诗来：“反攻反攻，退到山东。口吃煎饼，手拿大葱，有何意见？打回华中。”后来他们了解集中兵力的好处以后，又有人批评集中兵力过晚了，不知集中兵力要逐渐的集中，一下子把地方部队全部集中也不好，使地方政权天天打游击，无法进行工作。集中兵力时，在次要方面仍需要留些部队牵制敌人，不可过分集中，最多集中到地方兵力不超过三分之一；要采用割韭菜的方式，不可连根拔掉。

## 二、战役问题

战略方针要战役战斗来实现的，战役是战略的组成部分。一年来胜利和失败的规律：去年七月后，苏中我们七战七捷，后来保卫两淮、打泗县[13]及海安三个战役未打好。初期鲁南打了三仗，胶济线小的战斗很多，大的歼灭战没有。去冬宿北战役后，部队集中了，在宿北、莱芜、鲁南、孟良崮等地五次仗，都打好了。今年七月后，转入反攻，八个仗只有三仗打好了，也只消灭敌人四个团，对局面影响不小。九月在沙土集打好了[14]。以后在陇海路南主要打河南的保安团，六个保安团都被我们消灭了，县长都被搞光。

（一）一年来战争出现这样的规律：“此起彼落”。先打了几个胜仗，又碰了钉子，又打了几个胜仗。没有常胜的将军，没有一直打胜仗的军队，也没有一直打败仗的军队。打了胜仗就骄傲，容易栽斤斗，栽了斤斗爬起来是不容易的，主要是主观上的原因。我党二十余年的历史也是胜败的反复。胜利了便轻敌，种下栽斤斗的因素，失败又有胜利的因素。领导上主要是在栽斤斗之后，如何领导爬起来。如我们在苏中七战七捷后，在两淮、泗县就未打好，经过检讨失败原因，大家虚心了，谨慎了，所以又打了胜仗，接连在宿北、鲁南、孟良崮等地打了五次大胜仗。可是在以后就轻敌骄傲，在七月反攻后，八仗就有五仗未打好。

敌人也有同样的现象。汤恩伯[15]初期在苏中有六个军，他轻敌，结果被我们打了七捷后，他就小心了。薛岳[16]有八个军，初期他接受苏维埃内战时失败的经验，很小心，行动很慢，经常集中三个军在一起，不用无线电，用汽车送信。我们与他们兵力相等，不容易消灭他。且淮北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牛斗牛的形式硬顶。我们后来打泗县没打好，放弃了两淮，他就骄傲了，认为我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大胆进军，结果被我们消灭了几个军。

我们也是这样的，胜利时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人肥遮百丑”，“马瘦则毛长”，胜利后是高兴的很，不容易检讨自己。一年来我们打了大仗三十余次，三分之二打好了，三分之一未打好。战争没有一帆风顺的，是此起彼伏的，三分之一没有打好，没有很好的检讨教训，这主要是主观上的缺点。

我们部队打胜仗要克服骄傲的情绪，打败仗要克服悲观的情绪。由于部队成分复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俘虏的成分很大，有的连队百分之九十是俘虏兵，班长带哨都怕，打胜仗时没有什么，稍有不就就出毛病了，怨言到处发生，你埋怨我，我埋怨你，说什么“嫡系”与“非嫡系”呀！常常以个人观点来代替党的观点，以个人的本位来代替党的本位，骂别的部队不好。华中撤退时，我在会上说[17]：“张家口、延安、哈尔滨都可能丢掉，不然不能胜利。”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当面讲，心里是不服气的，一年后事实证明了才服气。有的坦白说出来“现在相信了，以前怀疑军长[18]犯了机会主义。”去年七月五个仗未打好，下边说怪话的很多。有的说：“司令员的命令要讨论后再执行。”发展到极端民主化。以后打了几次好仗，又说什么“英明领导、天才、地才”。张家口丢掉，有很多人就骂晋察冀的部队不好，小广播乱传。我们说：“晋察冀部队有很多老干部比我们强，不久之后一定能打几个胜仗的。”果然经过清风店、石门、元氏等地的胜利后，许多人的观点改变了。胜利英雄，和平时期的英雄，人人能当，可是在不利的逆境下，在革命低潮的逆境下，能坚持工作是不容易的。

我们部队有些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好像中国革命战争就是他自己打的一样，别人都不在内。我说：“没有华东，其他地区仍可打败蒋介石的。华东不过是牵制敌人一些兵力。”我们的胜利是整个的。胜利的原因：一是我党二十余年来的战略方针的正确；二是野战司令部组织战役的周密；三是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四是人民的拥护；五是敌人犯了错误。不是任何个人与部分的力量所能创造的。就是一个仗打败了，也不是我们胜利的条件都没有了，而是我们主观估计不足，没有组织好。有的部队打不好仗，大家骂，看不起他，干部也不安心。我们不能将整个组织作用看成个人的，也不能以暂时的现象看成长期的。

常常碰几个钉子有好处，失败后的教训是比较多的，可以看见自己的缺点，跌了斤斗要爬起来。毛主席是全国全世界驰名的，他的经验是二十年来受了许多挫折综合总结起来的。毛主席的历史不是顺利的，是受过挫折的，有时为一些人不信任。张家口、两淮失守后，波动大，大家乱骂；临沂、延安失守后，波动就小了；一年后的今天，把从前骂娘的也纠正了。

一年多来战争的难关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今后还有困难，我们思想上仍要有准备。

## （二）战役的准备

第一，决定打一个仗，在事先的准备动员会要开好。在纵队、旅423指挥员会议上作计划，经大家研究讨论，会上发言积极，顺利通过，命令让大家研究后写好发出，且要他们回去召开团、营长会议。大家研究同意了，全体指挥员都了解整个意图，往往能打胜仗。如果有几人不来参加，或会上没有发表意见，发言也不积极，很勉强的接受任务，则仗一定打不好。所以在准备会上一定要很好的动员，使大家都了解战役的目的，只是少数指挥人员知道是不行的，一定要下面大家都知道。如果准备不好，那么干脆不要打，犯急性病是要不得的。

第二，事先要充分准备弹药。敌人一到宿营地就构筑工事，修地堡，搞围墙、鹿砦，一天一晚就可以做好。同时在平原作战，不易隐蔽，且村落很密，村落多有围墙、有碉堡，大都是村落战，攻坚战，巷战，一定要明打，没有什么运动战埋伏战的，所以弹药是很大的问题。司令部要抓住一部分弹药，万余斤炸药，数千发炮弹，不要一下都发出去把弹药乱放光了，以备在总攻时，下面弹药打完了，司令部就可把自己掌握的弹药接济上去，往往能解决问题，刘邓部队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有数次仗没有打好，就是因为弹药接济不上。我们进行一个战役，在相当距离外即布置好，赶上敌人打起来，往往第一、二天是小打，先把敌人消灭一部分，第三天是总攻。如果第三天打不好，那么就撤下来，不要继续打下去了。作战时第二梯队要防止飞机的轰炸扫射，每门迫击炮要准备三百发炮弹，山炮五百发炮弹。

第三，粮食、民工的准备及伤员的救护。消灭敌人一个旅，我们要有一千多人的伤亡，消灭两个旅要伤亡二三千人，消灭一个军要伤亡七八千人；同时敌人还有二三千的伤兵，救护伤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很好的组织，丢了伤员则影响很坏。我们医院经常要保持一万个空床位，有五万个伤员分布在二十余个医院里。我们部队在山东打仗，经常有三十多万人，每日每人两斤粮食，再加上民工吃的，是个很大的数目，一天即需七八十万斤，常常需要二三十万民工，两万辆大车运粮，再加上运炮弹、子弹的，需要很大的民力。所以在一地作战就要烧光吃光的。打孟良崮时因运输供给不上，部队三天没有吃饭，因部队走一天百余里，民工就要走二三天。今年敌人在山东重点进攻，我们部队也集中，吃用很大，不能支持好久，以后不得不分散，因为吃光了，山东虽然富庶，也吃不消。我们作战时，县长、专员、县委书记都成了民工头子，带民工搞运粮食、油盐、蔬菜。幸得我们有几百辆汽车可以运输弹药，抵了大事。现在有的零件坏了，还得修理。

第四，通讯工作，电话网之沟通，战役之前一定要搞好。从野战司令部直通到团部，有时几十里甚至二三百里，需要很多的皮线。电话网畅通，往往打好仗；不通时，往往打不好。这里叫不通，那里也叫不通，你发脾气也没办法。所以电话组织很重要。

第五，接敌的情报侦察与封锁消息很重要。部队包围歼灭敌人，往往距离两天的路程，过近了不好，在战斗前俘虏兵一开小差，就把秘密泄露了，打不成仗。两天的路程也弄不清情况，一下跑不到敌人那里，等他跑到了，我们已把敌人包围起来了。

第六，侧后游击队的配合作战，使敌人摸不清我之主力。

以上条件弄好，打胜仗就有把握。

（三）要打歼灭战。在兵力使用上，要用一、二个纵队截断敌人的归路，从敌人军与军之间大胆的楔入敌人纵深，走入敌人阵地内去包围敌人，使敌人全盘混乱，互相不能联系。这个部队很重要，要精锐的。如把敌人的归路一切断就能打胜仗。

（四）楔入敌人纵深之部队，首先把敌人的指挥部打乱或解决，打乱其电话、卫生机关及八大处，打垮其坦克和技术兵种。如鲁南战役和宿北消灭戴之奇都是这样。

（五）战役上要分割支解，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的敌人都包围全吃，这样吃不下。可先集中力量搞一部，然后再搞其他的。要用吃梨子、削萝卜的办法去分割敌人。如敌人有三个军，先消灭其一个军，再消灭二个军。欲消灭

其一师，先消灭其一旅；欲消灭其一旅，先消灭其一团，不能用一杯干的办法。

（六）造成上述条件后，最后解决战斗，把敌人压缩在一狭小地区，然后用炮打。这样打集中的敌人，容易使敌人动摇缴枪。如莱芜战役，敌人突围被一个旅阻击五天五夜，倒退回莱芜，该城又被我军占领，于是五万敌人挤在一块长二十里、宽四五里的山沟沙滩上，我炮兵一炮打到敌人司令部的骡马队，骡马又跳又叫，全盘混乱，士兵都叫喊：“缴枪，缴枪，老子一辈子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就投降了，战斗总共不过三小时。孟良崮战役也是把敌人挤在三个山头上，中间一个鞍部我们用炮轰，一炮打倒几十个，连山上石头也炸死敌人，敌人很快便缴了枪。

（七）扩大战果。消灭敌人一个军后，整个战线动摇崩溃。这时要不顾疲劳追击敌人，往往以很少兵力可以解决大量敌人，一团可解决敌人一二个团，一旅可解决敌人一二个旅。我们的缺点是缺乏预备队，所以追击敌人部队很少。

（八）箝制，打敌人的增援部队。过去蒋军增援不积极，现在日夜都很快。如果箝制敌人打好了，就可以胜利。但我们的部队是不愿打箝制的，因为不能缴获胜利品和捉俘虏，且要挨打。原因是部队不会做工事，在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轰击下，冲几次便垮下来。敌十一师被我们包围五天五夜，挤在两个村落里，因箝制部队不得力被接走了。

（九）战后处理。战斗完后，往往打枪打炮比战斗时还厉害，有时不敢前去看，往往打死自己人。同志们比枪、比表、比钢笔，争俘虏、争武器、试枪、试炮，打手榴弹，特别是新式武器大家都想试一试，开汽车，数十辆汽车一齐乱跑，冲死人也不管。这种游击主义，不克服是很危险的，无法打扫战场，而且影响兄弟部队团结。主要原因是连、排管理问题，有时干部因几天没休息，很疲劳，他们睡了觉而发生这些问题。指挥员需注意克服这些现象。

我们的缺点：

第一，在战役上扩大战果不大，是缺乏足够的预备队。箝制部队兵力较多，不能连续作战。如部队注意做工事地堡，增强防御力量，能够减少箝制部队。

第二，我们的战役侦察好，但战术战斗侦察，直接的与近距离的侦察很差，有的两三天摸不清敌人的情况。所以以后用捉俘虏和组织便衣队的办法进行侦察。

第三，雨季战斗，我们很吃亏，我们军队没有油布、雨伞，以致战斗时手榴弹潮湿，炮弹打不响。我们这次到豫皖苏，洪水遍地，又没有工兵架桥，往往一天才走二三十里，一晚才走五里路。在雨季时我们最好不作战，可以整训，派出小部队进行游击活动。去年我们在淮北、今年在山东的两个雨季，都使我们打仗不利。

第四，对敌人的研究太差。像晋绥总结汾孝战役[19]的经验，我们那里是没有的。对新来的敌人情况都是用电报问（敌原来驻地的战略区），抓不住敌人的弱点。我们印刷一些对敌人研究的材料，也不过敌人官兵矛盾，进攻力量差，守备可以全做工事，不善野战，一套党八股，多是主观主义的。后来我们把五军及其他部队的俘虏兵组织到一起，指定其中的指挥官，演习他们原来的战术战斗，可以得出其特点。所以要向俘虏学习，不了解敌人的

情况，盲目的进攻敌人，是会造成我们很大的伤亡的。

战略一定要与战役联系起来，我们撤退的地方，一定要歼灭敌人，农村还要控制。战略是以战役战斗胜利来实现的。我们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战术的固定性，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没有灵活性，往往丧失时机。另一种倾向是猛冲，不顾一切，听到枪响就往那里跑，跑上去便打。上述两种倾向各有其特点，前者动作慢，用于箝制敌人好，后者勇猛动作快，用于袭击敌人攻坚好，但要防止其遇到强敌碰钉子，产生悲观情绪。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组织训练两者兼顾的学校，就现有基础上欲达到消灭敌人，主要是勇猛精神。

### 三、战术战斗

战术战斗动作，自己看的不多，听的也少；我现在要说的是战术战斗动作是我们部队当前最大的问题。第一，由于我军多是翻身农民，他们参军没几天，就拿枪打仗，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因为中国人民战争的残酷性，天天要打仗，没有时间训练，步兵战术、战斗动作、内务条令我们都没有研究，更谈不到按步兵操典上所说的去做，甚至连军语也不懂，作报告就是一套“精神训话”，什么“英勇杀敌，打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等”。如果我军能把战术战斗动作提高一步，就可以减少伤亡，革命的胜利就要快些，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就不用二十几年的武装斗争。这要引起我们领导上很大的重视。

当然我军不是不知道战术和管理部队的，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战术战斗动作，管理教育的方法。以前的红大、后来的抗大，是有我们的一套的，但很不够，对目前日益发展的战争局势是赶不上的，不够用的。这话如在前方讲，有些营、团长就会不服气说：“老子当兵十多年，不懂战术，还不是消灭了敌人。”事实上，我们的缺点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我们打仗打三天三夜，消灭敌人二三个旅，打了三四百万发子弹，实际予敌杀伤只有四五百人，你想多少子弹才打倒一个敌人？平均要一千发子弹，太不合算了。我说我军切不要像张勋的军队，他与段祺瑞打仗，打了三百多万发子弹，才打死二十八个人。我们部队打仗是二三百挺机枪摆在一起，乱打乱放，打的子弹真是惊人，把敌人的鹿砦围墙都打垮了。一挺机枪平均打六、七千发子弹，一门炮打三百发炮弹，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怎样打得起呢？我们计算一个迫击炮弹等于二个中农生活费，一个山炮弹等于三个富农，我们不知打掉多少中农、富农了。我们每一个战役战斗都是以血肉和敌人拼，伤亡很大，这对老百姓是有罪的。解放区的老百姓把他们的子弟交给人民解放军，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任。我们的干部不会指挥战士打仗，是以督战精神来指挥战士。一说就是：“操你妈，为什么不冲！，杀呀！冲呀！”乱叫一阵，不知组织火力和使用兵力，只是猛打猛冲，蛮干，伤亡很大，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们有个神圣责任，就是要提高战术，减少伤亡，这样我们才是对人民负责任，不然为什么打了这样多的子弹、炮弹，自己伤亡这么多呢？！

两广军队是很顽强的，是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硬不缴枪。真是蛮子蛮打，非打死不缴枪，伤兵还拿枪打你，伙夫挑起担子逃跑还骂“丢他妈”。你捉他，他放下担子就用扁担打。他不做工事，一到村子，排长就用刺刀在围墙上划几个圈圈（梅花形），以重机枪架起来打，通通通就成了枪眼，十多分钟就把阵地摆好，射击很准确的。他们都是老兵，有些营连长还是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学生。他们把我们看作“异民族”，他们封建团结很厉害，他

们说：“广西人打败仗就没饭吃，打胜仗了老蒋还要我们。”他们的战术好，可是纪律很坏。打开每个碉堡都关着三、四个老百姓姑娘。他们长官也说“只要打胜仗都行”，奸淫烧杀是不管的。我们消灭他一个班打垮一个碉堡，要伤亡二三十人；消灭他一个营，要伤亡四五百人；消灭他一个团，要伤亡近千人，非常吃劲，要付相当的代价。

我军勇敢固然好，就是一排排的集团冲锋，当把敌人冲下去时，牺牲的人也是一排排的。这种冲锋一遇到顽强的敌人，伤亡就更大，说明我军没有很好的战术是不行的。我们有一个营长指挥三个连去打一个村里的敌人，村外是开阔地，不讲究机炮火力掩护，敌人等到我们冲到七八十米远才打枪，冲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个俘虏兵是轻机关枪射手，他看见营长叫“打！打！打！”，说：“营长你叫打哪里呀？”营长没法答他。他说：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营长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并提出要用三挺机枪封锁五个枪眼，他先负责布置，搞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营长就发命令冲锋，以手榴弹打进去，没有一个伤亡，敌人就被迫投降了。这是战术作用。我们的营长不如人家的班长，俘虏兵起了指挥作用，这是我们战术上有缺点的缘故。

第二，组织火力。现在炮兵多了，榴弹炮、山炮、六零炮、轻重迫击炮等，常常炮兵在战斗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我们团、营长使用炮兵是老一套采取近战，实行抵近射击，把炮拉到距敌人二三百米远射击。因炮兵多，敌人用六零炮与机枪就可把我们炮打坏，炮兵伤亡很大。在抗战时期我们的炮少，敌人在孤立据点，则可用抵近射击而有效。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现在有三四百门炮，抵近射击，妨碍步兵的战斗动作。我们一定要用间接射击，把炮拉到一定的距离，榴弹炮十里至十五里，野炮十里或七八里，山炮、迫击炮一千到二千米远。我们的炮兵多是解放战士，你叫他们把炮拉近射击他硬不干，他说：“世界上没有见过这种炮兵，你那套是不行的，我们按一定距离射击，射击不准，杀我的头。”我们指挥员往往枪一响，就命令打炮，但他们不知打哪里。解放战士有经验，炮打得很好。我某部有一连榴弹炮调到石家庄作战，没有赶上，后来参加元氏战斗，指挥员也是叫把炮拉到二三百米远来打，结果打死了几个炮兵，有一门炮的瞄准镜也被敌人打坏了。有时炮太近了，东面打到西面，西面打到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解放炮兵往往几炮就把敌人的工事打垮了。人家是科学的，蒋军被我们俘虏的一个旅长对我们炮兵表示钦佩，又带讽刺他说“八路军的炮兵就是差一把刺刀。”一面说我们勇敢，一面说我们不懂炮兵战术。我们不能满足于老一套的战术。国民党的步兵操典一般的原则是对的，可以学习。我们考试一个连长关于司令部的卫兵守则，他报告半天，要如何提高政治警惕，注意反革命等一套政治讲演；我又叫一个解放战士来讲，他只讲七八条简明扼要的就说完了。

今天我们提倡战术，主要是我们的火器多了，连长要掌握机枪、步枪、手榴弹、掷弹筒、六零炮、手提式、刺刀等七、八种武器，营长要掌握三个连的火器，大小炮二三十门，轻重机枪六七十挺，不讲究战术是不成的。如何使用火力配合，《封神榜》中有万宝囊，要用什么就用什么，也讲组织火力，该用步枪就用步枪，该用机枪就用机枪，该用六零炮就用六零炮。旅、团长掌握火器更多，更复杂

了，更要很好讲究，研究各种火器的性能。如大师傅炒菜一样，分析蒜、葱、辣子不同性质，该用什么就用什么，才好吃。现在我们是一锅煮，光喊



“放枪”，好听是好看，就是无产阶级的无底洞，消耗的不成。我们的火器越多，性能越复杂，一个团世界各国的武器均有，有

日本的，有美国的，有蒋介石的，炮也不同，不讲究战术原则，增加我们的伤亡。我们每团有二三千人，如能很好的掌握武器，在一二千米远外就有很好机会消灭敌人。主要是组织火力要适当，要会使用。而不要样样武器齐鸣，乱打乱放，或是放在一边不用。如一个连长拿上机枪就冲上去，把别的武器都放在一边用不上。如能很适

当的使用，可节省弹药，又解决问题。每件武器一定要用，但不能乱用。

第三，我们部队战斗频繁，整训较少，在华中打了半年，到山东五个月打了五次大仗，战斗一结束马上就转移，中间虽然休整一二星期，也是专门作俘虏兵的政治工作，军事上没有注意。另一方面是干部调动太大，二个月的连长，半年的营长是没有的，团以上干

部伤亡较少，排班级干部伤亡更大。打一次仗，就得换一批。现在

中、下级干部有很多是解放战士，连队的政治战士是翻身农民，如能争取整训一个时期，练习技术战斗动作，弹药是可以节省的。现在强调步炮协同动作，指挥员指挥作战以战术做出发点，步兵、炮兵协同，步炮火力配合好，加上爆炸是很有力量的。

第四，爆炸是蒋军最怕的武器。过去抗战时期，使用手榴弹、白刃战，射击瞄准。现在强调爆炸，在部队是比较普遍的，炸药也很

多，破坏敌人的障碍都是用爆炸。如一组炸毁敌人的鹿砦，二组炸外壕，将他炸垮通过，三组炸围墙，只有十余分钟就可完成。山东部队比较熟练，每个班都有一套办法。华中部队不愿学习。他们说：“打了十多年仗都不用爆炸。”你问他怎样破坏鹿砦，他答：“用斧子砍。”你问他怎样过外壕，他答：“用梯子架起来过。”问他如何过围墙，他答：“用梯子架起来爬。”你说：“这样伤亡要大。”他答：“妈的，老子革命还怕死吗？”但经过长期的教育与实际经验的教训，现在学习爆炸也不错了。

第五，土工作业。过去我们强调投弹、射击、刺杀三大技术，现在要加上爆炸、做工事成为五大技术。

防空我们主观上是不注意的，近来注意了挖防空壕。头天行军进入宿营地，次日敌机就来了，且每次十六七架，这个阵地炸完了，又到那里去。战斗中特别是第二梯队受空炸威胁大，第一梯队因靠近敌人，是不容易炸中的，敌机也不敢乱丢弹。进房子无论如何不成，野外都是平原也不成，只有挖防空壕向地下发展了。因此，没有土工作业是不成的。我们过去没有做工事的习惯，你发给他锹铲他不愿带，经我们提倡土工作业后比较好些。我们部队不愿打箱制，主要原因是不会做工事，没有做工事的知识，做起的也很可笑，用板门加些土就算了，所以防御力量是很弱的，近来我们强调打箱制，创造“箱制专家”，学做工事地堡。一个地堡只用两三人能箱制很多敌人。过去有些同志因为一到宿营地就做工事，明天出发又要破坏，所以做的很少。蒋军会做工事、地堡，如我军学会做工事地堡，他就更怕我们了。信鬼的人最怕鬼，蒋军说我们不会守，因我未做工事故敢来攻，后来知道我们做起工事地堡后，他就不来了，很远地用炮来轰。过去是猛打猛冲，迂回我们，现在先要用飞机大炮轰击，或是绕路走了。为提倡土工作业，粟裕副司令员亲自动手，一到宿营地就领导警卫连做工事，汽车上带着锹，自己挖防空壕。

我们现在提倡野战近战。过去白天是敌人的，黑夜是我们的。现在提出

白天、黑夜都是我们的。过去黑夜打敌人解决不了战斗，天明就要撤退，次日晚上再打时，往往敌人又将昨晚的阵地恢复了，这样再攻损失很大。现在是继续黑夜、白天打下去，一直把敌人消灭。在抗战时我们养成黑夜打仗，那时我们的火力弱，现在我们的火力强了，可以白天打。近战中每次都是白刃战，通过外壕围墙就与敌人拼刺刀。蒋军的刺刀很少，每连只有二三十把，加以夜战，使得蒋军非常害怕。我们俘得蒋军五军官兵说：“我们就是怕你们的刺刀、手榴弹。”问他们，我们有什么缺点。他们说：“你们的缺点是拥挤一团。”我们的优缺点他们都讲到了。我军野战近战很强，火力组织在突破阵地前还好，但在突破阵地后，进入纵深战斗就混乱了，这与我们的战略方针有关，我们是以八九个共产党打一个国民党的，我们要研究用各种火力配合起来组织成交叉与纵深式的火力协同。

#### 四、政治工作

自卫战争一年来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表现在溶化俘虏，昨天放下武器的蒋军士兵，今天就拿起枪打仗，且打的不错。立功运动，评功庆功，评定伤亡，评定战术，团结解放战士，加强老战士与新战士，人民战士与解放战士的团结，组织救护伤员，组织民工担架队，运输给养、时事教育等，是自卫战争得到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缺点是在战争的长期化、残酷化，土改后暴露出来的，政治工作对人民解放军的阶级军队特质起保证作用，在严格执行纪律、政策上，保证我们党军的纯洁，保证在攻克城市后政策的执行，保证部队的战斗胜利，全体动员作战，作为党的阶级的军队，保证军队组织的纯洁性是削弱了。这原因：

首先是成分问题。内战时的工农政治工作人员，在抗战中大都已转为军事干部，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出身的人。他们没有政治工作经验。这批人加入政治工作的好处，使政治工作活泼生动些，晚会上的花样多了，报告也满流利。过去连马克思的像也画不像样子，现在能画像样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内容丰富了，不是土气，而是洋气，线条多了一些，但作为阶级的党的政治工作的特质是削弱了。这与过去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时期阶级路线不够明确有关。

其次，军事人员形成单纯的军事观点，不但不帮助政治工作，反而天天骂政治部：不好好地组织救护伤员呀！教育俘虏呀。政治工作人员因他们是老干部，资格老，有实际战争经验，往往向他们让步。

第三，土改以来的潮流，整党、整军、整干部，即三查运动[20]。这批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经三查后个人情绪与政治机关的威信都不高，且成分复杂，机关中更厉害，我们野战司令部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是地主、富农出身的，但有一部分很好，思想不错，生活朴素，工作积极，比有些老干部有发展前途；一部分特别坏，吹牛拍马、贪污腐化等。关于改进政治工作，我将向中央请示，先要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改变政工人员的成分，从地方上调些干部，如具书、地委等到政治机关来。

（一）溶化俘虏。每一战役后，每个团要补充一千多俘虏兵，俘来后就给发枪打仗。我们溶化俘虏有一套经验：一是用老解放战士争取俘虏兵，二是用翻身农民战士教育俘虏，三是不搜他们的腰包，失掉东西给一定的赔偿，四是民工教育俘虏。我军每团都有二三百民工，其中有四五十岁的老农民，

他们虽不洗面，手脚很黑，穿着便衣，但经过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阶级觉悟很高，时事政策都了解，利用他们向俘虏兵宣传教育，使俘虏兵感觉了不起，一个老百姓知道的东西这样多，往往比指导员或高级干部的讲话作用还大。再经过评功记功，给他们挂上红布条，升为班长，他们就高兴得很：“在蒋介石那里，当兵一辈子升不了，到解放军不几天就升了班长。”我们很多指挥员愿要解放战士，不要翻身农民。因为解放战士听指挥，有战斗经验，认为翻身农民到部队里给你讲民主，有时开小差，很难恃候。但解放战士在打胜仗时没有问题，一到艰苦时候就开小差。如华中撤退，反攻转移，解放战士就大批开小差，而翻身农民很少，甚至没有。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有些部队则不要，以翻身农民同别人换解放战士，后来因在困难时解放战士逃跑多，大家不愿要解放战士了。部队补兵最好比例是翻身农民十分之四，解放战士十分之六。一年来，我们补充了二十万解放战士，十二万翻身农民。

（二）立功运动。这是过去战斗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运动的扩大，因为英模运动在战斗中表现狭小，条件过高，要生活艰苦，思想正确，努力工作等，很不容易做到。现在你只要做好一件就算一件，其他思想问题可以慢慢解决，有错误的可将功折罪，戴罪立功，也可功上加功，把功臣选为模范。评功大会与评定战术结合起来，这样在战争中战斗后都能提高士气。但也有些人因功骄傲，冒功，假报成绩，互相争功，甚至有一个碉堡三个部队都说是自己夺得的现象发生，将立功变为锦标主义、风头主义。有的同志根本反对立功。他说：“老子革命十多年，打过多少仗也没有立功，毛孩子打过几次仗就立功。”有的人是老一套，他说：“对俘虏兵这样好是乱来，我的功这样大也没有这样”。后来部队的立功运动又发展到农村的群众中，他们在打扫战场，追捕逃亡的蒋军军官，清查俘虏、救护伤员，有很大的成绩，野战军就送给他们一面旗子，他们很高兴，农村男人女人都开展立功运动，他们供给蔬菜，救护伤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评定伤亡。这是刘邓部队创造的，每个伤亡的，大家给他评定，有的光荣的负伤，有的是不光荣的犯错误的。后来觉得不好，人家在前线打伤打死了，还犯错误，使人不满意，谁能知道敌人的子弹是有规律的呢？敌人的子弹都是不正确的。后改为评定战术，435 如武器的使用，加上伤亡的比例，看你的功绩大小。

（四）团结互助运动，克服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现在部队很复杂，有翻身农民、老战士、解放战士，山东还有一一五师的老红军，华中有八个师的单位，每师有许多小单位，有过去各地来的红军游击队，真是十八路诸侯，汇合成华东人民解放军。这里面就有南北分界线，山东人看不起南方人，南方人好洗澡、搞菜吃，说话听不懂，轻飘飘的，好留头发。南方人说山东人不卫生，地方不好，个子大，穿的鞋像一只船，骂他吃大葱，相当对立。这样情况下，他们在布置打仗，补充兵员，配备干部，群众纪律都互有意见，打仗中互相争功。要统一于人民解放军，打破本位主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长期的斗争。

我们克服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的经验是：

第一，不能互相指责，只能互相表扬；指责要由其直属的首长去作。

第二，部队间只能互相退让，不能互相指责。指责归之于党。

第三，犯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严重者撤职。

第四，士兵有这种反映不怪，但干部有这样就是非法活动。制造纠纷、分裂要批评、处分甚至撤职，要统一党的指挥。

## 五、后勤工作（略）

## 六、反攻及新区问题

（一）全国性的战略反攻问题提出，是去年[21]七月刘、邓大军渡河。当时华东因雨季没有打好仗，打敌十一师，五天五夜只消灭一个团，打敌第八军五天五夜只消灭二个营，打费县消灭一个旅，打泰安敌人逃跑了。七月打八仗只有三仗打好。这时，我们提出反攻中原，部队很多同志波动很大，且部队山东人多，要他们离开根据地转移到豫皖苏地区有很多疑虑，不相信。他们认为过去提出“在山东来保卫华中”，今天提出“在中原来保卫山东”，认为“是领导上欺骗”他们，认为反攻有很多困难，到蒋区作战，脱离根据地没有党政军民帮助，没有弹药和兵员补充，群众条件不好等等；他们又认为在山东吃光了，站不住脚，反攻是被迫的，反攻是带游击性的，要倒回头的；反攻是长征。这些右倾情绪很浓厚，一肚子不满，在厕所里写起打油诗：“分明被敌人赶出山东，你们硬说是反攻，反攻，反攻，真说不通。”

我们说这些意见有一部分是机会主义的，一部分是幼稚的，必须给他们以痛击与进行教育说服。我们几个领导同志轮流下去作报告解释。此时中央反攻指示、解放军宣言来了，但这些情绪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不懂得被迫性与革命性是辩证的矛盾，马克思革命是自动的，也是被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人受压迫，被迫革命，同时是他阶级觉悟自动革命的，是一定条件的自由，一定条件的被迫，没有绝对的自由。

第一，反攻不是被迫的，是主动的，这些反攻有预定计划。敌人进入鲁中、胶东是主动的，也是我们引诱敌人这样做的，被我们调动的。当我们从山东转移到空虚的敌后，敌人被迫掉转来，我们取得了主动，很自由，敌被我们牵着走，我们要过黄河就过黄河，要过长江就过长江，要回山东就回山东，我们要在哪里打就在哪里打，蒋介石要听老子的命令。说我们反攻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不是全面的历史的观察战局。有些人当山东打胜仗时，以为整个问题都解决了，好像打倒蒋介石就是他的本事，其实没有山东蒋介石也要扛垮的。他们看不见自卫战争的全过程，我们消灭敌人五百多万，我们正在转弱为强，由劣势转到优势。

第二，反攻不是带游击性的，不会被打回头的，认为反攻是打游击，要被打回头是错误的。我们三路反攻大军，共有五十个旅渡过黄河以南，展开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是蒋介石不能抵御的。他不可能拿到五十个到一百个旅来抵抗，这是不可阻止的力量，是一往无前的。我们想打南京，就打南京，我们打游击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快轮到蒋介石打游击了，他退出南京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我们将一直打到西藏去。对我们力量估计过低，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这种思想是跟不上时代的。敌我形势变化了，我们同志的思想，仍是旧的一套。我们必须以中央的正确方针与之斗争，打破他们的旧圈套。

第三，有些很老的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反攻是长征，不能给他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他们是根据实际经验提出的。根据长征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很多次长征结局都是悲惨的，如南昌起义后贺龙、叶挺长征到广东东江，第一次长征失败了；一九二九年，毛主席、朱总司令被迫脱离井冈山根

根据地，向广东、福建长征，因没有党政民的帮助，队伍下山，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结果被打回来，第二次长征是失败了。方志敏的抗日先遣队，长征到皖南被消灭，第三次长征失败了。后来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到陕北，幸得陕北有块老根据地，有高岗、刘志丹两同志，否则也是很危险的。到陕北后过了黄河，还不是又回来了吗？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有很大的根据地，为什么不在根据地打仗，消灭敌人，我们军队一出解放区，举目无亲，“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伤兵没处放，粮弹补充困难，一说几百条。有的说：“在根据地我负责消灭敌人两个军，出去一个旅也不敢保险。”

我们说：我们背靠着根据地，民工、弹药等仍可源源接济。我们反攻的地区大别山、中原都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们反攻是收复失地，连广州、四川我们都要收复的。所以不是出门，而是回家，以历史上的长征作类比是不适当的。那时我们被迫的打游击，被“清剿”的无法生存，再不走就会被敌人消灭。那时是处在革命的低潮，国际法西斯正在嚣张之时，现在我们消灭敌人百多万，国内人民运动与国际人民力量日益高涨，国际反动派陷于孤立，蒋介石在政治上、经济上到了最危急时期，解放区空前壮大，我们是胜利的大进军，大发展，敌我力量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这样来了解反攻，是形式主义的唯心的。我们反攻的实际困难，依靠发动蒋区群众，战斗胜利的缴获，和解放区后方的援助，三方面是可以解决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上前，”只要我们把新区群众发动起来，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的。他们提出反攻是长征，是思想方法问题，但他们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在我党的两个历史时期，遵义会议前，党内不能讲困难，要讲自己如何能干，夺取中心城市，谁如果讲困难，说你是“机会主义”，而讲国民党是怎样的不成。这是机会主义乐观主义的思想方法。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上台了，党是全面的看问题，看到困难与缺点，也看到我们的力量与优点。抗日八年很多党员干部经过长期的磨练，想困难想得多，现在就是有些同志过多的想困难，对胜利估计不足，三年前被蛇咬了一口，今天看见裤带都怕，总由反攻想起长征。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说：抗战三个阶段。防御阶段只一年多，相持了六年，总想反攻会到来，不知道反攻三天就完了。过去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因为罗斯福、邱吉尔不出兵[22]，结果许多人又说是吹牛皮。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过长江，转到江南作战，那是新的事变，蒋介石垮台之快是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过去经常批评对困难估计不足，今天要批评对胜利估计不足，许多困难估计到了，但许多“洋财”可能估计不到。毛主席估计抗战后有内战，因之整风，召开“七大”，做政治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工作很充分。现在是第三个转变时期，进行土地改革。对新形势到来的困难应想到，同时对胜利条件亦应充分估计到，当然我们是要做长期准备的。但不应是不敢胜利。我们党员思想比群众落后得很，不敢有冒险的精神。今天要勇敢的前进，不怕冒险，不要左顾右盼，白区党员尤其要有冒险精神，拿起枪杆子来干，蒋区到处是干柴，就是少点火的人。今天还强调困难是不成的，没有意义的。今天主要是敢不敢胜利，争取胜利的迅速到来，今天我们与长征时期、抗日时期是不同的，那时真有点老虎头上跳舞，“扫荡”来躲一躲，斗智不能死打。现在我们在政治上是绝对优势，军事上正逐渐转为优势，正在不断迅速的发展中，要估

计到困难很多，要估计到胜利很大，要把士气与干部观点扭过来。

（二）以新区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新区的实际情况，来解决我们同志的思想问题，比什么教育还好。当我军转到黄河以南，群众热烈欢迎，纷纷起来分地主的浮财，争相参军。在解放区还要说服动员，对抗属互助；在那里不叫他，他自动来找你，每个村子军队住了一夜就有一、二十个青年参军。群众帮助军队，供给粮食弹药，他们的斗争精神真是使人感动的。群众没有失败的情绪，他们不怕蒋军回来，只知道打地主、打土顽、分浮财、分土地，这是蒋介石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见到我们是想不到的欢喜，他们天天等我们去，原因是蒋介石政权机构过于腐败无能。他们的保甲制度，乡、区、县政权天天要粮要款，抓兵拉丁，贪污腐化，杀人如麻。蒋介石给人民的灾难太重大了。

在黄河以南更好打仗。在山东时敌人重点进攻，有二十四四个军，现在我们只负担四个军。敌人是一军一旅在一起，顶多是两个军在一起，三个军是没有的。我们走到那里，他们就跟到那里。我军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扫荡土顽固，消灭敌人保安团队，摧毁蒋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给养又便利，到处可以取得。吃得又好，吃鸡鸭，吃竹笋，吃鱼。不比以前那样的吃不上菜。我军真是如入无人之境，国民党到处恐慌的很，常常有国民党的县保安队找他的正规军，结果找到我们军队来。我们说：“你们辛苦了，进来请坐！”当他问到我们是哪部分时，我们说：“我们是新四军，把枪放下。”敌人马上张皇失措，举手缴枪。

加以各线我军的胜利配合，过去反攻认为是打游击的、被迫的、长征的人看到各地我军反攻的胜利消息、蒋军的恐慌，这时说：“真像反攻的样子呀！”特别是山东、华中的恢复，他们奇怪起来：“怎么我们走了，反而收复失地，真是首长远见，领导正确。”我说：当初他们的头脑就是缺少马列主义。

我军现在转入蒋区作战，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他是不好受的。我们是过来人，知道的很清楚。过去打仗在解放区，用解放区的骨头熬解放区的油，把山东吃得精光，现在这个大包袱，加在蒋介石头上，叫他尝尝滋味。在立三路线[23]时说：敌人是“恐慌万状，十分动摇。”现在以这八个字描写蒋介石是恰当的。当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打到徐州附近，我们则扫到徐州以北六十里时，那时蒋军真是手脚无措。徐州有一个卖西瓜的人，把西瓜皮丢在大街上，另一个人走路不注意，踩着瓜皮滑倒了，两人打吵起来，周围很多人来看，有的人乱跑乱喊：“新四军进城了！”马上震动全城，沈阳在我军进击之下，国民党的太太小姐抢着坐飞机逃难，曾把一架飞机抓烂了，今年春天，我们要放手大量消灭敌人，秋天大进军到长江以南，那时蒋介石从南京搬家，也会尝到搬家的滋味，要船没船，要车没车，老婆娃娃乱叫一团。也叫他们把钢丝床、沙发，甚至马桶都搬上走吧！那时，也许南京一个西瓜皮会顶十万大军。蒋介石的出路怎样呢？搬家打游击或是垮台，出现像西安事变[24]相似的事件，或是带上宋美龄出洋去了。总之蒋介石的垮台是没有办法挽救的。

（三）人民军队的阶级教育。反攻后感到部队成分复杂，干部思想摇摆不定，其原因是缺乏阶级教育，阶级观点、阶级立场不明确。反攻后我们从根本上教育着手，以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纪律教育，搞反特务教育，没有从根本着手。现在从阶级的基本教育即土地改革教育着手，主要是诉苦，

发动指战员一起检讨反省，诉苦后，追究根，追出蒋介石、美帝国主义，激发大家对蒋美的仇恨情绪，拥护反攻，坚决反攻，提高战术，加强纪律，争取战争的迅速胜利。

开始有些人赞成诉苦，但是用老一套的办法。有些地主出身的战士诉共产党的苦，有些流氓假诉苦，有的强迫诉苦。如一个连长把队伍带到大庙里开诉苦大会。他坐在一边，板着脸孔说：“今天开诉苦大会，大家诉吧！”没有人诉，他说：“诉吧！为什么不诉，你诉！”他自己拉起人来叫诉，还是没有人诉，就散会了，回来向上级报告：“我连不需要诉苦。”有的诉苦，一说就是蒋介石卖国内战罪恶，美国如何侵略中国等一套。有位俘虏兵听了起来说：“蒋介石怎么压迫人呢？我是贵州人，从贵州坐飞机到浙江，又从浙江坐飞机到南京，从南京到徐州；不是蒋介石我那里能坐到飞机。美国人帮助中国军队武器金钱打日本，怎么是侵略？”他不参加诉苦大会就走了。一研究，他是一个兵痞，长期受统治者情感的蒙蔽，一时不容易认识与觉悟起来。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认为自己被共产党捉住没杀了，共产党是他的恩人，要报恩决定不开小差，坚决为共产党打仗，后来先从生活上团结他，与他一起吃饭闲谈，有时顺便把他带到会场听人诉苦，初时还反感。一次他听到一个战士诉说他父亲死了，他母亲卖淫养活他长大，又被蒋军抓兵抓走，母亲饿饭等悲惨情景，全场战士听到都哭了，他也哭了。问他“为什么哭？”他答：“这和我的历史一样。”问他：“为什么不诉苦？”他说：“这和蒋介石、美国人没有关系，又不是蒋介石、美国使我这样的。”后经过解释启发才慢慢觉悟过来。村里老百姓看见部队开会都哭了，很奇怪，怎么昨天进村是高高兴兴的，唱歌谈笑，今天就大哭起来。后告诉他们诉苦诉的哭了，于是老百姓也要求参加一起诉苦，开军民联合诉苦大会，诉得军民都哭了。老百姓说：“这军队真知道老百姓的苦呀！”军民关系也搞好了。说明我们军队有些诉苦是抽象的，不实际的，真正诉苦进行好是对部队最好的教育。

军队干部中有的豫皖苏的，这次部队反攻到那里，他就带上警卫员骑上马回家去，真是“锦衣还乡”。那知回到家里是扫地出

门，他的老母亲住在破房子里，于是大发脾气，找村公所，区政府说：“什么政策？根本过左！”老百姓答复：“是毛主席政策、共产党政策。”把他捆回部队来，自己反省承认错误。有的是工农分子，经过土改学习，觉悟更加提高，但也有投机装假的，有的说：“你们十年搞统一战线我就不同意，那是非阶级路线。我十年来被压下去，今天政策变了，我抬起头来了，敢大声说话了。”他根本否认党的路线，否认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是不对的，说明在阶级教育中，仍表现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有的诉苦诉到干部头上，说连排长怎样压迫他，要求调换干部、澈职，使得干部不敢在连里参加诉苦大会，逃到营部里，打电话问是否诉到他头上，没诉到时，心里就安下来；诉到了，就怕的很，等诉苦完才敢回连，把干部的军阀主义也整了一下。因此我们决定凡是士兵诉到干部头上时，干部无论如何立即向士兵承认错误，这样也可以克服军阀主义的倾向。

#### （四）今后的任务：

第一，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第二，打开战场，建立民主政权。刘邓部队要过平汉路西，陈谢部队向南发展到老河口一带，陈粟部队还要向洪泽湖发展，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蒋政权、保甲制度、土顽固彻底扫荡后，建设起民主政权。

第三，破坏铁路，割断平汉、陇海、津浦三条内战的动脉，使敌人不能通车，孤立交通线大据点。

以上三点造成有利条件，大量歼灭敌人，把蒋军主力，五军、七军、十一师三个军消灭后，蒋介石就垮台，像一座房子十条柱子，砍断了三根柱子，不倒也得倒了，那时我们强大兵团渡过长江，蒋介石垮台的迅速是会出人意料的。

## 七、国民党方面剖解（略）

### 八、结束语

军队工作与地方党工作一样，需要新的形式。目前新的大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自卫战争胜利，解放区伟大土地改革普遍开展，蒋区工人学生民主运动的发展，反攻再前进一步，将发展成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重新整编队伍，三查运动，审查与提高干部，提拔新的干部，从地方上抽调好干部到军队，提高部队，使部队各方面的工作焕然一新，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一，发扬阶级军队阶级武装的特质。抗战八年，我们军队的阶级武装性质未变，在党的领导之下，为人民服务，今天更加要发挥这一特质，才能成为土地改革的军队。蒋介石向他的军官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共产党的清算对象，我已六十多岁了，还怕什么，主要是你们自己。”这是他最后挣扎的表现，说明蒋军是有他们的阶级性的。我们要树立农村贫雇农领导，割断小资产阶级与旧社会的关系，成为一支崭新的坚强的人民军队，担负扩大创造新解放区的任务，军队干部要学会建军、建党、建政、建民，把新解放区巩固起来，使之转回来帮助军队，扩大军队，我们在反攻中是以军队为主创造新解放区，先帮助地方工作，把地方工作做好，使之回来帮助军队，要完成这项任务，就要改造我们的军队。以前我们在内线作战时什么都齐备，现在在外线作战就要自己搞党、政、军、民工作，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会这四项工作，否则反攻会倒回头的。今年四八年我们能否渡过长江，不决定于蒋美而决定于我们的工作。如我们把长江北的工作搞好，彭贺部队进入陕南、四川，林彪部队进关，则我们与刘邓、陈谢部队可转入长江以南作战。抗战八年，我们只学

会打仗，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会做地方工作，做经济工作也是搞投机生意。华东部队干部在艰苦的时候，思想发生波动，是一点也不偶然的，是由于阶级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今后我们要彻底转变，从旧到新的突变。有些要被淘汰，一部分人要落伍，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也是世界革命的规律。不管你是大革命的，十年内战的，抗战的干部，都需要提高一步，彻底转变。审查干部、提高一切工作，发挥我们阶级军队的本质。军队大批干部调到地方，深入蒋区工作，地方好干部调到军队，向蒋区发展，深入蒋区发动农民土改。

第二，发挥军队独立作战的性能，过去一年我们强调集中，反对离开战略战役的机动，但反攻到蒋区后，许多同志机械的很，一举一动也问上级，搞不来独立作战了。今天我们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正规战、运动战，一面又是分散扫荡土顽固，摧毁蒋政权，建立民主政权。要做到又分散又集中，分散



了集中，集中了又分散，但反对游击主义。要善于抓住时机学会攻坚，共国两党二十多年来在各方面的论争，思想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论争，主要是土围子不能解决，敌人在上围子里，你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不学会攻坚，就无法完成中国革命，学会了革命就快成功了。现在打开石门、运城[25]等地，证明我们攻坚力量提高了。但仍不够，一定要继续提高。我们还要学会山地作战，越向南越多山，雨季作战也要学习。我们急需培养大批军事干部，能指挥各种兵团在各种情况下作战，应付各种情况的军事家。二十余年来我党培养了大批政治领导人才，也有一批军事干部，但仍差得很，要好好研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史，并使之与实际结合，培养成全面的军事人才。象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由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的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我党能有这样的人才百把十个就差不多了。我们解释毛主席的政治思想著作很多，但解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很少，需要一批有理论与实际经验的同志

来作这项工作。国民党步兵战术操典，拿破仑战争史及古代军事理论都要学，将经验提高到原则。

第三，一年来最头痛的是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过去是农村环境，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一套，合起来就不习惯，统一指挥也不高兴，成为掩护贪污、腐化、浪费、破坏团结统一的坏东西。今天要强调建设统一的人民解放军，以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本位，来统一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本位，具体办法是调开基本单位，“调虎离山”。

我们反对破坏主义与破坏专家，反对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思想。他们打开城市破坏城市，打开教堂破坏教堂，打下医院破坏医院，他们不要的东西都给你破坏了。他们不懂得反革命的财产一到人民手里就成为人民的财产，你只有保护的义务，没有破坏的权利。有一次，我们部队的一个勤务员把博山一个房子里的许多玻璃、电灯泡打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汉奸住的要打掉。”鲁南战役时，缴获敌人快速纵队的军需品，价值数十万万元，足够华野五个月用，但破坏不堪。华东消灭敌人近五十个旅，至少可装备二十个旅，但现在炮仍不够用，这与本位主义有关。他们认为“给你调走了，我还是用不成”。有了东西做人情，只把小单位搞好了，不管大家是否受损失。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以战养战”，以敌人的骨头熬敌人的油，尽可能减少后方群众的负担。前方的缴获能解决很大的问题。缴获的粮食不少，结果变成额外的消耗与浪费，我们有两万多匹马，却连拖炮的马都不够用。这样的仗我们是打不起来的。

我们今天提倡“以战养战”，实行大公无私主义。共产党是革命的破坏主义，破坏为的是建设，是与破坏主义、破坏专家不同的，有原则区别的。反对破坏主义、破坏专家是党内很大的思想斗争，特别要反对破坏头子，这批人是党内的“功臣”，他们虚报、假报，大斗进，小斗出，要来一个“对功臣的扫荡”，只有把他们“扫荡”掉，不然是无法无天的。

军事教育实行“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攻下据点，即演习攻据点，这样来提高军事技术。这是建军中很重要的一环。

第四，强调艰苦奋斗，反对贪污浪费。晋绥、陕北生活很艰苦，弹药少；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那里有一部分人过的是地主生活，反映了地主意识，结果反对土地改革。但一般部队生活是很苦的，只是少数供给经济干部，大权在握的干部，生活铺张浪费。有一旅长出门。要用几十个民工，后经调查，

他除带用几个伤员外，连家属小孩还有四十余人。但我们一般指战士很艰苦，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碉堡攻不下，我们一、两个同志拿很多炸药捆在自己身上，以自我牺牲炸毁敌人碉堡。打七四师动员时，有很多人事前写遗书，要求牺牲后追认入党或取消处分。有的牺牲了，有的没牺牲，第二次又写遗书。我们就接受其请求，发挥了高度的阶级觉悟。我们进攻敌城堡时，爬城梯子，周围布满烈士遗体，还是硬往上冲。这样的战争那有不胜利的！有的部队因一个地方撤出来就痛哭：“对不起上级，对不起老百姓！”表现了人民军队的特点。而一部分长期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人则高高在上，不能反映群众的情绪，要很好改造，要开刀才能割去盲肠。

第五，战争的展望。南线北线作有力配合，北线消灭敌人的孤立据点越多，根据地越巩固，东北解放军进关，则南线大进军的胜利越快；南线工作做好了，南北大军配合就可致敌于死命。今年秋天能组织一百万兵力渡过长江，今年就可能结束战争，否则到明年一定可结束战争，这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 注释

[1] 葭县，今佳县。

[2] 三进三出，指一九四六年八月出击陇海路，一九四七年初出击豫皖边，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五月的豫北攻势，晋冀鲁豫野战军三次南进又三次后退。

[3] 大名府，即今河北省大名县，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曾被国民党军攻占。当时敌军已逼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邯郸。[4] 张辉瓒、蒋鼎文、毛炳文、朱绍良，张在第一次对中央苏区进攻时任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在龙冈被擒；蒋鼎文在第三次“围剿”时任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毛炳文在第一、二、三次“围剿”中任国民党第八师师长；朱绍良是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

[5] 王耀武，当时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

[6] 两淮，当时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与淮安，合称两淮。

[7] 郝鹏举，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参谋长，暂编第五军副军长，后投靠汪精卫伪政权，曾任汪伪淮海省省长，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淮海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破国民党收编为第十战区第六路指挥官，一九四六年九月率部起义，所部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被任命为总司令。一九四七年一月，暗中接受国民党“鲁南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委任，并于同月二十七日公开叛变，华东野战军一部于二月六日发起讨逆战役，七日晚歼其总部及两个师，将郝生擒，同年九月，在威海被处决。[8] 还乡团，也叫“还乡队”，是由解放区逃亡在外的地主恶霸和一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所组成。他们跟随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攻，所到之处疯狂地向解放区人民实行阶级报复。

[9] 中央局、军区，指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

[10] 宿北大捷，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在江苏省宿迁县北部地区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等部二万一千余人的宿北战役。

[11] 七月间打十一师，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华东野战军指挥四个纵队，向驻守在山东南麻的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发动攻击。该敌据守预筑坚固工事顽抗，华东野战军冒雨攻击数昼夜，后因援敌逼近，被迫撤出战斗。

[12] 吴化文，一九四一年起任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一师师长，一九四三年率部投降日伪，任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一九四五年初夏，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津浦路南段警备司令，一九四七年三月任整编第八十

四师师长。

[13] 打泗县，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至九日，山东野战军为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向豫东出击，发起泗县战斗，终因雨暴水深，兵力分散，后续不继，虽歼敌三千余人，自己也伤亡二千，指挥部遂下令撤出战斗。

[14] 沙土集打好了，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至九日，华东野战军指挥其外线兵团在山东省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地区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师部及两个旅九千五百余人。

[15] 汤恩伯，当时是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后接替李默庵兼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16]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17] 我在会上说，参阅本书《华东三个月自卫战争总结》一文。

[18] 军长，陈毅曾任新四军军长，人们习惯地称呼他为“军长”或“陈军长”。

[19] 汾孝战役，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晋绥野战军及太岳军区部队各一部在山西汾阳、孝义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歼敌一万一千余人，战后，晋绥军区作了认真的总结。

[20] 三查运动，即三查三整运动。在军队称新式整军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制度改革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查阶级、整思想、查作风；在部队是用控诉旧社会黑暗和反动派的罪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和整顿作风。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起在全军进行的三查三整，达到了党和军队纯洁组织，提高全党全军人员的阶级觉悟，改进党的作风，保证了土改的顺利实施，增强了部队的纪律和团结，提高了战斗力，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21] 去年，指一九四七年，因为陈毅的这个报告，自“六、反攻及新区问题”以下，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作的。在此之前的“去年”，是只指一九四六年。

[22] 罗斯福、丘吉尔不出兵，一九四二年六月，苏、美、英三国政府达成协议，英美两国军队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于是英美两国制定了实施登陆的“霸王计划”。但英美两国却迟迟不执行，经斯大林的强烈要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会，并秘密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德黑兰总协定》，规定英美等国军队应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动“霸王战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而苏联也应相应地发动攻势，以便阻止德国军队从东战场调到西战场。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起，美英等盟国军队才开始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

[23] 立三路线，即第二次“左”倾路线。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第二次“左”倾路线统制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24] 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拘留了蒋介石，逼迫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25] 打开石门、运城，石门，即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在朱德总司令的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石家庄战役，攻克石家庄市，歼守敌二万四千余人，并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和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攻克山西省运城，歼守敌一万三千余人。石门与运城都是敌人有强固设防的城市，它的攻克，

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正在不断增长。

## 谈谈党委领导问题 (一九四八年四月)

前委在去年十一月发出建立各级党委的指示以来，取得了某些成绩，解决了部分问题，表面化的问题少了一些，但只是给大家一个警惕，今后为保证反军阀主义倾向及内部团结，更须健全各级党委领导，成为部队领导的核心。军队建设及各项工作的大政方针，各种政策，都要由党委会掌握，个人领导要受到必要的约束。这次我到中央，同毛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毛主席说：“首长制与党委领导各有好处，实行党委领导，能够发扬民主，一切问题经过讨论，可以更正确，毛病就是什么问题都要议一下，可能动摇决心；首长制不大民主，形成个人领导，但首长保有最后决定权，可以避免议论纷纷。”我说：“首长制和党委领导可以结合，只要运用得好，不一定会矛盾。”毛主席也同意这种看法。二者结合的办法，就是党委领导第一，首长制第二，党委会闭会后，就行首长制。要教育干部不能因健全党委领导而轻视首长职权，同时，不能因保留首长制而削弱党委领导，不能两者矛盾，而是应当结合，环境许可时，应尽量民主讨论，求得意见一致，环境不许可讨论时，首长就要大胆负责，决定问题，不要顾虑人家说你独裁，我们要强调民主，但不要因此减弱军政首长的威信。在党委开会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允许争论，但一经决议，就要无条件的服从党委领导，坚决执行党委决议，这才是原则态度。如果开会时不讲，执行决议又不坚决，或者开会时议论纷纷，执行时马马虎虎，及会后发牢骚等都是不对的。党委闭会后，军政首长（司令员与政治委员）都是党的代表，一定要巩固他们的威信，过去以为政治委员才是党的代表，司令员就不是的，这种看法不妥当，军事首长也久经锻炼，是党的领导骨干，党委要他来指挥统率部队，为什么不可以代表党？不过军事首长要有坚强的政治修养，高度的政策观念，要有很好的风度，原则问题要掌握得牢，态度要严肃。现在，我们军事指挥员中，有一些就不大严肃，使人家感到无所谓，或者对待干部处理问题过分尖锐，过分苛刻，使人家望而生畏，不敢接近，这些都是应当注意修养纠正的。会后在原则问题上的自我批评，仍旧要保持尖锐的态度，不能含糊妥协，但方式可以多种，不一定要采用尖锐的方式，特别是党委会及首长，应当有最大的容忍，不要动辄发火，要尽量说服，要虚心倾听意见与声明。尖锐的方式有时也必要，就是上面所说的“政治脾气”。有些问题必须用压力才能解决，那就非用不可，只要用得适当，不过火，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时一定要严格执行纪律，把纪律的武器放下是不行的。但尖锐的方式，压力与纪律，都不能随便使用，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拿出来，依靠这一套吃饭那就不行，而且一拿出来就要见效，否则就是滥用了。

党委会研究问题时，允许意见分歧，允许争论，但最后一定要求得一致，求得一个正确的意见。党委书记不要认为非通过我的意见不可，那样就会变成党内家长制。党委书记要善于吸收意见，自己的意见不妥当，要善于撤回，但不是人家一提出不相同的意见，就撤回自己的意见，那样就会变成没有主见没有中心，应当深思熟虑，对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具体方法问题尽可能吸收和采取人家的意见，使人家感觉在党委里面还能起些作用，积极性才会

提高，

这是一个问题。其次，书记是否一定由政委担任？团营两级当政治委员的多半是新的，军事工作经验较缺乏，锻炼不够，本身思想作风也有些缺点，一定要他担任书记，有些困难。一般军事指挥员在部队历史较久，党内资望比政治干部强，这是实际情况，不得不照顾。因此，党委书记一般由政治委员担任，特殊情况下可由其他干部负责。这样是否会削弱政委制度？我考虑是不会的，因为政委一方面 是党委委员，但还有代表上级的一面，所以党委书记与政委之间应互相尊重。今后部队继续发展，还要大量提拔新的干部做政治工作，许多党委书记可能轮不到他们，但并不能因此取消政委制度。党委书记也不是一元化领导，过去提出一元化的意思，也不是样样事情都要书记来管。书记的职责只是在党委会开会时，他当主席，讨论问题分歧最后决定时，他投最后一票来决定问题，闭会后督促决议的执行，协助各部门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研究工作的经验，准备下次党委会的议事日程，各部门的具体工作不要去干涉，不要什么事都要照自己的意见办，更不要以为不照自己的意见办事就是反党，因为党委之间，没有我大你小之分，只有意见是非之别，党委书记如果认为自己意见对，就要想办法说服其他委员，自己意见不对，就要吸收人家意见，书记只是党委的中心，不要把“中心”变成“独裁”。党委会开会后，具体工作也要有商量，一般情况下最好是司令与政委未互相征求意见前，不要决定问题，司令与参谋长，政委与主任，主任与副主任之间也要如此，但到了十分必要的时候，部队属于生死存亡关头，就要能“独断”，那种时候就靠首长的决心与魄力，其他同志要保证他的决心贯彻，不要动摇他的决心，即算错了，以后再讲。在这种时候，特别要团结，要有分担责任的精神。意见纷纷，各行其是，“纰漏”就更大。即算要提意见，也只能简明扼要提出，提醒他一下，不要讨论。总之，军队比地方不同，有时非靠首长决断不可，发扬民主不能妨碍这种必要的个人决断。但这种情况一般不多，不能因需要首长决断而否定发扬民主。有些

同志喜欢简单，怕麻烦，可能认为这样是太麻烦，不好办，这种想法必须纠正。干革命就是一件最麻烦的事，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有许多麻烦，怕麻烦还行！？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党委议论未定的事，不要去传，一传出去，就会以讹传讹，引起无谓纠纷。特别是相互关系问题、干部问题，不要随便讲，党委还未决定，还没有解决，讲出去没有好处，引起新的纠纷，问题更难解决。对上级可以讲，上级听了，也要负责，特别是牵扯到具体人的问题，更不能乱讲，某种暗示也不必要，要做到这一点，也要有点修养才行，晓得的事不能讲，对个人确实有点痛苦，但对党有好处，只好吃这点苦。负责任愈大，愈不能粗率任意，许多事情要忍耐，几万人的生命交在你们手里，怎么能够随便！？已经确定了的问题，就要大胆地有系统地传达，最好分工去传，不要包办。供给工作问题，最好由供给部长报告，参谋工作可由副参谋长、作战科长代表司令部作报告，政治工作可以叫部长、科长报告，一个首长什么都要包办，什么报告都要自己来讲，一定是空洞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部门业务干部中有许多是有知识的，经验丰富，有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当首长的听不到，也不虚心学，很可惜。今后开会作报告不要去分官大官小，只问内容好不好，内容好的，就是一个干事一个参谋作报告，首长也要老老实实的听。要倾听下面的意见，不要以资格地位为标准，要唯

真理是从，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要善于取人所长补己之短。当首长的一定要把各个业务部门的政治地位提高，特别是供给部门，过去地位很低，只能算一个办差的机关，因此供给工作上的问题也最严重。毛主席说：“老百姓如果要革我们的命，首先就从财经部门供给部门革起。”这两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把这个缺点扭转过来，不要光是把不好的干部塞到供给部门去，一定把供给部门的威信建立起来，有职有权，才好办事。

## 向朱总司令学习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的干部晚会，是欢迎总司令，听取总司令的指示。在座大部分同志，没有和总司令见过面；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志对总司令的光荣斗争历史，英明伟大的领导，许多宝贵的指示，是有认识的。关于这些，我趁总司令作报告之前，再讲几句，表示我们大家对总司令的拥护与欢迎。

第一，我们欢迎总司令，首先要学习总司令对人民事业对党的无限忠心。二十多年来，总司令一直和毛主席在一起，领导我们的党和军队同反革命作斗争，没有一天离开过党和军队，没有一天离开过老百姓。不仅二十多年是如此，从历史上算起来，总司令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参加讨袁战争，以后参加党，参加北伐，领导北伐战争。总司令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董必武同志等是我党最老的党员。一九二一年、二二年即参加党的同志，现在已不很多了。大革命失败后，总司令坚决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带着队伍继续上山干革命，从此，总司令就和毛主席亲密合作，从无间断。当时，从大革命胜利转到失败的不利情况，由于毛主席和总司令的英明领导，我们得到了发展，建立了人民政权，创造了强大的工农红军，这完全是由于毛主席和总司令忠心为人民服务，没有丝毫为“我”打算所致，因此，中国人民也就选定了他们两个做自己的领袖。以前我们党的领袖不是朱毛，而曾经是陈独秀那样的人，可是大革命一失败，情况一严重，就考验了我们的党，更考验了陈独秀，陈独秀这样的“领袖”，受不住考验而垮台了！同时，中国的党，中国人民，和我们军队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严重情况下，考验出我党和我党领袖，朱毛是不怕失败不怕挫折的，是人民真正的领袖。在尔后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八年敌后的抗日战争，又考验了我们的党和领袖，在二十多年的历史考验中，中国人民是胜利了，我们的党和领袖胜利了，证明我们的党如铁打钢铸，坚不可摧！今天欢迎总司令，正是全国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倍觉兴奋。总司令代表中央交给我们任务：我们全体同志应当学习总司令的大公无私，对党对人民无限忠心的伟大精神，来完成总司令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假使现在还有同志处处为个人打算，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种同志站在总司令面前，应当感到无限羞耻和惭愧！

第二，要学习总司令对党的路线坚定不移的精神。我们的团以上干部，要特别重视学习这一点。在长征中，由于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内发生严重的分裂。当时，总司令在四方面军，处境非常困难。但由于总司令的伟大精神，克服了张国焘的错误，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认识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认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严重，而站到党的旗帜下来，保全了革命的力量。这是总司令对党对人民的一个伟大贡献，对于抗战中我党力量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毛主席回想到这件历史时，曾对我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这种伟大的人格与高尚的革命品质，是我们每个同志提高修养的标准，在革命形势顺利发展下面做

---

这是陈毅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欢迎朱德总司令到第一兵团视察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三年曾在《军事学术》第十期重新发表。



一个英雄好汉是容易的，但到了革命遭受挫折和严重失败的关头，能不能坚持？当党内发生严重分歧时，能不能站在党的立场坚持党的路线，领导全党来挽救革命就很难讲了。但我们在总司令身上可以找到这种常人难得的高贵品质。现在我们提出反军阀主义倾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部队的纪律，就应当学习总司令这种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忠诚的保证完全做到。否则，参加这个会议就是不诚恳的。

第三，总司令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大的政治远见，与实际结合的革命乐观主义。总司令知道革命斗争中的种种困难，但丝毫不害怕这些困难，认为什么困难都有办法克服，特别是愈困难的时候，就愈可以看出总司令的革命乐观精神，对同志不断的鼓励，鼓励大家不要气馁，告诉大家反革命的嚣张是暂时的，乌云无论如何遮不了太阳，革命一定要胜利。总司令这种乐观不是盲目的，而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出革命一定胜利的科学结论，以及毫无个人安危荣辱的打算，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伟大精神所致。我们现在快要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十年二十年以前的那种困难，是不会有的了，但也不是毫无困难，如粮食、弹药、后方的处理，部队可能受到暂时削弱……等等，可能成为我们的困难。不过，这些困难与总司令过去所遭受的困难比较起来，真是“渺乎其小焉者也”。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在这些困难面前沉不住气，讲怪话，发脾气，不安其位。这种同志在今天面对总司令时，应当警惕奋发起来，化懦弱为勇敢，化恐惧为无畏，特别我们将来要到更远的蒋管区去，有更多的困难，在今天欢迎总司令的会议上，就要向毛主席和总司令保证我们不怕一切困难，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能够有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够胜利。

第四，总司令的度量很大，在我们党内是有名的，在我们军队同志中，也是很少能相比拟的。正如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总司令就有这种浩如海洋的度量。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公认毛主席和总司令是领袖，人人尊敬，是没有问题的。但过去队伍小，党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总司令对于任何同志都是关心体贴，能够吃亏，自己作模范，善于说服人，很少看到总司令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的向同志耐心说服解释。我们同志中，有许多器量太小，受不起委屈，吃不起批评，听不得“反映”。在今天欢迎会上，就要好好的以总司令的度量为榜样，把器量扩大一点，有功劳不要去争，有过错自己分担一肩，人家批评得对，很好的接受，人家讲得不对，也可以提供参考，不要眼光如豆，只看到个人的名誉、地位、享受，而要高瞻远瞩，霁月光风，养成革命者政治家的风度，对敌人作斗争要坚决，对自己人就要多讲和睦。总司令就是这种对敌坚决顽强斗争，对内高度善于团结宽大的典型代表人物，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第五，总司令的生活，非常朴素，多年来都是穿的布衣服，一件棉袄要穿几年，补上好几个疤，工作做得多，对革命贡献很大，可是不计享受，总司令这种高贵的性格与作风，举世莫不钦佩。总司令出身于农民子弟，家里贫苦，生活朴素。辛亥革命中在云南做了很大的官，但很快就丢掉不干，转过来参加党参加革命，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勤苦的生活作风，与群众完全一致。特别总司令经常和士兵在一起，对接近士兵接近群众很有兴趣，以广泛的接触干部和士兵为精神上莫大的愉快，这完全是工农劳动人民天性的表现。总司令是一个伟大的统帅，也是一个普通的士兵，这是我们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当认真学习的。假使同志们的生活超过士兵太远，在今天

的会议上就要加以考虑，今后应当约束自己，只有过士兵一样的生活，才能得到士兵的爱戴和亲近，才能倾听和反映士兵的呼声，也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干部”，否则，就会脱离士兵，思想意识也会起变化，变成剥削者的意识，这种干部无论能力如何强，如何会打仗，都是不可能把部队搞好，也不可能打好仗的。现在我们有些干部遭受士兵的反对，生活上奢侈浪费，就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同志特别应当向总司令学习，坚决转变过来。

第六，总司令是中国革命中著名的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造者和组织者，精通革命军事学，熟悉各种战法，有不断的创造，在我党七次大会上的《论解放区战场》那一篇报告是毛主席的天才军事思想的很正确的解释和发挥。几年来总司令还有许多讲演都可作为我们干部军事工作的根据。我们欢迎总司令就要加强军事学习，提高战术，熟读总司令的文章，放在实际运用上去战胜敌人。总司令是不喜欢那种既当了兵却不喜欢学军事的人们的。

今天我只能简单的讲一讲总司令伟大革命品质的较突出的几点。总司令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三十多年，许许多多的优点长处，对党对人民的贡献，都值得我们学习，在这里是无法详细向同志们介绍。希望同志们好好去研究总司令的一切著作和指示，对照自己的思想和作风，认真的执行总司令的指示，修养锻炼自己成为总司令的一个好干部。

## 支前与生产结合的经验总结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

关于支前与生产结合问题，我们总结山东、华中二年来的经验教训，有如下几点意见：

一、我们认为支前的重心是运输问题，在八年抗战中，由于我们的队伍装备很差，人数不多，又是分散的游击战争，这个问题是易解决的。但在这次战争中就起了基本变化。

首先，我们的队伍已有近代化装备，有些野战军装备，并不亚于蒋之精锐部队。

其次，战争性质是近代规模，是高度集中的运动战，经常十几万人几十万人在一个地方作战，粮弹消耗、缴获与伤员之多，都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但我们却没有固定的作战线，一直到今天除了北线攻点部队外，南线野战军还是流动不定的，常常数天之内变化数次。

再次，我们部队却无辎重兵组织，缺乏近代运输工具与交通干线之控制。就是有了部分汽车，又因公路太坏逐渐损坏，运输效能也很低。因而我们的运输工具，主要还靠马车、牛车、独轮车以至驮马、挑担，伤员则靠担架来转运。

由于上述三个特点，就使运输问题成为此次战争中最大的困难，也是与生产发生矛盾的主要关键。此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常常要影响到战役的胜利，同时也影响到生产，影响到军民团结，甚至出现对立状态。在我们没有完全控制与利用交通要道以前，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与妥善解决。

二、两年来我们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开始是动员临时民工，供应部队之粮弹运输与伤员转运。战役一个接连一个，常常头一个战役民工已复员，而后一个战役民工未赶上，因此发生部队临时拉夫或与地方政府吵架现象（这是难免的），因而影响军民关系，也影响战争。以后我们采用半年为期的常备民工制，比临时民工好一些，但由于北方农民抬担架不惯，又是供给制，运输效能异常之低（一副担架是八个人抬，小车每辆载重二百斤）。从动员到部队，又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常常行军数十天，名为半年，实际服务时间不及四个月，此种民工数量影响很大，初期是一兵一伙，后来是二兵一伙，农民初离家乡，未经训练奔赴战场，即遭飞机大炮之威胁，逃亡很多。急行军赶不上，战情变化时，常大批被俘，做了敌人的军队。

另一方面由于战线不固定，民工逃亡失散，作战部队与后方机

关工厂，常常还需要大批临时民工。军差命令急如星火，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军差，行署、专署、县政府等，常常控制几千几万民工集中待命；区、村政府则采取控制民力办法，禁止农民、大车、牲口远离家乡，以便随时征用；有些地区，更提出“村不离村、区不离区”的口号。如此劳动力便冻结起来，农村间商运停滞，生产减低，很多群众逃避支差，甚至把大车破坏，牲口杀掉，民众对我们极感不满。此种状态，我们在九月间（一九四七年）才发觉，即下令禁止，实行劳动力解冻，民间商运与群众情绪才

---

一九四八年五月，陈毅奉命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野战军副司令员，六月，在与前去担任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同行路过洛阳时，联名向中央军委拟发了这份电报。

逐渐恢复，但社会经济已遭受莫大的损失。劳民伤财，妨碍生产，莫此为甚！至今思之，犹为痛心。

三、上述办法不仅劳民伤财，而野战部队运输问题，也仍然未能很好解决。特别是外线出击部队，实感困难。这主要是部队没有自己的辎重兵编制所致。部队既有近代装备，又担负近代战争，就必须有近代化的组织。因此我们于去年夏秋间，就决定部队组织自己的担架兵与运输兵，每连成立担架班，三付担架（用竹竿及布制成）九个人；团部成立担架排，二十至三十付担架；师成立担架连，一百付担架；纵队成立担架营，二百付担架。另外团、师、纵三级各成立运输队，配备必要之汽车、马车、驮骡，肩挑等。如此每个纵队需要担架兵二千四百名至二千七百名，运输兵六七百名，合计三千至三千四百名，便可担负第一线至总转运站（约离火线六十里至一百里）之粮弹运输，总转运站至后方则由地方临时民工接运。此种编制现在东兵团各团及西兵团[1]部分部队已经编成，但师、纵二级以及部分团队尚未组织，这主要由于干部思想未打通，只怕部队战斗兵少，减少战斗力，因而不愿意把新兵拿来充当辎重兵。而不想今天我们的部队没有辎重兵编制或辎重业务不健全，同样是要减低战斗力的。我们考查第七纵队担架队（每团有七十副）运输兵之所以组成，其来源：一部分从新兵中来，一部分从老兵中抽，而半数则由俘虏补充。

因此，我们建议军委严令各部队建立此种辎重兵编制，不再依赖民工来作为第一、二线运输之用。此种辎重兵来源不要等待民工，应从新兵、俘虏及老兵中逐渐编成，如能在解放区动员二年为期的辎重兵则更好。但无论如何，必须完成辎重兵编制，二年来的痛苦教训太多了。此次粟兵团[2]出发，民工大批逃亡，他们已感到自己不组织辎重兵对战争妨碍太大，因为只靠民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四、关于从前方总转运站将伤员转移到后方医院，及从后方送粮弹、被服、军用品到前方，以及后方机关、医院、工厂之粮草、原料、制成品的运输，凡是有固定收发地点之物资、械弹转运，一概采取按量计工的包运制。按照各种不同物资，不同地区，规定运输费（如运粮每百斤，走一百里者给粮十八斤，运棉花者给粮二十四斤，运军鞋给粮二十斤等）。一般比工运略低，比供给略高，由群众个别包运或集体包运，后方机关、部队之指战员、勤什人员愿意包运者，也同样给资。做军鞋不再采取发动妇女慰劳及派军鞋办法，而改用按件计工之定购制度。一般多在城市与集镇中设小型工厂（只几个人便够），由我们规定样式、厚薄、针线密度及工资多少，交贫民妇女定制，我们只收货发钱。有些则由我们出布铺好鞋面鞋底，交妇女纳底抽线，分别按件给资。此种办法在华中之两淮、盐城、新安镇，山东之诸城、日照、惠民等城市，成千成万妇女靠此谋生，他们每日所得好于纺纱织布，而公家所费并不多。因为过去慰劳鞋、派军鞋质量太坏，穿不上几天就坏。现在定购鞋则经久耐用。定购军鞋制之实施，山东、华中群众不但不感到支差之苦，反而增加她们谋生之道。过去对我们供给兵站、军工部门害怕仇视，今反而到处欢迎，因为这些部门可以帮他们增加活路，他们的运输效能也空前提高。过去供给制支差，每辆大车只运六百斤者，现能运一千四百斤至一千七千斤。过去一天只走四五十里者，今能走八九十里至百里。生产情绪也日益提高。过去出公粮、公草、田赋之外还要支差，并要出村经费、做鞋慰劳等，真是苛杂不堪重负。现在群众只出公粮、公草、田赋，其余村经费慰劳、派军鞋

一概停止。支前不仅不是负担，反增加活路，因此到处修理大车，增加牲口。最近渤海分区六个县的统计，今年春季三个月就进了六千头，其余可想而知。过去群众对我不满心理，已一扫而空。当然这是整个整党、土改的结果，但包运制之实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最近东兵团、泰安局更决定伤员转移，也采包运制，即从总转运站转送后方医院之伤员，每一伤员走一百里，给粮数十斤。过去八个人抬者，今后必可减少至四个人至三个人抬。因为少人抬则多分粮，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增加生产力，这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我们建议军委将此包运制与军

鞋定购制普遍施行于各解放区，这个制度既不劳民，也不伤财，又可解决战争需要，又可增加生产力，再不要沿用过去既劳民又伤财的派工供给制了。

五、除了部队建立辎重兵编制及后方实施包运制外，目前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汽车，作为军运的主要工具。过去我们缺乏汽车，只能使用旧式大车、小车，以数量解决质量。但今天我们已有不少汽车，汽油也可以买到，并可自己提炼，估计关内解放区大卡车不下五百辆，每一辆十轮卡车的运输量等于载重三百斤的牛车三百辆以上，五百辆即等于十五万辆。如能充分利用汽车，则目前大部军运，即可靠此解决，而不必过分使用民力了。但要使用汽车，必须解决公路问题。目前各解放区公路，由于大车行走（这是破路大车），没有路局管理，破坏不堪，致汽车大批损坏，汽油浪费极多，运输效能也极低（一辆十轮卡车好路能载一万至一万二千斤，每天走六百至八百里，现在只载重五六千斤，每天走三、四百里），因此建议军委严令各地修好公路。其办法是：

- 1、按路设局，分段管理。公路不能按行政区设局，必须按干线设局（如邯郸至洛阳公路可设公路局），每六十里一小段，数小段为一大段，段设段长，划定界线，分段负责。

- 2、路局要有自己的工程师、工程队与养路队，小修理路局自己负责，大修动员民众，并要与兵站、电话站、汽油站结合在一起。

- 3、公路干线之旁，必须设大车路，严禁铁轮大车在公路上行走，违者重罚。在这点上，要克服干部中片面的群众观点。

- 4、从速建立汽车修理厂，购买和制造汽车零件。

- 5、有计划采购汽油并设法提炼汽油。

上述各点是我们在华东二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在目前解决支前与生产矛盾的主要关键，是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战争早胜利的重要建议。

#### 注 释

[1]东兵团、西兵团，一九四七年八月为调动与分散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的敌军，准备执行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性任务，华东野战军以四个纵队组成东兵团（亦称内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在内线坚持作战，又以七个纵队组成西兵团（亦称外线兵团）出击鲁西南，执行外线作战的任务。

[2]粟兵团，即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下辖第一、第四、第六纵队。

## 必须首先从战略上看问题 (一九四八年八月)

毛主席讲：“军事上的胜利是大革命胜利的标帜。”

这一标帜是很显著的，这是头旗。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大革命的先导，是第一位的。

毛主席特别指出这个胜利的重要意义。对于军事的胜利，我们的同志每每只看到缴获了多少枪炮，虏获了多少人马，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旅长、师长，一直到纵队司令员，往往拿缴获多少来判断胜利的大小。毛主席讲：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自然，我们党不能俘虏和缴获大批敌人、马匹、武器，便不能壮大自己。可是如果死看这一点就以为满足，不去解决战略问题，也还是要失败的。项羽七十二仗仗无不胜，每仗俘虏人家的兵，最后一仗失败了，就整个垮了。因为楚霸王缺乏战略指导，把他的大兵团摆在荥阳，与汉高祖对立，牛牴角，打得汉高祖没有办法过荥阳河，不能超过伏牛山。可是汉高祖比项羽厉害，他实施战略迂回，收复邯郸，打到济南、临淄，韩信大军南下，项羽的屁股徐州没有保住，灵壁核下一仗大败，项羽全军覆没，落得乌江自杀。蒋介石恐怕连项羽这点自杀的決心也没有（全场大笑）。

毛主席讲：我们歼灭了敌人一百二十万，两年我们可能歼灭敌人二百五十万（昨天广播为二百七十二万）。这是我们伟大的胜利。可是只注意这点不行，更要注意到战略问题。战略问题是能否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包括吃饭问题，战争在哪里打，把战争引向什么方向的问题，几百万的军队要吃饭、屙屎、洗澡、睡门板，牲口要吃草，这样一个巨大的无可避免的消费放到敌人区域，敌人就受不了。如果把这一战争重负长期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受不了。如果不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只注意在我们区域里消灭敌人，俘虏敌人，最后还是要失败。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吃饭、屙屎、洗澡和牲口吃草等问题。这一个问题解决的好，在蒋区吃的多，在我区吃的少，战争持久下去一定能胜利。毛主席特别提出，战略问题着重于对人民负担、军队取给于前方与后方支援的综合研究。大部取给于前方，敌人吃亏大，我们就一定能胜利。一切靠后方供给，后方就来不及负担了，虽然前方天天打胜仗，还是要罢战谈和；人家不和，你就支持不了。所以毛主席讲：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胜利是去年转入进攻。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刘邓大军走前头，转入大别山，其次陈谢[1]转入豫西，陈粟[2]转入豫皖苏，这是带决定意义的步骤，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扭转了战局。这是战略的胜利，我们全党干部一定要认识这一问题。

蒋介石这个人懂得战略。毛主席讲：蒋介石不是完全不懂战略的，多少懂得一点。蒋介石的方针是无论如何把战争摆到解放区，保证吃饭、筹草、抓壮丁、搞鹿砦一切都出在解放区。毛主席讲：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使他的管区不受战争影响，或付出的很少，这样支持三、五年，则不愁解放区不垮。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我们一百多万军队，蒋介石二、三百万军队，一起堆到解放区，吃他

---

这是陈毅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上旬，在河南省室丰县召开的中原野战军第一、三、四、九纵队团以上干部整军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的节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三年五载，双方五、六百万人，光屙屎一天也要屙五、六百万堆。你能俘虏，可是俘虏也要吃，俘虏过来的第一天马上就要解决伙食问题。所以去年我们这一反攻，带决定性的胜利就是把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把战争包袱放到“蒋委员长”头上。战争是一个皮球，他踢过来，我踢过去，最后踢到他头上。战略上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讲过的，毛主席讲了这句话。去年转入进攻，毛主席讲话非常谨慎。去年八、九月中央只讲“反攻”，不讲“进攻”。反攻的意思是反到什么地方不一定，反不过去再回来（全场大笑）。毛主席讲得非常谨慎，量力而行，毫不吹牛。一到十一月，大别山的部队统统解决了棉衣问题，刘邓一个电报，棉衣可以解决，大别山巩固了。毛主席说可以叫“进攻”，不是“自卫战争”了，而是“人民解放战争”，人民革命战争的进攻。反攻是带有自卫的性质，人家打进解放区，你反出去，你们都是军事家，都能了解反出去太远了还要糟糕。毛主席曾估计到进入大别山有各种困难，甚至于估计到打不好再回来，不能死在外面。试一下，胜利了，站住了脚。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毛主席在给刘邓的作战指示中曾讲过：“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全国战争的负担加到解放区身上，达到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我们的战略就是要尽量破坏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使蒋介石担负全部战争负担，达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大别山的行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报告[3]第一段里讲：“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不是在解放区里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了。”把战争的车轮扭转过来，以蒋介石的人力物力支援战争，用蒋介石的骨头熬油，把我们解放区的力量培养起来，支援前线。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再加上战役上战术上的胜利，一定能打胜。毛主席特别强调战略。去年冬季我在陕北时毛主席谈了这些问题，今年五月又叫我去一次，又是谈战略问题，这是古今中外未有过的军事学。这一战略上的解释是任何书本上也未讲过的。我们对于军事上的胜利，首先要从战略估计起，其次才是战役与战术的胜利。如果战略上失败，战役战术的胜利不能改变战争局势。华野的部队打一次胜仗，枪搞得多，弹药搞得多，全军就高兴狂欢，有的通讯员打马游街，第二天战场上枪炮齐鸣，掉手表的，换钢笔的，哈哈大笑，快乐得很。但是打一仗如果没有搞到东西，仗打得苦，这就骂娘发脾气，抱怨上级，“你是嫡系，我是非嫡系”。这些都不是从战略上看问题。还有打钳制的打得多，补充不大，队伍苦了些，就影响情绪。自然我们领导上要负责，在分配任务时应尽量照顾。但有时也很难，敌人恰恰从这方面来，你的部队离得近，只有用你的部队去抵住敌人。我们今后要注意对钳制部队的补充表扬。毛主席特别奖励我们：“你们是主力部队，主力部队就要吃苦。”（大笑）挺进中原当然是主力的事，不能拿二、三等的部队。你既然是主力，就应该跑去受困难；你主力受不住，二、三等的队伍一去就完了。（大笑）

将来挺进大江以南还是要主力去。如果拿晋冀鲁豫的二、三等部队进入大别山，当然要拖垮，不会保持现在的样子。所以李先念同志[4]在中央会议上讲：有些同志说这样好的部队这样拖太可惜。毛主席马上讲：就是要你们拖，你们拖还能拖出来，人家拖就拖垮了。主力比较老，配备比较强，你们要负担主要的任务。挺进敌后，转变战略，更要使用这些部队去。国民党为

为什么不拿一个部队挺进太行？军事上是相对的，对我有利，对敌人就有害。我们可以挺进到大别山搞他一个大转身，使蒋介石作战略上的撤退，几百万军队向后转，真是转不过来。既然我们能这样，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不这样？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军队是没有我们这样的阶级觉悟的力量的。傅作义试过一次，挺进河间，把我们的孙毅[5]同志搞得恼火，但是当他们察觉我方有备时，还是赶快回头。美蒋顾问为什么不能来这一手？这是因为他们部队的素质不行，干部的素质不行，军队反人民的性质，确定了不能干这一手，如果他把十万人开进太行山，那就会被消灭得更快。毛主席反复他讲，第二年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因此有很多战役的胜利。反过来了解是不对的。战争第一年敌人疯狂进攻，敌人各路大举进攻，我们解放区不能当面迎敌，被迫撤退，在不断撤退中争取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一个旅、一个师、一个军地歼灭敌人。战争第一年的形势我们是以退为进，以撤退地方换取歼灭敌人，达到转入全面进攻。蒋介石进到济宁、兖州、泰安、新乡，西北一直进到绥德、葭县[6]都是在黄河岸上。我们战略撤退的终点也是黄河。蒋介石的战略进攻的最高点是达到黄河南岸。这是第一年的战争形势。一到第二年七月鲁西南战役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在此前后，东面打孟良崮[7]，西面打刘戡[8]，敌人进攻达到了顶点，蒋介石拿出吃奶的力量也不能再进了。我们也不能再退了，再退解放区将受更大破坏。去年七、八月无论如何要战略反攻，敌人的兵团都摆在黄河南岸，他的屁股后面很宽。我们反攻，敌人被迫来一个大转身，但是来不及，造成很大的失败。犹如关公与黄忠打，关公退两步来一个拖刀之计把黄忠捉了。蒋介石是中了毛主席的拖刀之计，战略上陷于混乱，手忙脚乱，南京、武汉发生问题，他就顾不上整沂蒙山区了，整个战争发生了带有决定意义的变化。

毛主席的指导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是有重要意义的。你们第一次进入鲁西南消灭整三师，正在向豫皖苏转进，看到不对又转回去。因为那时我们整个野战军的序列还没有编成，进入敌后作战是很危险的，有被歼灭的危险。山东军队进入淮北很不利，水太大，不得不撤回。第二年转入进攻当然也有些困难，如政治上没有准备，没有研究政策，装备没有减轻，一个命令就走，会都没有开好。陈粟部队更是没有准备，部队拖得很苦。这些困难毛主席与中央早已估计到了。毛主席曾估计到我们到新地区后，新兵没有补充，伤员无法安置，弹药没有补充，枪打不叫，炮打不响，他们相信这些局部的代价一定要付，但是也估计这一代价可以收回，以这些具体的削弱换得战略上的绝大胜利，所得大大超过所失，所以坚决进军向南。刘邓是第一个出来，陈谢兵团是第二，我们是第三。陈粟兵团在渤海曾要求一个礼拜的时间作些准备工作，中央不准，连电要我们赶快过河。到聊城后，我们要求停三天解决给养问题和弹药问题，并安置一下伤病员，中央急电催我们过河，留人办这些事情，当时真是“火烧屁股追得紧”。现在我们才懂得了，这是事关战争成败。我们的队伍拖垮一点，这些困难是局部的；这等于我们野战所付伤亡一样。我们野战消灭敌人要付伤亡，大家认为是应该的，而对这样一个战略收获付出代价难道就不能理解了？我们现在还要准备下一次战略进展，还有一次、两次的挺进，我们各级干部要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才能领导这一工作。我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不了解，讲些怪话，是因为我们幼稚，这样一个大的原则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快了解的。

当你们初出陇海消灭整三师时，我们部队走淮北不利，两淮失守，我们



就向中央提出一个建议：是否打出去，向四川，渡长江，中央说：“太早，等一下，问题提的是适当的。”军事上，无论如何，战略意义很重要，必须使全体战士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部队大部是北方人，要他到南方“蛮子”地区是很不容易的，过黄河就是一个问题，比妈妈死了还大。我们的干部对于这一问题也是不了解的，过去两年战争的胜利是从各个战役得来的，更重要的是战略的胜利。昨天晚上，新华社广播两周年总结并提出第三年的任务，第一条是把战争继续引向蒋区，深入蒋区消灭敌人，一句话就是要过长江。我在华野作报告要继续把战争引向蒋区，一个调皮的战士马上说道：“首长，你不要讲得那样弯弯扭扭，你就说过长江。”这个山东同志很痛快，实际上就是过长江。现在的蒋区已经不是很远了，只剩下九个省，最南也不过镇南关[9]。我们过去说抗战到底，“底”是指鸭绿江。华野部队有些人说怪话：“胜利是哪一年啊？消灭一个二十五师，还有一个二十五师，消灭一个三十师，又有一个三十师，究竟是什么时候完？”实际上再深也不过九个省，远也不过九个省，并且不要省省都到，只要占了四川、湖南和两广的一部，蒋介石的统治非结束不可。消灭蒋介石的残余，只要几个兵团就行，一纵的几个同志昨天汇报中提到部队疲劳，装备减低百分之六十，三、四万人的纵队现在只有万把人。这一定影响情绪，影响战斗力，这种编制许多仗不能随便打。可是这一损失不是白费的，整个山东、华北、中原解放了。刘邓兵团一个纵队损失三万人，但是地方武装有发展。我们损失几万人，换得整个山东、华北、山西与中原解放，实际是再便宜没有的了。所以问题必须从战略上去认识。我们现在准备下一次的战略展开，对于这一问题要很好的解释，不然要引起混乱和逃亡。毛主席讲：为什么我们能打败蒋介石，取得全国的胜利，就是去年战略的胜利。不管任何困难，我们拿出党最好的部队，如一、二、三、四、六、九各个纵队，原先的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一部，中野就是那几个部队，拿出自己的血本去搞。这是相当冒险的，领导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大革命没有这样大的决心是不行的。毛主席讲：假使我们不出去，刘邓打了那样的胜仗仍旧撤过黄河，所有部队都可以得到补充，所有同志都会满意，可是敌人也要继续过河；刘邓不出去，山东的部队也不能够出来。敌人仍在山东打，冀鲁豫、豫北、鲁西南一直打到现在（十二月底），我们的解放区一定要垮，山东一定不能支持。山东只有退到渤海区，山东的敌人就有可能从济南打通津浦路。我相信我们野战军还可能打些胜仗，消灭他几个军，可是这一、两个军的代价不能补偿战略的失败。我们的解放区是以山东、河北平原与大行为基础的，山东一失，基础动摇，我们就只有东北了，战争就难以支持。所以去年的战略进攻看来是有点“搬蛮”[10]，可是这个“蛮”不得不“搬”。那时，我们在思想上感到很奇怪：与毛主席在一起多年，毛主席向来是极关心部队的，只要你一讲部队困难，他就要你休息几天。这次就不管，不准讲这些，并且追问不过河的是哪一个，“请立即查明予以处分，报告本部为要。”

这个官司直到现在还未打清。我这里必须说清楚，下一次的战略行动比去年要好得多。今后过长江时，整个中原已经解放了，那么就坐稳了半边屁股。华野进入淮北、安徽、江西；你们进入两湖、江汉[11]，进入湘鄂西、陕南[12]，进入四川。这与去年突然跃进大别山是不同的。同时，两年来战争情况也变了。去年华野部队执行这一战略行动时，也是有些怪议论。一个同志跑来说：“我看很严重。最近这样搞法，历史的惩罚等待我们。共产党

的长征没有哪一次不失败，如井冈山突围，朱毛万里长征，徐海东从鄂豫皖到陕北[13]，李先念到陕南[14]，都是不得了，基本上是脱离了党政军民的帮助，孤\*军深入，焉得不败？这次为什么不在内线作战？内线作战伤亡好安置，炮弹能补充，一个仗打不好跑到大别山，我看刘邓到大别山要。倒霉！现在把我们也送去，这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自然你说这个议论完全没有道理也是不对的，但他最大的毛病是没有看到一年多来的战争变化。实际上历史上的每次长汪都是最后没有办法了才突围，今天是我们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胜利之后最后主动地向敌人进攻。苏区长征是最后没有办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是保存革命力量的办法。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是胜利的局势，一个是失败的局势，过去的长征一定要失利，这次就一定要胜利。

过去长征受到历史的处罚，这次进军须受到历史的奖励，因为现在与过去基本上是不同的。过去蒋介石对付我们长征的队伍是前截后堵，拦腰一棒，全国统一“围剿”我们；万里长征是万里长跑长追，追得你屁滚尿流，那是敌人胜利的“围剿”。现在是蒋介石惨败以后，一路撤退，各路惨败。我们一进入大别山，他必然要撤退；华野与陈谢部队加上去，敌人就一定失败。那个同志和我谈到天亮时，他还是半信半疑，临走时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是充分估计了困难，五、六、七月粟兵团的一、四、六纵队准备过江[15]，像你们去年一样先到那边。我们充分估计了困难，并且困难不会少，可是一定要估计到胜利，因为十万大军进入江南，中原敌人就顾不过来了，他就不会去争鹿邑、南阳，他就要去衡州、浙赣路上布防，中原的大城市就可以彻底收复了。经过了第二年的战争，敌人士气更低，因此过江的困难比去年要少得多。这样的估计才是正确的。

注释：

[1]陈谢，指以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的太岳兵团。[2]陈粟，此处指陈赓、粟裕率领挺进豫皖苏地区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

[3]毛主席报告，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4]李先念，当时是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

[5]孙毅，当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

[6]葭县，今佳县。

[7]东面打孟良崮，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之孟良崮地区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三万二千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8]西面打刘戡，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三日，西北野战军在陕西省宜川县城及其西南的瓦子街地区发动宜川战役，歼灭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以下二万九千余人。

[9]镇南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西南国境线上，一九五三年改名睦南关，一九六五年又改名友谊关。

[10]搬蛮，西北土话，蛮干的意思。

[11]两湖、江仅，指湖北、湖南和江（长江）汉（水）平原。

[12]湘鄂西、陕南，指湖南、湖北西部和陕西南部地区。\*

[13]徐海东从鄂豫皖到陕北，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担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的徐海东与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部长征，两个月后进入陕南，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五年七月，为接应已到川北松潘地区的中共中央，率部西进

甘肃，于九月到达陕北。

[14]李先念到陕南，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集中三十余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指挥中原突围，并带领主力一部转移到陕南。

[15]粟兵团的一、四、六纵队准备过江，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央军委为迅速改变中原战局，指示粟裕率领由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的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经过充分准备后渡长江甫进，执行宽大机动的战略任务，创建闽浙赣根据地，以吸引中原地区之敌军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该

兵团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故简称“粟兵团”，渡江后称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经粟裕建议后，五月初，中央军委采纳粟裕的建议，决定该兵团暂不向江南作战略机动，先加入中原作战。

## 中原工作近况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

(一) 九月六日电悉。你的建议[1]完全赞同。你去后[2]八月十号前[3]开一、三、四、九纵会议，会报工作。八月十二到月底在方城开二、六纵会议，作襄樊战[4]检讨，召集桐柏、江汉、陕南会报工作。九月初回来，才见到中央八月关于整顿纪律各电。中原局即开会讨论和会报情况，共历四昼夜，已通过一个决议：拥护中央制度[5]和整顿纪律的决定（此文件初稿已拟好，待审查后数日即可发来）。另讨论了九月综合报告的内容，特别是保证中央新区政策（停止土改，进行双减、生产）之执行，有详细讨论。此报告由我写，要九月半才能交卷。另外决定发一个秋冬两季工作指示，继《六六指示》[6]之后，确定全区工作方针（雪峰[7]写好后先交中央审核）。

(二) 邓老[8]八月份不吉利，腰痛，痔疮，带病工作，讨论了秋征、双减、冬衣诸问题，我们又插上督促各纵的查整[9]和布置抓新的战机，故都很忙碌。特别初到刚满三月[10]，情况仍不熟悉，执笔综合很难。提议会后即回，并恳将此情转达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

注释：

[1]你的建议，指邓小平九月六日在河北省建屏县（后并于平山县）西柏坡村给刘伯承、陈毅、邓子恢、李雪峰、张际春（中原军区和野战军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子久、李达（中原军区和野战军参谋长）并转宋任穷（中共豫皖苏分局书记）的电报，要求中原局于最近制订一个克服党内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正式决议。

[2]你去后，指邓小平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离开中原局驻地到中央去参加“九月会议”以后。

[3]八月十号前，指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七日中原军区和野战军在其第四纵队驻地集中第一、三、四、九纵队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陈毅传达中央各项指示，开始整党整军工作。

[4]襄樊战，即一九四八年七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原野战军一部及桐柏、陕南军区部队在湖北襄阳、樊城地区进行的战役。

[5]中央制度，主要指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

[6]《六六指示》，指中共中央中原局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五月二十五日关于土改整党的指示而制定的停止土改、实行双减和合理负担的政策指示。

[7]雪峰，即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副书记。

[8]邓老，即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和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办公厅的工作。

[9]查整，即三查三整，在部队为新式整军运动。

[10]刚满三月，陈毅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到达中原解放区的，到九月六日，接近三个月。

---

这是陈毅回复在中央参加“九月会议”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拟。

## 中原局九月份综合报告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

毛主席：

小平七月北去[1]，我们托其面达，因而未写七月份综合报告。

这次来写九月份报告，拟将整个夏季五、六、六、八四个月的情况和政策转变问题，汇报如下：

### 一、中原情况

经过夏季的连续胜利，和中原局《六六指示》，军事胜利与政策转变并进，因而使中原局面开始变好，这是第一方面。表现在许多中心区的出现，如豫西二十余县无敌踪，陕南之郧县、郧西[2]变为腹地。豫皖苏在七月以后，阜阳敌七十四师撤退，中心区已广阔无敌，大别山局面开始稳定。江汉区、桐柏区、汉水与平汉之间取得发展等。市镇农村秩序，开始恢复（例如豫西中心地带人民说，二十年来从来未有如现在的安定，历来的兵匪骚扰没有了，农民纷纷多买牲口，生产积极）。中州券[3]信用开始建立。知识分子开始近我。逃亡地主先后回家等。这就使我党在中原获得了基地，部分建设可以开始，造成向南的战略基础。这是一年努力的成就，第二方面，蒋匪鉴于我主力集中应付野战，其在中原各地的地方反动政权已摧毁，乃乘我过去政策过左及以后政策转变采取下列对策：一是由南阳、商邱、合肥诸地派遣正规军配合流亡土蒋[4]千人、数千人不等，分股对我中心区进行穿袭，企图分散我野战兵力，减轻其野战军担负，捣毁我后方，破坏我建设。二是利用我宽大政策派遣特务回家，组织武装进行暗杀，镇压我区、村干部，特别是所谓“枪打出头鸟”，先杀群众积极分子，使群众不敢起来。三是组织谍报网，携带电台潜伏我区内，报告我军主力动向。四是广泛谣言攻势，说我军要退回河北，中央军大军来中原进剿，号召河南人反对河北人，三次大战已爆发，共军必败等。五是在国民党区域实施总体战，围寨网，联防，连坐等办法。反动派的政策是生了不少的成效的。此一时期，我中心区后方被袭击各地均有，主要是地武不强，不能独立担负保卫地方的任务，村、区干部被杀事件甚多。如方城县长被绑赴南阳杀害。我军每一调动，敌方第二天即知道，证明我区敌之电台甚多。谣言攻势效验很大，许多知识分子尚不敢踊跃入学。例如军大[5]搬在临汝城数月来仅两人入学，证明该地特务控制甚强。临汝之姚宝安、杞太淮[6]等地之郭馨波、豫南淮西之张旭东等便是反动武装的代表，各区均有数股或数十股反动游击武装，在我区穿插或扰乱边界，逼我区后退。敌我两军交界地方的市镇、农村人民的生活是异常痛苦的，一部人民仍然存着观望态度，民主政令之推行障碍仍然很多，我区之流动性仍然存在。

### 二、河南地区的特点

---

这是陈毅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结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其时，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参加中央九月会议，陈毅代理其工作。

我党足迹踏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可举豫西临汝、鲁山、宝丰、伊阳、郟县、禹县等地为代表，这是我们最近

的体验。我们驻地发生三次黑夜摸哨，枪伤哨兵，最近破案即房东所为。南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军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克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区、村干部之被击杀，造成一种下乡恐怖。比较抗战中期我军在阜宁所遇着的土匪，此地更为强蛮。研究了数个具体的谋杀案件发现，他们多半是恶霸地主作后台，策动流氓退伍兵作凶手，有组织干的。他们说：“八路军要款，要公粮，要壮丁，要派夫，经过我，我一定负责办到，如直接去动员群众翻我的底，则一定与河北人斗争到底。枪打出头鸟，任何人先与八路军接头办事，一定要杀全家。”他们确实说得到做得到，控制了群众，使群众不敢起来，白天不敢与我们说话。豫西上述各县是白狼、刘镇华、樊钟秀、孙殿英[7]的老巢，确有拉队伍、搞会门、搞黑杀的传统。以前的土改，确实有些便利了这些地方恶霸流氓，基本群众根本不敢动。桐柏、豫皖苏、陕南，宛[8]东、宛西各地亦有类似情况。河南敌正规军虽被消灭、撵走，敌县、区政府、保安团虽被摧毁，但是这一基层恶势力如不推翻，一切由上而下的发动群众的办法，均可能变成他们镇压群众的工具。同时他们更善于应付我军，一到即承包战勤，自动带枪来加入地武[9]，来当乡、保、甲长，懂得把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黑杀结合起来，每一暗杀事件，多与当地乡、保长有关，或他们先知道不讲。我们干部无经验，最易被其公开应付一套所迷惑。国民党的挺进武装与特务能在我中心区活动，即依靠此一基础。因此应估计到如匪正规军来进攻，此辈必然大暴动来响应他。中原解放区创造第一阶段，必须懂得首先解决此一问题，必须要充分了解河南的地方知识和地方斗争知识，以对症下药。河南中上层人物最熟悉改朝不换国那一套，即拥你为王，下面得承认他们的统治地位。我党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先制服他们；要制服他们，亦必须同时发动群众。我们南下干部，学会了老解放区的正规的由上而下的动员方法，对河南又是公开斗争，又是秘密斗争，又是武装斗争，又是和平交往，颇不熟习，必须重新教育，锻炼出一套新本领。同时又要认识河南地区出兵、出粮，人民斗争性坚强，如经过政治与组织的

改造与提高，革命的效果必大，可造成最好的基地。

### 三、中原党内部情况

党的干部分为四大部分：（1）南下干部，由华北、华东派来，此为中原党的主干，其中分为未整党前南下的，和经过整党南下的，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戴过帽子背有包袱的；另外，其中一部是个别抽调的，一部是由几个负责人按级抽了一套干部带来的。（二）当地的干部，即原华中八分区及睢杞太、豫西和五师地区的干部，有系失联络的，有系掉队下来的，有系原地下党干部，一部是归俘。（三）是野战军的派遣部队、地方化的部队和干部，成为全区军区、分区的主干。（四）一年来新起的下层干部，多担任行政区、乡干部，或农会干部。南下干部带来老解放区的整套作风，对解放区初期运动规律不熟习，特别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当地地方干部情况复杂，须加审查，特别表现是左右摇摆，无根据地经验。野战军分遣干部和部队，总想归建，不尊重所属区党委、地委和行政部门。地方新起干部，一部工农成份是好的勇敢分子，一部则是旧保甲被利用的人，不可靠，实际是两

面派。我们认为干部状况如此，故很自然产生宗派、山头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必须经过整党，才能保证政策上的统一。

#### 四、关于中央新区政策的执行

六月六日中原局根据中央五月二十五日土改整党指示，发出停止土改、实行双减和合理负担的政策以来，分浮财，打土豪，开仓放粮，以粮换菜，走马点火，点火抄家等急性土改办法，已迅速纠正。社会秩序的混乱，业已趋于安定。对工商业的破坏，业已停止。据子久[10]八月底从豫皖苏回来所谈，与八月底在方城召集桐柏、江汉、陕南三区代表会报的材料来看，则各地对《六六指示》的了解和执行程度，是大有差别的。（一）共同意见对崭新区，即我军未到过的地区或未进行土改点火的地区，实行《六六指示》一致赞成。（二）豫西区因在中原局附近，谈得多，以前未大搞土改，故赞成搞双减。大别山皖西、鄂豫二区亦无条件赞成，一律改力双减政策，因该两地区是游击区，中心腹地极不稳定。（三）豫皖苏则划一、三两分区及二、四各分区一部为土改区，余为双减。桐柏则划一分区及二、三分区一部近百万人口为土改区，余为双减。江汉划一、二分区百万人口为土改区。三个地区的共同论点是：第一，坚持这些土改区的土地确实业已分配，据说群众不愿退地。但我们一追问，任何人拿不出一个村、一个区的真正实行土改的材料。第二个理由是双减不能满足贫雇农要求，或双减较土改难作。第三个理由，南下干部在河北搞过土改有经验，不会搞双减，大部分均是从近二、三年土改中产生的干部（指区、乡级干部人数最多）。一部干部则过去搞过双减，在去年九月整党戴地富帽子，现在又要搞双减，恐将来整党一定又挨斗。第四个理由是就中央以前指示，在环境、群众觉悟程度，我们干部和机构的掌握能力具备时才搞土改，因而他们分析：第一、说环境，我区有中心腹地，已安定。第二、干部相当具备，有土改经验。第三、群众要求土改，其觉悟程度已提高。根据上述的认识，他们便提出下列工作部署：（一）凡属梅花形的几个土改区或土改点，他们便决心布置消灭中间的空白村，一律用土改去打成一片，例如豫皖苏一分区的睢、杞、太[11]和三分区以萧、夏、永[12]为中心的某些梅花形小块是老区，而将全区一律用土改方针去统一起来。（二）凡属比较安定的地区，例如分区或区党委所在地，也一律用土改方针。这是由于他们对过早的急性土改所造成的少数勇敢分子孤立突出被杀害、土匪蜂起、征粮困难、工商凋敝、人民失业的危害认识不足，对真正实行了土改的地区即群众真得到土地的地区，并无真正的研究，使我们至今难放统计有多少人真得到土地利益。（三）在中原确实有部分地区，民兵积极保家自卫，地主威势打落，且经过“扫荡”的考验，究竟是由于我军协助群众打击了恶霸，减轻了负担和政治压迫而来，或真是由于从政治民主运动进到真分了土地消灭封建而来，各地并未作过专门研究，所以在电报上会报上都无人能负责具体答复。

#### 五、政策检讨上的教训

根据上述概况，我们研究后得出以下几点教训：

第一，我们认为从停止土改转到双减和合理负担政策，几个月来，中原

党最缺乏深入研究中央政策和具体研究当地情况，首先去获得当地各种知识，然后把中央政策与当地实际结合，通过群众意见，去订出适合人民要求的工作方针，而是仅凭主观办事，不仅坚持土改，举不出真凭实据，即转到双减与充分利用抗日经验的认识，亦是模糊的。这里不仅看出吴芝圃、赵紫阳[13]等同志的对“左”的留恋，同时亦检查出从右的方面去了解新区政策。例如把暂时利用旧保甲解释为提倡旧保甲廉洁奉公。又如说统一战线是群众解放的策略阶段，即搞统战可以不发动群众。又如号召地主回家，造福桑梓。又如豫西、洛南成立地主和平救国会等。我们一般估计中原党内“左”右倾同时存在，故掌握党政策是很摇摆的。这里教训我们一个政策的改变非有系统说明不可，更非根据下层的实际调查作有理论的说明不可，我们在这方面很差，所以纠正不彻底。

第二，各地同志均对中央政策采取断章取义，或利用其合我口胃的一段或一部，作为自己的掩盖阵地，口头上同意上级指示，并不把上级指示研究带到群众中去，真正查勘一下，如何是好。例如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指示和中原局《六六指示》，对土改已彻底进行的地方均有保留的指示，各地即利用这一点去扩大土改面，而并不是根据自己调查研究，切实知道某地的真分假分来决定。

第三，各地缺乏从全局看问题，从整个战略利益看问题，把土改看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中原现在局势，在政策上要求能“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武装力量，及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因而需要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这一层是不加考虑的。对八十万人马的军需问题之解决，是首先需要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秩序，生产工作最得人民拥护，也不大考虑的。紧张的阶级关系是目前我中原党的主观能力所不能掌握的，混乱的社会秩序是最不利于战争进行的，也不放在政策考虑的主要位置上。

第四，认为停止土改是退了一步，不了解过去急性办法正是领导者离开群众跑得太远，现在是要退到群众原有阵地与群众重新结合，率领群众真正前进。

第五，我们深感形式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由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方式的群众工作路线，是普遍存在，最障碍党与群众的结合。豫皖苏人民说：“要我们分地，请先把棺材准备好。”在干部中相当普遍的流传：“讨论土改派土改，派了土改催土改，催了土改缴土改。”这是最中时弊的舆论、与群众工作中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等行政作风的典型。目前真正的群众利益，在于打击政治首恶，肃清土匪，减轻负担，获得初步解放，要依靠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去发动群众，与群众呼吸相通，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从启发群众的自愿自觉出发。这种真正的群众工作路线，是我们最缺乏的。这里使我们觉悟到这一基本问题不解决，固然会使本来很好的一个土地法一变而为原始的农民的破坏运动，已令人吃惊。如果顺此路线去搞双减，也一定不能收得更好效果，难免不重复“讨论双减派双减，派了双减催双减”，直到“缴双减”。

## 六、今后工作方针

一、一年之计在于秋，秋粮收割后，今冬明春的群众运动，事关中原全局。我们抓住九月十月要解决群运的方针问题，已电芝圃、汪锋[14]先后来面谈，并派人去桐柏、江汉巡视。在豫西抓住临汝、郟、宝、伊五地委，重



点配备五百个干部，以金明[15]任五地委书记，特别以临汝、宝丰两县由子恢、雪峰[16]就地指导，做出经验去指导全局。

二、工作方针决定，坚持中央新区政策和《六六指示》，实行双减。而且在许多接敌区域（占中原很大面积），暂时还可以不搞双减，着重组织对敌斗争，使游击战争与合法斗争控制两面派相结合，以打击首恶，争取地富左翼，中立中间阶层，吸收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这些地区以组织自卫队，肃清土匪，保护人民安全，减轻负担为主要任务。在中心腹地着重发动政治民主运动，以打击恶霸，防匪自卫，合理负担三者为中心，作为初步发动群众的主要口号。在双减条件具备时，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进入双减，不机械的过早去搞双减。在某些土改区责令各地切实调查，以不动摇群众既得利益为原则，实行调整土改或改为双减，甚至双减也缓行，不准主观的去扩大土改面，不准损失群众既得利益。

二、进行深刻的群众工作教育，要各级党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无论土改，无论双减，或初步打击恶霸的群众运动，均须耐心艰苦去进行。如何下手接近群众，如何通过群众的自觉，如何制定斗争纲领，如何组织斗争，如何掌握斗争，总结斗争与转到新的环节，这是群众工作的基本知识，是群众运动的成败关键，对群众工作干部应注意重新教育。

四、中原局办《中原通讯》，并用力办好《豫西日报》，区党委办整党班，地委办群众工作训练班，来说明党的政策，进行群众工作教育，克服干部各种偏向，强调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山头、宗派，达到执行政策上组织上的统一，使党的阵容面貌一新。

五、进行大的宣传运动，并经过新华总分社有系统写社论，来揭破匪方宣传，和深切说明党的政策，大胆争取地富左翼，招收青年学生，开办中小学校，开正式的参议会，分化匪特内部，以摧毁其反动基础。这一点各地均不注意，甚至不屑去做，这是一个偏向，便利了匪特的破坏。

六、在新区初成立的区、乡行政机构，以及工农团体，客观上均免不了带着维持会的性质和一定程度的两面派作用，我们要先懂得这一特点，逐步去加以改造，在群众中去发现真正的积极分子，逐渐提到领导地位，革命的人民团体和行政机构才可以出现。

## 七、其他各项工作的概述

在这次综合报告，是以叙述新区政策的转变为中心，关于野战军工作，俟各纵整党结束即行汇报。军区工作，正收集材料作报告。财经贸易工作，宣教文化工作，城市工作，亦另作专门报告。我因明日即出发赴前线参战，故不能在一次报告中把所有问题讲完。但在本报告末，仅就大的轮廓作一叙述：

（一）刘邓、陈谢两野战集团，其各种优点不叙述外，主要问题是工农老干部的军阀主义倾向，表现在阻碍民主和轻视政治工作；知识分子干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地富思想影响下，表现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政治认识模糊；上述两者的结合或互斗，是使部队工作受损害总的根源。两者共同点是脱离士兵与下层实际的官僚主义，常寄托其兴趣于生活的谈论与技术的吹求，很少关注军政大计。以上各方面，基本上我认为与华野相同，但无某某

等那种骄横，纪律亦较好，制度亦较严。这次整党，主要从纵队首脑着手整起，从八月起开会听报告，来往费去半月时间，实际查整或从八月上旬起，或从下旬起，多者不过二十天，少者仅十五天。纵队与旅两级（有团或营全体参加）是普遍做到了上、中、下三层亮，来揭露工作，开始了民主作风，个人主义、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小资地富意识，是受着了严厉的打击。工作的新气象初步开始。缺点限于时间，未能转到营连与士兵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士兵民主运动在七月以前各纵也搞过半月到十天，亦略有基础，但均因时间关系，未能彻底深入。故纵、旅、团的整党，以及中下级和士兵民主运动，均待今冬战斗空隙继续去作。士兵工作中最大的倾向，一是把士兵会变成形式，热潮一过，空洞无物；一是变为连排干部的御用工具，用以专任处罚士兵，实际起取消士委的作用。能起三大民主作用，并代表士兵利益的健全士委不是没有，只是太少。我们决定在一面作战一面整训中，加强各级党委与政治工作的思想领导，与连队士委工作结合起来，去保证执行任务和提提高军队各种建设。

（二）地方军区建设。中原局已发出指令，令各野战军主力不得与分遣之地方化部队发生勾搭关系，应督促其一心一意完成地方任务，令各地方化部队服从当地军区和党委领导，该部即划归地方军区直接建制，地方军区党委应视为自己的基干部队，加以培养，不得因其将要归建制而加歧视。我们强调这些部队之归还野战军权在中央，亦可能不归还，将来还可能在中原成立新纵队，把这三面的矛盾解决，统一起来，才能担负保卫地方、肃清匪特，作为野战军助手任务。县区部队最初胡乱招兵，自己麻痹，不能控制，以致不断发生叛变。现在又转而不敢招收，有停止了地武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只要自己有基干，自己有整套诉苦民主改造办法，是可以大量收容使其成为正果。这一批地方上失业流氓，退伍士兵，只有吸收到野战军、地方基干部队，才是改造的好办法。另外，各军

区、军分区成立军区、分区等党委办法不好，常变为与区党委、地委对立，以照中原局办法改为军事小组为好。

（三）财粮、贸易、战勤等工作，主要倾向是一般人民负担太重。近八十万人马，实际负担人口总数仅二千万。财税人员缺乏，许多税收无人去收，减少了收入。用中券排法币，各地一致，人民亦拥护，但中券筹码不够，分行设立太少，蹬打不开。夏围已完成大部数目，秋征亦可能做到。主要是财政人员用老解放区复杂的累进办法不便于民，已纠正。供给和战勤方面，主要斗争是废除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和无偿支差制，转到用资本主义的有偿支差制，这是严重斗争。我们的财供行政干部思想仍旧贯，转不过来，例如雇商用汽车运伤兵，又快又节省。支差民力按劳动市价给钱，做衣服鞋子在洛阳等地定货，比自办被服厂、鞋厂或派军鞋均好。我们财政供给干部的观念老转不过来，不敢掌握资本主义的办法，需要大力说服与教育。现在卫生部和医院已初步扩大，足够收万余伤员，需要办卫校，荣军学校，来有计划收容和管教并提高救护能力。

（四）在文教方面，中大[17]四百余学生，军政大学一千一百学生，均河南本地籍，一部来自蒋管区，正大批招收。就八月内开始授课，以造就军政干部为宗旨，颇得学生欢迎。原河南大学几个教授讲空道理那一套为学生所不满。现拟办行政学校（豫西办），卫生学校，各部队招收文工队，可望能大量吸收。学生中情况，一部是经家庭同意送来的，一部是违反家庭意旨

跑来的，一部是一些落伍、退役军官，失业职员。主要缺陷是办学校的人员不够，无得力人主持和事务人员最缺乏。各地中小学开办问题，人民均提出此要求，一面限于经费，一面限于无人去参加管理，故尚未决定大发动。教科书缺乏也是障碍中小学校发展的原因之一。

最后说明中原局面，正在具备初步根据地的条件，正在走向应付大规模作战的条件。中原行政委员会必需建立，来担负领导战争，主办财粮支前，改善民主的严重任务。我们机构不健全，仅能就现有规模进行大批地方干部的培养，以应付局面开展的需要。中原局各同志均亲身轮流到中大、军大上课、讲话，还要计划办各种训练班，实际指导附近各县工作，并派人巡视，来抓住冬春两季的工作。

注 释[1] 小平七月北去，邓小平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离开中原局驻地，前去中央参加“九月会议”。[2] 郟县、郟西，这两个县本属湖北省管辖，但当时中原局将其划归陕南区党委领导。[3] 中州券，中原解放区发行的货币。简称“中券”。[4] 流亡土蒋，指流亡到外地又潜回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地方武装。[5] 军大，即中原军政大学。[6] 杞太淮，指杞县、太康、淮阳地区。[7] 白狼、刘镇华、樊钟秀、孙殿英，白狼应为白朗，民国初年曾在豫西发起农民暴动，但因不讲政策，脱离群众，一九一三年被豫西“剿匪”总司令刘镇华率部镇压。刘镇华，巩县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曾任豫西镇嵩军首领，先后任陕西省省长、安徽省主席兼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樊钟秀，宝丰人，国民党军长，曾任建国豫军总司令，一九三一年任阎锡山、冯玉祥联军邓宝珊部副总指挥等职。孙殿英，永城人，一九二二年投身于豫西镇守使部下，一九三九年任国民党新五军军长，一九四三年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委力第四路军总司令。一九四七年五月进攻解放区时，在汤阴被活捉。[8] 宛，即南阳，过去称宛城。中原解放区曾划分宛东、宛西两县。[9] 地武，即地方武装。[10] 子久，即刘子久。[11] 睢杞太，即睢县、杞县、太康县。[12] 萧、夏、永，即萧县，夏邑、永城。[13] 吴芝圃、赵紫阳，当时分别为中共豫皖苏分局副书记，豫皖苏行政公署主任和中共桐柏区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区副政治委员。[14] 汪锋，当时任中共陕南区委书记、陕南军区政治委员。[15] 金明，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副政治委员。[16] 子恢、雪峰，即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副书记李雪峰。[17] 中大，中原大学的简称。

## 关于开好曲阜会议的建议 (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

(一) 这次曲阜会议，应就夏季各纵查整及濮阳查整[1] 的结论作两个月来战斗与工作的实际检讨，归结到中央指示关于无政府状态、无纪律状态的根本纠正，保证今后能建立深刻的整体观念，予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保证能更顺利地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和争取大革命胜利。经过夏季查整的纵队应进行继续检讨，未经理夏季查整的纵队应进行补课自修。例如三、八、十、十一各纵负责干部与纵、师各党委的检讨是十分必要的，头子的自我批评作用最大，应利用战斗空隙去进行。

(二) 刘邓[2]、陈谢[3]两集团，于八月中到九月中进行一个月查整，其主要收获是揭发了我军部队中一部分老干部的军阀主义倾向，骄傲自大，破坏政策和纪律，其特点是压抑民主，与一部分知识干部的地富思想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其特点是自由主义，对政策摇摆，闹无原则纠纷，两者的结合或互斗，以两者均不了解下层实际，不关心士兵的官僚主义倾向，使党的指示不能下达，使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不能上呈，这是障碍部队进步的主要原因。这个揭发，对干部的教育意义最大。这与华野的情形是基本上相同的，故重提一遍作各纵参考。

(三) 这次曲阜会议是去岁转入进攻大分兵以来第一次大会合，应利用这个会合和饶政委亲临主持，进行前委与纵队负责同志的检讨，特别对掌握政策与战略和战役的检讨十分重要。山东××同志的错误，请饶政委做一传达，以及分兵前后的各种带争执的问题，应作出总结，特别各纵委与前委各同志均应有简略发言，作自我批评，以便造成更好的团结。在粟、谭[4] 领导之下，便利执行新任务。以上是我个人的想法。这次会议应依照军委的指示，以部署淮南大战役[5]为重心。上述各点提供参考，有时间可以提及。

### 注释

[1]濮阳查整，一九四八年三至五月，华东野战军及第一兵团（第一、四、六纵队）在濮阳举行团以上干部会议，开展整党整军运动。

[2]刘邓，指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六纵队。

[3]陈谢，指以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的集团，下辖第四、九纵队。

[4]粟、谭，指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5]淮南大战役，即指后来的淮海战役。

---

这是陈毅在河南宝丰县中原军区驻地发给正在山东曲阜参加华东野战军师以上干部会议的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拟。

### 第三野战军渡江准备的军政动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日)

(一) 二月中旬徐海整训期间，即部署了渡江各种准备工作，并派军、师干部率侦查队以兵团为单位先期赴江边侦察，初步了解情况。三月上旬，各兵团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准备位置，王兵团[1]控制安庆、无为间江岸百五十余里，宋兵团[2]控制无为、和县间江岸六十余里。陈兵团[3]逼近两浦外围，叶兵团[4]进入江都、泰兴、靖江间二百余里江岸，可进行侦察和渡江准备。各部队均利用湖泊及各内河进行了实地水上演习，如撑船、摆渡、上下船只、船上屯兵方法、作战方法等，现在各部队对江岸实情、对岸敌情和敌舰巡逻规律、江水流速均有初步了解。如宋兵团派干部已偷渡到江南繁昌山地实地观察，回报敌情及敌江防空隙甚大等。如是，一般打破了南下时渡江的顾虑，增强了渡江的胜利信心。各级干部亲自领导水上演习，亲自侦查江边情况，均极负责，以实地材料说明渡江能成功，提高了渡江学习的积极性，打破了部队怕兵舰、怕敌机、怕翻船、怕登陆不成功的各种顾虑。现在重点已转到克服轻敌情绪方面，强调渡江仍然有各种困难，必须更加努力加强准备工作，如何保持渡江的战役上和战术上的突然性与协同动作，以及如何应付登陆后的严重战斗等，必须保证能够克服和胜利的击破敌人抵抗。

(二) 在沿江人民支援我军渡江方面，表现积极热烈。如从两淮到苏中，沿途人民张灯结彩，彻夜迎送，粮食、夫役供应甚周。许多船夫以参加渡江为荣。在合肥、巢、无方面，人民出粮供应亦很积极，船工亦听调参加演习，只少数惧怕参战，间有逃亡。各地人民均了解渡江成功当地负担即可减轻，故盼望迅速渡江。目前困难是近四十日来已天雨七次，妨碍行军和准备工作。近来已五日不雨，续晴可望，关系很大。同时大军云集，在淮南油盐缺乏，货币跌价，只有靠后勤支持。最困难是烧草和马料不能解决，故盼望四月渡江成功，大军分布大江以南，才能使供应问题得到减轻；停留太久是难以支持的。

(三) 在预计渡江成功的方面：一、一月来准备工作比较好，特别各兵团抽调懂得撑船和识水性的指战员计千人、二千人以上不等，解决了自己的水手，不完全依靠船工。二、实地演习后，使指战员懂得，依靠轻快船只作第一梯队，一字排开，使数十数百只船直开江南，利用昏夜，猛勇靠岸，战术上的突然性可以争取。三、在沿江千五百里线上，实行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敌空隙甚大，兵力强弱不等，一处成功，其他各处即可继续奏效。四、以兵团为单位，第一夜可渡过一万、三万、四万人不等。我军如有六个团以上登陆，占领阵地，即可支持，以待二梯队继进。五、沿江有内线可资利用（不作为主要依靠）。

综上各条，只要准备更充分，组织得更好，对各种意外情况发生时有应付办法，则渡江成功是有保证的。

(四) 渡江成功后的打算：凡某部渡江成功，即迅速占领阵地，并立即接应左右友邻继续登陆。同时，在全战局上于登陆后，力求苏南登陆方面与皖南登陆方面迅速东西对进打通连系，集结兵力，形成对南京包围，对沪杭

---

这是陈毅为中共第三野战军前委起草的给中央军委并报第二野战军的电报，并且作为三月份三野前委的综合报告送呈了毛泽东主席。

及赣东警戒。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不性急，以保持我军各方面的主动。此刻考虑到，如渡江成功，即实行大分兵，害多利少；自然还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来执行任务。

（五）部队方面：华野前委由粟[5]主持，即东移苏中，统一指挥华野全部渡江作战，华东局、总前委与华东军区邓、饶、陈[6]留合肥附近，统一指挥华野、中野，主持全局，并于必要时就近照顾巢、无王、宋两兵团（由震林同志统一指挥）。中野专门在桐城、安庆线上指挥，与总前委相距甚近，便利联络通报。

#### 注 释

[1]王兵团，即以王建安为司令员的第七兵团。

[2]宋兵团，即以宋时轮为司令员的第九兵团。

[3]陈兵团，即以陈士榘为司令员的第八兵团。

[4]叶兵团，即以叶飞为司令员的第十兵团。

[5]粟，指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

[6]邓、饶、陈，即总前委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总前委常委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

## 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城市人民的见面礼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

同志们！今天主要讲入城纪律。进入上海以后应该注意的事情，南下时大家已经学习、研究、讨论过《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工作的三个重要指示》，有的还进行了测验，但是今天还有再讲的必要。虽然过去学习过，一般地有了进步，但进入丹阳后，纪律并不好，将来进入上海是没有把握的。

一、在丹阳表现了哪些违犯纪律的事实。

第一件，八号下午我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戏院门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并且有一两个带头，闹得很厉害，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去不了。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直属队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会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大概同志们认为革命成功了，没有革命对象了，所以革到戏院里来了。很明显的，《白毛女》是把阶级斗争描写给老百姓看的，我们解放军的人员受过党多年的教育，而且也看过多少次了，为什么要争着去看呢？这就是违犯纪律。

第二件，今天清晨，我起床后，到外面走走，走到丹阳简易师范学校。我问校长、教员，有没有解放军进来破坏纪律。他们说：“一般地很好，过去国民党队伍来一次要住一次，弄得我们没有办法上课，教职员也没有地方住，解放军来后没有人来住过。”我再三的问，他们才讲：“前天有一位解放军来摘去一个电灯泡，昨天又有两个同志，带着摘电灯泡的同志来送还灯泡。”这样他们好象才比较满意，这是人家不满意中的满意，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纪律。所以我去参观时，他们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害怕我们是不是也去摘他们的电灯泡，因此警惕性很高。

第三件，满街都是队伍，干部战士自由上街，由天亮直到下半夜满街是兵，证明我们没有执行非请假不能外出的制度。我们在丹阳并没有担负着什么工作任务，我们的任务是休整，准备进上海。而同志们没有事情，谁高兴谁就上街闲逛，这是不好的。如果不加纠正，进入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我们华东局的几个同志出去时，也要互相通知一下，交代值班秘书、参谋，也不能那么自由。今天我来作报告，也是经过他们同意的，报告以后我还是要回去，不能把自己解放出来就不回去了。同志们穿解放军的衣服，吃解放军的饭，就要服从解放军的纪律。我们要自己约束自己。现在满街都是兵，闭着眼睛就可以抓几个来，这样就很难维持秩序，使反革命分子能够趁机冒充解放军进行破坏，我们也无法查出。假若我们同志外出都能请假，发生了事情，就很容易查出。将来几十万部队住在上海，同样也能查清楚。否则被反革命分子害死，或者遭遇意外，连耶稣、上帝也不知道。

第四件，这次南下路上，发生爬汽车，拦汽车，强行坐汽车而有人因此负伤，有时汽车根本无法开动等现象。这主要是我们直属部队干部带头干的事，这是不讲道理的流氓习气。其他违犯纪律的事情很多，不再多讲。

二、目前（在进入上海以前）的情况：

这次部队过江准备两个半月，四月二十日晚上开始渡江作战，四月二十

---

这是陈毅在苏南丹阳县（今丹阳市）召开的华东军区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标题为编者所拟。

三占领南京，五月三日晚上占领杭州，五月四日占领上饶，并且解放了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整个渡江作战任务便完成了。任务完成得很快，当天晚上渡过长江，三天解放南京，不到两个星期或者仅仅两个星期，占领了整个苏南、皖南（上海除外）和浙江大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进军。百万大军（三野六十万，二野三十万加上直属队）携带重武器骡马辐重等，十天内外进军千里，横渡长江天险，粉碎敌人反抗，平均一天进军一百里，普通老百姓空身走路，也没有这样快。敌人在江南设防共有二十一个军，其中十个军被全歼，七个军大部被歼，最多的只逃掉一个团，仅在上海防守的几个军比较完整。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空前伟大创造，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原先认为渡过长江需要经过三、四天甚至于一个星期的恶战，或者渡过去了站不住脚又被打回来；或者只能占领滩头阵地逐步发展，不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千里，原来准备在无锡、南京要打一下，一个半月打下南京，结果三天就实现了计划，半个月解放苏南、皖南，进入浙江、赣东北，证明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敌人的腐朽，军无斗志，亡魂丧胆，不敢抵抗，缴械投降。解放军的威力发展到最高峰，敌人的战斗意志降到零点，标志着全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南京的解放又代表一个全中国的胜利。这种胜利的取得，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领导方针的正确，沿江几十万人民帮助我们解决渡江的困难及解放区广大人民的拥护，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后方各部门的积极支援，每人都出了一份力，都有一份功劳。这个胜利的到来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哪一部分有这样天才，能够解决这么大的问题。现在讲讲与我们进入上海有关的经验：

这次渡江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我们部队里大部分是北方人，有一部分南方人，也不是沿江一带的，不熟悉长江地形水性，不会撑船，晕船，不敢走跳板。北方同志像秤锤一样掉在水里就爬不起来。敌人把江北船只都弄到南岸了，封锁江口，安置据点，驻兵把守（有九万部队）。据点前面摆上几条兵舰，我们如果攻据点，他们就可以开炮，策应后面部队。一般说敌人的长江防务是周密的详尽的。过了淮河又遇到大雨，很多同志吃不惯大米，很多同志对渡江抱着怀疑态度，这些都是渡江中的困难问题。我们用两种方法解决的：

第一，进行演习。各部队由军到连在巢湖、高邮以南如皋、泰兴、江都附近，无为、安庆附近内河里，按级进行了两个月的演习。得出了船上不能射击开炮，否则船身后坐，永远不能靠岸。因此渡江不可能组织火力掩护，完全依靠我们的勇敢沉着和以稻草作成救生圈（比橡皮的好，因橡皮救生圈中弹即会泄气，危险很大）。原来大家害怕兵舰，后来得出用硫磺弹、穿甲弹打兵舰司令台吃水的地方，从转弯处组织平行射击。经过这些实际演习后，大家信心提高，觉得渡江无问题。又恐雇用的船夫，临阵惊慌不能使船，所以各个部队都自己训练了船夫。兵团、军、师首长也亲自参加学习。在横渡十里巢湖的演习中，有一个师正遇到顺风，连上下船只花了一小时半时间即到达目的地。也有一个师组织得不好，又遇到逆风，一上船就被风吹散，三天才汇合归队。

敌人封锁江北出口，内河船只无法驶入长江，这是致命的一点。假如攻据点，敌人就会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过江。因此，我们只能从两个据点之间把船抬下去，三四百人抬一只，怕敌人听见又不能打哼，只能用鞭子指挥，就这样把上万只船抬到江里。这是多么艰苦的工程，老百姓都佩服解放军“蛮



得很”。这是伟大的劳动，是革命智慧和广大群众的创造所得出来的。有的开了八十里、六十里的运河，十里八里的隧道，把船运到江边，隐蔽在挖好的船坞里。所以当我们大军开向江这时，敌人还以为我们没有船。因此，当几万只船从船坞里“鬼”一样的出现时，南岸敌人就吓跑了。总共花费了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个工，这些运河隧道现在又正在填平恢复中，这是共产党对老百姓负责的精神。此外，我们有些负责同志亲自请懂得长江水利的老工程师、退伍海军、老船夫等吃饭，请教他们。这些告诉了我们一个工作方法，只要虚心学习，演习研究，任何事情都能作好。所谓“天才”不是“天生之才”，而是熟练。野战军是有很多毛病的，如有些人骄傲、纪律不好，但有一条起主导作用的好处，是肯练习、坚决完成任务，如果我们进入上海能够像过江一样的演习，我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渡江演习是通过了军事民主方式，按班、排、小组、党内、党外对如何克服困难，进行了反复的讨论，经过总前委传播经验。因此进入上海也必须采用民主方式来解决，这也是毛主席所讲的群众路线，否则过江打了胜仗，而进入上海就要打败仗。现在上海敌军仅有八个军的残兵败将，我们何时进去都可以，但要看我们的准备如何。南昌、九江、武汉，敌人也准备放弃，退守福建、两广抵抗。这是一条绝路，长江天险尚且抵挡不住，福建、两广没有问题，可以被解决。今后主要是走路问题，走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因此全党中心转到了巩固胜利，建设新中国。这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取得的胜利，不要自己把他破坏了。有些同志只知道消灭敌人，连敌人用过的东西也要消灭，这就是破坏。因此，必须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设城市问题。提出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一个大的思想转变。我们打了二十年的游击，对今天革命的胜利虽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游击观念，也要改变。我们全体同志应该知道，保护城市，建设城市，十年以后大家就可以享受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了。如果我们依然是无政府无纪律，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代替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则我们的建国工作二十年也搞不好。

三、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现在存在着两种偏向。有些同志对进城无信心，愿意在农村工作，觉得管理城市没有办法，怕出纰漏。而敌人也认为我们不能掌握经济和工业。的确我们也要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但是我们是有信心可以很好的把上海接管下来的。整个中国都可以解决，进入上海为什么没有信心呢？我们有几百万大军与强大的地下党的组织，广大的群众的拥护，加上我们本身很有准备，很有秩序，很有组织，再说管不好上海，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但也有些同志以为进一个城有什么了不起，没有看到进城的各种困难，而盲目乐观。上海有六百万人口，要我们给他解决煤粮问题、生活问题，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1]。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不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地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

看到我们搞得好就会失望，而搞得不好他们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进入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的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 四、城市纪律：

1. 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会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

2. 纪律是两方面的，因为上海很复杂，我们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对敌人要斗争要严肃，对基本群众朋友要客气，要争取团结，使他们拥护赞成我们。敌人好管，老百姓也好管，就怕我们自己混乱，使敌人有机可乘。

3. 入城时要尽量作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进城。马匹、大车一概不准入城。

4. 外交问题：上海有七万多外侨，我们同志有自尊心，有多年抗帝情绪，这是很好的，但不能笼统的盲目的不加分别的将所有的外国人都放在打倒之列。外国人中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有民主国家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又有政府人员与和平居民，应该分别对待，不能无原则的排外，否则会使我们丧失世界人民的同情，被帝国主义挑拨利用，这是不策略的。今天不宜用武力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用和平方式、外交方式来进行斗争。武装冲突在目前是对我们不利的，不用武装斗争不是怕帝国主义，而是更有利的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去。除指定的人外，任何人不准与外国人谈话。

5. 入城最大的保障就是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我们每一个行动，都可以测验出帝国主义的态度。现在帝国主义已经表示软弱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软弱，而是有策略的。在现在革命高潮的时候，由于我们力量的强大，步骤的严紧，所以才退在一边不敢动。如果我们自己内部一混乱，他们会马上钻进来给以袭击，大革命就吃了这样的亏。

最后要求大家注意军风纪，我们主张艰苦朴素，反对腐化堕落，但要注意整洁，要有礼貌，全体同志都要注意。

#### 注释：

[1]三次大胜利，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 攻沪作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

敌目前似企图坚守，在我钳形攻势下已难逃脱。请你们更明确告知前线军师团首长，攻沪战役不要性急，我军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去克服敌之钢筋水泥碉堡。十兵团、九兵团两方面均应以此为基础去部署。

---

这是陈毅五月十五日二十二时在丹阳为总前委起草的给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的电报。

一面战斗，一面接管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 原定警备部署只适用于战斗解决之后的情况，目前战斗正在进行，各部部署当然不受其约束。特别请你们并转告兵团、军、师、团、营注意，一面战斗一面接管是三野全体参战人员应负的义务，必须处理得好，才能大大减少上海的破坏而掩护接管人员的逐次进入。因此即使战斗所需要也要严格限制不必要的人员和辎重的楔入为好。

(二) 野司不全部进入、留苏州主持的建议甚好，望即本此原则办理。但粟、唐[1]等同志应率精干机构入驻上海主持军事接管及警备业务。你们与警司合驻为好。

(三) 军管会的牌子或挂在市政府一起，或挂在警备区司令部一起，待商定。

(四) 邓、饶、陈[2]等或与粟等一起住，或分住，可待战斗解决后的情况再决定。

(五) 各部驻地可照十八日电暂不变更。注 释[1] 粟、唐，即粟裕、唐亮。根据华东局和总前委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决定，粟裕兼任上海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唐亮为副主任。[2] 邓、饶、陈，即邓小平、饶漱石、陈毅。

---

这是陈毅在丹阳为总前委起草的给粟裕、唐亮、钟期光、张震的电报。标题为编者所拟。

## 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

上海市于本年五月二十七日完全解放，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代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把两个月来的工作，向各位代表作一简要的报告。我想说明的是：一、解放上海的经过；二、两月来的接收工作；三、在军管时期的具体工作；四、军管会和市政府今后应做的工作。各位代表听了我这个报告后，请对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工作加以指正。

### 一、解放上海的经过

人民解放军于四月二十日开始横渡长江，二十三日解放南京，五月三日解放杭州，此后即开始部署解放上海的战斗。五月十二日起，开始上海外围的战斗，五月二十四日我东西两兵团钳击吴淞要塞，封锁了吴淞港口，完全断了敌军的退路。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四面总攻，二十七日上海完全解放。此役歼灭敌军十五万人，内生俘和投降的十三万人。伪上海市政府的首要已先期逃走，由代市长赵祖康先生率领市府人员高悬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举行光荣的投诚。这种方式是有利于人民的。这个情形，证明了蒋介石集团的众叛亲离，以至不能带去其政府人员；又证明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约法八章，已经深入人心。由于旧市府大多数人员的尽职，从上海旧租界工部局时代起，经过日寇直至国民党时代的文件档案和公用器材，完整地转交于人民之手。这种方式可能而且必然会发展到西北、西南、华南各省，包括台湾在内。解放上海的战斗是经过血战和克服困难才取得的。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艰苦，值得称述。从千里以外赶来解放上海的部队，冒着梅雨，只用十天的急行军就赶到了。因为机枪、迫击炮、步兵炮、山炮等武器和大批弹药无法驮载，完全改用步兵人力扛运，克服千多里的道路泥泞，很不容易。此外，我军从营级干部起至兵团司令，因渡江追击敌军，骡马无法先行随军渡江，一月来完全和士兵一样步行驰抵上海近郊，也是难能可贵的。蒋军对上海的防御曾经经过长期的准备，利用上海近代建筑和工业设备作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三种部署。蒋军的防御工事，包括钢骨水泥碉堡五千座，美式水泥活动碉堡三千座，卫星工事半永久性野战掩体万余处。每一个碉堡又布置了三道至九道副防御不等。人民解放军不得不以血战来逐一夺取这些碉堡。蒋军曾经乱吹什么“上海的设防较之斯大林格勒的防御还强百分之三十三”，什么“防守六个月至一年来挽救战局，反守为攻”，并且采用了搬运、破坏、抢劫、勒索的手段，企图破坏上海。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进攻的迅速，作战的英勇和上海人民护厂护校的积极，使上海的破坏仍然比较少。这里的主要的经验就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中国人民的劳动与智慧，必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解放上海是走这条路，建设上海必然仍走这条路。在上海解放后，由于被敌人封锁发生困难，有少数人就动摇起来，表示悲观、迟疑甚至抱怨。我在这里提出经过与敌人恶斗而解放上海的经验，是有益处的。难道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不经过克服更大

---

这是陈毅在上海市各界代表会上的报告。其时，陈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市长。

的困难是能够成功的吗？

## 二、两月来的接收工作

我们部署渡江解放京沪时，即已着手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的，成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从事专门研究，向懂得上海情况的人询问并征求对于接管的意见。我们知道要接收和管理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必须以虚心学习的态度来对待接管工作。我们分四大部门进行接收：一、政务部门，二、军事部门，三、财经部门，四、文教部门。我们把国民党伪中央的机构与伪上海市政府的机构统一划分在上述四大部门内去统一接收。伪市政部门于军管时期逐渐归还人民政府管辖。凡不属于市政范围的中央事业及各省市的事业，目前由军管会代接代管，准备将来归还中央及各省市。

我们把整个接管工作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接收工作一般包括移交清点接收，主要求得不打乱，不影响军管时期工作与业务的继续。在此阶段，国民党反动制度的遗迹暂时存留很多，变化不大。在管理阶段，主要是进行研究和考察，开始局部的改造和整编。国民党反革命制度的遗迹开始清除，人民民主制度开始建立。在改造阶段，则着重全盘地或大部地肃清国民党的反动制度，巩固地建立人民民主的新政权制度。政务部门和军事部门按照解放区的优良的军政制度，进行全盘的彻底改造；经济部门与文化部门则保留其符合人民利益与符合科学规律的部分，改变其反人民利益与反科学规律的部分。整个地说，经济产业部门与文化部门会比政务部门与军事部门变更较小。但这只是就技术范围说的。经济产业文化诸部门的基本方针，则仍然与政治军事部门相同，就是必须用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来代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的反动方针。

（一）市政接管工作：计接管财政、卫生、工务、公用、教育、地政、民政、警察、社会等九个局，另一民食调配处和文献委员会。市府本部计接管统计、人事、秘书、会计、新闻、外事、总务、交际等十个处，共有旧人员职工计四万九千余人。除调查处，人事处旧职员大部逃跑或转入潜伏外，其余各局，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留在原职位照常工作，听候处理和录用。我们将伪社会局裁撤，另成立工商处和劳工处。将民食调配处裁撤，另成立上海粮食公司，管理粮食供应。另成立房产管理处，管理房产的清理和调配。另成立外侨事务处，管理侨务工作，由该处接收伪中央政府驻沪外事机关及其有关机构。

（二）财经接管工作：这一项计接收属于伪国民党市政府及属于伪中央政府的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共四百一十一个单位，重要资财计黄金二万四千六百两，白银二十六万元，伪金圆券二十一万亿元。伪台币两亿四千万，台糖三万五千吨，粮食四十七万石。新旧好坏不等的汽车一万八千辆，汽油四千八百八十七万加仑。在上述各机关服务的旧职工共十五万三千余名。

（三）文化接管工作：计高等教育方面接管大专校院十九个单位，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及职员、工人共二千八百三十六人，学生共八千一百零九人。市政教育方面接管公立学校及教育机关共五百二十一个单位，教职员共八千八百八十四人，学生十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二人。新闻出版方面接管和实行军管的共四十七个单位，其中报馆、通讯社二十个单位，书店、

印刷厂等二十四各单位，广播台及器材厂三个单位。上述各单位的人员共二千四百二十九人。文艺方面共接管十八个单位，其中电影九个单位，戏院四个，交响乐队一个，俱乐部一个，美术馆一个，剧校一个，演剧队一个，共员工九百零七人，技术人员一百六十五人。各私立大中小学未予接收，亦尚未实施军管，俟国立教育事业处理就绪再筹商处理办法。

（四）军事接管工作：在接管部署上分为训练、政工、后勤、空军，海军五部。对敌之陆军是以战场歼灭代替了接收，剩下的任务是打扫战场和处理俘虏。陆军营房计三十八处，均大部破坏，据专家估计初步修理需二百亿人民币，为节省开支暂停修理；另由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组织勤务劳动，作临时补修工作。训练部只接收几个军事学校，完全是破坏了的空房子。政工部只接收两个伪政工队，一所印刷厂，十七个广播电台，另三十个单位，内分戏剧、电影、乐队等，均小型机构，一律分散编入人民解放军，改造后参加服务。上述两部门接收工作结束最快。后勤接收部接管单位共一百一十六个，被接管人员计工人七千七百四十八名，职员一千三百九十三名，学员五十二名，技师二百二十七名，医工人员二千五百九十九名，政工人员一百零三名，伤病员九千五百七十四名，将级官员三名，校尉级官员三百九十二名，士兵七千六百九十七名，杂务人员五百一十五名，家属二千九百五十四名，其他人员一千四百四十名，总计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名。后勤接收部所接收之各单位，系敌军联勤系统之补给、修械、被服、医务等业务机构。空军接收部共接收十二个单位，接收空军人员一千二百二十名，民航人员一千四百五十五人，空军航空工程师技师计四十名。空军较陆军保全较多，民用航空方面保全更多。另接收空军及民航房屋三千三百四十九间，其中可用房屋一千八百三十四间。海军接收部共接收十八个单位，仓库十四个，工人八十二名，技术人员一百五十四名，职员五十八名，杂役八十名。海军破坏较空军为大，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机构。

由于我们接管方针的正确，接管人员的努力，以及上海人民的同情援助，两个月来的接管工作已胜利地完成了初步接管的任务。现在接管工作应转入第二阶段，即管理和局部改造的阶段。

### 三、军管时期的具体工作

（一）市政方面：我们先后进行了肃清残敌，扫除战争痕迹，恢复市区秩序，维持治安，恢复交通秩序，扫除垃圾，进行防疫注射，疏散和救济难民，清理棚户摊贩，清理房屋，局部地整理工务，防水救灾和救济难民等工作。已经进行的工作，包括扫除市区近郊地雷计二万四千九百零四个，拆除碉堡一万八千余座，收容散兵游勇二万二千零六十三人，内军官二千七百三十九人。在逮捕特务、盗匪方面，在六、七两个月内，计由公安局逮捕者二百八十九人，由警备司令部逮捕者一百三十八人，两处共四百二十七人，其中判处死刑者只十三人。这里表示人民政府对普通特务分子和罪犯是着重教育改造的。六月份破案仅百分之四十五，七月份破案即达百分之七十，证明人民警察破案的能力是提高了，由不熟悉逐渐走向熟悉了。蒋集团潜伏上海市的特务系统复杂，但其内部多已动摇，并有不少人已决心悔改，向人民政府输诚。由于我方人员干练努力，并有市街居民协助，特务匪徒企图在上海保留其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夏季防疫注射达三百五十万人，超过历来的记

录。清除市区积存垃圾计十五万四千三百四十吨。两个月来资助疏散难民返乡计三十万人。六月份车辆肇事达二百五十九件，七月份已减至二百一十一件，比较国民党统治时代一月份车辆肇事三百八十件、二月份二百八十六件的纪录是减少了。车祸减少的原因是人民政府对汽车使用采取限制政策，对三轮车夫采取组织和教育政策，市民也比较能遵守交通规则，军队方面也严格制止横冲直撞的违警事件；但是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最近郊区和市区相继发生水灾和台风灾，人民政府动员了政府机关和军队人员从事抢救，大大地减少了人民的损失。例如七月二十四日夜台风袭击本市，当夜五万余难民纷纷逃入市区，当即由各警局驻军动员收容，供给住食，动员居民学校公共机关协助，使这一批灾民迅速得到救济和处理。现在近郊如宝山、浦东等地，仍要防止秋汛的袭击，政府正组织专门机关进行准备中。上述每一件工作都很复杂，都需要从头到尾有计划地坚持进行。因此我们对市政所属各部，除一般维持业务外，只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做好最切要的一件事和几件事。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初来，业务不熟悉，情况很生疏。多数旧职员们好的方面，是和我们合作，不擅专；坏的方面是由于不明我们的政策，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让你们在上海试试看吧。”由于接管人员的虚心请教，克己奉公，取得了有觉悟的旧职员的帮助，取得了上海人民的帮助，我们的办事能力逐步提高，对许多复杂问题处理起来也逐渐顺手了。在人民政府与人民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便能使历代的上海统治者认为繁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开始解决，我们将遵循与人民密切联系的道路继续前进。

（二）财政经济方面：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收兑伪金圆券与美钞，取缔银元贩违法活动，调剂煤粮，办理折实存款，恢复水陆交通，修复铁路，恢复航运，恢复工厂的生产，调整税收和公用事业的价格，进行对外贸易和管理外汇，调解劳资纠纷等。我们是按毛主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示去办事的。我们准许自备外汇，允许棉花进口免税，对船舶进口采取鼓励扶助的方针，对存棉分配采取国营私营兼顾的方针，公用事业加价，特别照顾厂商用电的折价。这些说明我们是忠实地执行了公私兼顾和保护一切正当工商业的政策。我们处理劳资纠纷采用民主协商方式，劝告双方照顾大局克服困难，因而使某些人恶意地预言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将要严厉压迫资方的造谣落了空。我们的税收政策既要照顾政府的开支，首先是军费开支，借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前线，同时又要照顾人民负担能力。殷富者自然应该多负担一些，但也不能超过其可能负担的限度。这里我要指出，老解放区比新解放区负担重得多，而乡村又比城市负担重得多，对这种情况必须加以合理的调整。对于调剂煤粮，我们是作了极大的努力的。我们调动华东五个省和华东以外各省的物资来供应上海，并以动员和组织上海的工业生产来回答各省的供应。依靠这个方针，加上可能的部分的迁厂办法，加上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的帮助，以及我们不拒绝与其他外商进行平等互利贸易的政策，我们深信上海的建设和全中国的建设，是一定可以逐步达到自力更生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来毁灭上海市，但是人民解放军正在迅速地解放全中国，敌人的企图是一定要失败的。估计解放全国还要一年或稍长的时间，而调整城乡关系，交流物资，恢复交通，克服灾荒则约需一年到二年。两三年时间即可克服困难，走入人民建设的新轨道。只要我们是勇敢的人，只要我们是敢于建设新中国的人，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三）文教工作方面：对国立大专校院及市立各中小学校接收后，由于目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一般地很少进行剧烈的改革。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没有撤换人员，只改用校务委员会来负责校务，吸收旧当事人参加校务管理。对于教育制度，现在只停止了国民党的训育制度，停止了党义与公民课程。对教会学校，只取消了宗教作为必修课的制度。中学方面，只撤换了极少数坚决反动的校长。文艺方面，只禁演了内容很反动的两种影片和一种戏剧。在我们的赞助之下，高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组织了教职员共二千余人，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组织了教职员八千余人。文艺部门在电影界、文学界、诗歌界、音乐界、美术界的各种协会中共组织了文艺工作者八千余人。上海的文化界派出了百余人去北平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和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闻出版方面，我们停止了国民党反动派办的报纸和过去作为反动喉舌的报纸，刊行了人民的报纸，实行了两家报纸的改组，扶助了过去在国民党时代受压迫而停刊的进步报纸的复刊。这些工作表现了一个主要方针，即以新民主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文教方针来代替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反动文教方针。这个方针必须贯彻，但贯彻的步骤则须采用民主说服的方法，欢迎进步和改造，欢迎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改过自新，向群众认错，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站到人民立场上为人民服务。这个方针获得各方面的同情，在实施中收了效果。自然应当估计到，由于我们政策的范围很宽大，可能给某些拒绝改造的坏分子以潜伏活动的机会；但我们不害怕，因为人民的眼睛是可以照遍任何阴暗的角落的。我还要指出，我们在文教方面带来老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各种文艺教育工作经验和各种艺术作品，提供上海市的文艺教育界朋友作为求进步的参考，在这方面成就很大。无论在音乐、戏剧、绘画、舞蹈、平剧[1]各方面，老解放区的作品都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上海人民的面前，引起广泛的赞誉。例如文艺工作团演出七十次，观众达一百六十四万人。这说明为人民服务的艺术作品，尽管它本身依然有许多缺点，但它的方向和内容必能获得人民的衷心爱护。这种情形，感动了各派文艺集团，使他们开始以新的标准检讨自己过去的工作，因而他们就有了勇敢地走向人民，为人民服务的

（四）在外侨事务方面：在上海市军管会下面成立了外侨事务处，协同公安局外侨管理科，工作得很有秩序很有成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的规定，凡守法的外侨定予保护，违反人民政府法令的外侨定予处分，在处分时对愿意悔改的又可酌情作宽大的处理。两个月来，在上海市接连发生了若干次关于处理外侨违法的事件，我们都本着上述方针，作了公平宽大的处理。某些帝国主义野心家公然违背上海如此众多的外侨所目睹的事实，来指责上海市的保护外侨工作，企图造成中国人民“排外”的印象，来愚弄其本国人民，我想这是徒然的。若干外侨的受处分，是由于他们不遵守法令，这种处分是应得的，并且一般地是宽大的。如果要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容忍外侨在中国领土上保持其以往的特权，那么这当然办不到。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享受特权的时代，已随国民党反动派的垮台而一去不复返了。凡是希望继续在中国保持特权的人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如果他们记性不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句，是有必要的。

（五）在协助各人民革命团体的建立方面：各人民革命团体的组织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石。这种组织，应根据于人民自觉自愿的原则去进行。在上海市解放以来，工人、学生、妇女和文化教育界，因为他们有地下斗争的

组织基础，他们的组织很顺利地发展了起来。他们动员起来配合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力量非常之大，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也给了他们一些必要的帮助。他们正进行深入教育和扩大组织的工作，我们预祝他们的成功。对于国民党时代各种显著的伪人民团体，军管会已令其解散并停止活动。对于其余的旧有的社会团体，则采取审慎的逐步改造的方针，欢迎他们的内部能以民主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自己的群众基础和他們历来的政治主张，选择真正能为人民事业努力的人出来办事。如果合乎军管时期群众团体的组织程序，则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是定予赞助的。举例来说，上海市的产业界，对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有不少的帮助，他们本身的组织是应该开始了。

#### （六）军管时期的几点经验：

第一、接管工作不单纯是行政处理和技术处理，而是人民革命事业从获得胜利到开始建设的过程中主要的政治斗争任务。好好地接管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遗产，好好地接管这些人民多年来血汗的积累和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物质基础，这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毛主席和我党中央非常重视接管工作，号召并领导共产党员，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首先遵守纪律，以自己的模范纪律来对待接管工作，我们是这样做了。这就保证了用战争夺回的人民财产，原封不动地交还人民。像国民党以前接管上海时代所谓“重庆人”的五子登科[2]的现象，在我们这里是完全没有和不允许的。我们这里有的是接管人员有纪律、有秩序、不贪污、克己奉公的革命气象。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象征着新中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彻头彻尾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二、接管工作方针，既不采取急性办法，也不采取迁就办法，而是采取稳步前进的实事求是的接管方针。这是一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方针。这使得我们的接管工作能掌握极复杂的情况，能有余裕去处理各种日常事变。这就使得敌人方面以左的刺激方法或右的引诱方法来逼迫我们改变方针的企图，不能不归干失败。解放后第一个月有许多朋友嫌我们太宽大，而特务匪徒则误认为我们软弱无能，但是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前者的过虑和后者的错觉都不合于事实。现在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例如对敌人封锁而引起的暂时困难，某些人表示悲观。我们敢断定，在不远的将来，上海人民即将逐步克服困难而走上新的真正的繁荣。这个事实，必能说服一切悲观怀疑的人们。

第三、接管工作中使我们更深入了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实际。从接管文件物资当中，发现有许多三年前日寇移交的物资和三年来美国“援华”的物资，原封未动，不加清理，任其封存腐烂。国民党反动派官僚机构，可以说是腐朽透了。同时我们还从接管工作中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狡猾。他们用各种方法隐藏物资，潜伏物资；有的竟敢冒人民解放军或地下工作者的名义，进行“接管”，迅速变卖；有的卷款潜逃或潜伏民家，或胁迫居民冒名替他们保管；或伪装民主面貌冒充民主人士，来掩护其物资；或勾结外侨顶替，来逃避接管等。因此接管工作的斗争方式是多样性的，必须运用各种适当的方法去战胜敌人。这一斗争现在还未完成，应当继续贯彻下去。

第四、在接管工作中用民主方法动员人民配合接管，所收效果异常之大。上海各界对接管帮助很大，尤其数十万工人学生，解放前护厂护校，解放后协助接管，深入到敌方统治的底层，贡献更大。我们深致感谢。

第五、除上述的主要的好经验以外，我们还应指出接管工作是有很大的缺点的。例如情况不熟，业务知识不够，某些问题处理不够迅速，吸收有益

意见不够广泛，各部门配合不够密切，个别人员破坏纪律的事仍有发生等。我们要正视这些现象，不替这些现象辩护，而要接受善意的批评，加以有效的纠正。

#### 四、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今后应做的工作

（一）我党已提出了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的政治报告。关于这个报告的内容，早在六月下旬当敌人开始封锁时，我们即已进行考虑和研究，然后又与各方面进行了不断的讨论。经过个月的酝酿，才在七月二十七日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全上海人民提出反封锁的方针。我们认为，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应该接受和执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的内容包括六大项；即一、积极支援前线迅速解放全中国；二、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口和实行部分学校工厂的可能的内迁；三、改变上海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摆脱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赖，而确定为替中国人民服务；四、动员到农村去开展农村工作；五、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六、实行节衣缩食克服困难。究竟应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呢？是否还有另外更好的方针呢？采取这个方针是不是会把事情弄坏呢？属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都曾经考虑过，恐怕不周到，所以今天特意提到各界代表会上来讨论。我们盼望经过各界代表会上的讨论和修正，能使方针更完善，办法更周到，实行更有效。如有人认为可以有另外的方针，我们亦欢迎作为提案提出讨论，再付诸公决。我们希望经过讨论定出大家同意的方针，使今后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工作有所遵循。

（二）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愿意继续帮助各人民革命团体的迅速正式建立，使各界代表会议能以各人民革命团体为基础，扩大其代表性。目前的各界代表会的代表是人民政府聘任的，其任务是进行咨询和协商，因此还需要加以扩大和提高。我们请各界代表加强并重视各界代表会议的工作，发挥民主讨论和民主动员的力量，来协助政府进行接管和建设的工作，以便逐步地由目前的军事管理的制度，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使上海市的人民民主政治更强大地更健全地建立起来。这是我们所盼望的。

（三）加强和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能力，使之能适应目前革命形势和新中国建设的需要，适应执行六大任务、粉碎敌人封锁和建设新上海的需要。这就要加强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纪律和生活纪律；就要加强政府人员的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使其能胜任担负政府工作的任务；就要提倡和建设民主作风，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与可能发生的官僚主义和各种坏习气作经常的斗争。

以上就是我代表上海市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大会提出的工作报告，请各位代表加以检查和指正。

#### 注释

[1]平剧，即京剧。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而将北平改为北京后，“平剧”亦改称“京剧”。

[2]“重庆人”的五子登科，在旧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时代，一家五个儿子都应试中榜，称为“五子登科”。日本投降后，盘踞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要员到南京、上海等日伪占领的大城市搞接收，他们利用职权强取豪夺，将位子（官职）、金子（钞票）、房子、车子、女子（美人）都搞到手，被讥讽为“重庆人”

的五子登科。

## 为消灭残余敌人和保卫新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各位代表先生们，代表同志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今天正式开幕。他站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高点，宣布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灭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大翻身，从此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此以自己的劳动与智慧，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设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这是旧历史的结束和新历史的开端。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百余万指战员，能派遣代表出席人民政协大会，躬逢空前的人民革命盛典，认为是无上光荣。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无条件拥护人民政协大会；愿在大会领导之下将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保证新中国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调用，为消灭残余敌人和保卫新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中国人民政协大会，致崇高的革命敬礼！并祝贺人民政协伟大建设工作的成功！注释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平举行，其任务是：制定人民政协组织法与共同纲领；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所在地和年号。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公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

这是陈毅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标题为编者所拟。

##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

今天本校举行开学典礼，大家盼望我来讲点对大家有帮助的意见。我今天不讲别的，我想讲讲大家入学三个月来经常讲的“为人民服务”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老解放区里，在人民解放军里，是人人能讲的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我不选择什么新的题目而选择这个普通的题目来讲，大家可能不会满足，但是我认为这个题目是好的，需要再讲一讲。

我们学校大多数是二十多岁上下的青年。大家到学校里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想求得一定的知识，能为国家民族有所贡献，同时也是为自己争取一个美好的前途。中国青年的这种心理，我是懂得的，因为三十年前我跟大家差不多，处在同样的情况，满怀热望的追求真理，对旧社会看不惯瞧不起。青年人很纯洁，不愿堕落，追求理想，于是到四面八方去找，找那些能知道我们的人，找一个真正能够教育我们的学校。这个心理我懂得，我是过来人。可是在以前，每每使我们青年人失望，我们当时崇拜过的人物使我们失望，我们当时进过的许多学校也使我们失望。学校所给我们的知识，不能适合我们青年人们的需要。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成千成万的学生和青年朋友们来找共产党，加入我们人民解放军，进入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大学，高呼着拥护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很受感动。——那么，会不会重复如我以前的情形呢？今天会不会和过去一样，又陷我们于悲观失望的境地呢？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可以这样研究问题，特别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政大学敢于这样提出问题，来公开研究讨论，用不着隐瞒和躲闪，我们有这个勇气欢迎从反面提出这个问题，因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欢迎成千成万的青年加入我们的学校，欢迎他们把各种问题提出来，我们说明问题的真相，不带任何欺蒙，也不带任何勉强，我们提出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便可解决和满足青年的要求，使大家不致失望和走错路。

当年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人物、党派或军队之所以使我们失望。因为他们是完全反动的，他们用一些漂亮的词句欺骗人们，他们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打倒了旧的统治者。自己做新的统治者，他们利用青年，利用工人和农民替他们作战，胜利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便掉转枪口来屠杀青年，屠杀工农。他们完全是反革命的，所以使青年人失望，青年人跟他们走，不久便发觉他们的反动本质，因而引起更大的愤怒，便离开他们，便掉头来反对他们！这是很自然的事。

今天，我们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号召为人民服务，不仅在口号中喊，在标语上写，在课堂里讲，而且贯彻到各方面。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策，在农村的双减政策，土改政策，在城市里的劳资两利政策，对青年学生的文化教育政策，人民解放军对人民的关系，哪一样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是完全可以检查的。这样，在实际行动中证明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利益就是我们判定一切问题的标准。符合人民利益的，不管是党员与非党员，不管是老同志与新同志，都受到欢迎，受到赞扬；违反人民利益的，不管是干部

---

这是陈毅在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讲演，发表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大建设》第五期。

是战士，不管你过去有过多大功劳，这种人就应该受到责备和处分。用这个标准来考验和测量一切，有千万人的眼睛看着，千万人的耳朵听着，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三十年来的斗争锻炼，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任何人想玩弄手段欺骗人民，是不行的了。你们看看老解放区，看看我们人民解放军，能不能容得下一个反人民的分子？容不下的！反人民分子纵会一时隐蔽了，终久是要被发现的。你们看在南京、上海，解放后各界人民均组织起来了，大家都在研究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我们的意思就是做到使全国人民能够高举人民利益的大旗作为检验一切的尺度，这样使中国的面貌完全改变过来，使一切反人民的分子无存在的余地。这种主张一定能实现，一定能保证新中国之建设，完全符合人民利益，使全国人民得到真正的生活改善。今天，你们找共产党，找对了！你们找人民解放军，找对了！加入华东军政大学，也加入对了！

但是，为人民服务是艰苦的，是要决心奋斗的，不是今天“为人民服务”一下，明天不高兴了，就不为人民服务了，就走掉了。这个基本观点，青年朋友们必须确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后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为这个目的而奋斗。大家要下定决心，不是来看看热闹，报纸上登着军政大学是如何如何，去看看西洋镜吧；或者仅仅为找一个生活的出路，到军大来碰碰机会；或者大家三朋四友相约到军大住一个短时期，弄得一张毕业文凭以便作为一种资格便于出去作个人活动。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思想，这是在政治上不固定的漂游分子的表现。今天他可以参加革命队伍为人民服务，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也可以参加反革命队伍做反动派的工具，为反革命服务。他不了解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一切问题要重新估价，要以人民利益为标准来衡量一切，许多旧的看法旧的想法应该丢弃。加入军大首先要对军大有正确认识，不先认识清楚，糊涂干下去是有害的。你们应懂得军大之开办是为了给青年人以革命知识，为新中国训练有用的人才。同学们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终身事业，确立这个观点来看军大加入军大，则一切问题便能得正确解决。封建社会把男女的婚姻问题作为终身大事，我们今天的终身大事，便是确定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而不是其他。世界上有两个营垒，我们要确定自己站在那一边：一个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营垒，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营垒。在中国一个是人民的营垒，一个是帝国主义及蒋介石集团的营垒。现在两个营垒的斗争是很明显的，在中国更其清楚的确定了人民营垒的胜利和蒋介石集团残局不能久持，这个选择是容易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为人民服务问题，他是很具体的。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还要遇着不少困难，首先需要青年人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换取新中国建设的胜利，这就要考虑青年人是否意志坚强，是否认识正确，是否经得起挫折经得起磨练，是否能打破一切顾虑，是否能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加以扫除等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我认为要经过反复考虑和不断的思想痛苦，不断的内心斗争，而且不断受各种实际生活与不如意的考验，而且要准备五年乃至十年以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确定为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不容易的，要作长期的努力。要解决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对于出身中等以上家庭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不容易的。知识分子受了旧教育养成一种自高自大的盲目观念，自己认为自己要比人民高一等。他们心里想，广大的工农群众没知识，我中学毕业大学毕业了，我有知识。他们懂得什么？为什么要为他们服务？他们为什么不为我服务？为他们服务有什

么前途？能给我多少钱一个月？我要为人民服务，家庭父母兄弟反对不反对？我又不反革命，为什么不到上海、南京找个职业？我不反革命但也不革命，关起门来过一辈子不好吗？为什么不能站在中间立场？……这一连串问题需要反复考虑，才能得到解决。我想你们心中一定有这类问题需要解决，我指出一个要点来帮助你们。青年人为什么有轻视人民的观念呢？这主要是旧教育旧家庭的影响，即是地主阶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他们计划的向青年人灌输反人民的思想，希望青年人作为他们压迫人民的工具。青年不懂得清算这一点把自己解放出来，一生一世都是无前途的。你们到军大首先帮助你们解决这一问题，当然是最重要的，你们千万不要忽视。

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用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去反对敌人，这是当时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的主要方式。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了革命战争胜利，曾作了三十多年的英勇牺牲。这里可见为人民服务不是一个空谈，而是非具有最高贵的革命品质的人无法去参加的。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胜利，革命战争时代已过去了，以监狱和战场来考验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对青年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幸运。老一辈替我们青年打过了最艰难的一关，替我们创造出从事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应该尊敬已经牺牲的先烈和活着的老同志，他们为人民服务，扫败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我们应该以他们为榜样来从事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革命战争过去了，并不是说革命建设就没有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说，革命建设的困难还要大些。帝国主义在世界上还存在，反动分子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消灭，他们是时时刻刻要来破坏我们的。用革命的战争破坏旧中国是一件事，在破坏了的基础上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又是一件事，不要把他们放在一个戥子上来称，因为他们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建设要更困难些，什么道理呢？因为革命战争，犹如疾风暴雨，他是用扫荡形式去摧毁旧中国。建设工作，却是要长期的、耐心的一点一滴的工作，慢慢的修盖，慢慢的积累。你们看所有国家，民族的革命战争，十年八年就结束了，我们中国的革命战争算来最长，经过了二十八年之久，但终于胜利结束了。但是你们又看所有国家民族的建设则不是八年十年二十年可以完工的，至少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这就说明了建设工作是如何的困难呀！我们中国人民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在战场上，在监牢里，在工作岗位上，在各种斗争中前后牺牲的人目前尚难数计，我们要估计到在今后几十年的建设工作中的大海洋里，仍然需要革命战争时代那种高度的革命牺牲精神。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没有高度的革命牺牲精神，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新中国的建设，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你们加入军大后，遇着家庭的牵扯，遇着恋爱苦恼，遇着过去旧教育给你们的思想包袱，又遇着军大生活艰苦过不惯，又遇着军队生活与管理方式与自己脾味合不来，这些问题都会动摇你们的决心。你们要好好考虑把这些问题解决，从动摇走到稳定，从不觉悟走到觉悟，认清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不管中途有多少困难，总是朝着这个方面一直走去。你们入学两三个月来，我们不讲别的，专门讲为人民服务问题，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的基本政治方向。我个人在二十多年前选择了共产党，加入人民军

队，我也是经过长期考虑和内心斗争，才慢慢的确定下来。确定这个观点是不容易的，不要说是新近加入的青年朋友，即使是在座的老同志，也不是一下能确定下来的。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的基本观念，既要有理论认识，又要经过行动的考验。有些人在战场上在监狱里，在艰难困苦中动摇了，离开人



民，走上堕落可耻的道路，这种人也并不少呀！青年朋友们要准备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家庭问题，朋友问题和生活问题，要善于处理，要处理得好。一切根据人民利益来办，要从服从人民利益去解决，不要从超过人民利益妨碍人民利益去解决，这一点很重要，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曾宣传说：共产党要破坏家庭，不讲感情，不讲朋友，共产党主张生活愈穷愈革命愈好。这完全是反动派造谣破坏。老实说我们共产党人最主张把家庭问题、朋友问题和生活问题处理得很好的，问题是当全中国人民困苦，经济破坏，外寇侵略，民族危亡之际，是不是能让我们先解决家庭问题个人问题？家庭问题个人问题在人民问题未解决之前是不是能完全的合理的解决呢？事实上只有全国人民问题得到解决，其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已诞生了，这就造成我们全国人民问题能得到解决的强固基础。在今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过程中一切家庭问题生活问题均可以逐渐的得到合理的解决，美的光明的前程等待我们，我们要加紧劳作去迎接他！

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建设正规化近代化国防军的干部，你们正应该适应这个人民建军的需要，好好学习，准备训练自己成为人民军队的好干部，因而你们要有彻头彻尾的认识——为人民服务，担负起学习与建设任务。你们有了这个观点，那么军大即使有再多的缺点，也不重要了。你们要了解在军大教育上起主要作用的是给来学习的人以正确的人生观，提供你们一条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军政大学，便是最好的大学，纵然在目前，凳子不好，衣服不好，教员不多，饭菜不好，零用钱没有，缺点很多，可是最好的一点，起决定作用的，便是创造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干部。有了这一点大家应该满足，应该安心学习。至于缺点可以慢慢克服，各种设备可以逐步添置。这些，各老同志都已和你们谈过，我们不再讲。希望大家安心下来，努力学习，争取在学习上的胜利！

## 增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今天华东军区炮司、炮政、工兵指挥部、炮校、工校正式宣告成立，又适逢全军炮兵会议开幕，我特代表军区、三野向同志们祝贺！

多少年来，我们的装备是很差的，技术也有限度。因为长期在农村中进行作战，条件落后，不可能强调炮、工兵和装甲部队的建设，只能使用旧式的和落后的武器，只能强调近战、夜战、游击战。当时，我们的好处是善于利用一切简陋落后的条件办事，而且办得很好。我们把一切力量组织起来，结果战胜了比我们条件优良、而且已经是近代化装备的蒋介石军队。

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已取得了基本胜利，全国大陆接近全部解放，我们掌握了全国的城市，掌握了工业，这就创造了以前所没有的条件：改善了装备，增强了各兵种的建设，增强了技术，因而提高了战斗力。特别是在近几年来人民解放战争中，我们在前线缴获了大批美日蒋武器，装备了自己，使我们人民的武装力量大大发展了。现在我们有了工业条件，就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条件。如果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情况就不适合现代要求了。我们要依据我们工业上的供应能力来提供我们新的武器，使我们人民解放军更强大，这是人民武装现代化、机械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是迅速的。就从去年渡江战役到现在，我们部队迅速地壮大，炮、工兵不断增强了，而且有了海军和空军。我们的工业在发展中，交通运输条件大大改善了，我们的汽车增多了，我们靠铁道、海运来运输部队。这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新条件。

处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的思想上、组织上、编制上、使用武器、作战方法、教育方法上，都需要有一个新的转变，在过去优良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才可能更好更迅速的完成这个伟大的建设任务。

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装备，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它掌握起来。如果拿到武器不能掌握使用，我们的战斗力便要减低，胜利就不能巩固，甚至还要失败。但是现在我们干部战士的知识技术不够用，这便成为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努力学习，学会新知识新技术，使用新武器，强调陆海空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这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历史任务。我们全体指战员一定要在最短时期内完成这个任务，越快越好。

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愿意这个转变。他们不愿进步，他们看不起新知识新技术。他们认为过去没有新知识新技术也能打仗，也能胜利，便不愿学习了。这种思想不好。我们要说服他们。因为我们有了新知识，掌握了新式武器，作战的死亡率便会大大减少，增强战斗力，缩短战争过程。我们再想一想：二十几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是很大的。比如过去我们攻取敌人一个碉堡，都要付出相当代价。攻击一个小村庄，往往要打几天几夜。这说明我们的装备不好，过去打仗只能在夜间，白天受到敌人的空军和炮兵威胁。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炮兵，并有了空军，将来我们掌握了制空权，白天黑夜都是消灭敌人的时候。因此，不愿学，看不起技术，认为自己有本事，是不好的。

---

这是陈毅在南京汤山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炮兵政治部、工兵指挥部、炮兵学校、工兵学校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前线》第七十八期。

另一种思想是觉得很为难，认为什么空海、炮、工、装甲各兵种复杂，没文化，又不懂什么数学、物理、化学，怕麻烦，一提到学习自然科学、学数学就不耐烦，这种观点也不好。越是现代化的武器。越是高度的科学技术，越是新式武器，则越是简单。因为所有新式武器。都是在不断改进过程中提高而来的。开始时是很粗糙的，越是改进，便越科学，越简单好用。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认识了这点，便会打破为难心理。我们解放军的干部战士，都经历过长期的战斗锻炼，走州过府，都是有头脑的聪明的人，是完全能够接受新知识的。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肯用功学习，肯钻研，而且有教员和专家负责教育，如果我们的教学方法更完善，就是最复杂的技术也可以学会的。如某地的飞行员，开始学习驾驶新式飞机时感到困难，但在他们苦学苦练的结果、二三个月就学会了驾驶，而且能战斗了。在资本主义国家训练一个飞行员起码要六个月，这就是个显明的例子。

同时还要纠正那些对于学习技术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不足为奇的思想不愿意学，害怕困难固然不对，但看得太简单，认为不费什么气力便学得好也不对，掌握新式武器，把我们军队转变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我们要掌握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掌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军事科学，要经过艰苦的奋斗。要全心全意老老实实地埋头学习，不要三心二意，才能学好。如果我们马马虎虎，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看看就懂，只要学它一年半载就行，看作是尝尝味道，这个观念要不得，无论炮兵、工兵、装甲兵也好，海军、空军也好，哪一样都要准备学他十年八年才能精通。懂得是一回事，会使用，会创造又是一回事。从学会了到能够使用，又进一步完全掌握。能够重新创造，能够在现有基础上，一步步提高，这完全是完整的科学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我们以科学家和专家的态度来对付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因此，必须十分努力，严肃地终身为炮、工兵和各特种兵的建设事业而奋斗，把自己这一行全部贡献给人民。我们的党员、干部、战士都要具有这个觉悟和这个决心。最近这个时期我们见到许多苏联朋友，他们都是专家，他们每个人都能精通一行。苏联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大批的专家而且是大批党员专家，这是最值得我们羡慕和学习的。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高度的技术，因此能对人类作伟大的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高度的政治觉悟，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苏联红军是享有同等荣誉的，但在科学技术和培养专家这方面就很不够，应该向苏联学习。今天，我们处在部队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创造大批的技术干部、专家。炮司、炮政、工指、炮校、工校的成立，就有这个责任。因为有了大量干部，我们部队才能更坚强。我们有强大的特种兵，有强大的海、空军，与步兵配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

要问我们的干部和战士能否成为专家，能否每个人都能在大学毕业，能否成为一个大学教员，我们说，只要努力是完全可以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也就是为广大的工农兵创造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过去的教育完全受反动派统治，不给工农有享受教育的机会。今天已把反动派推翻了，我们掌握了高等教育，这对发展文化科学、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我们应该享受文化科学，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在学习中还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是走第一步。我们要大大鼓励表扬不想个人、不计较地位、努力学习技术而成绩优良的同志，在操场课堂里，在研究室里建立崇高的荣誉。空空洞

洞的讲理论，唠唠叨叨的历史陈述已经不适用了。一定要鼓励我们的干部在课堂里、研究室里坐冷板凳，苦心钻研。我们相信，在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将完全可以改变现在的状态，在我军的五十万干部中创造出大批专家，都懂得高超的技术。

有这样的干部，组织上调他们去担任教育工作，他却想不通，这些思想必须纠正。假如没有大批经济专家、工程师，我们的轻重工业就很难发展。没有大批的文化教育干部，全国的教育就无法开展。没有不断培养起来的大批特种兵干部，也只能停止在现有水平，不可能发展壮大。过去我们党拥有大批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以及打游击的干部，因而能够在敌后立足，创造根据地，因而能够在极端困难中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并且从这里产生大批的革命领导干部。因此，我们今后必须广泛地在经济、文化、教育上，海、陆、空军、特种兵方面努力，我们的胜利就完全可以巩固起来。

我们军区决定明年以训练部队为中心，而训练部队又以军事训练为中心。在训练中强调正规化现代化，强调增加新知识，在过去优良的基础上，改进教育方法，强调干部先学好，然后去教下级，下级向上级学习，并号召全体工作人员，为完成训练部队的伟大任务而努力。希望炮司、炮政、工指、炮校、工校成立后，能在明年的大练兵中担负起自己的创造干部的责任。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学好本领。

## 中国人民军事建设的新时期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 举行成立典礼，对于我们是一个隆重喜庆的日子；对于全中国人民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我奉命谨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刘院长[2] 和军事学院全体同志致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军事建设新时期的开始。过去的很长时期是中国人民利用农村条件组织武装来战胜国内反动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蒋介石集团及其主于帝国主义的援助的时期；现在由于条件的改变，中国人民将能充分利用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并取得伟大苏联的援助，把中国人民的军事建设，提高到现代化的阶段。这样必然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和战法要作必要的改变，首先是高级指挥干部与上级指挥干部的培养与训练便成为迫切的任务，军事学院就是为承担这个任务而开办的。军事学院能胜利完成这个任务，对于保卫祖国、保卫世界民主和平、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将起着重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多年来在反对卖国贼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能自觉的深切知道组织武装、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和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指示，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能将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理论与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践两相结合，进行了适合中国条件的新创造，他领导与组织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和取得伟大苏联的同情与援助，便创造出全新的局面，能够战胜国内外敌人，建设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政治质量是优越的，军事思想和战斗方法是高超的，这个坚固的优良的基础，仍是今后战胜一切敌人的依靠。军事学院全体同志，应该以保护自己生命的同等热诚来保护它。

同志们！由于伟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使帝国主义体系受着致命的创伤；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更加重了帝国主义体系的破坏；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不甘心失败，为挽救其死亡，正在拼命挣扎并制订侵略世界的计划，而且在朝鲜、台湾已公开发动了大战后五年以来第一次的武装侵略。在朝鲜的武装侵略已被我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共同努力所击败。这是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喜讯，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喜讯。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还只是开始被打得惨败，还没有被打死，因而他必然要而且正在进行更疯狂的侵略准备。为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以美帝国主义为对象，作充分的准备，即对症下药来作各种军事准备。因此，必须在我军现有的优良基础上争取提高一步。我们要学习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日法西斯的宝贵经验；要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经验；要总结二十多年来我中国人民军队自身在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宝贵经验，要学习现代化联合兵种的作战与指挥；要通晓各兵种的性能，学会掌握与指挥。要求我军指挥员能依照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进一步吸收与增加现代化作战的知识。把这一工作做好，即是通过在军事学院学习把这一任务完成，就一定能保证在今后保卫祖国与保卫世界民主和平的伟大斗争中在军事指挥上起决

---

这是陈毅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典礼上的讲话，原载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八一杂志》创刊

定作用。

同志们！在军事学习的战线上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是要处理极其复杂的军事思想与战斗动作问题，它并不比实际的战场作战更容易。我们要用苦功从事学习，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要打破轻视学习的情绪，要打破自高自大不求进步的情绪，要克服拒绝吸收新知识的保守倾向，要服从刘院长的领导，要发挥同志间的学习互助和自我努力，要把我们在战场上的突进勇气转移到学习上去，只要我们高级干部的学习有了成就，如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敢于进犯，则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不成问题的。

最后，我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谨祝刘院长和全体同志的身体健康！谨祝胜利的完成军事学院的建设与学习任务！

注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建国初期为适应革命新时期的需要而成立的最高军事学府，其任务是训练熟悉与指挥现代化各技术兵种，组织与指挥协同动作，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完全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忠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事业，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高级指挥人员。

[2] 刘院长，指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当时负责创办南京军事学院。任军事学院院长。

## 加强党与非党的合作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恰为党的三十周年纪念。部队同志正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祝贺党的生辰，掀起了庆祝与纪念的热潮。年青的同志总是向老同志询问我党的历史，要求作党史的报告与军史的回忆；非党的同志总是向党员同志询问党的情形和要求作党史与军史的介绍等。党的同志与非党同志更以最大的关怀询问毛主席的生平以及想知道毛主席怎样领导我党我军能以三十年的努力而获得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要回答上述问题，即叙述党的三十年的历史和党领导中国人民军队的二十几年的历史，就是简明的著作也需要一本大书。这本书是短期内难以编成的；但已经有一本最好的书足以说明我党我军的三十年的历史，这便是毛主席的著作，只要我们用心钻研，真可终身受用不尽，中国革命三十年的概略，也就可以具体的把握着了。毛主席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我不想涉及重大的党史军史问题，为了纪念党的三十周年，我向华东部队的全体同志建议如何加强在部队中党与非党的联盟，我认为是颇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第一个事实，共产党员在人民解放军中只占少数，仅及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其余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以上是非党的同志，不可能把几百万人民解放军全变为党员。第二个事实，三十年的革命事业都是党与非党同志的合作去进行的，尤其部队在前线更具体的表现了这个生动而强有力的共生死共患难的合作场面。第三个事实，这个联盟的领导属于共产党，这是从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证明了共产党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对人民事业具有远见，能胜任领导，特别是遇挫折不灰心，犯错误不文过。第四个事实，多年来证明了非党同志以同样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信任共产党，拥护共产党；非党同志中的优秀分子与我们党员相比毫无愧色，甚至有时超过许多普通的党员。每一个党员同志应该设想，自己在入党前曾经经过长期非党的生活；同时目前许多非党同志，确可在今后长期斗争中争取入党。但由于党在人民中永远是少数也只能是少数，所以党与非党的关系在人民生活中是长期存在的一个事实，关系人民生活非常之大，必须搞好才符合人民利益。以上四点，初步描画出党与非党的团结是我们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敌力量的泉源。

在党与非党联盟中，首先强调党的政策的正确与党员的模范作用，这是联盟的杠杆，有了这一点，便可以吸引起广大的非党的同志的同情与援助。党员的模范作用与非党同志的广大的同情援助相结合，以巩固的联盟形式去力争党的政策的实现，这是三十年来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遵循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做好党与非党联盟的政治工作，争取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

在目前华东部队中，如果党与非党的关系尚存在问题的话，不在于非党同志的积极性不够，或者他们有若干缺点，他们中有许多人，也同我们共产党员一样，带有部分缺点，这是很自然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有缺点，问题是要我们共产党员能以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模范行动去帮助非党同志，求得共同

进步，把事情办好。有了这一条，则投桃报李，借助他山，非党同志的响应一定会是更好的，共产党员如果放弃了自己的领导职责，一切便无从说起。至于在共产党员中，尚部分存在着排斥党外同志的宗派主义思想，这就更坏，不纠正即等于削弱和破坏我党我军自己。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主席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这是极其重要的指示，对今天新中国的建设与部队的建设，仍有切中时弊的政治意义。我认为放手团结非党员同志和党外人士乃是巩固革命胜利的关键之一。

现今在部队的任务，第一个是抗美援朝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第二个是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国防军，特别是训练任务，要努力加速完成。第三个是进行部队镇压反革命工作，务使反革命分子不能隐藏，保证我军内部的纯洁，使我军能胜任担负起巩固国防与保卫世界和平民主的任务。为了做好这三大工作，以及包括其他各项工作，必须依靠党与非党同志的联盟，必须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与非党同志的积极援助，必须依靠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党与非党合作的伟大指示。

三十年的普通岁月已是悠长，而三十年的革命岁月则是更其悠长。今天以前的三十年，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依据三十年来的革命胜利的基础，可预祝今天以后的三十年更其辉煌更其光荣的胜利是正在迎接我们。

同志们继续努力吧！光荣归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光荣归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归于伟大的毛主席！光荣归于伟大的党与非党的联盟！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万岁！未来的三十年的更伟大的成就万岁万万岁！



## 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在庆祝党的生日的时候，人们首先注意去认识毛主席在党史中的创造地位。在纪念人民解放军的建立的日子，毛主席在建军上的创造，同样是应该首先提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军事问题，驳斥了从来各种剥削阶级所谓军队超政治、超国家、超阶级等反动思想，而认为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人民军队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民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剥削阶级的军队则是替剥削阶级服务的工具，两者是有其根本的阶级区别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军队是反动的统治阶级最主要的支柱，人民革命如不能瓦解和消灭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军队，就不能有什么革命的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瓦解和消灭了反革命的军队，终于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专政，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人民的军队和反革命的军队在长期的斗争中，人民的军队最后战胜了反革命的军队而达到的。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曾经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同志这个指示的正确性，完全由中国革命长期发展的过程所证明了。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和当时还在革命中的国民党合作创建革命的军队的。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完全的人民的军队，开始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农对于蒋介石、汪精卫领导国民党叛变革命所给的答复。但是，使这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并成为人民革命胜利的最初出发点的，乃是毛主席领导工农武装向井冈山的进军。南昌起义后所保存的一小部分军事力量，是在和毛主席所直接领导的武装及根据地汇合以后，才得发挥其在长期革命中的作用的。

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完全归功于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政治思想和战略思想。

我们现在来回忆一下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是如何去解决下列重大的革命问题，是会有些益处的。

首先我要说到毛主席对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局势所作的英明分析。

毛主席当时一方面激烈地反对陈独秀所代表的取消主义，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反对“左”倾盲动主义。毛主席认为：虽然革命由于国民党的叛变而遭受了失败，但是，引起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一切矛盾一个也未解决，国民党绝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只是促进这些矛盾更加深刻化。而且在各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国民党的统治不会稳定，一定要发展成为长期性的军阀混战，这就给我党和中国人民以复兴革命运动的机会。另一方面，毛主席则认为，革命失败后党的队伍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党的政策应该重新检讨，重新制定。根据这样的政治分析，毛主席得出了结论，指出必须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取消主义，而选定在大革命有群众运

动基础的边区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以抵抗白色恐怖，逐步积蓄力量，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冬到一九二九年春，毛主席分析当时的政治情况，预断新的军阀混战将要再起，可是那时国民党军阀围攻井冈山正在加紧，看不出有因内讧而退兵的痕迹，党内外有不少的人怀疑军阀混战必起的论点。毛主席差不多经常要为此问题作解释，直至一九二九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才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正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局势的发展的论断的准确性，是取得领导群众的首要条件，毛主席正是能掌握此种准确性的能手。当时有些同志的意见，认为国民党军阀混战不会爆发，主张缩小游击队，甚至认为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应离队到大城市作地下工作。此主张如真正实行起来，其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个革命领导的影响将是难以设想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将采取何种形式？有人仍然追求以大城市暴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有人仍然幻想是北伐形式的再现。如果大都市暴动的胜利方式不可能和北伐形式不能再来的话，则井冈山的红旗打得久吗？井冈山斗争的归宿是什么呢？这是当时有些人的疑问。毛主席根据国内外革命经验和新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在全国作波浪式推进的方针。有的同志最盼望所谓“天天扩大”和很快的夺取大城市，怕谈长期的艰苦奋斗。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条件之下，纵使不想长期奋斗，事实上长期奋斗仍继续存在下去。为了进行长期战争，必须选择根据地作为斗争的依托。在选择根据地时，毛主席每每着重当地受盲动主义影响较小，党与群众的基础保留尚多，而地势又很好，以及离大城市较远而统治阶级力量较薄弱的地方，而且毛主席还亲自带队作巡回式的选择。毛主席第一次选定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以后又选定赣西南九个县区作为第二个根据地。以后又汇合闽、赣、粤三省边区建立中央红军根据地，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地方范围提到全国的规模，以后转到陕北，坚持陕北根据地作为反日、反投降斗争的基点。在最近人民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坚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斗争，直到打败敌军才东渡黄河。这里我们看出毛主席一贯的重视根据地，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顽强性。中国革命的过程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形式既不可能是大城市首先暴动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北伐形式的重复，而是采取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波浪式推进的方式，使中国革命在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根据地斗争的思想，成为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毛主席认为是根据下述条件而产生的：第一、中国是被各帝国主义侵略与分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第二、中国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内部不统一，存在着长期混战；第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几种经济并立，并未形成支配全国的经济中心，许多地区经济上保存自给自足状态，使根据地斗争在经济上的坚持虽然十分困苦但成为可能；第四、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第五、中国战争的长期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毛主席更经常着重地说明党的领导正确这个主观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根据地斗争思想是根据上述特点而产生的中国所特有的战略思想，其主要内容在于先建立各种小块大块农村根据地，通过正确的土改政策与广大工农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在于使各项政策取得大小规模的试验；在于让军事上作各种准备与进行长期的锻炼；在于在组织问题上、干部问题上能作各种准备；在于向全国人民发出革命的号召，动员和鼓舞他们进行革命斗争，逐步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在于使党取得经验以增强党的主观掌握能力，

以便能顺利地应付和领导全国的大小事变。我党有了如上所述的毛泽东式的科学的根据地指导思想，因而打破重重困难，带领中国革命到最后胜利之路。教条主义者看不起中国的历史，不研究中国的历史，切断中国历史，或者落在中国历史的泥坑中爬不起来。教条主义者也即“左”倾冒险主义者，看不起农村，更不承认农村可以作为中国大革命胜利的起点；他们听见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主张，如不称之为保守主义，便称之为是落后的农民意识的反映。但事实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根据地思想的战略意义的伟大。

讲到组织军队与建设军队，毛主席坚持党对于军队的政治领导，坚持党的支部设在连队，提出一切工作经过支部的口号，指出南昌起义部队不建设连的党的支部，而把支部放在团，是一个大的错误，以致使党不能深入群众去掌握军队。毛主席主张在部队中任何角落贯彻党的领导，反对在部队中划出不接受党的领导的除外部分；坚持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阶级的政治的界限，坚持革命的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制度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教育与说服广大指战员，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人民军队必不能巩固，不能提高其战斗力。毛主席主张在军队中建立为巩固军队纪律与战斗力并加强官兵团结的民主制度，宣布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废除枪毙逃兵以及用鱼水关系血肉联系等比喻来强调军民合作，毛主席主张建设一支有政治工作能力、有群众工作能力、有纪律、有文化、又有战斗力的新式的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初步实现了，而且是通过毛主席本人亲身研究、检查和帮助连队工作，以这样的深入而艰苦的政治工作去奠定基础的。

讲到中国人民军队的作用及其作风问题，毛主席提出部队是党的政策的宣传者与组织者。部队的军事斗争应善于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只有使用部队去参加土地革命，去参加工农运动，才能使部队壮大，才能使部队质量提高，才能使部队与人民密切结合而休戚相关，毛主席指出：任何企图使部队离开群众运动，提出单纯军事观点，认为部队除打仗外不应做别的事的主张，这是极其错误的军事主张，信它的话必使红军陷于孤立无援而失败。毛主席提倡一种群众工作作风。组织部队指战员参加群众工作，参加一个乡一个村的群众工作，对一个乡一个区一个县的地方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具体调查，以获得必需的社会知识，作为教育部队、决定部队行动的帮助。这样一来，中国人民军队隶属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不仅是一支武装的军队，而且是一支政治宣传的军队。

讲到战略战术问题，毛主席主张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要根据我军当面的敌我情况作具体分析，来进行新的建设与新的创造。毛主席痛恨凭主观办事、发空洞议论而不具体分析情况的作风，屡屡嘲笑书生用兵必败无疑。毛主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面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实际，进行了伟大的思想创造，解决了以弱小的红军而能战胜强大敌人的最困难的革命课题。我们回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提出十六字诀，提出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对付敌人；提出游击战争应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提出红军战略应分别统治阶级内部破裂时期与其内部相对稳定时期而有所不同，反对分兵冒进，反对被动保守；提出主动影响时局，主动调动敌人，以及在不利情况下避免与强大敌人作战，同时又主张制造和抓住敌人的弱点，予敌人以歼灭的打击，从而建立了保持我军有主力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从不断战斗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天才的歼灭战思想。毛主席主张选择地形，布置战场，利

用我方手中掌握的地理条件，配合其他有利条件，以达到以我们的劣势去歼灭优势的敌人。把人民军队的各种条件和力量充分利用，充分发挥，而避开敌人的长处，善于打击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是毛主席的革命战略的精髓。这些有系统的科学的战略、战术的主张，在井冈山时期即能够正确的提出，当然是为一般军事家所梦想不到的。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言军事，除军事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为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人民革命问题，加以具体的理论的考察，这样就透入本质，而能进行军事思想的创造。一般军事家对进攻问题永远只是进攻问题，看不见其中包括别的因素；对防御问题永远只是防御问题，同样看不见其中包括别的因素。而进攻与防御这两个战争的基本方式，落在毛主席手上，便发现新的内容与新的角度。例如退却可以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完全的败退形式，又可以表现为形式与内容从矛盾到统一的以退为进的胜利的进攻形式。

前者是一般战争规律，为一般军事家所熟悉；后者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规律，超出通常范围，是一般军事家所不能了解的。又如一般军事家谈战略、战术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其中能背诵几页战史便算高人一等。毛主席谈战略、战术是如何使中国人民军队能够打胜强大敌人，这是有具体内容的，连血带肉的，与长期战争相联系的战略战术，这样便自然而然地从解决新的问题中，提供新的经验和创造新的原则。毛主席的军事学说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特殊军事规律，是以井冈山斗争为起点。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为尔后二十多年的军事斗争打下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概括能力，可以前知，可以预见事变，于此又得到证明。

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上，也创造出保持军队主力与挽救危局的典型的例子。湘赣边区的井冈山斗争，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以前是一个胜利的发展局面，由于八月红军主力向湘南冒进，以致遭受失败。这是一部分同志违背毛主席的坚持井冈山根据地以应付敌人“围剿”的指示，毫无准备地向湘南冒进的错误所造成的。毛主席于红军主力南进后，率一部红军坚持了根据地斗争，打破了敌人夺取井冈山根据地的企图；同时又获悉南进部队受挫，遭受极大困难，乃决计亲率一营兵力迂道往湘南寻找主力，终于与进军湘南的主力汇合于桂东县城近郊。南进部队于失利情况下，得到毛主席率队亲来汇合，其兴奋与感动的情绪是难以言词形容的。毛主席于两部汇合后，亲自主持行军宿营及检查部队的给养状况，并注意当地农民斗争的指导。这样，使主力部队得到保全，而湘赣边区的井冈山斗争局势也从八月失败中挽救过来，从一个极小的局势经过毛主席的领导把局面扩大，可是中间遇着障碍，由于部分同志的错误又把一个扩大的局势弄坏，又要由毛主席以极大的坚忍与明智，把这一弄坏的局势根本挽救过来，这就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中所创造的又一领导范例。毛主席不仅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与干部、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而且是在极艰苦的情况下与干部、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屡次考验中，领袖与统帅的卓越领导能力不能不被发现，不能不取得党与人民的深切爱戴。

讲到根据地的坚持与反“围剿”的战略转移问题，毛主席在领导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的行动决定上，更创造了极为卓越的领导范例。一九二八年冬敌方进行“围剿”井冈山的更大规模的部署。为了打破“围剿”，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反“围剿”的方针问题，先后不下数十次会议作了反复而详尽的讨论。例如分析了反“围剿”的胜利可能性及其失败的可能性；分析了

反“围剿”的有利条件及其不利的条件；分析了主力在井冈山就地退敌与向敌区进军调动敌人以保持根据地的各种可能；提出了各种进军路线，各种反对敌人阻击的计划，毛主席对留守井冈山的部队作了动员和部署。毛主席解决保持老根据地和发展新根据地问题，完全表现出他对党与人民的利益极其负责的态度，除对主要的战略问题紧紧掌握外，同时不放松每一细节的考察。这样的严密部署与精细打算，故能领导全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其结果是进军赣西南，扩大和创造了新根据地，而留守井冈山老根据地的党与部队经过反“围剿”后仍能坚持下去，成为尔后湘赣边区大根据地的基础。

上述几点仅系我个人参加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时代的一些回忆。这些回忆不仅不是全面的，而且也不是很精密的。例如毛主席如何研究土地问题，提出正确的土地政策；如何研究群众的切身的政治、经济要求结合全国政治形势以制定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纲领问题；如何主持党的建设，反对党内各种偏向；如何耐心地教育干部与同志等，均是带根本性质的重大的革命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重要问题，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中均着手研究与发掘，均有光辉的开始。这一切都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涉及，我在这里只想以偏于军事方面的一些回忆来说明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交替之间，以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所起的伟大的创造作用。我们在井冈山时期，于一九二八年冬天正准备向赣西南进军时，才收到党的六次大会的决议，毛主席领导我们对“六大”决议作了研究，证明了井冈山的政策与“六大”决议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为毛主席的领导是以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很自然地在许多问题上又超过“六大”决议而更深入实际地去解决问题，这又是为以后的革命战争所证明了的。我认为毛主席的创造精神，无一处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无一处不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时又从来不是机械抄袭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来现成的任何一个结论和词句去束缚革命实践的手足。马、恩、列、斯不会把解决一切问题的方策都替我们准备的好好的，让我们安享其成，而是要我们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指示，钻入具体的实际，为实现人民利益去独立解决问题。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勇气，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勇气，要学习马、恩、列、斯的革命精神和懂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我们是要深入实际，在革命实际中与群众一道，向群众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实际并改造实际，而不是坐在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坐井观天。以上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经常对人作宣传作教育时所说的话。当然，在井冈山时期，党内状况并未形成如一九三一年以后党内所产生的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主义，但当时党内确存在着一种专作政治游谈不切实际倾向，毛主席反对此种倾向是非常正确的。毛主席经常说，我们既主张土地革命，而又对一个乡、一个区、一个县的土地革命运动无参加的兴趣，则这种主张土地革命是假的。又说，在土地革命中口头主张进攻富农的人，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并不反对地主。这是反对口头革命家的一针见血的话。毛主席对于理论非常重视，领导我们研究“六大”决议便是一个例子。

如以上所述，一个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便活跃在我们面前了。由于毛主席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便有勇气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通过中国革命实践，使两者紧密结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因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更丰富更发展起来，这是最具体最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辩证式的发展过程，这是最值得我们终身研究

和学习的。

中国人民面临全国胜利后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全国胜利后的国防新建设问题，要能顺利解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便只有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着手，根据其原则指导，钻入实际去独立解决问题。毛主席在中国四次大革命中充满了创造的范例，我在此仅举出井冈山斗争中的军事创造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举例。

## 八一起义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八一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是一道界牌。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来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自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的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的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1]，是没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蒋介石叛变以后，以汪精卫、张发奎为首的武汉政府，其反动的捣毁农民协会，一样的解散工人纠察队。所不同的，这些罪恶是在东进讨蒋[2]的欺骗掩饰下进行的。武汉政府当时发表张发奎为江右军总指挥，唐生智为江左军总指挥，东进讨蒋，对革命人民保持一定的欺骗。事实上，他们的司令部里日本特务公开活动，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时在党中央尚未清算，陈独秀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时也没有撤换。因此，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这一重大决定关键，不能不是软弱的，无力的。对于八一起义，既无布置，亦无定见，根本就没有坚定的政策。继续合作下去，显然不可能，人家已经动刀杀我们的头了，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又没有这种勇气，而陈独秀正大放其取消革命的言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巩固了，今后只有议会斗争了，只有办杂志宣传斗争了等等。八一起义粉碎了陈独秀的谰言，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被彻底清算了。

东进部队中，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为首，主张起义，中央对起义不反对，也没有明确的指示。于是就在南昌行动起来了。起义以叶挺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六个团，朱德的教育团为基干。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军的主力。在三十一号午夜起义开始，到八一全部占领了南昌，顺利解决了城内敌人。

起义以后，队伍扩大了，以教导团[3]为基础，成立了第三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扩充为第二十五师，成立了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原张部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在周士第起义时已拉出一些，又加上俘虏、逃难到南昌的革命同志、工人和农民群众等扩充起来的。当时全能跟上就跟上的。

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之所以能够顺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内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同志的教育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布置之乱，可以想见了。

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的基础，但张唐的力量很大，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的形势，就不好搞。下赣州至广州，

---

这是陈毅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在南京鸡鸣寺对来访者的谈话。

恰巧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是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会昌、瑞金至汕头，当时主要是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了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没有懂得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革命应该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广大人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革命斗争形式。方志敏同志以极少数的武装，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能够坚持十年，主要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依托。贺龙同志在潮汕失败后，单人匹马回到湘鄂边地区，能拉出那样大的一个局面，建立了湘鄂西根据地，也主要是发动群众的结果。人民的武装必需以广大人民为依托。

人民对贺叶部队的起义是支持的，对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是欢迎的，对国民党的叛变是愤怒的。广大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是非常英勇的。

我当时在武汉军校[4] 负党的责任。军校学生有七八千人，有七百多个党团员，很多同情分子。我们八月二号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八月四号到九江，七八千学生坐了几十条船，一个小火轮拖三四条木船，每一条船上坐几十人，浩浩荡荡，风涌直下。军委的命令叫我们东进讨蒋，归张发奎指导。军委并没有告诉我们八一起义的事，只是说，中途可能有变化，要我们有应变的准备。但因为不知道八一起义的事，所以准备是很不够的，几乎是没有准备的，学生们大部是徒手，小部有枪，枪是烂枪，很多没有子弹。船坐得很分散，根本没有应变的部署。满长江都是船，哪个人坐在哪个船上都不清楚，连联系都不易办到，统一指挥更谈不到了。八月四号船到九江，船不准靠岸，事情严重起来了。张发奎的兵立刻到船上来说：“同志们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分家了。”七八千学生就这样在船上缴了械。下午，船才准靠岸。张发奎把学生集合起来讲话，他喊着：“国共分家了，共产党站那一边，国民党站这一边，分一下，别误会。”他不好意思说左边右边，只笼统的喊那边这边。但那边当然没有人敢去站，一喊都站在一边了。

当晚，我们在党内布置了一下，指出了几条路。一条可以回家，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一条连夜出发到南昌去和叶贺会合。一条，要是还没有暴露的，可以留下。大约有两百多人愿意留下，这两百多人组织了支部。我们估计叶贺可能到广州方面去，张部也一定向广州，到广州后，再跟自己部队会合。以后，这两百多人，果然成了广州起义的基干。缴械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学生对汪张的反动，非常愤怒。登岸以后，七八千人，走散了一大半，只剩下二三千人。这些走散了的，其后有个别到了井冈山。

我是著名的红色分子，埋伏在特务连连部里面。特务连的环境较易隐蔽，连长肖劲同志是党员，一二三排长都是同情分子。那些同情分子说：“你是CP分子[5]，我们今后是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怎样你。上面要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护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这是当时中下层干部的普遍心理。对于汪张残杀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中下层干部是普遍愤慨的。但我和肖劲同志因为太暴露，所以还是决定去找叶贺。

我们连夜出发，从九江往东走，一夜走了三四十里。一路上，老百姓很



恐慌，都说兵变了，家家关门闭户，不敢收留外乡人。农民协会的牌子都打烂了，土豪劣绅又横行霸道起来。本地的团练在路上武装盘查，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抓。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当兵的，问我们到哪儿去，我们说回家，不干了。快天亮了，既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地方睡。住家不用说，旅店伙铺都大门关的紧紧的，打门不开。说是当兵的更不敢收留，只好到山上树林子里休息一下。天亮以后，又走，走出了六十里，慌乱的情况才没有了，也可以买到东西吃，田里也有人耕种了。我们赶紧买了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换了便衣，在一个面摊子上打听到南昌可以在姑塘赶船，姑塘有船开南昌。

就我看，一路上可疑的人很多，都各人埋头赶各人的路，谁也不招呼谁。我有意和一个人攀谈了一下，那个人是安徽人。他说，你老百姓不懂，现在汪张也杀自己人了，背叛革命，背叛工农，骂苏联如何不好，他说汪张是假革命，我们青年人受了他的骗，决定不干了。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我不够资格，我这样的，共产党不收。我现在回家去，反正不干反革命。这是当时一般人的普遍情绪。

我们到姑塘赶上船，飘鄱阳湖赴南昌。船上有几个广东人，我一看，一定也是部队里的。船上的人纷纷议论，有的说张发奎的兵开到了九江，有的说贺龙在南昌暴动了。

我们六号晚上到南昌。一到南昌，才知道张发奎已经进了南昌，贺叶已经退走了。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骂共产党，又开始捉共产党，杀共产党了。从九江动身的时候，本来规定了几个接头的地方，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根本不敢去问。贺叶究竟那儿去了，也不敢探听。好容易听人说，往临川抚州去了。我们当时很奇怪，没有估计到是走这条路往潮汕，以为这消息一定不确实。这时城里很紧张，我们没住处，不敢投店，也没熟人，非常危险，还是决定出城去追部队。

出南昌十多里，到了一个渡口。渡口上有一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都不肯渡人到对岸去，说是封渡了。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衬衣，一条西服裤，不像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那儿去了，他说经临川方向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去吉安。我们问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跟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我们问他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学生联合会的人，他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说：不是，不是！

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目后，就让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应承。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岸边，我们这天夜里就睡在船上。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

过去李家渡以后，沿路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

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的十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打探，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原来八一起义时，叶挺扣留了蔡廷锴，想争取他的十师一齐起义。蔡被扣以后，队伍也带过来了，十师的营连干部，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十师的领导，但叶挺因为和蔡廷锴是老朋友，很犹豫。退出南昌时，只叫他跟着走，谁知他就走了另一条路，到进贤去了。到了进贤，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清出来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

出来了”。这个十师后来虽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吃掉了。十师本来是可以成为革命部队的。

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队伍，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布置。

赣东有一股绿林武装[6]，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庆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贺叶的委任，条件是发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绿林部队去领导，我本不愿去，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绿林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庆，由他介绍了去。傅把我们安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带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没等到什么邓司令，连傅大庆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部队等来了。朱部杨如轩的兵开进了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出城，就被步哨抓住了，说我们是共产党。朱部大部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一听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

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庆。这位先生也正是惶惶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是要他带了去找，他说：“找不到了，要找，你们自己到山里找去。”我们没办法便跟着他，还是求他带了去。走了三四里，天黑了，谁知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原来这家不知是他的亲戚还是他的家，他到了家了。我们打了半天门，在外面喊，他理也不理，对我们是恕不招待了。

没有办法，只好再赶队伍。连夜赶了五十里，赶到宜黄，赶上了队伍。这次到了队伍，就把我分在七十三团做党代表。

七十三团是共产党领导最早的武装，从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这个团的前身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最出色最有功绩的部队。一九二五年，叶挺同志从苏联回来后，就是这个团的团长，我党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都在这个团工作过，党对这个团的领导是坚强的。这个团成立以后，从没打过败仗。第一仗是在衡山以南的攸县，就把北洋军阀打的落花流水，打垮了北洋军阀六个团。蒋介石当时以叶挺为先锋，命这个团孤军深入，本来是阴谋使这个团覆灭在北洋军阀手里的。只是因为这个团的英勇善战，蒋的借刀杀人阴谋才没有成功。第二次打汀泗桥的胜利，第三次攻克武昌的胜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决定作用。以后在河南打郑州，打开封，威名远著。这个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扩编为师。抗日战争时，改编为——五师的教导一旅。皖南事变后，开入苏北地区成为新四军第七旅。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传统的部队之一。

我到这个团工作后，下到连队看看，觉得战士情绪很高，很有信心。战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都知道他们是反革命，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抛弃了，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众谋利益，为工农打天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他们对共产党很信任，都说共产党好，并且也很自豪，夸称他们是共产党的党军。因为有为民众谋利益的朴素观念，所以纪律很好，那时候虽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不扰民的观念是有的，普遍的作战信心很高，对国民党的追兵是瞧不起的。我们到宁都以后，国民党已有准备。桂系军阀集中了很大力

量，广东军阀也以钱大钧所率的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和另两个团到瑞金、会昌一线来堵，而朱培德就紧紧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我们的力量是贺龙部二十军六个团，叶挺部第十一军六个团，朱德第九军只有一个教育团。朱德同志当时是先遣司令，但却是没有部队的司令。部队推进至王田市，贺龙就和钱大钧相遇了。在壬田市一个遭遇战，把钱大钧打垮了，钱退至会昌。我们当即决定叶贺分兵两路合击会昌，在会昌城外的岚山岭，战斗打响了。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上午，解决战斗，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计全歼钱大钧四个团，钱大钧溃不成军，退到广东梅县一带去了。第二天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桂系黄绍竑的部队就从我们的侧背赶到了。他从赣州赶到会昌，恰巧跟我们翻了一个个，即从我们的攻击原路，攻击已在我手的岚山岭。打了一天，我们消灭他们的两个营，他才晓得钱已垮，便狼狈逃跑了。

这时候我们如果乘胜追击钱大钧，是很好的机会。因为钱大钧垮了以后，广东仅仅剩下陈济棠，只有很少的部队。桂系虽实力雄厚，但又不能不防张发奎，因张发奎和桂系有矛盾，他也正扬言要下广东。假若当时采用这个决定，虽未必能拿下广州，但把钱大钧全部歼灭，是极有可能的，局面会是不同的。

但当时我们经验少：追钱，又怕朱培德迫我之后，且岚山岭一仗有大约上千的伤员，这些伤员也没法处理，客观环境很艰苦的，这个地区没有革命基础，几十里路群众都跑的精光了。军中缺粮，饭吃不上，找不到人抬担架，困难是很多的。于是便决定返回瑞金，至长汀，在长汀下船到汕头。以为到了汕头有了海口，国际就可接济，一切就会好转，可以下广州，进行第二次北伐了。这个决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路很偏僻，山多林密，群众基础很差，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于是得以从容的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而我们到了大埔，又作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决定分兵，把周士第和朱德的部队留在三河坝。这个三河坝分兵是个悲惨的决定。因叶挺十一军是全军的主力，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

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十三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十七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全军覆灭了。

汤坑战败以后，贺部余二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下贺龙同志一个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残部除少数在饶平和我们会合外，大部由团长董朗率领，会合了海陆丰农民暴动的队伍，和广州暴动撤出来的武装三千多人，就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但因政策和军事的错误，死打硬拼，后来也在东江被打垮了，传播下了其后在抗日战争中东江游击队的革命种子。

我们和反革命打了一仗后，也有些损失，由朱德同志率领，由三河坝退至饶平。为什么退至饶平呢？是还想接应贺叶，和贺叶会合。一直到和叶部少数残兵败将在饶平会合后，才知道贺叶已经垮了。

这时候我们约有两千多人，以七十三团作基础，编为第一营，算是个大

营，共四个连；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育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个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但人民军队虽然有了自己的领袖，处境却是非常困难的。人心涣散，士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肠打仗。到了大庾，两千多人只剩下九百多人，但这九百多人却是最纯洁的，最坚强的战士。到大庾以后就没人逃了。

朱总司令不论是行军，不论是在三河坝，不论是打仗，见人就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等于一九一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一九一五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迫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可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会不迫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我们到了大庾，反革命不迫了，蒋桂混战打起来了。人们听了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的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到大庾以后，反革命自己打起来了，屁股后面没有追兵了，部队可以休整了。我们于是便开会，讲道理，传达朱总司令的道理。部队看到了光明，情绪稳定了。正在这时候，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便更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很有影响。部队的湖南人最多，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便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希望。

八一起义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于在广大地区内宣传了革命的道理，特别是朴素的土地革命的道理，在于为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积累了军事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运动战的经验，这是很宝贵的。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质历史现实出发，就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斗争，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是一定会失败的。说明敌强我弱的时候，战略上的分兵是错误的。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

八一起义的结果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有坚强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必须依靠人民，由人民自己来建立。反动的旧军队不可能成为坚决的革命力量，因为他不是服务于人民的。旧军队在革命高潮时可以投机，但到了革命低潮

一定反水。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强大。人民是力量的泉源，党是领导。离开党，长不大，离开人民长不大，没有党的坚强后盾，力量一走被消灭。党强则强，党弱则弱，弱者必败。海陆丰的力量本来比朱德的力量大，但海陆丰失败了，就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弱。

朱德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当时的道理在和毛主席会合后，由毛主席理论化、提高到马列主义科学水准了。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是由革命斗争中考验出来的。

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武装斗争的问题。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是毛主席解决的。知道搞武装斗争，并不容易，知道怎样搞法，更不容易。有种种搞法，土匪山大王的搞法是一种，太平天国的搞法又是一种，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又是一种，只有这后一种成功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有根据地，有革命政策，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路线，有军事路线。八一起义出了问题，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

注 释[1]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向人民举起屠刀时，便束手无策，从而断送了革命力量，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2] 东进讨蒋，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为了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了这个带有一定欺骗性的口号，并组成了东征军。陈毅所在的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而成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也在东征军序列。[3] 教导团，指的是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教导团。[4] 武汉军校，全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其前身为广州黄埔军校。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北迁武汉，原黄埔军校学员也陆续随军北迁，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式定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年五月，陈毅任该校秘密的中共党委书记。

[5] CP分子，“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P分子指共产党员。

[6] 绿林武装，指赣东一支五百余人的农民武装，司令邓克忠。因当时该部未能与叶贺军取得联系，势单力薄，终为国民党军所算，全部在江西崇仁县境内牺牲。

## 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基本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召开意义很大，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过去开过的军事会议，没有到这样多的人，也没到得这样全。高于会在党的历史上历来是解决重大问题的会议，其性质等于党的代表会议。这次高干会是当着抗美援朝胜利，国家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开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各方面展开，我军现代化各项建设经过四年摸索，许多问题已渐臻成熟的时候召开的。如何总结全军四年来的工作和决定今后建军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我军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毛主席指示：要开好大会，就要上下通气，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打破上下问的隔阂。朱总司令在开幕词中也宣布：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彭副主席[1]也几次提出要展开批评。我们要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副主席的号召，对四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提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事与人都可能联系着进行一些必要的批评，我们到会同志都是经过多年锻炼的高级干部，对此当然是能打破各种顾虑的。

彭副主席的报告，详细说明建军方针、并进一步解决了建军步骤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文件，我拥护这个报告。彭副主席在报告中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2]，为保卫国防，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这个任务的提法，是提得很正确的。对四年来工作成绩的估计也是正确的，对今后十件工作的规定也很好，我们对此意见不多。我们认为对缺点的估计及其原因也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我只想提一些补充的意见。我认为报告中对缺点都作为全军性提出来的，这是很符合事实的，但对军委各部门及各区、各军的缺点未分别点明，因此，可能产生这种印象：大军区以为这些缺点是指军委各部的，军委各部又可能以为这些缺点是指大军区的。我认为各大军区与军委各部门缺点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相同的，应特别指明。听了聂、萧、张、赖[3]各同志的副报告，我认为一般是好的。我觉得干部工作的报告，自我批评精神较好，聂代总长、萧副主任和张副总长的报告，总的精神是符合彭副主席的报告的，但工作检讨方面是不够的，我想在这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

### 对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问题

我军正规化的建设，首先就要解决对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的问题，不能单纯从业务上着眼。事实上，我军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苏军现在的水平，因为他们已有三十六年的历史。现在公开的反对政治工作，削弱政治工作的言论是没有的。但是以单一首长制来抵消政治工作的倾向，是正在发展着。军委、军委各部门和华东军区对此错误倾向进行批判是很不够的，必须进行严格批判。脱离政治领导的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在我军中是没有地位的。毛主席说农村阵地没有空间，不是资本主义去占领，就是社会主义去占领，农村社会生活如此，军事工作更应是如此，正确的政治领导思想不去占领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就要来占领阵地的。单纯技术观点，单纯军事观

---

这是陈毅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倾向自有我军以来即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现在是披着新的外衣，又在我军强调现代化新任务之时企图活跃起来，企图抵消和削弱政治工作，故必须加以批判和清除。贺龙同志这次去朝鲜参观回来说：朝鲜战争，首先是打政治、打党，然后才是打技术。即是打党与政治和技术的结合，这是极其正确的看法。有些同志热心于军队的现代化，我也同样热心于现代化，但是如果用其来抵消或削弱政治工作，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彭副主席和萧副主任的报告中也尖锐的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着重还不够。例如内务、队列、纪律等条令先颁发，而政工条令迟迟不颁发，不管主观想法如何，客观上是助长了一面，打击了一面。我认为应采取步骤，或收回再同时颁发，或于政治工作条例颁发时，附文说明，军委要举行一次自我批评来澄清局势。另外，有所谓政治工作人员不安心问题。我要先问为什么不安心，为地位、为待遇、为个人前途而不安心，或是感觉政治工作被削弱而不安心？毛主席常说：政治工作同志应懂得有所不争有所必争。我体会此意是，政治工作人员不应争什么地位、待遇与所谓前途问题，应该争政治思想领导的加强，这是党与人民的最高利益，才值得一争。现在我军猪战士大多数人都了解政治领导、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都愿意支持政治工作，这在我军建军初期是没有这种条件的。现在不利用这种条件来加强政治领导，而有消极表现，热心于所谓政治转业，这就是政治工作人员的自暴自弃。即令这种人改行去搞所谓现代化业务，必然是又增多一位新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的人，我敢预言，这样搞所谓现代化是一定搞不好的。

不能设想，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要逐步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一个很大的资产阶级他可以完全驯顺地被改造，他不企图反攻，不企图在党内军内找他的代理人。不能设想，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中，加上蒋帮盘踞台湾和国内残余地主尚有一大堆，他们不向我党我军伸出破坏的血手。只能说他们最想的、他们处心积虑的，总是想法从我们内部来夺取革命堡垒，即是在我党我军内部寻找他的代理人。警惕这一点，严加防护，各方面深切地进行思想消毒，正确的运用马列主义的领导思想打破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来巩固党来巩固部队，这是我军现代化步骤上的首要问题，不许可将他列为次要而与其他问题并列来看。

二十六年来历史证明，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制度是极为正确的制度，在此制度下与各部门分工配合，由党委负责组织经纬（即块块把条条组织起来，配合去进行工作），由首长督导各部门分头去执行，加上政治工作制度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起保证作用，在民主基础上强调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强调民主，这一系列的领导、分工、执行、与政治保证密切结合起来，动员群众，走群众路线，这就是我军的常胜的根源。再说一遍，党委领导其一，首长督促各部门分头执行其二，其三是从政治上动员群众和保证完成任务，片面强调一面或企图削弱哪一面均要犯错误。这里特别说一说政治工作制度，它是贯彻和掌握政治领导，对各项工作提供保证作用的，较之其他业务部门更带全面性，而且是动员党与非党来行动的，用动员党的力量来保证的。它是在各部门工作中贯彻党的领导的一根政治红线。它不应在部队中争什么特殊地位，而应在部队中抓住思想动员、思想领导和思想说服教育的重要环节，保证把一切工作做好。

党委领导机关，过去规定设在政治部。我认为不一定。军师党委可设在政治部，大军区可以设在政治部，也可以设在其他机关，也可以单独摆，只

要对工作方便有利就是好的。大军区的政治机关工作已经很重，以不兼办党委的事为好。但绝不因此而削弱政治机关承办党务的光荣任务。过去说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这句话容易引起片面的解释，因为部队各机关，都是党派遣自己的党员会该机关主持工作的，党在各该机关均有最高的领导威信，这与政治机关殊无二致。但政治机关是替党委专办我党本身党务，并贯彻政治领导的机关，这是有别于其他机关的。

这次大会主席团指定谭政、罗荣桓两同志和我负责审查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我们还未开会，但我看了二遍，并与甘副主任谈过，我认为这个条例写得很好，可以用，只要和各种条令加以校对，不互相打架就行。政工条例在这次大会后颁发，是可以澄清目前部队中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情况的。

整个政治工作的思想工作，应与地方工作相配合，这次全军的总路线的学习，比地方迟了一步，这是不好的。军队的思想工作应与地方并进才好。过去中央和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只发地方党，有一部分未批发军队，我建议今后要批发军队，如地方发到县，军队就要发到团。军委对军队的重要指示，在不妨碍军事秘密的原则下，也可发给地方，这样军队和地方才能在各方面取得相互的一致和配合。军队和地方的路线教育要做到一致才好。

我认为总政文化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总想和地方争先恐后的比，形式又多又杂，部队的东西反映得少，这是缺乏专心为部队服务的精神的。地方上有越剧团，我们也就搞一个越剧团，并不一定符合部队的需要。但我不是主张取消文工团，对凡谈精简，首先精简文工团，我也不赞成。军队的体育主要是军事体育，不要过分强调球类。军队的文化与体育均应以数百万军队为服务对象。能满足几百万军队的要求，不求出人头地，自然出人头地。地方的文化与体育工作，应以为地方服务为对象，不强调他照顾军队，但他的优良出品将对部队有很好影响也是必然的。

### 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基本问题

部队要现代化，要建设诸兵种合成军队，要改装，要以苏联军队为榜样，要以斯大林军事科学力准则，这都是肯定的。但学习苏联必须结合实际，逐步地学，急于求成，不讲步骤是学不好的。不愿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的人近年是日益减少，逐渐认识了学习的必要性，愿学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目前主要情况是急躁冒进，不结合实际，想一跃而跻。这是这次会议应该解决的第二个主要问题。

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见，但顾虑很大，不敢讲；我认为应该有勇气，打破顾虑，把意见讲出来。结合实际地有步骤地学习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这是真正尊重苏联的先进科学。不结合实际、硬性的搬、片面地强调，那是假学，不是真学，不是真正的尊重苏联的先进科学。我党历史上教条主义的错误记忆犹新，不可重蹈覆辙，必须既按需要又按可能，不要急于求成；凡是追求形式不务实用，是要失败的，有些在苏联适用的，拿到中国来也还要按原则结合实际加以修订，这是必须明确肯定的，含糊其词是有害的。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是逐年增长的。如果我们部队现代化不按可能而要求太急，就有与国家工业化脱节和有“返工”的危险。当然，如果不抓住时机逐步地向现代化的技术水平前进，企图保持古旧的技术落后状态，也将造成



损失，不能强有力地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

对不重视学习苏联现代化军事经验和技术的，其主要理由是说我军曾以劣势装备打败了美蒋，因此并不感觉其学习的必要性，这种谈法必须痛驳。今夏总政指示指出：我军能打败日本、蒋介石主要是由于我军装备与其接近而悬殊不大，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因为我军多年是以夺取敌人武装装备自己，故能做到装备接近而能打败他。我要进一步指出：不仅当时敌我装备差不多，而且还由于我军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即战略上以少胜多，而战役、战术上则是以多胜少。请不要忘记，这种战役、战术的实际，仍然是组织了人力火力的优势，即装备的优势，才把敌人打倒的。现在美帝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不学习现代化合成兵种作战，不学现代化技术，不改装，当然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另外对愿意学习苏联的现代化技术的同志，有一种浅尝辄止粗心大意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各特种兵中最严重，必须痛加纠正。他们不懂得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是集现代自然科学的大成，每一兵种，每一项目，每一武器，都是经过多年的不断修改而始告成功的。可以说世界自然科学界每一进展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军队武器与作战改变。因此对苏联先进军事科学与先进技术，不作三年五年或十年二十年的虚心学习是得不到手的，短期学习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现在单就军事科学技术来说，它本是由粗到细，由局部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的系统的结合。科学技术最讲究程序，即按程序排列，达到一系列的运动，即从分解与合成而达到科学预见的证实。中间有任何错乱，任何颠倒，任何违反，或稍稍与原定程序不符合，必致全部打乱或遭致失败。某些同志仅视为一种单纯的技术的动作，苏联顾问比一比，我学一学，浅尝辄止，自以为天下事不过尔尔，认为科学技术是易于学会的，无论空海装甲炮等几个月就能学会，粗心大意，不下苦工，造成训练时装备损害多于战斗损害，这一倾向应痛加纠正。我主张号召老实学，用心学，每一门学他几年，终身从事，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可靠专家。我敢预言：将来还有一个按中国条件来发挥和发展苏联先进科学经验的伟大前途。

对学习苏联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要靠部队党委、首长与政治工作机关，系统的对上述两种倾向作不疲倦的斗争。首先部队首长与政工人员应自己先学一些必备的现代化技术知识，找着共同言语，才便于领导。部队首长不学，将来即有难于胜任指挥合成兵种作战的危险。政工人员不学，即难于布置政治保证。特种兵首长自己不学，不能使自己成为专家，这个首长不是首“长”，而是首“短”，这个首长是当不久的。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要随着部队现代化的要求与进展而适时改变，要促进这个改变，不要障碍这个改变，要争取自己站在这个改变的先头，不要落后，不要拖尾巴。

国家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正在进行，必须在军费方面紧缩才能向重工业、国防工业投资，部队不紧缩，不削减开支，国家工业化会推迟的，也就是部队现代化要推迟。反对部队建设中作大计划大扩充的不切实的倾向，特别是各特种兵的党委要注意，要提高到一切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上面去着想。只有通过这一方面，有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才能有现代化的部队，目前各顾各的倾向，会分散力量的，只打本位算盘，应加反对。

要很好与苏联顾问合作，他们有学问，有知识，有热情，工作负责，值得我们学习。但他们不大了解情况，工作方式有些生硬，我们有些同志下愿与其多往来，即见面也是应付场面，与顾问合作形成很大负担，这问题必须

解决。根据我的经验：首先要用最大的耐心，多给顾问介绍情况，他了解情况越多，就越容易和我们思想一致；其次不要怕讨论，该讨论的一定要讨论；再就是生活上多予关心。顾问同志们是很重感情的，又身居国外，举目无亲，我们一定要体贴这一点。感情上融洽，中活卜打成一片，也是可能在合作中帮助解决问题的很重要的一条。在高级干部学军事时，可聘请顾问当教员，他们是愿意的。各政治顾问的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是好的，也可请他上课，要充分利用顾问来进行工作。

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要结合实际，实际之一就是要着重在干部，把干部训练好，部队训练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在部队训练计划上，建议军委少搞一点，但要深，要精，要有重点，全面铺开力不胜任，当然效果不好。

所谓结合实际，最大的实际之一就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思想领导、群众路线等等。如果认为要学习苏军现代化技术，就要使我军优良传统受到削弱，那是不对的，应坚决与之作斗争。实际上应结合它去学，才学得好，违反它必无任何成就。

### 切实改进自己的领导方法

（一）在领导方法上，缺乏典型试验，这说明对毛主席的领导方法体会不够。几个报告中都讲到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但不具体，你没告诉我，缺点究竟在哪里，怎样犯了官僚主义？这包括军委、各大部门、各特种兵和我主持的华东军区都有此毛病。地方党在这方面做得好些。华东军区司令部按编制进行了一个营的全副武装演习，据此提出了在华东自然条件下的编制意见。据说，总参谋部对此不加理会。我认为编制为甚老定不了，就因为没根据一定的实际来作指导。毛主席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要纠正官僚主义只有拿活榜样给他看”，又常说“按倒石头打泡秋”，也就是着重典型试验之意。我建议军委凡对今后兴革事项，尽可能先措意于此。

（二）缺乏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精神，有四个不够：（1）事前收集意见、倾听意见不够；（2）事后坚持不够，开展斗争也不够；（3）对下面应该撑腰的，也被自己公布的东西束缚起来，在大胆撑腰方面也不够；（4）常用生硬的办法，行政命令的多，检查工作和了解实际也很不够。上述批评是根据我们四年来执行军委及各大部门各项指示得出的感觉，不细举例子。为改进今后军委工作，我建议：一、军委应该定期开会。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会议，是全国工作的发动机，这是完全正确的。此次会议的方针，即是在那样的会上通过的。但军委本身应有专门会议，每周开会一次，每三月把各大区的人找来开一次会听取各区、各军的工作报告，使上下通气。二、彭副主席报告中说：“现代化军队并不简单地等于步兵加上飞机、坦克、大炮……在军事上说是一个很大的跃进，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并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因此要引起一系列的变革。”我认为要完成这个转变，首先是说服教育，同时必须进行坚持的斗争。我认为发动斗争，克服障碍，这是任何工作在前进时不可避免的规律。我国去年不进行“三反”、“五反”，当然不能获得恢复经济的胜利。今年和以后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当然不能获得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几年来，军事系统在开展对坏典型斗争这方面，表现软弱无力，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缺点。另外要下面执行自己的东西就要善于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随时能撑下面的腰，这方面也很不够。

例如华东军区党委处理某同志问题，拖迟一年多，有处理不下之势，最后直报毛主席，才解决了。处理另一同志也转了许多弯，才处理下来。我们要求在正确方面撑我们的腰，在错误方面给我们以严厉批评和纠正。如何了解实际，只有靠不断的检查工作。我在一九五一年冬到一九五二年秋未是专在军区做部队工作，从没有人来检查工作，而命令、训令多得很，使人应接不暇，业务会议多，而政治会议一次也未开过。以前军委人手不足，不能多怪，今后军委人事配备全了，要求事前多征求意见，事后多检查，多给下面批评和督促。

（三）建设部队，强调军训是对的，但五月二十日结束文化学习，要在六月一日开始军训，无论如何，准备时间是不够的。对女同志转业，一面应坚决执行，不应有何犹豫动摇，一面对限期和步骤则可稍宽。文化学习，应该继续学，把重点放在干部方面。这些问题，由张爱萍、萧望东和叶飞三同志多反映一些意见。

（四）刘院长说：组织经纬、编织成纲，这个问题很重要。最大问题是对各部门打招呼，多通报。军委发指示要互相联系好，全盘下达是有好处的。特种兵部队指挥全归军委或全归军区都是不妥当的。我同意聂代总长的报告，有的工作归军委，有的工作归军区，应作明文规定。军委和各大部门四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军委机关刚建立，几个负责同志有病，彭副主席又来得迟，人手也不够，以前工作忙不过来是事实。特别是胜利的领导抗美援朝战争，把我军提高和扩大到现在的伟大规模，成绩的获得这是很不容易的。讲到此地，我得到很大安慰而且很兴奋，这些伟大的成就，使新中国的安全有了保障。现在前线停火，彭副主席返京负责，各大部门的人员也配好了，工作一定可以作好。

（五）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军队应该关心地方工作，参加地方工作，执行和贯彻党的总路线，保卫经济建设。军队执行和贯彻党的政策，应该不落后，现在地方上搞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军队不要站在旁边，应尽可能积极参加。

总路线学习问题是从学习文件，听报告，到自己做报告，到实际去执行，这是反复学习的过程，这是由理论到实际与由实际又回到理论的学习的辩证过程。光学不做，光做不学，皆偏而不全。在实践总路线的过程中，才更知道总路线的正确性，才算真学。同样，在实践后再来学总路线才更知道自己知识不够，而实际生活变化是无穷尽的，因而更需要对总路线的学习。

在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军队不应落后，军队成员多来自农民，例如地方上发现有不少因我指战员寄钱回家而囤粮。举此一端证明，军队中也必须进行总路线的教育，推动指战员去影响其家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用甚大。

### 几个具体问题的建议

（一）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的存废去留问题。过去我对此是很费踌躇的，现在我同意彭副主席和聂代总长的报告。要保留军区机构，取消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但需加以精简，提高质量。过去军区、分区没有工作，是上级没有具体指导，实际有很多工作可做。留此机构有很大好处，平时保卫治安、处理复员、办理兵役、训练干部、研究兵要地理和后备动员状况。一

旦有战争，一个分区可成为一个师的机构，到仓库领得弹械，即可赴前线作战。但不能把军分区变为安插闲员的机关，而要成为真正的工作机关。

（二）此次精简机构，要首先从军委做起，军委在人员上，要减少数量，增强质量。大军区也要减，主要也是提高质量问题。兼职多不好，完全不兼也不好，应尽可能减少兼职，可多提几个副司令员、副参谋长副主任、副部长来担任实际工作。建议军委对干部做一全盘了解，进行全国统一调整。现在正在建设的军事工厂，一个大厂几千人，不派主要的军、师干部去，那是危险的。不要怕调的多，也不要叫，问题在于是否使用适当。请军委检查在高级机关中是否有把得力人置于闲散之地的现象，不反本位主义是不行的。

（三）建议军委要着重训练干部，中下级干部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对他们要加紧培养，这是我军的骨干。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了这样大的家当，要交给可靠的干部来继承，就必须重视培养干部。反对送不好的干部去入学，把好的干部死抓在自己手上。打仗是先打干部，然后才是打兵。

（四）各特种兵部队在军委指挥下一定要归大军区分管。最大的理由是：使大军区经常直接与特种兵接触，使其学会指挥诸兵种联合作战。特种兵指挥员要成为专门人才，但也可以与陆军将领轮换，要通大家来学。

（五）编制、装备、训练要照顾全国地理、气候、任务等各种不同情况。据萧克同志谈，明年军训工作是按八种情况订计划，这样很好。希望在编制、装备方面，也注意这种不同的情况。

（六）要求军委每年检查军区工作一次。军委对大军区的工作应调负责人来北京每年作一次严格的检查。每年应有二次至三次派主要负责人去现场检查工作的执行程度。要求明年首先检查华东军区工作和东南海防工作。

#### 注 释

[1]彭副主席，指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〇年十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朝战争，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五二年四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2]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指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苏联红军，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故提出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3]聂、萧、张、赖，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

## 华东军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三大任务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华东军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党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发布了“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我们华东部队的党，根据这个决议的精神，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今天正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华东部队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三个：这次大会要讨论如何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我军建军的总方针总任务。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以后，经过广泛的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国内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资产阶级思想受到了严格的、深刻的批判，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种思想力量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动力。全国人民都纷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早日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了以技术革新为主的劳动竞赛。经济建设战线上不断创造新纪录、新成就，像过去战争时期的捷报一样，雪片似地飞来；广大农民踊跃地把余粮卖给国家，积极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像过去为了支援革命战争而踊跃地送粮、出扶、参军的那种高度热情，又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表现出来。

我们部队的同志，应该用怎样的实际行动来拥护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呢？那就是要加强国防现代化的建设，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的国防建设必须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不相适应就非常危险。我们还必须关心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我们有一部分部队，要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直接参加祖国的工农业建设。同时，我们还必须在生活上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们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就要搞重工业，就要大批资金，一个工厂就要好多万亿[1]。今天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今天吃得比较差一些，穿得比较差一些，省出钱来搞重工业，使我们的国家一天一天富强起来；一条路是只顾把我们生活搞好，把钱用光，使各种建设无法实现。走后一条路，今天虽然可以享点福，但国家没有钢铁，没有重工业，也就是还要长期地落后下去。大家知道，落后照例是要挨打的。所以我们只有走前一条路，走一天一天富强的道路。我们党代表大会要来号召全军，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争取社会主义早日实现。

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根据国内外的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明确地规定了我军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这就是要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这就是我们全党全军今后长期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努力，我们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就要响亮地回答这个号召。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认真地学习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毛主席曾经指出，学习苏联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我们过去就是学习了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和苏联的建军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和发展，因而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今天，我们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更必须以苏联军队为榜

---

这是陈毅在中国共产党华东军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标题为编者所拟。

样；否则，就要走弯路，浪费许多时间、金钱和精力。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要严格地批判盲目的骄傲自满情绪和狭隘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特别是要通过实际事例，使全体人员深刻地了解学习苏联的好处，用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把苏联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号召。当然，要实现这个号召，是一个艰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过程，也是新旧思想的转变过程，必须稳步前进，不能急躁冒进。因此，我们也必须防止生吞活剥地机械搬用的现象。我们必须提倡艰苦钻研，老老实实地学习，把苏军的先进经验和我们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我们的光荣任务。

要现代化必须正规化，正规化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我们在今后各项工作中，必须强调执行条令，加强统一性。过去，我们打游击战、搞根据地，工作上各搞一套；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我们部队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建设，我们必须依照条令的规定，把几百万部队从各个方面彻头彻尾地统一起来。这样将来在作战中才能统一指挥，协同动作。这次大会，要号召全军坚决执行条令，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当然执行条令，必须深入进行教育，不能单纯采用强制的办法。

这次大会要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精神，来研究如何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

党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党的团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部队的团结，也就是部队的生命。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教训中，来认识增强团结的重要。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今天帝国主义包围的存在。从南朝鲜到巴基斯坦，美帝国主义到处建立军事基地，矛头针对着我国，派遣间谍、特务，刺探情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如果我们麻痹大意，斗志松懈，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隙。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国内存在着极尖锐极复杂的阶级斗争。在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绝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绝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敌人懂得进攻我们最好的办法是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和部队的团结，在我们党和部队的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从内部来破坏我们。我们必须提高全党全军的警惕，用增强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为此，我们必须反对一切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部队团结的思想、行动，特别要着重反对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全国胜利之后，我们部队里确实有一部分人滋长着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情绪，认为天下是军队打下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会把军队放在党和政府之上，就再不认为军队是党的工具，而认为党是军队的工具。有某些同志，认为自己有功劳，现在是向党伸手要报酬的时候了，不愿意虚心学习，不愿意进步，而斤斤计较个人地位、名誉和待遇，如果不能称心如意，就不满意、发牢骚；有的甚至已经发展到胡作乱为，违法乱纪，腐化堕落。这些思想和行为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生活上的腐化，就是思想上、精神上已被腐蚀的反映。我们党代表大会必须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要所有在这方面有毛病、有错误的人，都很好地检查，

切实地纠正，使他们得到挽救。

要克服这种倾向，必须经常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召开过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不少的成绩。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一次“打扫”，就可以肃清一切思想上的“灰尘”。毛主席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判自己的缺点，好象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我们应该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大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骄傲自满情绪，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

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华东军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次大会上，一方面要认真地总结我们华东部队四年来的工作，一方面要选举新的华东军区党委会来领导我们今后的工作。

在总结检查中，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成绩。四年多来，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由于全体党员和全军同志的努力，在执行各项任务中是有许多成绩的。如果认为我们一无成就，就会丧失信心，而且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像我们海防前线的许多守岛部队，长期地远离大陆，生活很艰苦，不断地与敌人作斗争，保证了祖国海防的巩固，他们与站在三八线上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光荣。我们华东部队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和军委指示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夸大成绩，蒙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必须以对党中央、毛主席、全国人民和全军同志负责的精神，既要正确地肯定成绩，又要严格地指出缺点，特别是检查华东军区党委领导上的缺点。敢放揭露缺点，勇放改正错误，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忠诚的表现，我们不需要旧社会里的那种“客气”。在这次大会召开前，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同志认真地提出二千七百多件提案。这些提案，揭露了我们部队中存在着的重大问题，指出了华东军区党委领导上的各种缺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希望大家在这次大会上，进一步揭发我们的缺点。关于过去四年多来工作的总结，将由唐亮同志[2]作详细报告，这里不多谈。希望全体代表在听了报告之后，充分地检讨，大胆地展开批评，使华东军区党委的工作，能够得到更大的改进。

同志们，我们华东部队，守卫着几千公里的海防线，面对着金门、台湾，我们必须加强敌情观念，提高战斗意志，自觉地站在国防最前哨，坚决完一切海防战备任务；我们必须加紧部队训练，加紧现代化建设。代表们，让我们以战斗精神来开好这次大会，使这次大会真正能够把我们华东部队的各项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我代表大会主席团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注释

[1]万亿，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从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以代替原来面额较大的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折合旧人民币一万元。

[2]唐亮同志，当时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 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总后勤部卫生部要我在这里讲一些问题。我对军队医学科学情况不熟悉。今天上午有些同志向我汇报了一下，我现在就根据汇报的情况来讲。另外，地方上的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我管得多一些；对于中国科学院、高教部等的工作情况，也了解得较多，我现在也根据这些情况来讲，而且多讲一些，供大家参考。

中央对于知识分子的安排问题，在最近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周总理作了报告，例如：关于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如何组织科学研究工作，如何使用老的科学家的力量，十二年，即到一九六七年要赶上世界科学水平，再过二、三十年要超过世界水平等。这些大家都知道了。根据中央农业合作化四十条，[1]的指示和周总理的报告，科学方面又作了十二年的规划[2]，规定十二年应达到什么。中心题目及其下的题目，规定时间、物质、助手等各种条件的保证，赴苏留学，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各应达到什么目的等。中央的决定、号召是正确的，问题是下面如何执行。一九五六年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快过去了，但下面的转变如何，就是在医院里、实验室里、教室里、行政负责人（院长、校长、所长等）、政治领导人（政委、党委书记、协理员、支部书记等）是否都执行了中央新的指示？根据我们了解，下面不顾中央的指示，还是搞自己的老一套。

目前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障碍，不是科学家，而是行政干部，具体的领导干部。粗暴的态度，冗长的会议，骄傲自满，以为天下都是老子打下来的，将科学“抵掉”了。今天请我来讲话，我是没有好话讲的。中央的指示，需要在学校里、医院里来考验，在怀仁堂，科学家是满意的，但在医院里、科学院里、大学里就不然。有些科学家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这些具体领导干部的领导，而不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所以关于贯彻中央指示方面，部长、校长、院长、党委书记应该首先自我批评。

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科学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宗派情绪，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眼我、我不服你，不愿合作等，但六年以来，经过政治运动学习，已有很大改变。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如抗美援朝，购买公债等，他们贡献很大。科学专家的缺点（我们干部也有），不是、也不会是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和障碍。要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非科学家不可。科学家的毛病不是主要的。无论哪一个科学家都愿意研究。哪一个外科医生不想看病、开刀，做些理论研究？哪一个科学专家不想看新的东西？不知道新的，怎能提高？跟我们也都要看新的消息、文件一样，否则就无法进行工作。科学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作风、生活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有的，但六年来基本上已有所转变。重点不要弄错。问题不在科学家而在领导上。六年来资产阶级分子改变了，我们也对他们宽大。资产阶级分子已将资金献出来，怎么还能说他们“五毒”[3]？但我们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宽大？中央指示，听说你们已传达到了五、六遍，但还不够，还是委讲。因为问题主要在于具体的领导干部，愈到

---

这是陈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的报告节录。其时，陈毅是国务院副总理，分任常务，兼管科学、文教等，也参加国防。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下面愈坏。

当然这也不是说，领导干部对科学家有坏意，主要毛病是对中央的政策不了解，按照部队方式来领导科学。听说你们的医学科学院，为了保密，晚上将实验室锁起来，不让专家进去。这等于不许连、排长到连队里去。这是愚蠢！相信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连、排长应当一天到晚到连队里去；假使只有上操的时候才到连队，一定不是好的连长、排长。专家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实验室，半夜也可以去；也许会想起一个问题连饭都不吃。如不这样，就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科学家不能按时上下班，一有心得就要去实验室。中国协和医学院派男同志去当妇产科的协理员，这十分不合理。为什么这样糊涂？条例规定指挥军官不能派女同志，但不合理的条例，为什么不请示？我们可以改。西北大学一位研究麦种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对米丘林学说，崇拜英美，这显然是不对的。但不能强迫命令他。现在不相信，就等待他，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总是会被相信的。他还有一个毛病：他的实验室不许别人进去。人家怀疑他在里面倒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我们的干部将他调出去考察，而在他离开后，就将他的实验室大门打开，把他搜集的麦种都搬出来，掺混在一起，撒了满地。这个教授回来，大哭一场，这教授有不对的地方，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公开宣传，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办法。这倒是一个“调虎离山”计。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们不能用这些反科学的外行办法，强不知以为知的办法来对待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办法如不纠正，科学就不能开展起来——就是障碍。

孔夫子曾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说，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很多同志缺乏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的：要谦虚，要戒骄戒躁，要抱虚心学习的态度。毛主席一再指出要向工人、农民群众学习，我们现在搞科学，就要向科学家学习。应当尊重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工作不要强加无理的干涉。中央指示的意思很多，但主要是反对强不知以为知。不懂就应该学习，粗暴的方法是不对的。不久前，毛主席对我讲，领导科学，我们共产党有一个法宝：首先说，我不懂科学；我只可供给你条件，向你求科学成果；我们只能做验收员。我们给他们条件，三年、五年没有成果，他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

在政治上，人家听我们的话，服从我们的领导，但在科学方面，我们要服从科学家。不要弄得彼此不能见面，伤了感情，也不要牵涉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主席这些原则问题上去。科学家在政治上反对我们党、政府，是没有这样严重的，主要是牢骚，因为条件不够，没有机会，工作没有成果等，这仍还牵涉到我们的领导。毛主席再三讲，我们要虚心，要向科学家学习，听他们的话。不尊重人家的意见，自己又不懂，假使发生争执，我要无条件地支持科学家。总之，关于政治安排，科学家要向党内同志学习，听党内同志的话；关于科学安排，必须听科学家的话，放下架子，当小学生，否则，什么物理、化学、原子能、医学，都搞不起来，中医也搞不起来。希望饶部长、宫乃泉同志、史书翰同志等总后卫生部的领导同志，将我这些话传达给各级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武装。其后在一九二七年，我们重新搞起，这时主要的就是需要有一支武装。因为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敌人，以武装来反对我们，使我们无立足之地。敌人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漏掉一人。南京雨花台不知枪杀了多少人。没有武装，其他一切工

作如地下工作等，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一下子就会给敌人抓去。但要搞武装，当时没有干部，于是就派干部——主要是知识分子去学，因为知识分子比工农分子学得快。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穿军装，学军事，这样就发生了懂与不懂的问题。也有一些从军队出身的干部，但主要还是把俘虏过来的兵，马上让他们干军事。当时毛主席就这样指示：你们这些政委（知识分子），在军事上，不要去干涉他们，走远一点，让他们去干；要向俘虏兵学习，起码五年，等你们学会了，也就可以管军事、当司令员。

这个故事虽很简单，但意义很大。给专家以足够的信任和方便，因为干涉太多，他就会不干，应放手让他们去干，然后向他们要成绩。有病人，就让他们去开刀，要他们治好；若是你自己跑到开刀房，说，我来开，就会把病人开死，麦种是人民的财产，有什么理由把它搞翻？这也就是领导方法的问题——领导也是很容易的，只要加以组织和支持就行。但不用这个方法就总“说不拢”。

因此，今天执行中央指示，障碍在哪一方面主要的，已很明显，不在科学家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中央指示中肯定了他们的缺点是次要的，决不会障碍科学的开展。

我们希望科学家有主张。我对于那位研究麦种的教授是佩服的。他没有认识到米丘林学说，就不相信，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见解，这并不错，虽然他的见解是不对的。共产党不欢喜“唯唯诺诺”。列宁讲，共产党员的重大特点就是有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利益；假使错了就改正。当面讲好，背后乱骂，“怕肃反斗争我”等的这种唯唯诺诺态度，这种合作，是虚伪的。大家在一起应该很愉快，亦可批评，亦可吵架。学术上没有争论是不对的。共产党实事求是，什么人都可批评，如这次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就有很大的争论、批评。批评有对的，也有错的；但错的就不采纳。

需要扫除的科学开展的障碍，主要即为具体领导干部的强不知以为知。我们下面的各级领导干部并没有真正体会到中央的意图。只有尊重科学专家的意见，才能指挥他们。他们不会反抗党，也不会跑掉。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个实验室，发表几篇论文，取得声誉。这些要求还不批准，如何领导科学？

基督教徒做礼拜才能得到安慰，科学家只有做科学研究工作才舒服，离开了就恍恍惚惚。我们共产党员离开了党，就难以生活，要哭。为什么只能想到自己，而不想想人家的这种心情？不想，就是主观主义。不能只喊口号，光喊不动。希望你们响应中央号召，打开研究工作的局面。

科学家的毛病如：思想作风、宗派、小集团等，经过六年来的社会运动、思想改造，是已经给他们很多帮助，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但有些单位规定他们读些著作（如联共党史学了六年），出些讨论题等，效果是下大的。改造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大量的搞科学研究，展开学术上的争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转变他们的思想观点。我们不是要让每个科学家都成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只要一般懂得时事、政策就行。要保证六分之五专业活动时间。联共党史学了六年，但研究工作还是一样，这有什么好处？政治学习是必要的，但不能冗长，应生动活泼，不浪费时间。开会应有准备，不要妨碍他们的业务。我们有些政治干部给专家上课，理论还及不到他们，还硬要他们听。政治学习应组织得精干，报告应是听了以后，鼓掌，下次再来，不要搞五、六个钟点。

无论哪个科学家都爱国，都有人民的正义性，都希望祖国人民好起来，都愿意对人民有所贡献。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即使在家庭中也出现浪子；出了浪子，不能就把他开除出去。科学家的缺点，应该当作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的干部有缺点，我今天讲得多一些，大家听了，可能痛快些，但希望专家们也不要误会。这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是可以纠正的，他们也都是为了国家人民。大家都是同志，不能只看到缺点，看不到贡献。两方面互相砥砺，就一定会团结得好。这是我今天所讲的主要一点。

我现在要求你们科学家在具体单位所遇到的障碍，都向我提出来，我一定同你们解决。我负责这个工作，做不好也要检讨；你们把困难提出来，也是帮助了我。我在地方上负责管科学，我在军队也可以元帅的身份找有关部门算总账、解决问题。

我国文化经济落后，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我们一定要埋头二十年，卧薪尝胆，赶上去。如下克服落后，就与大国的称号不相称。而克服落后就要与科学家合作。光给科学家当代表、当模范、宴会碰杯，但没有主要的给科学家以研究工作的条件是不行的。

我国的土地使用面积与苏联差不多，是个大国，人口比他们多，历史有数千年。我国文化，长期在世界上占重要地位，自然科学也是一样。这是光荣传统，近代是落后了。现在我们有优良的社会制度，有伟大的朋友苏联帮助，不能不争气。现在我们赶不上，就是我们后代没有用——不是科学家没有用，而是共产党没有用，因为克服落后的规划是应该由共产党负责的。

我们的前途是伟大的。我们应该出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的科学家，像巴甫洛夫、米丘林——这是苏联的光荣。我们现在已出现了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毛泽东，文学家鲁迅。毛泽东同志最近又创造性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和平改造的理论。我们的自然科学家为什么就不行？我国有很多有利条件，如地大物博，人多，爱劳动，党的领导等，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如还不能使科学发展，这就要怪具体的领导干部。我们的科学家是有力量的，只要党很好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问题是下面如何做，所以领导问题不在党中央、毛主席，而在下面具体的领导干部，从我算起。

另外来看体育问题。六年以来，我们的进步比西欧二十几年都快，有十多项创造了新纪录，这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过去蒋介石集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但没有得分，而且根本不及格。今年又要开奥林匹克运动会，假使我们参加，虽然不至于第一，但有些项目得第二、第三或第四、第五是可能的。过去比赛吃鸡蛋，现在有些国家还输给我们。我们才不到十年，再有一些时间锻炼，成绩一定会更好。这原因就是听了体育教练员的话。所以我们要尊重专家的意见。我们应提倡有领导的自由的研究，不要强不知以为知。

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关心他们。在政协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与专家谈话、握手、拍照、招待吃饭。我们至少应该学毛主席的这种做法。但我们的院长、校长怎么样？是否与专家谈谈，去专家家中青看，建立同志间的友谊？关心不关心？我看都是官僚主义。你有汽车，人家有没有汽车？人家去一趟图书馆、实验室，在路上就要化二、三个钟头，毛主席说，有贡献的科学家的待遇应该比我主席的还高。美国好莱坞演员，有的薪水比罗斯福的高。美国有侵略政策，是不好的，但是当初在那一个历史时期作为进步的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有些遗留下来的东西还是好的。对于专家，应个别谈，专门谈，

不要一律听报告，与连队一般要求。星期天可以让他们看电影、游公园。我们的领导一般化，不能对症下药，牛头不对马嘴，离要求很远。

以上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现在再简单地讲一下第二个问题。

地方各方面技术人员正在安排。有人对国防工作不感兴趣，想转地方。你们不要认为只有在军队才遇到重重困难；我说，天下者鸦一般黑，到地方上也是一样会遇到。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军队、地方，在看病方面是一样的，但在军队应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军事医学很重要，并不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只要领导上这一关过了，就可以发挥你们的天才，是不会埋没你们的。今后博士、副博士学位等，军队、地方都有。医学科学院，要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建立，地方有一个，军队也有一个。科学应交给大众，小的地方都可做研究工作。我希望你们还是留在军队，安心下来，不要挑工作岗位。但军队的领导同志就要注意。假使你们做得不好，来了没有工作，还要受气，那么，他们走到地方，我就会收。

中央的指示，下面有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执行而转过来。也可能这里转了，走到另一个地方，没有转，就又要碰钉子。所以应该选定一个工作岗位，干到底；在军队，各放异彩。

第三个问题，关于时间安排，就是保证六分之五专业活动时间问题。星期天不能布置什么会议、演讲。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一星期应有五天用于专业活动，总政规定：半天政治学习，半天军事学习，半天党团活动，一星期共有三个半天，这值得商量研究，医生一下看病，二不开刀，成了马列主义专家。我们政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搞好科学研究，为了治病，而不是为政治学习而学习。医生学马列主义，不学开刀，至多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马列主义专家；应该在医学方面放异彩。总政、总参必须根据中央六分之五专业活动时间的规定，重新考虑。

科学研究是极其复杂的精神生产，不是容易的。往往十年、八年，甚至孜孜一生，也不一定有成就。科学研究的成果，不是变戏法，一下子可以得到，须有耐心，有的科学家终生研究，没有成果，但还是令人钦佩的。也许一、二十年，一代、二代、三代才能有成果，这就需要极高度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甚至要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即使多少年没有成果，但这种精神还是好的。在科学研究中，不容许有浅薄的人；浅薄是与科学研究不相容的。

科学研究与实际联系，不要机械唯物论，认为非要直接解决实际问题不可；也要有间接的联系，即理论研究，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科学研究，可能目前并无好处，但将来会大有好处。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式，对目前治理黄河没有好处，但也许在若干年后，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理论研究不能取消。但主要的研究题目，应放在解决实际问题——在目前来讲，主要就是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十条。

上海一个研究机关研究一种蓖麻蚕，不用桑叶，到处可以养。

目前无用，但如成功，将来全国都可以穿绸子，功用很大。同时还试验了无性生殖，获得成功，这又大大的打破了成规和传统看法，这个实验室只有几个人、一间房子，很简单，但这研究却已有了世界意义。所以对待科学，不要戴近视眼镜，要戴望远镜。搞不起来，不要改变脸色；对失败者应给以鼓励。不要小人见识，要落落大方，这是领导风度问题。过去，科学家没有成就，就受到轻视；今天我们新社会不应这样，要改变过来。对失败的，我们应同情，不应加以批驳。一千次失败，一千零一次就可能成功了。有的需

要限期完成，解决目前问题。但目光也要放得远一些，对目前没有什么意义的，也要花一些成本。

我今天讲的话，主要是对共产党员讲的，批评多了一些，有的话可能是过分的，也可能不合事实，但基本的意思是可以考虑的。希望大家批评。

#### 注释

[1] 农业合作化四十条 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陈毅曾参与修订工作。

[2] 科学方面又作了十二年的规划，指《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陈毅作为兼管科学院的常务副总理，在制订此科学规划的初期曾参与主持工作。

[3] “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 后勤工作者应该是经济学专家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后勤领导同志要我在你们的会议上发言，我是个转业军人，军队工作参加的很少，发个言。

军队后勤工作是什么性质？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经济工作。后勤工作者是经济工作者，后勤工作者应该是经济学专家，是军队经济专家，是政治、军事、经济专家。我就是用这个语言来表达我的意思。资产阶级讲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讲经济就与政治联系起来，二讲政治就与经济联系起来，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基础就反映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调转来政治又指导经济，改造经济。所以军队的后勤工作者，是军队政治经济学家，不但要学政治、学经济，还要学军队这一部分，要学特殊的军队政治经济这一部分。所以把它看成很简单的事务工作，很简单的后勤事务工作，很简单的后勤行政工作，很简单的一个后勤补给工作，是把军队的政治经济工作庸俗化，思想不高。思想不高就看不远，见地不明，展望不远，结果工作就抓不起来，就容易犯本位主义的毛病，犯事务主义的毛病，就不能抬起头来工作，这点你们是不是可以议议。要提高，军队后勤工作的风格要高，要有共产主义的风格，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干。我先讲了美国七百多亿的预算，有四百多亿用在军事预算上，国家是不能持久的。不管美国多富，多么有本事，七百多亿预算有四百多亿军费，是不能持久的。我们的预算好办事，建国以来军费预算一般是减的趋势，经济建设、工业建设、文化建设是增长的，国家是有发展的，很有希望，所以在政治上是强国。去年军委扩大会议[1]上我就说，彭总、黄克诚同志代表军队在讨论国家预算上他们总是不替军队争经费，这点我很佩服，我是投他们的票的。一九五四年我离开军队，五三年管一管南京军区的工作，四九、五〇、五一年我还管军队，那时我也在他们领导之下，是支持他们这个的。减一亿就减一亿，减两亿就减两亿，减五亿也可以，过去万里长征你都能过，现在还不能过？就是要把工业强大起来，农业发展，文化发展，军队就如虎添翼，就飞起来了。经济很落后，文化很落后，你军队也很落后，军队再强你也是弱。军队领导同志在国家预算上不去争这个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说是政治经济学家。后勤工作者是军队政治经济工作者，就是有这么点钱，也能够过，就是这点钱，紧紧还过得很好，这就看本事。大会出给你们的题目就是这个。钱不多，装备要逐步改善，工程要逐步改善，生活要搞好，这就是大跃进。调转来说，就是在国家预算中挤，也像美国一样，七百亿美国四百亿是军费，国家不能过。我们全民皆兵，但是不要钱，这就是强国。

注释：

[1] 军委扩大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当时军委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

## 忆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三九年二月)

从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红军主力长征，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为时约有三年的期间，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和苏区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斗争。这段斗争，通常叫做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是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经验，机械搬运教条，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而遭致了惨痛的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这个退出，是逃跑主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1]同志负责），和中央政府的办事处（我任主任），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

这时，在苏区军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中央苏区是个大块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和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这种战争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七年，红军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革命由低潮日益转入高潮。而今，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敌人大军压境，整个苏区被一片乌云笼罩着，一场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

在这样的情势下，苏区的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敌人即将进入苏区，革命又落于低潮，苏区失败已成定局。失败就是失败，应该承认这个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应当冷静地面对现实，认真地组织这次退却，迅速地，坚决地适应形势，抛弃旧有的一套，实行彻底的转变。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坚决分散，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要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这样转变过来，退却下来，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给形势以若干影响，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这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实行这个转变是艰苦的，但是必须的。只有彻底实行了这一转变，才能渡过这个风暴，转入胜利；不能实行这个转变，就要失败。

但是，对于面前的严重局势和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仍然“阴魂不散”、“余孽犹存”，影响着一些同志的行动，继续葬送着中央苏区。

他们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敢承认失败，而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转移之后的打胜仗上。他们认为主力一出动，在湘桂边连打几个大胜仗，敌人就会撤走，中央苏区就会恢复，轰轰烈烈的局面又会到来。当然，如果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外线作战，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持并发展了苏区。但现在情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五次反“围剿”在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的结果，

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特别是转移时所表现的逃跑主义，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五六万军队就带了两三万非战斗人员，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想打胜仗是很困难的。

由于不肯承认失败，把希望放在红军大捷上，他们便不肯从事这个适应形势的转变，甚至讥笑这种主张是“悲观失望”。当时，还留下了一个主力二十四师，另有八个独立团[2]。按正确的做法，这部分力量应该立即化整为零，分散到苏区几十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当可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但他们主张把这些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训练，准备打大仗。他们说：“我们主力一个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而且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搞正规军团……总之，还是迷恋着旧的形式，企图用旧的一套再搞起大苏区，来“旧梦重温”。但他们忘记了，正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才把一个大苏区搞垮了的。当红军主力在的时候尚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不得不撤出，这十几个团又怎能拼得过？而且，部队在苏区失败之后，战斗力、战斗意志已不比从前了。记得主力撤出后不久，广东军阀部队一个营把粤都南部的一个口子占领了，我们要去夺回来。去了八个团近一万人去打，打了四天四夜没有打下来。

这时，实行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主力撤出之后，在历次战役中被我们打怕了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敢贸然进入苏区，他们对红军的转移作了种种的判断，担心这是一个圈套，只好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二月，苏区才完全沦于敌手。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这五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形势转折的一个过渡时期。如果当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不是追求旧形势的再现，而是立即实行转变，是可以转过来的。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七年的苏区人民，是十分顽强的，还有各县区的党政机关和一万六千人的军队，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这几十个县，每个县都有二三百人，那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就可以保存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革命武装；这几十支游击队的活动，就可以保持更多的游击根据地，牵制更多的敌人，给局势以更有力的影响。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却转变得迟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苏区都转变迟了。像闽西苏区，那里早已是敌后，有了一些游击斗争的经验，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3]等同志的领导下，及早地转入了游击战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4]、鄂豫皖等苏区，虽然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也大都先后完成了这个转变。

到了十一月底，敌人已经探明了主力红军的动向，开始向苏区的中心推进。我们在错误指导下，几个战斗都没有得手，再坚持下去是不行了，受错误路线影响的同志这时才同意实行这个转变。当时，曾拟制了一个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说明了从正规到游击、从集中到分散的必要性，要求各地改变旧有的大摊子作风，分散成小组，打埋伏；这样避敌锐气，渡过这个大的风暴、保存力量。在政治上要击破敌人初入苏区时所搞的政治阴谋，夺取敌人搞的“自首大队”的领导权，保护群众，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许多地方已经垮了，电台也叫不通，这个精神没有传达下去。最后只有距离较近的瑞金县委接到了这个指示，钟得胜等同志按照这个精神作了应变的准备，坚持了下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

这时我们便着手收拾中央苏区的摊子。要隐蔽苏区的资财，要动员群众疏散，要安排伤员，分散部队……。中央苏区是一个国家，物资很多，长征



部队去的时候尽量带了一些，但留下的还是不少。如书籍、机器、医药器材，还有苏区最宝贵的财产钨砂，都要掩埋起来。

尤其难以处理的是伤员。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住院的有一万多伤员，一些轻伤的随队去了，重伤的还有两千多人。看来不改变办法是埋伏不下去了。当时因为我也是伤员，便指定我去动员他们疏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敌人，牺牲只能牺牲一个，不要叛变，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讲这番话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伤员们都静静的听着。有的喊：“只要告诉我们就行！”有的说：“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了！”至今，每当忆及这一情景，还仿佛听到这种喊声。只有最坚强的战士，在面临如此严重危险的时候，才有这种英雄的气概。

我们和地方党的同志，把这些伤员交给了当地的群众。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关的。于是又是一个动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你驮一个，我抬一个，半天的功夫，两三千伤员全被抬走了。

这些疏散工作就绪之后，敌人已经深入到了苏区的腹部，我们被迫撤到了山上。这时候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老百姓满坑满谷，东边枪响往西跑，西边枪响往东拥，一片国破家亡的景象。到了这时，才更深刻地体验到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全部后果。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特别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便决定突围。部队十几个团，分成五路向外突，但是，因为行动迟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固的包围圈，突围的部队对新的斗争形式缺乏了解，没有独立活动的的能力，结果突围部队除少数冲了出去，大都失败项英、贺昌同志和我是最后突围的。往哪里突呢？曾经有过分析：第一条路是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苏区，且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找到长征部队的关系，但高山大岭，又逢雨季，敌人封锁太严。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那里距离较近，两天两夜可以赶到，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敌人交通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站不住脚。第三条路是到井冈山去，这里地跨两省，地形很好，过去毛主席就在这里建立过最初的红色根据地，估计还有游击队，但要过赣江，敌人控制得很严，过不去。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虽强，我群众基础也强，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李乐天同志曾经在这里坚持游击斗争。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

突围的日期是二月十日[5]。动身之前，我们和中央通了一次电报。我们向中央报告了中央苏区的情况和突围的决定。接到了中央的回电，谈到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关于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指示：要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这是最后一次与中央通报，此后电报机破坏了，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便与中央断了联系。

中央的来电，遵义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立，对于我们这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之害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

鼓舞。但是，我们的突围却是很不顺利的。在过会昌河时，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牺牲了。继续突围中，我们一个不足数的营也被打散了，最后只剩我和项英同志等几个人，几经辗转，化装到了粤赣边境的油山。

至此，我们总算是完成了这个转变，转入了游击战争。但是，这个转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像翟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柱[6]等很多党的优秀的干部，在这大变动中牺牲了，上万人的部队垮了，整个中央苏区连最后一个村庄也落于敌手。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恶果，是沉痛的教训。

油山，是粤赣交界处的一座大山。粤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山为中心进行的。这里原有党的粤赣特委，由李乐天、杨尚奎、刘建华[7]等同志带领着特委机关和一支游击部队在这里坚持。此外，在上犹、崇义地区，蔡会文、陈丕显[8]同志带领三百余人在活动，钟得胜同志带有二百余人在汀（州）瑞（金）一带活动。至此，整个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就剩下了这几块山头，上万的军队，就剩下了这一千多人。

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了。

这时，敌人已经完全占领了苏区，我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但是，就连敌人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懂得红军的主力向西走了，革命之火会随着长征部队的行动而蔓延开来；他们也懂得，留在苏区的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火种不灭，终必燎原。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消灭长征的部队；又指令一部分正规部队会同各省的军阀、地主武装，全力消灭战斗在南方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

敌人对付游击队的手段是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的。

他们知道游击队的生存条件是依靠群众，因此，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具体的办法，除了疯狂地屠杀镇压群众之外，对游击队便是封山、封坑。他们把山区和邻近山区的村子里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到山外去，实行井村，用密集的确堡把山封锁起来。然后在群众中实行保甲制[9]，搞连坐法，并利用地主民团加强乡村的统治，经常点名、检查。检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天天查，一天查几次，有时几天不查，突然袭击一下。在经济上，对于主要的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等，实行定量分配，以断绝游击队的物质供应。

这样还怕控制不住，对挨近山区的村子，便派人化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的伤兵，半夜拍门“我是分散的游击队，讲讲阶级友爱，弄点饭给吃吧！”老百姓答了话，立即抓起来，以此挑拨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

此外，还搞种种欺骗宣传，在我们内部组织叛变等政治手段。

这样，在遮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之后，在军事上便是大规模清剿，频繁的搜山。几路队伍，带上猎犬，围攻山区，到处打枪，到处喊叫，后来甚至连探照灯也搬到山里来了。

搜山搜不到我们，便将山林倒上洋油，纵火烧山，烧得野猪、山牛满山吼叫，长蛇到处乱窜。这样还找不到我们，便化装成老百姓，找个地主婆娘弄个饭篮子带着走前头，满山喊：“游击队同志，反动派去了，给你们送饭来了。”或者装成砍柴的、打猎的、种香菇的、烧炭的来欺骗我们。要不就派人到高山上去望了望，看哪里有我们烧饭的烟；或是派人躲在山林草丛里，听有没有我们的动静；派人到小道上，看草，看山石，有没有我们的足迹……一发现痕迹，立即就追。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击队几乎失去了一切正常生活的条件。

房子是没有的，开始还能搭茅棚子，很简单，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用竹子搭，把竹子破成两半、在棚顶上排起来，像琉璃瓦。后来因为棚子目标大，不能住了，就用雨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便睡起来。天晴，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卧看星星月亮，与天地同归了。大庾岭上的雨季十分讨厌，于是又想出了新办法：弄几块雨布，四只角上钉上绊子，往树一挂，便可遮露挡雨，搬起来也方便，把雨布一解，地上扫扫，每班都有构子，泼上点水，把痕迹灭掉。

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上个“靠山的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或是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大树棵里，马蜂多得很。搞个竹蔑背斗护着头脸，把蜂窝一烧，马蜂飞去了，然后将幼虫搞下，把来一炒，跟蚕蛹一样香脆。做汤吃，白的像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明，一照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有群众送来米粮，也可以煮点饭吃。不过部队流动性大，煮饭的家具就要事先筹备，有机会搞些小锅子来，在野草丛中东丢一只，西丢一只，用时就去找。或者干脆将米和水装到鲜竹筒子里，丢到火里烧。此外，山上也不会完全断人，春天有造纸的来，冬天有烧炭的来，他们是反动派特许进山的，带得有配给的粮食，请他们匀出一点来，可以略作补助。所以，完全挨饿的时候也并不多。三年的时间，我真正吃不上一点东西的时候只有三天，那是与敌人猝然遭遇，被打散了，带的一小包盐，一天吃完了，只能爬到水沟里喝点水，嚼点野草，第三天便遇到了自己的同志。走路也不能不非常诡秘。不能走路，只能拣没有路的地方走；不能讲话，不能咳嗽，更不能留下脚印。为了消灭形迹，走过之后要把踩倒的草扶起来。落雨天走路，走走又退回来，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而且不能失落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

四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个正确的方针和统一的意志、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正确的方针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为依据的，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基本认识是：红军撤走，敌人进占苏区，这是一个大失败，是革命的低潮，是一次退却。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在哪里？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主力红军会派队伍回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无暇顾及我们；即使站住了脚，也要发展新的根据地。这种情势下，我们南方是在援助主力；而主力的胜利和成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但要直接派队伍回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是不是再由小到大，搞个大苏区？”这也不可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了。

我们所说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攻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

基于这种政治估计，敌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就不可能是进攻的，而是退却的。退下来，转变过来，保存革命力量，长期坚持，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牵制一部分敌人，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给时局以若

干影响，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样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和北方的主力红军夹击，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事后看来，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基于这种分析，当时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记得我们曾经对同志们讲过：“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

这是对形势的基本认识，是说明问题的出发点。由这一点出发，便可以说服同志们忍耐艰苦，坚持斗争；由这一点出发，便确定了：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当然，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政治分析和论点，也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了的，因此，贯彻这一方针就不能不充满着斗争。

这时，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主张拚。他们认为：“苏区失败了，我们躲在这里打埋伏是可耻的。拚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形式上很“左”，实际是右的，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不懂得，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的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其实，这样做正符合了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他们最希望你来拚，拚掉一个少一个。

另一种人则是神经衰弱，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倒了，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而悲观失望，丧失了信心。他们借口怕暴露，而主张消极的打埋伏，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来。由于斗志消失，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义的道路，搞点吃的，搞点钱，丧失了共产党的政治面目，变成了土匪。或者动摇逃跑，叛变革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他们不了解，我们到这里来打埋伏，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发展，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响亮的斗争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上，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给形势以影响，推进革命高潮；任何悲观消极，不但不能保存，而且会导致灭亡。

为了使正确的方针得以贯彻，就要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盲动，反对悲观消极。正确地分析形势，不断地阐明我们的方针，天天讲，大会小会都讲，成了当时政治工作的中心的内容。

经过这一番工作，绝大部分的同志接受了这个方针。他们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地投入了游击斗争，在这残酷的斗争中，我们茹苦含辛，流血牺牲，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他们是阶级的硬骨头。但是，也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是随着土地革命的高潮卷进来的，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动摇了，随潮而退。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留帖告别了，有的干脆叛变了。

当时，对于如何巩固部队内部的问题上，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制的，有的表现不好，讲些怪话，便开斗争会；对动摇逃跑的，采取极端的手段镇压。夜间放哨，怕一个人靠不住，便放两个三个。

显然，这种方式是极端错误的。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疑忌，破坏了团结。有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方式而垮了的。当然，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应当坚决予以镇压。但对队伍内部，主要是强调民主，强调自愿，

强调说服。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对于那些思想动摇的人，应该用说服的办法，劝说他留下来坚持；能坚持当然好，经过这段考验和锻炼，将来在新的革命斗争中是骨干。但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甚至帮助他走，发给路费，帮他换好便衣，找好路线，让他安全地到达家中，甚至他路上被反动派抓住，还要组织黄色村庄的人去保他出来。这样公开的处理动摇问题，做到仁至义尽。这种政策很好，公开了之后，有的本来动摇得要命，也坦白出来不走了；有的走出去，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认识，巩固了团民主，是革命军队内部生活的重要准则。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充分的发扬民主。游击队严格地保持着红军的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打土豪得来的钱大家分着背，有什么开支经过民主讨论，定期公布账目，人人都是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成员，人人都对集体负责。

还有重要的一条，便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时钱很少，但大家一样忍受艰苦，吃草根，打赤脚，上上下下谁也不特殊。这样，保持党的作风，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不让党的政治面目受到损害，才能加强内外的团结。自然，最重要的还是正确地阐明局势，进行正面积极的政治教育。有人说打游击没法做政治工作，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否定了这种谬论。要做，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只要条件许可，我们就搞起各种学习，讲游击战术，讲军事，讲苏维埃运动的总结，学文化。那时从外面搞到一些书报和小册子，便拚命地学，这也是为将来局面开展进行的必要的准备。分析形势更是随时地进行，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讲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讲我们坚持斗争的意义和前途，使全体人员的意志在对客观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牢固地统一起来。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处境的艰苦、险恶，在指明前途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目前的困难。只有对目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这些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五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统一的意志，还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鲜明准确的政治口号和灵活的游击战术。

敌人对各游击区的进攻是疯狂的，但敌人内部的矛盾却暴露得更清楚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占了华北，抗日战争势在必发。一九三六年夏，又爆发了“两广事变”[10]，这个事变虽然以两广军阀投靠蒋介石而结束，但蒋桂、蒋粤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此外当地土豪与军阀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领导上就要正确地分析掌握这些矛盾，利用这些矛盾，根据这些矛盾制定出新的斗争策略。

当时的主张是：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游击队一定要以党的名义，表示态度，发表宣言，及时提出斗争口号。像“两广事变”，即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华北自治事件[11]就发表《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告士兵书》等。并派队伍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展开宣传活动。

在那样的条件下，发传单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印刷条件，只能用笔抄写十几份，还要派交通员冒很大的危险跑到公路口、桥梁、乡镇去张贴。影响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敌人引进山来了。这种活动当即遭到了右倾主义者的非难。他们借口避免暴露、反对提任何政治口号。他们说：“有什么影

响？自找麻烦！”

我们回答这种讥笑说：“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就是了。”

事实如此，鲜明而又及时的政治口号，震惊了敌人，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这些传单，印在了人民的心里，指导和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群众说：“国民党天天说游击队垮了，其实人家还在，共产党还在。”

游击斗争必须和群众斗争和地下党的活动结合，把公开、半公开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游击队与群众秘密联系，组织群众的合法斗争，在城镇建立白区工作，进行国民党士兵的工作，甚至在南雄、大厦城里也建立起秘密工作机关。在实际斗争中，游击队摸索到了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便是搞“黄色村庄”。

在游击斗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赤白尖锐对立的局面——山上和靠近山区的村庄，凡游击队力量所及之处，搞起赤色区域，和反动派控制的白色区域对立。对白区的国民党政权人员和土豪劣绅，不加区别，一律镇压，并且不断扩大赤色区域。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错误的。因为游击斗争是长期的，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搞一次赤色村庄，群众就受一次摧残。结果游击队成了祸害之源，成了“火神”（游击队一来，敌人就烧房子、杀人），这是不能长期巩固与人民的团结的。于是便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结合军事压力，搞革命的两面派，从政治上争取反动保甲为我们工作，应付敌人，搞“白皮红心”。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保证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黄色村庄与比较进步的地主、开明士绅及其知识分子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推动抗日工作。

这个策略很重要。但是在搞这种两面派时，除了警惕争取对象可能“反水”之外，在内部还必须同另一种倾向作斗争，那便是单纯做地下工作，下山去到“黄色村庄”搞半公开斗争，而忽视坚持武装的重要性。因为斗争实在是太艰苦了，以我为例，在三年中我只两次进了房子，四次看到了老百姓。这长期的山林生活，餐风饮露，忍饥耐寒，有的人厌倦了，现在有了“黄色村庄”的条件，便插枪到村镇里去。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就削弱以至取消了武装力量。经验证明，游击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政治旗帜必须坚持。党的武装，这是敌后游击斗争的主要方面，是我们的本钱。抗日高潮毕竟是要到来的。共产党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取决于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弱、武装的多少；只有有了枪杆子，我们才有发言权。

打游击，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游击战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系统的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继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叫化子打狗靠面墙”，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粤赣边的游击斗争，一开始便是以油山地区为根据地，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在有根据地作依托的前提下，还要有一套灵活的战术。首先，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务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方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又不是消极埋伏，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不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

既然是打这样的仗，就有这种仗的打法。游击队人少，枪弹少，打硬仗

是蚀本的。因此伏击、袭击便是作战的主要形式。游击队三五个人、十来个人，分散活动，和人民结合，把情报、时间、地点搞清楚、弄准确，出其不意，隐蔽接敌，枪一响，几分钟就解决战斗，解决了就走。或者远途奔袭，一夜急行几十里、百把里，插到敌后去，来一个“摸冬瓜”，一下子把敌人的区公所、乡公所搞掉，土豪抓来。这样的战斗，再加上发传单，写标语，地下党的策应，代价小，收获多，影响大，造成对敌人的威胁。

当然，也不可能每次战斗都能取得主动，在奔袭战斗或者在敌人“围剿”中跳圈子的时候，也有时和敌人遭遇，或者遭到敌人的袭击。这是最讨厌的情况。因为不成对手，一打就只好分散隐蔽。这时，最要紧的是沉着。好在山深林密，你躲起来，只要敌人看不见你就别动。敌人是很狡猾的，看看搜不到，骂一声：“哼，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哨子一吹，故意弄得人马杂乱，其实一个连走了不过一个排，三分之二留下来。但我们是打埋伏的老祖宗，懂得他这一套，就给他个不出来。两个钟头以后，倒是敌人沉不住气了，当官的一跳出来，又是一阵咒骂：“嗨，土匪真沉着。告诉你这次真走了。”又是吹哨子，集合，喊口令，叮叮当当，看样子真走了，但走过不一会，一个回马枪，又包围上来了。我们还是一样，树不摇，草不动。当官的这次更火了，跳着脚骂：“好，有你的！你有本事出来干！”于是机关枪、迫击炮往山里胡打一气，一边打一边乱叫：“看，那里一个，大石头底下。出来，出来，看见你了。”再不弄个人假充游击队员：“别打了，我讲：那边还有几个同志……”有时我们的人也会在这乱枪中受伤，但不管伤多重，都忍住不哼。敌人胡搞一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就凭着这套办法，游击队才能做到打得对，打得巧，杀伤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八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們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粤赣边的人民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还在北伐战争中，这里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起过农民暴动，大革命失败，又暴动，搞起苏区，苏区又失败。在这长期斗争中，人民不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这一带差不多每个庄子都被烧过，反动派的恐怖手段、改良主义……什么阴谋他们都懂得。他们和反动统治，和地主阶级结下了很深的冤仇；和共产党结成了生死的同盟。他们坚信革命只是暂时的失败，将来一定能够胜利，因此，不管条件如何，总是舍死忘生地支持我们。

群众对敌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时便衣游击队员或地下党员被捕了，群众便千方百计地去营救，组织起来去请求释放，打官司，告状，用钱赎，动员和尚、道上、老太婆去哭……样样都来。群众的积极分子被捕了，他明知一切情况，但受尽各种酷刑，就是不讲。他们从切身的体验知道，讲了，敌人还要追查；要死就死一个，决不害共产党。这是全体群众的共同信念。儿子被捕了，母亲就给反动连长送老母鸡，又哭又叫，哭得敌人不耐烦了，骂一句：“去劝劝你儿子！”儿子被打得半死了，母亲一面擦抹着儿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着说：“连长大人要我劝你，你要知好歹，千万别乱说，要讲实话，连长大人会开恩的。”儿子听了这样的嘱咐，心里明白了，更坚定。

敌人实行移民并村、封山封坑，群众与游击队联系不上了，老百姓就到

敌人那里去闹：没有饭吃，没有柴烧，要进山去种地、打柴。敌人是不会掏腰包养活老百姓的，只好派出队伍押着进山去，于是，种田的带上干粮，打柴的把竹杠子打通，装满粮食、盐、报纸、咸鱼、腊肉，和敌人活动的情报，到深山里，四处一丢。我们得到消息，晚上去一摸，便得到了供给。这个办法后来被敌人晓得了，敌人便利用这个机会，到老百姓活动过的地方去伏击我们。但我们也很警觉，一定要看准了才去拿，或者乘机调动部队打他一下。有时，敌人也用丢东西的办法侦察游击队的踪迹，但我们早已从群众那里得到了情报，根本不动他的。过几天，敌人看看东西还在，误以为游击队不在这山，倒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这时只是怕便宜了老虎，老虎把东西吃掉，游击队倒跟着倒霉了。

对于靠近山区的村子，敌人知道游击队常常出没，便来个突然袭击，把庄子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的来人。通知游击队是来不及的，但群众有的是办法，这时候，庄前庄后，庄里庄外，树梢、墙头，场坝边、窗户旁，到处是暗号。比方一位老太太在村头放牛或打猪草，反动派喊一声：“土匪在哪里？”“不知道！”“回去！”“回去就回去”。她随手把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是把草帽挂到竹头上，我们的交通员一见，就不进去了。

总之，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支援游击队的动人故事是数不完说不尽的。

他们这种忠心不贰地支持游击队的行为，直接教育了我们。“人家那样对我们，我们要好好地干，不要辜负人家。”这成了全体游击队员的决心。有时，我们带些同志到老百姓家看看，谈谈，见到他们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房子被烧了，东西被抢光了，但毫无怨言，这等于给我们上一堂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的课。同样的，我们在山上吃草、吃树根，冒着大风大雪打赤脚、睡树林，牺牲一个又一个，这也使老百姓很受感动。再加我们对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反动派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我们拿打土豪得来的钱给修，反动派打死了老百姓，我们派人送钱去慰问。这样就巩固了我们与群众的生死同盟。就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证了我们得以生存，走向胜利。

七“西安事变”，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在南方各省，和平却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才实现的。

蒋介石被释放不久，表面上答应谈判，但实际上却集中了大量部队向各游击区疯狂地进攻。敌人的阴谋十分明显，是要消灭我们这些武装力量，把你搞完了，还谈什么？因此，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始了三年来最紧张的时期，天天打，日日夜夜打。我们看出了敌人的意图，决心熬过这艰苦的日子。终于，这一天来到了，七七事变爆发了。七月十一日，十二日，日子一天比一天平静，国民党军队撤走了，接着大庾、南康、信丰、南雄各县统统派出代表和我们联络，说什么“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呀，什么“爱国志士，无任钦佩”呀，腔调大变。

于是，又一个新的大转变开始了。

游击队一面趁机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大发展的局面，一面派人到大庾、赣州去探听虚实。派下山的人一路被国民党大拍马屁，他们希望游击区能派一个负责同志去谈判。

我们和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对中央的政策不了解。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不行的，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能联合起来，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



要联合，就得充分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谈判的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以交通的方便，以便能迅速和各游击区联络。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央负责，游击队无权谈论。

于是，我们便派出代表，到赣州、到南昌和敌人谈判，最后会合了党中央派来的同志，在中央的指示下，和国民党订了一个协定，又派出入到各个游击区去，传达中央指示，勾通联系。停战全面实现了。

从坚持敌后斗争到国共合作，这又是一个大的转变。它像开始转入游击战争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地完成了这个转变的。

这时，最主要的危险便是政治上的右倾，走向投降主义。由于形势来得突然，游击区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在新形势下便过分相信敌人，敌我不分，以为合作了便是一家人，从而丧失了政治警觉，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人认为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说什么“拥护蒋委员长”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呀，只走上层路线，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宣扬这一错误路线的结果，便使得本来就缺乏思想准备的某些人、某些地区，政治上更加松懈，在敌人的阴谋袭击面前，手足无措。像闽南何鸣[12]领导的游击队，就由于对敌人丧失警惕，而陷于失败。

另一种便是对新形势缺乏认识，拒绝新事物，固执旧的一套。有的发牢骚说：“我们辛辛苦苦搞了这多年，现在却要与阶级敌人合作了，要编成国民革命军了。”这种想法本质上是好的，表现了坚定的阶级立场，但这是机械的阶级斗争观念，不能适应新的高潮，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容易陷于孤立。

因此，坚持正确路线，就必须向这两种倾向进行斗争，批评这种右的倾向，说服那些不愿合作的同志。特别是要在这个转变中扩大自己的力量，发展游击武装。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了。我们真的在国民党欢迎的军乐声中走下了高山密林，告别了游击区的群众，走向了抗日的敌后战场。

注释：

[1]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武昌人，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第三届至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主席、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陈毅等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2]八个独立团，指江西军区独立第一、二、三、四、十一、十二团和原属江西军区后划归赣南军区的独立第十三、十四团。

[3]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历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张鼎丞（一八九八——一九八一），福建永定人，历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红四军纵队党代表、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土地人民委员等职；谭震林（一九二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历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茶

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特委书记、红四军纵队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张鼎丞和邓子恢、谭震林一起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分别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共同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4]赣东北，在一九三三年赣东北苏区改称闽浙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称皖浙赣边区，陈毅在文中是沿用早期的称谓。

[5]突围的日期是二月十日，实际时间是三月四日下达突围命令，五日开始突围的。

[6]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柱，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人民委员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突围时在闽西水口附近被国民党军搜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何叔衡（一八七六——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历任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湘江学校校长、上海互济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监察人民委员、中央临时法庭主席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突围时，在闽西水口附近被国民党军包围，壮烈牺牲。贺昌（一九一六——一九三五），山西离石人，历任中共江浙区委委员、广东省委常委、南方局宣传部长、北方局书记兼顺直省委书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在会昌河突围中壮烈牺牲。阮啸仙（一八九七——一九三五），广东河源人，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书记、广州农讲所政治教员、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在与国民党军作战中壮烈牺牲。刘伯坚（一八九五——一九三五），四川平昌人，历任西北军冯玉祥部政治部主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在江西信丰与国民党军作战中负重伤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带镣行》等不朽诗篇，三月二十一日在江西大余英勇就义。李天柱（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曾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历任营长、纵队司令、湘东南独立师师长、湘赣军区副总指挥、红八军代军长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江西寻乌突围时壮烈牺牲。

[7]李乐天、杨尚奎、刘建华，李乐天当时任中共赣粤边特别委员会书记、赣南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尚奎任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信康赣雄特别委员会副书记。刘建华任中共信康赣雄特别委员会少共特委书记。

[8]蔡会文、陈丕显，蔡会文当时任赣南军区司令员；陈丕显任中共赣南省委少共省委书记。

[9]保甲制，是国民党政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决定实行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规定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及各种强迫劳役法。

[10]“两广事变”、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实力

派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宣布“北上抗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采取分化利诱等手段，迫使陈济棠在这年九月下台，接着又同李宗仁、白崇禧取得妥协，事变遂告解决。

[11] 华北自治事件，指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一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壓力，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剥夺中国对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所行使的主权，使中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

[12] 何鸣（一九一——一九三九），广东万宁人。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团长，作为特委谈判代表，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就合作抗日问题谈判达成协议。一九三七年七月，他根据协议率领红军游击队近千人进驻第一五七师指定防地漳浦城接受改编，由于存在右倾思想，缺乏应有警惕，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

